

Peter Hessler

何偉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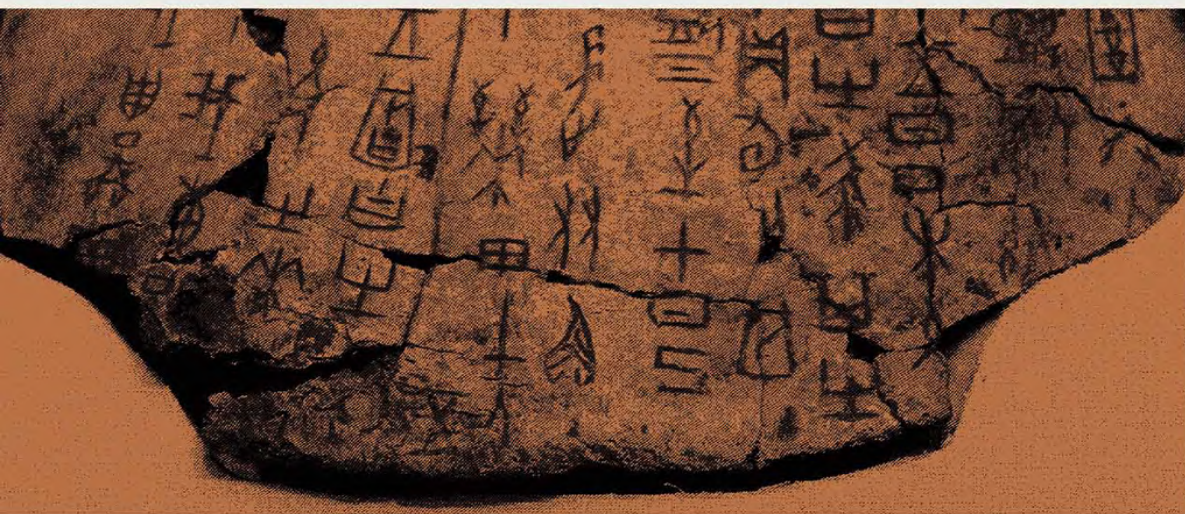
02

# 甲骨文

## 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



何偉

A century ago, outsiders saw China as a place where nothing ever changes. Today the coun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regions on earth. That sense of time—the contras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and the rhythms that emerge in a vast, ever-evolving country—is brilliantly illuminated by Peter Hessler in *Oracle Bones*, a book that explores the human side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盧秋瑩 —— 譯

# 甲骨文

## 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



# 何偉

A century ago, outsiders saw China as a place where nothing ever changes. Today the coun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regions on earth. That sense of time—the contras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and the rhythms that emerge in a vast, ever-evolving country—is brilliantly illuminated by Peter Hessler in *Oracle Bones*, a book that explores the human side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何偉作品集  
——  
02

# Peter Hessler

唐秋堂 —— 譯

# 甲骨文

何偉作品集  
—  
02

---

## 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

---

何偉

Peter Hessler

盧秋瑩 譯

作者

何偉 (Peter Hessler)

原名彼得·海斯勒，「何偉」為他的漢名。1969年生，在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長大，於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並在牛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何偉自2000至2007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至2016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2019年舉家搬到中國四川，並於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授課。

何偉最膾炙人口的作品為「中國三部曲」：《江城》曾獲桐山環太平洋圖書獎，《甲骨文》入選2006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尋路中國》獲選《紐約時報書評》百大書籍；此系列與專欄合集《奇石》成為中國觀察與非虛構寫作的必讀書單。另著有《埃及的革命考古學》，為他派駐開羅時的政治與社會觀察。《別江》則為他2019年重回中國後寫下的最新著作。

2008年，何偉因卓越的報導而獲得美國國家雜誌獎；2011年，何偉以其筆下「敏銳觀察中國平凡百姓如何應對改革時代社會快速變遷的複雜生活」之紀錄，再獲麥克阿瑟基金會表彰。

譯者

盧秋瑩

美國麻州愛默生傳播學院媒體藝術碩士，自由作家和譯者。譯有《好賊》、《奇蹟之邦》、《一個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實日記》、《離開悲

傷之後》、《抵達真愛之前》等書。

## 目次

### 第一部

#### 【古文物A】 地下城市

#### 第一章 中間人

#### 【古文物B】 文字的世界

#### 第二章 美國之音

#### 第三章 斷橋

#### 【古文物C】 城牆

#### 第四章 一夜之城

### 第二部

#### 第五章 澱粉

#### 第六章 好萊塢

#### 【古文物D】 龜之聲

#### 第七章 夜空不寂寞

#### 第八章 移民

#### 第九章 四合院

#### 【古文物E】 青銅頭像

## 第十章 週年慶

## 第十一章 四川人

## 第三部

### 【古文物F】 書

## 第十二章 政治庇護

### 【古文物G】 鑿不裂的骨片

## 第十三章 奧運會

## 第十四章 風沙

### 【古文物H】 字

## 第十五章 翻譯

## 第十六章 國旗

## 第十七章 直接入鏡

### 【古文物I】 馬

## 第十八章 餛飩西方

## 第十九章 選舉

## 第四部

## 第二十章 唐人街

### 【古文物J】 批判主義

## 第二十一章 國是訪問

【古文物K】 遺失的字母

## 第二十二章 濃縮精華

【古文物L】 抄錯的字

## 第二十三章 巴頓將軍之墓

【古文物Z】 賣掉的字

## 第二十四章 茶

後記

謝詞

參考資料





獻給我的姐妹——艾咪、安潔拉、布莉姬塔

# 第一部

【古文物A】

## 地下城市

從現在的首都北京，來到古中國文明搖籃的安陽，搭火車要花六個小時。我坐在窗邊，有時不免覺得單調麻木。窗外的風景如壁紙一樣地重複：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這份重複的感覺並不新奇。一九八一年，美國歷史學教授吉德煒搭乘同一線火車到安陽。之後，他在家書裡寫道：「這片土地大多是平坦無奇的，每個村莊都很相像……上流莊園、別墅、英法式的大宅大院在哪兒？這個社會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無法產生出可以紀念貴族生活的建築呢？」

時間拉回現在，風景如故：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一九三〇年間，有位定居中國的外國人杜布森曾經寫下：「河南沒有歷史。」如今，這說法似乎說不通，因為，這裡是眾所周知的殷商遺址。商朝出現過東亞地區最早的書寫文字，那些文字被鑄刻在龜甲和骨頭上，就是西方人所稱的甲骨文。如果我們把歷史定義為書寫的紀錄，那麼，河南的這個地帶就是中國的起源。

不過，訪客通常更感興趣的是起源之外的事。再回到從前，回到一八八〇年代，美國人威爾遜<sup>1</sup>寫道：「自中世紀以來，他們（指中國）完全沒有知識上的追求。」他進而解釋說：「他們的歷史起源用幾個小章節就講完了。」這種觀點跟西方人注重軌跡與進展的角度有關。就傳統西方人看來，中國的往昔跟羅馬淪亡、文藝復興、啟蒙時代無法相提並論。相反地，中國只有一個皇帝推翻一個皇帝、一個朝

代接續一個朝代，歷史就如壁紙一般。在克利佛德《對中國的真實印象》這份關於西方人在中國的旅遊報導分析中，他描述了一種十九世紀外國人的觀點：「誰也無法否認中國的過去比西方來得長，但問題是『過去』和『歷史』是不一樣的。中國的過去裡沒有敘史只有故事。」

在安陽一處叫洹北的考古遺址裡，一小群人正在田野作業，構思著一座地下城市。這座城市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三、十四世紀，那時商文化達到了顛峰。如今，商朝正躺在一點五至二點五公尺深的厚土下。農人在這片泥土上耕種了幾個世紀，渾然不知有一座城市正躺在地底下等著人們發現。

洹北的層層泥土是隨時間累積而成的。這遺址以洹河為界，不定期的洪災把泥土沖積到遺址上。除了泥土還有黃土，特別是那些來自戈壁和其他西北荒漠，又乾又薄的黃土飛沙。黃土極易隨風而吹，幾個世紀下來，它一層層地隨風往南，囤積在像安陽這樣的地方。在中國北部，有些黃土甚至可以堆疊達一百八十幾公尺高。

在世界其他各地，考古學家上窮碧落下黃泉，找尋著已淹沒遺址的各種可見的蹤跡。但在安陽，光用肉眼是不夠的。若只用二維空間的角度來看安陽，它不過是一片平土。跑田野的人們在一個叫作荊志淳的年輕考古學家的領導下工作，他談到了在這樣一個地方從事研究的挑戰性。

「你得用立體的角度來看這片風景，」他說，「你得去觀察它是如何進化的。它可能跟三千年前完全不同。我們用的是三維空間的角度來看一個人類社會，而不是只看它的表面。我們必須增加另外一個維度，時間的維度。放眼望去，你可能什麼也沒看到，但事實上，這

裡是這一帶的第一座城市。如果不把時間加進去，你什麼也找不到。」

這些工人都是本地農民，他們使用「洛陽鏟」掘土，這是一種中國考古學上特有的挖掘工具。在洛陽這個曾是中國眾多古都之一的地方，歷代的盜墓賊把他們精湛的技術用在了工具發明上。他們會用一支圓管狀的鏟子切成像勺子的兩半，再接上一根長竿子。你把鏟子筆直插入土裡輕轉一下，就可以抽出一管長約十五公分、寬不到五公分的泥土；一次一次地重複幾十次後，土洞變成了約兩公尺的小坑道，就可以取到更深的泥土。坑道夠深時，取出的樣土裡可能會有一些瓷、骨或銅片，或是傳統上被用來建築的厚實夯土。

盜墓者發明了洛陽鏟，二十世紀前半時，中國考古學家把洛陽鏟改造成考古工具。一位有經驗的考古學家能從深土中挖出的土壤看出它的成分，用來推斷自己是正站在被掩埋的古牆或墳墓上，或者只是廢坑一片。那把泥土，如同一段一眼就可讀出的文字，告訴我們地底下的世界。

荊志淳和其他考古學者在安陽的洹河流域讀泥閱土已多年。他們先從系統化的調查開始著手，在一大片田地上挖土鑿洞，尋找任何可能的建築遺址。在一連串隨機的鑽孔取土過程中，出現了一樣東西：夯土。它寬約六公尺，埋在大約六十公分深的土層下。他們繼續探查，並意識到這些夯土如箭一般向前延伸。他們跟隨著夯土跨越一畝畝黃豆田，一路上留下了更多的坑洞和土堆。三百公尺、一千公尺，更多的坑洞、更多的土堆，突然那夯土線停了下來，他們撞上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轉彎：一個轉角。這時，他們明白了，那應該是一片聚落的圍牆。他們持續追蹤著夯土的邊界以及其他內部結構。這群考古學家正構圖出一座現代人從未見過的城市。

這些都只是考古初期的步驟，鑽取土壤樣本之後，他們將會展開更大規模的挖掘。不過，荊志淳似乎一點兒也不急。他總是慢慢來，謹慎地行動。三十七歲的荊志淳是個友善、笑容快速閃現的人。他的臉型是簡單的幾何形狀：圓頭、圓臉、圓框眼鏡。他在南京長大，但在明尼蘇達大學讀過考古學。他的文化見解之寬廣，有時很讓我驚訝。有一次，當我們一起從地表走過那座地下城市時，他告訴我要避免用政治的觀點來看待商這個王朝。

「很多人說到商朝，好像它很大似的，」他說，「那是因為他們把一個古王朝當作一個現代國家來看待。因為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殷商遺物，所以人們就理所當然地想，那個地方一定也是商朝的一部分。但你必須把文化的控制和政治的控制分開。如果要談政治實體，我會說，商其實是很小的，可能不會大過三條河流的流域（黃河、汾水、渭水），但它的文化影響就大得多了。這就好像如果我在這裡買麥當勞，你不會說我人在美國。傳到這裡的只是美國的文化。」

\* \* \*

農民們在秋天的陽光下汗流浹背地工作。他們的竿子跟著一片看不到的古代圍牆蜿蜒前進：挖一個洞，走幾步，再挖一個洞。如果你從沒聽過地下城市這回事，遠遠地看，他們的工作似乎毫無意義：一群農民拿著竿子穿過一片乾燥的土地，一個洞，走幾步，再一個洞。就這樣，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一個洞，走幾步，再一個洞。

---

1 編按：八國聯軍時，美軍在華的指揮官。



# 第一章 中間人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

我是《華爾街日報》北京辦事處的最後一名剪報員。辦事處很擠，只有兩間辦公室和一間改建而成的廚房。職員包括兩名外國特派員、一名祕書、一個司機和我。司機和我共用廚房。我的工具是一組美工刀、一把鐵尺和一張覆蓋著玻璃的書桌。每天下午，一疊疊的外國報紙堆在桌上，如果有某一則跟中國有關的報導看似值得留存，我就把報紙攤在玻璃上，剪下那篇報導，再把它歸檔在大辦公室後面的櫃子裡。我的月薪是五百美元。

辦事處位於市中心的使館區，離天安門廣場只有兩三公里。我在鄰近辦事處的北邊租了間便宜公寓。那一區新舊房舍混雜，破舊的磚蓋工人單位住宅和傳統的胡同裡，會穿插著一棟豪華旅館。在街角的走道旁，豎立著一塊霓虹燈閃爍的百事可樂大看板。那一帶的北京，生活花費還是挺便宜的。不到一美元就可以在餐廳吃頓午餐；而且，我不管到哪都以腳踏車代步。春天傍晚氣溫轉暖時，不時可以看到年輕的球伴藉著百事可樂看板的燈光打羽毛球。

在一切電腦化後，剪報員在大多數的外國駐北京辦事處裡已經算是過時的差事了。從前，報紙歸檔有其必要，年輕人也把這份工作當作進入新聞事業的入門。有時候，剪報員會幫著做些研究，遇到重大新聞發生時就幫忙寫點報導。這份工作通常一個星期只需要幾個小時就可以做完，因此有充裕的時間去旅行或自由撰稿。剪報員可以學到一些報業規則、學著寫些報導，最終成為一位正式的中國特派員。之

前，我雖然有些在中國的經驗，教過英文、學過中文，但是我從來沒當過新聞記者。就這樣，我帶了三袋行李、一疊旅行支票，和一張聖路易開出的、沒有寫歸期的回程機票到達了北京。那年我二十九歲。

小辦事處的氣氛不錯，這裡充滿了新報紙的油墨味，還有徘徊在舊石磚上的我一知半解的語言。這裡的外國職員和祕書用中文和英文交談，司機則是個帶濃重北京腔的大個子。剪報歸檔的時候，我把那些標題當成某一天我將會學到的語言素材。檔案按主題的英文字母順序而排列：

Democracy (民主)

Democracy Party (民主黨)

Demonstrations (示威遊行)

Disabled (行動不良的)

Disasters (災難)

Dissidents (異議的)

比較複雜的主題就再細分：

U.S.—China—Exchanges (美—中—交流)

U.S.—China—Relations (美—中—關係)

U.S.—China—Scandal (美—中—謠傳)

U.S.—China—Summit (美—中—高峰會議)

U.S.—China—Trade (美—中—貿易)

剛做這份工作時，我寄望可以從這些檔案裡學些有用的東西，我不時會拉出一個檔案夾，讀上幾十篇泛黃的、繞著相同主題報導的故事。不可避免地，我後來變成只瀏覽標題；到了連標題都看厭時，為了好玩，我就順著主題的字母，想著可以用什麼故事把它們串在一起：

Science & Technology (科學與科技)

Secrets & Spies (祕密與間諜)

Security (安全)

Sex (性)

有一組P開頭的六個單字，讀起來像是個因為過度自傲而釀成的悲劇：

Party (政黨)

Patriotism (愛國主義)

Political Reform (政治改革)

Population (人口)

Poverty (貧窮)

另一組則亂七八糟，教人一頭霧水：

Students (學生)

Style (風格)

Superpower — “New Threat” (超級強權—「新的威脅」)

## Superstitions (迷信)

### Tea (茶)

有一次，我跟辦事處的主管提到了上面的順序，他不以為奇地說，每一個中國特派員總有一天都會寫到和茶有關的報導。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架從懷特曼空軍基地起飛的美國B—2轟炸機飛到貝爾格勒，在中國大使館上空丟下多枚衛星導航的炸彈，炸死了三名新聞記者。《華爾街日報》為此建了一個新檔案：「美—中—使館轟炸」，排在「美—中—關係」之後。

\* \* \*

那次攻擊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好在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差做調查報導：我計畫寫一篇有關南京歷史的文章，這裡曾經是中國好幾代的首都。南京似乎是那種重大事件抵達其終點前總會路過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南京被不同的軍隊占領過，傑出的領袖來了又走，到最後，除了陵墓和沉默的紀念碑，什麼也沒有留下。即使是它的名字——南京，意思是南方的首都，都帶著紀念的味道。

古文物散落在南京四周。城外，明成祖永樂皇帝下令建造了世上最大的陵墓——明孝陵，來紀念他的父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西元一四二一年，在至今仍不明的原因下，永樂帝遷都北京，他的工程師留下了未完成的陵墓。他們大概從未想出移動這座巨大建物的辦法。

我去參觀明孝陵那天，遊客寥寥無幾。露天的陵園草木叢生，蜿蜒的坡上長滿了小樹和野草。一座被遺棄的碑亭包含三個部分：寬廣的碑座、拱形的碑額，以及石碑本身。躺在一旁的石獸，看來像是被

某個失智的巨人隨手推倒在地。石碑高約四十五公尺，最頂端有三層樓高。幾個世紀下來，雨水在碑身上留下斑斑雨漬，就像小孩畫了格子的寫字簿。除了雨漬之外，石碑一片空白，沒有人在碑面鐫刻出擬好的銘文。石碑沒有柵欄，旅客可以任意走近。

一個叫楊君的女孩在售票亭工作。她二十歲，從鄉下來到南京。像她這樣的年輕人正從全國各地湧向城市，此時此刻有超過一億中國人離開家鄉，大部分的人都移向工廠激增的東南沿海城市。社會學家稱這個現象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和平移民」。這是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一代人將決定中國的未來。

處在這歷史性的一刻，楊君在這個世上最大的空白石碑處找到了她的工作。當我問她這個話題時，她大概覺得我的問題很無聊，不願正面回答，只是唸出一大堆導覽用的數據：石碑寬十五點五公尺，厚四點六五公尺，整個工程據說花了十萬人力，重二萬六千噸。我問她遊客多嗎？她瞪著我，好像我是個笨蛋。「遊客都去了中山陵。」聽起來好像在怪我，意思是說你人在這裡幹麼？

我換個角度提問：「有沒有人從碑頂上摔下來過呢？」

女孩眼睛閃過一道光芒：「前年有兩個人摔下來，一個跳，一個摔。跳下來的那個剛被女朋友給甩了。事實上，他沒死。倒是摔下來的那個死了。」

我們繼續聊了一會兒，但她不停地繞回她愛說的那些細節：意外摔下來的死了，本來要自殺的卻被救活了。當我離開時，楊君的心情似乎好多了。她還告訴我，那個從石碑上跳下的心碎男人永遠毀了容。

\* \* \*

在南京時，我把一切收集在筆記本裡，其中有談話片段、博物館標籤，以及隨機的觀察。在中山陵墓頂，我注意到一面英文說明：

陵墓的平面圖呈警鐘形，象徵孫中山先生畢生致力於「喚醒民眾、以建民國」的奮鬥精神。

孫中山是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帝國的皇帝。小販在這裡兜售著一組紀念別針，向中國人民視為二十世紀偉大三領袖的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致敬。每位領袖的照片上都附著各自最著名的口號：

世界大同  
解放人民  
實事求是

這十二個字概括了二十世紀的理想主義的變化軌跡。現代文物常用這樣的方式來簡化往日的紛亂。在南京的一個博物館，我買了一張「中國歷史簡圖」，這是一張螺旋形的時間史。所有的事件從正中央一個叫「元謀猿人」的小點開始。元謀猿人（約一百七十萬年前）之後，時間表經過北京人，然後轉了個大彎，到夏朝時繞完了一圈。商和周捲成了第二圈。每一圈的螺旋形好像轉得愈來愈快，也變得愈來愈寬。每當一個朝代或一段戰亂結束時，上面就畫上一條直線或打一個叉，然後開始了新的朝代。沒有岔路，也沒有死路，從元謀猿人到一九一一年國民革命，螺旋形總共轉了三圈，至此打破了循環，變成一條直線向上走出圖外。

\* \* \*

那天傍晚，我跟朋友吃飯的時候，外面街上突然傳來一陣喊叫。我們付完帳時，抗議者們已經快速經過。但隔了一條街仍然聽得到他們的聲音在夜裡迴盪。

一群外國人站在人行道上，滿臉驚愕，因為在像南京這樣的都市，主要街道上出現示威遊行是前所未聞的。有個外國人告訴我，昨晚深夜，北約轟炸了南斯拉夫當地的中國大使館。北約宣稱那是個意外事件，但有些中國人在轟炸中喪生，而新聞剛剛才在全中國播出。

街道上空空盪盪的，沒有汽車，沒有腳踏車，但籠罩著遠去的抗議聲浪。我跟在人群後面追跑，打算先看看場面，再打電話回辦事處。當我靠近時，聲音變清楚了：

「打倒美帝！」

「打倒美帝！」

我沿著街邊，跑過參差不齊的示威隊伍，人數肯定有幾千人。他們舉著標語和中國國旗，呼喊完口號後，接著唱起國歌。突然間，群眾開始快跑起來，來到一個叫「新街口」的十字路口，在正中央的孫中山銅像前慢了下來。

我溜進人潮裡，希望觀察一陣子後能找個人訪問。有些年輕人注視了我一下，但他們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遊行示威裡。一個學生帶頭喊了句口號後，其他人就跟著喊：

「打倒北約！」

「打倒北約！」

這讓我想起一年前曾經教過的那些中國學生，在上課前以齊聲背誦的方式記課文的樣子。這些示威者也跟我從前的學生很像，大多是

瘦瘦、戴著眼鏡、身穿襯衫的男生。

「前進，前進！」

「前進，前進！」

我們轉了個彎，又一個彎，我再也搞不清自己身在何處，這些街道在夜裡看起來都一樣。隊伍再次快跑了起來，我想我們一定是接近了某個目的地。但過了一會兒，隊伍又慢了下來。又轉了幾個彎後，我終於認出一個地標：孫中山銅像。我們又回到了新街口。

我問左邊一位看起來頗友善的學生，他戴著金邊眼鏡、全身是汗，「我們要去哪裡。」他模糊地指了指前方，然後轉向我。

「你是哪裡人？」

我告訴他我是美國記者。

「打倒北約！」

「打倒北約！」

「你對在貝爾格勒發生的事有什麼看法？」那學生問。

「我對此事一無所知，」我說，「我只是在這裡報導群眾抗議。」

「打倒美帝！」

「打倒美帝！」

「你的政府必須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戰爭，」那學生說，「為什麼美國非得當世界的警察不可？」

我為之語塞，抱歉地聳聳肩，我沒想到會在南京談到南斯拉夫的問題。三月時，北約開始了一連串的轟炸行動，支持因為推動科索沃自治而飽受攻擊的阿爾巴尼亞伊斯蘭教徒。早在使館轟炸事件之前，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就強烈反對北約的攻擊行動，辯稱總統米洛塞維



奇只是「美國霸權」的受害者。中國政府關心的，似乎主要是南斯拉夫的議題可能會鼓勵台灣、西藏和新疆的獨立運動。

當我們繼續遊行時，學生一個接著一個向我靠近。剛開始他們是禮貌的，都跟我說這件事與個人無關，說他們不怪我是美國人。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雖然好奇我對這起事件的反應，但主要是想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知道那是個蓄意攻擊，因為總共有三枚炸彈，而且是從三個不同方向射出。我不知道他們的這些訊息是從哪得來的，但是每個人都這麼說。三枚炸彈，三個方向，不可能是意外。美國科技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怎麼可能會犯那樣的錯誤。

「打倒美帝！」

「打倒美帝！」

一個年輕人向我自我介紹說他叫吳明，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這名字有可能是假的，很多學生拒絕給我真正的名字，吳明是中國報紙上常見的筆名，因為跟「無名」同音。但這學生看起來很認真，他問我可不可以用筆來表達他的感想。我很高興地把筆和紙交給他——在不停的叫喊和行進中做紀錄，我的頭已經開始發暈了。

那是個溫暖的春夜，天氣還不熱，但樹已茂盛，枝葉垂向街頭。南京依然保有古城牆，偶爾可以瞥到牆面在夜空下或隱或現。人行道上到處是民眾，公安人員站在十字路口看著示威群眾。這時，他們的口號已逐漸統一成某種規律的韻律：帶頭者喊出一個口號、一個敲擊聲、一陣跟隨的叫喊聲；一個口號、一個敲擊聲、一陣跟隨的叫喊聲。我們向前走一會兒，快跑一會兒，再前進一會兒。跑的時候，吳明就停下紙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句新口號加了進來：

「不吃肯德基！」

「不吃肯德基！」

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聽錯，於是問吳明他們在喊什麼。「不吃肯德基！」他說。我們在一家肯德基速食店前慢下來，群眾的情緒再度沸騰。很快地，我看到南京大學的圍牆，接著是麥當勞的金色M商標。

「不吃麥當勞！」

「不吃麥當勞！」

後來我才知道，不只南京，當時中國到處都進行著示威抗議，而且是自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革以來最激烈的反美抗議。在北京，共青團用巴士把一群群大學生載到外國使館區，開始了途經美國和英國大使館的遊行。國家電視台轉播了北京抗議的新聞後，全國各地的學生很快地組織了起來。在四川的首府成都，示威者放火去燒美國領事的住所，用腳踏車的鐵架當攻城槌，試圖撞破領事家的防彈大門。在北京，學生朝美國、英國大使館丟磚石和油漆彈。破壞行動波及阿爾巴尼亞在內的其他國家使館。示威群眾憤怒的理由是，阿國的種族情勢導致了北約的轟炸行動。

然而，南京早已不是政治中心，市內也沒有外國使館或辦事處。幾個小時下來，我們一群人只是繞著市中心，尋找出氣的目標。我們走走跑跑，有時停下來對麥當勞的黃色拱門喊叫一陣。吳明把筆記本還給我，我把它放進口袋。實在沒什麼好記的，同樣的事情在不斷地重複。轉個彎、快跑、再轉彎：到了孫中山銅像。另一個學生來到我身邊喊著：美國科技，三枚炸彈，三個方向。打倒美帝，打倒北約。三個方向，三枚炸彈。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們前走，我們快跑。又是孫中山銅像。

\* \* \*

憤怒的情緒在入夜後沉澱了下來。對話變得簡短，斷斷續續；愈來愈少人問我的意見。最後我離開人群，改站在人行道上觀看。

「不吃肯德基！」

「不吃肯德基！」

近午夜時分，一群示威民眾敲碎了肯德基炸雞店的櫥窗。我趕到現場時，公安已經把餐廳畫入警戒線，此時燈已熄滅，窗子已破。圍觀的民眾告訴我，公安向攻擊的群眾解釋，那家肯德基事實上是中國人開的，於是他們就解散了。

「不吃麥當勞！」

「不吃麥當勞！」

另一群人破壞了南京大學附近、安靜坐在一張麥當勞店外長椅的麥當勞叔叔塑像。隔天早上，一位麥當勞員工告訴我，群眾用棍棒打壞了麥當勞叔叔。那員工看起來很緊張，她說餐廳當晚休業，以防有更多暴力出現。外面，一塊鮮黃色的纖維玻璃片仍卡在長椅上，那是麥當勞叔叔遺留的最後一塊屁股碎片。

「打倒美帝！」

那個星期稍晚，我請《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助理幫我讀吳明在我筆記本上的潦草字句時，她一句完整的也看不懂。

\* \* \*

到了抗議的第二天，已經不需要問人們任何問題了。只要我一站在人行道上，他們就向我挑釁，對話總是這樣開始：「你是哪裡來的？」訓話一直要我聳肩走開才會結束。對我而言，第一夜的刺激已漸退去，因為追一則新聞和被新聞追完全是兩回事。我想告訴人

們，我只是個剪報員，我不是真的記者，中國百姓對我說的那些憤怒之言，我無法在報上發表。

一夜之間，紅色的國旗飛揚在餐廳、商店前，學生的聚集示威從早到晚在南京市四處進行著。電視整天不停地報導著被炸的大使館影像，以及死掉的三名中國記者的照片。國營媒體把轟炸事件說成是一項故意的、「美國主導下的北約」的行動。北約和美方先後發表聲明，宣稱轟炸案是個意外；但是對於這些聲明，中國媒體完全不報導。官方將會對這攻擊採取什麼回應，沒人清楚。

那天下午，為了轉移注意力，我試著回到對南京歷史的調查報導。我參觀了紀念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間暴行橫掃整座城市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年冬天，侵華日軍占領了南京，迫使國民黨政府放棄首都，遷移內陸。之後，日本士兵肆虐全城，殺戮強姦百姓。

六十多年之後，歷史學家對事實的真相依然爭議不斷，死亡人數也是個敏感話題。中國學者宣稱死亡人數高達三十萬以上，但一些外國歷史學家認為這數字過於誇大。在日本，有些右翼分子則根本否認有屠殺這回事。（即使比較自由派的日本歷史課本，也只稱它為一個「事件」。）對中國人而言，這一直是最沉痛的歷史傷痕，他們痛恨外人告訴他，什麼有發生、什麼沒發生。

紀念碑上分別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寫著：

不忘歷史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好幾個巨大的牌子上什麼字也沒有，只寫著：

## 三十萬

紀念館大廳內，玻璃櫃裡展示著受害者的遺骨，另一區展覽著黑白照片，為了讓世人看到日本士兵如何記錄自己最惡劣殘暴的一刻。很多日本兵笨得可以，拍完照後竟把底片拿到上海照相館去沖洗。中國沖印師把副本交給外國記者，才讓外界首次見到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走過安靜的照片陳列室，我發現自己注視著一組三張中國百姓被砍頭的照片：一個雙膝下跪的人、一把高舉的武士刀、一顆如毛球滾在沙子上的人頭。然後，我意識到自己無法忍受對南京的歷史做更多的調查報導了。

我來到外面，坐在紀念館空曠的院子裡。我想離開南京，這不是一個待在陌生城市的好時機，更不要談寫什麼報導了。但是我也害怕搭夜班火車回到北京，還得面對那些無處遁逃的憤怒質疑。我獨自一人坐在椅子上，試著鼓勵自己走回市區。

庭院裡，一群鴿子在陽光下踱步。牠們是紀念館的一部分，有位職員負責照顧著這些鳥。那人自己做了一個臨時的標示，一塊三合板上以潦草的字跡寫著：

不准攆、抓、驚嚇鴿子，不准對鴿子高聲喊叫。

我走近那牌子，那位看鴿人跟我聊了起來。他名叫鞏邦興，六十歲，從本地一家玻璃工廠退休後，開始做這份工作。他一個月領八十

多美元。他很健談，而且談的全是鴿子。我從未這麼高興地聊過「鳥事」。

鞏先生解釋說，鴿子是紀念館重要的一部分，因為老實說，大屠殺的展覽容易讓人心情沉重。他告訴我說，一旦有隻鴿子生了病，其他的馬上會被傳染，因此他得花很多時間清理羽毛和鴿糞。工作雖不輕鬆，但他樂在其中。我問他紀念館裡總共有幾隻鴿子。

「一百多隻，」鞏先生說，「不過到底有幾隻，我也不確定，因為我不敢去數，那麼做會倒楣。要是哪天我一數，發現數字對不起來，那我豈不是要擔心個老半天。」

他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他的聯絡方式，要我下次再來南京時打電話給他。他穿著大大的黑色長筒塑膠鞋，戴著一頂卡其帽，帽沿上黏著幾粒白色的鴿糞。他是我那天見過的人中，唯一沒有提到北約轟炸的。

\* \* \*

回到北京讓我鬆了一口氣。我不在時，辦事處裡報紙積了一大疊，我剪下外國新聞，讀著頭條：

宣傳——熊熊燃燒的抗議行動，凸顯著中國的威勢依然隱約強大。

喧鬧背後，一個扭曲的中國世界觀

對美國的憤怒擴及中國內地省分：對使館的攻擊愈形緊張

辦事處也訂了一份《中國日報》，這是中共的英文報，我也剪下了下面這些報導：

人民為轟炸罪行所苦

霸權注定失敗

問卷調查顯示：使館轟炸是故意的

每晚七點，外國特派員和我都會看中國的電視新聞。當然，我們也看外國的電視新聞，並收聽斷斷續續的廣播訊息。北約宣稱他們要轟炸的是南斯拉夫的一個軍事補給總部，但是被一張錯誤過時的地圖誤導。示威的第一天，沒有任何中共高層領導人出聲或露面。美國駐中國大使尚慕杰和他的職員們因為門外抗議者正丟著磚頭、漆彈，被困在大使館裡吃軍糧。中國警察消極地守在使館外，等著未知的命令。

\* \* \*

五月九日，一位中國高層官員首次發表了公開談話。他是低調的副總理，名字叫作胡錦濤——黑髮、黑西裝、黑領帶，緊張的眼神。這是正午時刻，在特別的全國新聞播報裡。簡短的講話中，胡只提到抗議者一次：

我們相信，廣大人民群眾一定會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顧全大局，依法而且有秩序地進行這些活動。

那天晚上，解放軍被派遣去保護美、英大使館，很清楚地，最激烈的場面已經結束了。隔天，柯林頓總統在白宮發表電視演說，第一次公開用了「道歉」這個字眼：

我已經向江澤民主席和中國人民表達我們的歉意。但我認為，清楚地分開一件因過失而引起的悲劇和一樁蓄意的種族清洗行動，是很重要的。

隔天中午，國家電視台播出柯林頓的道歉，但是在「向中國人民表達我們的歉意」之後，報導就被剪掉了。到了十二日，美國大使終於能夠自由出入使館。這一天，三名受害者的骨灰被運回北京。新聞從機場一路報導：莊嚴的音樂、表情悲戚的官員、淚流滿面的親友。中國媒體的情緒從憤怒變為哀傷；最後，整個事件開始滑入過去。政府的英文通訊新華社有一則這樣的報導：

北京（新華社）——上週五遭美國主導的北約轟炸而死的三位新聞記者，他們的遺物將被存放於中國革命博物館，該館副館長馬俊海做了以下表示：「這些遺物實際上有很大的教育意義。」……這些東西包含染血的棉被、袋子、筆、筆記本和文件。《光明日報》的總編輯翟惠生展示死去的兩個同事的背包，背包還聞得到濃烈的火藥味。

\* \* \*



我不喜歡回到住處。每天傍晚我都逗留在辦事處，找各種事做，例如轉台看電視新聞、讀另一則報導。一個月五百元的工作能做的也就這麼多，而我那一個月租金二百的公寓所能提供的實在有限：沒有電視、沒有冷氣、廚房小得不能用；我幾乎沒從美國帶什麼書來。不管喜不喜歡，我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得待在外頭。

三餐是最麻煩的一部分。在中國，我一向喜歡便宜小吃店的親切感，我也會在麵店、茶館裡消磨時間學中文。但現在，我必須學會用一種新的身體語言：低著頭，臉上帶著微笑，盡量看起來很友善。我對所有的意見、批評，即使是最荒謬的，我一律會說：「對，你說的都對。」有時人們跟我提到台灣問題，或者把焦點放在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之間的鴉片戰爭，以及歷史上外國強權對中國的霸凌。有些中國人告訴我，美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才導致它缺乏道德核心。不過，不管誰問到我的國籍，我總是據實以告——我打算在這一帶落腳，任何謊言都可能讓我之後的處境變得複雜。

我愈來愈常在位於住處和辦事處間的雅寶路用餐。雅寶路是俄羅斯人的特區，來自前蘇聯和中亞的商人常聚集在這裡，批發中國成衣廠做的衣服。在住處附近，對於像我這樣不想被注意的白人，雅寶路是最合適的地方，只是我也沒法完全融入。大部分的俄羅斯人身材臃腫且雙腿細短，臉孔冷峻，大部分鼻子有點歪斜，一看就像曾經斷過。他們的眼袋下垂，可能是生意壓力大，也可能是伏特加喝太多。現鈔都裝在垂掛在厚重肚皮下的塑膠錢袋裡。

俄羅斯商人雖在雅寶路一區占有優勢，但許多其他種族也很活躍。大部分的餐廳和商店是漢人經營的，但也有幾家是占少數的伊斯蘭教徒開的。轟炸事件後，我想這些餐廳會比較安全——就算有中國人

在那裡用餐，也比較不會惹麻煩。而伊斯蘭教徒應該不會對北約在科索沃的行動生氣才對。

有天晚上，我來到一家伊斯蘭教徒開的小餃子館。我一走進去，所有的顧客都停止了講話。三張桌子坐著漢人，另一張則坐著兩個維吾爾人。我很快認出其中一個，之前在其他餐廳見過他，但是只打過招呼。雅寶路有很多維吾爾人，他們通常擔任貿易中間人。以中國人的眼光看來，有些維吾爾人看起來像外國人，就跟我一樣。

我找了空桌坐下來，點了水餃和啤酒。女服務生拿酒和碟子來時對我笑了笑。沒多久就有一個漢人開口問我：「你是哪國人？」

我一答完，每個人都抬頭看我。那人問我，為什麼美國非得把自己當成是世界警察。另一個客人嘀咕著什麼鴉片戰爭。第三個則繞著那老套的科技的事打轉。「如果美國真的這麼進步，怎麼可能說轟炸是個意外的錯誤？美國說他們用的是舊地圖，這真是荒謬。」

我說我承認對這個事件也很不解，然後試著只管吃我的餃子。那人卻重複著他的問題。「美國人可以從太空看到一切。有那麼進步的科學，怎麼可能會炸錯大樓？」

我盯著我的盤子，希望他很快會覺得無趣而閉嘴。那人正要再說些什麼時，我認識的維吾爾人開口了。

「有這麼進步的科學，」他說，「美國人怎麼就只炸死三個中國人？」

餐廳頓時鴉雀無聲。漢人問維吾爾人，他這話是什麼意思。維吾爾人笑了笑，「我的意思是，如果美國這麼厲害，科技這麼進步，如果他們想要的話，應該不只炸死三個中國人才對。」

「廢話！」一個漢人大聲喊。

但維吾爾人繼續說：「別那麼笨，相信電視報導的一切。如果美國人真要殺中國人，你早就沒命了！」

其他人馬上跟進，前後爭論了十分鐘。好像被遺忘了似的，我安靜吃完餃子並付了帳。當我正準備離開時，那個維吾爾人走過來自我介紹，他在一張碎紙上寫下名字和行動電話，邀我找個時間吃晚餐。其他人默不作聲地看著我們，在我走出餐廳步入夜色時，爭論聲又在身後響起。

\* \* \*

那年春天，我們養成了一個習慣：我會打他手機約他在雅寶路一帶共進晚餐。我們誰也沒去過對方的住處，因為我們自尊心都太強了。他在餃子館隔壁租了個房間，簡陋到只好用馬路對面的公共廁所。我的住處也好不到哪裡去，只要廁所一不通，就只好往附近的瑞士旅館跑。雖然沒多說什麼，但是兩人晚上都不想回家這件事加深了我們的友誼。

他的名字叫波拉特，在雅寶路靠抽佣金謀生。跟很多維吾爾人一樣，波拉特的語言能力很好。新疆是中國種族最多的一個地方，在十三個不同種族中，總數約八百萬人的維吾爾族是最大的一族。波拉特可以說維吾爾語、漢語、俄語、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和突厥語。他以語言專長在外國商人和中國批發商之間擔任仲介，同時也做美金的黑市交易。有時他做一筆幾萬元的貨幣交易可以抽成百分之十。但是私下的貨幣交易是非法的，移動那麼大一筆現金也很危險，一九九九年時，雅寶路就有兩名做金錢交易的維吾爾人被殺。相比之下，波拉特比較喜歡做名牌服飾的生意。

波拉特四十幾歲，打從一九九〇年就入行。一開始他周遊列國，以中亞居多，跑過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庫曼。那幾年裡，一般中國人要拿到護照和簽證很難，但是波拉特明白，只要賄賂到對的人，就可以拿到對的證件。他到過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並且在土耳其待了很久，那裡的語言和維吾爾語很像。他也去過巴基斯坦，不過那裡的生意很難做。有一次，他試著把新疆的葡萄經由西藏運到加德滿都，不料遇到尼泊爾的豪雨季，結果水果全爛了。伊朗的經驗也不太好，有位德黑蘭的藝術經紀人說服他販售伊朗發現的中國古畫，表示有錢可賺，結果那些畫既不是古畫也不是中國畫。那次賠錢之後，他主要就只做服飾買賣。不過，凡是需要旅行的生意就帶有風險。一九九三年，他存了一萬美元之後，把大部分的錢投資在一大貨櫃要銷到哈薩克的服飾上，結果裝貨的條板箱被蟲蛀，他投下的錢全賠光了。

一九九七年，波拉特來到了北京，開始在雅寶路一帶做起製造商和批發商之間的中間人。這個地帶已成了黑市批發中心，專門販售中國東南沿海工廠所做的衣服。其中尤屬外國品牌最為暢銷，例如說North Face、Nike、Tommy Hilfiger。通常，交易者賣的都是冒牌貨，但冒牌貨沒關係，只要牌子對就行。Nautica、Adidas、Timberland，這些品牌的便宜版本不管是在俄羅斯、東歐，或是國界向來分不清、種族複雜、外人難以區別的廣闊中亞狹長邊境，都十分暢銷。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塔塔爾人……都來到了雅寶路。這一帶女人不多，最顯眼的要算妓女，有俄羅斯的、蒙古的、中國的，不時在商人們談生意的餐廳外慢步閒逛。

波拉特幾乎什麼都賣。一九九八年，他賣了兩大卡車的冒牌五五五牌鞋子給一團來自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商人，淨賺二千美

元。還有一天，他幫一些俄羅斯人從天津的地下工廠買了一貨櫃仿冒的Nautica衣服，也賺了一千美元。一九九八是很順的一年，這一年他還說服一些俄羅斯人買下二萬件廣東生產、貼有皮爾卡登標籤的內衣。每件內衣大約可以賺到二角五分美元。

但我在波拉特身上看不到錢的影子。他穿著簡單，也不像其他雅寶路商人，做完一筆交易之後就要吹噓一番。那些商人是最典型的生意人：賣假貨賺差價，我知道不能把他們的故事過於當真。但是波拉特不一樣。他有著夾雜白髮的捲曲黑髮，眼睛褐色而憂鬱。他不常笑。他有著深褐色的膚色、堅毅的下巴和中東人突出的鼻子。當他真的笑起來時，臉上容光煥發。他經常說的一句中國話是：「假的」。他對自己賣的東西極為輕蔑。他說，那些仿冒的衣服跟垃圾、廢物、狗屎沒什麼兩樣：「假的」。我們認識不久後，他告訴我，他原本在新疆的一所中學教維吾爾語和文學。他談起自己做的生意，口氣是那麼的充滿鄙視，讓我不懂他為什麼會離開教職。他有一種滄桑的魅力，但臉頰上的皺紋深得看起來像傷口的縫痕。他有一點胖，菸抽個沒停，似乎總是很疲倦。我搞不清楚他賺的錢都跑到哪兒去了。

\* \* \*

五月底的一個晚上，波拉特邀我和另一位商人一起晚餐。我們約在日壇北路上我最喜歡的一家維吾爾人開的小餐館。拿了食物後，我們來到餐館前的寬廣露台，一邊吃一邊看著交易商和應召女郎走過。通常，我們會點燕京啤酒。餐廳經理會走下露台，打開人行道上的人孔蓋，從下水道裡拿出兩瓶啤酒。溫度較低的下水道就是餐廳飲料的冷藏系統。那裡的餐點算是很便宜的。

波拉特的朋友是一個亞塞拜然來的商人。他的臉很小，有濃黑的長眉毛，如玩具一般的小鬍子輕輕地沾在唇上。他穿著一套廉價的灰西裝，來雅寶路是為了批發成衣。波拉特幫他跟中國業者聯絡。

「我的朋友對無法跟你用英語或漢語交談，向你致歉。」我們握過手後，波拉特說，「還有他想知道，今晚我們可不可以不喝啤酒，來喝白酒。」

白酒是中國人用穀物釀的酒，沒有人喝它只是為了嚐嚐味道。我勉強答應後，老闆送上一瓶白酒。我猜這年輕人是個伊斯蘭教徒，不過，大部分的中亞商人不管怎樣都會喝酒。當他們出外經商時，好像就把教義丟在了家裡。

幾種語言在我們的飯桌上換來換去，而波拉特當中間人。他跟年輕的亞塞拜然人用突厥語說話而跟我用漢語交談，我們聊到了使館爆炸事件。波拉特特別喜歡這個話題，縱使遊行抗議不到兩個星期就退去了，但是他仍不斷地提起這件事，通常是跟陌生人。早先在餃子館發生的發飆事件並不是特例，因為他喜歡挑釁漢人。

「他們的腦袋有問題，」幫我們倒上第二杯白酒後，他說，「那些學生都太笨了，他們什麼都不懂。」

「你贊成北約對南斯拉夫做的事嗎？」我問。

「我當然贊成。阿爾巴尼亞人會被殺害，是因為他們是少數民族。我有聽『美國之音』，所以我知道那裡發生的事。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我是來自新疆的維吾爾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點點頭。但他很嚴肅地看著我。

「明白了嗎？」他說。

「我明白。」我說。

「很多事很難在北京公開地談，」他說，「明白了嗎？」

「我明白。」我說。他仔細端詳著我，然後微笑，舉起酒杯。我們三人一飲而盡，做了個男人喝完白酒後才會做的表情。年輕的亞塞拜然人透過波拉特問我，美國人常不常喝這樣的烈酒。我搖頭。接著，波拉特說起俄羅斯人的飲酒習慣。這是個很容易參與的國際性聊天話題，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跟俄羅斯人喝醉有關的故事可以分享。結果我們驚訝地發現，不管是在維吾爾人、亞塞拜然人或美國人看來，這些故事都很像。波拉特來回地翻譯。年輕的商人說，一般的亞塞拜然人喝不過一般的俄羅斯人，但是，最能喝的亞塞拜然人卻能贏過最能喝的俄羅斯人。他慎重地提出這個結論，帶著些驕傲。服務生端來了烤羊排。羊排有點辣但是滿好吃的，配上啤酒可能會更好。我渴望地望著那個人孔蓋。

過了一會兒，話題轉到維吾爾人，波拉特說起有些維吾爾人跟歐洲人長得很像。他對我說：「我的一個好朋友頭髮是金色的，他看起來比你還像外國人。因為長得那麼像，有時候，他會在中國電影裡客串演外國人。你有沒有看過《鴉片戰爭》？」

我點點頭。這部官方投資的史詩電影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前不久上映。那一年，國家主義極受歡迎。兩個小時長的電影描述了邪惡的英國帝國主義，以及中國的英勇抗拒。

「記不記得有個外國人被中國人割喉的那一幕？」波拉特問。

「不太確定，」我說，「不過我可能有看到。」

他說我不可能錯過的——他們在螢幕正中間割了他朋友的喉嚨。今年，那位朋友將會演出另一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的官方電影。

「有一群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經常在這類愛國電影中演外國人，」波拉特解釋道，「他們會找真正的外國人演主要角色，但是小角色就會找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

「酬勞高嗎？」

「不是很高。我朋友賺了三千塊。不過那份工作也不是很難。」

三千人民幣約等於不到四百美元。我問波拉特喜不喜歡那部電影，他笑了。

「當然不喜歡，」他說，「你也知道那些中國歷史電影都是什麼樣子——一切都是假的。真的歷史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們講中文時，那個亞塞拜然人安靜地坐在一旁，只不過他好像很認真地在觀察我。波拉特繼續我們的話題，他說：「我比較喜歡美國電影，《教父》系列是我最喜歡的片子。我也喜歡勞勃·狄尼洛演的每部電影。」

他說的那刻，我發現他跟勞勃·狄尼洛長得很像：歷經風霜的外表、厚實的下巴，有點下垂的眼袋。他是維吾爾族的狄尼洛。亞塞拜然人還在端詳著我的臉，最後，他終於對波拉特開口。

「我的朋友想知道，」波拉特說，「你是猶太人嗎？」

坐在一家伊斯蘭教餐廳裡，我被這個問題嚇到了。那年輕商人傾身向前，波拉特解釋說：「他說你看起來很像猶太人。」

「我不是，」我說，「事實上，我是天主教徒。我有些祖先是德國人，有些是義大利人。勞勃·狄尼洛也是義大利人。」

聽到波拉特的翻譯後，年輕人的臉色有些失望。一陣連珠砲似的突厥語後，波拉特說：「我的朋友感興趣的原因是，因為他是猶太人。」

「哦，我不知道亞塞拜然有猶太人。」我說。

「也不是很多。」波拉特說，並再度舉起酒杯。

\* \* \*



波拉特是第一個讓我想到了中國的種族和幅員的人。如果你拿維吾爾人和漢人做比較，他們不管哪一方面都是南轅北轍的，不管是地理、文化、語言，還是歷史。就像是一個國家內完全相反的兩族人。

新疆在西藏的正北方，和西藏一樣偏遠而險惡。它占中國版圖的六分之一，這相等於阿拉斯加和紐約州的總和。在地理上，新疆涵蓋了世上最高的山脈和最廣的沙漠。新疆的古史不詳，最早的居民是未曾留下書寫紀錄的游牧民族。中國早期的一些朝代偶爾會在這裡設置軍事要塞，但是新疆的地理景觀跟中國的農業極不相容，因此帝王們並沒有持續地控制這片土地。一直要到西元九世紀，今日維吾爾人的祖先才開始在那兒大量定居。但即使在那個時候，他們也大多以綠洲為基地，把廣大的山脈和沙漠留給了游牧民族。

維吾爾人經常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他們曾教蒙古人用維吾爾字母寫字（維吾爾人很早就以突厥魯尼文書寫），他們也曾是成吉思汗和其他中亞強權之間的斡旋人。維吾爾人的宗教很重實效，不時隨著新的駐軍而改變：在不同的時期裡，維吾爾人信奉過薩滿教、摩尼教、景教和佛教。十世紀時他們改信伊斯蘭教，之後的千年中，他們不再自稱「維吾爾」，他們的文字也改成阿拉伯文。

跟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一致性相反，維吾爾人的許多基本特徵是多變的，不論是他們的名字、文字、宗教還是他們的政治聯盟；但是他們似乎總可以在邊緣上生存。這個特質在今天依舊鮮明，只要看看維吾爾人在中國各城市經商就可以證明。他們開餐廳，或是賣新疆葡萄乾和瓜果之類的土產；他們也主宰貨幣黑市。在中國，少數民族很難在漢族掌控的經濟上占有一席之地。一些雅寶路商人曾告訴我一個很流行的維吾爾笑話：美國人登陸月球時，發現有個維吾爾人在那裡做生意。

波拉特和我有一份第二語言的友情——我們完全以中文交談。我不一定能了解那群在餐廳出入的維吾爾人，但他們的身體語言是很難被忽視的。他們比中國人高大，走路大搖大擺。他們握手的力道在中國是罕見的，強而有力。若有一位婦女來到桌前，他們馬上會站起來。他們不碰豬肉，他們嗜酒，這是唯一一條沒有生根的伊斯蘭教戒律。他們的鼻子很高，曬得很黑，他們的眼神懾人。他們舉手投足的自信讓中國人緊張。到這間維吾爾餐廳用餐的少數中國人通常只管自己的事，如果波拉特不在，我也是一樣的。我尤其避開那個身材魁梧、眉毛濃重、渾身暗示著暴力可能性的維吾爾商人。有一回，他告訴我他剛做了筆大生意，賣出五十幾萬個天津製的保險套給烏茲別克人。在我看來，那就像聽到那個在月球上的維吾爾人一樣讓人印象深刻。又有一天晚上，這個濃眉的男人在餐廳跟一個維吾爾朋友喝伏特加喝到很晚。隨著酒精的發酵，兩個男人輪流用菸蒂在手臂上灼洞。之後，這兩個人只要一見面，就大力握手，摸摸彼此手腕上的菸疤，笑著回憶起那晚不曉得是什麼魔鬼把他們湊在一起。

\* \* \*

現代史對維吾爾人不算善待。十八世紀，清朝大軍西征，想把維吾爾人的所在地納入帝國版圖。抗拒雖頑強，但在一八八四年，清朝還是把它強併了，改名為新疆。清朝結束，一九一一年新疆成為試圖脫離中央的省分之一。一九二〇年代，一群突厥語系居民開始推動獨立，稱自己為「維吾爾」——一個千年沒用的名字。一九四四年，當國民黨政府忙著對付中共和日本的內憂外患時，一群維吾爾人、哈薩克

和白俄羅斯人在北新疆打敗當地的中國守軍。這次的反抗為一個叫「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多種族國家奠定了基礎。

接下來五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基本上像個獨立的國家般運作，跟蘇聯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但蘇聯從未公開支持它，可能也只把它當作與未來取得中國政權的黨派談判的籌碼。生存在邊界就有這樣的風險，難逃強鄰的覬覦。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中國之後，他們邀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最有權力的領袖到北京開會。這些人離開新疆，從蘇聯的阿爾馬阿爾塔上了飛機，從此音訊全無。幾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控制了新疆，中國宣布那架飛機失事了。但很多維吾爾人相信：他們的領袖被謀殺了，成為毛澤東和史達林密謀的受害者。

此後，新疆處於中國的嚴厲控制之下。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當這裡發現石油和天然氣，漢人大量移入。維吾爾人動盪不安起來，這是因為他們深恐自己會成為自家土地上的局外人。一九九〇年代，暴力不斷，公車爆炸、火車出軌。人們相信這些攻擊是抗拒中國統治的維吾爾人幹的，但沒有任何組織承認犯行。這些暴力事件一如新疆的很多其他事情，至今仍是祕密。

在雅寶路，我看著這些貿易商來來去去，有中亞的、中東的，以及我不認識的，心想，到底還有多少無名民族在大國的歷史裡滑進滑出呢？維吾爾人的命運並沒有因為獨立的語言、文化或傳統而自成一格，外國強權的決定權太大了。蒙古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假設新疆當初是掉入蘇聯而非中國之手，這可能也是新疆會走的路。在中亞的分合大遊戲中，維吾爾人是失敗者之一。

和波拉特熟識後，他跟我說了更多他的家世背景。一九四〇年代中期，他父親加入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軍隊。跟很多軍中同伴一樣，父親的左肩上有個來福槍刺青。在文革期間，那是個危險的標

誌。等文革結束時，他已被批鬥成了跛子。波拉特說，但願他能夠在真正的維吾爾族史中寫下這段。他還想寫下自己個人的經驗，包括在一九八五年因為抵抗中國統治而受的牢獄之災。他說，這就是他無法繼續在新疆擔任教職的原因，政治打壓讓他遠走他鄉。他還說，他已經存了四萬美元，發誓只要存款和時機一到，他會找辦法去美國投奔自由。

\* \* \*

我試著寫下我的南京報導，但最終宣告放棄。我自己擔下所有的花費，把失敗歸罪於不對的時機，然後轉向其他題材。到了夏天，使館爆炸事件已變成遙遠的記憶。偶爾人們會提起，但很少深談。即便談起，也是失望多於憤怒，因為他們的政府接受了美國的道歉和對貝爾格勒大使館的損傷賠償。在我遇到的中國人中，沒有人相信爆炸事件是場意外。

在辦事處剪報時，我有時會看到一些後續報導。七月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泰內特在國會作證。他說北約瞄準的九百個轟炸點裡，由中情局單獨研究和指定的只有一個：中國大使館的所在。泰內特強調整件事是地圖過時而造成的過失。

三個月後，倫敦的《觀察家》刊出一則調查報導，文中指出，爆炸事件事實上是故意的。報導訪問三位不願具名的北約駐歐官員。他們說，美國軍方刻意瞄準大使館，是因為中國暗地支持米洛塞維奇。該報導宣稱，先前當北約炸毀了塞族的無線電發射器後，中國便允許塞族使用該使館，用來當對科索沃軍事廣播的後備站。

《觀察家》懷疑，中國可能以協助米洛塞維奇，作為交換接近美國隱形戰機殘骸的條件；這部早先被打下的戰機，對中國情報單位有很大的價值。無論如何，中國和塞族軍方合作其來有自。北約說是誤炸也太牽強了。三枚炸彈全炸在使館南邊，正好是武官辦公室和情報中心所在，使館的其他部分則毫髮未傷。死傷的人數非常少。與很多外國媒體一樣，《觀察家》宣稱死亡的三名中國「新聞記者」中，有兩名事實上是情報人員，這種角色偽裝在國家掌握的媒體中很常見。

那篇報導就只有這樣——沒有注明消息來源，也沒有證據。北約否認指控，也只有少數美國報紙引述這份報導。在辦事處，我剪下一份把它歸檔起來：

[U.S.—China—Embassy Bombing \(美—中—使館轟炸\)](#)

[U.S.—China—Exchanges \(美—中—交流\)](#)

[U.S.—China—Relations \(美—中—關係\)](#)

[U.S.—China—Scandal \(美—中—謠傳\)](#)

[U.S.—China—Summit \(美—中—高峰會議\)](#)

[U.S.—China—Trade \(美—中—貿易\)](#)

【古文物B】

## 文字的世界

秦始皇焚書。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成為首位自稱「皇帝」的統治者。他統一貨幣與度量衡。他開闢馳道，並把戰國時秦、越、燕三國北邊的長城連結起來，成為後來的萬里長城的雛形。他銷毀民間所藏的詩、書、百家語。他坑儒。他以秦國通行的文字為基礎制定小篆，強制性地頒行全國。

在大臣的建言下，秦始皇銷毀的不只是書，還包括有關書的想法：「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一個多世紀之後，漢朝史學家司馬遷把秦始皇的這些事蹟全記下。《史記》成為二千年來的傳世之作。

\* \* \*

高奕睿三十五歲。對一個研究古代中國文化的學者而言，高奕睿的族譜很不尋常。從他母親那邊來看，他是個中亞人：外祖父是塔塔爾族，外祖母是哈薩克族。他的外祖母出生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成年後西遷，在位於歐亞交界處的烏拉山區生下高奕睿的母親。高奕睿的母親往更西邊走，在莫斯科讀大學時愛上一個匈牙利人，再度往更西邊走，最終高奕睿出生在北匈牙利，離多瑙河不遠處。他有二分之一匈牙利人、四分之一哈薩克族、四分之一塔塔爾族的血統。他矮而

壯、黑頭髮、長睫毛。他很害羞。跟他講電話，他可以沉默到只講「是」、「不是」等單音節的字。第一次見面可能會尷尬，但是，一旦跟他熟了，會發現他的思考流暢精采，已經是此領域優秀的學者。

高奕睿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完成古漢字演進史的論文。他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刻在二千年前的竹簡上的文字。那些古老的文字剛面世，大部分是在二十世紀後期被挖掘出土。過去學者沒有接觸這種第一手資料的管道，只能讀像是《史記》這種被抄寫過多遍、歷代傳下來的史書。

竹簡上的字雖然是秦朝之後刻的，但字體仍然未統一。同一個字有不同的寫法，就好像古代文化一樣缺乏一個清楚的準則。高奕睿以此推論，秦始皇統一文字是誇大之詞，可能是個謎團，關於秦始皇的其他傳說可能也一樣。高奕睿在論文裡提出，幾個世紀下來，歷史學家著迷於焚書的故事，而忽略了古人「挑選和抄寫作品的那個沉默而持續的過程」。

他的觀點很簡單：圖書檢查讓我們對歷史留下了想像空間，但其實創作的過程可能更具破壞力。在書寫某個故事或解釋某個事件意義的同時，你也否定了其他可能的詮釋。中國的歷史就跟任何別的偉大文化一樣，是在犧牲了一些沉默的故事後寫成的。

在高奕睿看來，中國最重要的文學上的統一是發生在漢朝。他們寫下自己的史書、自己的第一本詞典，他們對文字世界的重視奠定了一個二千年的帝國。他說：「當人們談到文學世界，有些文化，像是拜占庭和中國，書寫文字所創造的世界比真實世界更具意義。中國古代的官員是經過考試，透過背誦古書而被遴選的。他們活在相似的文字世界裡，不管是誰，從外面進來後就變成那個世界的一分子。就像最後變成元朝的蒙古人——天啊，他們根本就是沒什麼文字的游牧民

族。但是有一段時間裡，他們變得像中國人，他們同化了自己。我想，是這個文字世界，把這個我們稱作『中國歷史』的東西連在一起。不是這個國家的人數多少或其他什麼東西，而是這些人所創造的巨大的文字世界。他們創造的這個世界是這麼大，除了自己，也把周圍所有人全含括了進去。」

\* \* \*

高奕睿無疑是個懷疑論者。他對整齊性、規律性、細小情節全都帶著懷疑。在他看來，故事通常是混亂局勢的偽飾。這個看歷史的角度，可能是遺傳自塔塔爾族的基因，或者，可能跟高奕睿連自己的身世也搞不清楚有關。除基本背景之外，他不清楚自己的家世。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哈薩克外祖母會住在中國東北，以及後來為什麼離開。他也不知道，外祖母是怎麼認識那位塔塔爾男人，他們又是走哪一條路到烏拉山的。

甚至連高奕睿當初投入中國學研究的理由也很牽強。他在共產黨統治的匈牙利長大，那裡所有的年輕男子都被強迫服兵役。他高中畢業後入伍，但很快發現軍中不是個適合懷疑論者的地方。結果他受到了懲罰：軍隊把他送到匈牙利中部的包科尼山脈接受六個月的額外訓練。高奕睿大部分時間都被派在伙房工作，有一次，他假裝需要動疝氣手術，只因為手術的恢復期可以獲得二十八天休假。那個手術很粗糙，到今天他仍不時感覺到內臟的陣痛。

疝氣手術後，想要再度逃避兵役就得借助高等教育。在匈牙利，如果一個士兵進了大學，他的役期可以減少半年。高奕睿申請了，但他錯過所有學校的截止日期，除了一份到中國留學的獎學金。他接受



了，心想，可以減少六個月的兵役應該是值得的。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我就這樣進入了中國研究。」他解釋說。

有天晚上，我跟高奕睿約在北京見面，我們的話題轉到了歷史。他解釋說，一般人很自然地會傾向於挑選某個人或事，誇大其重要性，然後把它杜撰到歷史敘事裡。

「歷史在他們心中就是這樣形成的，」他說，「是透過這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但在讀中國史時，你學到的是，這些事件中有一些其實並沒有發生過，或只是些很小的事件；或者，很多其他事件很重要，但沒有被提到。中國人說每五、六百年會有一個哲人出現。事實上，我會說歷史是更多變、更複雜的，還有很多東西發生過。但顯然，歷史是沒辦法『教』的。你不能只說：『還發生了很多事。』就交代過去。無可避免地，你必須選擇某些事件來陳述。」

我們坐在北京市中心後海一間不知名的酒吧裡。這是首都最後一塊保有原貌的老街坊，酒吧的窗戶對著湖面敞開。美麗的夜晚，燈光紅黃閃爍在水面上。高奕睿談到觀點的殺傷力，然後他把話題轉向我。

「這是為什麼中國人會怕像你這樣的外國特派員，」他說，「對西方人而言，不管你寫的是什麼，那就是中國。他們可能刊登一些人民生活所得的GDP數字，人們看了可能會說：『哇，那真的很低』，或認為那很高；但你們新聞記者會加油添醋地解釋一番，結果就不一樣了。如果你寫我們坐在後海，人們會想，中國是個很酷的地方，中國在他們心中就定型成為這個樣子。但事實上，它可能跟真實情況相去甚遠。」

## 第二章 美國之音

一九九九年五月

北京是我第一個以全職作家身分居住的地方。過去，我不是當學生就是當老師。剛到中國時，我同時是學生也是老師。一九九六到一九九八年之間，我是和平工作隊的一員，在一個叫涪陵的小城教英語，同時也在那裡學中文。

在涪陵師範專科學校，我大部分的學生都是農家子弟，他們學成後將到偏遠的中學教英語。在上一代，英語這科目是個禁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中，任何跟外語的接觸都有風險。但是在今天的中國，不但六年級以上的學生都要學英語，年輕一輩對這個語言也很著迷。剛教書的第一年，我不是很確定這個語言有多少實際用處。我是涪陵僅有的兩位外籍教師之一，大多學生畢業後會到更偏遠的地方教書，但不論如何，他們學得很認真，利用所有可能的學習教材。傍晚時，他們會走在校園裡，拿著短波收音機收聽英國國家廣播電台或美國之音。

搬到北京之後，我常有種失落感：混亂的五月示威，自由撰稿的瑣碎細節，《華爾街日報》的檔案櫃。但是，只要以前教過的學生寫信或打電話來，我的迷失感旋即煙消雲散。那年春天的某天下午，我接到在長江附近一個村莊教書的吉米的電話。他聽起來很高興，剛交了個女朋友，也很喜歡他的工作。我問他教了多少個學生。

「九十四個。」他說。

「幾個班？」

「一個班。」

「你一個班有九十四名學生？」

「是的，」他說，「很擠！」

講完電話後，我試著想像在偏遠的長江小村裡教九十四個中學生英語會是個什麼樣的景象。尤其從辦事處的角度去看，那簡直令人完全無法想像：

Students (學生)

Style (風格)

Superpower – “New .reat” (超級強權—「新的威脅」)

Superstitions (迷信)

Tea (茶)

另外一天，我接到DJ的電話。跟我之前很多學生一樣，DJ選這英文名字的原因是個謎。他目前任教於四川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一個月賺不到四十美元。他的一個同班同學告訴過我，當DJ領到第一份薪水時，他好興奮，買了顆足球踢了一整個下午，就他自己一個人。

「我給我的學生都取了英文名字，」DJ在電話中說，「大部分是照我涪陵的同學英文名字取的。我要告訴你，我還幫一個學生取為亞當，一個取作彼得。」

亞當是一九九六年另一位跟我同時到涪陵的和平工作隊教師。我很感動，跟DJ說謝謝。但他一開口，我就聽到他聲音裡的笑意。「叫彼得的學生，」他說，「有可能是全班最笨的。」

\* \* \*

一如大多數中國的鄉下人，我的學生們大都早婚，那個春天我常接到他們描述跟異性交往的信。費里曼的信是用電腦打的，這在偏遠地區並不常見。在一本美國雜誌上看到演員摩根·費里曼的一張照片後，他就給自己取了這名字。在一封信中，他說到怎麼透過人家做媒而認識他太太。

從涪陵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後，我的家人和親戚都急著幫我介紹女朋友。他們介紹了一個又一個，但一個個從我眼前溜過，沒一個成為我太太。他們給我介紹了大約有三十多個女孩。有些肥得跟豬一樣；有些瘦得跟旗杆或釣竿沒兩樣；有些很漂亮，不過她們看到我就走人，還丟下一句「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當然，我家人花了不少東西和錢在那些女孩身上。

現在我終於有了女朋友，二〇〇〇年過後她就會成為我的太太。她不漂亮，臉上有很多黑斑，但是我愛她，因為她比我還有錢，也許我比較愛的是她的錢.....

我現在教中學二年級英語。在這樣的地方教書很難，這裡很窮，人們還看不到教育的重要性.....

我有很多事想說，但無法全寫出來。這封信是用我女朋友的電腦寫的。我會再給你寫信。

誠摯的費里曼

\* \* \*

過去，中國人很少離開家鄉，有五分之四的人口住鄉下。然而，自從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推動自由市場改革後，情況開始改變了。這

個政策後來變成一般所熟知的「改革開放」。到了一九八〇年代，資本主義開始在沿海地區啟動，工廠快速林立以滿足新興外貿的需求。移民大量從內地流入，加入建設工程與生產線的工作。一九九〇年代末，每十一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

離鄉背井需要勇氣。出走的人，能力一般比留在村莊的人好，最優秀的鄉下學生通常在畢業之後往沿海一帶發展。對我的學生而言，出走是一個更難的決定，因為如果他們留在家鄉，政府會提供穩定的教職。每年一到春天，課堂裡就會開始響起該往南還是往東走的討論聲。那些地方薪資雖高，但是沒有傳統「單位」的保障。談論的學生很多，但只有少數人真正行動。離開的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質：成績頂尖，個性外向活潑。他們的英語講得很好，想法跟別人不同，且他們的作文常令人驚豔。

威廉·傑佛遜·佛斯特是出類拔萃的一位。一開始他選的英文名字是「威利」，但是到了畢業前的那個春天，他突然改名成「威廉·佛斯特」。我還來不及適應作文上的這個新簽名時，「傑佛遜」又被加了進去。他的簽名如龍飛鳳舞，三個名字大大地橫跨在作文紙的最上方。他沒有要我對他的改名提供意見，只是說他喜歡柯林頓，因為柯林頓總統和他一樣，出身於一個大國的貧困地區。一九九八年一畢業，威利離家往東求發展，對他這個決定我一點也不驚訝。他當時二十三歲。<sup>2</sup>

威利可能是班上最聰明的學生；他的英語是全班講得最好的。打電話來時，其他學生偏好用中文交談，但威利堅持用英語——他下決心要把這個語言學好。他走的路也許不是最突出的，但他的故事正好是我所知道的。他是這股千萬移民潮中的一個。

\* \* \*

威利生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雙龍公社第十大隊第三生產隊。這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要事件，沒有出過名人，也沒有古蹟牌坊。跨過蝸牛河的勝利橋是最老的建築。石橋建於一九四〇年代，過沒多久就被一場洪水沖毀，後來修護了一半，寬窄只夠一次一人通行。也沒有任何勝利的事蹟發生在那座橋上，其實，勝利只是個最流行的名字，標明了新中國的建立。出於簡單起見，共產黨用號碼代替了村名和行政單位。第十大隊的總人口不到一千人。

八十公里外，跨過四川東北部的矮綠山丘和閃閃發亮的稻田，是鄧小平的故鄉廣安鎮。一九七五年的廣安還只是個偏遠村鎮，鄧小平也只是個一度被看好、但在文革時被整肅過兩次的政治人物。一九七七年復權之後，鄧小平快速爬升成為全國最有權力的領導人，但他再也沒有回過廣安。他可能想避免如毛澤東當年一樣的個人崇拜，有鑑於毛的故鄉變成朝聖者的麥加，鄧故意讓故鄉保持荒蕪窮困，因此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

雙龍公社比廣安更窮，第十大隊的貧窮更甚於雙龍公社，這是一個沒有正式歷史的地方，大部分的居民跟威利的父母一樣不識字。這裡的歷史既包括居民所記得的那些事，也包括他們刻意不提的那些事。威利的父親生於一九四一年，他跟兒子們說，他一輩子最苦的要算是大躍進時期。那個政治運動從一九五八持續到一九六一年，毛澤東瘋狂推動工業生產，結果導致千萬名中國農民死於饑荒。威利父親有些親戚朋友在那期間餓死，但他不願多談。那段往事，在他看來能夠遺忘最好。

接下來的時期，像是文化大革命，他倒是願意談。有別於大躍進，文革影響的大多是城市和讀書人，而這也是為什麼這段歷史在今天較為人所知。儘管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政治鬥爭都很淒慘，但傳到鄉下時已經不是那麼激烈了。政治常常是這麼一回事，各種運動像代碼一樣，從遠處一點點傳來，村民抓住些片段，其他的則不管。共產黨掌權後，第十大隊一位姓李的人家很驕傲地把三個兒子取名李毛、李澤和李東。每次他喚兒子到田裡幫忙時，就喊：「毛、澤、東，給我過來！」他說，這是他表達熱愛毛主席的方式。不用說，到了文革時，當村民從村裡宣傳擴音器中學了開「批鬥會」後，李家人就成了明顯的目標。第十大隊的村民把李父的雙手綁著吊起來，批判他亂用毛主席的大名，逼他喝公廁舀出來的尿。

威利的父母又窮又不識字，因此在文革時期沒有被當成批鬥的對象。事實上，這個時期對他們來說還挺幸運的。在此期間，威利的母親生了三個兒子，一九七一年生了老大戴建民，兩年後生了老二戴和平。一九七五年老三出世，因為他出生時很小，又紅巴巴的，就取名「小紅」。紅色在中國是吉祥的顏色，果真沒錯，小嬰兒出生的第一年，世局就有了大轉變，威利還不滿十個月大時，毛主席逝世了。

消息傳來時，威利的父親正在鎮上某處幫忙蓋肥料場。一起工作的還有三個人，全停下手邊的工作，聽著從擴音器中傳來的新聞。聽完後，他們一句話都沒說。多年以來，他們嘴邊常掛著那口號：「毛主席，萬歲！」現在真不敢相信他死了。

當晚他們沒回家，全睡在工地帳篷的一張粗木板上。威利的父親整夜無法入眠，他知道這次和之前來來去去的那些運動不同，他無法預測將會發生什麼事，但他確知一切都將變得不同。那大半夜裡，他

躺在那兒安靜地流淚。直到後來，他才知道，那一晚，另外兩名工人也一夜無眠，躺著啜泣。

第十大隊的毛主席追思會在當地學校的硬土廣場上舉行，整整七天，所有的工作全暫停；他們做了白色紀念花圈，對毛的遺像叩頭。第一天，一個叫劉玉清的女人因為哭得最大聲，受到村民注目。到了第二天，大家開始懷疑她是不是有毛病。到了那年年底，村民常看到她漫無目的地在稻田上走來走去，告訴人家她曾是毛主席的祕密愛人。她宣稱和毛澤東主席以及總理周恩來一起設計了勝利橋。她常話說到一半就急急忙忙說她得走了，要去趕赴一個重要的政治局會議。當威利還小的時候，劉玉清常在蝸牛河邊出沒，洗她亂得打結的頭髮，哼唱著自己加入有性暗示歌詞的傳統歌頌毛主席的曲子。她用露骨的當地話跟人說，她「睡瞌睡」了毛主席。威利和其他小孩常取笑她，大喊：「妳什麼時候還要再跟毛主席見面？還會跟他睡瞌睡嗎？」劉玉清的小孩長大成年後，上田工作前總把母親關在家裡。

\* \* \*

威利的父親對中國將改變的猜測一點也沒錯。雖然他不識字，沒上過一天學，但天資聰穎，當經濟改革的風氣一滲入村裡，他馬上就有反應。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他就已經組織了一個私人的工程隊在雙龍公社工作。到了改革開放的第五年，威利家已經成為第三生產隊最有錢的家庭之一。

其他的徵兆也顯示著這個世界果真變大了。一九八〇年，威利的一個叔叔成為村裡第一個赴外地工作的人。他遠行到西邊的甘肅，在一組工人隊裡待了幾個月。不久，其他村民也開始離開，不過他們朝



的是相反的方向：往東走。另一個最早離開的是威利的鄰居，這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是村裡最有學問的人。因為曾經念過五年書，他在黑龍江的一家鞋廠找到了工作。回到村裡後，他講述了自己闖蕩的故事，還寫成了詩。威利小時候很崇拜這個鄰居，最愛聽他唸他自己寫的詩。

當地的第一台電視出現在第四生產隊。每天晚上，威利和他的哥哥們會騎半小時的腳踏車來到第四生產隊。電視的主人蓋了棟兩層的樓房，到了晚上就把電視放在二樓陽台，讓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有天晚上，威利和他的哥哥盯著那陽台連續四個多小時，被那台機器給迷呆了。之後，他們全部脖子痠痛，那讓他們的父親決定要買台電視。

威利最鮮明的兒時記憶之一就是一九八二年的那一天，他們家成為第三生產隊第一個擁有電視的家庭。多年之後，他還記得那場景：

我非常驕傲，非常開心。電視買來了，但沒有人會開。很多人都試過了，但就是不行；可能花了有五、六個小時。當時我們家來了一百多個人，大多都待在大屋子裡，就像個大廳，大家一排排坐好，還有一些坐在外邊。等我們學會怎麼開機後，只有一台節目可以看——四川電視台。那時港劇很流行，我們最常看的是《大俠霍元甲》。霍元甲是清朝末期功夫了得的大俠，日本功夫好手到中國來挑戰，全被霍元甲打退。我還記得那首主題曲：「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睜開眼吧，小心看吧／哪個願臣虜自認／歷來強盜要侵入，最終必送命。」

《大俠霍元甲》之後是墨西哥的肥皂劇，第三生產隊居民發現它一樣好看。它的中文叫《女奴》，劇中主角糾纏於婚外情，情婦們又壞又賊，太太們又天真得什麼都不知，讓人難過得看不下去。在威利家，村人們總是叫喊著一致的心聲：同情太太，鄙視情婦。《女奴》這齣戲首次向第三生產隊居民揭露了外國人的私生活。

四川經常下雨，天氣不好的時候，擠不進威利家的觀眾只好站在窗外撐著雨傘。電視十四吋大，不久就多了一個頻道：

人們會喊說：「換台！」我會說：「不行，看哪一台由我決定！」我就像個主子，很驕傲。有天晚上，大家正在看電視時，它突然沒聲音了，什麼聲音都沒有，有些人很生氣就離開。我走到電視機前把它關掉，有人喊：「別關！」我就把電視再打開，沒想到聲音就回來了。後來同樣的問題又發生，我一樣地把它關掉再開，就行了。有時一次不行，我就得關關開開二十幾次，甚至三十幾次，幾乎把電視給搞壞了。有的時候畫面很不清楚，我就得握住天線。大家輪流握著，這樣其他人就可以看電視了。

\* \* \*

威利小的時候，看著哥哥們每天去上學。清晨，戴建民和戴和平沿著一條泥路往南邊走去，兩人共提著一張木板凳。他們消失了幾個小時後，照樣提著那張板凳回來了。在威利眼中，那就是上學：一件有著哥哥們和板凳的例行公事。

村裡的學校圍著泥巴牆，老師們其實是教育程度很低的當地農民，他們的正職是種田，一旦田裡有事，學生就放牛吃草；一到農忙

季節，學校就關門停課。威利的兩個哥哥都沒有讀到五年級，後來一個當了農夫，一個當了工人。

威利十歲時，父親已經跟不上改革開放的腳步。新經濟變化得太快了，機會之窗稍縱即逝，有時，某項產品或技術甚至不到一兩年就落伍了。一九八〇年初期，地方上有知識且勤奮的居民還能承包到小規模的工程，威利的父親就是在那時賺到錢的。不久，競爭一多，工程競標需要更精明的計算。有時，威利的父親承包了一樁需要花長時間的工程，到頭來卻反而賠錢。他常警告威利沒有受教育會有多麼不利。「我爸爸說，沒念書要工作很難；你會被有念過書、有知識的人騙。如果不念書，你只能當個苦力。」

這個男人決定更認真地看待小兒子的教育。他付較貴的學費讓威利去鎮上的學校，那裡的教育更好。不過真正影響威利教育的關鍵是一個「奇蹟」——至少多年以後，威利是這麼回憶的：

我念小學時，前四年的成績不是很好，每一科對我來說都很難。可是奇蹟出現了——從五年級開始，我的數學變得非常非常強。我也不懂怎麼會變得那麼快。老師會在黑板上出一大堆算術題讓我們解答，解得愈快愈好，而我總是第一個做完的。中學入學考，我在七十多個學生裡拿了第二名。

很快地，威利的父母不再要他下田幫忙，雖然他們的地有十分之一公頃那麼大。儘管威利的哥哥抱怨，但是父親知道小兒子的前途比較有利。威利常幫父親的工程做計算，只不過到了中學時，這男孩發現自己不再喜歡數學。還好這時另一道光芒出現了：

六年級時，我們拿到第一本英文課本。我想那是另一個奇蹟。我的成績很差很差。我們的老師是鄉下來的，叫譚興國，高中剛畢業，連大學文憑都沒有。他講的課我一句也聽不懂，考試老考不及格。但是在期末時，我決定靠自己學習。我偷了幾枝粉筆，把家裡的門當黑板，在上面寫單字，然後唸出聲來。寫寫讀讀，我很喜歡這樣：我是老師，我也是學生。這是最適合我的方式。

期末考試卷一發下來，我很驚喜地發現所有的題目都好簡單。我考了八十分。從此我對自己就有了信心。

一九九五年春天，高中結束時，威利通過國家考試，考進涪陵師範專科學校英語系。他和另外兩個男孩是第三生產隊裡第一批讀大學的人。

\* \* \*

威利坐在教室最後面，字典攤開在桌上。他在班上成績很好，而且只要叫到他，他答問題總是又快又對。但是他不是那種一有機會表現就舉手的學生，課堂進度對他來講太慢了；如果我講課時踱步到最後一排，他就會很快用紙把桌面蓋起來，不讓我看到他又在讀字典。他矮小、結實、皮膚黝黑、戴著眼鏡、穿著整齊，不過，他身上那套衣服都是便宜貨，領子有磨損的襯衫，裁縫店的牌子仍掛在袖子上的外套。跟我大部分的學生一樣，他的外表可以用「土」來形容。他看起來像個農民，也有著農民粗樸的幽默感。有一次下課後，大家都走

了，威利溜到我身邊，用很小心刻意的發音問我：「你的早洩好些了嗎？」（How is your premature ejaculation?）

他喜歡嘗試新的句子，而且常是些奇怪的句子。新的語言迷住了他——他很愛用「yahoo」（亞戶）一字，這是從《格列佛遊記》讀來的一種人形獸的名字，他老把從亞當的西班牙課上學來的「tonto」

（通托）<sup>3</sup>掛在嘴邊。每次我在課堂上介紹一些被引用在英語裡的外來語時，他總是興趣盎然，「coolie」（苦力）就這樣成為他常用的一個字。他喜歡「so-called」這個辭的諷刺性：中國「所謂的」愛國主義，大學「所謂的」晨操。他對四川話特別有感情。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威利和他的同學教了我一些「土話」。在四川，你可以嘲笑一個人，叫他「瓜娃子」或「龜兒子」；當地「斧頭」的發音跟「陽具」一樣。「牙刷」很奇怪地被當作形容詞使用，「你很牙刷！」在籃球場上，如果某個球員投籃外空心球或打得很差，四川觀眾會大喊：「陽痿！陽痿！陽痿！」跟威利和他的同學打完球後，他常帶著嘲弄的認真口氣笑我，「我看你的陽痿還是很嚴重哦。」

但是一到了真實的生活，他的壞只是虛張聲勢。在學校的第二年，威利開始注意到一個叫南西的英文系女生。她長得很嬌小，黑眼睛，面貌姣好；南西很害羞，是一有男生在課外跟她講話馬上就會呆住的那種。威利幾乎跟她一樣羞怯，花了好幾個星期才鼓起勇氣給她寫信，用的是中文，他讚美她的美麗、安靜和好個性。他問，可不可以跟她有單獨相處的機會。

管理學校的是一群保守的幹部，他們批判學生之間的戀情，視之為沒必要、只會讓人分心的事。年輕男女一旦交往就會被畫上汙點，這汙點會一直留在他們的政治檔案上，受到未來雇主的調查。南西從

未回應威利的紙條，不過接下來的那個週末，她悄悄地跟上他，一起繞著校園散步。

後來我們去看電影。我們一句話也沒說。那真的很尷尬，我覺得非常不好意思。我現在記不起來那部電影在演什麼，應該是部美國的大片。我送她回學校宿舍。就這樣持續了幾個星期，她話很少。

有天晚上，我們去運動場，坐在樓梯上，天很黑。我們開始聊，聊得很開心。突然管理員出現，問我們在那裡做什麼。他把我們的名字抄下。南西害怕極了，說那是命中注定的。之後她很難過。有一個多月，我試著約她出來，她都不肯。

跟威利不同的是，南西是個悲觀主義者。她得到父親的遺傳，她父親是一個來自四川北部、從未能在經濟改革中安身立命的農民。她父親夢想發大財，也總能找到新的花樣搭上改革列車。一九九〇年中期，四川養豬業大興，養豬人家遍布全省，有個離鄧小平故里廣安不遠的鄉鎮的豬種尤其出名。南西的父親決心要成為全村第一個飼養新品種的人。他坐了七個多小時的巴士去買那豬種。接下來幾個星期，他買的二十隻小豬，一隻接一隻全死了。他有可能是被騙了，買了假的品種。在中國的新經濟中，什麼假東西都有人賣：假的行動電話、假的皮爾卡登內衣，甚至假的種豬。常見的手法是在豬飼料裡摻入豬吃了無法消化的油菜籽。

事出必有因，但在偏遠的農村卻不一定是這樣。奇蹟庇護著威利，命運卻詛咒著南西的父親。有一年，他買了部電動腳踏車來載

貨，不久後車子就撞壞了。他又試著養兔子，結果也染病死了。到處都是厄運。

大學最後一年，威利終於讓南西不再恐懼校方反對學生交往的規定；不過，即將到來的畢業卻帶來更大的威脅。如果他們接受政府所安排的教職，他們得各自回到故鄉，那表示他們得分隔數百里。

那年春天，一位浙江的校長來涪陵招募新老師。這是每年的慣例，招募人員總在四月出現，希望從沿海和內地的薪資差異中謀利。在像涪陵這樣的地方，他們用比東部少很多的薪水，就可以吸引到頂尖的師資。

來招募的王先生穿著銅扣漿領的中山裝（外國人有時候稱之為「毛裝」）。王先生告訴學生，他十六歲就加入共產黨，畢生奉獻於中國的教育，最近在玉環島成立了一所「百人高中」。王先生說，玉環的經濟發展得很好，年輕人從全國各地到那裡的工廠和貿易公司工作。對新進教師，王先生承諾提供免費的住所和月薪八百人民幣，這比威利和南西回鄉任教的薪水高過兩倍以上。但是他們如果要到那裡去教書，涪陵英文系的黨職員必須同意把他們的檔案轉過去。

威利和南西提出了申請，他們的政治背景不是很出色，兩人都沒有加入共產黨，也不得幹部特別偏愛。除了其他一些小違規外，兩人的戀愛還曾被批評過。畢業在即，他們卻還沒得到上面的回覆。

最後，威利決定採取行動，事先也沒有問任何人的建議。多年後他解釋說，當時他只是聽從自己的「第六感」。一天晚上，他偕同南西到黨書記家。黨書記向來不怎麼友善，威利也不太喜歡他；但那晚，他笑著請威利進門，他稱讚說，玉環聽起來像是個經濟前景看好的地方，不過，浙江很遠，轉送文件到那裡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威利跟他解釋，往東發展是他最想做的事，他掏出一個信封袋，放在書記面前的矮茶几上，說：「請幫忙。」

「我試試。」書記說。然後他送那對年輕人到門口。誰也沒提一句關於那信封袋的話。

另外一名職員負責畢業生的工作編遣，威利和南西到他的住處重施故技。每個信封袋裡裝著五百元人民幣，總數等於威利父親半年的收入。那也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賄賂職員幹部。

畢業前不久，學校通知威利和南西，他們的檔案已送到他們申請的東部。

何偉  
華爾街日報  
7—2—63建國門外外交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

親愛的彼得：

很高興聽到你的消息。太平洋彼岸又多來了一位外國「牙刷」，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的好消息。接到我的信時，你可能正在跟中國婊子上床。不論如何，還是請讀我的信，因為它可以被當成「威而鋼」……

我的學校工作不是很好。我覺得很累。事實上，我們被當成了「苦力」。我們被歧視，因為掌管薪水的是一個婊子，她既性冷感又苛刻，唯一能滿足她的是金錢。過了這半年，我覺得愈來愈好了，不管如何，我還是很高興能來浙江，這裡的機會終究比



較多。因為我對英語的熱情，我還是很努力地在學這個語言，我有信心，有一天我會成為重要人物，不再是個牙刷。我的教學在這兒算是挺成功的，你和亞當是我的教學榜樣.....

彼得，我希望你能找機會來玉環看我。我的那些「亞戶」學生迫不及待地想見你。

對了，我有幾個問題要問你：

一、「KTV」的定義是什麼？

二、英文該怎麼稱呼那些到別的城市討生活的人（特別是從四川來的農民）？

三、「DVD」、「VCD」的全名是什麼？

四、你會想成為一個美裔華人嗎？

五、你希望有幾個老婆？

六、你是不是還陽痿？（小鳥挺不起來）

誠摯的威利

\* \* \*

抵達玉環後，威利和南西發現，王先生所描述的那個島跟真實情況差很多。第一，跟別的地方比起來，它根本不算開發；五十公里外、甌江旁的溫州才是這一區的新興城市。第二，威利和南西的工作跟王先生所形容的也不一樣。他所謂高薪的工作根本不存在。王先生跟他們道歉，說那是個誤會，然後付給他們不到當初所承諾的一半的薪水。他所保證的免費住所也只是空頭支票，威利和南西得自費在一棟大樓租個小房間；那居住條件之差，威利只能自嘲地稱它為「我那所謂的」公寓。

王先生每天都穿著那套中山裝，扣子全扣到底。他年約六十中旬，短灰白髮，紅光的臉，腳跛得很厲害。他暗示那殘疾跟為共產黨革命服務有關。他的老婆穿著傳統的「解放鞋」，手中的綢緞錢袋被她緊抓得汙黑又油膩。那女人負責學校的財務，每次付威利和南西薪水時，她總要從中扣掉連他們也不明所以的雜費和罰金——王太太是威利所見過最苛刻的婊子。

「百人高中」也不存在於任何具體的地點，校址幾乎每年都在變動。王先生付短期租金，租下那種蓋到一半的樓房，或是被舊公立學校遺棄的校舍。大部分的學生來自邊遠的島嶼，他們沒考上公立學校，家長別無選擇，只好送他們上私立學校。在中國，義務教育只有九年。

王氏經濟王朝雖然是暫時的，但卻多元化：王先生的一個兒子在校舍附近畜養專供當地警察用的警犬。王先生自己的辦公室，跟學校一樣尚未完工，除了一張書桌和幾本書，什麼家具也沒有。最有價值的是一冊記載著各行各業成功人士傳記的《世界名人大全》。這本書被很顯目地放在王先生的書桌上，他總是鼓勵到訪者去翻閱。威利瀏覽了一下，裡面唯一認得的名字是王先生。大全裡王先生的那個部分詳述了他對中國的愛，以及他的種種輝煌黨績。書上還提到王先生如何多次自掏腰包，贊助付不起學費的貧困學生就學。

不到兩個月，南西就辭職回四川。她在家鄉找到一份教職，這時一個鄰居以鄉下人特有的耐心和堅定態度，開始追求她。

\* \* \*

威利第一年瘦了很多，他想念南西，他對「百人高中」的怨恨一天比一天深。學校主要仰賴外來的教師，他們的薪資只有本地老師的三分之一。王先生很清楚外地人要找新工作不容易。同時，學生一旦發現學校是個騙局後，常會退學，因此退學率很高；而一有學生退學，威利的薪水就被減一點。他根本存不到錢。

每天晚上，他藉著收聽美國之音以轉移自己的注意力。這個電台是美國政府在戰爭時創立的，於一九四二年日本轟炸珍珠港後不久在德國首播。至今，這個電台已擴充到以五十五個語言來播放。美國之音自稱所秉持的特色是：致力於提供值得信賴、有權威的新聞；它雖自稱為「美國」，但只是取這個名字的一般性，並無政治色彩。事實上，很少有美國人真的收聽過這個電台。美國政府不准它在本土廣播，擔心任何政府資助的新聞來源讓節目流於宣傳工具。這聽起來是典型的美國矛盾——創造了一個聲音，卻又防止自己的人民收聽。

但是在海外，美國之音每週大約有九千萬名聽眾。在中國，美國之音一向很受歡迎，例如說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示威期間，該電台宣稱約有六千萬名中國觀眾每週固定收聽。十年之後，大都市中多數中國人已有網路和有線電視，但像玉環這樣的小地方，美國之音依然是重要的訊息來源。它以普通話、廣東話和藏語廣播。

美國之音同時也提供英語節目，包括一種叫「簡明英語」的廣播形式。在美國之音的網站上可以讀到對「簡明英語」的定義，而這個定義也很簡明：

三個基本要素構成了簡明英語的特色。它以一千五百個基本字彙為限，大部分是用來描述事物、行為或情感的簡單單字。有些比較難的字彙，則用來報導世界上發生的事件、描述醫學和科

學上的創新。簡明英語的每個句子都短而簡單，只用來表達一個想法，而且絕不使用俚語。簡明英語講得比較慢，速度大約為正常英語的三分之二。

簡明英語是冷戰的產物。一九五〇後期蘇聯常干擾美國之音的廣播，廣播者決定一個型態簡單的語言，將會比較容易穿過靜電干擾。它的原意不在語言教學，但很快地變成教學工具。全世界有幾百萬的人利用廣播中的特別報導來學習英語。

在涪陵，我的學生也虔誠地收聽，跟著模仿聲調。很快地，為了讓學生聽得懂我們，亞當和我也學會用那種方式講話。我們是那城市中唯一的美國人，幾個月後，我們不知不覺地習慣了用簡明英語對話。我在和平工作隊工作的第一年，有位朋友從紐約來看我，他很納悶我和亞當是不是失去了我們的母語。他不斷跟我們說，不要用那種語調跟他說話，好像他是個小孩子。

有時候我覺得簡明英語簡直是語言學的麥當勞——一種慢步調的速食語言。但因為我自己也在學中文，很快地發現，我也發明出自己的簡明中文。當你在學習一種新語言時，這其實是自然而然的方式：第一，你先找出基本的句型和字彙，就像畫家先描出一幅人像的基本輪廓。隨著時間過去，你把更多複雜的字句加進去，那感覺很像是住在一個粗略素描的世界裡，新的細節一天一天地浮現。

在玉環，威利幾乎每晚固定收聽「簡明英語」廣播。在一本畫線的筆記本上，他隨手抄下從各個節目聽到的字句，它們全都混在了一起：

大多美國人在週六早上喜歡晚起

簡明英語  
美國之音  
華盛頓  
總統中止科索沃  
現在可能飛去貝爾格勒  
視會議而定

通常他抄下的主題都是新聞，但有時會跳出有關美國文化、政治或歷史的節目：

第一層：國會圖書館  
壁爐旁：喬治·華盛頓  
一百三十二個房間，二十間臥室  
增加到三十四個洗手間  
隱私等於遠離公眾  
歷任總統和家人的房間不許參觀，不過他們從來不把這些房間視為己有，他們並不擁有這些房間  
白宮是屬於美國人的

威利最喜歡的一個美國之音節目是「美國成語」。這個節目介紹一些「簡明英語」不會提到的奇怪又複雜的新句子。威利在他的筆記本上寫著：

悔過自新  
鼠目寸光

## 嗤之以鼻 如坐針氈

可惜的是，「美國成語」是不含淫穢髒話的。威利四處尋找補充教材。他發現了一本中國人印行的《美國俗語》，但他最珍愛的一本，當數在杭州舊書店找到的《英文委婉語詞典》。這本字典專門收錄性學、糞便幽默學，和暴力的字彙。有一回我去找威利，我隨便翻到字典的一頁，跳出來的第一個字是：

女暴君（dominatrix）：名詞（美語）(1)一位女性獨裁者；  
(2)一個女性虐待狂；(3)一個性虐待狂活動的女總司令。

\* \* \*

一九九九年春節，威利長途跋涉返鄉。在第十大隊，他大部分的小學同學也都離家謀生；男的通常在工地，女的則在餐廳或是工廠工作。以他所受的教育，威利應該發展得比他們都好，但是他連旅費都勉強才存夠。省內另一邊的南西，情況也好不到哪去。在鄉下學校，她一個月賺大約二十五美元。而追求她的那名農夫是個禿頭。

自從回鄉後，南西對運氣的看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現在她覺得如果待著不走，她的命運將會是一份沒出路的工作和一樁沒生命的婚姻。春節期間，她橫越四川去找威利。出門前，南西的父母要她承諾春節一過就回家。他們認為，浙江的生活對兩個未結婚的男女而言太不安定了。

但南西和威利一旦重聚後，他很快地說服了她一同搭上東行的列車。他承諾不會在玉環待太久，最多把在「百人高中」接下來的一學期教完。威利相信，浙江的其他地方一定會有比較好的發展機會。

一個星期後，南西的父母知道了真相。他們打電話到那個「所謂的公寓」把威利臭罵一頓。假如接電話的是南西，他們就哭著問她：他們要是老了，該由誰來照顧。過了不久，他們找來親朋好友打電話恫嚇這對男女。南西的表姐是其中最頑固的、最不肯放棄的一個，連續一個多星期天天打電話來。每次都對威利大吼大叫，然後突然平靜了下來。「你要負責，」她說，「你要對你所做的事負責。」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

親愛的彼得：

近來好嗎？希望你在北京不寂寞。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中國小姐對你很熱情。不要忘了要小心，有些中國女孩老是冷熱不定、反覆無常。

這裡最近一直在下雨，我的心情就跟雨天一樣.....事實上我覺得有點無聊，也被學校的一些事搞得很煩。很久了我都沒什麼心情教書。只要一站上講台，我就期望著下課鈴聲趕緊響。所有的學生都是「亞戶」。有些既粗野又未開化。很多學生想退學，我沒有很努力地制止他們.....我相信有更多學生會離開學校.....

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我可以透過美國之音和用一本叫《美國俗語》的詞典學英語。我希望很快可以正確且自由地使用它們。我擔心自己堅強的意志會被這個環境消磨光，但願我可以找到方法離開這裡.....

玉環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換句話說，它跟外面美妙的世界完全隔絕。我很擔心待在這裡讓我無法好好使用英語。你看，我對英語充滿熱情，我把它視為我這輩子不變的另一半.....

對了，你的呼叫器號碼是6491-1166-56599嗎？要不要先撥區域號碼010？你對北約軍隊對抗南斯拉夫聯邦有什麼看法？

保重。

誠摯的威廉·傑佛遜·佛斯特

\* \* \*

五月勞動節假期的第一天，威利買了一本新的筆記本，小心地在第一頁寫下這個標題：

收聽筆記

威廉·傑佛遜·佛斯特

妻子：南西·珠兒

五月一日，一九九九年

南西的姓是他們在涪陵的最後一年時，由亞當建議她取的。事實上，這對男女朋友還沒有結婚，也尚未定下婚期。一對年輕的未婚男女住在一起，這在過去可能會引起不少流言。他們偶爾也會碰到麻煩：有一次在溫州租房被拒，因為他們無法出示結婚證書。不過這種問題很少見，在「百人高中」也沒人說話。移民學到的第一件事是：當地人不想跟他們有太多關係。

那年春天，威利繼續每晚讀英語，繼續寫他的美國之音筆記：



北約高峰會

一、視米洛塞維奇為欲置人民於死地的希特勒

二、日本人

西藏問題新疆問題

拒絕外部對內政的干預

西藏就像科索沃

研究顯示同性戀不是基因造成的

比爾·柯林頓，科羅拉多，丹佛

北約轟炸之後，威利的筆記變成更混亂：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

我們沒有其他意圖

軍事營地

表達它深深的歉意

戰爭犯罪

對中國在南斯拉夫使館的飛彈攻擊加深了中美關係的緊張程

度

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

據說貝爾格勒運送武器到中國大使館

中國提供貝爾格勒情報——通敵

人道社群

任務通路——合作

## 中央情報局

### 「打倒美帝」「打倒北約」

\* \* \*

那個星期威利常打電話給我。他很關心我在北京的安危，情勢安定下來後，我們持續固定通話。有一次他提到可能會來北京找工作，我告訴他如果他來的話，我會盡所能地幫他。

但他決定到溫州再試一試。他參加了這座城市的一個就業展，但沒有人願意雇用一個從長江偏遠學院出來的四川老師。有一天，他偶然看到報上一所私立學校徵求老師的廣告，學校在溫州附近的一個衛星城市樂清。威利前往應徵，該校的一位女行政人員要求他當場試教。那對威利一向不是個問題：他的英語很好，站在講台上感覺也很自在。那女人當下就決定用他，要他九月開始上班。

雖然威利對那女行政人員的印象很好，但過去的經驗教他不要太相信承諾。只不過，這次學校真的存在：不僅整修過，而且校園過去每年都在同一個地方。對威利來說，那是個好徵兆。他預想愈篤定，就算再怎麼糟，也不會比「百人高中」糟。

夏天快結束時，威利和南西祕密地打包。王先生希望他們在新學期繼續任教，而威利只要一想到王先生得在開學時臨時去找兩名老師來代課，就覺得很得意。威利和南西兩人加起來的行李，是兩個袋子、一台電視、一堆舊毯子，和總共約二百美元的存款。就這樣，他們不告而別，離開了玉環。

- 
- 2 編按：為方便行文描述，以下就用「威利」這個名字，特別狀況才會出現「威廉·傑佛遜·佛斯特」。柯林頓總統的全名是威廉·傑佛遜·柯林頓。
  - 3 編按：西班牙文中愚笨、豬腦袋之意。

## 第三章 斷橋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

那年夏天是天安門事件十週年紀念。五月下旬，外國報紙刊登了一些紀念性的文章。在辦事處，我把它們剪下歸在「T」下面：

Tea (茶)

Think Tanks (思想坦克)

Tiananmen Square (天安門廣場)

Trade Fairs (貿易展)

Transportation (交通運輸)

這個週年慶的問題是，命名這樣一個中國人無法公開談論的事件是困難的。剪報的同時，我自己整理了一份外國報紙的非正式用詞表：

天安門廣場鎮壓

天安門廣場屠殺

天安門廣場壓制

血腥壓迫天安門廣場的民主示威

六四鎮壓

在天安門廣場及其周圍的血腥鎮壓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軍事鎮壓示威者

## 鎮壓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示威的學生

北京報紙沒有任何相關的報導。打從一九八九年以來，國家控制的媒體都很少提到那個事件。一般中國人簡稱它為「六四」。在其他省分，人們對該事件的印象更是模糊；我住在涪陵時，有些熟識的朋友曾很認真地問我，真的有學生因鎮壓而死嗎？在許多市民曾親身參與那街頭運動的北京，人們對當年發生過的那件事則毫無錯覺或疑問。人們鮮明地記得某個情景，但是整體的印象依然是一片謎團。沒有人知道，它如何演變成後來的鎮壓，或者究竟死了多少人。大部分外國媒體預估至少有幾百人。

足以確定的是，最常拿來稱那事件的名字與事實有點出入。大部分的死傷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外面，尤其是靠西邊的街頭。鎮壓行動事實上是從六月三日開始，而非四日的傍晚。一九八九年，當暴力降臨到北京後，一位勇敢的中國記者透過國家的官方英語電台對外廣播：

「這裡是北京國際電台。請記得，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個最悲慘的事件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有數千人，且大多是無辜的百姓，死在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下……」

十年之後，紀念日被稍微往後移，地點也都集中在天安門廣場。雖然細節變模糊，人們對事件的記憶，跟當年那名記者所希望，相差並不遠。據報導他後來被判送到北京城外去接受多年的再教育。

\* \* \*

六月四日那天，《華爾街日報》的特派員和我輪流到天安門，去看看有沒有什麼紀念活動。我們錯過兩個示威遊行，每次參與的都只

有一個人，歷時不到幾秒鐘。一個中年人撐開一把白色的雨傘，傘面上是手寫的標語：

### 牢記學潮，國產歸還於民

穿便衣的公安很快把他趕走，但是美聯社攝影記者拍到那一剎那。過了一會兒，一名男大學生對空中撒傳單，但馬上被帶走。傳單上寫著反政府的標語，以及「打倒美帝」的字句。

我輪到的是下午班。廣場被圍上了警戒線，且用了個合乎時宜的理由——為了整修以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共建國五十週年慶。不過，天安門前面的一塊區域還是開放的。那是個有陽光的日子，來自外省的旅客聊著天，以懸掛在城門上的毛澤東肖像為背景拍照。

過了一會兒，我注意到人群中有些人看起來不像遊客。這些年約三、四十歲的男人大多剪著平頭，穿著很普通，身穿磨損了的褲子、便宜的防風短外套。他們不像受過很多教育，也似乎沒有樂在其中——他們不笑、不拍照、也不買紀念品。他們徘徊閒逛，鬼祟張望。有時，其中一個人會站到一群正在講話的遊客後面，好像在偷聽。每隔一會兒，一個平頭會走到另一個平頭身旁，說些什麼，然後走開。有幾個人手上拿著捲成筒狀的報紙。我看到其中一人拿起紙筒放在嘴前說了些什麼。我出於好奇走過他身旁，偷偷瞄了一眼，那捲筒裡是一個黑色的塑膠行動對講機。

我觀察這些便衣男子忙了快一個小時，那算是唯一可見的紀念活動。然後，我騎著單車回到雅寶路的伊斯蘭餃子館，提早吃晚餐。坐下後，一個三輪車夫停車走了進來，問可不可以和我同一張桌子吃，那張桌子靠窗，這樣他就可以看著他的三輪車。他點了一瓶白酒和一

盤花生，把醋淋在花生上，配酒吃。他喝得很快且面不改色，雙腿看起來很強壯，還長了些節瘤，好像是一根從古代硬木上切下來的樹幹。

晚餐時間還早，我們是店裡唯一的客人。老闆是一個北京在地人，手臂交叉趴在髒髒的桌面上打盹。三輪車夫跟我說，夏天時他一天可以賺十幾美元。他是道地的滿洲人且引以為傲。他告訴我滿洲人是怎麼建立清朝，統治中國近三百年。他們是好戰的一族，漢人是沒法比的，清朝的皇帝都以驍勇善戰出名。作為一個滿洲人，真是非常不得了。

吃完花生後，車夫叫醒了老闆，又叫了一大碗餃子。他把餃子沾在醋裡就跟他吃花生一樣。我很久沒見過有人食量那麼大了。出於好奇，我問他今天幾號，他不知道，於是轉頭問老闆。

「六月四日。」老闆馬上答說。他把兩隻手指交叉，比成中文的「十」字，臉上完全沒有任何表情。他說：「十週年。」

\* \* \*

在雅寶路，我學到跟波拉特打探消息。他好像認識這裡的每個人，而且關係好得不得了。七月上旬時，海尼根啤酒在本地的公園贊助了一個外國音樂節，波拉特拿到了一疊工作證。當一個爵士樂團在台上表演時，我們六個人就站在舞台旁，這是北京有史以來最難令人信服的工作人員的組合：一個美國剪報員、兩個維吾爾貿易中間商、一個中國服飾商，和兩個在工人體育場當保安的中國人。在波拉特把保安帶進爵士音樂會之後，他們保證他可以免費進入接下來在工人體育場舉行的任何足球賽。

很多時候，我們就坐在那家維吾爾餐廳外邊的露台上打發掉個把小時，喝著啤酒，看著行人走過。如果有某個商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問波拉特，他通常會知道那人的故事，比方說來自哪個遙遠的國度，或是買賣哪種不尋常的產品。如果他不認識那個人，則通常不是好兆頭。那些留鬍子的阿富汗人是個謎，有謠言說他們做寶石和鴉片買賣，不過波拉特並不確定。那些北韓人也是個謎，他們的使館就在維吾爾餐廳的同一條街到底，一棟巨大建築的前門上掛著宣傳照片。照片上快樂的北韓兒童唱著歌，快樂的北韓軍隊接受金正日的閱兵。

有時，北韓的外交人員會走過維吾爾餐廳。我從未看過他們單獨行動，他們總是兩兩成雙。這些穿黑色西裝的男人，夾雜在湧動著貿易商、批發商、妓女等等的人潮中，看起來是那麼僵硬而又格格不入。波拉特總會指出別在他們翻領上的金日成徽章，他還認得北韓外交人員的專車，因為車牌照上的前三碼是一三三。這些北韓人開著中國製的黑色奧迪轎車，從深色的玻璃窗看進去，什麼也看不到。他們的使館更神祕，在宣傳照片後沒有任何生命的跡象，大門永遠緊閉。

六月的一天晚上，我跟波拉特約在維吾爾餐廳，我有幾百塊美元要跟他換人民幣。他點了三瓶啤酒，那表示他會待上一陣子。在晚上，他常把生意安排在餐廳裡，跟他做貨幣交換的客人可以把車停到店前的人行道上。只要身上不帶超過四萬美元，波拉特覺得在車裡進行交易沒問題，但如果金額比這更大，他就會借用一個朋友在這附近的辦公室。他經手過的最大一筆交易金額是二十萬美金。

餐廳老闆打開人孔蓋取出啤酒。我等到我們開始喝第二瓶時，才把錢放到桌上。波拉特說，那天早上雅寶路的匯率是八點八六人民幣兌一美元，但下午跌到八點八四。他基於禮貌，給我八點八五。在銀行，你不可能超過政府所定的匯率八點二六去兌換。中國貨幣兌美元



是以定價買賣的，匯率從不會有太大的波動，除非是在黑市。一個星期之前，雅寶路的商人得付到九塊錢才能換一美元。

「這個星期匯率之所以會掉下來，是因為北京有個大老闆沒辦法把一筆現金運到香港，」波拉特解釋說，「那筆現金還在深圳，除非那些錢跨過邊界，否則匯率是不會再上升的。」

這個黑市循著某種拜占廷式的、我從來搞不懂的謠言系統運作，但是對於波拉特來說，這完全合乎邏輯。他也常花很長的時間跟我解釋一些內情，例如像在哈薩克某處收受賄賂、管制鬆懈的邊界，如何因為突然嚴格起來就可以在北京的市場上掀起一陣騷動。我喜歡聽這樣的故事，尤其是在《華爾街日報》剪了一天報紙之後。日報的麥特主跑美國電信的高通公司，該公司打算在中國開發一套新的行動電話系統。有時候，高通的股票在一天內就可以漲跌個三、四點，而這完全要看麥特怎麼報導。那些新聞總是和一點點蛛絲馬跡攪在一起，例如說公司的合約內容被部分外洩，或是政府的一則間接聲明。這些訊息其實並不一致，但是高通的股票就會整年瘋狂地跳動。如果自由撰稿這行走不通，我也許可以把當剪報員時聽到的，和從雅寶路貨幣謠言網得到的內線消息，加在一起，做點什麼訊息交換的生意。

我們很快地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一個白人和一個亞洲女子在遠遠一角找個桌子坐下。她看起來不像中國人，我跟波拉特問到她。

「事實上，她是個北朝鮮人，」他說，「韓戰時，她的父母變成了孤兒。」他沒有使用中國官方的標準名稱「抗美援朝戰爭」，而是很小心地選用「韓戰」這個名字。

他繼續解釋說：「戰後史達林接收了部分孤兒，他把其中很多小孩送到烏茲別克收養，那女人的父母就是在那裡長大認識的。她在烏茲別克出生，現在在北京做生意。」

我問，她會說韓語嗎？

「他們已經不會說韓語了，」波拉特說，「現在跟烏茲別克人沒什麼兩樣。」

我們又叫了兩瓶啤酒。一輛黑色奧迪車從東邊慢慢駛近，在人行道上停下。波拉特欠身站起，提著他的皮錢袋鑽進車子裡。車窗一片漆黑，引擎繼續開動著。當他回來時，我可以感覺到一股冷氣從他的衣服透出。

「我剛完成的是雅寶路金額最大的貨幣交易之一，」他說，「他的朋友是中國航空的駕駛員，有時幫他把美金帶出國。」

天快亮時，我們點了麵和烤羊肉。那韓國—烏茲別克女人和她的同伴吃完，付了帳，一起離去。我想著：她的父母被送到烏茲別克收養是不是對她比較好，讓她的人生變得比較幸運。但在雅寶路，很多事是很難說的。

夏末時，我決定到中國一個叫丹東的城市做一趟調查之旅。那座城市隔著鴨綠江正面對北韓。我想，在一個如此孤立隔絕的國家的邊界，也許可以找到些東西來寫。我跟波拉特提起時，他笑著說，北韓是那種會讓中國看起來很進步的地方。

\* \* \*

抵達丹東的第三天，我在凌晨兩點醒來，發現房裡有小偷。那是一個中等旅館，一晚十美元。丹東是個中等大小的中國城市，是那種若不是和北韓隔河相對就不會吸引太多人注意的地方。但因為丹東鄰近與世隔絕而被外界稱為「隱士王國」的北韓，一切就改變了。丹東自我宣稱是「中國最大的邊境城市」。鴨綠江岸上擺列著供遊客租用

的望遠鏡，大部分遊客都是那些想要擁有「生平第一次看到外國」經驗的中國人。望遠鏡後面的看板上寫著：「出國只要一塊錢！」而只要付十塊人民幣，你就可以搭快艇近距離地看北韓人，看他們在炎夏的午後在河堤淺灘上游泳。每逢結婚吉日，丹東的傳統是新人租艘船，在禮服上套上救生衣，逼近北韓的邊界。

在丹東有很多事要想，那可能是我晚上忘記關窗的原因。我的房間在二樓，我想應該很安全，就沒有注意窗戶外那道寬達三十公分的窗台，我也忘了做我平常旅行時總會做的——把藏錢腰包和護照放在枕頭下面。我把它們跟相機、皮夾、記者的筆記本和兩件短褲全放在衣櫥上。當我醒過來時，那個小偷正捧起我的所有東西。那瞬間，我們之間的空氣凍結了。

當你生活在兩種語言之間時，有時在一瞬間，那界線消失了。在中國，有時半夜電話響起，我要花個幾秒鐘才能聽懂話筒另一邊的聲音——一位美國老友的聲音。偶爾，當我正以中文與人交談，突然會有個英文字無緣無故地在我腦裡揮之不去。做著兩種語言交雜出現的夢則一點兒不奇怪。但最奇怪的夢是，在密蘇里我記得的一些人，正講著中文。從那些夢中醒來時，我會躺在那裡，想著潛意識是如何穿過深深的語言和記憶層。我想，如果哪天碰到真正的危難，我應該就會知道在最底下一層的是哪種語言。

在丹東，我從床上驚醒，脫口而出的是「Motherfucker!」（幹你娘！）。小偷轉身往門外跑，我的東西全都在他手裡。第二聲還沒喊完，我人已下床；到了第三聲「Motherfucker!」時我已衝向走廊。走廊沒有開燈，模糊的旅館房門快速閃過，「Motherfucker!」我的回聲從牆壁彈出。小偷拚命地跑，但我跑得比他快。我們繞到一個轉角，

在便宜的地磚上滑過。我赤著腳，身上只有一條內褲。在走廊盡頭的出口和樓梯間，我抓到了他。

我使出全力用拳頭重擊他。他沒有還手——他的手上全是我的東西。我每揍他一拳，他就丟出一件東西：揍他一拳，我的相機立刻跳了出來（「Motherfucker!」）；再揍他一拳，我的藏錢腰包掉下來（「Motherfucker!」）；再一拳，我的短褲飛到了空中（「Motherfucker!」）。皮夾、筆記本、護照——全掉在地上。我整個人氣瘋了，雖然他已經把所有的東西都丟下了，我還是不停地揍他。這時他只想逃。他跑回走廊的另一頭，不顧一切想要轉開門把，可是統統鎖著、鎖著、鎖著。我緊跟在後，尖叫，抓住他，揍他。最後，他終於找到一個沒有鎖的門，跑向一扇開著的窗，在兩層樓上，從那跳了下去。

我差點跟著往下跳。我一直跑到窗前，身體無法控制地往那外面衝。但突然間，我好像醒了。我往下看，發現那小偷滿幸運的，這邊的二樓下頭有一片寬廣的延伸屋簷。我停止叫喊。夜一下子安靜了。我聽到那人穿過旅館轉角的腳步聲。他依然狂跑著。

\* \* \*

暴怒過後，我感覺到了身上的疼痛。打鬥之間，我扭傷了左手中指，一定是在我拉住他的時候脫臼的。旅館夜班經理陪我上醫院，我們叫醒了上大夜班的醫生。他打著呵欠，把手指接回去，照了張X光。關節看起來還是彎曲，醫生把手指拉出再接回去。這次，照X光的機器壞了，我必須在早上技術人員上班後再去照。我們到警察局報

案。頭昏腦脹間，我回答了問題、填了表格，我用中文交談的能力正急速下降。終於，在清晨五點，我回到床上。但我睡得很不安穩。

幾個小時後，旅館老闆親自來帶我去醫院。他是一個英俊的男人，頭髮用髮膠抓起定型，幾綹藍黑色的髮絲掃過前額。他穿了一件嶄新扣到底的白襯衫、燙得筆直的西褲。他對我的遭竊不斷道歉，然後介紹自己。

「我叫李鵬。」他說。

我不敢相信：「李什麼？」

「李鵬。」

「跟前總理一樣？」

「是的。」他帶點倦意地微笑。我看得出來，自己絕不是第一個發現這巧合的人。一九八九年夏天，是李鵬正式宣布戒嚴令，很多憤怒的中國人把他跟鎮壓連在一起。之後，據一家香港報紙報導，憤怒的北京市民打電話騷擾了二十位正巧名叫李鵬的民眾。其中至少有一人申請改名。十年之後，李鵬的笑話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之間很流行。

「你喜歡李鵬嗎？」我問旅館老闆。

「No!」他說，改用英文來強調。顯然，他比較喜歡談其他話題。他問我有關被偷的事。

我已經跟警察說過我所能記得的關於小偷的所有細節：黑頭髮，年紀大概在二十至四十歲之間，比我矮小。如果再看到他，我也無法認出他。

含糊的答案曾讓警察很疑惑：你怎麼可能打那人打得自己手指都斷了，但是一點也不記得他長什麼樣？我也一樣不解。我很清楚地記得追他的諸多細節，像是那黑暗的走廊裡飛閃而過的門，尤其記憶鮮明。在我的腦海裡，我也清楚地記得那個樓梯間，我的相機跳在空

中，還有那扇開著的窗戶。我還聽得到自己叫喊的回音。最清楚的，是我記得那一想到就讓我無法平靜的憤怒。但是那小偷的長相在我心中卻是一團模糊。李鵬皺起眉頭。

「他是個小孩嗎？」他問。

「不是，他不是小孩。」我說。

「那你怎能那麼輕易就抓到他。」

「我不知道。」

「美國有小偷嗎？」

我告訴李鵬美國有小偷，但是他們有帶槍，你不會追著他們跑。

「在中國，大部分的小偷會帶刀子，」他認真地說。接著道：「有哪個小偷會連刀都沒帶？這是為什麼我想他是個小孩的原因。」

「他不是小孩，這點我很確定。」

「但是他為什麼沒有回手呢？你怎麼會那麼輕易就抓到他？」李鵬聽起來似乎有點失望。

「我不知道。」

警察問的問題也差不多，我開始覺得有點不快。當我們反覆倒帶這個事件，我發現它呈現出幾個層次的不安全感：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這些人對外國人在他們的城市裡被偷感到很丟臉；再者，勉強接受這個事實後，他們發現更丟臉的是，那外國人竟然還抓住了小偷。只有最愚笨的小偷才會在凌晨兩點被一個外國人揍，結論是那小偷一定有什麼地方極不對勁。警察提出各種解釋的理由。他一定是個醉漢或跛腳的，要不就是一個窮得不得了的外來人。警察們強調，丹東是一個現代、秩序井然、觀光業成長的都市，而不是那種外國人會在半夜醒來、發現有個小偷在房裡的地方。

沒有人重視另一個可能性——那小偷是北韓難民。警察跟我保證這個邊界沒有什麼難民，因為跨江那邊的新義州，並不像北韓其他地方那麼貧窮。據在新義州有親友的丹東人所說，新義州人一天有兩餐吃。若再往東一點，則是受饑荒和瘋狂經濟政策影響最慘重的地方，據統計，那裡每年有七萬北韓人逃到中國。在我想來，很可能其中至少有幾個會跑到丹東。這個可能性困擾著我：如果本地人希望那小偷是個瘸子，我倒希望他四肢健全。我希望他是個老練、心智正常、腳步飛快——值得一戰的對手。我希望他是中國人，而非北韓人。一想到我痛揍的可能是個快餓死的人，我就覺得不安。

李鵬和我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他想到另一種可能性。

「他可能有毒癮，所以才會那麼虛弱。」

「這裡有很多染上毒癮的人嗎？」我問。

「沒有，沒有。」李鵬很快地答，「丹東沒有任何毒癮患者。」

\* \* \*

鴨綠江上，曾經連接丹東和新義州的斷橋，是城裡最主要的名勝。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韓戰第一年，麥克阿瑟統帥的軍隊向中國邊界逼進，美軍轟炸機炸毀了大半座橋。中國修護了他們這邊的一段後，在一九九三年開放觀光。觀光客可以走在橋上，到河中間橋的盡頭看看被炸毀的殘骸，還可以付一塊人民幣租望遠鏡觀看對面。北韓尚未修護他們那邊的橋。一條空空盪盪的山形牆橫跨在清澈的鴨綠江中，尾端落在遠遠另一邊的堤岸上。

有天早上，站在中國的橋上，我問出租望遠鏡的男人，北韓人在幹什麼。

「他們在游泳。」他說。

我付了錢，把眼睛貼在望遠鏡上。遠遠的江邊站了一位漂亮的高麗女孩，穿著舊式的帶裙的紅白線條泳裝。踩進水裡時她打了個冷顫。她後面，一群小孩正圍著一個大人，看起來像是老師。我挑了個頑皮的男孩，透過鏡片跟著他。他撞上另一個男孩，在同伴間跳來跳去，往一個女生身上丟沙子。老師罵著他。不遠處站著一個背著槍的士兵。所有人都被框進這望遠鏡的圓鏡片裡，那一瞬間，我迷失在這微縮的世界裡。然後，租望遠鏡的男人問我是哪一國人。我往後退了一下，回答他。

「假設美國跟中國今天打起仗來，你認為誰會贏？」他問。

「我不認為美國跟中國今天會打仗。」

「但假如他們真打起來，」他繼續，「你認為誰會贏？」

「我真的不知道。」我說。我轉移話題問他生意如何，他說還不錯。在望遠鏡旁邊，他還架設了一個照相攤位，觀光客可以換裝打扮，以斷橋當背景拍照。他們可以穿上傳統的北韓民族服飾，或是整套的中國軍裝，還包括一頂鋼盔和一把塑膠製的軍槍。

橋上另一個小販開了家咖啡店，觀光客可以買到包裝紙上印有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和凱特·溫斯蕾照片的「鐵達尼號」雪糕。咖啡店經理解釋說，雖然橋是國家的，但是私人企業可以租場地擺望遠鏡和零食攤。我在橋邊停下，跟另一個幫觀光客拍照的攝影師聊天。「你認為中國有辦法加入世貿組織嗎？」他問，「今年四月朱鎔基訪美的時候，所有的媒體都說會。不過南斯拉夫轟炸後，看起來不是那麼樂觀。」

我們聊了一會兒，攝影師不斷地提起世貿組織。我問他為什麼那麼感興趣。「報紙說，如果我們加入世貿組織，就會有更多外國觀光



客來中國，」他解釋道，「當然囉，如果中國的經濟變好了，也就會有更多中國觀光客來這裡。這對我就有影響了。」

我一向喜歡到像丹東這種沒什麼外國遊客的小城市旅行。當地人總是很健談——以他們的觀點看來，跟一個美國人的簡單交談對他們有某種重大意義。跟他們的談話常讓我想起中國跟外部世界複雜的關係。人們不可避免會談到戰爭或是有爭議的事件，他們毫不懷疑美國或其他國家曾故意欺凌中國。但在同時，人們對外國人又是那麼友善，熱情跟你談論各種國際貿易上的聯繫。

最初，這些矛盾讓我很迷惑——我以為總有一天，我會了解人們真正相信的是什麼，但隨著時間過去，我意識到，這些矛盾的想法，即使是在同一個人的腦裡也是可以同時存在的。當中國人跟一個會講中文的外國人聊天時，那則遙遠的轟炸新聞可能觸發他做何種不同的反應，跟你當時所處之地的複雜度有很大關係。如果你正參觀一座被美國人炸斷、中國人修復、小商人在賣鐵達尼號雪糕的橋，那麼，這裡的人對外界的不合邏輯的反應，你就不會感到訝異了。

鴨綠江斷橋位於「丹東邊境經濟合作區」的一邊。本地人驕傲地稱這區為「開發區」，它描繪出當改革開放終於抵達中國的這個地區後，過去十年裡丹東的發展有多快。人們告訴我，十年前，這裡除了農人的簡陋棚屋和臨時船塢外，是個不毛之地。而現在，這裡有餐廳、冰淇淋小販、卡拉OK歌廳和一棟叫「歐洲花園」的豪華公寓。開發區的東邊是「鄉村狩獵公園」的入口，還有一座供火車和汽車通行的到北韓的跨海新橋。在橋和豪華公寓之間，有一間性病防治診所，還有一間提供按摩服務的芬蘭浴休閒中心，休閒中心的看板上畫著一張上半身裸體的外國女人淋浴的照片。

在「鄉村狩獵公園」的入口處，旅客可以射「野」鵪鶉、鴿子、雉雞和兔子。那些鳥都被綁在地上，只要一塊人民幣，觀光客可以用點二二口徑的步槍或弓箭射殺牠們；花三塊人民幣，可以用手槍射擊躺在地上的兔子。他們可以吃掉所射殺的任何東西。

有天下午，我看著兩位從廣東來的觀光客射鵪鶉。那對年輕情侶二十初頭，穿著體面。男的醉得很厲害，不斷地射偏。那些綁鵪鶉的拴繩鬆掉了，牠們就躺在陽光下——是我所見過最了無生趣的鵪鶉。

「我醉得太厲害了，換妳來射。」那男人說。他在這個地方長大，現在帶女朋友回來玩。

「我不要射，槍聲太大了。」她說。

「拿著，」他說，「妳來射。我太醉了，射不準。」

「我不要。」

「拿去。很容易的。」

那男人教她怎麼把槍放在柵欄上，這樣比較容易瞄準。看守的人通常不准客人那麼做，因為那柵欄很不穩固，但是他為那女人打破了先例。我坐在附近，聽著那對話，試著回想起記憶中的海明威的哪個故事。他的故事裡總是有槍、動物、女人和醉漢爭吵著。唯一不同的是，在他的故事裡，動物從來沒有被綁在地上。

最後，男人說服了女友拿起那款步槍，看守的人幫她把槍架在柵欄上。她射了三發子彈，每一次開槍之後，她就尖叫著捂住耳朵。她打得糟透了，那鵪鶉看起來睡得很熟。

入夜後，開發區燈火妖嬈，霓虹燈和日光燈從餐館、歌廳、芬蘭浴休閒中心向外閃耀，穿過了鴨綠江。對面的北韓邊境則是一片黑暗，看不到任何燈火，而且北韓人也不在晚上游泳。

\* \* \*

在丹東時，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鴨綠江畔。我認識了一兩個開快艇的人，每天他們都會載我到北韓江畔繞個幾圈。我們經過空空如也的失修觀光船，經過了看起來像是廢棄的工廠。在綿長的沙灘上，北韓人在游泳、小孩對我們微笑招手。全副武裝的士兵僵硬地站在他們後面，看起來像是拿著槍的救生員。

中國和北韓的官方關係良好，但是丹東人很快會跟你說，他們鄰國的政府領導得不好。我若問詳情，他們就會聳聳肩說：「沒有意思。」即使是那個愛談世貿組織的照相小販，當我問他有沒有想過去北韓看看，他也一副興致缺缺的樣子。「我能跟他們學什麼？」他問。丹東人似乎對這個鄰居的貧窮和與世隔絕毫無興趣。在共產黨統治早期的三十年裡，中國人自己所遭受的就已經夠多了。

對我而言，北韓是個悲劇。這個國家能夠對外關閉了半個世紀，真是神奇。船沿岸而行，我注意著各種細節：一艘空的遊船，一位武裝的士兵，一個游泳的小孩。從我的角度，每一瞥都沉重而帶著某種意義，就如同我跟丹東本地人的簡短談話似乎對他們也有著某種意義。只是中國人和我注視鴨綠江對岸的理由是不同的：我是向裡面看，他們是往外看。中國觀光客在北韓岸邊來去匆匆，只因為這裡是他們展開國際之旅最近的一個地方。

只要有錢他們就可以渡江。我的旅館就有經營旅遊業務，旅費從二百美元起價，不需要護照，只要持中國人的身分證就可以。對一個中國人而言，到北韓比到兩年前回歸祖國的香港還容易。中國政府在丹東的法律馬虎得不尋常，他們相當確定過江的中國人都會回來。

每天早上，各種等級的中國旅遊團在出發到北韓之前，都會在我的旅館前集合。有天我看著一位導遊做簡介，那讓我想起剛到中國時和平工作隊跟我說的一些話。導遊說，中國旅客在參觀北韓紀念館時要表現出尊重，不要拍攝正在工作的北韓人，北韓人是很驕傲的民族，中國人一定要記住這一點。還有，在參觀三十八度線的軍備解除區時，不要跟對面的美軍喊：「哈囉！」

「你們會發現北朝鮮不如中國進步，」導遊說，「你不能跟北朝鮮說他們需要改革開放，或者他們要學中國這類的話。記得，他們有很多導遊中文說得很好，你們講話要當心。」

\* \* \*

韓戰是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唯一發生過的正面衝突。戰爭從一九五〇年六月北韓入侵南韓時開始。美國和其他聯合國會員國很快地前往協助南韓，麥克阿瑟將軍的軍隊一路領先攻到中國邊境。那年十月，毛澤東開始派「志願軍」去幫他們北方的鄰居。戰爭持續了三年，美軍死亡人數為五萬四千名。外國歷史學家預估中國死傷高達九十萬人。但真正數字無從得知，因為中國人對戰爭的計算很難讓人信賴。丹東的一家博物館裡寫道，只有一萬一千名中國人喪生。

在鴨綠江閒逛時，我告訴船駕駛，我想見見韓戰老兵。那人有個朋友的父親曾經服過役，就安排了我們三個人一起見面吃飯。我們約在餐廳外碰面，那老人一看到我就張大眼睛，「我以為你說他是個住在美國的中國人！」他大聲地說，然後掉頭就走。船駕駛追過去，試圖安撫這個老人。講了很久之後，他們回來了。我跟那老兵解釋，我

只是對歷史有興趣，保證不會寫出他的名字。最後，他答應跟我們進到餐廳裡的一間包廂。

老人在中國海軍服過役，當時他的單位被派到台灣海峽，所以並沒有親眼看到太多戰役。後來一九六四年，台灣外海的一次戰役中，他的腳嚴重負傷。老人六十四歲，有四十年的中國共產黨黨齡。他走路拐跛。傷他的敵人是台灣人，但武器是美國製的。老兵要確定我了解這個重要的細節。

我們點了晚餐和本地的啤酒，不久老人就放鬆了下來。他問我綁膠帶的手指是怎麼一回事，然後他搖搖頭。「如今很多事情都很難說，」他說，「像是一些退休的人領不到退休金。還有一點不同的是，中國現在有資本主義的傾向。有些人太有錢，有些太窮，不像毛主席時代，大家都是一樣的。那時候就沒有犯罪。像你在旅館被搶這種事，在以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問他，江的對面是什麼樣子。

「金日成在世的時候，他就跟毛澤東一樣，」老人說，「大家都崇拜他，因為他是個偉人。但是金日成的兒子就沒他那麼行。他太年輕了。主要也是因為沒有經過戰爭的歷練，沒有經歷過困頓。金日成小時候曾經歷過戰爭，那是為什麼他能成為一個偉人的緣故。」

一個小時之後，訪問的內容方向全改了。老人直接丟出各種問題：美國人的薪資是多少？美國人對中國有什麼看法？他們對北約轟炸有什麼看法？

那老兵說，他的兒子大學畢業後拒絕了一份理想的公家工作。有家私人公司付他更高的薪水，不過那職位不是完全有保障。他都二十六歲了還沒結婚！他怎麼會這樣？是從大學裡那些外國老師那裡學的吗？美國人是不是相信錢多的工作比有長久保障的好？

我跟他解釋，在某些方面，他兒子的想法跟美國一些年輕人很像。老人不斷地回到這話題：公家工作最好，最有保障，以及中國需要再有一個毛主席。他喝得很多，開始口齒不清，然後發起了脾氣。他抱怨著他兒子，抱怨餐廳的服務。他說外國人來丹東不應該擔心被搶。船駕駛客氣地建議我們該走了，老人突然就生氣起來。

「我又不是每天都有機會跟外國人講話，」他粗暴地說，「我不累，我只是得去上個廁所。」他站起來但被椅子絆住了，船駕駛在他跌倒前把他扶住。一個女服務生進來，老人大喊：「拿帳單來！」

女服務生跟他解釋，我已經付過錢了。「我有的是錢！」老人喊說，「這頓我請！」船駕駛試著把他拉向門口。「我付得起！」老人又喊，手上揮著一疊鈔票。

最後，我們終於把他帶到了外面，夜晚的空氣讓他清醒了一點。我謝過他。他跟我握手，一拐一拐地走回家。他不要任何人陪。

船駕駛看著老人離去，嘆了口氣。他三十三歲。他說：「很多老人很難了解中國現今的狀況。」

\* \* \*

我在丹東的最後一天，江面上全是中國的婚禮船。有錢的新人雇了雙層渡輪，其他新人則租電動小艇。它們全沿著相同的行程——疾駛到斷橋，拍照，然後慢慢地繞著北韓的沿岸滑行。救生夾克裡面，新娘穿著鮮粉紅、粉橘、紫色的禮服，他們站在船頭像花朵裝飾的塑像。那是個炎熱的午後，北韓人又在游泳了。

一個叫倪仕朝的駕駛帶我出行，我們在婚禮船隊裡穿梭。倪仕朝解釋說，那是農曆的好日子——六月初六。不過就整體來說，今年結婚

的人還是比較少。

他解釋道：「人們認為九結尾的那年不吉利，我是不相信，但很多人信這個。在八九年，北京發生了動亂，而七九年是審判四人幫。六九年是文化大革命。五九年你們美國人炸這座橋。」

他停下想了一會兒，說：「不對，那是一九五〇年，反正，五九年有壞事發生。」

那年是毛澤東大躍進的顛峰，但是歷史課本把那場災難給美化了。跟很多中國人一樣，倪仕朝對當代運動的了解不是很多。他也記錯了四人幫審判的時間，事實上它發生在一九八〇年。

「那一九四九年呢？」我問。

「新中國就是那個時候建立的。」他說。我們划進斷橋的倒影，鴨綠江慢慢地流過我們的船下。他接著說：「那一年跟任何時候都不一樣，那年當然是好年。」

\* \* \*

從丹東的鴨綠江出發，我沿著邊界向東邊的日本海方向走去。這一地區人煙稀少，長途巴士消失在一片樺樹林中。我帶了個帳篷和睡袋，準備在長白山上露營。這是一個巨大的火山口，填滿了藍色的湖水。中國—北韓的界線把湖切成了兩半，就像一件損壞的首飾。晚上南風狂吹，我總是幻聽到帳篷外有腳步聲。

本地人告訴過我這裡的邊境沒有設警戒。清晨，我爬上一處長滿青草的山坡，天池湖水就環繞在下方。半個小時後，我看到了一塊小小的白色界碑矗立在遠處的一片綠地中央。我仔細地看著這片原野：

沒有建築，沒有人。最近的城市距離這裡十幾公里，在那塊崎嶇的地勢之外。在中國待了那麼長時間，這是我所見過最空曠的地方。

石頭界碑上一邊寫著中文、一邊寫著韓文。我習慣了線狀的邊界，像是河流、圍牆，但像這樣只有一塊石頭，四周空曠無物的邊界讓人感到奇怪。這邊界只是個概念，曠野更凸顯了這個標誌的毫無意義。

我放下背包，走了幾步進入北韓境內，把相機放在一塊石頭上，設定了拍攝時間。在照片裡，天空一片深藍，白雲浮在地平線上。我蹲在那裡，影子斜斜地映在石頭界碑上。我的左手上貼了塊髒髒的白膠布。那鏡頭裡的山脈分不清是中國的還是北韓的。



## 【古文物C】

# 城牆

那座地下城市無法和堆積在安陽這一帶的其他土層分開。你可以把古代商朝遺址想成是一整座躺在地底的城——有城牆，也有內部結構。甲骨可能被埋在這裡，三千年來一直在等著被挖出來講述自己的傳奇。但是地面上，則是一堆完全沒有關聯的東西拼湊在一起，如現代建築、單位，以及一片片土地。如果考古學家想挖掘，他們就得跟那片地的所有人做協調。

幸運的是，這片土地大部分是農地，種植著黃豆、玉米和麻，考古學者們跟農民協商比較容易。但是在近代，不同的權力單位也在安陽這一帶留下他們的痕跡。一九三〇年代後期日軍占領此地的時候，入侵者在這蓋了一座機場，水泥跑道至今仍穿過農田。共產黨掌權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機場旁蓋了一座軍營。改革開放開始之後，舊的跑道被改成私人飛機駕駛訓練場。諷刺的是，很多客戶都是日本人，因為他們在安陽受訓比在日本便宜。不過，日本飛行員覺得不貴的，中國考古學家不一定覺得便宜。考古學家盡量避免在機場做密集的調查工作，因為飛行學校同意他們挖掘的收費很高。

在安陽或在中國的其他任何地方，「現代」的人事總是控制了人們去接近古代。考古學家開始勘測地下城市的牆時，發現它筆直地伸向了人民解放軍的軍營圍牆內。兩座牆：一個在古代，一個在現代；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地上。在這個交會點上，現代的牆占得了優勢。考古學家們呈遞申請表、文件、地圖等資料的時候，勘測工作被迫停

頓，他們花了近一個月才獲得軍方的許可。當考古學家終於被允許進入後，他們繼續耐心地用洛陽鏟挖掘泥土，發現被掩埋的商代古牆，呈對角線狀的，像箭一樣筆直地穿越了軍營。考古學家們跟著來到了軍營的另一側，古牆依舊向前延伸，絲毫不變方向地離開了人民解放軍的管轄地。

\* \* \*

地下城市的牆呈長方形，包圍了一片五百多公頃的區域。荊志淳和其他考古學者仔細地勘測過它的結構後，發現它並不完整，那牆有很多段都只蓋了一部分。古時的聚落好像被遺棄了，有可能是居民遷移到了他處。

「最終，像這樣的訊息會提供我們線索，讓我們知道為什麼這座城會在這裡，又為什麼沒有蓋完，」荊志淳說，「我們繪出六幅牆的輪廓草圖，還沒有發現任何一個是完整的，他們只是完成了地基。很奇怪，這也是為什麼我相信它是一座尚未蓋好的城市。」

## 第四章 一夜之城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

深圳充滿了活力。它發展得是如此快速，以至於人們稱之為「一夜之城」，它不斷冒出的新建築，有時被形容如雨後春筍。在像北京這類城市裡的知識分子取笑深圳的都是些很平常的理由，諸如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格調，然而這座城市對於內地來的移民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對他們而言，這座城市有著鮮活的個性：集實力與不完美、殘酷與成功於一身。在這個國家到處都是蓬勃發展的城鎮裡，深圳是最著名的一個。

在造訪深圳之前，我已經聽過數十則它的傳奇。在涪陵時，我的學生很喜歡寫深圳，或是用虛構的場景，或是描寫移民到深圳的四川人的真實經驗。寫作課有個單元是對話練習，有一次，我讓學生用英文寫下最近跟某人的一段對話。一名叫艾蜜莉的學生，寫下了她的姐姐做出人生最重大決定的那一天：

「我決定去深圳。」我姐姐說。

「媽不會讓妳去的。」

「我會試著說服她。」她說。

「我支持妳，」我說，「但是妳都考慮清楚了嗎？」

「我知道，我可能永遠無法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可能會被解雇，或者更糟。但是，對我這樣一個生氣蓬勃的年輕人來說，那有什麼關係？」

一陣沉默後，我說：「那好，我同意妳說的。能夠在一個變化豐富的城市工作，一定很棒。」

「祝妳好運。」我補上一句。

「謝謝妳。晚安。」

「晚安。」

現在我姐姐已經到那個繁榮的城市五個月了。不知道她還記不記得我們的對話，不知道她還是不是一樣地充滿活力。

剛開始，在看起來還只是一片充滿求知欲的模糊臉孔中，艾蜜莉是我第一個注意到的學生。我到中國的第一個學期教的是她們這個班（到第二年才教威利他們）。剛教書時，我在出作業題目上有點問題，所以我常隨意地在黑板上寫個題目，給學生十分鐘讓他們發揮。有一天，我問：「你寧可有一個正常的起起伏伏的漫長一輩子，還是一個非常快樂、但再過二十年就會結束的人生？」

幾乎每個學生都選擇了前者。在中國鄉下，這個問題其實不會讓人難以抉擇，像幾個學生就說，他們家太窮了，需要人手幫忙，因此不管有多快樂，他們都無法在二十年後就死掉。結果，我可能是那個從出題過程中學到最多的人，從此，在把美國人對追求快樂的想法用在四川課堂上時，我變得更謹慎了。但是我注意到艾蜜莉選擇了短暫的人生。她十九歲，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學生。她寫道：

我好像很久沒有真正快樂過了。有時我將自己的消沉歸之於環境，尤其是我們學校壓抑的氣氛。但是我發現，當我在抱怨時，其他同學都滿快樂的，所以我想問題是出在我自己身上。

她那年所寫的每篇文章都顯露她的與眾不同。跟班上同學相反，她挑戰黨的尺度，她自有主張。她是學生中少數幾個父母是知識分子的，父親是學校裡的數學教授。她曾寫過他在文革時期被下放到一個偏遠的煤礦勞動改造的經驗。在一次商業英文課上，我要學生寫一封正式信給一個美國組織，艾蜜莉選了在田納西那許維爾的「鄉村音樂協會」。她說，她很好奇鄉村音樂是什麼樣子。另一次在週記上，她問我有沒有黑人朋友，因為除了在電視上，她從來沒見過黑人。我的文學課表演《仲夏夜之夢》時，她演皇后緹坦妮雅。雖然她不論演哪個角色臉上總是帶點笑容，好像正從遠處看著自己的表演，但她是個好演員。她臉龐寬大，雙頰很高、嘴唇豐滿，眼睛黑黝靈活。她的英文名字取自寫《咆哮山莊》的艾蜜莉·勃朗特。

艾蜜莉一畢業就離開了家。她跟男朋友安立（系上一個比較神祕的英文名字）一同往南走。安立是班上的運動健將，一個鄉下來的英俊男生，長得方臉、短髮，以及一雙剛強的黑眼睛。安立的脾氣不怎麼好，他的英文名字（Anry）跟「生氣」（Angry）只差一個字母似乎不只是巧合。幾年之後，艾蜜莉跟我說安立常嫌她。

她還記得：「他會要我跟其他男生講話時不要笑，臉上應該毫無表情。他總是批評我這點，說我笑太多了。他說，我跟男生說話眨眼睛的樣子很不得體。我常站在鏡子前看著自己，想找出要怎麼做表情才對。那時他說什麼我都信，後來我才知道，他說的全是錯的。」

他們離開家的原因是不同的。安立的家裡需要錢，一年前，他哥哥在炸魚時引信爆炸，被炸得幾乎全盲，手也廢了，但哥哥還有妻兒要養。炸魚在中國是違法的，然而在偏遠的農村裡，農民還是照做。

至於艾蜜莉，她的父親在學校有份穩定的工作，錢不是什麼大問題。事實上，她一直說不清離開涪陵的真正原因。「我心裡有個什麼

東西，」她曾經說，「我媽說我是不會滿足於快樂生活的。她說我是決心要吃苦。」不論如何，艾蜜莉是不可能滿足於在涪陵當地做個老師。「當老師對女孩子來說是份很好的工作，也很容易找到丈夫，因為男人都喜歡找老師當老婆。它可能會帶給我舒適的生活。但太舒適了，我覺得那跟死沒什麼兩樣。」

艾蜜莉和安立先去了雲南的省會昆明，各自找了公寓住下後，他們開始找工作。新經濟下的人力市場和招聘中心發展蓬勃，艾蜜莉和安立幾乎試過了昆明的每一個中心，卻都沒什麼下文。艾蜜莉是班上英文最好的一個，但在人力市場裡沒有人過問她的學歷。大部分開出的條件是，女性應徵者的身高至少要有一百六十公分，還要「五官端正」，也就是要長得漂亮。艾蜜莉知道，如果拿傳統的漂亮標準來看，她的眼睛有點小、嘴巴有點大。還有，她只有一百五十三公分。在昆明待了幾個月後，除了一份錢少得可憐的祕書工作外，她什麼也沒找到。艾蜜莉決定到另一個城市去試試。

深圳是個很自然的選擇。每個在四川長大的年輕人都聽過有關這個一夜城的各種故事，這些故事多帶有傳奇性，像是哪個移民變成了百萬富翁，哪個年輕祕書爬到了貿易公司的最高職位。艾蜜莉小的時候，常聽鄰居說起一個本地女孩搬到深圳後變得多成功，常給父母寄錢。艾蜜莉的母親盛讚那女孩，好像她是獨立的典範，而正是這些故事鼓勵了艾蜜莉的姐姐去了南方。

但是，安立決定去上海，那裡他有熟人。這對年輕人吵得很凶，最後決定分手——他往東，她往南。在深圳，艾蜜莉的姐姐剛辭掉了一份工作，姐妹倆在人力市場裡的各家工廠招募攤位上消磨了大半個月。入場券一天要十塊人民幣，大約一塊美金，而姐妹倆合起來只有約二百美元的積蓄。一星期後，她們開始一天只買一張票。她們把各

自的優勢結合起來：艾蜜莉的學識背景較好，但是她姐姐比較能言善道，因此通常是她拿著艾蜜莉的履歷表進去。最後，她幫艾蜜莉取得了一個到某家台灣貿易公司複試的機會。那老闆很欣賞艾蜜莉的英文能力，她被錄取了，那是一九九七年的十一月，起薪是八百七十元人民幣，折算一百美元又多一點。那年秋天，她給我寄了封信：

最開始那兩天，辦公室裡只有一個女孩招呼我，其他人則裝作沒注意到我的存在。

我覺得很寂寞。我想到了你，你剛到涪陵時一定也很寂寞。我鼓勵自己表現出想跟她們做朋友的熱情。我的努力成功了，我很快地成為她們的一分子。

我們辦公室只有八個人。除了老闆（一個老頭子），其他全是年輕女孩。她們來自三個不同的省分：露露、盧芸、徐莉和莉莉來自江西，易小瑛來自湖南，琳娜來自四川。露露是最漂亮、最嬌小能幹的女孩，大家都喜歡她。盧芸人最好，讓我想起艾蓮（涪陵的一個同學）。徐莉是古典美人，男生打來的私人電話大多數是找她的，但我不是很喜歡她，因為她講話有時很傷人。莉莉是早我兩天上班的另一名祕書，她給人的印象是既笨又不負責任，所以在辦公室裡不是很受歡迎。小瑛最胖也最關心減肥，她的電腦很行，但是英文很差，我們講好了，她教我電腦，而我教她英文。我可以跟琳娜講四川話，不過大家都聽得懂四川話，所以那並不會讓我們覺得特別有優越感。

對了，到現在我都還沒告訴你，我們公司是做什麼的。我們公司幾個月前才從台灣遷過來，出口時裝、化妝品和貝殼首飾。我的工作是用信件或傳真跟客戶聯絡，接訂單，然後把訂單交給

工廠，找最合適的公司運送產品給客戶。我現在對工作還不是很熟悉，所以露露幫了我很多忙。

\* \* \*

艾蜜莉的消息從南方傳來。她多用寫信的，有時晚上老闆回去以後，她會打電話來。很多時候她談到常換工作的姐姐。一開始，艾蜜莉的姐姐在一家做戶外家具的工廠當會計，後來換到旅行社做業務。之後，她在一家做老鼠會直銷的公司上班。她知道那家公司是騙人的——政府正查封著橫行中國南部的老鼠會。但是她姐姐還是去參加會員招募會，還帶著艾蜜莉一起。「很多業務員文化水準很低，但是他們知道怎麼做推銷，」她後來說，「那不是個賺錢的好方法，不過倒是個增強自信的好方法。」

我在涪陵最後一年的一個晚上，艾蜜莉打電話來說她調薪了，調到一千元人民幣，那等於一百二十多塊美金。我跟她道賀。但她聽起來有點吞吞吐吐，最後我問她到底怎麼了。

她猶豫地說：「公司在香港有個代理人，他常來深圳。他很老，不過他很喜歡我。」

「那是什麼意思？」

沉默。

我再問一次：「他為什麼喜歡妳？」

「因為我胖。」她在電話那頭緊張得笑了。我知道自從搬到深圳後，她胖了一點，那可能讓她變得更漂亮了。

「妳說因為妳胖，所以他喜歡妳，那是什麼意思？」我問。

沉默。



「他要妳當他的女朋友？」

「可能。」

「他結過婚？」

「他離婚了，他在台灣有小孩。他是台灣人，但大多數時候在香港工作。」

「他多久來深圳一次？」

「一個月兩次。」

「他對妳造成很大的麻煩嗎？」

「他老是找藉口想接近我。他說如果我要的話，他會幫我在香港找工作。你也知道，那裡的薪水高很多。他說如果去香港，我可以賺更多錢。」

我小心地措辭。「那聽起來不是個好主意，」我慢慢說，「如果妳想另外找份工作，妳不該找他幫忙。那在將來只會成為一個大問題。」

「我知道，我永遠不會那麼做的。」

「你應該試著避開他。」

「我有，只要他在，我就請我同事跟我在一起。」

「妳覺得他是個大麻煩嗎？」

「現在還不是。」

「如果他變成大麻煩，妳應該辭職。否則，情況可能會變得很糟。」

「我知道，」她說，「應該不至於。不過這份工作也不是那麼好。如果我需要離職，我會的。」

\* \* \*

深圳是中國唯一一個有現代城牆的都市。這座牆大約有三公尺高，是用鍊條做的，有些地方還冠上鐵絲網，全長一百零七公里。如果從北邊進入城市，你會先經過這座牆的一個檢查站，然後沿著一條現代公路穿過低矮的綠色山坡。愈接近城市中心，新的建築愈高。在深南路和紅嶺路的交叉口，豎立著一塊巨大的看板，它至少在精神上意味著這座城市的核心。看板上鄧小平的巨大畫像，反襯在深圳城市天際線的背景裡，上面寫著標語：「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當地人和觀光客常站在這裡拍照留念。一九九七年二月，當鄧小平去世時，數千名深圳人自發地來到看板前奉上鮮花、悼詞和其他紀念物品，唱著深圳的市歌〈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蹟般聚起座座金山.....

其他的中國城市慶祝它們的歷史，但深圳的起源卻有著謎一般的味道——帶有神奇色彩的誕生過程，還有那位庇佑它的神。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政府故意不開發這塊地方，因為它毗鄰香港。共產黨害怕資本主義的英國殖民地會帶來政治和經濟上的汙染，因此把深圳地區設計為「政治上的防禦前線」。除了政府擁有的少數工廠外，大部分的居民都仰賴漁業和耕種為生。

一九七八年之後，當改革開放開始時，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面臨到該從哪裡開始的問題。他們不想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市做重大的經濟變革試驗，因為一旦出錯就會釀成政治上的大災難。因此，鄧小

平決定找個遠一點、開發度不高，後來被稱為「經濟特區」的地方做實驗。透過給予免稅和投資特權，政府希望吸引外國公司到這些地區設廠。一九八〇年，中國正式設立了第一個特別行政區：深圳，以及原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對面的珠海。

一九八〇年代，政府把經濟特區擴張到了五個城市或區域，但深圳始終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官方把深圳定位為「改革試驗室」和「試驗田」，是一個「面對外部世界的窗口」。他們把這座城市看成一個實驗品，就像一個好的培養皿。相較之下，它具有不受過去汙染的優點。當中國的其他地區，正努力地要將低效率的國有工業私有化、裁員、重整工廠的時候，深圳的經濟乾淨得如一張白紙。政府對這個城市的開發計畫既簡單又直接：修建公共設施，邀請外國投資，吸引移民。短短二十年內，深圳的人口從三十萬增加到四百多萬，同一時期，深圳的GDP年成長率超過百分之三十。一九八〇年代的前五年，深圳以試過二百多次的經濟改革而獲得信譽，那些改革有很多後來被中國的其他城市採用。

深圳的每樣東西都讓人感覺很新。居民的平均年齡不到二十九歲，沒什麼老人。深圳大學沒有歷史系，學生可以主修高爾夫球管理來替代，因為這個地區有中國最好的高爾夫課程。深圳博物館不太熱中地展示了一點古代和鴉片戰爭的東西，以及一段以示盡責的標語：「當你迷戀這『一夜城』時，有沒有想過那些為祖國淌血流汗的、勤勞勇敢的先輩們？」

但深圳博物館對現代史的紀錄則顯得熱心多了。一項展覽注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本市主辦了新中國第一場土地使用權的公開拍賣會。不遠處，有張照片圖解著中國的第一個人力市場——這是另一項深圳發明的、很快傳到各地的活動。還有其他文物照片：一九九〇

年，中國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建立；一九八八年，國有住宅第一次轉到私人市場。還有一張照片驕傲地展示了中國第一家沃爾瑪（WalMart）在深圳歷史性的開幕典禮。

\* \* \*

撇開標語不談，這裡沒有一樣東西真的是在一夜間，或著沒有經過爭議就發生的。如果鄧小平是這座城市的神，那也是希臘式的神——一個不時被未知的力量所抗拒的守護神。鄧小平相信，經濟特區除了帶動中國改變中的經濟，還有一個政治用意：他尤其希望吸引香港和台灣的投資，然後慢慢地把這些地區帶進祖國。但保守分子擔心的是反作用，他們相信深圳這樣的城市會給予外國公司剝削廉價中國勞工的機會。很多像這樣的新經濟區，正好位於從前跟外國人簽訂條約的港灣上，它們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之後被迫開放。反對鄧小平政策的人有時會攻擊他的政策是帝國主義的傳聲筒。在一九八〇年中期，當一系列走私醜聞在這些地方爆發時，批評的聲音更加強烈了。

鄧小平採取的回應辦法是修建一座深圳圍牆，它完成於一九八四年，是中國傳統舊瓶裝新酒的解決之道。在深圳，城牆的功能之一是把一切保留在城裡。官方希望以此約束改革所帶來的潛在風險，這座牆似乎給予了保證，他們覺得一切操之在己——一個實體界定了實驗城市的邊界。要想正當地進入深圳，人們必須攜帶他的家鄉省分所發的通行證。

一九八九年夏天，保守派分子在北京鎮壓之後掌了權，有些人擔心深圳會失去它的特殊地位。但三年之後，庇佑它的神回來了。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展開著名的「南巡」，意圖告訴世人中國的經濟改革

不會停止。南巡的關鍵時刻發生在深圳，當八十八歲的老領導人在此發表講話時，他提到：「深圳的寶貴經驗就是敢闖禁區。」因此才有了第二段的「春天的故事」：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  
啊，中國，中國  
你展開了一幅百年的新畫卷  
捧出萬紫千紅的春天

在深圳，很少百姓了解到自己是一個巨大實驗的一部分。不過，他們可以感覺到那份不確定性，他們也常把這座城市的發展歸功於一個有勢力的人的恩惠，而非自由市場經濟下自然生產出來的東西。有一次造訪深圳時，一位生意人告訴我，鄧小平死後，設立他的招牌是一種向他致謝的方式。不過生意人也說，這裡面既有害怕，也有迷信的成分，就好像是傳統中國的祖先崇拜，往生者對生者每天的生活仍然有影響力。另一次，我跟一位來自湖南的計程車司機聊天，司機說：「這個地方從前是個不毛之地，是鄧小平叫他們建設起來的。在中國就是這樣，一個人說什麼事該做，它就做成了。這就是共產主義。」

不管領導人如何定義和規劃他們的實驗，深圳在某些方面是照著自己的方式發展的。這個地區變成被勞工密集的輕工業掌控，工廠老闆偏好女性作業員，因為可以付比較低的薪資，也比較好管理。雖然沒有可信的地方數據，但很明顯的，在深圳女性人數多過男性。當地

人常說女對男的比例是七比一。深圳也變成一個有名的妓女多，以及在香港和台灣有家室的工廠老闆「包二奶」的地方。

官方想用邊防來管控的企圖，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很多工廠因此搬到了圍牆的另一邊，在那他們可以租到比較便宜的土地，也少了嚴厲的法令規範。深圳因此被分成兩個世界，當地人管它叫「關內」和「關外」。過去幾百年以來，這個名稱是用來描述長城上與滿洲人分隔的山海關內外，但在深圳，這個舊詞有了新意——衛星城鎮遍布於關外，大多數工作環境低劣而又沒有什麼城市規劃。廉價蓋成的工廠和員工宿舍四處蔓生，薪資也很低。典型的工作時間是一星期六天而非五天。勞工意外和工廠火災也比關內頻繁。

也是在那裡的一個叫龍華的衛星城，艾蜜莉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她開始上班後不久，公司增加了一個生產部門，變成一間有廠房和宿舍的全方位工廠。工廠生產鉛錫合金的、銅製的、低檔的銀飾，還有粗糙繪漆、裝在保鮮袋裡的塑膠珠子，外銷到香港、南亞和美國。

\* \* \*

艾蜜莉和那香港生意人的故事很快就結束了。我們通話一兩個星期後，她又打電話來，我問她那個男人的事。

「他喜歡他看到的每個女人，」她大笑著說，「所以他不是大問題。」

艾蜜莉告訴我，她姐姐在一個叫作「孤獨的心」的熱線公司找到份新工作，跟寂寞的深圳人聊電話。她賺的沒艾蜜莉多，但工作很輕

鬆。她依照來電數量分紅，而打進來的電話多得不得了。我問艾蜜莉，怎麼會有那麼多人來電。

「在深圳每個人都有很多麻煩。」她說。

「怎麼會這樣呢？」

「有很多感情上的麻煩，有些人說深圳沒有真愛。人們太忙於賺錢求生存了。」

電話裡聽起來，她成熟了許多，已不是我當年認識的那個學生了。和艾蜜莉談話之後，我常常陷入沉思：年輕人該如何在深圳，或任何一個突然繁榮起來的城市裡找到他們的路呢？幾百萬無名無姓、面目模糊的人往南方移去，令人無法安心，像艾蜜莉這樣的年輕人似乎不免要迷失。

\* \* \*

那年春天，一個叫朱雲峰的男人來首飾工廠工作。他是受過訓練的造模工人，在之前的工廠，有一次錯估了鋼鐵片的重量，他和其他三名工人在抬起鐵片時失手，朱雲峰放手，但其他工人沒有，他們因此斷了手指。雇主答應賠償受傷的工人，也沒有責怪朱雲峰，但他還是決定離職。跟那些受傷的工人共事，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當朱雲峰三月剛開始到廠裡工作時，艾蜜莉並沒有特別注意到他。他話不多，長得也不是特別突出：身高中等，有著濃黑的頭髮，造模的工作讓他的肩膀變得寬厚。他不帥，但一段時間下來，艾蜜莉開始愈來愈注意他。她喜歡他工作的樣子，因為他的步態帶著自信。兩個月後，她的抽屜裡開始出現一些小禮物。她收到兩個洋娃娃和一個小羊雕像。她沒問是誰放在那裡的。六月時，艾蜜莉和朱雲峰跟同

事一起出去，最後卻發現只剩他們兩個單獨走在公園裡。她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跟同伴分開的。她突然覺得害怕，事情進展得太快了。她二十二歲。他二十六歲。

「我不要跟你走了。」她說。

「那妳要跟誰走？」他問。

「我誰都不要跟！」

他們回到工廠。幾個月後，朱雲峰告訴她，就是那個時候，他知道他有成功的機會。他可以看得出來，她還沒有做決定。

工廠有五十名員工。台灣老闆很公開地告訴工人們，他來中國的唯一原因是因為廉價的勞工。工人們不是很喜歡他們的老闆。他們有些人一小時只賺一塊錢人民幣，相當於十二塊美金，而這意味著如果他們想多賺點錢就得加班。提到他們的老闆，員工通常使用的兩個詞和很多深圳工人形容台灣老闆的沒什麼兩樣：又小氣又好色。不過，首飾珠寶廠的老闆不像其他的那麼壞，工廠的環境比起其他關外的工廠要好一些。他們星期天有放假，下班之後也可以離開工廠，只是，宵禁之前每個人都要回到宿舍。宵禁是晚上十一點或十二點，全憑老闆決定。

宿舍在六層樓工廠的最上面兩層。每個房間裡住著四到十名員工。那是一個「三合一」式的工廠——廠房、倉庫和宿舍全在同一棟建築裡。這樣的安排在中國是不合法的，員工都心知肚明，就像他們也知道那些儲放在地面樓層的原料是極易燃的一樣。更糟的是，有個電工來檢查時告訴艾蜜莉和其他祕書，工廠有些電線接錯了。從那之後，艾蜜莉給自己畫了條逃生路線。如果哪個晚上真的發生火災，她打算跑到最頂樓，從六樓陽台跳到隔壁工廠的屋頂上。那是她的計畫，因為跟別人抱怨那些違法的事是沒有意義的。在關外，這樣三合



一的建築多的是，員工除了接受之外什麼也不能做。他們都離家很遠。

十月一個星期六晚上，過馬路時，朱雲峰牽了艾蜜莉的手。她的心跳到胸口。朱雲峰握得很緊。

「我好緊張，」一過馬路，她說，「我不想這樣。」

「怎麼了？妳以前沒有被牽過手嗎？」

「我有，但是我還是害怕。」

「以後都會像這樣，妳會習慣的。」

很久之後，艾蜜莉跟我說這故事時還是忍不住笑。她做了一個中國女孩常做的動作，用手把嘴掩起來，好像她不該從回憶獲得那麼多快樂似的。

\* \* \*

每隔六個月，我就會搭火車南下深圳。在中國，辦理正式的新聞記者簽證需要許多文件，像是你要得到一家媒體的贊助支持，還必須申請一張辦事處的執照和一張記者證。這些我都沒有，所以每年我就得兩次跨海到香港處理這事，在那裡，旅行社什麼問題也不會問你，只要付五十美元，它就賣你六個月多次入境的商業簽證。那變成我固定的流程，每當夏秋之交，或冬天轉春天之際，就是我南下的時候。

一九九九年四月，我的第一次換簽證之旅。火車旅程令人愉悅，我喜歡看乾旱的北部平原如何逐漸變成豐饒的南部。在香港，新的證件一天不到就辦好了，我跨過邊界回到了深圳，搭上公車去衛星城鎮龍華，那裡是艾蜜莉的工廠所在。她跟我約在麥當勞見面，是城裡唯

一的一家西式餐廳。我到時，她已經等在外面了，站在麥當勞叔叔塑像旁。她跟工廠請了一天假。

距離上次見到艾蜜莉已經兩年，她看起來沒什麼改變。她穿了一件簡單的藍色絲質洋裝，頭髮往後綁。她對我笑，跟我握手，她知道美國人見面都握手。我們大多用中文交談，她說用她的母語比較自在。艾蜜莉學生時代的羞澀不見了，現在她扮演導遊的角色，領著我快速穿過城中心，來到另一個公車站，我們從那裡搭公車到經濟特區的圍牆處。穿制服的警衛在牆邊檢查我們的身分證件——我的護照，她的邊界通行證。然後，高速公路帶著我們進入城市中心。

一年前，當我還在和平工作隊時，亞當來深圳找過艾蜜莉，他告訴我說，他的南部之旅最精采的部分是去看坐落在附近靠海邊的「鴉片戰爭博物館」。要到博物館，你必須要雇台小型機車，要雇小型機車，你必須跟一群車夫討價還價。那群車夫很厲害，對他們來說，看見一個外國人就像看見一塊肥肉從空中掉了下來。跟那些車夫周旋，花了他半個小時，這也幫亞當做好了參觀博物館的心理準備，包括參觀一系列所謂「活歷史」的展覽：那裡展示著一艘外國軍艦，軍艦上操作的是一些蠟像做的洋鬼子，正準備以軍事武力從中國手裡奪取香港。亞當不知怎地，不小心變成跟活歷史糾纏在一起，一群中國遊客驚嚇地發現，有個活生生的洋鬼子從軍艦中跳了出來。艾蜜莉一向欣賞她的外國老師的幽默感，一般而言，她還滿喜歡我們開她的玩笑。但是，亞當的惡作劇真的考驗了這可憐女孩的忍受度。

坐在往深圳的公車裡，艾蜜莉問我最想去哪裡參觀。

「我要去鴉片戰爭博物館。」我說。

「我不要回去那裡。」她說。

「亞當很喜歡那裡，他說我應該去看看。我們可以搭小型機車。」

但艾蜜莉比我記得的頑固得多。她很快把我們的選擇縮到只剩下三個本地的主題公園：強調「開放式」的「深圳野生動物世界」；可以看到穿著傳統服飾的中國每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民俗文化村」；展示著全國名勝迷你模型的「錦繡中華」。最後，我讓艾蜜莉做決定。我有個強烈的預感，不管是參觀哪一個，我們將會看到中國小資娛樂最糟的一面。

她選了野生動物世界。「開放式」算是名副其實，如果它指的是你可以親自餵動物。遊客餵動物各種東西，像是紅蘿蔔、核果、芹菜，而當零食全餵光後，他們會把包裝的紙袋也丟進去餵。動物園各處的販賣人員兜售著一元一袋的食物。他們一定可以從所得中分紅，因為他們跟那群鴉片戰爭輕型機車的車夫一樣緊纏著遊客不放。只要一元！他們叫賣著。餵鹿。一元！餵鹿。一元！而那些鹿，就像動物園裡的所有其他動物一樣，目光呆滯，搖搖晃晃地走來走去。

在猴山，兜售人員變成用恐嚇的。如果你不餵猴子，其中一人說，牠們會攻擊你。如果沒有一元袋子的紅蘿蔔，猴山會是一個危險的地方。餵猴子。一元！猴子不餵不行。

艾蜜莉正要買一些紅蘿蔔時，被我制止了。「難道妳不想看看，如果我們不餵，牠們會怎樣嗎？」她抬起頭咧嘴而笑。果然不出所料，一隻猴子試圖奪走艾蜜莉的皮包，我得抓緊我的棒球帽。離開時，販賣人員給我們一個洋洋得意的臉色。

我們抵達鱷魚池時，只剩下一隻鴨子。牠被塞在一個小籠子裡，眼睛注視前方，好像刻意不跟人對看，就跟我過機場海關時的表情一

模一樣。倒數第二隻鴨子剛被丟進池裡，鱷魚還在大撕大嚼著。一隻鴨子要二十五元人民幣。我掏出錢包。

「我不要丟鴨子餵鱷魚。」艾蜜莉說。

「妳不用丟，」我說，「工作人員會丟。而且他不會把鴨子丟給鱷魚，他只會把牠丟進水裡。」

「我不喜歡那些動物，我不要餵牠們。你也沒有餵其他任何動物呀！」

「鱷魚很友善的，妳看，那隻在微笑。」

池子裡，一隻鱷魚咬了幾塊倒數第二隻鴨子的肉，退出池時嘴邊還掛著些鴨毛。

「牠們的嘴本來就長那樣。」艾蜜莉說。

我很有耐心地試著跟她講理。我跟她解釋，把鴨子關在籠子裡是很殘忍的事，尤其是為野生動物開的動物園。野生動物就是這樣，牠們遇到危險的情況，有些得以生存，有些不行。如果那鴨子沒得活，那也不是我們真的親自動手殺了牠。我們碰都沒碰牠，我們只是給那人二十五元。美金三塊——用來換取鴨子的自由，是很小的代價。

艾蜜莉則說，那些鴨子的翅膀都被砍掉了。好吧，我說，但是牠還是可以游到岸邊走開。鴨子真要走可以走很快的。況且，誰知道，也許工作人員沒砍好，鴨子會讓我們驚訝地飛到附近一家鞋廠重獲自由。不試的話，我們是不會知道結果的。

過了一會兒，我的邏輯變得莫名其妙：我告訴她鱷魚很稀少，快有絕種危機，如果不餵牠們，牠們會死。艾蜜莉反駁說，這些鱷魚短時間內不會餓死。我雖然不想承認，但她說的一點也沒錯。這些鱷魚看起來快撐死了。即使是那倒數第二隻鴨子，鱷魚把牠撕成肉片後也沒吃。幾塊還浮到池邊。

最後，我降低到世上最微弱的道德論調：如果我們不把鴨子丟給鱷魚，別人也會丟。我們沒有比較好，也沒有比較壞——我們都只是一般的老百姓。我們只是人，從滿池鱷魚跟一隻折翅的鴨子的公平戰爭上得點樂趣，再人性也不過了。況且，是什麼讓這隻特定的鴨子這麼幸運？是什麼讓牠享有不同於同伴的特別優待？我不停地說著——但艾蜜莉跟她不去鴉片戰爭博物館一樣的堅持，最後我們離開，讓那隻鴨子留在籠裡。

我們的動物園之旅以觀賞每天都在舞台上固定舉行的「百獸盛會」遊行畫下句點。延續「開放式」的特色，這個隊伍裡有動物也有人。一位穿天鵝裝的年輕女孩領著一群受過訓的天鵝，牠們一邊搖擺著走進舞台的泥土道上，還一邊排便。跟在後面的是一群打扮成鸚鵡、肩上站著真鸚鵡的女孩。她們的後頭是騎著大象和駝鳥的男人。一隻駝鳥把牠的騎士摔落在地，那人很快跑掉，但生氣的鳥緊緊追著他不放，逗得觀眾都笑了。

整場娛樂的結尾是熊的遊行。穿戲服的熊、騎單車的熊、酒醉般搖搖擺擺以後腿行走的熊。然後是一場熊的婚禮。最先出現的是熊客人，推著一輛裝滿木製的、代表新經濟的結婚禮物：一台電冰箱、一台電視機、一大瓶長城牌紅酒。快樂的新人走在最後。一隻熊穿西裝，另一隻穿禮服，他們和一位馴獸師站在遊行花車上。簡短的婚禮中，兩隻熊舉起後腿發誓，接著，馴獸師把他們送入花車的洞房。馴獸師手上拿著一條像是在逼婚的皮鞭。洞房的紅色大門上張貼著金色的「囍」字。幾乎所有的觀眾都是年輕富裕的中國人。有人告訴我，晚上他們用這同一個舞台賽狗。

離開那座城市之前，我們在鄧小平看板前停了一下。動物園讓我麻木，看著鄧小平的看板則是一種洗滌——赦免我們這趟關內之旅。那

是個灰濛濛的下午，我幫艾蜜莉拍照。按照中國人的慣例，她沒有笑，在偉大領導人的背景前擺出一副嚴肅的神情。

\* \* \*

回去的路感覺似乎很長。我們乘坐的公車繞過市中心的摩天大樓：一幢藍黑玻璃反著光的股市交易所、雙子星的地王大廈。再往北開，我們經過了數公里長的新公寓，住戶愈來愈稀疏。公路穿過一片空曠的綠山坡後抵達邊界，那是條長而低矮的鎖鏈圍牆。一張大看板矗立在關卡檢驗站附近，上面寫著：「觀瀾湖高爾夫球俱樂部，中國第一家七十二洞的高爾夫球俱樂部」。

關外，一簇簇沒有蓋完的粗糙的水泥建築立在那裡，一堆堆泥土堆積在巨大的地基旁邊。我們經過一所看起來管制寬鬆的監獄，牌子上寫著「第二勞教所」。公車繼續向北開，工廠城鎮一個接著一個地出現了：被圍起來的宿舍，冒著黑煙的煙囪。這種郊外的景色，是中國急速發展的城鎮特有的未老先衰景象。全新的人行道上已經長滿野草，未完工的公寓蓋得如此馬虎，以至於它的牆壁很快地就又破又髒。幾乎沒有一件東西是成品，每件東西的品質都是那麼低劣，導致它們很快就看起來陳舊不堪。

路旁，廣告看板上宣傳著工廠製造出來的產品，如發電機、空氣壓縮機、熱泵等，大多數廣告把目標瞄準了成批進貨的批發商，它們不是你日常會買的用品，也不是容易做宣傳的東西。一如這裡所有的東西，廣告設計得也很倉促，常常只是某個產品的看起來很奇怪的局部照片——一件小機械，一個小器具，疊加在明亮的綠野上。看板的扣鏈齒輪下寫著公司的名號，通常都是些很奇怪的英文：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Various Hydraulic Machinery（專業生產各類液壓機械）、Friendly Metal Working Lubricants（友善鋼鐵潤滑油）、Good Luck Paper Products（好運紙品）。

那晚，我們在離艾蜜莉工廠不遠的一間戶外餐廳晚餐。在中國的街市，傍晚通常是一天中最舒適的時段，尤其是在關外，黃昏讓這地方終於看起來有了人性。這個千篇一律的工廠城鎮白天看起來殘酷無情，上班時間，街道好似被人遺棄。但到了晚上，當大部分的工作停止時，工廠圍牆外突然出現了一群群年輕工人。他們快活地成群結伴，好像鐘響下課的小學生。坐在餐廳裡，我看著他們走過人行道，說話、笑著、男女彼此打趣。除了工作外，他們在這個地方無須擔負什麼責任——沒有家人，沒有傳統。就這個角度而言，他們是自由的。

晚餐時，艾蜜莉以工廠老闆們的故事來款待我。她的老闆有個同事是華裔美國人，最近從舊金山來出差。他到艾蜜莉的辦公室給太太傳真情書，一傳完馬上出去找妓女。艾蜜莉自己的老闆老是色眯眯地看著女員工，他大部分的朋友也都一樣。她們附近一家工廠的台灣老闆，被兩個四川情婦搞得無心經營，結果公司宣布破產。艾蜜莉一邊說一邊笑，我可以想像得出，這些故事在十個年輕女孩一間的宿舍裡流傳得有多快。到深圳之前，艾蜜莉從來無法想像人們會這個樣子。她說她最驚訝的一件事，是聽到她的涪陵鄰居，那個總是被描繪成深圳成功代表的女人的近況。艾蜜莉的姐姐聽人說，事實上那女人是香港來的工廠老闆的「二奶」。

艾蜜莉對那些來深圳的生意人沒什麼敬意，尤其是那些台灣人。她的男朋友朱雲峰最近離開了首飾工廠，找到一份新工作，他的台灣老闆對員工還算公平。但是在艾蜜莉看來，那種老闆算是例外，他們

中大多數人都是既剝削又好色。「他們都是其他地方失敗了。」她嘲笑著說，並解釋說她的老闆在台灣的公司幾年前破了產。

我問她政治氣氛如何，她說深圳的政治限制比她的故鄉少。但她指出，保障勞工的法規一樣少。「在這裡，不是政府，而是老闆控制一切，」她說，「不過到頭來，可能都是一樣的。」

當講到附近城市一間台灣人開的皮包工廠時，艾蜜莉變得特別有興致。一如大多數關外的工廠，這家皮包工廠的員工一週工作六天，但是除了星期天，老闆把所有的門都鎖起來，員工不准離開廠房。

「那怎麼會合法？」我說。

「很多工廠都是那樣做，它們跟政府的關係都很好。」她說。

艾蜜莉有個朋友在那間工廠工作，台灣老闆常常要員工在生產線上加班到半夜，他們累了，老闆就大喊大罵。有一名員工抱怨，結果被解雇。當他要求付最後一筆薪資時，老闆卻找人把他痛打一頓。那件事讓艾蜜莉很生氣，她決定做點什麼。我問她有沒有找警察、政府部門，或是找某個記者來報。

「沒有，我寫信給老闆說：『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她說：「還畫了一個骷髏像。」

我不懂骷髏這個詞，像中國人要澄清什麼時常會做的那樣，她在手掌上寫下「骷髏」兩個字。但我還是不懂。最後她把盤子推開，在桌上畫下一個輪廓圖。

「一個骷髏？」我問。

「是的，」她說，「一個骷髏。但是我沒寫我的名字，我署名『一個不快樂的員工』。」

她咯咯地笑，把手放在嘴上。女服務生清過桌子。我不知該如何反應——在涪陵時，我的寫作課沒有教過學生寫死亡恐嚇信。最後，我



只好問她：「信有效嗎？」

「我想多少有幫助，」她說，「工廠的人說老闆很擔心。之後，他有對員工好一點。」

「為什麼妳不跟警察說呢？」

「沒有用的，他們之間都有關係。在深圳，你凡事得自己照顧自己。」

吃完飯後，艾蜜莉問我：「要不要去看一件有趣的事？」

我們走到城鎮中心的一條小街，路下面有一條小溪在陰影裡慢慢地流。街上沒有燈，幾十個男人站在路邊，他們的香菸上冒出的黃光像螢火蟲飛在黑暗裡。我問艾蜜莉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在找妓女。」她悄悄地說。一會兒，一個女人走過——慢慢地，四處張望，直到一個男人走近跟她說話。他們講了幾秒鐘，男人退回陰影裡。那女人繼續走。「你要不要看看，如果我把你一個人留在這裡，會發生什麼事？」

「不，」我說，「我們可以走了。」

\* \* \*

那晚，我跟朱雲峰擠他的單房公寓。他的新工作允許他在外面租屋，那也是他離開首飾工廠的另外一個原因。朱雲峰賺的比艾蜜莉多，但他很省，因此房間很簡單。附近的房子貼滿了私人性病防治診所的粗糙廣告單，我們循著一排廣告單爬上四樓，來到他的公寓。未粉刷的牆、脫落的灰泥，沒裝好的水管，還沒有熱水器。像關外的很多事一樣，這棟建築還沒蓋好就被棄置了。太多的房子要蓋，地基一

放進去，建築工人就離開，換到下個工程去了。我想到了，這個地方唯一被完成的東西就是那些很快就被出口的工廠產品。

朱雲峰的公寓只有兩張鋪著藤席的簡單木床。牆上什麼也沒掛。除了一個熱水壺和幾本書，他沒什麼財產，他目前為一家專門做外銷的家用電器工廠生產模具。

艾蜜莉回去後，朱雲峰談到他的新工作。他說他真希望自己有學英文，像他的女友。我看得出他對艾蜜莉的愛慕，我也可以看出他讓她覺得有安全感的地方。他曾坦言他不帥，這是真的——他的滿臉都是粉刺的結疤。不過他的平凡吸引著她。艾蜜莉有個理論，好看的男人靠不住。

\* \* \*

我第二次辦簽證，安排在十月，那是那一年一個重要的月分：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週年慶。傳統上，重要的週年慶會在北京舉行國家領導人的閱兵大典，例如第十五週年是毛澤東，三十五週年是鄧小平。四十週年沒有慶祝儀式，因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讓北京人看夠了軍隊。經過和平的十年後，現在輪到了江澤民主席閱兵。

首都一整個夏天都在做準備。天安門廣場被圍起來整修，長安街上的有些大樓裝潢了門面。八月十六日晚上十點半，當我跟上司伊恩<sup>4</sup>晚飯後搭計程車回辦事處時，長安街上突然充滿了〈聖母馬利亞〉的甜美歌曲。車流慢下來：司機搖下了車窗，騎腳踏車的人停下了車。每個人的表情都很困惑。直到他們播放了第二首曲子〈聖誕歌

曲：爐火中烤著栗子〉時，我們終於了解，他們是在測試為遊行而安裝的新擴音設備。

第二天下午，一長列的坦克車、運兵車、自走式飛彈發射器突然出現在長安街上，往西朝天安門廣場行去。在那之前完全沒有任何警兆。那天，北京的早報上有一些小布告，通知讀者，下午四點半到隔天凌晨兩點，市中心的某些地區會有交通管制，但沒提到會有軍事裝備出現。我在辦事處剪報，一聽到街上傳來轟隆隆的聲音就跑出去看。士兵排在人行道上把好奇的路人擋住，父母把小孩扛在肩上，讓他們可以看得更清楚。

第二天晚上，我跟波拉特在雅寶路吃飯，他咧嘴笑說：「好久沒在北京見到坦克車了。」我問他週年慶會怎麼過，他說那週他會盡量待在室內。他聽到謠言說，因為擔心一些分離主義者會引爆炸彈，破壞節慶，警察將會特別看緊維吾爾人。

在北京，政府下令工廠暫時停工以減少汙染。週年慶前夕，他們派出了人造雨飛機。九月的最後一天，雨下得很大。十月一日早晨，天空一片晴朗，遊行進行得很完美。江澤民穿上了扣到頂的中山裝，一邊閱兵一邊重複地喊著：「同志們辛苦了！」一切都是老套：國王的舊衣，過去領導人喊過的老口號。他們播的是國歌而非〈聖母馬利亞〉。看了一個鐘頭的電視轉播後，我覺得無趣，出門去雅寶路吃飯。波拉特如他所說的「不見蹤影」。除了我之外，維吾爾餐廳一個客人也沒有。

政府宣布大家放假一個星期以慶祝國慶。在浙江省，威利和南西還沒存夠錢旅行，他們在樂清度過了安靜的一週。國慶那天，他們去了威利的四個學生家做家庭訪問，那是一個外來的新老師培養地方關係的好辦法。有個學生家裡開了間製鞋工廠，他的父親送威利一雙休

閒皮鞋。後來，他半開玩笑地寫道：「夠有趣的，那是我第一次接受賄賂，接受了學生的禮物。」

遠一點的南邊，在深圳特區外，艾蜜莉的工廠只放一天假。關內，大部分公司放了一個星期的假，但圍牆外的生產線一向要求得比較緊。艾蜜莉工廠的員工也相信，他們的老闆對中國的國慶假日更摳，是因為他是個恨共產黨的台灣人。

那個星期快結束時，在我自己的日曆上，季節移轉到下一個節點。我搭上南下深圳的火車，越過香港邊界，買了一張新的簽證。

\* \* \*

我們的第二次圍牆內之旅，艾蜜莉選了地王大廈。我們沿著相同的路線：在麥當勞碰面，搭公車到圍牆，接受邊界檢查。過了綠色小山坡後，深圳市中心出現了，閃亮的玻璃和鋼鐵大樓之中，坐落著最高的地王大廈。

我們買票上頂樓。玻璃電梯快速把我們載到上面。我們從六十九樓俯視寬闊的深圳經濟特區。在中國其他大城市，爬得愈高，看到的壅塞景觀愈讓你印象深刻，一直到你抵達頂點，看到了一片水泥之海：這麼多的建築，這麼多年的雜亂建設。但是深圳從空中看起來似乎不一樣，路又寬又直，一塊塊綠地點綴著市中心。向西看去，鄉下蓄滿水的魚池像一面面巨大的鏡子映照著天空。這是一座有計畫的城市，而不是一個任不同的時代痕跡雜亂堆積的地方。

摩天大樓裡，正展出一個慶祝深圳和香港歷史的展覽。深圳的部分很簡短，主題就叫作「一夜之城」。展覽的香港部分，包括了真人大小的鄧小平和柴契爾夫人的塑像，後者是當時談判香港回歸條件的

英國首相。展覽的結尾是一九九七年英國歸還了香港。其中有一張英國駐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的照片，他因任內最後幾年試圖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革而被共產黨政府刻意漠視。地王大廈的展覽對那些改革隻字不提，連彭定康的名字也省去了。他的照片下面附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標題：「殖民時期的終結」。

- 
- 4 編按：伊恩·強森（Ian Johnson），漢名「張彥」，一九九四至二〇〇一年派駐中國，是何偉當時在《華爾街日報》的主管。

## 第二部

## 第五章 澱粉

二〇〇〇年三月

從事自由撰稿的頭一年，經過了沒什麼收入的幾個月後，我的文章開始刊登在《虎報》、《南華早報》、《亞洲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芝加哥先鋒報》、《紐瓦克明星紀事報》、《西雅圖郵訊報》、《青年學者雜誌》，以及一個叫「當代中國」的網站上。當「世界經濟論壇」的學者們從日內瓦飛來中國開年度會議時，我幫他們撰寫印在手冊上的研討總結。每家機構都有它自己的規定條例、薪資和付費標準。世界經濟論壇要求我穿西裝打領帶，但是他們付給我一天三百美元。報紙的一篇報導通常付記者三百至四百美元，如果附上的照片被採用，稿費更高，但所有的花費得自付。他們寄給我的任何稿約我都簽。

在所有的媒體中，《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最有聲望，但它們的稿費都沒有《青年學者雜誌》給得大方：九百美元一篇文章。

《青年學者雜誌》曾要求我寫一篇有關北京學童的故事，故事裡要用一些基本的中國歷史為背景。文章是給美國的國中生讀的，編輯要求我每個句子的長度不超過十八個字。寫完後，我在讀草稿時，突然發現我用的是簡明英語：

中國歷史是最強也是最弱的。過去，中國遠比西方先進。中國人最先發明了紙、印刷術、火砲、瓷器、鑄鐵、絲和指南針。

但過去的兩世紀，中國歷史常是悲劇的，尤其是中國的對外關係。結果是，今日的中國仍是個有許多問題的發展中國家。

自由撰稿的要訣是，你要把自己跟你掛名的文章分開，直到你能從遠距離來看它們。那種感覺就像一個人突然暈倒，而他正看著自己的身體倒在地上。在某種程度上，寫作都是那樣的，但對一個住在像中國這樣一個地方的自由撰稿人而言，那種感覺尤其深刻。幫一份那麼遙遠的雜誌寫東西，感覺很奇怪，編輯只是電話中的聲音。這份工作實際上也是不合法的，因為中國禁止任何沒有正式委派資格的記者從事報導。然而，北京和上海仍有一小群年輕作家，買上六個月的商業簽證，希望哪天被駐華媒體的辦事處挑中，搖身變成全職特派員。惹出麻煩的機率不高，但有時會發生意外。我到北京不久之前，美國廣播公司報導了一則有關中國的敏感新聞，結果警察不斷地騷擾該辦事處不具資格的外國助理，直到他們最終被迫辭職。

無論如何，我盡可能找更多的機會投稿。我的風險是經過衡量的：儘管這些文章可能會被官方注意到，但它們也可能會被其他媒體的編輯注意到。我每週都寄出詢問信，並學到把像北韓邊界那樣的旅行經驗分成幾個故事來寫（那個旅程後來變成五篇不同的文章被登出）。同時，我也隨時注意其他固定的工作機會。《華爾街日報》的麥特給了我一份他的舊差事，一週幫《虎報》寫一篇文章。每個星期二，我寄出一篇六百字的稿子給他們，收到一百五十元稿費和登出來的文章剪報。我跟那份報紙的所有往來就只是那樣——兩年中，我只管供稿，從沒跟該報的編輯見過面或收過讀者來函。到香港辦新簽證時，我也沒有去過《虎報》。毫無證據顯示，有人曾經讀過我的文章。



從某方面來說，這樣讓事情比較簡單。我做隨興的長途旅行，等待事件自己出現。有時我在北京四處閒逛，尋找一個人或一個胡同加以描繪。對一個作家來說，這個首都正達到自身發展的一個完美階段——自由市場經濟在蓬勃發展著，但尚未完全規格化或變得大規模。個體經濟零散地出現在城市各處，每一樁都是值得一寫的故事：雅寶路有個小巷子專門賣貂皮大衣給俄羅斯人；新街口有很多不錯的盜版CD和DVD小店；前門的地鐵站以賣假發票而出名，他們把假收據賣給那些從外地來的共產黨黨營事業的貪汙幹部，賣家在地鐵的出入口喃喃叫賣著：「發票！發票！」而這些貪汙幹部看起來鬼鬼祟祟，眼神閃爍，兩手緊插在口袋裡——一看就是想用假發票報帳的舉止反常的人。

雨亭橋市場到處是非正牌的電器：二手貨、展示過的樣品、試用品、走私貨、工廠流出的商品、假貨。每件商品都有一個讓顧客安心的故事——口頭上的保證。有一天早上，我在市場閒逛，和一個人聊天，他在賣台灣製造的松下音響，價錢很便宜。他解釋說，那是因為他省掉了很多稅，因為他的朋友在廈門海關工作。另一個小販告訴我，他的揚子牌洗衣機是直接從安徽的工廠進貨的，它們只是因為一點點瑕疵刮痕而被客人退貨。不遠處，還有個男人在賣CR2鋰離子電池，那曾是高級百貨公司用過的樣品，他發誓電池的電至少還有半分滿，卻只賣市價六分之一價格，買到算是賺到。

我對兜售故事的人特別有親切感。一次，我到山西省會太原旅遊，走過一個市集。那裡賣的都是一些典型的東西：手錶、打火機、菩薩咒符、手工做的鞋墊。每個小販都簡單地在地上鋪塊布，再擺起貨品。

一群人圍著一個賣小冊子的男人。他二十初頭，從他的模樣看得出是個外地人——黑皮膚、髒衣領、便宜的藍西裝。但他很會說話，把

群眾吸引住了。關鍵在於他說話的速度，不是很快，也不顯得急切。他的演說不疾不徐，好像有的是時間，但也不像事先演練過的刻板，讓人覺得他賣冊子不是為了錢，而是那些冊子真的值得一買。

那些東西一看就知道不合法。他把白色布條鋪在地上，上面手寫了一系列問題：

誰比較好，毛澤東還是鄧小平？

一則從沒被報導過的重要新聞

世界變得這麼快，二十年後中國還會實行社會主義嗎？

「你會得到所有的答案，而且還不止如此，」那人說，「只要一元。」他抬頭，發現人群中有個不尋常的面孔，但是他沒有停下來：

「不管你是外國人還是本地人，價錢都一樣——只要一元。我不騙你，什麼主題都有，你要的所有答案都在裡面。」

小冊子印得很粗糙。二十四頁文章釘在一張藍色封面下：

科學新聞和疑難雜症祕方

作者：張紅（經濟學家）

出版：神州科學新聞出版社

不消說，那家出版社從沒聽過這本小冊子，那位經濟學家可能也不存在。如果是在像北京那樣政治氣氛濃厚的城市，這名小販可能會被趕走或抓到警察局，貨物會被沒收。但是在首都以外的這些地方，你會不時地看到這種人，他們靠賣國家控制媒體漏掉的消息賺錢，他

們交易的是各式各樣的謠傳、謎團、小道消息、陰謀論——那些在人們腦裡轉的小聲音。一元並不貴。你永遠不會在報紙上看到這些東西。

小冊子裡有二十一篇文章按照某種神祕邏輯編排的文章。「毛澤東為什麼展開文化大革命？」後面緊跟的是「怎麼知道會生男還是生女？」在「十個中國馬上得解決的問題」之前的是「這十種人會短壽」。有一篇故事寫的是一位因為一九八九年示威而坐牢的勞工領袖；另一篇寫的是前中共副主席劉少奇的老婆們。有些是謠言：「五百個懷孕的女空服員。」有些則是建言：「如何治療禿頭和白髮？」有些是詐騙術：「打麻將時如何耍老千？」還有家庭保健：「如何避孕？」（用蘇打粉和棉花）；「如何墮胎？」（用發酵的麵粉和栗子酒）。

文章都很短，句子簡單清楚，每個問題到最後都有答案。毛澤東開始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三：他感受到劉少奇的威脅，他要繼續階級鬥爭，還有他希望全面發展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如果孕婦右邊的乳頭比左邊黑，她會生男孩。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好。如果你規律地運動，就不會禿頭。中國二十年後仍然會實行社會主義。左邊的乳頭比較黑，會生女孩。

\* \* \*

二〇〇〇年三月我接了個案子，寫一篇關於澱粉的故事。一家叫作多爾奧利弗的荷蘭公司出版了一份內部刊物，他們想要一些有關他們在中國東北（舊稱滿洲）的宣傳資料。多爾奧利弗給當地兩間最早的玉米磨粉廠（黃龍和大成）提供了離心分離機，我的工作就是「publicize」這些成功的合作。「publicity」的中文意思是「宣傳」，

在中文字典裡的定義和「propaganda」一樣。一九九七年，政府把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的英文從「Propaganda Department」改成了「Publicity Department」，淡化了政治色彩，但中文名稱仍保持不變。

多爾奧利弗公司付我九百美元寫這篇文章。他們付我的自由攝影師朋友馬克一千美元；他的稿費比較高，因為他保證會拍到適合當雜誌封面的照片。離開前夕，我收到這家公司寄來的雜誌，其中一篇文章提供了我採訪的資料。文章是用簡明英語寫成的，開頭是「像澱粉這樣有多種用途的原料很少」，文章接著說，從唇膏、紙張到湯粉末都用得到澱粉。全世界每年生產五千五百萬到六千萬噸的澱粉，很多是用來代替糖。這個用途起源於拿破崙戰爭時，當時英軍封鎖法國對糖的進口，法國人被迫使用澱粉來製糖。雖然法國戰敗了，但對澱粉的使用並沒有停止。還有一句寫著：「像漢堡王這類的速食餐廳，用澱粉來讓薯條更酥脆。」

我對進一步認識澱粉很感興趣。第二天一早，馬克和我飛往了滿洲。

\* \* \*

從空中俯瞰，你可以看到一小堆一小堆的金黃色玉米遍布著長春。一九三〇年代，這座城市是日本在侵華期間所建的傀儡政權滿洲國的首都。長春市中心至今仍保留著當年日本人為前清皇帝溥儀所蓋的皇宮。日本人把溥儀塑造成一個有名無實的領袖——「假的」皇帝。如果我們想要的話，可以參觀「假的」皇宮，但是馬克和我沒有時間。我們的承辦人把接下來的八個小時都排滿了工作。

我們一抵達，問題就出現了。我們的原始任務是報導兩間工廠，還有它們之間的密切關係如何幫助中國生產更多的澱粉。但是到了現場，我們卻發現不能兩間工廠都參觀。承辦人之一要我去找其他的主題，我們不能進去黃龍工廠參觀，但他沒有解釋理由。

到了大成後，我們注意到，這家工廠跟多爾奧利弗以及它的競爭對手（名字叫韋斯伐里亞的德國公司）同時買離心機。兩家公司的機器一起運作，面對面地決戰，這讓馬克很難拍照。他必須找到一個辦法，能夠拍到多爾奧利弗的離心機，卻不帶到那家德國公司的機器。韋斯伐里亞的機器是灰棕色的，多爾奧利弗則是藍色。多爾奧利弗從下面倒進玉米粒，韋斯伐里亞是從上面倒。兩者的聲音都很大。工廠裡聞起來有一股麥芽的味道。工人們身穿黃褐色的工作服，胸前貼著共產黨的紅星。

馬克拍照時，我訪問了承辦人挑選的一個工人。我們坐在工廠的會議室裡，我問他多爾奧利弗和韋斯伐里亞有什麼不同。

「多爾奧利弗從下面倒玉米粒，韋斯伐里亞從上面倒。」他說。

這點我早已注意到。我問他，兩者在品質上有沒有不同。

「基本上是一樣的，」他說，「不過韋斯伐里亞好一點。」

多爾奧利弗在中國的首席代表王先生，正坐在桌子的另一頭，講著手機。王先生是「中國國家經濟委員會」的前會員，也是我們這件宣傳任務的主要協辦人。我希望他沒聽到我們的談話。我傾身向前，小聲地問：「為什麼你覺得韋斯伐里亞好一點？」

「他們就是好一點。」那工人聳聳肩。他二十五歲，短髮，有著短得幾乎看不見的鬍鬚。他的月薪是一百二十五美元。「多爾奧利弗機器比較複雜一點，」他說，「韋斯伐里亞機器則好操作一些，多爾奧利弗比較需要人看著。」

我知道這不是很好的宣傳內容，我擔心王先生講完電話後可能會對這工人怎樣。所以我換個問法，問到他在品管部工作的妻子和他十個月大的女兒。談起女兒，他的興致比談多爾奧利弗機器高了許多。他說女兒應該很快就會走路了。

\* \* \*

我的第二個訪問對象是郭先生，他是吉林石化設計研究院的副總工程師。這家成立於一九五七年的機構，一開始叫作地方工業科技研究所，原本是要研究如何把甜菜精煉成糖。但那個時期中國歷經了許多變化，沒多久該院就改成研究如何製造尼龍繩。接著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郭先生被迫離開工作崗位五年多，他對那五年做些什麼沒有多說，只是明確地表示，那五年跟做尼龍繩無關。

一九七〇年初期，隨著文化大革命平靜下來，該院改名為吉林石化設計研究院，在那段時間內，他們開始做香菸濾嘴的改進工作。那對郭先生又是個全新的領域，但是他全心投入。到了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研究院的研究對象再度改變，這次是澱粉。沒有人可以給我一個好解釋，它為什麼還是叫作吉林石化設計研究院。

郭先生六十七歲。他是那種溫和、講話柔和，一講到不自在的話題就咯咯笑的中國人。提到文化大革命，他咯咯笑；講到小時候長春的窮苦，他咯咯笑；談到他花了六年時間開發香菸濾嘴，他也咯咯笑。郭先生是我在長春所見少數不抽菸的人之一。

在長春的五星級香格里拉飯店接受一位外國宣傳記者的訪問，似乎讓郭先生有點受寵若驚，這也是他不斷咯咯笑的原因之一。他無疑是非常聰明的。一個在人生如此晚期才找到天職的人，他對澱粉的了

解之多，遠超過你的想像。所有數字全從他腦裡跳出。他告訴我，自從一九八〇年以來，中國玉米澱粉生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一百五十。在中國，百分之四十的玉米澱粉用來做味精，而在美國，百分之六十用來做人工代糖。這些數字似乎深刻地說出兩個國家的大不同。

訪談中，馬克打手機過來。他正在工廠外面拍照。

「這裡有個巨大的玉米堆，」他說，「你應該過來看看。」

「我人在飯店，」我說，「我正在訪問一個玉米澱粉專家，待會兒過來。」

「它有五十英尺高，所有農民都把他們的玉米送來這裡，我一輩子沒看過這麼多玉米。他們用那種大機器堆高。你知道我說的是哪一種，它們是不是叫作反鏟挖土機？」

「應該是。」

「你真的應該過來看看。」馬克說。一如很多攝影師，他常被那二點五公分多鏡頭中所呈現的世界給迷住。

「我們很快就要回去了，但是我得先把玉米澱粉專家訪問完。」

「訪問完請他一起過來，我們可能也會需要他的照片。」

馬克掛上電話，我繼續訪問郭先生。他提出更多數據：美國每年每人的糖消費量是五十公斤，而在中國則不到八公斤。說到全世界的澱粉生產量排名，美國是第一，中國第二。玉米的價格在中國是愈來愈便宜，一九九七年一噸幾乎要二百美元，現在只要八十五塊。郭先生咯咯笑著。他的數字都說完了。

一陣靜默。我想著還有沒有什麼宣傳問題可以問。最後，我問他有沒有吃過玉米，郭先生又咯咯笑了。

「過去，大部分的玉米都是拿來當食物，」他說，「在我的整個童年，我們都吃玉米，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都是如此。但現在如果我

會吃玉米，一定是餐廳正好有一道特別的菜。在家裡我從不吃。沒有人吃，現在的人都比較有錢了。」

郭先生只點了一杯水果奶昔，他不好意思從自助餐檯拿東西吃。我一直邀請他去拿，但他只是搖頭和咯咯笑。他倒是很喜歡那水果奶昔。

\* \* \*

在東北，玉米的濕度在百分之三十二和三十八之間，在中國中部只有百分之十四。這是為什麼長春的玉米需要那麼長的時間才會乾燥的原因。

在回大成工廠的車上，王先生告訴我這件事，我把它記了下來。

\* \* \*

我最後訪問的許先生是長春玉米工業開發區的管委會主任。他在一九八〇年代成立黃龍公司，是中國第一家玉米澱粉製造廠。許先生花了五年才得到政府的各種許可，所有的紛爭都釐清後，他第一年就賺進了七百多萬美元。不久他成立大成廠。基本上他是中國玉米澱粉之父。我在他辦公室等他開完會。

在場陪我的是多爾奧利弗的主要承辦人王先生，以及兩個正好在中國出差的荷蘭代表。馬克還在外面，偶爾他會打電話進來問許先生來了沒有，因為他是馬克的理想封面人物。馬克真的很想讓他的照片



上封面。同時他對那堆玉米又充滿興趣。荷蘭代表的名字叫維姆和基士。他們話不多。

王先生跟我聊著他的背景。他十五歲進入中國海軍艦艇學院，在那裡待了七年。一九七六年他離開海軍，轉任外文出版社。他勤學英文，最後被派任到北歐負責共產黨的宣傳工作。後來他加入國家經濟委員會，他沒有解釋他在那裡是做什麼的。

離開政府部門之後，王先生任職多爾奧利弗公司，在中國賣離心器和其他儀器。一如郭先生和很多我在中國見到的中年知識分子，王先生講起他的事業生涯時，不像在講自己的故事，而像是一連串彼此不相關的小插曲。他帶著困惑地講起那些小插曲，好像那是別人的故事，而那些人現在已經不在，他們的蹤跡隨著時間褪了色。

他對曾經在國家經濟委員會工作的那個自己最感興趣。

「我可以當上部長，如果我留下來的話。」他說。

「要多久才能當上？」我問。

「那要看你的政治手腕。」

他舉許先生為例，來說明當你介入政治時會遇到什麼。一九九〇年代早期，黃龍工廠大放光采後，許先生準備在大成開第二家工廠。他本來要叫它龍二世，這樣兩家工廠就可以代表中國玉米澱粉工業的重心。一切都按著計畫走，但突然來了個政治大地震，許先生最終失去了黃龍，對一手建立的工廠不再有控制權。

「所以他才獨自成立了大成，」王先生跟我說，「他以此作為報復。他叫工廠大成，也不叫它龍二世了。」

我想見許先生的興趣更濃了。我要看看到底是什麼樣一個頭腦冷靜、精於算計的人，會想到用另開一家新玉米廠的方式來報復他的敵人。

「政治就是那樣，」王先生繼續說，「你總會被你的手下扯後腿。那就是政治。如果你要當主事者，你就得扯對手的後腿。如果你是個溫和的好人，你就會被弄走。他們就把你幹掉。」

王先生是用英文說的，還不斷使用了「fuck」這個詞。每次說到這個詞時，維姆和基士就跳腳。王先生的英文很好，但他是那種會在同一個句子裡用「fuck」三次卻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的人。結果是，它讓荷蘭人跳了起來。

他正要再開口說那個詞時，馬克打電話來了。

「主任來了嗎？」

「還沒。」我說。

「有個工人對我拍他的照片不高興，發了脾氣。」

「有什麼問題？」

「我在拍臉上有泥土的工人，他不喜歡。他開始對我大吼，要我離開。我跟他解釋後，他終於不找我麻煩了。」

「他認為你故意要醜化工廠嗎？」

「有可能。或者，他以為我是另一個公司派來的間諜。」

我想要跟馬克說明大成跟黃龍的血緣關係，但那太複雜了。我想馬克可以照顧自己。我答應他，等許先生一出來就打電話給他。

我想知道，王先生在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不理會我的問題。他對另一件事比較感興趣。

「今天早上你訪問那工人時，當你要他比較多爾奧利弗和韋斯伐里亞時，他怎麼說？」

一時之間沒準備，我答：「他說基本上都一樣。」

「他說不同在哪裡？」

我很快回答：「他說多爾奧利弗是從下面，而韋斯伐里亞是從上面倒玉米。」

「不是不是，」王先生愈來愈沒耐性了，「他說哪一個比較好？」

「他說它們都差不多。」

「不是，他不是那樣說的。他跟你說韋斯伐里亞比較好，不是嗎？」

我想要說謊，但我發現我跟那名工人一樣，掉入了陷阱。

「是的，他是那麼說。但是他說差別不是很大。」

這下子維姆和基士有了興趣。王先生勝利似地看著我。

「你知道嗎？他說的沒錯！」

沒人說話。王先生笑了笑。

「我們的機器設計得沒韋斯伐里亞的好，他們的離心器比較好。」

兩個荷蘭人的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

「我們很需要知道這些，如果不知道我們的產品差人一等，我們怎麼做生意？」

房間內一片死寂。我在心裡把他的問題重複了兩遍，還是不曉得要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那是我很久以來所聽過的最聰明的一個問題。

「每個人都說他們的產品是最好的，他們不得不說自己的產品比他們的競爭者好多少，通常他們也相信這一點。但事實是，一旦你知道自己的產品比較差，情況反而容易多了。這樣你就可以只專注在做生意上！」

我終於知道王先生在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每當我遇到像他這樣的人，我就會了解為什麼這麼多中國人可以把從

共產黨換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掌握得這麼好。

兩個荷蘭人似乎很不自在，直到王先生轉移了話題。他說起改造過的澱粉跟一般未改造澱粉的差別。它們的差異太小了，我幾乎搞不太懂；最後維姆開口了。他澄清說：「基本上，改造過的澱粉就跟原油一樣，」他說，「就是碳水化合物。」

\* \* \*

馬克終於拍完玉米堆。他走進辦公室，跟王先生討論起管委會主任許先生拍照的地點。討論並不簡單。

王先生指著掛在主任辦公室牆上、曾到過大成的李鵬和鄒家華的毛筆字，他要馬克在這辦公室拍主任。李鵬是下令一九八九夏天軍事鎮壓的前總理。鄒家華是誰我不知道，但王先生跟我保證他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sup>5</sup>鄒家華的毛筆字寫著：「玉米經濟產業化前途無量」。李鵬的寫著：「中國長春玉米工業基地」。李鵬的毛筆字之醜，是全中國有名的。

王先生要許先生以毛筆字為背景拍照。馬克眼看他的封面照就要化為泡影了。

「這裡的光線很差，」他說，「工廠的比較好，我可以拍他站在多爾奧利弗機器前面。」

「不行！」王先生大叫，「他不會同意的！你不能拉著這麼大間公司的董事長，隨你的意思到哪拍照！這是政治，不是那麼簡單的！」

看得出來馬克愈來愈挫折。「好吧，那我們只好用一張普通工人的照片，」他說，「如果一個普通工人上封面，你想他會高興嗎？」

「我建議你最好不要，」王先生警告說，「有高層官員在，最好不要用職位比他低的，尤其是個普通工人。你必須要用最高職位的人當封面。」

他們爭論了一會兒。各有堅持：馬克擔心光線，而王先生擔心政治。許先生一進門時，大家都站起來，爭議頓時好像從未發生過。王先生問許先生可不可以跟我們到工廠，在多爾奧利弗機器旁拍照，許先生毫不遲疑地答應了。

我們到外面。天氣很冷，空塑膠袋飛過工廠地面。你可以看到遠處那個馬克說的大玉米堆。它們真的很大。我們走進機器間。

馬克小心地避免把韋斯伐里亞機器拍進來。許先生身高不過一百五十幾公分，穿了一件灰格子花紋西裝。拍照時，他驕傲地微笑著。他今年五十七歲。

之後我們回到他的辦公室做採訪。他遞給我名片，上面列著他的兩個主要職位：「中國長春市人民政府副祕書長」、「長春玉米工業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這個開發區是按照深圳特區的模式建立的。

我問許先生，自一九八〇年代他創立黃龍以來，情況有何改變。

「最大的問題在於行政上，」他說，「那段時間我必須要跑很多部門，每件事都得經過國家委員會的批准。但是現在，批准的權力放下了。我只需透過長春市政府就可以，在那裡，基本上我自己就可以批准，因為我就是副祕書長。只要我簽准的申請書，其他部門也會核准。」

許先生驕傲地解釋。我把它們記下來。

他詳細說明現在一切如何變得容易多了，因為他可以批准商業案件，那清除了很多障礙，他期許大成玉米澱粉的生產會因此增加四倍。他們一年已經生產五十萬噸。玉米的降價助益很大，中國加入世

貿組織後，價格會降得更低。想到未來，許先生露出笑容。訪問結束前，他想到一件事。

「我還要增設處理廠，生產濃縮玉米澱粉，」他說，「我希望，透過這些新工業，我們可以幫助因玉米降價而受害的農民創造工作機會。」

\* \* \*

我兩個小時就把那故事寫好。文長一千字，我極盡可能地用數據把它塞滿。我沒有提多爾奧利弗機器有時候會卡住，沒提黃龍和大成之間的不和，也沒有提許先生在政府的職位如何幫助那間工廠擴張。在滿洲，我學到了宣傳的重要一課：真正關鍵的訊息不是你所寫進去的，而是你省略下來的。

兩個星期後，雜誌社的一個女人跟馬克說，他們不會用許先生的照片當封面。取而代之的是，那位花了六年時間研究香菸濾嘴的郭先生上了封面。他們不得不用他，那女人說，因為他的笑容是那麼好看。

---

5 編按：鄒家華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八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

## 第六章 好萊塢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冬天的時候，波拉特幫我弄了張「好萊塢」的貴賓卡。天氣冷時，我們無法坐在維吾爾小餐廳的戶外露台，所以我們的雅寶路老規矩不得不改一下。有時候，我們在既是俱樂部又是餐廳的「好萊塢」吃飯，持有貴賓卡意味著可以免掉夜總會的附加費。波拉特認識他們的經理——他好像認識雅寶路上每家俱樂部的經理。

「好萊塢」的菜單上有俄文和中文，我們幾乎每次都點一樣的：我點基輔雞，波拉特點牛排。週末的晚上他喜歡早點到這裡，這樣我們就可以一邊慢慢吃，一邊看著人群慢慢湧進。進來的人都要穿過吊在門口的巨大金剛塑像。店裡，裝潢模仿的是「好萊塢星球」連鎖餐廳。玻璃櫥櫃裡展示著假的電影用具，還仔細地做了標示說明：一個據稱曾用在電影《無敵戰將》的銀色的警長徽章（一九九一年）、一件滾著紅色內沿的黑斗篷（《吸血鬼也瘋狂》，一九九五年）、一條皮鞭（《長舌鞭》，一九五八年）。進門處，一支巨大的玻璃管內，裝著一個真人大小的阿諾·史瓦辛格在《魔鬼終結者》中的扮相。那塑像跟餐廳裡的很多電影產品一樣，做得很粗糙，教人難以辨識。這個地方就像個專門陳列假物品的博物館，一個文物展覽館，提醒你到底脫離現實世界有多遠。在一個充滿了冒牌貨的地段，「好萊塢」是它們的集大成者。

這裡也是雅寶路上俄羅斯妓女的主要出沒地。每次波拉特跟我約在這裡吃飯時，我都會留意那個夜晚交易的動態。到了八點鐘，那些

女人開始滲入。一個小時之後，潛在的客戶到達了。他們大多數是中國的小生意人，可能身上有點錢，但沒受過太多教育的那種，腕上戴著會帶來好運的佛珠，手裡總是抓著一個假皮錢包，一副標準的交易商打扮。不管在城市的什麼地方，這種男人總是說話很大聲——大聲講行動電話、大聲對餐廳女服務生下指令。但是在這些「好萊塢」的白種女人面前，他們變得很安分。這些中國男人成堆地逗留在那裡，低聲說著什麼，無聊地玩著手機。只要一個像漂白過的金髮女人走過，他們就更加坐立難安。有時，我就看著某個男人採取行動：拿起電話，放下電話；點個菸，放下打火機。然後那一連串動作速度加快：拿起電話，放下電話；拿起電話，放下電話——直到最後他終於起身，走到對面，開口跟那名女人講話。這時，或是瞥一眼自己的手機，或是轉過頭和波拉特講話，我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偷窺癖。

\* \* \*

波拉特愈來愈常說到要去美國的事。他提到出國念書的可能性，或是找個有機會出國的工作。有一陣子，他對加拿大很感興趣，因為有人跟他說移民到魁北克很容易，但是他實在不想學法語。我們在「好萊塢」的討論總是回到原點：美國。

波拉特想去美國的想望很令人困惑。他不會講英語，我也實在無法想像他當學生或生意人的樣子，美國大使館絕不可能把簽證發給像他這樣的一個雅寶路中間人。他在新疆有老婆，但很少提到她，我可以感覺這兩人的關係有問題。他說他不想把老婆帶到雅寶路這種地方。他們沒有小孩。我想，這對夫婦相處的時間很少。這種情況在中國並不算少見，尤其是其中一人經常不在家時。



我懷疑波拉特想去美國的念頭只是對他不安定生活的一種投射，但我也擔心他對美國有錯覺。沒去過美國的中國人常把美國的好壞想得很極端，但通常兩者都不正確。我碰過很多相信美國是邪惡化身的中國人，但我也碰過對美國的財富、機會和自由滿懷憧憬的人。跟他們談話時，我常試圖小心地把他們推離極端，但這很難，因為缺乏可供對照的實際情況。美國是個「想法」，而非一個地方。

在中國的少數地區，人們對美國的有些想法是如此根深柢固，以至於不擇手段地想辦法移民。這年一月，三名中國男子死在路經西雅圖的船上貨櫃裡。他們和船上的其他非法移民都來自福建——一個位於中國東南方、以安排偷渡的「蛇頭」聞名的省分。

那起意外之後，《西雅圖郵訊報》請我寫一系列關於蛇頭的報導。我在福州沿海待了將近一個星期。在一個叫琅崎的島上，我找到一個西雅圖生還者的家人，那個男人遭到拘留，正等著美國移民局的發落。這樣的移民肯定會要求政治庇護，雖然他們幾乎都是因為經濟上的因素而離開家鄉。在福建的一個村莊，我遇到一名年輕人，他跟我說，在要求政治庇護被拒之前，他在紐約皇后區的牙買加拘留所待了四個月。蛇頭安排一次偷渡，一般的要求是三萬到五萬美元，移民欠的債得靠在唐人街的餐廳或成衣廠非法打工多年，才能還清。

在貧窮的地區，偷渡還是可以理解的，但福建比起一般省分要富裕得多。然而，很多福建人並不滿足於一般中國人標準中的好生活，因此，那裡冒出了一堆支持當地人美國夢的行業，諸如蛇頭、假簽證服務、移民前的美語課。在一個叫潭頭的小村莊，三家英語補習班推出像是「餐廳美語」、「生活美語」和「出國美語」之類的課程。有一堂課的廣告很簡單，就叫「菜單」。另一個廣告則承諾：在美國工作一天半賺的錢可以讀一整個學期的「餐廳美語」課。有間學校還提

供廣東話課程，因為那是一些唐人街餐館的主要方言。為了可以在美國非法打工，福建人正在學著另一種中國話。

一些當地人真的抵達了美國，他們拚命工作，最後成為某家餐廳或公司的老闆。他們寄錢給福建的家人，家裡人在村裡蓋了大別墅。這些房子通常又直又窄，可能只有三間房寬，但卻有五層樓高，外面通常貼著白石磚，還裝上罩有綠色遮光窗簾的大玻璃窗。那種綠在現代中國的建築中很常見，總讓我想起《大亨小傳》裡從黛西的船塢盡頭發出的光暈。

但是在福建，這類成功的移民故事就像歷經多年才渡過銀河的一瞥微光。有些成功故事已經屬於更早的年代，那時中國的經濟還不能提供更多的機會。事實上，現在的福建人待在家鄉可能會更好，就算在美國立刻能賺到的錢比較多，但在中國，他們應該會比較快樂，或者前景更好。但是，人們不斷地看到那些大別墅，也就不斷地離開。他們正在追逐的是一顆抵達時可能已經死去的星星。

我站在潭頭一間新蓋的六層樓前，大門上刻著金字：德聲園。屋內，一名老婦很驕傲地告訴我，她有四個小孩在美國，其中一個女兒在開旅館。我問她旅館在哪裡，那婦人慢慢地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五個英文字。她不懂英文，筆跡的角度很奇怪，好像是一個人記住了字的形狀而不是字本身。但不論如何，她只寫錯一個字：

Vallege Inn Edison New Jersey（鄉村旅館，紐澤西州愛迪生市）

\* \* \*

每次在「好萊塢」跟波拉特談到美國，我都會跟他提到那些福建人，因為我擔心他高估了美國給他提供的經濟機會。我知道雅寶路的生意正慢慢走向末路。以前，俄羅斯和中亞的生意人從未間斷，很多人以參加旅行團的方式拿到中國簽證，一次停留個幾個星期。一些特別的旅行社專辦這種團，因為觀光簽證比商業簽證容易辦。我想像得到從莫斯科起飛的包機上，載滿了表情嚴肅的女人和有著伏特加眼袋的壯碩男人。他們是假的觀光客，是一群低劣仿製的外出度假客。

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底，雅寶路的俄羅斯人和中亞人的數量日趨下降。有時，波拉特用貨幣變動的術語向我解釋這些改變。他說，哈薩克的貨幣坦吉已經降了三分之一的價格，他的大部分阿拉木圖老主顧都不出門了。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塔爾的錢幣也都一樣。波拉特最近的一筆大服飾生意是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時做的，他賣了三千條廣州製的牛仔褲到哈薩克。大約在同時，他幫一些俄羅斯人買了一批假的諾基亞手機電池。他告訴我，那些電池只能用十五天。那些交易之後，波拉特當中間人的生涯基本上是結束了。

部分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它不但讓下層的外國貿易商感到吃力，也破壞了黑市的美元價格。每當波拉特談到匯率時，他總會強調政府控制的結果——深圳冒出了一個邊界的問題，或者中亞某些腐敗的海關官員被揭發了。從貨幣兌換的角度來看，上面這些趨勢都與之相關，但事實上，真正左右匯率的是一些更強大的經濟力量。中國政府想要掌控住經濟，以確保它在轉變時期仍然保持相對的穩定，因此他們固定了匯率，並和美元掛上鉤——在銀行，你換到美元的匯率大約是八點二六。這種人為的穩定性自然促使黑市蓬勃發展，給代理人在中國賺錢的其他機會。當有錢的中國人對國內的股市或房地產沒有信心時，他們或是把美元存下來，或是到海外投資。但是這個情況已經急

速改變了。自從一九九九年以來，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大興，人們要去投資，因此需要人民幣。我一九九九年春天剛到北京的時候，一美元可以換到九塊人民幣。一年之後，黑市的匯率已經掉到八點七。這對中國經濟是好事，但是對像波拉特的中間人則不然。這個國家起飛的經濟正把黑市逼向死路。

儘管如此，他還是從貨幣交易中賺了不少錢。我確定他的語言能力在中國會比在美國有得發揮。我坦白跟他說，從經濟的角度考量，北京比美國更適合他。但是他堅稱，選擇住在哪裡時，錢不是他的考量。「我不是個生意人，」有一次他說，「我有受過教育，我以前是當老師的。北京不是我的家，這也不是我想過的生活。」

他完全跟生意撇清的態度很奇特。在中國，每個人都公開談著錢，波拉特也不例外。我們的談話常常繞著匯率、批發價打轉。但他似乎要把自己的某個部分跟外界隔開。他困惑地談著那些他經手的交易，好像處理那些生意的是某個他也不熟的人。當他跟我說那一批假的諾基亞電池時，我問他：難道不怕俄羅斯人發現它們品質有多差後來找麻煩？他說：「他們知道那些東西是假的，要不然怎麼會那麼便宜？不管怎樣，俄羅斯人不會找我麻煩，我只負責調貨，那些東西又不是我做的。」

他的生活被現實與理想清楚地劃分成兩半。他在雅寶路的商業環境裡賺錢，但卻花很多閒暇時間想著遠方的人和事。他的老婆在千里之外，他在新疆教書是久遠以前的事。我們談起新疆時，他總是稱它為「東突厥斯坦」——這是那個未能獨立的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被推翻時的名字。而美國似乎也同樣地遙遠。他說他喜歡讀美國史，尤其是有關林肯的，因為他解放了黑奴。波拉特很喜愛美國文化，每年夏

天，他都會弄到工作證去看日壇公園的爵士樂表演。他一遍又一遍地看《教父》電影，即使只是演配角，勞勃·狄尼洛也棒極了。

基本上，我想這些夢只是他在逃避雅寶路的殘酷現實，重點不在真的去美國，而在談「去」美國這件事。不過，隨著時間過去，我終於了解波拉特的複雜處境。他真的對那種小格局的生意型態感到困擾，他有時也真的非常看不起其他的維吾爾商人。見到他們時，他友善地跟他們握手，但之後他會坦率地跟我說他們沒受過教育，也不懂政治。在波拉特眼中，他跟他們有不同的特質：他是個知識分子，若不是在新疆出了問題，他也不會來北京。

維吾爾文化一向有社會階級之別，知識分子自居於農民和商人之上。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分別更明顯。在像新疆這樣的地方，中國人是把發展經濟當作政治工具來用的，因此維吾爾族的不同階級與這些中國漢人發展出各自的關係。有時從政府贊助的基礎建設和耕種津貼裡獲益的維吾爾農民，可能顯得被動，甚至服從中國的政令。維吾爾商人也同樣現實，因為他們得依賴中國取得商品。但是，很多知識分子堅定地反對北京的控制，當他們感覺到自己得和低教育程度的族人同流合汙時，經常不免滿懷怨恨。

對波拉特這樣一個自己覺得被迫從事貿易的人，他的憤怒更強烈。當聰明偏激到某種程度，當把理想主義及對其的信仰奉為唯一真理時，這同樣讓人擔心害怕。波拉特雖然痛恨貿易者的目光短淺，但套用他的話，他更恨對某種主義走火入魔的人。在雅寶路，他無情地批判兩種人：他瞧不起北韓人，在他看來，他們是史上最糟的共產黨員；另外，他對阿富汗商人也沒好感。有時阿富汗人會出現在雅寶路上的餐廳，通常三五成群，我所認識的中間商幾乎沒人願意跟他們做生意。阿富汗人不是來雅寶路買Tommy Hilfiger或North Face的。這些

人留著大鬍子，形貌憔悴，夏天還穿著長袍，有謠傳他們是來買賣珠寶和毒品的。每次他們經過時，波拉特就厭惡地撇嘴。

「他們跟共產黨沒兩樣，」有一次他說，「阿富汗沒有自由。你一定得相信個什麼，而且還不能問問題。那種伊斯蘭教跟共產黨沒什麼兩樣。」

維吾爾知識分子對伊斯蘭教抱持懷疑態度並不奇怪，過去，他們就不是很投入，只不過那種情況在改革開放後有所改變。一九八〇年初期，中國政府刻意鼓勵伊斯蘭教在新疆的傳布，贊助修建清真寺，甚至於付錢給維吾爾族的宗教領袖去麥加朝聖。政府希望宗教的成長能拔掉騷動的種子，但是一九八五年發生的一連串的示威抗議教他們大吃一驚。上千名維吾爾人抗議反對漢人移民，反對中國用新疆沙漠作為核武器的實驗場。波拉特參與了那些示威，後來被判刑，第一次坐了牢。

那些示威完全是政治性的，但中國領導人卻相信伊斯蘭教是主因。一九八五年後，中國突然改變策略，以壓制宗教活動來回應維吾爾人的起義。但是伊斯蘭教繼續成長著——很多人相信，政府的鼓勵或後續的鎮壓所造成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對波拉特這樣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伊斯蘭基本主義派的盛行和毛主義一樣可怕。他相信，維吾爾人只是被從這個宗教驅趕到另一個宗教。

維吾爾族的圈子不大，在那裡面，波拉特只信任幾個人。他常打電話給一兩個流亡到美國的維吾爾人。在雅寶路，他定期約在北京工作的好友吃飯。他們全是知識分子，都在某種程度上向現實妥協了——陷落到生意人的階層，或是在共產黨嚴格控制的當地少數民族學院裡教書。

二〇〇〇年春天的一天晚上，波拉特邀我參加他為一位維吾爾好友致意而舉辦的晚宴。波拉特以前跟我提過這個人，他有時會在中國電影裡演外國人賺點外快。他剛參加另一部在南方拍攝的電影演出，回新疆之前路過北京。

波拉特在「好萊塢」旁邊的日壇旅館裡的維吾爾餐廳訂了張長桌。到場的總共有十二個人，我覺得比平常跟中國人在一起時來得自在，因為大部分的男人跟我一樣，有著深邃的輪廓和高鼻子。只有一點小小的不太對勁——大部分談話用的是中文。我知道這些人在一起時不喜歡講中文，他們願意改變慣例，好讓我有被包括在內的感覺，這讓我很感動。

他們全是維吾爾人，唯一的例外是一個在中國邊界出生的塔塔爾人。他告訴我，在全國五十幾個少數民族當中，塔塔爾是唯一沒有自己土地的一族。他們是二十世紀前半期逃出蘇聯邊界的人的後裔，離開的主要原因是反對史達林政權。

那位塔塔爾人白膚金髮，另位維吾爾兼職演員也是。「他是個假洋鬼子，」波拉特開玩笑，「你是真洋鬼子。」

我問那人他拍過的電影時，波拉特無傷大雅地取笑他。

「你被中國人殺死過幾次？」他說。

「一兩次。」那人笑著說。

「在《鴉片戰爭》電影中，你被那個中國女人殺了！」

另一個維吾爾人，一位教授，大聲地說：「他們用了很多民族大學的學生當臨演。有一個還受了傷，我想他是個哈薩克學生。」

一名客人說，他曾經在一部宣傳電影中飾演一個法蘭西帝國主義者。「我處決了一個中國革命家，」那男人也是一位教授，他驕傲地說，「那是很棒的一天。」

其他人都笑了，並舉起他們的伏特加杯子。桌上擺滿了維吾爾食物：烤羊排、饅餅、烤肉串和炸蔬菜。隨著夜深，男人們不停地喝酒，慢慢地不再講中文，到最後我連一個字也聽不懂。我安靜地坐在一旁，看著，聽著。我喜歡維吾爾語的聲調，還有這些人講那種語言時臉上發光的樣子。晚餐的最後，波拉特起身，慢慢地繞著餐桌，跟在場的客人一一敬酒。那個晚上，圍繞著那張長桌，在那雅寶路的中心，他看起來就像是世界的中心。

\* \* \*

在首都住了一年後，我對這座城市在日曆上行走的韻律比較熟悉了。北京的時間是不穩定的：有時，一個星期像是永久。或為了迎接某個早晨，得花上幾個月準備才行，比如說像是那個一九九九年的國慶日。有些日子，黨要紀念它，有些日子，黨想把它遺忘。有些日子，某些事情一定得發生，有些日子，則什麼事也不要。偶爾，花好幾天就是為了製造一些未來會記得的短暫時刻。

常常，北京警察會用鄰里治安檢查作為一些特別日子的前奏。或許是六四紀念日、國慶日，或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論如何，給人的感覺都一樣——街巷裡出現更多警察，挨家挨戶檢查戶口。這些時候，對時常沒有適當文件的外來人很不利，對維吾爾人也是麻煩。大日子到來的時候，波拉特總是盡量保持低調。

但是對大部分的北京人，包括警察在內，大日子來臨根本就是件討厭的事。命令無庸置疑地是來自上頭：某個部門跟下面的部門說要提高警覺，接著那話穿過層層的官僚體制，最後到了地方警察，他們就盡職地進行一次大掃蕩。但他們的心通常不放在這件事上，做做表



面工作就算了。每當他們來敲我的門時，我默不作聲，也不開門。我從未在住處登記過戶口，因為若根據法律規定，那裡是不准記者住進去的。

當然，每個新聞記者都變得特別能配合這個城市的日曆步調。對某些特定的活動，會備有特定的文章。到了當天，記者會花幾小時守著天安門廣場，留意抗議活動。大多時候是無趣的，有時候甚至讓人不太愉快，偶爾我會感覺自己像個警察，被迫去留意那些日子。當一切是那麼支離零碎時，實在很難把它們弄清楚：這裡在抗議，那裡在慶祝週年。而占優勢的全是政府。如果有個人到廣場去紀念六四，另一個人去鎮壓法輪功，這兩個人永遠不會碰頭。那兩天不會重疊，日曆會搖搖晃晃過去，沒有創造出任何故事。

但如果你目睹了一個事件後，又接著看到了它的迴響，感覺就完全不一樣。在那樣的情況下，一條單一的線會延伸歷經數年，把時間上的兩個點連接起來。對我而言，發生過兩次的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五日。

###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這城市對我來說仍然很新鮮。我經常一早騎著單車漫無目的地跑，試圖熟悉每一個街道。快到市中心時，我的呼叫器響了。我找了個公共電話回電給伊恩，我在《華爾街日報》的上司。他要我繞過紫禁城畔中央政府所在的中南海。有個謠傳說，有些人正在那兒示威。

我往西騎向文津街，經過北海公園，然後我看到人行道上站了幾排人，每排三、四人，大多數看起來像中年人，穿著鄉下人的簡單衣著。我的第一個直覺是去估算有多少人：一百、五百、

一千、二千。就那一條街，我估算大約有五千人。府右街上的人更多。

好一會兒，我被數字完全包圍了，其他什麼也沒注意到。然後，我被那安靜所撼動。沒有人在喊口號，沒人在唱抗議歌曲。沒有布條，沒有標語。那群人只是站在那裡，冷靜地注視著街頭。

路人都覺得很奇怪。幾個北京當地人停下腳踏車，問抗議者他們在那裡幹什麼。沒人回答。有個人變得很生氣，他說：「你知道你們這樣做，會有什麼結果嗎？你們只會給大家帶來麻煩。你們為什麼這麼做？」

沉默。我下車走入群眾，希望能找個願意說點什麼的人。我試著跟一名中年婦女說話：沉默。一個老人：沉默。一名男人、一個女人、一名男子。沉默、沉默、沉默。終於，一名四十幾歲的女人打破沉默。她的穿著比其他人正式，她的普通話帶著我聽不出的腔調。我感覺她是某種領導人。「我們練法輪功，」她說，「我們要的只是官方的認同。人們批評我們、誤會我們了，我們不會停止，除非政府承認我們是個好的團體。」

我們簡短談了一下，然後一輛黑色轎車靠邊停下來。深黑色的車窗，一面窗戶搖下。有人從裡面做動作示意，女人趕緊過去。車門打開後，她坐了進去。一兩分鐘後她出來，車子就開走。但是，當我再走近她，她只是搖頭，半句話不說，消失在沉默的抗議人群裡。

\* \* \*

那次法輪功首次示威之後，時間加速而過。在某種程度上，時間早已飛逝：自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以來，中國的宗教環境歷經了巨大的改變。基本上，共產黨對宗教是採批判態度的，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刻意破壞。毛主席不給其他信仰留任何空間——但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死了，文化大革命也跟著結束。兩年之後，鄧小平開啟了改革階段，但中國再度遭受從十九世紀以來就折磨著這個國家的精神大掃除。

現今，很多中國人似乎是信奉著兩個不完整的半信仰：唯物主義和民族主義。然而傳統的宗教也逐漸復甦，教堂找到新的信徒，廟宇、清真寺也被重建。不過這些信仰受到嚴格限制，因為共產黨只承認五個合法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一九八〇年代，有些中國人也開始對講求傳統呼吸和靜坐練習的氣功產生了興趣。這些練習從未被視為「宗教」，因為任何宣布新信仰的企圖，都會被視同是對黨的挑戰。因此，氣功練習者把他們的組織登記為運動和健康類型。一九九〇年代，一位東北出身、名叫李洪志的人創立了一種新的氣功，他稱之「法輪功」或「法輪大法」。法輪功跟其他派別一樣有靜坐和練習的步驟，不過也有明顯的不同。法輪功有具領袖氣質的領導人；書上除了寫有練法，也有信仰的重點；很多法輪功的符號和術語源自佛教或道教。不管法輪功登記的是什麼，感覺上還是像個宗教。

而它的傳布方式也像個宗教。法輪功的修練功法有三個基本原則：真、善、忍。它簡單的道德信仰對疲於應付改革開放的一般中國百姓很有吸引力。一九九〇年代，法輪功已增加到幾百萬信徒，很多人大清早一起在公園練功。我住在涪陵時，在茶館認識一群法輪功學員後，他們開始試著招攬我入會。他們給我李洪志的書，不時打電話

到我住的地方。他們給我的感覺是無害的熱情，我雖然不喜歡一早被他們的電話吵醒，但那些信徒總是很有禮貌。他們的誠意是毫無疑問的，練法輪功讓他們的生活有了規律。

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中國媒體裡的一些懷疑論者開始批評法輪功是迷信的和健康的。結果出現了一個模式：假如有某篇報導不夠正面，法輪功會員就組織在一起，到那個媒體外進行和平抗議，要求更正。那些媒體很多是低層級的機構，它們發現退一步比冒著被指責製造麻煩的風險，要容易一點。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電視台訪問了一位教授，在他批評法輪功後，電視台外聚集了二千多名抗議的信徒。那時正是北京日曆上一個敏感的時候——六四就快到了，電視台馬上播出一個對法輪功表示同情的節目。抗議的信徒才散去。

從此，會員們學到和平抗議是有效的工具，他們也變成有效率的組織。一九九九年四月，天津大學一份刊物登載對已移民到美國的李洪志不友善的評論。幾百名信徒在校園裡聚集，不過這次，那份刊物拒絕更正。最後，抗議者到了北京，希望直接向國家領導人陳情，那就是我親眼目睹的四月二十五日的抗議。那天，高層人員最後同意接見法輪功代表，獲得回應後，那些代表便要求群眾和平解散。

抗議活動和平落幕，但有一條線被跨越了。第一次，國家領導們意識到法輪功已變得那麼有組織。之後幾個星期，政府用那種在中國肯定代表了壞兆頭的沉默來回應此事。北京報紙對於抗議隻字不提，電視新聞沒有半點報導，沒有辯論，沒有公開揭露，什麼解釋都沒有。好幾個星期，那座城就只是等著。

然後風暴來襲了。七月二十二日，政府禁止法輪功。更多抗議出現，但接著的是抗議者被捕，帶頭者被送去勞改。十月二十六日，共產黨出擊，發出一個尖銳的公告，宣布法輪功是「邪教」。但是信徒

們持續抗議。他們經常到天安門廣場，攤開布條，以蓮花式盤坐，或者把手高舉過頭——這是練習法輪功的起手式。便衣警察在廣場監哨，外國記者注意著他們。不久，香港的人權團體開始刊出報告：會員在被警方拘禁時，遭毆打致死。

二月時，有位叫陳子秀的老奶奶在被一個山東小城的警察拘留時死亡。她是要來北京示威的信徒之一，但是還沒到廣場，就被一名便衣警察逮捕。（法輪功會員不願隱瞞他們的信仰，所以警察常在廣場附近巡邏，詢問民眾是不是信徒。）陳奶奶死後，她的女兒想找人把真相公開，後來透過層層關係，她聯絡上了伊恩。伊恩跟那名女人見了面，把故事登在《華爾街日報》的頭版上。之後，伊恩繼續追蹤報導法輪功的組織以及警方的反應。他發現，這又是另一個由上往下傳達命令的例子：凡是有信徒溜出管區到北京示威，當地警局就會被罰錢。始於上頭的一個想法——禁止法輪功，到了基層遭到扭曲物化，只剩下暴行，而為的只是一個最愚蠢、最現實的理由：會被罰錢。

接著，在你注意到之前，四月二十五日又再度到來，北京日曆又是另一個週年慶。

##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伊恩離開廣場之後，換我值上午的班。天空是黃色的，北京正經歷一場春天的沙塵暴，一個被從戈壁往南吹來的沙礫嚴重覆蓋的日子。我可以感覺到風吹過我的牙縫。

廣場上到處都是便衣警察——有些扮成紀念品攤販，有些假裝是遊客。一如平常，很多人是理平頭、穿著舊褲子和便宜的緊身短防風大衣。他們的大衣質料很差，而他們也是很差勁的便衣：他們徘徊逗留，站在那裡盯梢。他們喜歡指來指去。不用太久就

可以識破這些人不是很有訓練，不過反正他們的工作是脅迫，而不是滲透。他們接到的命令似乎只有一個：馬上把任何抗議者弄開，不管用什麼方式。

除了示威活動，他們也防範著外國記者。攝影記者的厄運是注定的，幾乎一定會被趕走。唯一的問題是，他們能不能在被警察搶去相機前，拍到一張照片，並把它藏起來。文字記者比較容易，只要我們遵守一定的規則：不要在外面寫東西，不要拿出筆記本，不要用中文跟任何人交談，盡量裝成遊客。最後，即使被揭穿，也要堅稱你是來廣場參觀的。

我混在一個美國旅行團中。這是很好的幌子，遊客大多數是男人，跟我一樣，戴著棒球帽。我聽出他們的口音：中西部人平的母音和生硬的R音。一個男人跟我說，他來自伊利諾，另一個來自愛荷華。我們圍著年輕的中國導遊，他帶我們到廣場北邊的旗杆下。一場演說開始了：

「紅色是共產主義的顏色。在中國的傳統裡，它也是快樂的意思。中央的大黃星代表共產黨。四個小黃星代表四個階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

演說變成個人化。導遊有個表兄以前在廣場當國旗護衛隊，幾個小時下來，他保持一動也不動的姿勢站在旗杆旁，因為覺得很驕傲，他並不覺得累。「假的故事。」我心裡想著，然後，一個小個子的男人在我們前面以蓮花座方式坐下。

叫喊聲、命令聲、跑步聲此起彼落，頓時有五、六個便衣跑來。當他們強迫那人跪下時，一輛小客車已經從遠遠的廣場那邊疾駛到我們面前。那抗議者一句話也沒說。他年約三十五歲，穿著簡單的農民藍色棉服。他的四肢垂落，他們把他抓進小客車。

車窗上窗簾緊閉，因此沒人看得到車內。他們把車開回廣場遠遠的一角。

「可惡，」一個中西部人說，「他只不過是坐在地上而已。」

另一個紅臉肥胖的男人拍到了一張照片。

「我拍到了一張照片！」他喊著，「我拍到了那個畫面！」他笑著揮舞著他的相機。看到我注視著他並走近，他漲紅著臉說：「如果沒拍到就太可惜了！」

「你最好把相機收起來。」我小聲地說。但另一部小客車已經快速開過來。一個身穿制服的警察指向那個中西部美國胖子。

「相機給我。」他用中文說。

那個美國人很快跑去找翻譯，然後毫無抗拒地把相機給那警察，警察把底片抽了出來。然後他跟導遊說了些什麼，導遊一下子看起來很擔心的樣子。

「他說我們得跟他走，」導遊說，「他要我們跟他去警局，他要問你一些問題。」

那個胖男人站在那兒，嘴巴張得老大。我想，現在是離開這群人的好時機。我離開了廣場幾分鐘，回來時，一個中年婦女正在旗杆前拉開布條。一個便衣用力扭住她。下一個抗議者也是個女的，她站到旗杆右邊，把雙手放在頭上，兩個便衣跑過去強迫她把手放下。

我發現旁邊有個義大利觀光團。我當下感到無望，因為他們個個衣著亮麗，但我還是把棒球帽拿下假裝成歐洲人。中國導遊講義大利文，我裝作聽得懂的樣子，想像他正在說：「大黃星代

表.....」但是在不遠處，一個平頭便衣看我看得很緊，然後他跟另一個便衣說了些什麼。我知道是離開的時候了。

突然，旗杆那裡有事情發生。十多個男女同時喊起口號，舉起手，拉出另一塊布條。便衣趕過去，開始拳打腳踢，有人哭叫。一個男人跌在地上被踢，又再被踢，又再被踢。一個接一個，抗議者被拖走了。

最後，一個小孩站在那裡。她約七歲，可能是跟父母一起來的，但所有大人都已被強拖進小客車。女孩穿了件綠毛衣，頭上綁綠緞帶。警察帶她走向車時，她的頭垂得低低的。

義大利觀光團盯著那部車子，沒有人說話。沉默跟混濁的空氣一樣沉重。那小孩是最後一個被帶離廣場的信徒。

Cadres (幹部)

Censorship (審查)

Cities (城市)

Civil Society (公民社會)

Confucius (孔子)

Constitution (憲法)

Consumer (消費者)

CPPCC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回到辦事處，我把外國報紙對抗議活動的相關報導歸檔，也寫下我自己的感受。但我實在搞不懂，不管是對週年慶或是在廣場上看到的事都是如此。學者常談到，這些現象顯示社會正朝著有法令的方向走，而我的想法是，當中國的改變塵埃落定後再做回顧，這些現象將



像是從一個點有邏輯地移動到另一點的過程。然而生活在這個過程中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可以在「好萊塢」吃飯，身邊圍繞著妓女、黑市商人與非法交易金錢的人。然後，我可以在騎了十五分鐘車後，看到某個人因為把手舉高而被逮捕。

從個人的角度去看，比較容易理解。最坦白地說，在中國，人們會犯法是很自然的事。政府有數不盡的法令規章，其中很多是不合理的。這個國家改變得那麼快，即使是合理的法令也很快就過時了。實際上，我熟識的每個中國人都在做著某種不合法的勾當，違規程度通常很小，所以他們並不擔心。或許是簡略不完整的公寓註冊，或是跟沒有執照的批發商買賣商品的小生意。有時，甚至是可笑的，例如說在深夜，我總會看到北京人出來遛狗，因為正式的養狗執照貴得離譜。這些通常是長得像老鼠的北京犬，牽著牠們的主人看起來睡眼惺忪，但一看到警察就馬上醒了過來。他們是帶玩具狗散步的游擊隊員。

不管個人有什麼問題，那是他自己的問題，只有他自己可以解決。感覺不到國家有合理的體系，人們很難對別人的問題感同身受。法輪功被鎮壓，照理說應該讓大多數中國人反感——那群人除了做了一連串對政治的錯誤估算之外，實在沒做錯什麼。但一般民眾很少對那些信徒表示同情，因為他們無法想像這個問題跟自己有什麼關係。在某部分上，這是文化特質，中國人從來就不是社群關係強烈的民族，家人和近親才最重要。缺乏合理的法律條件下，使得人們完全只專注在自己的問題上。

外國人必然會覺得更加隔絕孤立。我跟其他人處在同樣的環境裡——模糊的法令、有必要的違規，但我在這體系中的籌碼更小。不管我對廣場上的抗議者有多少同情，我始終隔著一層牆看著他們，因為我

永遠不可能會處在那種情況下。我不可能被警察打死，或者送去勞改。我最糟的狀況不過是被政府趕出中國。這有時讓我很困擾：我在中國的生活，好像是我所觀察的事件中的一個諷刺。但是，處在事件中很難找到時間多想，通常我要做的只是把事情辦完。我跟所有民眾唯一的連結是——我們都是冷漠現實的。

那年春天，在投了一年多的詢問信後，我終於接到《國家地理雜誌》的一個案子。他們要我去看中國的一些考古遺址，但我必須得到正式的資助，才能申請短期記者簽證。中國政府不會允許一個非法住在北京的作家自由做採訪報導。

幸運地，我申請到了第二份護照。我飛到香港，換護照，辦記者簽證。之後我用我的新簽證跨過邊界到深圳，然後到考古遺址。調查結束後，我飛回香港，換回我的舊護照，再越過邊界。

我知道，對任何正好注意到我的中國官員，這樣的過程看起來很可疑。如果他們仔細調查我，會發現一些粗略的細節：我沒有合法的工作，也沒辦理登記我住的公寓。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雅寶路，跟維吾爾人和中間商人往來。在北韓邊界被搶後，我向警方報過案。四年前美國政府以和平工作隊的志工身分送我到中國，而該團卻是冷戰高峰時期成立的組織。

我推測中國當局其實洞悉一切，但那跟一下子什麼都知道是不一樣的。這是我的猜測，我的感覺一向是政府比較善於收集訊息，但不一定會分析它們。只要一想到他們的檔案，我就會想像這些檔案跟《華爾街日報》的比起來，一定是無限大。而且，是按照某種比英文字母更加奇特的系統來排列的：我的記者簽證可能被記錄在某一處，我的商業簽證在另一處，而我那假造的公寓登記又在另一處。

如果湊巧被注意到，我在中國的一切可能會一下子就曝了光。這份擔心老在我心裡盤旋，尤其是現在我找到了更多的報導工作。五月時，我首次把文章賣給了《紐約客》，它刊登了我在丹東被搶的故事。我跟他們提到一個有關深圳的案子，編輯同意了。最後我放棄了剪報的工作，那年的世界經貿會議後（又一個一天三百美元的零工），我發誓我再也不寫小冊子和宣傳品了。我下決心要從事全職的報導工作，我要合法的身分。

從報紙拿執照比從雜誌容易，那也是我後來跟《波士頓環球報》達成協議的原因。他們要找一個在北京兼差的特約記者，無給薪甚至也沒有津貼，但只要我把需要的文件備齊，他們會幫助我拿到資格。中國外交部需要無止境的申請文件：履歷表、自傳、公司執照、介紹信，以及專業資格證書：

本文茲證明何偉是一位完全合格的新聞記者，他的經驗和擔任特派員的要求相稱.....

我什麼都自己來。伊恩給我看《華爾街日報》以前用過的舊申請表，然後我創造出自己的版本，寄到《波士頓環球報》讓編輯簽名。文字很重要，每個用字都要很正式。細節也要交代得很清楚。另外即使沒有真實憑據，我也必須在紙上創造出一個正式的人生，萬一出問題時可以派上用場。我宣稱過去一年住在香港和美國。我在北京《華爾街日報》的地址上，創造了一個《波士頓環球報》辦事處。伊恩簽了名、蓋上了報社的章。在警察局，我報戶口說，我住在外交部附近，而那是個我連一晚都不可能住過的地方。

在我的自傳裡，我創造了一個學歷和經歷俱佳的新聞記者檔案。這個人擁有大學的雙學位，有深厚的教書和寫作的背景。他從事中國研究，但是對政治、宗教或人權一概沒有興趣。對新疆與西藏都不在意。他喜歡寫商業故事。他很聰明，但沒有聰明到讓改革開放弄得眼花繚亂：

親愛的新聞專員：

過去二十年裡，經濟改革帶給中國巨大的改變，這既包括生活水準明顯的提升，也包括跟外國之間新的往來。中國進入世貿組織，反映出中國在全球經濟上的重要性，世界不能忽視對今日中國的報導。身為美國最大的報紙之一，《波士頓環球報》相信，中國報導對我們的國際觀至關重要.....

\* \* \*

到了五月，黑市匯率降到八點六人民幣兌一美元。波拉特到了下午通常很閒，我們在維吾爾餐廳的露台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他們不再把啤酒放在下水道裡，老闆終於買了台冰箱。那是另一個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大改變，但老實說，我已經開始懷念從前。在北京，讓你多愁善感的事，往往不過發生在一年前。

這座城市安靜地度過了北約轟炸一週年。沒有任何示威或公開紀念的活動。外國報紙有幾則報導，但也僅只於此。晚上愈來愈暖和，我們在餐廳裡坐到很晚，看著貿易商們來來去去。他們的這些事都已經變成了掌故：在黑色奧迪車內換貨幣，或用菸蒂燒自己的手掌。

有一天，一群北韓使館的人到餐廳午餐。波拉特跟幾個維吾爾朋友正在那兒吃飯，他們看了一會兒那些北韓人。最後，波拉特站起來，走到他們那桌。

「我喜歡那個胸針，」他指著其中一個人衣領上的金日成人像，「我用一塊美金跟你買。」

那北韓人不理他。波拉特說：「兩塊美金。」

北韓人站起來，麵還沒吃完就走人。我們再也沒有在維吾爾餐廳見過他們。

\* \* \*

那年夏天，波拉特買了一個新的身分。那一天，在美國使館附近的成衣市場，他碰到一個自稱為「簽證顧問」的中國人。他們聊了起來，那人給波拉特他的名片，上面印著：文化交流公司。

波拉特去了那家離雅寶路不遠的公司。只要美金八千八百塊，那人說他可以安排一切，包括文件、簽證、機票。波拉特後來又去了幾次，確定可以信任那家公司，最後同意讓他們辦理。

第一步要做的是，捏造一個可信的故事。那人仔細看過波拉特的護照，記下他之前所有的出國紀錄，然後，他做了另一個完全符合那些紀錄的身分證。他決定，波拉特應該有個中國大學的高等學位，在一個跟全世界都有高級貿易往來的公司做事。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富有。

那人透過關係拿到新的證件。一張有政府蓋章的證書，證明了波拉特的學位，另一張證明了他是一家大貿易公司的老闆，一家銀行證明他有相等於約三十萬美元的存款。他拿到一張新的中國居民身分

證，寫著他有四個小孩。在有這麼多孩子要養、這麼多錢存在銀行的情況下，波拉特出國之後一定會回國。美國使館沒有任何理由懷疑他。

直到一切都安排好了，波拉特才跟我提到他的新身分。解釋他的計畫時，他強調，就法律上言，那個新身分不是假的。所有的文件都是完全合法的，只有文件裡的資料是假的。就紙上文件而言，波拉特的新身分再真實不過了。

而美國方面更加簡單，不需要政府文件，也不需要銀行證明。文化交流公司在洛杉磯有個聯絡人，他做了一封有偽造公司抬頭的信，發出邀請函。那封簡短的信是用簡明英語寫的：

親愛的波拉特先生：

我很高興能邀請您在二〇〇〇年十月來美國做兩個星期的訪問。

本次訪問的目的是參觀我們的產品，以及跟一些美國公司見面。美國有很多做同類產品批發的公司。無論如何，您必須親自來看看產品並議價。

去美國大使館簽證面談的前一天，那顧問跟波拉特套招套了五個小時，確定所有故事他都沒記錯。這些故事描述了波拉特所經歷的每一趟旅行，以便證明他的新身分，即使是那些不好的經歷，像是在尼泊爾爛掉的葡萄、在哈薩克被蟲蛀的衣服，都造就他成為一位精明的商人。並且，一步步讓他成為一個有錢的人、四個孩子的父親，以及計畫到洛杉磯做兩星期的例行出差的企業負責人。

實際的面談僅僅不到五分鐘。後來，波拉特記得那官員只問了兩個問題：要去美國多久？是不是如同護照上寫的，在新疆出生？波拉特回答：「兩個星期」，以及，「是的」。那官員就在他的護照上蓋了章，說：「歡迎來到美國。」

【古文物D】

## 龜之聲

如同在安陽發掘的眾多古文物，地下城市同樣是透過文字的力量再現的。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安陽是最小心翼翼挖掘的一個地區，這裡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追溯到甲骨上。幾個世代的中國人，包括拿著地圖的考古學家、拿著洛陽鏟的農民都來到這裡，尋找東亞最早的書寫文字。

搜尋始於一場疾病：一個生病的人，一個生病的國家。一八九九年，在北京，王懿榮得了瘧疾，醫生開了一張傳統的藥方給他，上面的藥材包括「龜甲粉」。他從藥房買了一片老龜甲。磨粉之前，有人注意到上面刻著的圖案似乎像是中國古代的文字。身任清廷朝臣和國子監祭酒、同時也是古代金石文專家的王懿榮研究過後，決定把其他的龜甲都買了下來。

如今很多歷史學者相信那個瘧疾的傳說是假的，對甲骨再現的真實時間也有爭議。但王懿榮是第一位認真收集這些有刻字的龜甲的人，則是不容懷疑的事實，而且他也確實是跟北京的藥局買的。在那裡，這些東西被叫作「龍骨」，後來的中國學者稱它們為「甲骨」。

這些古文物現身的時機很不湊巧。它們出現於十九世紀末的鴉片戰爭後期，那時中華帝國正一片接一片地瓦解著：緬甸北部和九龍割給英國，東京（遼陽）和安南（越南）給了法國，日本拿了朝鮮和福爾摩沙（台灣），俄國得到了滿洲。德國得到了開礦的特權，法國持有修建鐵路權。美國聲明徹底否定帝國主義，他們的門戶開放政策乍



聽起來好像在保護中國，但事實上多少是一樣的。愈來愈多的外國傳教士和外國商人來到了中國。到了十九世紀末，在山東，排外的憤怒激發了下層社會的農民和勞工，他們結黨成群，自稱為「義和團」。義和團以外國傳教士和中國的信徒為目標，殺戮搶劫。暴動擴散到全國後，清政府表面上制止，但私底下很多官員對民眾的憤慨卻心中竊喜。

時局雖然不穩定，王懿榮還是很快地解讀出甲骨上的刻文，這是這些中國古文物真正神奇的地方，打從再現的那一刻，它們就可以被解讀出來。甲骨文不像埃及的象形文字，後者一直要過了好幾個世紀，等到刻有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詔書的羅塞塔石碑被掘出後才能解讀。至今，漢字仍是人類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統。王懿榮猜測，這些龜甲可能會把中國的書寫歷史往前推。他相信，中國的歷史可以被追溯至商朝，而那是一個被十九世紀的外國學者描述為神話的朝代。商朝被視為虛構的原因在於，此前，除了極其簡短的青銅器銘文之外，尚無商朝文字出土過。

但是義和團的動作遠比王懿榮快。他們殺掉了外國傳教士和工程師，他們切斷了電報線，拆毀了鐵軌。到了一九〇〇年夏天，外國聯軍開始在條約地所在的港灣聚集，並與清朝的軍隊正面衝突。該年六月，清廷最後站在義和團一邊，對外國聯軍宣戰。在北京，暴徒圍攻外國人，將他們逼進教堂和使館裡。

身為清朝官員，王懿榮被任命為北京一群義和團軍隊的統帥。他不情願地領命，他知道清廷很弱，但也知道責任比理由更重要。八月十四日，二萬名八國聯軍輕易地攻占了北京。聯軍從東邊攻入都城，慈禧太后帶著年輕的皇帝倉卒往西逃到西安。王懿榮不想逃跑，心中

的恥辱更是無處可逃。在城中心附近的錫鑪胡同，這名學者在妻子與長媳的陪伴下，服毒投井自殺。

王懿榮自殺後，大約一千片的甲骨片被他的好友學者劉鶚接收。

王占曰：「有崇，其有來艱。」

登人三千，以伐邛方，我受佑。

旬亡（無）禍。

\* \* \*

這些甲骨是家畜的肩胛骨和烏龜的胸甲，它們被拿來使用可能是因為表面平坦而適合寫東西。在商人的儀式中，這些甲骨的背面因為被刻意鑽鑿出小凹缺而變得比較薄。貞人（卜卦的人）用火炆燃燒那些凹缺，直到甲骨的表面出現了龜裂的痕跡。不知怎地，就在這龜裂的時刻，他們捕捉到了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聲音——除了商朝的歷代祖先，還有各種掌控大自然風雨洪水的力量所發出的聲音。獻上祭品，商人就即將發生的事情加以探問。這種占卜後來被稱作是「龜之聲」。

裂痕由商王和其他貞人解讀，他們的解讀被刻在甲骨上，今天我們讀到的是其敘述的回應。我們常認為書寫就是歷史，而傳統中國文化的特色，一般認為有把遙遠的過去理想化的傾向。但諷刺的是，中國的考古發現最早的書寫文字其實企圖預卜未來。

旬亡禍。

王往田，湄日不邁大風。

帝弗終茲邑。

最長的甲骨文不到二百字，而大多數要短得多。除了青銅器上發現的一些銘文之外，它是已知商朝文字的延伸。考古學家相信，跟安陽這塊地區後來的文化一樣，商人也在竹片上刻字，但問題是，竹片在中國的中部平原毀壞得很快。在安陽，雨水很容易地滲入乾土，易腐爛的東西不耐保存。這個特性也使得中國考古跟世界其他地方的考古不同。古埃及文獻能夠存留許多世紀，是因為此地氣候乾燥。在地中海東部沿岸的近東，古文化寫在耐用的黏土板上，考古挖掘出一堆文件，諸如皇室的占卜、稅收紀錄、學童的功課，從中你可以聽到帝王的聲音，也可以聽到蘇美小孩的話語。但從商朝傳來的只有龜之聲：

夕亡禍，

王夢祖乙，

卯（劈）三牛，伐（祭）三十羌（山鹿）、三十羊，祭於父乙。

甲骨本身有老象牙之美。埋在地下的幾個世紀讓它們呈現淡金色，歲月也讓它們遠離了工藝的刻意裝飾。無人確知，龜甲背後那些小凹痕到底是用什麼工具刻成的，我們從未發現商人的鑄刻器具，此外商人是如何拿到這麼多甲骨片的，也不清楚。這些甲骨跟創造它的活動完全沒有關係，好像是一本從天上掉下來的天書。

\* \* \*

劉鶚博學多才。他是個學者也是個醫生，此外他開紡織廠，還是個鹽商。他專精於算術、採礦、鐵道和水利工程。他曾建議朝廷如何防治黃河水患。他也是位優秀的古文物收藏家，那也是為什麼他會收購王懿榮的甲骨。跟王懿榮一樣，劉鶚的動作很快，他將龜甲上的文字拓印下來，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了第一本甲骨文的書《鐵雲藏龜》。

但是一碰到外國人和政治，劉鶚的運氣和王懿榮一樣差。不久之後，他因私售官方倉粟給外國人而遭彈劾，一九〇八年被流放到新疆（可說是中國的西伯利亞），一位學者的生涯就這樣結束了。一年之後，劉鶚死於異鄉。

行斬首之祭於丘商，  
告王目於祖丁，  
巨難將至，（某人將）傳厄訊。

\* \* \*

有個詛咒似乎跟甲骨形影相隨，或許是這些古文物把蒸餾出來的詛咒滴入這個中華帝國。清末是段困難時期，一如劉鶚在他的小說《老殘遊記》自序中說的：

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國家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另一位詛咒的犧牲者是端方，他是清朝的總督、巡撫和中國最傑出的古文物收藏家之一。端方尤其鍾情於青銅器（他的一些收藏目前保存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堪薩斯的尼爾森—阿德金博物館）。甲骨也吸引了端方的注意，據說他以每個拓印文字高於三盎司銀兩的價格來收購。端方所委託的中間商，是最早追蹤這批古文物到安陽的人之一。

端方以對外國人的開放態度出名，例如說在義和團暴動期間，他就在轄內的陝西省庇護了不少傳教士。八國聯軍平息義和團後，清政府被迫道歉並賠償損害，最後不得不著手進行重要的現代化變革。一九〇五年，皇帝下詔派任五名特使出國，到西方各國考察外國政府，學習如何創立一套中國的憲法。端方和另一名官員被派率領一支以美國和歐洲為目的地的代表團。

一九〇六年一月，端方帶著六十名隨員、七百五十件行李，每件都貼著中英文的「中華帝國皇室特使」標籤，抵達了舊金山。那個時機有一點奇怪，因為當時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是禁止華人入境的，但老羅斯福總統宣布清朝特使不在此限。精琪（Jeremiah W. Jenks）擔任老羅斯福的私人代表，在舊金山對代表團發表歡迎演說：

當然，就如您和兩個國家的所有人民所了解的，美國的政策是排拒華工。但是另一方面，對於其他階級，包括學者以及處理政府事務的卓越官員，我們是非常歡迎的.....

根據現代報紙所報導，清廷代表團運用他們的特權，至少偷渡了一名在船上跟他們變成朋友的中國工人。

那趟行程頗為成功。端方的血統一半是滿人一半是漢人（有時他身上帶著兩張名片，寫著他的滿漢兩個名字），而且他也惹人注目。到西點軍校參觀時，他穿著一件貂皮長袍（那裡是攝氏零下二十度，端方對那裡的電動門和自動削馬鈴薯器特別感興趣）。他在白宮的藍室見到老羅斯福總統。他參觀了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美國財政部，以及標準石油公司。他也在內布拉斯加州停留，參訪了那裡的感化院。在歐洲，他對那裡的軍隊制服大表讚賞，回國後，他學著穿中華皇室護衛的制服拍照。

不過，他也學了一些在中國不是那麼容易被接納的外國習慣。一九〇九年，他被指責在慈禧太后的喪禮上有失尊重，被免去巡撫之位。原因是端方犯了忌諱，允許攝影師拍攝儀仗照片和喪禮最後的影片（端方還允許他們用陵墓內的樹當電線杆）。去職之後，端方被派去監督外國人資助的國家鐵路建設。此時，反清和反滿的浪潮不斷增高，到了一九一一年十月終於爆發，武漢的一個兵營發生了暴動。起義很快就獲得了能量，朝廷委派端方運送清軍至四川。

此時，他麾下的將領倒戈。最後，端方雖然試著讓叛軍相信他是漢人，而非滿洲人，但已經來不及拿出另外一張名片。叛軍砍下他的頭，把他的身體葬在四川，頭提到武漢，作為他們決心推翻滿清的冷酷象徵。

在世界的另一端，一輛前往堪薩斯市的火車上，孫中山在一份丹佛報紙上讀到了武漢起義。聖誕節時他回到中國，隔年一九一二年元旦，他接受新的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之位。清末代皇帝溥儀於二月十二日遜位。不久，孫中山失權於強勢的軍閥袁世凱。袁世凱的兒子娶了端方的女兒為妻。但是，孫中山和袁世凱都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

領導國家，到了一九二五年，兩人先後去世。中國的未來面臨著一片威脅——軍閥、外強和預期中的內戰。

其寧風三羊、三犬、三豕，  
今亡厄訊，  
旬亡禍。

\* \* \*

打從一開始，北京的藥局就很聰明地不洩漏他們的「龍骨」來源。為了獨占市場，他們對這些很快流行起來的古文物的出處撒了謊。到了一九〇四年，讀了劉鶚的書之後，外國人開始蒐集甲骨。這些早期的收藏家很多是傳教士：方法斂教士、庫壽齡教士、柏爾根教士。通常，他們把這些古物賣給或捐給博物館，例如卡內基博物館、大英博物館，以及皇家瑞典博物館。

沒多久假貨就出現了。在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場，工匠們學會把商代文字刻在骨片上，他們也學會了識別誰容易上當。柏爾根教士驕傲地向懷特學院展示了七十塊甲骨，結果發現大部分是假的。而同時，中國的收藏家像是端方，則找到了真的出土處，並派中間商去了安陽。安陽當地的農民發瘋似地開始挖掘。一九〇四年，一隊調查團跟居民起了衝突，爭鬥之後雙方吃上官司。最後，一個討厭的地方官吏下令說：不准再挖掘甲骨。

在安陽這樣的地方，禁令是沒什麼用的。農民隨天候和政治的韻律而行：洪澇乾旱造成收成不好，或戰亂打斷耕種季節時，他們就挖甲骨，能挖到什麼全憑運氣。一九〇九年，一個叫張學賢的地主在收

成馬鈴薯時，挖到了一堆壯觀的龜甲片。村人們常說張學賢因為挖菜園而致富。故事廣為流傳，結果後來一群盜匪把張學賢給綁票了。

張學賢的家人要快速籌到贖金的辦法只有一個：他們允許其他村民在他們的農地上挖掘，條件是挖到甲骨所賣得的錢，村民得跟他們五五分帳。那些農民分成三群，很快地全往同一個目標挖去。當三條地道愈來愈靠近，土地終於坍塌了，四個人差點兒被活埋，張學賢的贖金挖掘行動也因此畫下句點。

王（卜）曰：「有猛雷。」

王（卜）曰：「大吉。」

今夕亡禍。

\* \* \*

甲骨出現在一個不僅僅只有政治或經濟危機的時期。到了二十世紀初，西方軍力已證明比中國的強，外國的政治體系明顯比中國有效率。有些中國知識分子甚至認為，連歷史都是對西方有利的。西方的改變很自然：法老王不見了，希臘亡了，羅馬滅了。沒有沉重的歷史和孔夫子學說的包袱，西方人好像可以看得比較遠，而非只有「今夕亡（無）禍」的短視——西方人眼中可以看到有形而長遠的未來發展。

西方歷史也好像比較有彈性。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那些關鍵時期，歐洲人藉由融入對他們而言半新半熟的古代價值，把文化轉型了。即使考古學也很能融入西方傳統的改變。十九世紀時，新的考古學規則由新興的中產階級主掌，他們對古代的研究描述——從石器到青銅器再到鐵器，反映出現代人對材料演進的信任。



但是在中國，知識分子往回看時，除了更多的中國歷史外，什麼也沒有看到。帝王和朝代，帝王和朝代——無盡的時間循環。就在世紀更迭之際，文化突然讓人覺得窒息，激進分子提議廢除幾乎所有跟傳統有關的東西。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一群飽讀古書的知識分子自稱為「疑古派」。他們認為，早期歷史文獻都經過了後代的不斷改寫。在這些懷疑論者看來，像夏和商這些早期「朝代」的存在缺乏證據。他們把歷史看為一個網——一張用保守的傳統編織成的，困住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網。

這些懷疑論者把甲骨視為偽造物而放棄。相反地，傳統中國文化的捍衛者則努力地解讀這些甲骨，希望證明它們是真實可信的。其中最傑出的學者是王國維，他用甲骨上的刻文，突破性地重建了商朝的帝王族譜。藉由研究這些古文物上出現的名字，把它們跟古史相比較，王國維證明了，那些甲骨和史書可以吻合。他的研究是讓商成為真實歷史的關鍵一步——商文明留下了可信的證據。

對於王國維，這些甲骨只是他對過去執迷的一種表現。他是一個忠貞的保皇派，全心相信清朝應該復辟。退位後仍住在紫禁城裡的清末代皇帝溥儀，想法跟他一樣。在那朱紅色的皇宮深苑圍牆裡，生活依舊，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時間還是照著清朝的日曆走，溥儀還是按傳統規矩行事。一九二三年，溥儀授予王國維「南書房行走」一職，擔任古董書畫的鑑定工作。那一年，王國維住在氣數將盡的皇宮裡研究古書畫、蒙塵的簡冊，以及在歲月中泛綠的青銅器。一九二四年，一批軍閥終於逼迫「皇帝」放棄紫禁城的生活。不到三年之後，王國維終於意識到清朝真的滅亡了，他在頤和園的昆明湖投湖自盡。王國維死後，陳寅恪在紀念文〈王觀堂先生輓詞〉的序言中寫道：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幾年後，考古學家終於把疑古和信古的人拉攏在一起。懷疑論者對原則總是特別關心，他們指出甲骨缺乏「科學方法」的挖掘。同時，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各地的知識分子也發出要學習西方科學和哲學的呼籲。甚至傳統人士也支持考古學，希望藉由挖掘，最後能找出證明商朝的證據。一九二八年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選上了安陽，它是歷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人組織挖掘的考古遺址。

學者們知道國家正逢危急之秋，他們的時間不多。名義上，國民黨統治著中國，但是到處都有危機：軍閥控制著北方，共產主義在內陸壯大，日本入侵了東北。接下來的十年內，事件進行得很快，安陽的挖掘也跟著加快了腳步。一九二八年，靠近洹河西邊河堤的探勘，挖出了七百八十四片有刻文的甲骨。同年，日軍炸死當時的東北軍閥首腦張作霖，扶植滿洲國作為侵華的基地。為了避開北方的混亂，國民黨正式在南京建都。在國民黨的打壓下，年輕的毛澤東逃往內陸，加入江西的蘇維埃政權。

就這樣，一年過一年，到了一九二九年，考古學家在安陽挖出一片片象牙、動物骨骼，和上面有刻文的龜甲。一九三〇年，共產黨占領長沙十天。一九三一年，日本完全占領了滿洲。而在安陽，考古學家發現大象下顎，還有一片鯨魚肩胛和脊椎骨——鯨魚的發現讓他們大吃一驚，因為安陽離海洋好幾百公里。一九三二年，溥儀同意至新成立的滿洲國「執政」，成為日本人的傀儡，一個住在長春的假皇宮的假皇帝。一年之後，在國際批評壓力下，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一九三四年，安陽的考古學家發現了四座大型的陵墓，它們極有可能屬於商王。他們到處看到祭品的痕跡：一排排整齊的頭顱，小心排列的沒有頭部的骨骼。往南，在國民黨的壓力下，毛澤東帶領共產黨放棄了江西，展開了後來所稱的「長征」。一九三五年，在中國簡短的考古學史上，安陽的挖掘集合了最多的工作群：一天有五百個農民從事挖掘。那一年，他們打開了十座王陵大墓以及一千座古墓。更多骨骼，更多頭顱。骨頭與青銅器。長征到達陝西後停止。

旬亡禍。

今夕亡禍。

\* \* \*

甲骨文跨越了約二百年，止於西元前約一〇四五年，從上面的刻文可以清楚地看到時間的記載。商人遵循著一套嚴格的曆法行事，某個日子祭祀某個祖先。在那些日子裡，他們敲裂甲骨，獻上祭品，刻下卜辭。重要的王室成員死後，就有自己的忌日。祭祀曆表隨著每代而不斷擴大。從某種角度而言，它為三千年後北京被共產黨統治提供了前兆——歷史是那些敏感日期的不斷累積。

在商朝，愈是早期刻下的內容愈詳細，它們常常反映了商人的恐懼，諸如針對部落的名字、王室成員的病痛，收成和氣候的問題。日常行事裡有不少官僚的繁文縟節，許多卜卦者的名字也出現在骨上。有時，骨上會同時記載著對未來的預言，和那預言後來是否成真。

隨著時間演進，像這樣的細節愈來愈少。後期的甲骨文趨向簡單，而且有慣例可循：「旬亡（無）禍。」即使字體有所改變：從早

期的大而不規則，到後期的小而統一。給人的感覺是，這些常規經過幾代之後已經變得非常精確。到了商朝最後一個王時，歷史已經很長了——他給王室世系的奠基者獻上祭品，他們之間已經相距二十二代了。「旬亡禍」這句文字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出現，像句祈禱文。真實歷史上，商朝一定遭逢難纏的敵人，因為他們最終還是被鄰近的對手周人所征服。但是一直到最後，甲骨上刻文如常，看不出商朝文明有受到任何威脅：旬亡禍。

一九三六年，安陽的春季挖掘計畫打算在六月十二日告一段落。最後一天下午四點鐘，挖掘的人很驚訝地在一個標為H127的坑穴中發現為數極多的龜甲片。在一個半小時之內，他們挖出了大約三千片。那次挖掘是由一位年輕的考古學家石璋如所率領的。

一年後，石璋如和其他人為了安全而離開安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占據南京，屠殺了數十萬百姓。國民黨退到內陸，在長江畔的重慶設立臨時政府。考古學家們則變成難民，帶著在安陽發現的大部分重要文物遷移。坐火車或船，用卡車或推車，他們帶著這些古代珍藏穿越中國。最後，當日本投降，共產黨壯大後，國民黨再度撤退，這一次是到了台灣。很多考古學家帶著甲骨和其他古文物一起，跟著到了台灣。

不過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上述一切尚未發生。石璋如的紀錄中這樣寫著安陽的情況：

我們很自然地把工作延了一天，希望這會讓我們有充足的時間完成清理這些令人驚訝的資料。但是，真的，事實常比小說更奇怪。發現的樂趣遠比預期的更大！H127的資料不像其他地下城

市的沉澱物，一點也不混亂無序。相反地，它們被有規則地聚集在一起，所以，很明顯地，新的挖掘和記錄方式是必要的。

四天四夜，考古學家和農民挖掘著那堆甲骨和土。它重達三噸，包括一萬七千多片的骨片，這是到目前為止所發現過的最大一批甲骨片。那裡沒有路，工作隊用鐵絲把那數量龐大的古文物牢綁在木板上。他們把這些甲骨片推到火車站，再用火車載到南京。石璋如的記載還有另一段細節：

和這些被歸類的古文物同時被發現的，還有一具人骨。

## 第七章 夜空不寂寞

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每個工作日的晚上，宵禁之後，艾蜜莉在睡前會收聽一個廣播節目。在首飾工廠，她跟四個女人住同一間宿舍，她們一起坐在艾蜜莉的床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一台收音機上。由於是祕書，她們在住的待遇上比作業員好一些，後者十個人分一間宿舍。但是這座工廠裡，所有女人收聽的都是深圳電台的同一個節目，叫作「夜空不寂寞」。每晚預估約有一百萬名聽眾在收聽，主持人胡曉梅可能是這個一夜之城最有名的女人。

在艾蜜莉和她的同事看來，胡曉梅是一個影子人物。這個電台女主持的一些生活背景曾被深圳的雜誌報導過：她快三十歲，最初來深圳當工廠女工。她不高，也沒有驚為天人的美貌。她未婚，很少提到自己的私生活，就算提到，也是拐彎抹角的。只有像艾蜜莉這樣仔細的聽眾，才能把這些有限的細節拼成某種有形的樣貌。「聽得出來，有個有錢男人愛過她。」有一次艾蜜莉跟我說，「她可能有想過跟著他，但後來還是沒有。雖然跟著他日子會很好過，但她還是決定靠自己。如果沒有那樣做，她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功。」

雖然很少細談自己，但胡曉梅卻有著讓別人講出自己的經驗的天賦。「夜空不寂寞」是個叩應節目，很多聽眾是用工廠宿舍的電話打進來的民工。有些談到工作上的麻煩，或家庭裡的問題，但大多數人討論的是感情。某個聽眾可能擔心著在鄉下老家的情人，或談著某次不好的分手經驗。有時，同一個人會打電話進來好幾次，她的故事連

續談了一整個星期，在這個每間宿舍看起來都一模一樣的城市裡，工廠的行事曆固定不變，但電台的故事卻有著無窮盡的變化。對艾蜜莉和她的同事最有吸引力的，是那些不尋常的故事：「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打電話說，她有很多一夜情。她可能在酒吧碰到一個男人就跟他回家。她想停止，找一份穩定的感情，但就是還沒找到。胡曉梅沒有批評她，她只是聽著。」

在艾蜜莉眼中，那個電台主持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這一點。

「她不做籠統評斷。她視每個打電話的聽眾的狀況而定。」胡曉梅可能會毫不留情地批評，她不怕給出明確意見，但她也知道什麼時候最好保持沉默。這位主持人有一個飽滿沙啞的聲音，講話的速度很慢。她從來不會生氣或者不耐煩。很多打電話的聽眾都是某種固定的類型：年輕女孩問婚前該不該跟男友住在一起。在中國內地，家庭壓力大，同居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深圳的年輕人，只要沒有宿舍宵禁的限制，做這類決定的自由比較大。只要一有人打電話問該不該住在一起的問題，艾蜜莉和她的同事都會很仔細地收聽。「大部分傳統的人會說你不該那麼做。但是，只要那女人聽起來夠成熟，而且考慮過各種問題，胡曉梅會說同居無妨。」

到了一九九九年底，艾蜜莉已經在首飾工廠工作滿兩年。二十三歲的她是部門裡年紀最大的一個。隨著時間過去，她了解了工廠的社交動態：不同員工之間的關係，台灣老闆的本性。他還是會糾纏工廠的漂亮女孩，大家也都知道他常嫖妓。但是他個性很軟弱，艾蜜莉可以看穿他這一點，她不怕他。

在公司的第二年，所有湖南來的工人聚集在一起要求加薪。在工廠世界，同省連線的力量是很大的。老員工會帶來同鄉的新人，有時候整條生產線的人可能都來自同一個村莊。工作時，他們可能全用故

鄉話交談而沒有外人聽得懂。有些老闆會刻意不雇用太多同一個地方來的人。之前找工作的時候，艾蜜莉有時會看到這樣的要求：四川工人不要，或，江西工人不要。

艾蜜莉廠裡有二十名湖南員工，大多數是男的，有幾個還是親戚。所有人都在生產線工作，在那裡，無特別技能的工人一個小時只能賺到十二美分。唯有接到緊急訂單，加工趕貨那段時間，他們才能賺到比較像樣的薪資。

湖南人暗地裡計畫了一兩個星期，然後他們在同一天集體辭職，大多數說是因為家裡有急事。他們把辭職信交到艾蜜莉的辦公室，她送到老闆那裡，老闆頓時手腳大亂。所有湖南人都走了的話，生產線會被迫停工。

老闆向他的鄰居請教。鄰廠也生產首飾，那個台灣老闆能力比較強，也比較了解外地來的工人心理。他來到艾蜜莉的工廠，跟那些湖南工人見了面。剛開始，他傾聽他們的抱怨，找出誰是帶頭人。之後，他花了些時間教訓了那群人的盲目之舉。最後，私下裡，他給帶頭的幾個人和他們的親戚調高了薪水。

所有人都回到工作崗位上。有些工人還是一小時賺十二美分。慢慢地，接下來的一年間，老闆把某些工人解雇，他小心謹慎地找替補者，直到最後，工廠裡連一個湖南男性工人都沒了。

祕書間的流動率也很大。她們都受過些教育，每個二十幾歲的女人都有很多事要考慮：要不要結婚生子，要不要回家鄉。她也許會另找工作，或許自己創業。艾蜜莉的信常提到變動和新的機會：

露露可能會辭職，不久可能會自己創業。她的一人公司要叫作千千珠寶首飾公司。盧芸在等著有一天老人（露露和我）都走



後，她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除了我們三個，辦公室裡還有一個叫何金寶的會計。她可能不會待很久，因為她的家人要幫她在湖南找份工作和一個老公。

盧芸在艾蜜莉眼中是個謎。剛開始艾蜜莉在信中描述她是個「待人很好」的女人，但是漸漸地，她的看法改變了。她感覺到盧芸暗地中傷同事們，而且她跟老闆有一腿，雖然她也常在背後批評老闆。一年之後，艾蜜莉懷疑盧芸真正在乎的是什麼。那女人似乎完全一個人在搞陰謀。

一天晚上，躺在床上聽收音機，艾蜜莉發現自己對打電話給胡曉梅的聽眾中的某個聲音特別留意。那個星期內，那女人打了好幾次電話進去。慢慢地，艾蜜莉知道自己為什麼對那個聲音特別好奇。那聲音讓她想到盧芸：「她說她只有小學學歷，來深圳工廠工作。後來她當過女傭。她覺得別人看低她，因為她是鄉下來的，所以她開始自學。最後她參加大學專科學歷考試，但因為某些原因她沒有考取，所以她就買了一個假的畢業證書——在這條街上就有賣。她真的那麼做，但她真的苦讀過。她的程度真的有那麼高。」

「用她的新畢業證書，她找到了一份比較好的工作，她工作很賣力，職位也愈來愈高。但是，她會做些讓別人無法威脅到她的事。如果有個職位比她低的同事開始往上爬，她會找個辦法讓她升不上去。她很誠實地描述這點。她只有在覺得受威脅時才會這麼做。不然，她對公司的每個人都很好，大家都喜歡她。但他們不知道她的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她也提到家人，說她怎麼寄錢回去給父母，常給父母寫信。她這些全做了，但她心裡其實並不喜歡他們，她對父母一點也不在

乎。」

「她打電話進去只是因為她想講話。不像其他打電話的聽眾，需要人家給意見。她只想講她的經驗。她講完後，胡曉梅問她：『妳難道不怕別人知道妳心裡真正在想什麼？』那女孩回答，他們永遠不會了解真相的，因為她很會掩飾自己。她說，她對自己那個樣子一點也不後悔。」

「她掛斷之後，胡曉梅說這種人是『無可救藥』。她說那女人的心又硬又冷，沒辦法。」

\* \* \*

事實上，艾蜜莉跟父母也不是那麼親近。她的父親是位有成就的數學家，是涪陵師範專科學校等級最高的教授之一。他去過美國兩次，在會議上發表論文，那種經驗在像涪陵這樣的地方是非常少見的。但這樣的成功和他曾可能達到的成就比起來，只是個陰影。當她還在讀大學時，有一次，艾蜜莉在英文作業上寫到她父親的背景：

我的父母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整個國家處在一種很大的困惑中：一開始是政治上的，知識分子被說成有資本主義傾向，他們被下放到基層單位接受改造。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從四川大學畢業後接下來的八年，他在一個小煤礦場工作。

礦場在涪陵南部離貴州邊界不遠的偏遠山區。很多知識分子會受不了，但艾蜜莉的父親在鄉下長大，他全力以赴地適應著那裡的情況。在礦場時，他一再申請加入共產黨，但總是被拒絕。就像艾蜜莉

一樣，他有著寬臉、高顴骨，眼神親切。他那安靜的平和態度總是讓人放鬆，不管那個人是否受過教育：

我會說在礦坑工作對他來說不是很困難，因為人們尊敬他，給他輕鬆的會計工作。即使到現在，他一看過帳簿就能算出收支平衡的故事，仍被當作奇人異事，在礦工之間流傳著。

艾蜜莉出生於一九七六年，當時她的父母還在煤礦場工作。那一年，毛澤東死了，文化大革命跟著結束。艾蜜莉還小的時候，她的家人得以回到涪陵。小孩們，包括艾蜜莉和姐姐，加上小艾蜜莉兩歲的弟弟，生長在一個裝點著毛主席照片和雕像的家庭。一九八〇年中期，艾蜜莉的父親最終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民盟），那是中國九個被允許的政治團體之一。在涪陵，民盟特別吸引知識分子，但就像所有的合法黨團一樣，它的組織得向共產黨報告。有一次，艾蜜莉跟我說：「老實說，他們沒有任何功能。我父親說，只要共產黨一說什麼，民盟就馬上附議。不過，當民盟開會時，他們可以談自己的想法。他們不能公開談論這些想法，但是至少他們在內部可以跟其他黨員談。」

艾蜜莉小的時候，她的父親從不跟她談政治，她相信書上說的一切。她學的是共產黨版本的歷史、政治和時事。即使是學校的空白練習簿也不見得是完全空白的。每一本簿子背後都印有兩行字：

台灣、蘇聯和越南的電台散布謠言和謊話，  
我們要求大家不要收聽敵台。

隨著時間過去，毛主席的照片和雕像從艾蜜莉家消失了。偶爾，艾蜜莉的父親會談到他不贊同國家的政治，但他說得不多。對艾蜜莉而言，大學是個轉捩點。英文系一些腐敗的幹部讓她很厭惡，她相信，很多政策是為了防止學生思考和發問而設計的。她不喜歡宿舍生活的組織，在大學第一年，她要求住家裡。她是班上唯一一個沒有住校的學生。畢業後，她在一封信上寫道：

我恨政治的偽善辭令，因為我過去都深信不疑。事實是，隨著時間過去，我看見了太多有影響力的人說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我想，我父親比我更悲哀，他在五十幾歲時才終於了解這一點。

\* \* \*

跨過時間的長河，這個家庭的父母跟女兒們反方向而行。艾蜜莉的父母年輕的時候，作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龐大實驗的一部分，他們到了鄉下。二十年之後，艾蜜莉和她的姐姐去了城市——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經濟實驗室」深圳。兩個世代的實驗完全不同：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全國性的決定，一個扎根於個別的人與個別的決定。

結果是，父母的經驗無法為子女指引方向。當艾蜜莉想到她的父親，她了解他的事業生涯大部分是由別人的決定所塑造的。「我想他有點後悔，他的一些同學出了國或做其他成功的事業。他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些機會。」對父母而言，艾蜜莉和姐姐看起來常常很任性。大學時，當艾蜜莉跟安立開始交往，艾蜜莉的媽媽並不同意。「她說我

太早有男朋友了。我說，妳結婚時比我現在還年輕！她說那不一樣。」

但是，這代溝到了艾蜜莉弟弟身上似乎最嚴重。他非常聰明，繼承了他父親的數學頭腦，但是他也非常非常害羞。這個年輕人進大學學電腦，但沒有念完。他比較喜歡讀哲學和宗教，有一陣子他對法輪功感興趣。他常說，他厭惡錢這個概念。到了二十一歲，他也從來沒有工作過，還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玩象棋上，而且，他是個講究棋盤邏輯和諧的遊戲天才。放棄了法輪功之後，他轉而研究起孔孟思想。當有一回他告訴艾蜜莉，讀孟子會讓她更美麗，因為真理會閃耀在她的臉上時，她不知該做何反應。她的家人考慮過送他去看心理醫師。問到她弟弟，有一次艾蜜莉說：「他是現代化的犧牲品。」

艾蜜莉在深圳的第一年，她姐姐再度變動，到浙江去謀職，不久就結婚了。之後，父母開始擔心艾蜜莉。艾蜜莉覺得那很好笑：「我跟安立交往的時候，他們說我太早交男朋友。現在他們覺得我快要太老了！」一九九九年八月，艾蜜莉的父親來到深圳，第一次見到了她的新男友朱雲峰。朱雲峰只念過一年的職業學校，現在是一家做加熱器、壓力鍋、電鍋和其他廚房用具的工廠領班。

艾蜜莉的父親讓她知道，他期望她找的是比朱雲峰更好的對象，但是他並沒有試著改變她的心意。他不是會脅迫別人的那種人，生活的歷練讓他可以接受不盡理想的狀況。事實上，他女兒還沒決定嫁給朱雲峰，甚至還沒想到結婚這件事。「我不喜歡婚禮這件事。很多來參加婚禮的人根本不在乎你。他們只是來看菜色如何，來看每件事準備得如何。他們只是來看你有個什麼樣的婚禮。」無論如何，關於這

些事，她並不想要父母的建議。談到個人的問題，她寧可聽胡曉梅的看法。

那個電台主持人是艾蜜莉在深圳的守護人。只要談到跟道德有關的問題，艾蜜莉就會提到胡曉梅，好像她的意見是絕對正確的。有一回，我們談到深圳未婚男女同居的事，艾蜜莉溫和地告訴我，不要直接詢問任何人的情況。她說：「在這裡，我們不會當面問人家這種事。例如，胡曉梅通常會建議你，不要跟別人說你跟某個男人住在一起，那會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尤其要是後來分手了。最好你就是什麼也別說。」

最後，在許多次的對話之後——胡曉梅、胡曉梅、胡曉梅，我跟電台聯絡安排採訪她。艾蜜莉小心地幫我做準備，跟我描述打電話進去的最有趣的聽眾，還有那些最感動她的故事。她提醒我，胡曉梅曾經愛過一個有錢的男人，但後來出了問題。

\* \* \*

那個電台主持人長得很嬌小，有著小巧的五官和長長的黑髮，不停地抽著天堂鳥醇薄荷香菸。我們約在深圳市中心一間四川餐廳的包廂。她帶了另一個客人，介紹說他是對美國新聞工作有興趣的朋友。那名年輕人有點胖，留著長髮，這在中國是藝術家氣質的明確標誌。他安靜地坐在一旁聽著訪問。

胡曉梅形容自己是個「夜貓子」。我們很晚才吃晚餐，而她的一天才剛開始：她十一點上節目。她說，雖然她不會說英語，但是她對美國文化很感興趣。她欣賞瑞蒙·卡佛的故事，讀過他的翻譯小說。

（「你可以從一點點細節讀出很多東西。」）在餐廳裡，她說起了自己怎麼來到深圳這個一夜之城的故事。

胡曉梅生長在一個江西的煤礦城鎮，父母是初級技工。他們不窮但也沒賺什麼錢。這女孩從小就想離開。「我一直很內向。我會跟自己講話，假裝我在上電台節目。如果有機會上電台的話，我會有很多事想說。」

一九九二年，她二十歲時，到了深圳。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礦泉水工廠工作，一個月賺七十美元。晚上時，她經常收聽當地一個叩應節目。改革開放的早幾年，這類節目開始變得很流行。有一天晚上，她終於打電話到節目裡去。跟大多數人不同的是，她不要任何意見，她只是要跟聽眾說，她想成為一個電台主持人的夢想。她很會講話，講完之前，她提到了她工作的地方和電話。

「接下來那個星期，我接到一疊疊的信和一百多通電話。」她回憶道，「但礦泉水工廠把我解雇了，因為我私用他們的電話。所以我沒了工作。我把所有的信綁在一起，帶到電台。他們問我要幹麼，我說我想當節目主持人。他們說我太年輕了——我只有二十歲，而且沒有經驗。但有個主管決定給我機會。我跟他說我只有二十歲，很多東西我不懂，但很多聽眾跟我一樣，也許我可以了解他們。」

她記得第一次上節目那天：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不到八年，「夜空不寂寞」已成為深圳最受歡迎的節目，胡曉梅還出了一本書。她相信這個節目讓她變老了，因為每個晚上要聽那麼多故事。她說，對女人來說，深圳是一個很艱難的地方。離婚率比內地高，生活比較不穩定。「這裡的壓力比較大，因為比較自由，」她說，「你個人的想法比較重要，因為別人不知道你的隱私。不像在內地，在那

裡，你的家人會告訴你得做什麼。這裡有自由，但這種自由也帶來了壓力。」

她說，以中國人的標準而言，她算很晚婚，婚禮準備在明年舉行，那時她三十歲。我問到她的未婚夫，她突然變沉默。「他喜歡寫作，」她溫柔地說，「他可能還不是很成功，但他很認真，這點最重要。我們很在乎彼此。」停了一會兒後，她繼續說：「我不想把社會的標準當作自己的標準。我曾經跟一個很有錢的男人交往過，是深圳的一個營造商。他在乎的只有生意，有一次，他要在一棟新大樓的入口處擺兩隻富麗堂皇的石獅，價值二萬人民幣的東西，他卻跟客戶開價到了八萬。那就算是成功嗎？賣高過價值四倍的東西？」

她點了另一根菸，深深地吸了一口。「反正，」她說，「他不喜歡人家知道他是胡曉梅的男朋友。」

一年多之後，我湊巧經過深圳，我們又一起吃晚飯。這次她在電話中說，她會帶她先生一起來。

我走進餐廳，看到第一次訪問她時的那個有點胖胖的、長頭髮的年輕人。胡曉梅害羞地笑一笑說：「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不想告訴你。」

\* \* \*

一九九九年整個冬天，艾蜜莉常打電話和寫信來。聖誕節之前，她寄給我一些她工廠的樣品：白藍紫三色塑膠珠子串成的鍊子，裝在一個有拉鍊的小袋子裡。她說，我可以送給我家鄉的姐妹們。

但她的信愈來愈沉重：「我無法多寫，最近我因為失眠，頭很痛。」她抱怨一成不變的工作讓人麻木，她擔心她的不快樂會傷害到



朱雲峰。「老實說，我的男朋友很聰明，對我也很好。問題不在他，在我。我只是需要時間從某種無法說明的憂鬱症中恢復過來。我正在努力。」

她對自己一向要求很高。當我寄給她我寫的有關涪陵課堂的文章，她的回應是：

講到我自己，我覺得那是最難懂的。你似乎比我大部分的朋友更了解我，在他們眼中，我只是一個好脾氣或好相處的女孩。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如你說的那麼值得人尊敬。沒錯，我是喜歡獨處。但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跟人相處。我無法分享她們的喜悅、悲傷和關心。

在我當老師的時候，我注意到頂尖的女學生常常好像被某種孤寂纏身，那是在男孩身上少見的。大致而言，男生比較沒有那麼早熟，即使是最聰明的男生也喜歡搗蛋開玩笑。像威利那樣的男生，畢業後似乎成長得很快，但很多女孩在學校時就已經想很多了。

英文系新生裡最優秀的學生，是個總是自己一個人獨來獨往的安靜女孩。亞當教她們班，有時下課後她會找他額外練習英語。暑假回鄉後，她從橋上跳了下去，自殺了。亞當和我對她自殺的原因所知不多，班上也沒有人跟她熟。在中國，自殺的女人比男人多，中國女人的自殺率是世界的五倍，這是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比率最高的。自殺的常是在偏遠地方的，受過一些教育的女人。她們並不貧窮，如果真要解釋的話，好像可以有更好生活的那一線亮光，不知怎麼地，竟讓她們抑鬱而終。

艾蜜莉一向能得同學的喜愛，不管個性孤不孤僻，她還是很受歡迎。但我很擔心在深圳的她。到了二〇〇〇年年初，她的抱怨更明顯了。有一段時間，她談到想跟朱雲峰一起做生意，賣車床加工機器，但她最後放棄了那個念頭，因為一開始所需要的投資太大了。她覺得自己被工廠和宿舍給困住了。在一封信中，她跟我說，她現在一個月賺二百三十美元，比剛開始時多了一倍。但是，錢沒有改變任何東西：

我在工作上並不開心。有時候我頭很痛，常出錯。雖然我的薪水一直在調高，但是我對工作不再感興趣了.....你知道有什麼工作既有趣又對社會有益嗎？我希望可以找到那樣的工作。

\* \* \*

每次到深圳，我都會在圍牆的兩邊盡量多停留些時間。圍牆被當作政治界線而豎立，但也是文化的劃分：一跨過界線，人們拿來當參考的對象就完全改變。在關外的世界裡，艾蜜莉和其他工廠工人常談到胡曉梅；但是，住在城中心的中上階級卻很少談到這個電台主持人。有些人告訴我，小說家繆永對他們的世界有比較準確的描述。她的作品也受到政府審查部門的注意，他們把她的最新作品給禁了。

我打電話繆永時，她建議我們約在城中高級地帶，她的公寓附近一家時髦的西式咖啡店見面。繆永二十九歲，未婚，個頭嬌小，頭髮中等長度，嘴唇和眼睛畫著很濃的妝，一樣不停地抽著天堂鳥醇薄荷香菸。她告訴我，她很欣賞亨利·米勒的翻譯小說。「他的書也被禁。」

繆永在甘肅長大。她的父母是出生於東部沿岸的醫生，一九六〇年代中國開發西部運動時，被派到甘肅。繆永畢業於甘肅的一家師範學校，後來到深圳。一邊當祕書，一邊寫小說。一九九八年，她出版第一本書《我的生活與你無關》，成為最暢銷的書之一。那本小說以深圳為場景，女主角的第一份工作是當祕書，後來成為一個有錢的香港商人的情婦，過著豪華解放的生活。書賣到七萬多本後被政府給禁了，原因是裡面描寫了毒品、賭博和隨便的性行為。正如中國的很多禁書，這一來只會引起更多人的興趣，增加銷售量——只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所有的書都變成盜版的了。深圳街角的人行道上，小書販賣著各式各樣的盜版書。在股票交易市場前的人行道上，我看到一個小販賣著盜版的《我的生活與你無關》，旁邊是希特勒自傳的中譯本《我的奮鬥》。

「我說的『你』，指的是社會，」當我問到她書名時，繆永說，「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是掌控在我自己手裡，而不是別人可以控制的。」她解釋物質主義是書中的主要力量，「任何事都跟錢有關，錢是每個人關心的第一件事。在深圳，什麼事都跟交換有關，你可以用愛交換錢，用性交換錢，用感情交換錢。」

不提書被禁，寫作讓繆永變得富有。稿費中斷之後，她把那小說改編成廣受歡迎的電視連續劇。她把最敏感的部分拿掉了，為了收視率，也把劇名改成比較快樂的《這裡沒有冬季》。她目前在寫其他的電視和電影劇本。下一本小說的場景，她會比較小心，不會刻意提那是深圳或是任何地方。她相信第一本書會被禁的原因是，出版部門擔心它醜化了這座實驗都市的形象。

印在小說內頁的作者介紹，首先寫到的是繆永的血型。跟很多時髦的中國作家一樣，繆永相信血型有助於了解一個人的個性。她說，

個人主義是她對深圳最感興趣的地方：「以往，中國都是集體制度，都是群體的想法。但是現在，在像深圳這樣的地方，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你可以自己決定。」繆永是O型的。當我問到深圳聲名狼藉的舞廳時，她向我介紹了她的現任男友。他花了一個晚上殷勤地帶我走訪各種不同的娛樂場所，在那裡，只要花幾百塊人民幣，男人就可以租一間包廂，唱卡拉OK，請穿著迷你裙的年輕小姐進來聊天、倒酒、餵你吃水果。

\* \* \*

艾蜜莉不喜歡繆永的書。我送她一本後，她告訴我，這本書是以「白領階級」為對象而寫的，那些讀者都住在城裡、關內。在她看來，那是一個跟她的深圳完全不同的世界。書裡的女主角沒有感情——她只在乎錢，跟一個個男人上床。「太亂了，」艾蜜莉說，「這方面的生活你必須要能自制。」

她的評價跟胡曉梅的看法相呼應，胡曉梅也曾經很坦白地告訴過我，她不喜歡繆永的書，因為它傷風敗俗。而女作家也同樣看輕電台主持人，從作家的眼光看來，只有住在工廠宿舍、教育程度低的女人，才會對那個節目感興趣。撇開她們明顯的相似處，像是一樣年輕獨立，一樣抓住新興都市的精髓，胡曉梅和繆永各自為政，各自在這個一夜之城擁有自己的領域。

艾蜜莉形容自己是屬於工廠王國的。她住在關外，她的生活是由宿舍築成的，雖然她抵制著深圳，同時也被它吸引。她常常談到有關道德的問題，儘管她很難清楚闡明自己的價值觀。有一次她跟我說，看了一部女主角跟好幾個男人發生性關係的好萊塢電影後，她深感困

惑。但當我問她，深圳的開放跟她故鄉的保守比起來如何，她說新城市是比較進步的。「這樣是比以前好，」她說，「但是，有些界線還是不該跨過。」

「什麼界線？」

「跟道德有關的。」

我問她什麼意思，她把下巴放在手臂上，很用心地想著。「傳統的道德，」她說，「比如當兩個人結婚後，應該對彼此忠貞。」

我們談到《我的生活與你無關》，我問艾蜜莉，她覺得這本書裡的道德觀是從哪裡來的。「在改革開放之後，大多數人說這是從西方來的，」她說，「我覺得可能沒錯。深圳人大多認為西方國家比較好，中國則既傳統又落後。」但是在艾蜜莉看來，這本書的哲學太黑暗了。「它所說的深圳是個沒有靈魂的地方。書中的每個人都很混亂——他們找不到寧靜。」

\* \* \*

二月，春節之後，艾蜜莉和朱雲峰開始同居。他們在關外約五十公里的一個小工廠城鎮，離朱雲峰工廠不遠的地方，租了一間三房的公寓。因為蓋得倉促，公寓的水泥階梯上還有裂縫，但其他都還好，也有廚房。這是艾蜜莉來到深圳後第一個非宿舍的家。

公寓裡還住著另一對四川情侶。每一對都有自己的臥室，但大家共用一個有彩色電視、錄放影機、一張矮桌和沙發床的客廳。有間臥房的牆上貼著一張裸著上半身的外國男女親熱的海報，那是前房客留下來的，沒有人想到把它拿下來。這類照片在中國很常見，圖中的男女是外國人，似乎讓它看起來比較浪漫而不會唐突。

艾蜜莉沒有跟她的父母提起公寓。工作日她還是待在宿舍裡，但週末她跟朱雲峰住。有一天講電話時，她母親直接問她，他們是不是住在一起。「我什麼也沒說。但從我的沉默裡，她知道實情。」那次之後，母女倆都再也沒有提起這件事。

朱雲峰又升職加薪了。他一個月賺三百六十美元。加上艾蜜莉的薪水，他們總共的月收入大概有六百美元，他們至少可以存下一半的錢。

那年四月，一個非週末晚上，艾蜜莉第一次違反宵禁規定。她下班後離開工廠，直到第二天上班時才回去。老闆把她叫到辦公室。

艾蜜莉後來跟我說：「他問我昨晚幾點回來，他就是那樣，一點都不直接。他不問我有沒有回來，只問我幾點。我說：『我今天早上回來的。』我沒有找藉口或理由解釋。他不知該說什麼，不知道自己該生氣還是笑。他看著我，最後只有走開。」

幾個星期之後，工廠裡另一個年輕女孩也打破宵禁的規定。

之後不久，老闆把一個漂亮的女工帶離生產線，升她為「個人助理」。那女孩來自湖南，只有十八歲。艾蜜莉警告她有關老闆的事，跟她說他那些失檢的行為，最後那男人當面質問艾蜜莉。首先，他試著老套的間接詢問，問她大家在背後說他什麼。那招不管用後，他就直接講了。

「妳跟其他同事說我很好色？」他問。

艾蜜莉說：「是。」

他試著勉強一笑，敷衍了事，但很明顯的，他不再喜歡艾蜜莉的存在。她開始在閒時找其他工作，不久就找到一份托兒所老師的工作。學校也在關外，但沒有台灣老闆，沒有工廠宿舍，也沒有夜班。她要去教英文。

六月，她提出了辭呈，老闆批評她。「妳變了，」他說，「妳以前很順從。自從妳交了男朋友之後，完全不一樣了。」

「我沒變，」艾蜜莉說，「我只是更了解你了。」

\* \* \*

那年夏天，深圳滿二十歲。這座城市在一九八〇年八月被正式規劃為經濟特區，現在達到了它自身發展的一個關鍵期。中國正準備加入世貿組織，這意味著很多深圳企業在稅收上享有的特權將因此結束。與此同時，來自中央政府的強大的反對聲音始終不斷，他們相信正是特權導致了腐敗。二〇〇〇年時，深圳副市長就因為介入房地產騙局而被逮捕。

當地的經濟表現依然強勁，但近年來有減弱的趨勢。過去，亞洲國家像是南韓和台灣也有類似的「特別」城市和地區，比如一般所知的出口特區。這些特區都遵循著一種簡短的生命循環：剛開始，勞工密集的輕工業發展得很快，但慢慢地，工廠穩定地移向內地薪資較低的地方。最後，這些特別區轉型成高科技工業，失去了它們在國家經濟上所扮演的主要動力角色。這類城市的規劃注定了它們在快速蓬勃後就快速枯萎，就像一朵只綻放一次的花。

但深圳的實驗不只呈現在經濟上，也同時影響了許多社會議題。二十週年慶的幾個星期前，我來到深圳，訪問當地居民有關這一夜之城的歷史和文化。

深圳人很勇敢。中國人一向害怕新東西，但深圳人不同。他們願意嘗試和冒險。

深圳沒文化。人們只關心錢。

年輕人很樂觀，但中年人則很悲觀，因為這是個年輕人的城市。

深圳跟美國有很多雷同的地方。美國提供人們機會，深圳也是。在這裡，你可以過很自由的生活，人們不會過問你的隱私。來了這裡之後，我覺得很快樂、很解放。如果我一直待在內地，我不會離婚的。

大家說，這裡就像美國西部，但那不是真的。美國西部等著被開發，它的成功是因為鐵路。深圳的成功是因為政治，因為鄧小平。如果他要的是雲南變成經濟特別區，雲南也會很成功。

我也是個實驗品。你看我在多年輕時，就自己出來謀生了。

在深圳，沒人管你的過去或背景。他們只管你有沒有能力。你能不能幹？這是唯一重要的事。

我從來沒有到過像深圳這樣給人感覺是如此分歧的中國城市。圍牆割裂了外面的工廠世界，但內部社會的分割卻更為戲劇化。不同世代的人少有互動，因為這裡大部分人的家人都在內地。跟其他許多居民一樣，艾蜜莉常提到「白領」和「藍領」階級的不同（她把自己歸在藍領一類）。胡曉梅是藍領的女英雄，繆永屬於白領生活圈。在一個被單一政黨控制的國家，在一個幾乎每個人都把自己看作屬於同一個族群的城市裡，在僅僅二十年之間社會就變得如此分歧，這真的是異乎尋常。

只是，有些界線就跟那道圍牆一樣，既是人為的，也是可以被滲透而入的。在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帶來了一個全新的社會階級架構，並從下向上流動，但感覺上這個體系還是不完整的。即使是在對平均



主義感到自豪的美國，還是有傳統的家庭、傳統的學校、傳統的成功方式。中國則還沒有發展出這些，至少在這股新的風氣裡還沒有。很難去定義個人的教育、經驗和決心將如何結合才算成功，成功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但這個狀態對騙子來說，再完美也不過了——即使是在北京這樣政治敏感的城市，也到處充斥著賣假身分證的人。在深圳，這種交易已經達到工業生產的地步。在工廠裡，艾蜜莉負責工人的報到工作，她說，很多員工的身分證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在沃爾瑪商場門口，小販賣著一張假的大學畢業證書，不到一百元美元。一個賣身分證的深圳小販告訴我，在過去五年裡，他用過五個不同的名字。

不管這城市的結構在感覺上是多麼的強而有力，諸如宿舍和生產線，城牆和社會階級，深圳還是充滿著不是很能適應的人。一夜之城承諾給人機會，但很多移民是因為個人內在的躁動與不安而離開家的，也是不爭的事實。（如同艾蜜莉曾告訴過我的：「我心裡有些東西。」）在深圳，一個年輕女孩可能會進入一家工廠，做幾個月的廉價首飾，再換到另一份工作。另一個外地來的人會接替她的工作，表面上什麼也沒變——工廠繼續生產著廉價首飾。然而你根本無法猜出，在這個新的環境裡，個人的想法有了什麼樣的改變。

同樣地，我們很難定義二十年對這個城市的生命有什麼樣的意義。政府幾乎不怎麼重視這個週年慶——沒有為領袖舉行的遊行、沒有給工人放假、沒有半個政治局的人出來說些什麼。據報導，共產黨內部有個指示，要官方低調應對這裡的週年慶。

那天，《深圳特區報》出了份紀念特刊。頭版標題大字寫著：

巨大的不安

巨大的實驗

首頁放了鄧小平的毛筆字，還有一份江澤民的冗長公告，描述深圳是「過去二十年實現歷史性變革的縮影。」在一個報攤上，我拿起兩份很流行的女性月刊，它們的標題完全沒有提到週年慶。

一百位深圳女老闆的創業經驗

初戀結束

為什麼要婚前同居？

為什麼要墮胎？

一個老男人設下的圈套

一夜新娘

深圳女老闆訪談

我不是淑女

\* \* \*

我在深圳的最後一個晚上，朱雲峰鬱悶地回到家。那是個不順遂的下午，他手下的一個工人受了傷。工廠加班趕一個新產品，這種時候發生意外總是不妙。新產品是一個新的金屬熱水瓶，同事的傷不重，但朱雲峰跟艾蜜莉說，他想獨自待一會兒。

有時，朱雲峰會跟我聊到他的工廠，問問我有關北京的生活，但是大多時候，他並不介入我跟艾蜜莉的談話。在中國，女性有自己的男性朋友並不算多見。一直以來，朱雲峰令人意外地容忍我的存在。他是一個冷靜的男人，沒有很多中國男人常見的衝動與缺乏安全感。我是一個外國人，加上是艾蜜莉的前任老師，多少有幫助，但是我知

道這樣的情況並不尋常。我有心理準備，艾蜜莉未來會愈來愈少跟我聯絡。那是女學生之間很平常的模式：剛結婚時，有段時間她們不太聯絡，直到生活穩定下來，通常是有了小孩後，她們會再度彼此聯繫。

在深圳的最後一個晚上，艾蜜莉和我把朱雲峰留在公寓裡出門去。我們爬上一個山丘，到一個可以遠眺鎮上的公園。那是一個小小的工廠聚落，在關外常見這種地方：一連串商店和公寓嵌進了小山滿是灰塵的邊緣，然後，一排排工廠和宿舍沿兩條主要道路呈傘狀散開。這些工廠有些是生產鞋子和成衣，有家做電腦零組件的工廠，最近在火災中燒毀了頂樓，白色的牆上仍留有被煙燻過的黑痕。艾蜜莉說，沒有人受傷，但是，路底那一家生產塑膠聖誕節飾品和草坪家具的工廠，幾年前的一次大火中，就有些工人喪命。

再過兩個星期，艾蜜莉就要開始她的新教職了。她擔心自己的英語因過去幾年的工廠工作而退了步，她也擔心能否把小孩教好。但是她喜歡那校園，每次談到新的職務都會笑。她現在留著短髮，劉海用塑膠髮夾往後夾住。頸上戴著一條朱雲峰送的簡單項鍊——玉做的龍。龍是她的生肖。

那是個溫暖無雲的夜晚，星星很亮。從山頂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一排排短而堅固的宿舍，宵禁前仍透出燈光。十一點多了，我想著每間宿舍裡有多少人，多少房間的人正收聽著電台節目。艾蜜莉帶了她的收音機，我們坐在山頂上收聽著「夜空不寂寞」。收音機控制音量的轉鈕壞了，胡曉梅的聲音在夜空裡有點破碎。我們費力地聽著。

第一個聽眾一打電話進來就開始哭，後悔自己對待前任男友的態度。胡曉梅說，那個經驗會對她有幫助，也許下一次她就會做對。第

二個聽眾很想念高中女友，但是她在很遠的地方工作。「這裡沒有女孩子對你微笑嗎？」胡曉梅問說。第三個聽眾很生氣，因為男友最近要求分開一段時間；他是個很好的男人，即使是她有不對的地方，也會說她對。胡曉梅說：「如果妳錯了，一個男人還是聽妳的，這個男人本身一定有什麼問題。」

山下，工廠的燈光成片地消失了，有時，一整樓的窗戶頓時漆黑一片，或整樓的燈火突然全部熄掉。從來沒有只熄一盞燈的情況。宿舍的工人無法控制電燈開關，一切都按宵禁時刻表來進行。

最後一個聽眾跟一個男人同居多年，但仍不停有外遇。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男朋友有錢、工作不錯，有正當的嗜好。當胡曉梅逼問她不忠實的原因，她問胡有沒有讀過繆永的小說。

「我不喜歡那本書，」胡曉梅尖銳地說，「妳不該照那本書過生活。問題是，妳要想一想，妳的原則出了什麼錯？」

艾蜜莉看著我，笑了笑。節目在午夜結束，接著是電波裡斷斷續續的一連串廣告，然後，山下最後一群工廠的燈光熄滅了。整片城景在黑夜裡消失。

有好一會兒，我們坐在那裡沒有講話，然後我記起幾天前艾蜜莉說過的一件事，她試著用歷史的角度來看像深圳這樣的城市。她說：

「原始的社會，人們成群而居，最後這些人群打散成為家庭，現在它們再度打散，成為很多不同的獨立個體。最後會變成只剩下一個人。」

她停了一下，看起來不怎麼快樂。「如果有某種完美的社會主義，那就最好了。」她說，「但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個美麗的理想。」

我問她想不想離開深圳，她搖一搖頭。在她看來，與世隔離有它的好處，能迫使人們去做決定。「結果是人們會有更多的能力，」她說，「然後他們會有更多的創意。到後來會有更多不同的想法，再也不會是大家想的都一樣。」

我說：「妳認為，這對中國將會造成什麼樣的改變？」

她沉默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樣的問題，雖然我期望，一旦人們知道怎麼照顧自己，這整個體系就會跟著進步。但我看到了深圳的分裂——有圍牆的城，有圍牆的工廠，遠離家鄉的寂寞的人，我不知道所有這些最終會如何協調成一個凝聚的東西。

我看著艾蜜莉，心裡知道那個問題對她來說並不重要。自從來到深圳，她找到了一份工作，離開，又找到另一份工作。她談了戀愛，她違反了宵禁。她寫過死亡恐嚇信給工廠老闆。她在老闆面前維護自己。她二十四歲。她做得很好。對我的問題，她笑著說：「我不知道。」

## 第八章 移民

二〇〇〇年十月

波拉特和我最後一次換錢，匯率掉到八點四人民幣兌一美元。他現在菸抽得很凶，希爾頓香菸一根接著一根，臉色很憔悴。他要把手上的人民幣全部脫手，因此我跟他換了四百五十美元。換完錢後，他介紹我在雅寶路一個可信賴的錢幣兌換商朋友。那是他的好意，但是我知道我的黑市日子就快結束了。市面上的匯率跌得那麼低，幾乎不再值得兌換，而且波拉特離開後，我也不打算在雅寶路花太多時間。這地方沒有他就不一樣了。

那個星期，我們在維吾爾餐廳見了好幾次面。波拉特說，他考慮落腳的美國城市有四個：洛杉磯、紐約、華盛頓特區，還有奧克拉荷馬。

「奧克拉荷馬？」我說。

看到我臉上的表情，他很快地接著說：「我聽說奧克拉荷馬很熱，風很大。大家都說它不是居住的好地方，就跟新疆南部一樣。」

我跟他說，他所聽到的多多少少是真的。波拉特解釋說，有一群維吾爾人住在奧克拉荷馬市附近，其中有些在那裡的大學念書。當地有個以住在那裡的維吾爾知識分子斯迪克·肉孜為首的小社群。肉孜常為美國之音的維吾爾族新聞提供報導。他的妻子熱比婭·卡德爾曾是烏魯木齊的一位成功翻譯，有很多年，中國政府推崇她是少數民族有成就的代表。但是後來，她丈夫的美國之音報導跨越了某條看不見的線，在新疆，她以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遭逮捕。但大多數人相

信，她只不過是把中國報紙剪報寄給她的丈夫。被捕之後，熱比婭成為維吾爾族最有名的政治犯，但是，外交關係上的努力還是無法營救她出獄（多年後，在二〇〇五年，她終於被允許離開中國）。

波拉特說，奧克拉荷馬只是他的選擇之一，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也有一些維吾爾人。他擔心的主要是能不能通過洛杉磯機場的移民海關。他的計畫是逾期停留，然後再申請政治庇護。朋友們告訴他，如果他能夠順利地抵達奧克拉荷馬或華盛頓特區，他的機會將會大很多，因為那裡有幫過其他維吾爾人的律師。

在我們的談話中，波拉特常問我的意見，但他要進入的是一個對我這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完全陌生的國度。冬天時我會回美國，我告訴他，我可以介紹在大城市裡會講中文的朋友給他，但是我一點也不懂政治庇護的程序。從一開始，我對波拉特的美國計畫就抱持著懷疑，但是現在，我很擔心會出大紕漏。我知道，如果他失敗了被遣送回中國，他有可能坐牢。但是，他信任在美國的維吾爾人給他的意見。

他好像在準備去玩一個規則不明但賭注大得驚人的遊戲。從洛杉磯到奧克拉荷馬到華盛頓特區，維吾爾人的安全地點散布四處，遊戲規則之一是通過機場移民海關，那會提高你獲得政治庇護的機率。後來我才發現，波拉特說的確實沒錯。如果一個人在美國機場申請政治庇護，他會被列入「加速遞解」（expedited removal），那是一個決定他的申請可信度的程序。即使這個人的案件被接受辦理，他還是可能會先被拘留，這時要請律師就很難。有時，被拘留者會被送到州監獄，跟一般罪犯關在一起。有個移民律師告訴我，他曾經見過一個申請政治庇護的客戶被銬上腳鐐，關在賓州監獄。

\* \* \*

波拉特離開北京兩天前的晚上，我們約在「好萊塢」旁的一家餐廳吃飯，我給他一張二千美元的個人支票。簽證顧問公司警告過他不要帶太多現金，以免引起北京機場的懷疑。我的支票是付給在美國有帳戶的維吾爾流亡人士。在餐廳，波拉特算過現金後把它們交給我。那是我們的交易中，我的口袋第一次裝滿美金。

「你覺得我在飛機上要穿什麼？」他說。

「嗯，你的申請書說你是個生意人，所以你可能要看起來像生意人。要是我，我會穿西裝。」我說。

「這一套西裝怎麼樣？我看起來像不像生意人？」

他身上的是套深藍色、廉價剪裁、舊得發光的西裝，看起來就像個維吾爾金錢兌換商。

「你還有別的嗎？」我盡可能技巧地問。

「這是我最好的一套西裝。」

波拉特的妻子從新疆飛來送行。她是個年近三十歲的老師。我們的對話有限，因為她不太會說中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波拉特跟一個女人在一起，他很細心，不時地牽著她的手。她看起來比他還要緊張。

最後一晚，我再度跟他們夫婦還有波拉特的一群維吾爾朋友吃晚飯。那是個星期五晚上，簽證顧問安排他星期六走，他們相信，美國機場移民局在週末的時候比較寬鬆。波拉特喝得不多，但一整頓飯下來菸抽個沒停。之後，他繞著餐桌跟大家道別。當他跟我握手時，我說：「下一次我們見面，會是在美國。」但即使我自己也懷疑那話的真實性。

\* \* \*



他在飛機上沒有睡。他只打包一個小袋子，一個用六美元在雅寶路買的假的新秀麗旅行袋。袋子裡裝著他的西裝、兩件襯衫、一條褲子和幾本書。簽證顧問要他輕裝便服（他們也建議他不要穿那套西裝），他穿著牛仔褲和一件新襯衫——卡特彼勒牌子的，也是假貨。

飛機抵達洛杉磯後，他提著袋子加入入境檢查的隊伍。輪到他時，他遞上護照，盡量看起來很鎮靜。那官員看了他一眼後，要他站到一旁受盤問。

他把波拉特帶進一個小房間。那裡有六名官員，包括一位中文翻譯員。當被問到此行目的，波拉特告訴他們他的貿易公司的故事，拿出他的假邀請信。一名官員離開去打那信上頭的電話求證。

波拉特等待的時候，另一名官員帶了一個中國人進來。那人也是搭同班北京來的飛機。他大約四十歲，看起來並不緊張。但那些官員看起來很不高興，他們用英語跟翻譯談了一會兒，神情激動。最後，那個翻譯問中國男人他的護照怎麼了。

「我把它撕掉沖到馬桶裡。」他說。

「你為什麼要那麼做？」

「因為我不要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那人很平靜地說，「我要來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他從口袋裡拿出一些文件：「這是我的證詞。」

那些官員離開房間去討論這件事。一會兒之後，其中一個回來了。

「波拉特先生，」他說，「你可以走了。」

兩名簽證顧問的聯絡人在機場外面等著，說他們的同事接到移民局官員的電話。波拉特給他們五百美元現金，那是最後一筆費用。然

後，他們把他載到洛杉磯的灰狗巴士車站。以十月來說，那天的天氣熱得不尋常。

在車站，波拉特買了一張到奧克拉荷馬市的單程車票。還要一兩個小時車子才會出發，他在候客室等著、看人。身為一個中國的少數民族，他很自然地對少數族裔特別留意，而做過多年貿易後，他的這種觀察力更加敏銳。在灰狗巴士車站，他注意到有一些人看起來有點像維吾爾人。他猜他們可能是西班牙人。巴士乘客不多，他發現它比中國的舒適得多。

波拉特喜歡那趟旅程，尤其是新墨西哥的景色，但是他不喜歡奧克拉荷馬市。又熱，風又大。他見到美國之音維吾爾特派員斯迪克·肉孜。他在紹尼（Shawnee）待了幾天，一些維吾爾人拿獎學金上完奧克拉荷馬浸信大學後，就在那裡住了下來。他們不是浸信會教徒，其中有些人在一間做信用卡的小工廠工作。在波拉特看來，奧克拉荷馬的生活似乎很蒼白，他感覺到少數族裔在那裡的狀況並不是很健康。幾個月後，他坦白地跟我解釋：「紹尼有很多印第安人，政府給他們房子住，但他們天天喝酒，不工作。」

在奧克拉荷馬待了十天之後，波拉特又買了一張單程的灰狗巴士車票。巴士帶著他穿過奧克拉荷馬往東開去。一路上，田納西的樹木之多是他前所未見的。在北京，有一天清晨，我的行動電話響了。

「我現在人在華盛頓。」波拉特說。他說，他住在首都的一些維吾爾人那裡，打算下個星期開始上英文課。我問他是否一切都順利。

「沒有大問題，」他說，「有一些事情還要處理一下，但是我不要在電話中講。明白了嗎？」

「我明白。」我說。他說，幾個星期後會再打電話給我，我跟他說，我一月時會去看他。掛電話之前，波拉特要我向他在雅寶路的維

吾爾朋友問好。

## 第九章 四合院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早上八點二十分

在北京住了一年之後，我終於搬離了舊公寓。我一輩子都沒住過像那間公寓那樣的地方，用來準確定義它的，是所有不曾在那裡發生過的事。我從未在那裡的廚房煮過一餐，從未在那看過一晚電視。我從未邀請過我的北京朋友來，也從未在那裡接到任何信件——事實上，我連它的確切地址都不知道。我大多數晚上都待在外面，我也常背著帳篷和睡袋到各省做長期旅行。一去兩個星期對我是常有的事。那就是自由作家的生活——流浪與寫作。

我總是會回到一個變化了的都市。有一次採訪回來，我到家附近一個平常最喜歡吃的麵館，卻發現那整個地區已全被鏟除，只為了蓋一棟新的住宅大樓。回北京是讓人震驚的：一個月的旅行讓人感覺像是做了場「李伯大夢」（Rip Van Winkle），景物全非。新的地區不斷迅速出現，舊的地區一個接一個被拆除和取代。過去，北京城中心地帶以胡同著稱。胡同一詞源自蒙古語「水井」，後來變成用來形容四合院連成的巷弄。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很多胡同快速消失，但沒人聽說取代它的會是什麼。發展的腳步如此急促，速度總是首要考慮，而大部分的新建築教人完全無法辨識：快速設計之後，蓋得很便宜，馬虎完工。看起來只是些臨時建築，就像一些奇怪的鄰居，格格不入，也不可能待太久。

在一個流動的城市中，我過著流動的生活。我住在一個什麼也沒發生過的公寓，一個原本最能代表它的東西也不復存在的城市。最

後，經過一年的飄泊後，我決定尋找一個比較穩定的家。北京最近剛通過一項法案以保護二十五個胡同，我在其中的菊兒胡同找到了一間公寓。對外國記者來說，它不是個合法的地址，但我想，週年慶的時候，我應該躲得過警察的臨檢。只要能夠住在沒有被拆除的老北京，要我做什麼我幾乎都願意。

菊兒胡同位於後海公園一帶，這裡的胡同從紫禁城向北一直延伸到北京的故城牆遺址。這一帶很安靜，街道太小，公車無法通過，大的建築工程也不被准許。房子最高就是幾層樓，很多都是單層的四合院。不像城市裡高樓群起的地區，菊兒胡同裡沒有什麼回音，這裡的聲音不多，而且很獨特，只有風聲吹過了槐樹，雨滴聲落在磚瓦屋頂上。早晨，小販騎著車穿過巷弄，吆喝叫賣著。啤酒、醋、醬油。米、米、米。撿破爛回收的也騎著車經過胡同，收購保麗龍、硬紙板、舊物品。有一回，我聽到一個男人叫喊：「長頭髮！長頭髮！長頭髮！」他是從河南來的，在那裡的一家外銷假髮和接長髮的工廠工作，外銷的對象大多是美國黑人。在胡同裡，如果是一束好的馬尾，假髮商願意出價到十五美元。一個女人從家裡走出來，手上的絲布裡包著兩束長辮子，是她女兒上回剪頭髮時留下的。

有些居民在屋頂上放了臨時的鴿子籠，他們在鴿腿上綁上哨子，當牠們從頭上飛過時，哨子就會作響。在北京的老市區，一聽到那低調的嗡嗡聲，隨著鴿子在天空中忽低忽高地飛，你就知道那是個美麗的晴天。傍晚時，撿垃圾的吹著哨子，推著垃圾車經過胡同。哨聲隨著他的離去逐漸消失，通常那也是夕陽西下之時。夜晚很安靜。菊兒胡同窗下的那一張書桌，就是我的綠洲。

但在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平靜是稍縱即逝的。我搬進菊兒胡同不久，就有位鄰居和我說，有件事你應該去調查一下。幾條街區以外，

在胡同保護區的邊緣，一個老人正在抗爭，為了保護他的四合院不被拆除。那座四合院可能有四百年歷史，老人八十二歲。他對政府提出過兩次訴訟。那鄰居警告我，像這種事通常進展得很快，他說的沒錯。這個事件正好進行了七十八天。

二〇〇〇年八月九日

老人年紀雖大身體還是很硬朗，他的個子比中國一般年輕人還要高。五十幾年前曾是個軍人，現在他的舉止仍像個軍人。八十二高齡的他，一個星期仍舊至少打兩次網球。他雙目如龜——黑漆漆的，眼皮垂蓋。但是，一談到這命運已注定的地帶，他的雙眼就綻放出光芒。

「胡同和四合院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他說，「這間房子比美國還老！」

他經常講英文。他的名字是趙景心，大家尊稱他趙老。他屬於一個消失得跟胡同一樣快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平精英年代，他在一個中西並存的世界裡長大。趙老先生的父親是浸信會的神學家，擁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榮譽博士學位，這位神學家的四個孩子全都接受中英文雙語教育。跟他的兄弟姐妹一樣，趙老在美國住過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任職於美國軍隊，在檀香山教美軍中文，這些軍人正準備攻擊占領中國的日軍。

那攻擊從未發生，對日戰爭一結束，另一個戰爭繼之而起——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內戰。到了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很顯然地，毛澤東的軍隊即將控制中國。這位受外國教育的年輕人面臨巨大的抉擇。趙家有兩個兄弟留在美國，但趙老和他的姐姐回到了中國。他們後來都在北京的大學裡當英文老師。

「我父親要我們回來，」趙老解釋道，「他說中國是我們的家。」

我跟伊恩一起訪問他，伊恩也聽說了他的訴訟案。趙老在他的客廳裡接待了我們，客廳的窗戶朝南，正對著的庭院磚地上，灑滿了秋天的陽光。他跟妻子黃哲住在這裡。他們一九五三年結婚，在老北京的這塊泥土上已經生活了四十七年。

他們的家將近三百坪，是由兩個小四合院組成的，屋頂覆蓋著灰瓦，木製的紅柱立在正屋入口的兩側。雖然有些細部被改建過：窗戶由原來的紙糊改成玻璃，還裝了抽水馬桶，不過，屋子的整體結構還是傳統樣式的。主屋坐北朝南，和另外三間房子圍繞著庭院。庭院是露天的，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用處：冬天天冷，他們得快速穿過庭院，從這間屋子走到那間屋子；氣候溫暖時，他們就在庭院裡安排一些日常活動，享受那四方形的天空。

這片露天的庭院既連接起了周圍的房子，也把它們分開。在傳統的北京，它決定了一個大家族的各房在同一棟建築裡的居住空間。趙老告訴我們，過去，他父親住在西廂房，住在東廂房的是他的姐姐，英文名字叫露西，中文名叫趙蘿蕤。她在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論文寫的是亨利·詹姆士，她是位傑出的中國翻譯家，曾在東廂房花了十年時間翻譯完了惠特曼的《草葉集》，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七年之後趙蘿蕤去世。

根據趙老的說法，雖然確切的屋齡待考，但那座四合院不止三百歲。由於官方從未把它標定為歷史古蹟，一九九八年，區政府通知趙老要把它拆除。他上訴控告文物局沒有把這座建築列入

古蹟保護的名單。更讓趙老生氣的是，拆掉它的理由竟然是為了蓋最俗氣的現代建築：中國建設銀行分行。

「有一年多，一點動靜也沒有，」他說，「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之前，他們對拆什麼都小心謹慎，因為正值建國五十週年慶，他們不想惹麻煩。但是在那之後，他們又開始了。不管是否還有人住在這一帶，他們都切掉水電，迫使居民離開。」

二〇〇〇年七月，這個案子上了法院。趙老的律師指控北京文物局的調查太草率：官方只訪問過他家兩次，而且每次只花幾分鐘在屋內走一走，就決定它不能被定為古蹟。在法院，中立的專家作證說，趙家的房子至少可追溯到清初，也有可能是結束於一六四四年的明朝。他們甚至在一張十八世紀的地圖上找到這棟建築。但是這些證據都沒用，法院裁決古蹟的認定完全是根據北京文物局的定義。只要北京文物局說它該拆，其他的都不重要。

但是老人不放棄。他交遊廣闊，這也是他無畏抗爭的原因之一，他再度上訴，這次告的是地方的房管局，這個部門按照賠償的規定，同意根據房子的品質和大小賠償他。最後和解的金額接近三百萬人民幣（超過三十萬美元）。趙老跟他們說那數目太小，不過，他跟我們說他的回絕是一種法律策略。

「這跟錢無關，」他說，「這間房子是我的。我父親買的，我在這兒住了五十幾年。聽聽著名的建築師貝聿銘怎麼說——他說，北京已經鏟平了太多的四合院。問問任何一個外國人他們記得北京的是什麼，是『胡同』。如果外國人都要保護這樣的地方，中國人為什麼不呢？現在全中國只剩下兩個城市是完整無損的——平遙和麗江。五千年的歷史就只剩下這兩個地方！」



他提到的兩個城市，一個在中國的北方，一個在西南。說到這裡，老人向後仰起頭，抬起下巴，眼神閃閃發亮。他換成英文，一字一字清楚地說：「身為中國人，我有責任保護這個地方。我不會自己離開的。法院可以來，警察可以來，救護車可以來。他們可以強迫我離開，但我不會簽字同意他們拆這間房子。對他們，我只有兩個字：不搬。」

\* \* \*

在中國，其他古老首都的歷史都比北京長久，但是，沒有一個城市像北京這樣被創造得這麼謹慎小心。這城市蓋上了胸懷大志的明代永樂帝的刻印，永樂帝的艦隊曾經遠征印尼、印度和非洲東岸。在原來的首都南京，永樂帝曾經企圖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石碑。

他對北京的計畫更加雄心勃勃。一四二一年，永樂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北京曾經是北方人（例如蒙古人）的活動中心。過去，這個地方出現過城市，但是，永樂帝建設它的態度多少就像他蓋那座大石碑一樣，一切從一塊空白的巨石開始。他以中國傳統的地理概念規劃這座新都，一切都嚴格地沿著南北軸線展開布局，皇宮坐北朝南。整座城市反映的是一個神的身體：特定的廟宇、景觀的位置呼應著哪吒的頭部、手腳和其他身體部位。幾個世紀下來，這座城市不斷擴張，但是原始的輪廓從未消失。

二十世紀前半葉，當世界上許多城市隨著現代化而轉型時，北京相較之下原封不動。政治的不穩定妨礙了中國的成長，而當國民黨主政時期，南京再度被確定為首都。即使是在日本占據期間，北京的整體性依然得以保持，未受破壞。事實上，日本人曾經要維護這座老城

市，計畫把所有新開發的地區集中在一個獨立的衛星城，但這個計畫沒有執行。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之後，共產黨把北京設為新中國的首都。這在世界上是很罕見的——一個在十四和十五世紀設計的主要都市，幾乎從未被現代化或戰爭所影響。

毛澤東就跟永樂帝一樣，是個心懷大志的統治者。他期望北京成為一個工業中心，城裡原有的圍牆被視為進步的阻礙。一座接著一座城門和城牆以不同的理由被拆除了：為了採集石磚，西便門於一九五二年被毀壞；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年之間，為了修建道路拆除了地安門；一九五六年，朝陽門因年久失修而坍塌；一九六五年，東直門因為建築新鐵路而被拆除；崇文門在一九六六年因為蓋另一條新鐵路線而被拆除。共產黨掌權之前，十五公尺高的城牆和它的城門，曾是這座城市最顯著的景觀，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差不多所有的城牆都被拆掉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剩下的寺廟不是被拆，就是被變更為其他用途。

很多胡同倒是在毛時代存活了下來。毛澤東的工業發展計畫基本上只是個想像，理論背後毫無實務作為基礎。他雖然拆了城牆毀了城門，卻從未創造出改變眾人實際居住環境所需要的繁榮。文化大革命之後，北京市中心的住宅區大多依然保持老樣子。

但是，當改革浪潮一起，市場力量驅動下的拆除遠甚於毛澤東。北京迅速發展，人口從一九四九年的七十萬人，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有一千二百萬人。道路必須拓寬，商業力量誘使一棟棟大樓取代了原有胡同，銀行似乎比四合院更重要。在北京的生命週期中，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是北京外觀上改變最大的一段時間。

但不管怎麼轉型，很多舊時的名稱還是保留了下來。沿著二環路有朝陽門、東直門、崇文門的地鐵站和路口。這些城門本身都已不復

存在，但是它們的名稱仍然代表著重要的地理意義。如果你到了地安門這個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交通號誌、水泥路面，還有川流不息的紅色計程車，正迫不及待地穿過那座在記憶裡標示著北京北部軸線的建築。計程車司機可以帶你去紅廟，但是那裡再也沒有廟了。復興門不復存在，安定門只是個名字。老北京變成一座徒然留下名字的城市：當居民穿梭在現代化的北京時，卻被一個個想像中的地方所召喚。

最後一個字總是「拆」：鏟平、拆除。在北京，這個字總是被塗漆在被告知要拆除的建築上，在老城區內到處可見。這個字通常約一百二十公分高，被圈起來，很無政府主義者的象徵標誌：大寫A外加一個圈圈。



隨著北京的改變，這個字逐漸附上了魔力。居民們說著「拆」的笑話，藝術家們拿它借題發揮。一家商店賣的棒球帽，帽沿上印著圈起來的拆字。菊兒胡同裡，一位叫老王的鄰居喜歡拿「拆」開玩笑，「我們住在『拆哪兒？』。」「拆哪兒」聽起來就像英文的China。老王說，自從他有記憶以來，人們就在拆北京的古建築。一九六六年，他跟其他同學還一起被叫去幫忙拆安定門。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整個秋天，訪問趙老的中國記者川流不息。他的案子成為新浪潮的一部分——一九九〇年代後期，曾經有幾樁私人控告政府的案件，包括幾件集體訴訟案。不管有沒有贏，那些案子都獲得

中國媒體顯著的報導，用來展示政府是公平的。大部分的控訴案都失敗了，而且你再也聽不到下文。它們被留在改革的煉獄裡，在那裡，就算立了案也永遠不會贏，記者可以調查但永遠不能報導。其他省分的報紙上出現過幾篇跟趙老的訴訟案有關的報導，但在首都，媒體的管制很嚴。北京的記者到四合院去，就好像是一種儀式：雖然不能報導，但對這件事情懷有敬意。

新聞管制是居民不大關心舊城區被拆除的原因之一，但造成人們被動的還有其他因素。胡同裡，有很多人家沒有抽水馬桶，居民們只得用公廁，因此他們通常很樂意搬到新公寓。他們很難想像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說，像很多歐洲城市，可以做到現代化但不破壞古建築。最終，像趙老那樣單一家族的四合院就是很罕見的案例：一座建築具體呈現了一條直線的人類歷史。因為，一九五〇到六〇年代的政治運動鼓勵無產階級占據有錢人的房子，很多單一家族居住的四合院用臨時的建材分成若干家。改革開放之後，建商要把這些暫時住戶遷走並不難，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產權的合法所有人。

即使像趙老那樣有合約為證，法律也不見得可以提供完全的保障。在一九八二年被採用的國家憲法明文規定，所有土地都是國有的——那時，趙家擁有他們的房子已超過三十年。個人雖然可以有買賣土地的使用權，但是一旦跟國家的利益相衝突，政府就可以強行銷售那塊土地。問題是，在權力分散的「拆哪兒」，國家利益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地方當局才經常是真正重要的一層，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扭曲「國家利益」。

根據趙老的律師所說，如果四合院被拆了，這塊土地的使用權會被轉賣三次。首先，地方政府會從老人手上買下土地權，然

後馬上轉手賣給公營的營造商，從中獲利。最後，營造商會再度抬高價錢，把它們賣給也是公營的銀行。換句話說，在什麼都還沒有蓋之前，三個不同的政府部門會彼此買賣這塊地。這一路下來，價錢會比他們當初付給趙老的大約高過十倍。

趙老的第二個訴訟主要是控告政府沒有提供真實的市場價值。九月二十一日早上九點十五分，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案子做出了判決。法官走進場，要求大家站起來，然後他讀了判決書：趙老和他的妻子必須在五天內搬出四合院。如果拒絕，地方政府有權強迫他們離開，拆除他們的家。

一家北京電視台的採訪人員等在法院外頭，在那兒，趙老的律師和政府的代表展開了一場爭論。律師發誓他一定會想辦法上訴，兩邊罵來罵去。電視台錄下他們的爭執，但晚間新聞並沒有播出。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趙老和黃哲仍然沒有離開。老婦人看起來有點緊張，她告訴我，聽說警察什麼時候都可能出現。但是她的丈夫看起來精力充沛。「他們得強迫我離開，」他說，「否則，我是不會走的。」

九月底是北京最舒服的季節之一，那天天氣好極了。那座四合院的庭院裡，下午的陽光正向東朝著趙蘿蕤翻譯惠特曼的東廂退去，一片玫瑰花綻放在即將到來的冬天裡。一架巨大的黃色起重機陰森地高高吊在我們頭上——隔壁已經開始建起銀行。幾乎所有的鄰居都搬走了。

那天早上，趙老在清華大學跟幾位退休的教師打了場網球。他跟我說他贏了，六比二。他似乎很樂觀，給我看一些近來留在

前門信箱裡不具名的支持信。一封信署名是「首都的公民」。

這對夫婦沒有小孩，朋友告訴我，文革期間他們吃了不少苦。趙老從不細談那段時間，每次提到那主題，他就跳過。我問到他在美國的兄弟，他說一個是退休的作家，另一個是退休的地質學家，叫作愛德華·趙，他的事業生涯都在美國地質調查所度過。

「你知道美國人登陸月球，」趙老說，「他們帶回了黑月石，很多地質學家想要研究這些石頭。四名地質學家被選中，我哥哥是其中之一。之後他被隔離檢疫了兩個星期。他們不知道那些石頭上可能有些什麼樣的細菌。」

下午陽光的影子正越過庭院，我們移到屋內的主客廳。我問趙老，他對當初戰後回中國的決定有沒有後悔過。

「我們誰也沒有後悔過，」他說，「我的兄弟們選擇了他們的路，我選我的。當然，一九九八年政府開始說要拆這間房子時，我的兄弟們邀請我去美國，但是我不去。我是一個中國人，就算我去了美國，我還是中國人。」

整個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趙老都沒有見過他的兄弟。直到一九七二年，在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後，地質學家以美國代表團的成員身分，第一次回國。趙老指著客廳裡一份姪兒給的禮物：一面來自伊利諾州春田市的紀念牌，上面是林肯的素描畫像。

每次經過庭院，它的規律總給人一種安定感：準確的角度、四四方方的建築。我想像著，那些年，當老家長住在西邊，女兒在東邊，兒子在北邊，這房子是什麼景象。但是一踏入客廳，這份規律感馬上就消失了，牆上掛的東西反映出不同的世界曾經過並留在這個房間裡：林肯的紀念牌旁，掛著一面北京網球中心頒

發的獎牌。不遠處，一個橘色的Wham-O飛盤吊在電視天線上。飛盤上方掛著兩幅紀念趙老父親的書法、一張他父親的黑白遺照、一幅耶穌教導法利賽人的畫、一幅中國山水畫、一個塑膠的聖誕老人、更多幅書法，以及另一座網球獎杯。

屋外，九月的傍晚安靜了下來，老人繼續說著話，如同以往，中英文換來換去，英文換中文，中文換英文。

\* \* \*

中國人以他們的歷史為傲，尤其是在外國人面前。他們對連續不斷的文明的描述會讓人想昏昏欲睡，但過了一段時間後我才發現，我幾乎沒見過什麼真正古老的建築。剛開始我以為那是因為它們都被拆除了。二十世紀是具破壞性的，我猜，建築是在那段期間遭殃的中國文化之一。

即使看到留存下來的老建築，像是趙老的四合院，我會發現多年以來它們有很多材料已經被換過。他的家就像紫禁城或任何中國的傳統廟宇，是用木材和磚瓦蓋成的。中國很少有石頭壘砌的建築。明朝的長城有些部分是鋪石的，但那是一個防禦性、而非用來做紀念或公眾使用的建築。中國的建築全然不是為了承受漫長歲月而設計的。

最關心古建築保護的人，似乎很多都跟西方有關。當趙老談到文化保護時，他向我介紹了另一位北京的行動家，一位中法混血、致力於保護胡同的女人。不過，古城的一般百姓即使被迫遷離，對這些議題似乎都不怎麼感興趣。他們常對地方官員的腐敗感到氣憤，抱怨賠償不公，但這些都是個人而非文化的問題，我很少感受到他們對胡同有深刻的感情。



在過去，中國人對建築的關心淡漠得驚人。宋朝人嘗試過界定和分類傳統建築，但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系統的研究。一九二〇年代，建築學是個開放的領域，年輕的梁思成和林徽音來到賓州大學念建築。他們在一九二八年完成學業後結婚，並回到中國。

接下來的十年中，這對年輕夫婦為中國建築發展出第一套有系統的分類法。他們走遍華北，找出許多老建築，煞費苦心繪下草圖。在離北京不遠的地方，他們發現了建於西元九八四年的獨樂寺；在山西省，他們找到了西元八五七年蓋的佛光寺，這是中國至今所知最古老的木造寺廟。共產黨掌權後，梁思成企圖保存北京的古城牆，但是他失敗了。

一九四〇年，梁思成這麼描述他們夫婦做研究的困難：「因為中國建築史裡沒有重要建築的指南，我們只能像『盲人騎瞎馬』一樣地尋找老建築。」

這對夫婦經常仰賴農民提供訊息：

我的經驗是本地人對建築沒有興趣。當我告訴他們，我在找古文物時，他們會帶我去看有古代刻字的石碑。他們對書法感興趣.....看重的是書寫文字，而非木匠的手藝。

梁思成的心得讓我想到以前在涪陵的學生。雖然是英文系，他們還是必須修好幾個小時的書法課。我走進一間教室，常常看到一群學生握著毛筆，彎著背，一遍又一遍地練著同一個字。他們馬上就可以告訴我，班上誰的字寫得最好，誰第二、第三、第四。他們無法理解為何我的英文筆跡這麼潦草，他們無法相信以我的教育背景——在兩所大學念過文學，卻連字都寫不好。



在涪陵，我的學生看得出像我這樣的西方人看不出來的文字之美。而在北京，我感覺到，我看到了古城的一些東西，但大部分本地人卻很明顯地看不到。跟很多西方人一樣，我從小就學到：「過去」躲藏在古建築裡，像是金字塔、皇宮、競技場、大教堂等等。愛奧尼柱式、多利克柱式、哥德式、巴洛克式建築，都是我可以從中學課堂回想到的名詞。對我，那就是古代，但是中國人的古代似乎在別處。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日

老人很生氣。他穿著整齊，灰色高領毛衣、藍運動外套，他在客廳見我。但是他的眼神不耐煩、沒興趣聊天。那天早上，他贏了球賽，但是他不願意告訴我比數。「跟八十幾歲的人打，沒意思，」他揮揮手說，「他們太老了。」

所有的法律程序都用盡了。最後的希望是某個高幹會對這個案子感興趣並介入，但是可能性不大。趙老說，朋友已經幫他安排了一間公寓，以防拆遷的命令真的下來。整棟四合院四周，其他房子都已變成了磚和塵土。那天稍早，最後一批鄰居也搬走了。這對老夫婦是胡同裡留到最後的兩個人。

他帶我看房子裡他希望能保存的部分。主屋的古董大門，以及一塊叫「象眼」、有著古代裝飾圖案的磚雕，將會被捐給現代文學博物館。我們往外走，老人帶我穿過逐漸暗下來的庭院。白天愈來愈短了，氣溫有些涼。他指出庭院的一個地方，幾十年前，那裡有個防空洞。

「那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他說，「毛澤東說每家都得有防空洞，那時候美國人是頭號敵人。」

他依然堅持，直到他們強迫他才會走。「法院的人會來，警察會來，救護車會來，」他冷冷地說，「到時會很熱鬧。」

來了一位中文報紙記者，我們三人因此回到客廳。那位記者很年輕，不知道是處在一個老人和外國人之間讓她不自在，還是覺得採訪一則不能報導的事件是徒勞的，她結結巴巴地問出第一個問題：「你的東西都搬走了嗎？」

「妳說呢？」老人反問，「妳沒看到我的東西都還在這裡？」

那女人看著牆上，毛筆字畫和老家長的照片，林肯和年輕的耶穌。她虛弱地笑一笑，試著問另一個問題：「你不高興嗎？」

「我當然不高興！換作妳，妳會高興嗎？我們已經被這件事威脅了兩年半，我們都八十幾歲的人了！」

我禮貌地欠身告退，離開四合院。背後，女傭關上了門。我往北，走過劃分保護區的那條看不見的線。我在菊兒胡同的家，一切都很安靜。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下午三點三十分，我的行動電話響了。

「他們星期四早上要來拆，」老人說，「我沒什麼能做的了。」他說，他們會暫時搬去跟朋友住。他的聲音不帶任何感情。他用中文說，然後換成英文。

「我能說的就只有這些。我打電話給你，沒別的用意。」在我回答之前，他就把電話掛斷了。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起床時，我就知道這會是個又長又冷的一天。這天正好是法輪功的週年慶，下午一點，抗議群眾計畫到天安門廣場示威。但首先，我從菊兒胡同往南走，傾聽胡同清晨的聲音。小販都出來了：啤酒、醋、醬油。米、米、米。鳥在槐樹上鳴啼，在秋天的空氣裡，牠們的聲音變稀落了。

四合院坐落在寬街交叉口的南邊。大門上已經貼上了政府收回的公告，院落古老的灰色牆壁上，有人貼了一張北京市防範經濟罪犯的廣告。這或許是對「拆哪兒」的有意嘲諷。

在前一天，趙老和他的妻子離開了，他們走得很安靜。沒有警察也沒有救護車。但即使他們不在場，拆除也還是一件大事。數十名記者，中外都有，八點不到就來了。八點二十分整，十五位法院人員到場。他們穿得一模一樣：白色襯衫，黑西裝，黑領帶。胸上別著紅胸章。他們走進屋內檢查，確定裡面完全沒有人。

八點三十分，一隊白色警車到達。超過五十名警察在便衣警察的協助下，包圍起整棟建築。他們清理人行道，圍起黃色塑膠警用布條。他們欺凌過路行人，找記者麻煩：一兩名攝影記者的照片被沒收，幾位外國電視記者被扣留，一位中國記者在扭打中受到輕傷。

最後到的是工人。他們是從四川來的民工，其中一個人告訴我，他們的工資一天不到兩塊半美元。每個人手上都拿把尖鋤。他們從屋頂開始，敲磚除土，接下來拆牆：灰、泥、磚。塵土、塵土、塵土。拆、拆、拆。一輛挖土機從南邊入口駛進，運土車跟在後頭。那是一個美麗的秋日，天空很高，湛藍無雲。到了下午，那座四合院已成歷史。

\* \* \*

過去正被建造著。它躺在一座座房屋、一條條高速公路，以及一個個建築工地的下面。通常，它會不經意地重現——某人在挖地的時候，突然就挖到了什麼東西。到頭來，大多數在中國出土的古文物都是碰巧挖到的。

這樣的模式讓任何考古學家或歷史學家都沮喪不已，因為即使是最宏偉的發現，其來源也大多平凡無奇。有個人生了病，卻發現買來做藥的龜殼竟然是甲骨。一九七四年，中國北方發生了乾旱，西安城外的農夫在挖井時，竟挖出了秦始皇的陪葬兵馬俑。一九七六年，在一場全國性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為了趕上大寨公社，安陽的居民被派去移平山丘以創造良田。那是毛澤東的另一個天才想法，雖然並不具任何農業價值，但卻意外地挖出了殷墟婦好墓，裡頭包含了考古發現有史以來最豐富的商代青銅器和玉器。

古文物重新出土的速度隨著改革開放而加快。這次推動的力量來自於經濟而非政治，已經不再有「農業學大寨」之類的競賽了。市場經濟，除了熟練地摧毀舊城市，也是個相當有效率的發掘者。相對於推土機的陽，市場經濟是陰。像北京這樣的古城消失了，像趙老這樣的四合院被拆除了，但是各種新建設也以空前的速度打開了古墓、挖出了地下城市。「拆哪兒」的經濟在摧毀過去的同時，也發展出過去。

在四川的金沙，一家建設公司在建造一條商業街時，一名工人不小心撞上一座墓，結果發現它竟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西安城外的一項高速公路工程，挖出了漢代第四任皇帝漢景帝的墓穴，以及赤陶人形陪葬品。在洛陽，建築工人在挖開一家購物商場的地基時，意外發

現一座東周的古墓。考古學家的工作就像救難隊，每當有建設工程從地下挖出古代遺址，他們就會立刻被召喚去把工作完成。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早上八點，在四川的三星堆，一群農人正在挖掘黏土，以燒製磚塊，突然挖到了一個藏有漂亮的玉器碎片的儲藏室。因此，考古學家接上手，那年夏天，他們挖掘出兩座大型葬坑，大約是西元前一二〇〇年，這相當於商朝時期。他們找到了八十支象牙、超過四千枚的子安貝貝殼、金質的手工製品、玉、石、琥珀與陶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中發現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展現出的精湛工藝及藝術風格，顯然是出自高度文明的產物。這批青銅器的造型，包含了一棵約四公尺高的青銅樹、一座超過二點五公尺高的男性站立人像，以及超過五十顆的青銅頭像。這批青銅器的造型跟以往在中國挖出的截然不同，事實上，在考古學的紀錄中，要過了近千年，類似的人形雕像才再度出現。三星堆的這些人型塑像一點都不像千里之外的安陽古文物。在四川的墓地裡，沒有甲骨或是有銘文的青銅器，沒有發現任何文字。沒有人知道這些東西究竟是何人製造的。

【古文物E】

## 青銅頭像

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上政治力量源自中央的國家，想像文化有著相同的源頭，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蔣介石認為，像維吾爾人和西藏人這樣的少數民族最早都是漢人，他們只是從中央平原漂流出去，經過了幾世紀的孤立，語言和文化漸漸地改變。在二十世紀早期，考古學家也用類似的言語來形容古代中國。文明沿著黃河流域中游，在中央平原一些像安陽這樣的地區開始發展，隨後，向外擴散。中國人想像他們有著共同的根，一股統一的欲望激勵他們在八年抗戰及內戰中，持續地挖掘安陽的古文物。考古學幫助了中國的統一。

在世界其他地方，二十世紀中葉，這種文化擴散的觀念受到了抨擊。近東及地中海的許多專家發現，這一觀念可能是受政治力量驅動而形成的。於是，他們開始探索關於文化發展的其他可能解釋，例如，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中國很慢才接納這個理論，部分原因是中國的現狀「投注」了統一和連續性的觀念。另外還有一條原因是，大部分的考古重心的確都集中在安陽。

然而，從一九八〇年代起，改革開放有助於人們接受不同的想法。當國內的移民和旅行者注意到這個國家的多樣性時，發現新事物突然成為一股風氣。在一九八〇年代，《靈山》的作者高行健和《非法流浪》的作者馬建等作家，都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旅行，然後出版了描述中國黑暗角落的著作。一九九〇年晚期，西藏和雲南成為中上階級的中國人國內旅行的熱門景點。少數文化的獨特性受到讚頌，儘管

那些文化是以歌舞團或色彩繽紛的傳統服裝之類的做作方式來表現的。

與此同時，建築工地裡陸續挖出的古文物，也並不完全符合人們對古代中國的傳統認識。在一九八〇年代，湖南和江西等南方的考古學家主張，他們的青銅器皿和商代的完全不同，應該被視為一種不同的文化。剛開始，大部分中國學者抗拒這樣的論點，但是三星堆出土的證據讓他們無言以對。只要看過這裡的青銅頭像，根本就不可能再辯稱這個文化源自於安陽。它們很明顯是各自獨立的藝術，而在湖南和江西出土的古物也是一樣的情形。考古學幫助了中國的分裂。

最後，什麼東西正好被發現，這些發現又如何被理解，大多仰賴當時的狀況。一個人和一件古文物的關係到底是被國家主義還是地方主義所形塑，關鍵在於視角——如果一個人相信他是站在中心，那擴散在他眼中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你是從外面一步步走進去，這個文化看起來將會截然不同。

**【觀點一】**

距離：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八公里

地點：美國紐澤西州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麥克密克專館，四〇六室

評論者：貝格利

貝格利教授是一位研究古中國青銅器的學者，以才智及嚴謹著稱，他對歷史學家及考古學家在沒有掌握證據之前就妄下假設的傾向，常予以批評。他有著澄澈的藍眼睛，講話斟酌慎重。當我為《國

家地理雜誌》專訪他時，他強調說，中國的傳統心態對新的考古發現的回應總是很慢。

他說：「典型的史學傳統總是對找到一個單一的發展線索有興趣，由一個早期的君王傳下合法的規則給後繼者，他們不談傳承這條直線以外的任何事情。而甲骨上記載的，當然全是安陽帝王的觀點，這就像是在《紐約客》的地圖上，世界上大多地方都由曼哈頓所構成。」

他接著說：「現在的難題之一在於，大部分的考古資金都投注在安陽及其他北方遺址，因為書寫的歷史紀錄都告訴你這裡才重要。但很諷刺的是，真正引起轟動的發現，卻都是在三星堆之類的地方偶然出現的。三星堆告訴我們的，是我們之前都沒看過的東西。」

學者們推論，三星堆文化與中亞、印度或緬甸可能有關係。但是關係並不清楚，這些青銅頭像與其他已知的古文物並不十分類同。它們有可能只是來自某個在四川發展過的、而後消失的先進文明。

「有一個觀點是這樣的，」貝格利解釋說，「因為中國二千五百年的傳統說，我們都來自黃河流域的中游，因此，不管有多麼特別或多麼驚人，在黃河流域之外發現的任何古文物，都不是那麼重要。但是，身為一個對於『中國』的定義並沒有任何預設心態的外國人，我可以說，嗯，大約在西元前一三〇〇年時，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其中有些事情在中國後來的歷史裡變得很重要，也有一些事，因為某些不明因素，並不太受重視。在四川，後來並沒有人繼續做著大型青銅塑像。但是，如果你光是看著西元前一三〇〇年，先把『中國』這個詞忘掉，因為這時地圖上還沒有黃色的那塊。如果你只看那時的亞洲東邊，會看到那裡正發生著許多有趣的事情，而且充滿著多樣性。許多



地方都有高度開化的族群，它們彼此保持聯繫且息息相關，但卻有著明顯的不同。」

雖然在三星堆沒有發現任何書寫的痕跡，但這並不表示這個文明沒有文字。那些古代人也許書寫在易腐的材料上。在安陽，書寫的痕跡能夠被保留幾千年，那是因為它們被刻在甲骨和青銅上。大多數學者相信，商人也曾在竹片或木頭上書寫，但這些材料無法在地底下存留幾個世紀。唯一能證明該書寫形式存在過的證據也是間接的，例如說在甲骨上有一個符號，被認為是「冊」的早期字形，「冊」在現代的解釋是寫字的書簡。這個字在商朝的樣子，很像把竹片或木片用皮質的帶子繫在一起。那個東西早就已經消失，然而代表它的字形仍存在著：



「那樣的文字肯定有助於提高安陽在中國人眼裡的重要性，」貝格利說，「因為它是至今仍被使用的書寫系統的祖先。但我們在安陽發現文字可能純屬僥倖。我們真正有的是什麼呢？我們有龜甲上的占卜。你可以想像安陽的商王其實一直在記錄歷史，但是，是記在容易腐爛的材料上的。然後你接著想像，在大約西元前一二二〇年時，有位商王說，為什麼不把它刻在我們用來占卜的甲骨上呢？這就是考古紀錄的開始，它可能只是出自某個商王突然的怪念頭而已。」

由於歷史上多數王朝都建立在北方，所以傳統上總認為南方是比較落後的。但考古學發現，在南方，比如四川，農業方面的發展其實很早。

「我對長江中游一帶很早就有稻米耕種活動的證據，深受震撼，」貝格利說，「一般中國人的觀念總是認為長江地區是沼澤地，一直要到北方人帶來文明後才逐漸開化。我懷疑那根本就是錯的。」

他接著說：「在考古學中，你根據所找到的證據重建對過去的認識。但那些被找到的東西是些很偶然的蒐集。它是被修路的工人、磚頭工廠，或是正在田裡挖土的農人所發現的。你只知道發現了些什麼，卻不知道還沒被發現的是些什麼。」

### 【觀點二】

距離：一千五百多公里

地點：北京市霄雲路二十六號，鵬潤大廈B座樓一五〇九室

評論者：徐朝龍

徐朝龍是個背離學院路線的考古學家。他沒有被免職，也沒有失去信心，但是他已經脫離了學院派。不久之前，他還被視為中國前途最看好的年輕學者。徐朝龍在四川長大，畢業於四川大學，一九八三年拿到日本東京大學的獎學金，他的一些畢業論文研究跟印度河流域有關，後來他改以故鄉的考古為研究重點，曾經獲得日本幾個主要的大獎和研究金。一九九〇年他完成博士學位後，開始任教於日本茨城大學。

徐朝龍是位受過古典訓練的小提琴家，因為教二胡而認識了他的日本妻子。他的日文說寫流利，出過八本考古學的書，大多是有關長江流域，每本都是以日文寫成，在日本出版。徐朝龍說他太忙了，還

沒有時間把它們翻譯成中文。一九九八年以來，他在京瓷集團，一家做行動電話、相機和影印機的日本公司工作，閒暇時間則研究考古。

不同國籍的學者對徐朝龍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年輕的中國考古學家說，他為了取悅日本妻子而改行從商。外國考古學家則認為，是因為中國在這個領域的狹隘與保守，讓他覺得挫折。但每個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一致同意，他對故鄉四川深深的愛激發了他從事考古，但也限制住了他。他是當地的英雄。但不像貝格利這樣的外國學者，以文化和政治的角度談三星堆，徐朝龍用的語言主要是經濟上的，那是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長大的年輕人常用的語言。

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給我看他在日本出版的一本書：《五大文明》。

傳統上的四大文明指的是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和黃河流域，他說：「現在你看看米的重要性——全世界都在吃米。但是產米地區的文明並不被重視。事實上，大多數中國領導人都是來自米鄉。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朱鎔基、李鵬、胡錦濤全來自南方。自清亡以降，都是南方人領導著這個國家。」

「北方人統治了中國二千年，對考古的走向當然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到，中國文明的中心不止一個，它是兩個古中心的結合。」

我們坐在一家日式極簡主義風格的房間裡。四張長椅，一張桌子，一些絲花擺設，和一盆塑膠做的棕櫚盆栽。屋內沒有窗戶，白牆上什麼也沒有掛。房間隨著徐朝龍的談話而加溫。他的中文講得很快，句子短促而清楚，表情隨著訪問的進行愈來愈生動。他緊張地變換姿勢，咬著手指關節骨，愈講愈快。他身穿一件新的白襯衫，繫著

藍金色的絲領帶，金邊眼鏡，銀色的勞力士錶。我問他怎麼會到京瓷工作。

「他們贊助我在國際研究中心做一個有關日本研究的案子。我那時主要研究的是長江文化。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後來在京瓷的老闆跟我說，我有做生意的天分。他說我可以學德國人施里曼，施里曼既從商也考古，他發現了特洛伊古城。我的老闆說：『你可以跟那個傢伙一樣。』」

「中國現在正面臨著很大的改變——經濟在改變，政治也在改變。這些改變的力量是從哪裡來？從南方。人們開始重視長江的米文化，將會對中國的經濟有很大的影響。為什麼南方應該帶動中國的經濟？因為它在過去就是那樣。長江流域絕不是蠻荒之地。」

「關鍵在於，米。全世界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口靠米為生。這個穀物的來源應該被視為偉大文明的來源，我們可以把它叫作米的文明。黃河流域則是黍麥的文明。」

訪問的最後，他再次提到政治把中國的考古學扭曲了。「從前，領導人把心力放在政治控制上是很重要的，」他說，「但是，現在是一個以經濟而非政治為主的世紀。經濟的聲音變大了，它會改變權力的觀念。江澤民最近去看過三星堆的青銅器，我聽一個朋友說他很感興趣。再看看政府的其他部門，為什麼那麼多領導人物來自南方？南方有自己偉大的古文明，人們要做的是把它找出來。一旦找到了自己的過去，人們將會更有自信，他們就會有更多的力量去發展他們的經濟，在政治系統裡就會更勇於表達自己。政治、經濟與文化是不可分的。」

**【觀點三】**

距離：一百多公尺遠

地點：四川省三星堆一間農舍

評論者：許文秋

許文秋身高不到一百五十公分高，但是她有一種中年農婦常見的厚實。她有雙長老繭的手、結實的腿和寬大的腳，便宜的網球鞋上裝飾著美國國旗。當我解釋我在幫《國家地理雜誌》做調查報導時，她說，她從來沒聽過那本雜誌。我問她一九八六年那個早上，她和其他農民挖黏土的事。

「那天是農曆六月十八，」她說，「我記得很清楚。大夥兒挖著挖著，然後在八點鐘他們就挖到了玉。接下來，我看到大夥兒全跑開不見了，那玉也不見了。」

她笑開了，這時一群鄰居也加入，在像三星堆這樣的村子做戶外訪問，要有隱私是不可能的。那是個涼爽的早晨，也是油菜花的生長季節，四周的農田閃著一片金黃。那女人住的房子很簡樸，泥土牆，瓦屋頂。不遠處的田地上，現代造型的三星堆博物館如海市蜃樓般矗立著。婦人跟我說，一九八六年夏天，所有挖到的玉器全被要求立即歸還。

「一些考古學家來勘查，他們發現了那個有名的金面具，」她說，「但是，陳老師跟我們說那是銅器——他是騙我們的。他要我們把那個坑蓋起來，那天後來軍隊就來了。真的，那個面具是金的。陳老師只是擔心會有什麼事發生，那是第二天的事。」

「那年夏天，我們幫他們挖地，那是我們的工作。有時候是用挖的，有時候是用刷子清掉上面的東西。他們給我們一個月不到一百塊錢，是有供吃的，不過那叫什麼食物，最多就是些餅乾。他們很小氣。」

我問她，她認為地下還有沒有其他古物。

「那很難說。」

「好吧，那妳想，下面可能還有些什麼東西？」

那女人瞪著我看。有時候，記者會故意放線等魚上鉤，問的問題一聽就是明顯的圈套。但有時候，記者的圈套會被農民識破。一個狡猾的笑容閃過那女人的臉。

「唉呀，你如果這麼有興趣，你應該自己去挖呀，」她說，「我又不會制止你。」

旁邊的人都笑了。我一時為之語塞，只好試著改變話題，我問到她的丈夫。

他是最早參與挖掘的農民之一，現在在博物館做些維修的小工。

「他出去了，」她說，「你知道嗎？他的照片掛在博物館裡面。照片上有他跟其他挖到那個坑洞的人。那張照片到過很多國家，但是博物館還是只付他二百元一個月的工資。」

「唔，那不錯啊，如果他只是兼差。」

「你在說什麼，那算不錯？」她說，「你說不定一個小時就能賺那麼多！」

更多笑聲。我問到他們的田：他們只有零點零六公頃的地。夏天種米、冬天種小麥和油菜籽，至於蔬菜……

「你每個月賺多少錢？」她突然問。

「嗯，不一定。」我說，「每個月不一定。」

「我敢打賭一定不少。」她說，「你住在北京，不是嗎？」  
我點點頭。

「我做夢也夢想不到北京！」  
笑聲。

「我最遠到過重慶，」她說，「你的生活一定很好哦。我敢打賭，你什麼都不用自己出錢。吃飯、旅行、坐車——你的工作全都幫你付，對不對？」

我承認那基本上是真的。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我把最後的希望放在數位相機上。我幫那女人拍照，然後給她看相機上的螢幕。

「就跟一部電腦一樣。」我解釋道。

「我的頭也是腦，」那女人開玩笑說，「不是電子的腦。」她看看她的觀眾，接著說出那句關鍵的話：「不過，壞掉啦！」

還是那個星期，後來，我跟四川省博物館副館長、農民稱之為陳老師的陳顯丹見了面。當我提到那婦人說的金面具一事，陳老師笑了一笑，「一旦發現了那個東西，我們就停止挖掘，」他說，「那個時候我挺擔心的。」他們在下午兩點半挖到那個面具，軍警五點鐘才到。他擔心的是那兩個半小時會發生什麼事。

#### 【觀點四】

距離：一層薄棉布

地點：三星堆博物館儲藏室

省博物館是我最喜歡的地方。它們的館長很喜歡看到外國記者，總會盡其所能讓我看到想看的東西。他們好像相信作家要真的接觸到東西才好。有時他們很興奮地把一堆古文物放到我手裡，一件接一件，換得很快，直到我開始擔心可能會把什麼給摔壞。你摸摸這把箭，握握看這個有多重；你看看這個碗，瞧瞧這個酒杯。我好像是在一個餐宴上被當作貴客請喝白酒：乾杯，再乾杯，直到最後，我不得不告退。我喝夠了，酒量不如從前，謝謝你的熱情款待。

但是在三星堆博物館，他們不准我空手拿任何館藏物品。他們給我一副跟亞麻一樣薄的白棉手套，我可以感覺到手中的青銅材質。歷經幾個世紀後，那金屬又粗糙又冰冷——那些凸塊和不規則的紋路賦予了青銅器獨特的個性。

他們把六個青銅頭像一個個擺在桌上，我走來走去、一個個拿起來看。兩個管理員在一旁看著，偶爾我會問個問題，大部分時候我們都很安靜。感覺就像逛古董珠寶店，但他們給我很多時間，也沒有人強迫推銷。

沿著桌子走了幾圈後，我決定了我最喜歡的一件。那個頭像，長度有三十多公分，到下巴的地方為止，大約九公斤重。青銅頭像上的一些補片看得出磨光的痕跡，它的顏色發光，比玉還深。臉很有型，頗具現代感——線條銳利、有稜有角。耳朵長，向外延伸。眉頭如兩道弧脊向下垂。鼻子在臉中央皺起後，向堅實的顴骨散開。嘴巴則筆直如紙上的一道線。

那頭像又長又瘦，眼睛的誇張形狀一定會吸引你的注意力。這對眼睛線條分明，沒有瞳孔，一條長細的水平摺痕穿過每隻眼睛中間，從而帶給這青銅頭像一種超然於世的表情。它也許是人，也許不是。



那對眼睛也許空洞，也許滿盈。這塊金屬是三千多年前做的。我雙手捧著那副青銅頭像，整個房間完全靜默。

## 第十章 週年慶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晚上十二點五十分

那封信是在事件的前一天寄到的。它是以密碼寫的電子郵件，寄信的對象是外國記者：

十月二十六日廣場上將會有場大型聚會，隨時會有人到場。我們所知道的是，高潮之一將會出現在下午一點鐘左右，在旗幟和紀念碑之間。這將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派對.....在可見的未來，不會再有這麼大的派對了。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

發出這封信的是一名北京的法輪功信徒。他是一位知道如何掩飾數位足跡的電腦行家，他的密碼總是寫得很小心。不過，不到兩年之後，他還是被警察在網咖監視後逮捕，並被送往勞改營。從這封電子郵件的語氣，你無法想像那將是場什麼樣的「聚會」，或者寄信人正冒著什麼樣的危險（「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他用的「派對」一字尤其讓人擔憂。這一年以來，示威者的膽子愈來愈大，活動日期也不斷地增多，就像是某種殘酷的獻祭儀式。四月二十五日後，接著是五月十一日，創辦人李洪志的生日；接著是五月十三日，法輪功週年慶；然後是七月二十二日，首則反法輪功法通過一週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一週年慶。

每到週年慶，廣場上都會出現示威群眾，每個參與者也很快學會如何扮演各自的角色。外國記者混在旅行團裡，不做筆記，通常只是

兩手插在口袋裡，站在那裡看著、記著。攝影記者得比平常更機靈，一位通訊社記者在脖子上掛了好幾台相機，有時三或四台，在胸前明顯地晃動著，手上同時還拿著一台小型的數位相機，藏在屁股後面拍。在不可避免的拘留發生之前，警察獲勝似地從每台看得到的相機裡拉出底片，但這時，數位相機已經消失在攝影記者的口袋裡。不論如何，其中總會有一張照片刊上第二天的報紙。

示威者也變得愈來愈嫻熟。他們還是循著同樣的基本規則，當被質問時，一定會宣認他們的信仰，不過他們盡量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來到廣場。有時，他們會戴著中國旅行團常見的那種便宜棒球帽，有時也會買只小國旗，看起來就像一個驕傲的外省人第一次參觀他們國家的首都。但有件事他們掩飾不了，他們沒錢。他們大多是純樸的百姓，很多人在國營工廠或共產黨時期的單位裡工作了一輩子，退休後卻飽受新經濟之苦——舊工廠不是破產就是改建，退休金不是少得可憐，就是一毛也沒有。改革開放對中老年人來說是一段艱困的時期，許多人因此投入法輪功中尋求慰藉，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廣場上，你常常可以從穿著認出他們：便宜的西裝，便宜的鞋子，便宜的棉襖。很少看到穿著體面的抗議者，他們之中又以婦女居多。

他們的抗議也愈來愈有技巧。有時，他們會按照既定的時間表行事，在固定的時間內同時行動，或是高舉雙手過頭，或是拉開寫著「真、善、忍」三個基本原則的布條，或者向空中撒傳單、丟冊子。五月以後，他們開始朝空中撒黃色的菊花，因為黃色是吉祥色。事後，警方會清掃那些花瓣，好像它們是些汙濁的東西。

警察則沒什麼長進。他們是這整個重複事件中沒有變化的部分，便衣警察依然以殘酷、沒有必要的暴力對付示威者。有時，似乎除了殘酷之外，他們什麼也沒有。當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發生時，你開始

發現，這些便衣警察根本就是一群無知的人。一如抗議者，他們屬於一個你容易認得出的階級：沒有受過太多教育、也沒有什麼正規職業的中國年輕男子。他們的長輩在經歷改革的年代後也許脫胎換骨，但是，這些年輕男人卻根本是一群失敗者，他們錯過了新經濟中的發展機會。

當那個時間一到——比如說，一點鐘，廣場上就開始了一場看起來有暖過身、但卻糟透了的運動。記者們有策略地在外國旅遊團裡各就各位，便衣們則試圖在衣著不堪的老年婦女中挑出抗議者。但是那些婦女大多認得出警察，盡量不跟他們碰上頭。因此，整件事變成一個慢動作的追逐：一個小平頭走向一群中年婦女，婦女們各自散開。對一個旁觀者而言，那是全北京最令人沮喪的情景——一群沒受過教育的年輕男人追逐著一群無助、年老、被虐待、沒有安全保障的中國老女人。你知道該支持哪一方，但你也知道誰都不會贏。

\* \* \*

十二點半時，所有人都到了。警察們埋伏著、閒逛著、逗留著。信徒們冒充成假遊客，搖著中國國旗，躲著便衣。記者們冒充成假遊客，雙手插在口袋裡。我已經累了，我的早上從趙老的四合院拆除就開始了，這個北京的一天逐漸變得感覺好像有一個星期長。

大多數參與活動的人等在廣場的北半部。這片鋪著石板的寬闊廣場被隔斷了兩次，首先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再來是毛澤東紀念堂，後者是座蹲在那裡的醜陋花崗石建築，裡面擺著毛澤東的遺體。紀念堂的兩側停著一輛輛車子。我很快地數了一下：十四部小貨車和十一部巴士。廣場上到處都是一點也不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的真遊客。

有人按捺不住，開始行動了。十二點五十分，廣場的東南角，一群假遊客突然舉起布條高喊：「法輪大法好！」警察快跑過去，一部小客車從紀念館疾駛過去。離人民英雄紀念碑不遠處，另一群抗議者也舉起他們的布條。旗杆前有人快速地丟出一堆傳單，兩部車子很快穿過廣場，往那些人駛去。更多布條、更多傳單、更多巴士和小貨車。東邊，我剛好站著的地方，一名信徒往地上丟出白色小冊子。出於直覺，我蹲下抓了一張，很快放進口袋裡：

天堂無法寬恕逆行

歸還我們的信徒

歸還法輪大法純真的名

我站起來，廣場已不是我認得的樣子了。活動在四處展開：傳單飛散，布條張開，人們叫喊奔跑。站在原地是不可能的，我在廣場上走起來，全憑直覺、毫無目標。一路上我瞥見一個男人臉上流著很多血，一個女人被踢得蜷縮著身體，另一個男的倒在地上，一名老婦人被推進一輛巴士。最後，在所有的週年慶活動、所有的抗議之後，一位受過教育會講英文的便衣被派來專門應付外國人，來搞公共關係。

「請離開，」他以練過的發音對我說，「這些人是違法的。」

在我們旁邊，一位抱著小孩的女人突然拉開一面布條。小孩約兩歲大。黃色布條上寫著紅字，它發生得太快了，我無法看清上面寫著什麼。第一個便衣開始揍那名女人，第二個奪走了布條，第三個搶走了小孩。女人倒下，小孩哭叫起來。一個警察——是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還是第四個？有什麼差別嗎？——重重地踢她。受過教育的警察再次用英文說：「請離開。」

\* \* \*

到一點鐘的時候，整個事件結束了。警察成功地把遊客和記者趕到邊緣，廣場一片死寂，大約三百人被逮捕。不過，我的手放在口袋裡，很難算得正確。

最後來到的是一輛洗街車。旋轉刷子下面的管子噴出水，清理著傳單和血跡。車子的一邊用藍色的英文印著廠牌名：中國天津洗街車公司。那是一個美麗的秋日，天空又高又藍，看不到一絲雲。那一天，中國的反邪教法正好通過滿一週年。

# 第十一章 四川人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想家的時候，威利和南西會一起聽一首歌。那旋律是他們從小就熟的一首歌，叫「王二小」。歌曲的英雄是日本人占據中國時一個住在北方的十一歲男孩。一天，日軍強迫王二小當他們的嚮導，這個男孩直接把他們帶到中國軍隊埋伏的地方，共產黨的八路軍就這樣殲滅了侵略者。王二小在戰役中喪生，但是，他卻永存在一首歌裡，被幾百萬名中國小學生所傳唱。

到了改革年代，有位叫遲志強的流行歌手改寫了那首歌，以吻合新經濟。日軍不見了，戰爭也不見了。男孩英雄變成四川來的勞工，移民取代了侵略，新的歌名叫作《打工十二月》。

一月我離開家鄉  
加上我的哥兒們李志強  
兩天兩夜的坐火車  
要去廣州闖一闖  
二月我倆遇見一老鄉  
他在一個玩具廠幫忙.....

在第三個月，敘述者聽到一個打工仔發了財：

都說那誰誰誰可發了財

想當初他也是這樣

第四個月時，他和叫李志強的哥兒們失去聯絡。第五個月，他在建築工地上做事，累得汗流浹背。第六個月，他拿到了工資：

領錢時候心都在發慌  
一個來月掙了有六七百  
致富路上看見曙光  
七月我寫信給爹娘  
還寄了幾百塊錢回家鄉  
想到了他們該多高興.....

自從威利和南西不告而別後，他們已很久沒回四川了，他們想等到有點成就再回家看父母。在王先生的假學校裡，要獲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還好威利在樂清的第二份工作好得多。樂清是溫州的衛星城之一，以快速發展而聞名。那所私人學校經營得不錯，他們後來也聘了南西，每個月這對年輕人可以存下大半薪水。不過整年不在家還是教人心裡難過，尤其是碰到過節時：

八月十五明月掛天上  
胖工頭送來啤酒一箱  
他告訴我們都別想家  
說這裡就和家一樣



第二年暑假，這對年輕人終於返鄉。在十八個月內，他們存下了三萬多塊人民幣，約四千美元。他們的薪水合起來一個月約有五百美元，要贏得南西父母的原諒是綽綽有餘的，他們務農一年，收入勉強才超過二百美元。他們以最大的溫暖歡迎這對年輕人，就好像他們當初離家是歡歡喜喜的一樣。

對威利來說，鄉下的人們調適得這麼快，似乎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在南西的村裡，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都到工廠鄉鎮打工去了，老人們主要依賴他們寄回來的家用過日子。整個地區到處看得到蓋好一半的房子：第一層已經蓋好，人們已經住了進去，但是第二層或第三層的骨架空空如也，好像豎立著的人體骨骼。如果打工者幸運的話，一年加蓋一層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運氣不好，那麼家裡的老人就得在蓋了一半的房子裡耐心等待。

九月我大禍臨頭上  
一塊磚頭把我手砸傷  
沒想到胖工頭會把我炒  
發了點錢就算了帳

\* \* \*

在過去，四川一向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省分，它有一個似乎專為馬爾薩斯的人口消長理論所設計的地理位置。四川所在的成都盆地上，是一塊滋養了眾多人口的豐沃河流和平原（三星堆位於平原的西部邊緣）。但另一方面盆地是被山脈圍繞的，那表示一旦人口增加到某個程度，居住條件就會急速惡化。於是，早期豐富的环境資源最後變

成了懲罰，最初的成功導致了競爭，競爭變成了無望。幾百萬四川人除了離開之外，別無他途。問題是，幾十年來的共產黨計畫經濟不准個人遷徙，那時，也沒有什麼快速發展的城鎮可以去。如同中國內地許多地方，四川的鄉下人只能在貧窮中等待，直到鄧小平終於開放了經濟。

距四川一千一百二十公里遠的東部，在截然不同的天然條件下，浙江人也在等待。那裡的土地大多貧瘠，例如在溫州一帶，可耕作的田地只占五分之一。早期，因為山脈限制了溫州跟中國其他地區的聯繫，當地人很自然地朝海洋發展。幾世紀以來，他們一直是成功的商人，其中很多人遠渡重洋到其他國家落腳經商。但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共產黨禁止私人交易以及跟海外聯繫。政府對離海岸只有三百二十公里的台灣尤其顧忌。因此，溫州變成另一個緩衝區，就像深圳一樣，除了幾處國營事業外，政府故意不予開發。因此，當改革時期開始時，溫州並沒什麼工廠需要重建，人口就像彈簧一樣跳升起來。當地人的商業天賦在被壓抑了三十年之後，終於重新嶄露頭角。

人們能夠投資創業的錢不多，政府也不像對待深圳那樣給予特別的經濟優惠。但溫州不需要那些，它最有價值的資源是當地人的直覺和海外關係。一九八〇年代早期，許多家庭開始成立員工通常只有十人上下的小型工廠。他們生產些小東西，諸如鞋子的某個部分、小布料、一點點塑膠製品。隨著時間過去，工廠擴張了，但生產的還是小東西。溫州變成世上最大的鈕扣製造地，也專門生產低電壓的電子零件。溫州人做鞋底、機械活塞、打火機，而且打火機愈來愈多。到了二〇〇〇年，世上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打火機出自溫州。

這個城市幾乎全是私人經濟。隨著生活水準提升，溫州和其他的浙江城市需要更多的勞工、生產線工人、祕書和老師。四川正好是完

美的配對，浙江的公司常跑到涪陵這樣的地方招募人才，就一點也不奇怪了。我最好的一些學生都往東發展，到了新環境後，他們最先注意到的是地域性的差異。一個叫雪莉的學生到浙江的外島玉環工作，在信裡這麼描述她的旅途：

這是我這輩子經歷過的最長的一段旅程。他們說，我們要去「先進的地區」「做先鋒的工作」。照理說我們應該很興奮，但是我不那麼覺得。去玉環的整條路上，我的心情出乎意料地平靜。

我們在七月十五日下午搭火車離開重慶。火車走了快一天，我看到一個父親帶著小孩。第一眼看到他們時，我嚇了一跳，主要是因為那名嬰兒，他那麼小。他父親說他是七十天大，我覺得他只有十天大。他好小，又黑又瘦，我以為我看到的是個來自小人國的小孩。我肯定他是營養不良.....

那可憐的小東西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照顧。很多好心人幫那無助的父親很多忙、安撫那小孩，但是都沒有用。同時，那小孩也引起很多猜測：「孩子的母親呢？」有人說，母親一定拋棄他跑掉了。有人猜他的父母一定吵架了。最後人們判定那個小孩一定是私生子。火車快速地往前開，猜測和議論不斷。小孩的哭聲迴盪在車廂裡。

雪莉的旅程花了三天，搭船、搭車，再換巴士。旅程最後，她遇到一個來自島上的年輕人。在一封寫給亞當的信中，她描述自己怎麼擔心被當成一個貧窮的外地人：

然後，他問我是哪裡人，我沒說實話，因為人家告訴我，玉環的人很排斥外地人。我編了一個故事，說我在玉環出生，但在四川長大，因為很少回鄉，所以對浙江不熟。他竟然相信！事實上我的故事破綻百出，笨拙到連「我在哪個村出生？」這樣的問題都答不出來，我也聽不懂浙江話。看到我答不出話，他幫我解圍：「妳住在四川這麼久，當然記不得那麼多年前的事了。」他很熱心地向我介紹玉環的很多事，在生活、工作上給我很好的建議。

跟他的誠意和熱心比起來，我很後悔對這麼誠懇的人撒謊。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玉環人，從他身上，我一點也看不出人家說的那些不好的特質。我記得人家告訴我，這裡的人不可信任，但是這個故事證明了真正不可信的人是我。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忙於其他的事，沒有多想這件事。但是後來，當我安定下來後，我還是會想起來，覺得很自責。好幾次我想打電話給那男孩（他有給我他的電話）。但是我沒有，因為我不夠勇敢。我是個膽小鬼。

亞當，這些是最感動我、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它們都是真的。

新工作安定下來後不久，她寫了一封信給我：

彼得，在這之前，我從不知道住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是什麼感覺，這感覺並不舒服。我可以了解你和亞當以前跟我們說過的。你說你們是外國人，在人們心裡，你們是不一樣的。對於當地人，你只是一個陌生人。那很傷人，因為他們不會把你當作是

他們的一分子，你也無法了解他們在說些什麼，想家的感覺很自然就會纏著你。

我們無法了解本地人講的話，他們的方言對我們來說很奇怪，因為他們的腔調跟我們的很不一樣。我們可以說普通話，但是有些本地人，尤其是老人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並不懂普通話。

\* \* \*

似乎每個離家的學生都會給我寫這樣的信。他們沒有想到適應是如此之難，他們從來無法想像，他們似乎是自己國家裡的外國人。但是中國那麼大，它在語言上的多樣性，應是用一個洲而非一個國家的標準來衡量的。中國的官方語言是普通話，這是一種北京和中國北部其他地方的人所說的語言，也是學校、政府部門和大部分電視、電台所用的正式語言。

但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是講著某種完全不同的語言長大的，中國人叫它「方言」。舉例來說，在北京和在廣東所講的「方言」，其不同的程度就跟英文和德文一樣。語言學家有時會拿拉丁語系主要的方言來比較中國口語的多樣性。除此之外，中國還有其他主要少數民族，像是維吾爾人、西藏人、蒙古人的語言。

在所有的中國方言中，溫州以其方言最難懂而聞名。在那座城市裡，不同的區域還有不同的「次方言」，而且沒有一種方言的發音是和普通話一樣的。即使是像雪莉這樣一個語言天賦很好的年輕女孩，也只能聽得懂一些基本用語。搬到溫州快半年後，她寫道：

來浙江好幾個月，很多事我都習慣了，我聽得懂本地人說的一些簡單句子，上市場基本上沒有問題。

浙江和四川都屬於中國的大省分，但是它們在很多方面上不一樣，尤其是在吃的方面。浙江因為位於東部沿海，這裡的人喜歡吃海產，覺得海產很新鮮。我不喜歡海鮮，雖然我知道很營養，但吃起來的味道很奇怪。這裡的人不喜歡辣的食物，所以我大都是自己煮。

這裡的人對事情的看法，跟我們內地的人也不一樣。很多人把錢看得比教育還重要，我是不能接受那種想法。老實說，浙江的經濟比四川發達，但是，他們常常很驕傲地在我面前炫耀。我對這點很生氣，但是不得不承認，我們四川的經濟真的比較落後。

\* \* \*

在自由市場改革之前，一般中國人很少出外旅行，很少人親自體驗過他們國家的分歧和多樣性。中國是統一的，漢人應該是個單一的族群，這些似乎就是基本的真相。但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多，他們開始體驗到國家統一表象下的另外一面。每次回四川，威利都覺得特別難受，因為他得經歷橫梗在溫州和家鄉之間所有的不平等和偏見。有一年寒假後，他寫道：

春節期間我回了一次四川，在返回學校的路上，我遇到一些很糟的事。剛回來的那幾天，我睡得很不好，到現在我都還會想起那些事。船上有很多去沿海地區討生活的四川人，人多到有些

甚至得睡廁所。在車站，四川人就像難民和乞丐一樣，在寒冷的天氣裡睡在地上。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被敲竹槓。在江西，巴士司機把我們載到一間汽車旅館，旅館的人用警棒把我們趕下車，我們還被迫花四十元買他們的速食，吃起來就像豬飼料。兩個四川人因為沒錢買，被打得躺在地上。司機說，如果你敢跟他們吵，他們會把你打到死。

大多數外來者沉默地忍受著不公，相信這種「新生活」只是暫時的。他們靠勞力工作，諸如當建築工人、做工廠生產線的作業員，一想到一輩子都要在這樣一個連話都說不通的地方做這種工作，心裡就感到淒涼。沿海和內地經濟的差異，大到你可以期望在外地存錢，以後再回家鄉慢慢地花。幾乎每個人都打算，等到這段努力工作的青春歲月結束後，就回到家鄉去。他們會談著要在村子附近的城鎮開家小店或餐廳。就像許多非法移民到美國打工、但家人留在家鄉的墨西哥和中美洲人一樣：他們在一個國家賺錢，把錢寄回另一個國家花。

不過，威利的狀況不同，他的父母跟他的哥哥們住，他們在當地做工程做得很好，已經給家族蓋了一棟兩層的大樓房。威利不用寄錢回家，他若想跟南西在東部長期安定下來是可行的。但他覺得自己被兩股完全相反的力量拉扯著：一股是浙江的經濟承諾，一股是四川親切熟悉的文化。有時候他覺得不做決定不行，但與此同時，他又寧可自己不屬於任何一方。他從未嘗試學溫州方言——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他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英文和美國之音上。取而代之的，他把心力專注在講一口完美的普通話。到了第二年，他已經完全沒有四川口音了。人家問他是哪裡人，他通常會撒謊，說他來自附近江蘇省經濟很好的某個城市。不過，當南西在旁邊時，這招就不大行得通，因為

她聽起來還是像四川人，而且，她也不喜歡威利要她改進普通話。在她看來，他是矯揉造作。

但是對威利而言，那是一種自我尊重。他在浙江的第一個老闆，那個討厭的王先生，以前常常告訴威利一個一九八〇年代他去四川北部的故事。那趟旅程讓王先生大開眼界：看到四川北部那麼窮，他都忍不住哭了。多年之後，只要一講到那趟行程，他看起來還是很感傷。王先生愛提這一段，好讓威利知道，他有機會逃離那麼糟的環境，應該要心存感激。在所有憎恨王先生的事情中——他的中山裝、他的寒酸小氣、他那婊子老婆，王先生對四川人的同情最教威利無法忍受。

即使換到了樂清這份比較好的工作，還是有些小事困擾著威利。在鎮上，人們有時會偷走下水道的人孔蓋當作廢鐵賣，當地居民走夜路的時候不得不小心。一次，威利跟一位同事走過街上一個沒有蓋的洞時，那人搖搖頭，不屑地說：「四川人偷走的。」威利沒有回話，但是他永遠也忘不了那人的批評。威利還注意到，樂清的家長罵小孩時，會用外來人的故事恐嚇他們。威利小時候，如果小孩不乖，村裡的大人會嚇他們說，洋鬼子會來吃掉壞小孩。但是在樂清，鬼怪不再是外國人。這裡的父母會說：「你再哭，江西人或四川人會把你抱走。」

我完全了解你在中國被另眼相待的感覺。很明顯地，因為四川是有名的又窮又落後，四川人也被另眼相待。四川和江西來的人總是被本地人看不起。我不是很在乎這些，我知道中國不只是他們的中國，每個中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到中國的任何地方去。我很高興聽到，你把一般的中國百姓當作你的寫作對象，那很



好。在我看來，你會跟莎士比亞一樣成功，他也是因為接近一般百姓而達到一生的文學顛峰。

事實上，我認為一個人最難的是能看到自己的錯誤。中國人老是說中國什麼都好，中國的每件事又正確又完美。有時候美國也跟中國一樣。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會說美國是世界警察，而美國則認為中國是個有很多問題的國家。

\* \* \*

一九八〇年代，政府喊出口號推崇「溫州發展模式」。這座城市自力上進的資本主義傳統自然地吸引了官方的注意：官方喜歡看到政府不用投資什麼，家庭自己就蓋起了工廠。但事實上，很少有地方能夠模仿溫州這個自身都有其侷限性的模式。成功的工廠的確會擴張，但是，從鈕扣、打火機、鞋底和低電壓電子零件裡能賺的錢還是很有限。這些利潤低薄的日用品，很難從中開發出什麼高價值的品牌，或是藉研發提升它們的價值。照理說，它的下一步應該轉移到高科技產品或者是多國投資。在像深圳這樣的地方，這些都是常見的發展策略。

但是，溫州有種喜歡保持簡單的心態。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它對改革開放很快地做出了回應。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後期，溫州是整個中國私立學校數目最多的省分。全市有將近百分之三十的高中生，五分之一的大學生上的是私立學校。

在樂清市，威利和南西任教的學校叫「育才學校」。這所新學校有近二千名學生，從幼稚園到八年級，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住校。在中國，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所有學校的課程都是標準化的，而且有著

嚴格的教學規定。有些科目是強迫必須要上的，所有學生在中學和高中畢業時一定要通過入學考，才能進入下一個階段。私立學校可以從開放的人力市場裡聘請教師、吸引學生，但是他們必須教共產黨理論。

自成立以來，育才學校就從一年級（而非三年級）開始教英文，來凸顯自己跟其他學校的不同。當地的公立學校後來也效法，從一年級開始教英文，但私人學校還是會找到它們的法寶：盡可能更早開始上課，盡可能把一天的課程排滿。學校的賣點之一是，準備參加考試的學生每天都上課，包括星期天。八年級學生一星期得上七十五堂課，這幾乎是一般公立學校（四十五堂）的一倍。基本上，他們把溫州模式用在教育上：那是一種從低獲利的產品上硬擠壓出利潤的知識產品。他們並沒有改進他們的課程或教材，他們只是填鴨式地教著同樣的東西。

私立學校持續占據優勢，一直到一九九八年，當地方政府贊助成立了一間新的公立學校後，情況才有了轉變。打從一開始，那所新公立學校的校長就公開表示，要把育才逼到破產。誇下海口後，校長的第一步就是聘請最好的老師。他利用手段發掘了當地所有被評為「頭等」的教師（他們得過獎，還有各種資格證明），但結果卻失敗得一塌糊塗。英文老師不會說英文，數學老師不懂數學。學生成績差得不得了，家長氣憤不已。很多人推測那些獎項和證明都是假的，這些東西到處都買得到。在一切改變得那麼快的中國，這些資歷一點價值都沒有。一年後，那所新公立學校炒了很多教師魷魚，變成只聘年輕的老師。

競爭一年比一年激烈，而關於考試的方面尤甚，它已經發展出兩個清晰的競爭策略。第一個策略靠的是簡單的事實：藉由系統、有

效、勤奮的學習，學生就會提高成功的機率。但如果他們事先就知道考題，那機率就會更高。這就是第二個競爭策略，這在威利和南西來到學校前就已經被嫻熟地使用了。每一年，教師和行政人員都會和某些有權力的人打好關係，這些人可能會洩漏考試訊息。

溫州教育部門的一個官員就以做些微妙的暗示而知名。全區的學校都會邀請這個人來給老師演講，而他只接受那些他認為值得的邀約。威利和其他英文老師每年都被派去溫州市聽他的演講。有一次，威利描寫了那個場景：

我們校長請那人來演講，講有關所謂高中入學考試的訊息。演講含糊不清，老師想從他那兒得到一些有用的資訊，但有時他什麼也不說。兩個小時下來，我們試著問他問題，我們問考試會考些什麼，他只說可能會有這個，也許會有那個。比如，他說，今年會出的填充題，可能要學生填兩個字，而非一個字。

之後，學校請他去紅日飯店，那是溫州很好的飯店，大概有十五位老師跟他一起吃飯。飯後，學校給了他二千元人民幣的禮金，再請他去卡拉OK，還請了一位小姐，我猜她是個妓女，給了他們一間雙人房——會發生什麼事？你猜也知道。我想這個人是個非常好色的色鬼。他有五十歲，有個兒子在國外念書，在美國。

那個人常給公立學校準確的訊息，但他的演講對威利和他的同事沒什麼幫助。不管怎樣，育才每年還是得照老規矩辦理。我問威利為什麼要不斷地付那筆沒用的小費，他說：「要是有一年那樣做是對的呢？」

每年六月，一到考試的季節，我會接到一封不愉快的信：

同樣的事又在樂清發生了，很多別的學校得到高中入學考的訊息，我們學校只得到一點二手或可能三手的消息，我們注定要失敗。那個教育部門的混蛋再度洩漏了英文考題。

\* \* \*

欺騙讓威利很不舒服，但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是外地人要面對的新環境的一部分：當你離開家，基本的道德標準也跟著改變了。有時威利會跨一大步，像是在改變婚姻傳統上。在浙江已經兩年，威利和南西還沒有正式結婚，結婚好像沒什麼必要，因為他們所有的家人或朋友都在四川。威利注意到，在樂清有很多外地人等了很多年才舉行儀式，因為要存錢和建立請客時的人際網絡。他參加過好幾次的婚禮，新人的小孩都已經是上學的年紀了。

對威利而言，那挺有道理的，此時實用主義打敗了傳統。每次他和南西談到結婚和有小孩的可能性，談到後來常變成是在談錢。最後，南西提出了一個數字。等到他們存夠至少十萬人民幣（超過一萬二千美元），她就同意有小孩。在樂清一年半後，他們存了二萬五千人民幣。四分之一的小孩已經在銀行了。

但是有些問題，舉凡是欺騙，還有本地人對外地人的偏見，都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一直以來，威利從來沒有尋求他父母的意見，因為他覺得在這個新時代，父母不能給予什麼指導。雖然他依舊考慮著有一天回到四川的可能，但是他心裡很清楚，他再也不可能真的回去。那個世界已經不見了，不是因為它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樣被拆了，而是因為鄉下的改變不夠。在一個不停轉變的國家，年輕人實在沒有

理由待在跟不上腳步的鄉下。每次威利回到第十大隊，就感覺它好荒涼。有一次回鄉後，他這樣寫道：

家鄉什麼也沒變，路還是一樣崎嶇不平，只有人們變老了。我覺得滿難過的，我再也找不到以前認識的熟人或朋友，有時候我覺得這種到沿海討生活，沒有穩定的家的狀況，是世上最悲慘和壓力最大的事。

每次回家都讓他沮喪。儘管知道沒意義，但是回到樂清後，他發現，自己還是想著那個逐漸死去的村子。這時，他會從學英文中尋求慰藉。除了轉移注意力，他也相信英文資訊能為改革開放後的新環境引路。他謹慎地追尋英文媒體的網站，他閱讀所有提供建議的英文專欄。有一次，威利打電話給美國之音北京部門的一個醫學節目，請教他們如何處理鼻竇炎的問題。另一次，當美國之音播出一個關於美國在家教育的節目，他仔細地做滿筆記。他對公立學校不一定會受另類教育系統威脅的觀點，尤其感興趣。

五十個州有一百五十個小孩在家受教育

他們的父母也是他們的老師

跟在學校一樣的優秀

穩定的家庭

一九九七年五萬美元

原因：

跟.....保持聯絡

滿足.....所需

防範學生受暴力色情和其他的影響

教育問題

公立學校提供家庭協助——圖書館甚至教課

大學畢業以來，威利翻破了三本英文字典。他還是把破字典排在書架上，就像個好的內野手從不丟棄用舊的手套。他一有空就翻譯整理資料：美國之音的廣播、報紙的報導、做字彙表。他常打電話問我問題，通常是一些單字或艱澀的文法，有時則跟時事有關。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當美國總統大選無法選出最後的勝利者時，威利幾乎每晚都打電話來問有關美國選舉團結構的問題。

他對這個世界上不合規則的事物特別感興趣。在溫州，政府贊助了一項節省用水的活動，標語中英文並用，英文寫著：「STOP TO WASTE THE WATER RESOURCE」（停下來去浪費水源）。

威利認為那句英文不正確，打電話來問我。雖然我常常懷疑他如何能消化那麼多資料，但每次他打電話來，我總是盡所能地回答他的問題。當我問到他的筆記，他說他要不斷地記錄所有的東西。他的夢想是，有一天編一本什麼字都有的英文字典。

Boozy-drunk（酒醉的）

Boorish（粗魯的）

Bookstall（書報攤）

Bookrack（書架）

Bookmark（書籤）

Booby-prize（在比賽或遊戲中）成績最差的人（或隊伍）

一九九八年，柯林頓和陸文斯基鬧出緋聞，製造了一個.....

利物浦和倫敦暴亂（一九八一年）。一九八〇年初期，英國再度出現街頭暴亂，這讓人聯想到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那也是首次因失業率提高而引起暴亂。

二〇〇〇年國慶日假期前，威利正好看到電視上播著反對犯罪示威集會的節目。在很多中國城市，那是件年度大事。被告在現場轉播的電視上受審，用意是嚇阻假期間的犯罪情事。過去這種儀式常常選在運動場上舉行，有時連處決也公開。但現今，電視只播出部分審判。

威利看著一位位的罪犯走出來：戴手銬、剃光頭、穿著藍白紋條的監獄制服。法官一一讀出每個罪犯的名字、出生地、罪行和判刑。電視前的威利忍不住抄寫著。後來他告訴我，他在「做數據」。

「只要法官唸出那人的名字和故鄉，我就把它們寫下來，」他解釋道，「江西、四川和湖北是罪犯人數最多的省分。到最後，我發現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來自四川，所占的比例最高。那讓我覺得很羞恥。」

又一個夜晚，威利和南西很晚還沒睡，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放著那首流行歌曲，直到把那整首歌翻譯成英文：

十二月我返回家鄉  
 爸爸媽媽哭了一場  
 一家人吃了頓包餃子  
 那味道可真叫個香

\* \* \*

親愛的彼得：

你在北京近來如何？我真的很想改變我目前的情況。南西和我丟下我們的鐵飯碗來這裡找發財的機會，這裡的情況比我那落後又「牙刷」的家鄉——四川好很多。但是，我連變成一個小有錢人、改善自己的希望都看不到。南西跟我都想在這裡買間公寓，但那只是個夢想。一般房價在三十至四十萬之間，我們買不起。等到我們買得起房子時，我們已經一腳進棺材了。真的，我的長遠希望是一旦我們存夠了錢，就回家鄉幫南西找份安定的工作，然後我可以做教書以外的事……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籌備二〇〇八年奧運會，我希望自己會有好運。

二〇〇〇年秋天，威利參加了一項英文教學比賽。這樣的活動正變成橫掃全國教育界的瘋狂競爭的一部分。在溫州，每位參賽者都在一間坐滿學生的教室裡比賽，裁判坐在後面，評估他的教學計畫和學生的反應。

威利在那種場合從來不會緊張。跟他經歷過的其他事比起來，這反而是容易的：規則很清楚，所有參賽者都得遵守。裁判一般來說算是公平，而且不管怎麼說，學生都是獨立的。小孩的反應最為自然，不會偽裝。

溫州的比賽一開始有五百名教師參賽，很快就淘汰到只剩下十六個人。威利進入在溫州市舉行的總決賽。其他決賽者帶了筆記型電腦、投影螢幕，還有用專業軟體準備好的教學計畫。威利是唯一沒有用電腦的參賽者。他的資料都是手做的：幾張有對話的插圖，十幾張用紙剪成的小紅蘋果。在一瓶水上，他用英文寫著「有毒」。



「當我教他們『危險的』這個字時，我拿出那瓶我說是有毒的水，然後我要一個學生喝下；他們覺得那很好玩。然後我要他們練習對話，因為他們要贏得那些紅蘋果，比賽變成很激烈。我問問題，答對了就有一顆蘋果。我站在椅子上喊出問題，就像一個將軍一樣，他們也覺得很好玩。」

那真是天才——在比賽中創造另一個比賽，威利最終拿下第一名。一千元的獎金幾乎是他月薪的一半。不過他說錢不重要，重要的是學校引以為傲。他也相信他之所以會贏，主要是因為在參賽者中，沒有人比他更在乎英文。在威利看來，他的勝利要歸功於那些字彙表，以及抄寫那些艱澀的字和少見的句子。「那是一個榮耀，」他說，「我想，我會贏的原因，是因為我瘋狂。」

\* \* \*

在雙龍公社第十大隊第三生產隊，最早一個出外打拚的男人叫劉成民。他念完了五年級，成為第三生產隊他那一代最有知識的人。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他去了黑龍江，在一間製鞋廠工作了幾年後，回到家鄉種田。

在村裡，劉成民因為有文化而獲得廣泛敬重。外出的經驗讓那男人變得不一樣。他從未結婚，完全按自己的方式過活。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地方政府荒謬地提高了農業稅，劉成民拒絕支付。他的理由是，他是單身，所以應該得到優惠待遇：他沒有妻兒子女，凡事靠自己的雙手。他的理由很清楚、合邏輯，也史無前例。

不久，村裡傳出了謠言：政府要逮捕他、打擊他，直到他繳稅為止。這是對付頑固分子的常見伎倆，但是沒有人真的那麼做。地方幹

部似乎被那人的不可捉摸給嚇到了。

外出的那些年，劉成民寫了些有關他經歷的詩歌。當威利還是小孩的時候，很喜愛聽。多年後，當男孩長大，自己也變成一個外出者時，他仍然清晰地記得那些詩。那些詩學習毛主席的詩風——毛的詩歌經常描寫自然風景，其中有一首讚美著長江的壯麗。威利記得劉成民也有一首詩，寫的是流過家鄉勝利橋下的蝸牛河，最後兩句寫道：

家鄉的河水很平靜  
但我的心不安寧

## 第三部

## 【古文物F】

# 書

今天，考古學家繪製出地下城市裡的一面城牆。整個結構離地面不遠，大約一點五公尺深，工作團隊穿越黃色泥土的挖掘進展得很順利。十七位工作人員手裡拿著鍬和洛陽鏟，在荊志淳的領導下工作。這位年輕的考古學家相信，那面牆有可能是這個地下城市裡王室所在地的一部分。

中午過後，荊志淳休息了一會兒。我在安陽考古工作站的圖書館訪問他。擺滿了書的屋子涼爽而安靜，除了我們沒有別人。荊志淳為我介紹了他們在安陽發現的一些古文物。訪問結束之後，他順手指向一本正好躺在桌上的厚重舊書。書的封面又破又舊，但是書名很清楚：

### 《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

書上沒有注明作者的名字。書是一九六二年出版，中國考古研究所編輯，全書蒐集了八百多張青銅器的黑白照片。其中有三足而立的「鼎」、優雅長頸的「觚」，以及腳部細長、可能是用來溫酒的「爵」。大多數青銅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上面通常裝飾著那個文化特有的饕餮紋：一種風格獨特、眼和嘴捲曲的獸面紋飾。過去有些專家相信，這些神祕的圖案是龍的代表；也有人說是虎、鱷魚，或者

蟒蛇；有些理論則認為這些設計和薩滿教有關，但是沒有人可以確定。饕餮的原意已經無從追考，成為一個沉默的象徵。

這本書的後面列出了美帝國主義的名單。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美術館擁有一支細長的商代的觚；密西根州草湖（Grass Lake）的羅馬東正教主教團（這名字似乎既不美國也不帝國），擁有一座鼎和一支觚。其他的收藏者倒不那麼教人意外：紐約市的范德堡夫人、同是紐約市的杜克小姐（根據該書所述，她擁有九座青銅器）、伊利諾州芝加哥的布倫戴奇（擁有三十座青銅器）、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的皮爾斯伯里（擁有五十八座青銅器）。

一頁頁翻著，不難發現美國主要的帝國主義者的考古品味。杜克小姐的九座青銅器都是商朝時做的，可見她對精緻的追求：一對細緻的觚，一個不裝腔作勢的小小的爵。皮爾斯伯里則相反，他有著中西部人的胃口，喜歡厚重扎實的銅器：一座三國時代壯碩的方鼎、一座戰國時期蹲踞形的沉鬱的鼎，看起來完全符合它的年代。布倫戴奇則難以捉摸，他的蒐集橫跨商、西周和春秋，既有厚重嚴肅的鼎，也有窄長的觚。他最與眾不同的，是藏有春秋時期的一件古怪的酒壺，形狀像隻鳥，是件準備要飛的古代青銅器。

\* \* \*

我問荊志淳這本書，他說，是一位叫陳夢家的甲骨文學者研究寫成的。

「他在美國待了很長的時間，」荊志淳解釋道，「他的妻子在芝加哥大學念美國文學，不過他們後來回到了中國。陳夢家也是位很優秀的詩人。」

我問陳夢家現在住安陽還是北京。

「他死了，」荊志淳說，「他在文革時自殺了。」

我再看了一下書名頁：沒有作者。荊志淳說，陳夢家自殺過兩次。我闔上書，問他安陽有沒有人認識陳夢家。

「要問老楊，」荊志淳說，「他退休了，但是陳夢家自殺時老楊在場。老楊跟其他人原本應該看著他的，但他還是自殺了。你在四合院對面就可以找到老楊。」

\* \* \*

安陽考古工作站離地下城市的遺址不遠。這一帶依然是農田，工作站四周都是玉米田。在這十幾間房子裡，只有幾個人是全職工作的。白天，風簌簌地吹過樹枝，偶爾可以聽到遠處的火車聲，向距此地六個小時車程的北京開去。除此之外，整片區域很安靜。高高的水泥牆上圍著鐵絲網。

房間裡放置著各種古文物。裝滿青銅器的房間，布滿瓷片的工作室，上鎖的抽屜裡堆滿著無價的玉器。這裡也有許多骨頭。一間展示廳的一個陶罐裡，擠著一具嬰兒的骨骼，可能是某種可怕的商朝儀式所留下的。另一個房間裡，擺著一九八七年從附近遺址挖出的一架古戰車和四具骨骼。骨骼成對：兩匹馬，兩個人。那兩個人可能是駕車的騎士，他們和那兩匹馬可能是為了在來世繼續服侍君主而犧牲。一人平躺在馬車後面，另一人趴著躺在馬旁，他的手綁在背後，頭轉向一邊，好像在吃土。

戰車已不再是戰車。當雨水侵蝕中原的乾鬆泥土時，埋在土裡的木材再也無法持久保存。隨著時間消逝，木頭腐爛了，只剩下一片跟

原車形狀一樣的土形。三千年之後，到了一九八七年，工作人員一寸一寸地挖掘，考古學家小心翼翼地將外面的土從變硬的土形上撥開，直到全形浮現，結果露出了：車的側板、一個輪軸、一支牽引桿、一個大到可以跪坐著三名武士的車廂，以及躺在兩匹馬旁的一個彎曲的軛。車輪直徑長超過一點二公尺。古戰車看起來很完整，好像依舊是木製的，但是幾個鏟子就能把它變成一堆土。考古學家稱這種東西為「土魂」——是土地對一個消失了很久的東西的記憶。

\* \* \*

在古戰車展示室旁的一間小會議室裡，我跟楊錫璋見了面。他六十六歲，白髮稀疏，戴了副鋁合金框的眼鏡。每次笑起來時，他的銀色假牙就嚇我一跳，好像不期然發現的古物突然發光。

老楊說，陳夢家在一九四〇年代蒐集了那本關於「美帝國主義」的書的資料，共產黨還沒有取得政權。那時他跟妻子住在美國。她出自一個西化的中國家庭，父親是位基督教神學家。

「那是後來他們惹上麻煩的原因之一，」老楊解釋，「他們家對外國的東西很熟。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陳夢家被扣上『資本主義知識分子』的罪名。因為他在美國待過，加上他妻子的家世。不過他被批評得最多的，是因為他的『男女關係』。」

我不熟悉那個句子，因此請老楊寫下來。他停了一會兒，好像有點後悔提到它，但還是寫下了。字很清楚，不過我還是不懂它的意思。

男女關係。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問。

他不好意思地把目光轉開——一道銀光閃過。老楊有點吞吞吐吐地說：「這表示你跟一個妻子以外的女人發生關係。」

「陳夢家有那樣做嗎？」

他再度把眼光轉開。「我不知道。」他說。

一陣尷尬的沉默後，我們回到原來的話題，我發現一談到陳夢家的死亡，老楊自在多了。我問他有關自殺的事，他的表情沒有什麼改變。

「那件事發生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剛開始，」老楊說，「陳夢家第一次自殺時被救了。在那之後，考古研究所派我和幾位年輕的考古學家來看著他。我們住在他家，責任是不讓他再自殺。但是，我們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跟著他，我們試過了，但那就是不可能。那只維持了大約一個星期。」

為了更清楚描述他們怎麼失去陳夢家，老楊站起來指向窗外。那是個晴朗的下午，陽光不均勻地從樹梢灑下。「想像你在陳夢家北京的家裡，正往四合院看出去，」他說，「有一天，我們看到陳夢家走出屋外，經過窗前。」老楊做了一個悄悄走的姿勢，好像跟著一個想像中的人走出視野外。「幾分鐘之後，我們發現他不見了。我們急忙跑出去，但太遲了——他上吊了。」

老楊坐下，「那是個悲慘的損失，」他說，「他是位傑出的學者。」

但是從老人的表情，我看不出他覺得愧疚、羞恥，或者有任何感覺。他臉上是一種中國人談到不好的記憶時那種常見的茫然表情，所有的感情都藏得遠遠的。我問當他們在一起的那個星期，陳夢家講過些什麼。



「我們沒有說很多。老實說，我不知道跟他說些什麼。他看起來顯然很憂鬱，跟他談什麼好像都不合適。」

老楊解釋，陳夢家的妻子當時不在家，紅衛兵在街對面的北京大學裡把她給抓了。文革之後，她重回北大，教授英國文學。老楊說，她在幾年前過世了。

\* \* \*

一起走過四合院，我們來到老楊簡單的辦公室，他在那裡有一張陳夢家的照片。辦公室裡擺著一張書桌、一架書，和一張掛著蚊帳的床。地面是光禿禿的水泥。老楊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泛黃的考古研究所的年冊。

「我還有一個問題，那本在美國的青銅器的書，」我問，「為什麼陳夢家的名字沒有在上面？」

「一九五七年，陳夢家批評了一些領導的想法，」老楊說，「他被貼上右派分子的標籤。右派分子是不准出書的。但是那本書很重要，所以他們還是出版了，但不用他的名字。當然，大家都知道那本書是誰寫的。」

老楊打開年冊翻到一頁照片，其中有一張是中年的陳夢家。照片說明他出生於一九一一年，清王朝的最後一年。照片中的陳夢家有著酒窩和明亮的眼睛、蓬鬆的黑髮。他穿著傳統的高領上衣，是照片上所有人當中笑得最開懷的一位。

「他很英俊。」我說。

老楊笑出聲，但是這一次沒有露出銀牙。

在安陽，我試著更深入認識陳夢家，但其他的考古學家太年輕了，記得的有限。回到北京後，我把這個主題歸檔，著手下一個題材。這是作家常做的事，蒐集被傳了一半的故事，然後讓它們溜走。不過，它們總會在記憶裡留下一道痕跡，就像一個被埋葬的古文物的靈魂。

\* \* \*

二〇〇〇年一月，我的第一本書《江城》在美國出版，描述了我在四川教書的日子。同年，美國之音後來播出一篇中文書評。之後，書評人寄給我一封自我介紹信，以及書評的影本。它的副標題吸引了我的注意：

### 讀洋鬼子何偉的新書

寫書評的是一位華裔美國人，叫巫寧坤。信寄自維吉尼亞的雷斯頓，用英文寫著：

附上的文章是.....根據美國之音的中文節目「今日美國」所播的談話而寫的。如果你以前教過的學生正巧聽到這個節目，他們一定會很高興.....

巫寧坤提到，一九四〇年代，他曾經在芝加哥大學讀美國文學，共產黨革命之後，他回到祖國教英文。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他再度橫

越太平洋——這次橫越是對的，自此和妻子住在華盛頓特區附近。我給他回了信，問他在芝加哥的歲月時，是否聽說過陳夢家。

信回得很快。事實上，革命之後，陳夢家的妻子曾幫忙勸巫寧坤返回中國。巫寧坤建議我讀他的英文回憶錄《一滴淚》，其中一部分描述了巫寧坤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一連串災難性的政治運動開始之前，回到中國的情形：

我被列在住宿安排的候補名單上，因此暫住在露西和她的夫婿陳夢家家中。陳夢家是附近清華大學的中文教授，也是位知名的考古學家。他瘦而且黑，走路駝著背，好似身肩著無形的負擔，看起來比四十幾歲的實際年齡更老。露西的父親趙博士是英國聖公會的主教和神學院院長……她優雅地遊走在她蒐集的精緻明朝家具、藝術品和史坦威鋼琴之間，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正從亨利·詹姆士（她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小說走出來的女主人，塞進一個跟她身上的毛式風格外套一樣不相稱的環境。我很好奇，在她泰然自若的姿態下，可能藏著什麼樣純潔的「道德意識」。跟他天生沉默的妻子不同，陳教授率真且直言不諱。當局宣布職員和學生每天都要做集體體操時，他一邊在地板上繞圈踱步，一邊大聲地抱怨：「這簡直就是《一九八四》成真，未免也太快了！」

看到露西的名字時，我突然意識到，故事的這個部分我很熟悉：露西就是趙老的姐姐，是那個在四合院東廂翻譯《草葉集》的女人，是陳夢家的遺孀趙蘿蕤。跟趙老交談時，我沒注意到這個關聯，關於姐姐，他說得不多，也沒有提過她的英文名字。

跟那位甲骨文學者一樣，露西也走了——她死於一九九八年。但是，趙老和他的妻子還住在北京，於是，我去了他們的新公寓拜訪他們。

\* \* \*

老人唯一改變的地方是曬黑了。垂蓋著的眼睛依然一樣——平靜、深沉而不顯老，舉止依然像個軍人。他持續打網球。當我問他近來的球賽，「我比那些不能跑的人跑得快。」他冷淡地回答。他是在泰國曬黑的。政府付這對夫婦近三百萬人民幣，約等於三十五萬美元，作為拆除他們的四合院的賠償。在中國，這樣的數目是筆小財富。在中國，也跟其他所有地方一樣，錢帶不進棺材裡。趙老夫婦剛從曼谷度假回來。

他看起來似乎完全不帶感情。他說，接受和解的那一刻，他就承認自己的抗爭輸了，再來談四合院已經沒什麼意義。他對文革的感受也是一樣，他不想去談它。最初，當我要求見面談他的姐姐和姐夫時，老人拒絕了。在一些刺激後，他終於答應，但是他講得很清楚，那沒什麼好談的。

趙老先生和妻子黃哲搬去了城東，離到處都是商業大樓的嘉里中心和國貿中心不遠。老夫婦住在一棟名叫金色貿易的新大樓裡。窗戶是綠色的玻璃，像閃在船塢末端的燈火。

他們夫婦在客廳裡招呼我。那些裝飾品很眼熟——大家長的黑白遺照、長卷的書法、耶穌和法利賽人。但有個新東西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張裱框的黑白四合院照片。

我們聊了一會兒，老人告訴我，陳夢家曾是新月詩社的一員。新月詩社是二十世紀初一群有名詩人組成的詩社。我問到陳夢家的寫作風格。

「是浪漫的。」趙老冷淡地說。

「怎麼個浪漫？他寫些什麼樣的主題？」

他揮揮手不想回答。「你也知道，我不懂那些東西。」

「好吧，那陳夢家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死了這麼多年，很難記得，」趙老說，「不過，我倒記得他非常勤奮。他跟我姐姐一樣手不釋卷，整天寫不停。他們是文學人。有時看起來，他們好像什麼其他活動都沒有。」

我提到那本關於在美國的青銅器的書，老人點點頭。

「陳夢家在一九四八年從美國回到北京，比我姐姐早一年。在美國的時候，他走遍全美國，到人家家裡去拍他們蒐集的中國古文物。只要聽到誰有一個青銅器，他就問人家可不可以看一下。他就是那樣寫出那本書的。那些收藏家都是大有來頭的，能那樣買青銅器，得很有錢。」

我問他那個書名——美帝國主義，老人說那書名不是陳夢家選的。

「他對政治沒興趣，他只想鑽研那些青銅器。他常說青銅器有多美，他說了很多次真是不可思議，三千年前人們就已經製作出如此好的東西。他對明朝家具的感受也是那樣。他是個認真的收藏家，收藏了二十多件明朝家具。他跟我姐姐回到中國後，兩人的薪水差不多。他們拿她的薪水當家用，他的則用來買古董家具。」

老人說，那對夫婦的家具現在是上海博物館的永久展品。當我問到陳夢家的政治問題，趙老說，在一九五〇年代，毛澤東發起一場運

動來改變中國的文字，開始實施簡體字，毛希望最終把漢字改成字母系統。陳夢家寫文章批評那個提議。

「他認為漢字不應該改變，」趙老解釋道，「從此他被打成右派，在那時就遭受到很多批評，當然到了文革時期又更糟糕。」

我問他為什麼自殺。

「他是個學者，一個知識分子，」趙老說，「他是個很有自尊的人，他無法忍受那樣的汙辱。你知道嗎？他試圖自殺了三次，被我姐姐救了兩次。第三次，她在睡覺——她累得筋疲力盡，沒有注意到他，一直到他死了。」

黃哲一直在旁邊安靜地聽，這時搖搖頭。「你無法了解那種壓力，」她說，「他們強迫你在眾人面前跪下認錯。他們指控你一些根本沒有的事，說你要殺誰，有壞念頭——什麼理由都有。我們都熬過來了。但我們沒有人像陳夢家那麼慘，他又有名又被打成右派。」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喜歡談過去的事，」他丈夫說，「沒辦法。」

他們的故事跟老楊的有矛盾。那位考古學家沒提到漢字改革的事，而且他告訴我，陳夢家自殺的時候，趙蘿蕤並不在身旁。老楊說他兩次而非三次企圖自殺。他還提到那則外遇的指控。

「我跟一位在考古研究所工作、認識陳夢家的人談過，」我小心地說，「他說在文革的時候有人批評陳夢家，他們相信陳夢家有外遇。我知道，那個時候有很多事都被誇大了。你記得這類的批評嗎？」

一陣沉默，那婦人不自在地變換姿勢。趙老終於打破沉默：「我完全不知道有那樣的事。」

「你記不記得聽說過任何有關的事？」

「我從來沒聽過。」他平靜地說，神情看不出有任何異樣。我換了個話題，緊張氣氛舒緩了，我們談到網球，趙老還是一樣一週打三次球。

\* \* \*

我知道那故事有更多內情，但我也知道從趙老那裡挖掘不到更多。在跟他談話的所有經驗中，我可以感覺到，他個性的某些部分是完全隱藏起來的。他和那一代的很多中國人一樣，尤其是那些經歷過悲慘事件的人。他們的記憶藏在一個外殼下，隨著時間而變硬。

但是偶爾，某種深層的東西會如光芒乍現。我記得趙老告訴我的另一個故事。他的房子被拆的幾個月後，一個冬日的下午，他發現自己到了舊宅附近。一時興起，趙老來到那座四合院舊址。從街上看，外觀一切如故：灰泥的圍牆、紅色的大門。趙老正好有帶鑰匙，他試著開門。打不開，他就彎下腰從信箱孔往裡瞄。毀壞的牆，粉碎的磚。塵土、塵土、塵土。老人看了很久，然後轉身走開，再也沒回頭。

他告訴我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是這樣的結局。意思很明顯：他生命中的那個章節已經畫下了句點。不過，一定還有某種原因，並非像他說的那般無情。否則，趙老怎麼還會有那把鑰匙。

## 第十二章 政治庇護

二〇〇一年一月

華盛頓特區和北京一樣，是被嚴謹規劃出來的城市。兩個城市都是正方形，有筆直的街道，精準的角度。兩個城市都完全根據羅盤排列而成，在有遠見的統治者眼中，它們是向遠方無窮延伸的石板地。明永樂帝在中國北方平原上選中了位置；喬治·華盛頓相中了波多馬克河灣。兩個城市的布局——從紀念碑與寬廣的街道，都讓訪客立即知道那是權威的所在。

在這兩個城市的中心各豎立著一座政治建築：北京以紫禁城為中心，華盛頓特區則以半圓形的美國國會為中心。以美國為例，從國會這個中心點向外輻射，街道完全是邏輯化的命名，徹底表現美國的實用主義：南北向的道路用數字，東西向用字母來命名。從國會沿著北首都路往北走，跟羅德島大道交叉之前，你會經過比較後面的字母，像是Q街、R街、S街。羅德島大道繼續向東北延伸（U街、V街、W街），接著，當單一字母全部用完之後，兩個音節的名字接著開始：亞當斯（Adams）、布萊恩（Bryant）、錢尼（Chinning）、道格拉斯（Douglas）、埃瓦茲（Evarts）富蘭克林（Franklin），依序排列下來。在富蘭克林街和羅德島大街轉角處，有一棟快倒塌的米黃色石磚公寓，二〇〇〇年秋天，在那棟公寓的三樓，五個維吾爾人在那找到了暫時的家。

有好幾個月，那間公寓是剛從中國出來的維吾爾人的中繼站。租金一個月只要四百美元，房客一個接一個，全是維吾爾人。公寓有個



小廚房、兩間臥室，和一間地上鋪著兩張床墊的客廳。客廳的一面牆上掛著一幅抄錄自《古蘭經》的經文，對面牆上是一幅彩色美國地圖。

現任的房客中沒有人打算在此長住。一個男人剛從加拿大非法入境，另一個已拿到政治庇護，正在申請永久居留權。其他人正在準備申請政治庇護，每個人都在這個城市到處尋找自己的管道，以便覓得工作、律師和需要的證件。他們同時找尋著體制裡的漏洞。這是華盛頓特區和北京的另一個相似處：在一排排整齊的街道和耀眼的紀念建築下，總有一種混亂失序的成分存在。

搬進這間公寓不久，波拉特在一份中文報紙的分類廣告上，看到一則「駕照顧問」的廣告。廣告主在唐人街，只要一百五十美元，他們的顧問便可以幫你準備好申請維吉尼亞州駕照所需的文件。維吉尼亞的法律漏洞之多，在移民之間是出了名的，例如說向該州申請駕照和身分證的人不須出示居民證明或其他任何身分證明，唯一的要求是一份申請人住在維州的宣誓書，和其他一些有效的文件。那表示，住在其他州的非法移民，也就是像波拉特這樣的人，有可能連護照都不用出示，就拿得到該州的駕照。甚至不會說英語的人還可以帶自己的翻譯去考筆試。

那家唐人街的服務公司幫波拉特安排了宣誓的事，對方什麼問題也沒問，還派一個中國人陪他考筆試，那男人只要一看到選擇題的正確答案，就低低地說一聲「大哥」。大哥、大哥、大哥，結果，波拉特順利考過。拿到駕照後，波拉特花三千一百元美元買了一輛一九九二年出廠的銀色本田汽車。

那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波拉特想打電話給他新疆的母親，但是公寓的電話被切斷了。他決定到羅德島大道和富蘭克林街轉角的公用電

話去打。時近午夜，公用電話位處良信酒鋪的街對面。

波拉特正撥著號碼時，一個男人從背後靠近他，說了些波拉特聽不懂的東西。他不理那人，繼續撥號，但感覺到有個東西抵住他的背，他轉過身，看到那是把手槍。

兩個男人：一個拿著槍，一個在車內。「趴下。」拿槍的喊，這回波拉特聽懂了。他馬上趴在地上，拿槍的那個在他身上搜尋，找到他前面口袋裡的七十美元，但不知怎的沒注意到他藏在另一個口袋裡的三百塊。搶了錢後，兩個強盜往羅德島大道方向開去。波拉特爬起來，快速跑回公寓。他在外面的時間不到五分鐘。

\* \* \*

那年冬天，我返回美國一個月。我跟父母姐妹在密蘇里過聖誕節，到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華盛頓特區等不同城市跟朋友、編輯見面，沒有一個地方讓我感到熟悉。我在美國的一個小鎮長大，在另一個小鎮上大學，畢業後一直住在國外。我在美國，前往任何一座大城市都需要依賴地圖。

對我而言，首都似乎最陌生。那些寬闊的街道和雄偉的紀念建築，使得它的格局給人一種威脅感，好像再怎麼多人也永遠填不滿這個特別行政區。紀念建築在一月裡尤顯荒涼：空盪盪的步道、枯黃的草坪，天空是冰冷的金屬色，氣象預報可能會下雪。我搭地鐵去羅德島大道，周圍全都是陌生的面孔，第一個認得的是一個維吾爾人。

波拉特在車站外面等我。他是走路來的，因為本田車送去維修了。我們相視而笑，握起手來，就像在雅寶路的那些日子一樣。他看上去更消瘦，來美國後體重降低了，菸還是抽個不停，不過現在改抽

萬寶路淡菸。在北京時，他就比較喜歡萬寶路，但很少買，因為都是假菸。

我們走到他的公寓，我一脫下外套，他就笑了。

「你的襯衫跟我的一樣。」他說。

我低頭一看，發現我們穿得一模一樣：橄欖綠的卡特彼勒牌棉布襯衫。

「你在雅寶路買的嗎？」他問。

「是啊，在朝陽門外那個新市場。」

「它是假的，」他說，笑了起來，「我的也是。你花多少錢？」

在中國，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只要有人那麼問，你就知道自己被敲竹槓了。

「差不多七十元人民幣。」我絕望地說。

「我付四十，」波拉特說，「可能因為你是外國人，所以他們開的價格比較高。」

他的室友們都出去了。波拉特要去一趟城裡，我請他先帶我到附近逛一逛，他就帶我沿著羅德島大道往南走。一路上，電線杆上都貼著關於那個月的總統就職典禮的傳單：

憤怒之日！

反布希的黑色聯合集會

一月二十日，星期六，早上十一點

請穿全黑衣服

贊助者：反布希黑色聯盟、新自衛黑豹黨、美國印第安人運動，以及其他有色人種

我在筆記本上抄下這一則，波拉特問我上面說著些什麼。「有色人種」（peoples of color）如果直接翻譯很奇怪，所以我用中文通用的「少數民族」一詞跟他解釋。但是，少數民族一詞在英語裡也一樣奇怪。或許，世上有某個語言可以把這個問題解釋得妥當一些，但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

我問波拉特，他在街上碰到的一般美國人，會不會把他歸類於某個特定的族群。

「他們以為我是墨西哥人。」他說。

「有沒有人試著跟你講西班牙語？」

「有時候，」他說，「但是在這一區不常有。」

我們到了羅德島大道和蒙大拿大道的交叉路口，波拉特說在那個轉角處，晚上常有毒販公開交易。他認為，他住的大樓裡也有人在販毒，有些人的作息很奇怪，他感覺他的大部分鄰居都沒有工作。他還注意到，他們買東西時，有時用的是一張張特別的紙而非錢。

到這個國家才不過三個月，波拉特已經學會所有美國人的習慣，提到黑人時就壓低嗓子。即使我們用的是中文，他也一樣，有時候他叫他們「非洲人」。他聽過人家用「非裔美國人」一詞，但他只記得第一個字。有時候，他也用「西班牙人」一字來形容拉丁語系的人。

「所有維吾爾人都說，住在非洲人的地區不好，」他告訴我，「老實說，我還沒聽過哪個人對他們有好印象。在美國其他地方，他們可能好一點，但是在這裡，他們整天又喝酒又吸毒，我敢說，在這一區不到一半的人有工作。」

他抽出一根萬寶路淡菸，我們繼續沿著羅德島大道走。人行道上丟滿了破玻璃和廢棄物，沒什麼人。樓房很破舊，商店大多沒開業，街道很安靜。我不記得上次置身於這麼安靜的城市是什麼時候的事

了。在中國，每個市區都充滿生氣——小販、修理工、麵攤、路邊商店、美髮店。即使在被國營企業改革影響的城市，當地人也總是有活動在進展著。而且，總有工程在進行，充滿了不間斷的敲打聲和手提鑿岩機的鑽鑿聲。

但是在羅德島大道，唯一的聲音是疾馳而過的車聲。少數幾家店連真的商店也稱不上：一家立即支票店，一家明星典當鋪。波拉特說，雖然這一區外來的移民不多，但是幾家比較有規模的店全是移民開的。他的車在一家衣索比亞人開的大都會汽車廠修理。韓國人開了一家知名的炸魚店，還有一家雜貨店，叫「東尼的老鄰居」，店裡的酒比食物還多，用厚厚的玻璃樹脂保護著收銀櫃台。印度人開的良信酒鋪旁，是福建人開的華美餐館。福建以走私人口著名，華美餐館的福建老家親戚可能正等著蓋綠玻璃的大厝。位於羅德島大道上的這間餐廳，一副破損的招牌面對著冷冷清清的大街，上面寫著：

華美餐館

中美料理

玻里尼亞雞尾酒

外帶服務

「黑人欺負他們，」波拉特說，「他們在這兒白吃白喝。」

\* \* \*

地鐵帶著我們在城市的地下棋盤裡奔馳——回到第一個字母，經過國會大廈，到了史密森車站。我們走在廣場乾枯的草坪上，華盛頓紀

念堂關閉整修，支架攀在地基上，大理石、金屬支架和鉛灰色的天空渾然一體。我們抬頭往紀念堂望去，看見兩個亞裔男子從旁邊走過。他們的穿著一模一樣：黑西裝、卡其大衣。波拉特等到他們走到聽不見的地方才開口。

「那些是北韓人。」他說。

「我想，他們只是亞裔美國人。」我說。

那兩個人往西朝倒影池走去。波拉特很注意地看著他們。

「他們絕對不是亞裔美國人，」他說，「我從他們的穿著和走路的樣子，就看得出來他們不一樣，我敢打賭他們是北韓的外交人員，看起來跟那些在雅寶路大使館出入的傢伙一個樣。」

「他們有戴金日成別針嗎？」

「我沒看到，」他說，「不過在美國，他們有可能把別針拿下來。」

我們走下草坡，向那排沿著倒影池的橡樹走過去。我故意放慢腳步，希望不會再看到那兩個亞洲人。這是個讓人沮喪的一天：破舊的鄰里、有關北韓人的雅寶路老話題。過去五年，我住在世界的另一邊，許多時候我被叫去談美國——上課、回答問題、跟好奇的中國人聊天。在和平工作隊，那基本上變成了我的工作職稱：「外國專家。」

但是現在，當我終於和一個從中國來的人站在這裡時，卻發現我一點也不認得自己的國家。即使是因為冬天而無人眷顧的紀念堂，看起來也不一樣了。正在維修中的方尖碑下，倒影池跟石板一樣了無生趣。幾隻白色海鳥從水面慢吞吞地飛過，我在池畔停留了一會兒，波拉特說他想去看林肯紀念碑。這時，我們前面的亞洲人終於不見了。

我們爬上紀念碑的階梯，兒童的笑聲在大理石牆上迴盪，到處都是學生團體。我不記得上次來這裡是什麼時候，可能在我也是個孩子

時。裡面，「蓋茲堡演說」刻在牆上：

八十七年前，我們的先輩在這片大陸上創立了一個新的國家，乃基於對自由的堅信，並致力於凡人皆生而平等的信念.....

那些字句給人一種彷彿跟重讀《聖經》一樣的祥和感：半熟半新，就跟所有在了解其意義之前就已經背起來的東西一樣。我慢慢地讀，在固定押韻的句子後停頓：「世界不曾多加留意，也不會長久記得」；「鞠躬盡瘁的奉獻」——那天第一次，我得到一種平靜。那是我的語言，這是我的家。

波拉特跟我站在林肯雕像前，孩童擠在我們旁邊笑談著，他們的在場使得那座人像看起來比照片更加威嚴。有好一會兒我們都沒有說話。

「很多維吾爾人很尊重林肯，」波拉特說，「我以前常讀有關他的歷史。他處理少數民族的方式令人敬重。」

我們走出紀念堂，回到了寒冷的一月下午。外面豎著一塊簡單的木板，上面寫著：

戰俘米雅  
妳不會被遺忘  
最後的砲台屹立守護  
直到他們都回家

一個身穿迷彩裝的中年男子發著傳單——鞠躬盡瘁的奉獻。我接過一份，道了謝，這時波拉特碰碰我的手臂：

「那些北韓人在那裡。」他說。

他們並肩走著，黑西裝、卡其大衣。這次我仔細端詳了一下，  
嗯，沒有胸針。

「我真的不認為他們是北韓人。」我說。

「我很確定。」他說。

那兩個男人走向等計程車的地方。他們握手之後，各自坐進一輛計程車。

「他們一定在做些什麼奇怪的事，」波拉特說，「要不然怎麼會那樣各自搭車？」

而我們看起來也差不多是那樣：兩個男人，一個來自新疆、一個來自密蘇里，穿著一模一樣的假卡特彼勒牌子棉布襯衫，站在林肯紀念碑前講著中文。我說，我們該走了，然後我們終於離開。

\* \* \*

全美國大約只有五百名維吾爾人。其中一些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以大學生身分來的，但是最近幾年裡，單獨來的人愈來愈多。他們通常會提出「政治庇護」的申請，那跟「難民」的狀況不同。難民是一個被控制的團體，每一年，白宮會根據國際局勢決定接受多少難民，以及來自哪些國家。一九八〇年初期之前，大多數難民來自越南，到了上世紀末，前蘇聯人占了多數；二〇〇一年時換成非洲，諸如索馬利亞、賴比瑞亞、獅子山。基本上，難民是先從海外申請，國務院負責提供來美國的旅費和開始定居時的費用。

「政治庇護」是美國移民系統中的一張彈性牌。跟「難民」是在政府的資助下抵達美國不同，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是自己想辦法來的。



他們的人數很少，例如說二〇〇一年只有二萬三百零三人獲得政治庇護（那年美國承認的合法移民總數是一百零六萬四千三百一十八人）。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或持假造文件、從邊界偷渡入境，或是欺騙美國移民官員的例子，並非罕見。只要候選人條件佳，這些行為並不會影響他的申請。這種情況創造了一個奇怪的道德環境：波拉特到美國領土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欺騙政府官員，但他還是可以申請政治庇護，而不用擔心有後遺症。政治庇護案中向來以充滿各種假故事而知名，很多人是因為經濟因素來到美國，但他們卻會誇大自己在祖國受到的政治危險。來自中國的申請人常常引用一胎化政策，因為他們知道美國很關切墮胎的問題。

一月，我去看波拉特時，他已經聘了一位律師幫他申請政治庇護。一旦成功，他就可以找工作，也可以把新疆的妻子接過來。得到政治庇護之後還有其他步驟：永久居留權以及申請公民權。其他維吾爾人告訴波拉特，如果一切順利，他可以在五年內成為真正的美國人。

為了準備將來找工作，波拉特報名去上英文課。他告訴我，剛開始能找到的工作大概都不需要什麼專長，比如像是幫人開車。不知道為什麼，他對英文變好後能在郵局工作感到興趣。「很安定，而且不需要美國學校的高學歷。」他解釋說。

一月時，他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寫一份申請政治庇護的推薦信，我答應了。雖然我沒有親眼見到波拉特在新疆受到的政治迫害，但我很了解他的經濟情況。在信中我寫著：「不管怎麼樣，波拉特先生都不應該被視為只想到美國謀生的經濟難民——身為一名精通中俄雙語的知識分子，他在北京有很多做生意的機會……」

接下來的一次，我去華盛頓特區時，跟波拉特的律師麥茲格爾見了面。一九九八年，當麥茲格爾還在費城一家非營利的移民機構做事時，一個客戶打來諮詢電話，解釋說他是維吾爾人。麥茲格爾問他：「維吾爾人是哪一國人？」但在同年，他就自己組建了公司，客戶很快變成以維吾爾人為主。雖然他的辦公室在馬里蘭的貝塞斯達市，但是到了最後，所有華盛頓特區的維吾爾人都雇用了他。他跟每個客戶索取一千五百美金的費用，這比起同行算是低的。

三十一歲的麥茲格爾十分熱情。他出生於義大利的維琴察，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西西里人。他告訴我說，他母親的背景啟發了他去研究移民法。從麥茲格爾身上，可以看到文化熔爐熔得很快。他的母親是天主教徒（「西西里式的」），但他上了十三年的貴格會教會學校。他投票給共和黨，讀奧柏林學院時主修東亞研究，空閒時還會讀讀日文和漢詩，也盡可能研讀各種有關維吾爾人的資訊。一九九八年，他參加了流亡團體在土耳其安卡拉所舉辦的世界維吾爾青年大會。「我超能忍受無聊的，」他解釋，「所有會議都講維吾爾語或俄語，我就讀我的書、塗鴉、做其他事。」

麥茲格爾從來沒有去過新疆，但光是待在馬里蘭，他對維吾爾的文化就已經有相當的了解。他曾想請個華人助理，但在發現了維吾爾人對漢人根深柢固的不信任感後作罷。他還了解到，很多受過教育的維吾爾人不喜歡伊斯蘭教徒。他也熟悉了維吾爾的階級系統，對維吾爾貿易商人的資源之豐富，更是印象深刻。（「你可以把他們丟到叢林裡，他們照樣有辦法做生意。」）他也學到，在問他們政治庇護申請表上的第五個問題時，要很小心：

如果你被送回祖國或任何國家，你會害怕受到折磨（嚴酷的身體和心理上的痛苦，包括被強暴和其他性迫害）嗎？

「我碰過有維吾爾人回答說不會，因為他們不怕，」麥茲格爾告訴我，「他們想要做勇士。所以我就得向他們解釋，這個問題想知道的是，中國的監獄有沒有可能折磨囚犯。」

二〇〇一年時，據統計有五百名維吾爾人住在美國，經由麥茲格爾的協助，其中約有一百人最後得到了政治庇護。但是他跟我說，就算案子成功，他還是會擔心客戶的將來。

「每過一陣子我就會想，我雖然幫這些人拿到政治庇護，但基本上，我在幫忙摧毀維吾爾文化，」他說，「他們的孩子適應得那麼快，到了孫子那輩，身為維吾爾人將會變成是件奇怪的事。但是，這種情況發生在美國的每個族群裡，就像那些一八四〇年代過來的德國革命分子，他們的後裔對革命再也沒有相同的熱情。任何被迫害的少數族群都是這樣的。」

每年的十一月十二日，華盛頓特區附近的維吾爾人會聚在一起慶祝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國慶。有一年我正好在那裡，就跟波拉特一起赴會。波拉特的父親曾經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軍隊作戰。餐會租借喬治梅森大學的場地舉行。大約有八十名，包括幾位從海外來的維吾爾人參加。一位八十歲的老人老遠從哈薩克飛來，他是少數親身經歷過一九四九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滅亡的維吾爾人。

餐會上，人們用維語發表演說，然後年輕的維吾爾人穿著傳統的服裝跳起了舞蹈，其中一個八歲的女孩來自維吉尼亞的費郡，講著一口標準流暢的英語。她告訴我，她之所以跳舞是因為她的朋友也在跳。我問那女孩，她的維吉尼亞同學知道維吾爾人的意思嗎？她滾動

著雙眼，「他們說我是中國人，因為我是從中國來的。」她說。舞蹈之後，四個穿著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橄欖綠軍服的維吾爾成人列隊走進大廳。他們走到前頭向群眾敬禮，這時掌聲如雷。十一點整，一名安全警衛廣播說那個活動場地馬上要關門了，這些維吾爾人互相握手告別，默默地離開了喬治梅森大學。

\* \* \*

我在二〇〇一年一月去看波拉特時，他並沒有跟我提及他被搶的事。一年多後，我們都認識的一個朋友告訴了我，我才知道。後來我問起波拉特這件事，他說開車和拿槍的都是「非洲人」。

「一開始我很害怕，但是當他要我趴下時，我就不怕了，」他說，「那時候他會不會開槍，都不是我能決定的事。我不認為他會開槍，他很瘦，我想他有毒癮。」

「我沒跟警察報案，因為我還沒拿到政治庇護，不想惹上麻煩。而且那個場面很難看，我就這樣子趴在地上。」

波拉特搖著頭，自我憐憫地笑了一下。我懂他之前為什麼沒有告訴我，因為那起搶劫事件讓他很羞恥。好幾次他都提到，在羅德島大道那樣趴著，看起來一定很可笑。我試著安慰他，那樣做是對的，沒有理由跟一個拿槍的人正面抵抗，但波拉特並不認同。

「我的一個維吾爾朋友在外送達美樂披薩時，被一個人用槍口指住，」他說，「那人也是非洲人。他用槍指著我的朋友，我朋友奪走了槍，但裡面一顆子彈也沒有。他們打了起來，不久警車就來了，警察把他們兩個都扣上手銬，帶回警局。我朋友打電話找翻譯，翻譯一到，他們立刻放了我的朋友。」

我跟他說，那個維吾爾人很幸運，但最好還是預想槍都是有裝子彈的。波拉特搖搖頭。

「那要看情況，」他說，「如果他們看上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麼，你就可以跟他們打。有一次我在雅寶路就碰到這樣的情形。那是一九九七年，那一年有四個兌換貨幣的商人被殺。有三個傢伙可能注意我好一陣子了，那天晚上他們想搶劫我。帶頭的在街上把我擋住，對我亮刀子。他晃著刀子說：『朋友，借點錢吧？』你也知道那些人說話的口氣，總是『朋友這、朋友那』的，他有東北腔。」

波拉特驕傲地笑了。「我什麼也沒給他，」他說，「我跟他說：『我是新疆來的，我們烏魯木齊來的對刀子很清楚，你手上那把一點也不稀奇。還有，我這附近有朋友。』我一說完，他們全走了。」

【古文物G】

## 鑿不裂的骨片

跟趙老談過之後，我開始研究陳夢家的生平故事。資料很少，坊間沒有出版過他的傳記，他的很多著作也已絕版。他的生命盡頭一片空白，沒有人知道他究竟為什麼走上自殺這條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仍是段帶著陰影的時期，你可以評論那個年代，但一般的共識是不要追究得太深，而且也很少有人保存那段期間的日記或書信。

由於很年輕就發表過作品，陳夢家早年的經歷倒是很清楚。他一九一一年出生於南京，父親是當地的教師，也是一位長老派教會的傳教士。陳家有十個小孩，五男五女，每個都大學畢業，這樣的教育程度在當時極為罕見，尤其是那個年代的女孩子。陳夢家排行老七，也是最聰明的一個。他在十八歲就發表了第一首詩，二十歲出版第一本詩集後，一夕成名。照中國詩人的傳統，他給自己取了個筆名：漫哉。

陳夢家是新月詩社最年輕的會員。新月詩社由一群浪漫詩人組成，他們想掙脫古體詩僵硬的寫作規則。一九三二年，當日本和中國軍隊在上海郊外正面衝突時，陳夢家加入抗日。年輕的詩人從戰場寄回了詩句：

血花一行行潤著新鬼的墳墓開，  
開在雪泥上：  
那兒歇著我們的英雄——靜悄悄.....

他的詩風格簡潔但充滿韻律，文學評論家把他跟英國詩人郝思蒙和哈代相提並論。成年後，陳夢家放棄了基督教，但他依然感受到那遙遠過去的神祕感，並用一種幾近宗教崇拜似的情感來描述它。在早期一首叫〈唐朝的微笑〉的詩裡，他對一座千年女神像做了這樣的描寫：

我從側面窺探，  
她在莊嚴下  
冷淡的，沉默著  
一抹笑角的希微

古文物自有它的力量，文字讓遙遠的古代呼吸。在另一首詩中，敘事人注視著一座古堡壘：

塔像是安靜  
像是尊嚴，聽著江聲  
聽著風  
在白雲上寫出三千年古國的文  
啟示我向上，崇拜，引我尊重古老。

在南京念大學時，陳夢家讀的是法律，但畢業之後他換了領域。一九三二年，他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接著是宗教，最後他投注於古文的研究。把過去拉得更近的同時，詩卻變遠了。詩好像總是帶給

陳夢家痛苦。在一首詩中他寫著：「我搥醉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在一本書的序中也解釋，他在二十三歲時就已經不再著迷詩：

我從十七歲起就用規格束縛自己。我寫的任何東西都可以用一條尺來衡量.....在沉重枷鎖的奴隸下，我學會惜字如金。

三十初頭時，陳夢家基本上已不再寫詩。在燕京大學時，他埋頭苦讀甲骨文和青銅器。隨著轉移重心到考古學上，他早期的詩讀起來就像已經過去了的另外一段人生：

你想要聽我的真身？  
我寒傖，講來真要紅臉。  
我輕輕掀開過二十張白紙。  
有時我想要寫一行字：  
我是一個牧師的好兒子。

\* \* \*

趙蘿蕤也是牧師的孩子，同樣才華早露。在二十五歲，她就翻譯出版了第一本中文版的艾略特的《荒原》。趙蘿蕤在燕京大學教英文，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為了逃避日本侵略，她才離開北京。多年之後，她在自傳中記著：

我們搬到南方，但是我的父親和弟弟趙景心留在北京.....我們搬進浙江德清縣一間老房子。我在那時嫁給陳夢家。什麼東西都



很便宜，日子多采多姿。我們天天有魚蝦吃，也不用讀書，所以我們常去看鴨子在水裡游來游去.....

跟很多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樣，陳氏夫婦最後遷居昆明。在那裡，全國主要的大學重組成著名的西南聯大。陳夢家在那裡教書。因為規定不准夫婦同在一所學校任教，趙蘿蕤因此待在家裡。

我當了八年的家庭主婦。我有妻子為丈夫犧牲的傳統想法，但我也真的受過很好的教育。煮飯時，我總會拿本狄更生的書在手裡。

一九四四年，洛克斐勒基金會提供給這對夫婦一筆人文獎學金，贊助他們到美國從事研究。那是一個獨特的年代：儘管發生了日本入侵和國共內戰，但一群前景看好的年輕人卻在知識上和西方保持深入的聯繫。很多人前往美國和歐洲接受教育，大多數人計畫學成之後要把所學帶回祖國。

對陳夢家和趙蘿蕤而言，旅程始於從昆明飛往加爾各答。那趟「超越山峰」之旅，讓陳夢家在停筆多年之後，重新激發了寫詩的靈感：

看不見喜馬拉雅山，  
雲霧堆成山.....  
一切都太寂寞，  
這裡是天上的沙漠

在芝加哥大學，趙蘿蕤投入精神研究亨利·詹姆士。研讀英文多年的她，突然發現文學世界就在眼前。一次訪問哈佛大學時，她見到艾略特本人，他送她一本親筆簽名的詩集。

據說我成為亨利·詹姆士作品第三多的收集人.....我丈夫和我決定盡情享受美國所提供的文化教育。我們去聽演奏會、看電影、參觀各種美術館和博物館。我們去觀賞各類歌劇。離美返國時，我們的行李裝滿了書和唱片，沒剩下什麼錢。

趙蘿蕤研讀文學的時候，陳夢家到處蒐集青銅器。在混亂的十九和二十世紀之間，很多古物流出中國，但它們很少被仔細研究過。陳夢家希望寫一本準確詳盡的青銅器集錄，匯集了中國和西方對青銅器的研究。除了洛克斐勒獎學金，他還獲得了哈佛燕京學社的贊助。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修斯小姐：

我應該會在這個週末或是下個週末去拜訪堪薩斯市。我想知道什麼時間去參觀博物館最方便.....

漫哉果然名不虛傳。他到過底特律、克里夫蘭、聖路易、明尼亞波利斯、紐約、耶魯大學所在的新港、波士頓、羅德島的普羅維丹斯市、普林斯頓、舊金山，甚至遠赴檀香山。在每座城市，他跟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聯絡，研讀他們的收藏品。整整兩年，他遊走在中國古代銅器和當代美國文化之間：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

親愛的修斯小姐：

我在堪薩斯度過一段很美好的時光，再度感謝妳的熱情招待。時間許可的話，我希望在秋天之前能帶內人再度造訪.....最後一天晚上，我花了一點時間在堪薩斯市中心，最後還去看了場電影。從每個角度說來那趟旅程都是愉快的.....

美國之外，陳夢家還到過多倫多、巴黎、倫敦和牛津。一九四七年，在造訪了斯德哥爾摩之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洛克斐勒基金會：

皇室的王子在城堡裡接見我，請我看他的收藏。我很榮幸地和他談了兩個小時。

那一年，陳夢家完成了書的初稿——八百五十座青銅器的照片和解說。回到中國之前，他將手稿和照片寄到哈佛大學，接下來的編輯工作將靠郵件進行。哈佛的東方藝術史教授華爾納寫了一封信給陳夢家：「唯有一個勇敢的人才能面對亞洲當前這種困境——政治和財政上皆是。我很佩服你在這個時候回國的勇氣。」

趙蘿蕤繼續待在芝加哥完成博士學位。一九四八年底，當她終於橫越太平洋回國時，中國的內戰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登船（到上海）時聽到廣播，清華和北大已經解放。（國民黨將軍）傅作義的部隊已陷入重圍.....

這時去北京的火車與海輪已停駛，我得想辦法.....幸運的是，有架給傅作義運糧食的飛機正好要飛往北京，我搭上了那班飛

機。飛機在天壇降落。過天津時，解放軍的高射砲向我們射擊.....飛機沒有扶梯可以讓搭乘者下機.....那就往鋪設在地上的兩床棉被上跳吧。

當時的首都已經分裂，有些地區被共產黨控制，有些仍在國民黨手裡。陳夢家的住所是在已淪陷共產黨手中的一區。

我託人帶信給夢家，告訴他我已平安抵京，哪天開城門，哪天就來接我回家。三週後城門開了，北京已和平解放。

\* \* \*

城門才打開幾乎馬上又關上了。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中美之間的聯繫隨之中止。在劍橋，哈佛大學的教授等著陳夢家關於那本青銅器著述的音信。而在北京，陳夢家等著政治局勢緩和下來，他研讀甲骨文，讓自己忙碌起來。一九五六年，他出版了《殷墟卜辭綜述》。殷墟指的是過去幾年來挖掘出無數骨殼片的安陽。從那些骨殼碎片中，陳夢家重建了商人的世界：文字、語法、地理、天文、祀與戎、上天與王室。北京出版社付他稿費後，他用那筆錢在市中心買了一棟老的四合院。大門入口上方題字：一書齋。不過那本書成為悲劇的徵兆：兩年之內，書被中共查禁。在美國，那本青銅器的書也沒有下文。

雖然被查禁，但考古研究所還是用陳夢家帶回來的筆記，印出了自己的版本。那個版本編輯得很馬虎，有不少錯誤，照片又被擱置在哈佛。為了應付時局，中文版還附了一篇批判陳夢家的引言，書名下也沒有他的名字。這跟洛克斐勒所贊助的任何其他研究成果都不一樣。書名是：

## 《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

\* \* \*

現今，全世界大約只有三十位甲骨文學者，在美國最受推崇的專家，當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吉德煒。吉德煒與陳夢家從未謀面，對陳夢家的故事也所知甚少，但這個美國人沿著中國學者的軌跡進行研究，還參考過陳夢家留下的那本有關甲骨和商朝的書。

「那本書非常非常重要。」在他柏克萊山丘的家裡的一次訪談中，吉德煒這樣跟我說，「那是一本很棒的書。他把一切攤在那裡——儀式、祭典、曆法。它是一本很舊的書，但依然是個很好的研究起點。」

跟陳夢家一樣，吉德煒把他的學院生涯花在拼湊一片片甲骨上。他把甲骨上的符號比喻成音樂中的音符——在對的人手裡，這些代碼就化身成音樂。它們是歌曲的片段，聲音的片段。旋律中有些主題不斷再現，創造出了合聲。吉德煒研究了一千三百片有關降雨的卜辭，它們是商王武丁時期的甲骨，約成於西元前一二〇〇到前一一八九年之間。

今月多雨。

王其田；湄日不雨。

不雨，隹（唯）茲商有乍（作）咎（災禍）。

甲骨能奏出音樂，也能說故事。商人對死亡很執迷，在他們的世界裡，死去的先人有著神力。如果違背他們，他們會用疾病、不幸、

天災處罰活著的子孫。只要當政者有人生病，或者天氣出了問題，王室就會占卜，試著找出是哪位祖先在生氣，需要祭祀奉獻。有時候，商人會跟這些死去的祖先談判：有一片甲骨文上就記載著，商人提出以三個人牲為祭品，但一定有裂痕顯示那祖先不滿，因為另一片甲骨隨之記載：增至五個人牲。那之後，這個祭祀的卜辭就結束了。顯示祖先一定對五個祭品感到滿意。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一個牙痛的卜辭。」吉德煒說，一邊打開他自己撰寫的有關甲骨文的書《商代史料》。他翻到一頁一幅同樣是武丁時期的甲骨黑白拓片。上是一塊破裂的龜殼的正反兩面，橢圓形的龜片上有鑽孔和刻文。那些原來的商文字很難辨認，吉德煒的書將這些腹甲上的字形重製成清楚而現代的文字。

打開那一頁後，吉德煒設想了當時的場景。「王就要出征，但是有顆牙齒在痛，」他解釋說，「他要想辦法處理牙疾，所以得先找出是哪個祖先在作怪。」

龜片上刻了四個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他們都是同一代，王的父親和三個叔伯，問卜當時都已經作古了。

「是父甲，不是父甲，」吉德煒用中文大聲唸出，手指指著拓文上那字，「是父庚，不是父庚。是父辛，不是父辛。是父乙，不是父乙。」

每個祖先都卜過多次，這從腹甲上的多次裂痕可知。這份拓片就像本三千年前偵探家的筆記，把可能性一一過濾掉。

「然後，我們又有另一片拓文：『侑父庚一犬，分一羊。』」吉德煒說，「所以我認為，父庚是讓帝王牙痛的元凶。」

吉德煒停了一下，從書中抬起頭。六十九歲的他，身材高瘦，有一雙銳利的灰藍眼睛。「這些是音符，」他說，「但要靠我們來把它

們譜成樂曲。」

\* \* \*

古代中國，似乎總有人將這些音符做排列組合，而它們的秩序化、有規律、有組織，讓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印象深刻。即使是早在商朝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在中原的葬坑裡都看得到這種驚人的規律性。這些早期文化遵循著一種叫作「二次葬」的儀式。死者被葬下後，過了一段時間，骨骸被撿出來，清洗後重新排列。有時候，骨頭堆得很整齊，頭顱放在最上面。在某些墳墓裡，骨骼被小心地排開，頭部全朝向同一方。秩序化、有規律、有組織。

當吉德煒看著這些墓葬圖時，他聯想到了藝術與文字。在他看來，所有的東西都有著內在的聯繫：是一種同樣的直覺，以及把世界變得井然有序的想望在發揮作用。

「如果你想要尋找漢字的起源，我認為從自然圖像中去找，是不正確的，」他說，「你要找的應該是具結構的圖形——人們是從那裡把文字抽象化、編纂成的。在宗教信仰領域裡運作的同一動力，也會在文化領域裡運作。如果你想對這種非人格化的特質有更多了解，看看這個饕餮圖。」

「這些不是自然的圖像，它們是有高度結構性的獨特設計，遵循著基本的樣式和排列的秩序。它們好像是某種代碼，裡面藏有一種古人行事和思考的文化共識。我的感覺是，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東西。你什麼時候看過中國的第一個王的肖像？連我都不知道答案。在埃及，你可以看到很早期的國王或高級官員的肖像，但在中國你看不到

那樣的東西。顯然，中國人用抽象的方式來描繪重要強權、力量和存在，並從中得到樂趣。」

三星堆的青銅器則不同，雖然它們也有特定的風格，但它們描繪的卻是人而非抽象的圖案。當吉德煒提到「中國」時，他指的是中原，這裡是商朝所在地和現代中國人尋根的地方。中原是中國人祖先崇拜傳統的起源地，祖先崇拜是這種文明獨有的特點之一。祭祀祖先，在吉德煒看來，自然開啟了後來的官僚制度，以及中國人保守的儒家觀念。

「當你注意到商人的祖先，你會發現他們各有權限，」他說，「最近過世的祖先管小一點的事，過世很久的則管大一點的事情，他們的力量隨著年代而變強。我的看法是，它提供了一種治理世界的方法。這種不同世代的祖先負責不同的事，其權力隨著時間而增強的特質，我稱之為『世代主義』。」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英雄基本上是一名官員。他負責組織和調度，在戰場上，他更多的是出謀劃策而知名，而非在馬上征戰。早期中國古典文學不會在戰爭的細節上，諸如死傷的、流血的戰場景象多加著墨。「你看不到像《伊里亞德》或是《奧德賽》書中那些血腥的戰爭細節，」吉德煒說，「而全是關於那個人做了些什麼、他的才能在哪裡。它是非常務實，非常基本的。」

吉德煒發表過一篇以此為主題的文章：〈乾淨的雙手和閃亮的鋼盔：早期中國和希臘文學中的英雄〉，拿希臘古典文學跟與之時間最接近的中國周朝的文本做比較。周朝以奠定中國文化的許多哲學基礎而聞名，一些最重要的早期文學作品，如《詩經》、《尚書》、《左傳》，也都是在這時寫成的。這些作品的時代橫跨西元前一〇〇〇到西



元前四〇〇年之間。生於西元前大約五五一年、西周滅亡後二百年的孔子，就視周朝為文化與習俗的理想典型。

和古希臘的文學相反，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道德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古老中國旌善懲惡，天上的神不會到人間作亂，中國古典文學裡沒有悲劇。除了更有力量外，死去的人跟活著的人基本上沒什麼兩樣。秩序化、有規律、有組織。

「荷馬史詩裡的死亡，問題在於它們都是毫無價值的，」吉德煒說，「它們被描寫成『愚蠢的死亡』。它們沒有力量，什麼也不能做。《奧德賽》中奧德賽到地獄見到阿基里斯，阿基里斯對希臘發生了什麼事，甚至他的兒子和父親是死是活全不曉得。這跟中國的死者不一樣，他們死得愈久，道行就愈高。古希臘人就不是這樣。希臘發展的是跟祖先崇拜相反的英雄崇拜。希臘人想建立的是城邦國家，那跟政治全由一個強有力的家族所掌管並繼承的宗族政體是相反的。希臘人並不鼓勵那種方式。」

吉德煒的談話是永恆的。我們見面時，他的話題變化自如：有時提到商朝，然後是周朝，再接著是當代中國。有一次，他講到中國人會建立官僚制度，就好像西方人的英雄崇拜一樣，是出於本能。但是他強調，這並不是一個價值判斷。事實上，對西方式的英雄主義的需要——抉擇、行動，自然地引發了戰爭。歷史學家長久以來就有一套理論，他們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受過希臘古典文學教育的歐洲人會更加不顧一切地衝入戰爭中。在他的一篇報告裡，吉德煒引用了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威廉·布雷克的話：「古希臘羅馬文學，看那戰事不斷的荒涼歐洲，那就是古希臘羅馬文學！」

再回到史前。當我問到，為什麼中國和西方會發展出如此不同的世界觀，吉德煒的解釋是地理位置。在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其氣候

類型比地中海和近東來得穩定。中國的兩大主要流域——黃河和長江，都由西向東流，流經的區域緯度都沒有什麼改變，表示上下游的農作型態都差不多，加上刺激貿易的因素也不多，古文明很自然是以農業為主。不常外出的人自然很少會跟外界交換想法和技術。

「基本上，我扮演的是地理決定論者的角色，」他說，「我相信氣候對古代中國很有利，它也助長了我們在這個文化中所見到的那種樂觀主義。當有洪水之災，就有個叫大禹的祖先把它治理好了。再來一次災難，我們還是有能幹的祖先，來解決問題。而且古代中國沒有邪惡的行為，沒有原罪的想法，因此，對解釋世上罪惡的自然神學沒什麼興趣。」

「反觀地中海、中東、蘇美這些有暴風沙及各種災難的地區，那是很不一樣的世界。讀《吉爾伽美什》就明顯看得出來。這個傢伙快死了，但他很生氣，他要一個死亡的解釋，這跟中國完全不一樣。在中國，你死了就變成祖先，你的身分關係跟在世時是一樣的：曾經是王，永遠是王；曾經是奴隸，永遠是奴隸。我相信，一個講祖先崇拜的文化會是個保守的文化，你不會發現新奇的有趣事物，因為那會對祖先形成挑戰。那樣的文化不給你懷疑的空間。」

我問吉德煒，這種樂觀主義，為什麼跟我們所知的十九和二十世紀——饑荒、洪水、災難、戰爭不斷的中國，那麼不同。而現在的中國則有著超過一億人口的移動遷移。

「那就是『高度平衡的陷阱』。」他套用了歷史學家伊懋可在其經典著作《中國的歷史之路》一書中的一個用語。伊懋可研究了中國文化的延續性，發現中國早期的成功和後來會走下坡，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地理位置的孤立。在沙漠、高山和海洋圍繞下，中國相形之下比較不受外來的威脅，但那也限制了它跟外來新事物的接觸。與此同

時，政治的穩定加上早期農業技術的先進，也都讓中國的人口增加到了一種危險的程度。

「中國在過去幾百年以來不斷壓榨它的天然資源，」吉德煒說，「他們那麼徹底地壓榨著資源，以至於它已經到了極限，在我看來，中國的自然景觀已經消耗殆盡了。」

想像的世界，跟地理一樣，是個陷阱。祖先接著祖先，朝代接著朝代——一個人口過多的歷史，永無止境的時間輪轉。中國人傾向於向歷史的深處探索，而西方人，尤其是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方人則對未來想的比較多。在西方人眼中，即使是遙遠的古代經驗，也必須是服務現代才有意義。在啟蒙時期，當現代政治系統面臨改變時，歐洲人歌頌古希臘的民主。十八世紀晚期，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所彰顯的是帝國主義「精英必須才智與體能兼具」的價值觀。

然而，中國人的歷史觀限制了他們對歷史的重新詮釋。二十世紀初，有些知識分子試著向過去尋根，但不可避免地，大多數人還是把興趣轉向外國的觀念與價值。那是個痛苦又笨拙的過程，他們無可避免地抓住了西方最糟的一些思想（例如馬克思主義）。一直到今天，中國人還在努力地想把西方的傳統融合在自己的文化中。吉德煒認為，這是為什麼在一九九三年，當他們沒有拿到二〇〇〇年奧運的主辦權時，他們會那麼酸溜溜地失望的原因之一。在〈乾淨的雙手和閃亮的鋼盔〉一文中，吉德煒寫道：

不論是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或者是後來渴望民主的不滿的學生，不管好或壞，西方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中國的希臘與羅馬。

跟中國人一心想主辦的奧運一樣，最近在北京舉辦的亞運……可以被看成阿基里斯為派特羅克勒斯的喪禮所辦的那場運動會的後代……這是一個鮮明的例證，表明中國企圖把曾經是古典西方的一部分，而現在是國際性的遺產，納入中國現代文化。

\* \* \*

跟陳夢家一樣，吉德煒會投身於甲骨研究是個偶然。他年輕時的志願是當作家。

「我簽了約要寫一本有關股票市場的書。最後放棄了，很高興地放棄。我寫過一本小說但從未出版，還好。後來我研讀了各種文學雜誌中的所有短篇，學到了寫作小說的那個套路，坐下來，寫了篇短篇小說投給《週六晚報》。沒想到，他們寄了張一千元的支票給我。我想，我可以每個星期都這樣寫，沒有問題。但是文章還沒登出來，那家雜誌社就倒了。」

「我當了一陣子自由記者，但是我的人脈太薄了。我幫《時代雜誌》寫的書評夠付房租，那很棒，但我發現一個成人不該只做那樣的事。我想朝某個新的領域發展，我想成為一個報導中國的自由撰稿者，因此我想應該學中文，就進了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裡，我被一個博士研究卡住了。在博士班第三年時，我已經退到了十九世紀。我想做些有關吸鴉片的研究——中國南方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怎麼會染上大不列顛帶來的惡習？然後我頓悟了：問題出在更早遠以前。我想閱讀孔子時代的書籍，所以我再回到另一個一千年前，那是個前沿領域，要研究的東西多得不得了。一九六二年，我已經三十歲，起步算有點

晚了。不過因為那是個新領域，感謝老天，你不用擔心解構主義或新批評主義那些東西。」

「我在台灣待了兩年，一九六五到六七年。回美國之前，我在日本工作了六個星期。一天，我在東京一家書店的書架上看到一本書——關於甲骨文的書。書上的第一個字看起來像是一個人舉起了雙手：



「共人的意思是『招募』人員。總共有七、八十個拓文全跟招募兵力有關。王做了一連串的預測——該招募嗎？共人三千，共人五千。伐這，伐那。那是本革命性的書，書名叫《殷墟卜辭綜類》，作者是島邦男。我把我的第一本書獻給了他，他花了十年才寫成那本書，但我和他從未見過面。」

發現一個機會，發現一本書——之後是三十五年的甲骨文研究。吉德煒出版過兩本有關商代的書，他的研究備受稱譽，一九八六年他獲得麥克阿瑟獎，可謂實至名歸。

當然，故事在結束之後再來回顧總是比較容易，這就跟古中國的歷史一樣：秩序化、有規律、有組織。吉德煒強調故事總是有兩面，也許我們只是還沒有看到那些「骯髒的」、不規矩，與不完美的日常生活細節。

「我把其中一部分跟我們所看到的古文物的優秀本質聯想在一起，」吉德煒說，「在中文作品裡，大約一直要到宋代才看得到對『骯髒的』細節的注意。我很確定他們一直都有這種文學，只是沒有

被精英分子記錄下來而已。精英分子要的是一個比較有組織的世界觀，在那個世界觀之下，道德受到獎賞、祖先受到崇拜。那不是真實的，而是一個高度理想化的世界。」

在另一次談話中，他跟我說他還是想著寫小說。「我很想寫一本有關商代的小說，」他說，「不過，我有的只是這些骨架、甲骨和古文物等等。我得把『骯髒』的部分加進去。我的意思是，我們有結構、有構圖、有文字，但我們沒有情感的衝擊力，我們得用想像把它們編出來。」

\* \* \*

在柏克萊的家中，吉德煒保留了兩塊骨片。一塊不到五公分長，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上面刻著：

癸亥卜，貞：王，旬亡禍。

那塊骨片是同在柏克萊教書的蘇聯流亡學者卜弼德送他的。以前在中國，這樣的古文物轉手還很自由時，卜弼德從一個古董商那兒買的。毫無疑問的，這片甲骨是柏克萊山莊最古老的文物之一。吉德煒用棉布把它包起來，放在一個舊的影片罐裡。有一天，他會把它捐給學校。

第二片是他大約在一九七八年買的一塊牛肩胛骨。那時，吉德煒在劍橋大學當研究生，他決定用商代的方法去鑽鑿一塊骨片。就他所知，這項實驗至今還沒有任何現代學者成功過。他跟一個肉販買了一片骨頭，那塊骨頭也就是現在一般所稱的丁骨牛排。

「一位教材料科學的教授說，這是個很簡單的實驗，」吉德煒說，「他跟我說，你把它帶來，我們把它放進沸水裡煮。兩個小時之後，整個地方臭死了。結果分數是商代一分，現代科學零分。」

直到今天，那分數還是沒變。學者們已經解答出許多甲骨文的內容——王室族裔、戰爭型態、對天氣的敬畏，但是對最簡單的問題：如何用傳統的方式鑽裂一片甲骨，還是沒有答案。

「高嶋謙一和一些研究生嘗試過。」吉德煒說。他說的高嶋謙一是一位溫哥華大學的教授。「他試著重現商代的方式，用焊鐵鑽裂甲骨，不過沒有成功。問題之一是，當你把一根熾熱的火鉗放在骨片上時，骨片就把那熱給吸掉了。也許商代的人是直接把甲骨放進火爐中烤的。我不知道。」

吉德煒的第二塊甲骨顏色很淡，比舊的象牙還要白。三個燒焦處在表面結了疤，但骨片並沒有裂開。骨面上什麼也沒有寫。

## 第十三章 奧運會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我坐進計程車時，司機笑著用英文說：「早安。」那是下午三點半。他的臉又黑又皺，有一雙小眼睛，笑起來會露出一口黃牙。他也知道如何用英文說「你好」和「好的」。當他講英文時，這個語言便獲得一種肢體性——他的身體向前傾，緊緊地握著方向盤，在發出高音和捲舌音的時候，他就會噘起嘴唇。用英文說了兩遍「早安」後，他換回了中文。我們向北出發，去尋找奧運會體育場。

身為一個在北京的外國人，那是滿愉快的一週。國際奧委會的調查委員將在北京待上四天，評估北京主辦二〇〇八年夏季奧運會的資格。這將是國際奧委會對北京的最後評估，半年後，他們將從北京和其他決選城市——巴黎、多倫多、大阪和伊斯坦堡中，選出主辦城市。每天，計程車司機的廣播都會傳來特別通知，提醒他們對外國乘客要有禮貌。司機們還免費得到兩盤英文卡帶的英文課程，那課程是為評估調查而特別設計的。課程包括一些實用的句子，例如，「陽光正燦爛」、「本市在主辦了奧運會之後會變得更美」，以及「漆器是唐朝時從中國傳入日本的」。

每個北京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孟景山。他是去年跟亞特蘭大《憲法報》的記者講述了中國奧運夢的計程車司機。亞特蘭大的那篇文章只有三百三十五個字，卻吸引了中國當局的注意。可能因為文章中引用了孟景山說過的一句話：「奧運會不是一個談論人權的場合。」孟景山也提到，如果在一九九三年，北京申辦奧運就成功的話，為了建造



新的運動場所，他所住的社區將會破壞。那份美國報紙引用了他的話：「雖然留住了房屋，但我真的想搬出去，所以我對那次申辦失敗感到雙重的失望。」

外國媒體人一向很著迷人權和胡同保存的話題，北京政府為了獎勵孟景山，除了給他首都「出租車行業百優司機」的榮譽，還頒給他幾百美元的獎金。北京的報紙將他描述成人民的模範，據報導，他將部分獎金捐給了慈善事業。這個消息的涵義非常清楚：每個市民必須為奧運會做出他的貢獻。

我的角色，我想，只是單純地跟隨著這股浪潮。整個星期，當我告訴人們，我正在寫有關奧運會的故事，突然之間，整個城市就好像沐浴在柔和的陽光中。交談更加友善，人們笑得更多了。當我要求採訪政府官員時，他們也同意了，隨後他們很實際地回答了我的問題。在中國，我學會謹慎對待我在筆記本記下的東西，但現在我可以毫無顧忌地引用它們。坐進計程車裡，我取出筆紙，告訴司機，我是一個記者，想要參觀未來的奧運會體育場。他許諾說，我們沿著通往長城的高速公路走便能找到。他不斷地瞄著我手上的空白頁。「奧運會會幫助中國人，」他說，「我真不知道該怎樣說才好，但是，奧運會可以提升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的名字叫楊樹林，他說我可以叫他楊司機。他告訴我，兩天前，在機場，一名中國空姐搭他的車時跟他說，她親眼看到國際奧委會調查團到了北京。

「她看見他們下飛機，」楊司機說，「她當時就站在機場門口。」

「他們是什麼樣的一個團？」

「她沒有跟我說任何跟他們有關的事，」他說，「不過，她很漂亮。所有的空姐都很漂亮。」

我告訴楊司機，再過三天，當國際奧委會調查團完成他們最後的行程時，我會在場，他讚許地點點頭。這男人的穿著跟流行的方向正相反：他穿著布鞋，戴著白色的棉質司機手套，穿著聚酯纖維橄欖綠軍服，衣服上的鈕扣是黃銅色的。他五十三歲，一個毛澤東的垂飾掛在他的後視鏡上，毛主席的相片下有兩句話：

一路平安

百年無災

我們沿著二環路行駛，這條路過去是北京舊城牆的所在地。為了迎接調查團的訪問，現在道路兩旁插上了顏色鮮明的旗幟。據北京奧申會的資料統計，北京市區總共布置了二萬面旗幟。旗幟上用英文寫著：「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s」（新北京，偉大的奧運會），中文則寫著：

新北京，新奧運

經過翻譯，其中有個形容詞的意思被扭曲了。照字面意義，這個中文標語應該英譯成：New Beijing, New Olympics。當我採訪北京副市長劉敬民時，他解釋說，中文的「新」有著難以翻譯的寬廣涵義。

「翻譯成英文時，我們決定用great來代替，因為奧運會有古典傳統的意義。」他告訴我，「如果譯作New的話，似乎不太正確。」當我跟另外一位中國體育官員談到這點時，他的解釋比較坦白，不過他要求

不要寫出他的姓名。「如果他們把它英譯成『新奧運』，似乎表示著中國想改變奧運會，」他說，「國際奧委會不喜歡。他們會認為，這個共產主義國家想要接管奧運會。」

但對生活在北京的每個人來說，這兩個相反的字是真的：奧運會，或者至少主辦奧運的念頭，把北京給接管了。好幾萬工人、學生和義工被動員起來清掃街道，政府也雄心勃勃著手一項包括了許多油漆工作的市容美化工程。他們將公路的欄杆塗成白色，把天安門廣場的草染成綠色。他們將舊世界的面貌打造成「美麗新世界」。就在奧委會代表到來之前不久，北京許多無產階級的住宅區似乎掉進了又濃又明亮的義大利調色板中：深綠色、明亮的赭色、流暢的灰藍色。在工人體育場路，一片老舊的蘇聯灰建築換上了黃褐色。沿著這條路，矮胖的六樓公寓正面被染成了愉悅的威尼斯粉紅色，雖說其他三面仍然是灰色，但你從路上是看不到的。對統計資料特別偏愛的中國政府宣布，他們粉刷了一百四十二座橋、五千五百六十棟建築，以及一萬一千五百零五面牆，總面積已達到二點六億平方公尺。他們油漆過的面積比紐澤西州還大。

北京是世界上汙染最嚴重的首都之一，但是，即便是空氣也能被清洗乾淨——至少在短期內。我有個朋友在一棟辦公大樓工作，那裡的管理處分發了一份好笑的布告：

為了迎接下週奧委會代表團來北京視察，三環路周圍的一些樓房將停止供應暖氣，以減少塵煙。所以，請大家下週在辦公室裡多穿些衣服。

\* \* \*

在頭一個小時裡，楊司機先後停下來跟兩個司機、六個圍觀民眾、兩個員警問過路，他還打手機給查號台，問到了北京奧申會的電話號碼。那裡的電話一直占線，所以他又打電話給計程車聯絡中心，問接線生是否知道未來的奧運體育場地址。沒有人能說出準確的位置，只知道是在北京城北。楊司機告訴我不要擔心，我們會順利到那兒的。但他看起來著急得很，當我們開到了沙河——北京以北三十二公里，他問我是否可以停下來抽根菸。之前遇到的兩個員警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掉頭去郊外一個叫大屯的地方。

「你如果想抽菸，可以在車裡抽。」我說。

「這會讓車裡的味道很難聞。」他回答。這是我頭一次聽到中國的司機這樣說。我們在一家煉煤廠附近停下，楊司機一邊在煤渣中小便，一邊抽著德比牌香菸。之後他看起來平靜了一些。沿著這條路，一條褪色的宣傳標語上寫著：「加強公路管理，人人有責」。這裡沒有任何有關奧運會的旗幟，只有路上吹過的幾片垃圾。走回車裡時，楊司機把胳膊靠在我的肩膀上說：

「我們是朋友，對吧？」

「當然。」我回答。

在往大屯的路上，他脫下駕駛手套，我們聊了起來。三十年前，楊司機在內蒙古當過兵。他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他驕傲地告訴我，兩個都在讀大學。在大屯，我們經過一家麥當勞、大力水手店和肯尼羅傑斯烤雞店。在安立路和慧忠路的交叉口，兩名員警正在開一個計程車司機的罰單。那司機在非停車區停車，在這個星期，違反交通規則的後果特別嚴重。楊司機把車開到路邊，在員警衝著他喊之前，很快地跟他們說：「車上有位報導奧運會的外國記者，我們正在找二〇〇八年奧運會的舉辦地址。」

一個員警正準備開罰單，但是現在，他手上的筆在空中停了下來。被開罰單的司機抬起頭，充滿了期待。他身材矮小，穿著一件髒兮兮的尼龍夾克。那名員警是個大塊頭，他的警號是〇〇七七八六。暗紅色的太陽低低地掛在天空。這一幕看起來像是出自某一幅畫，畫中每個元素的安排，用意都在於引起你對承載著所有涵義、最重要的那一筆的注意。我掏出我的筆記本，大個兒員警馬上露出微笑。

「請等一下。」他對他的對講機喊話，然後轉身向我走來。

「請問，你是哪個國家的人？」

他再次向對講機喊道：「這裡有個報導申奧的美國記者，他需要參觀大屯的奧運會會場！」

停了一會兒後，他抬起頭說：「他們在呼叫我的上級。」

每個人都等著，被開罰單的司機建議我們向西開過幾條街，那裡為了迎接奧運會，已經打掃得很乾淨了。大個兒員警要他閉嘴。這時對講機發出劈啪聲。

「向西開，找到一個四周插有奧運會旗幟的地方。」員警對楊司機說。然後，他轉向我，「你會看到，那個地方用來建奧運會體育場很棒。他們還要在那蓋足球、羽毛球和網球場。」

他向我們敬禮，先向我，然後向楊司機。被開罰單的司機祝我們好運，這次那個員警沒讓他閉嘴了。我們向西前行。

\* \* \*

中國古代的一些王公貴族玩蹴鞠，一種類似足球的遊戲。明朝的史書記載有婦女玩捶丸，一種由球桿、球和洞組成的遊戲，中國的歷史學家將它描述成中國版的高爾夫球。此外，還有其他的古代遊戲。

在一幅描繪康熙皇帝下江南的清代圖畫中，一個模糊的角落裡，有三個男童正在玩一種手球。收藏在紫禁城的故宮博物館裡的一幅唐代皇帝畫像中，唐玄宗正與幾個女官玩一種類似馬球的遊戲。

但這些只是娛樂——遊戲，僅此而已。中國古代傳統運動的真正核心是「武術」。在十九世紀，武術中的一些元素影響了太極拳中「吐納術」的發展，後來成為有名的「氣功」。武術和氣功在形與神的表現上是一致的，目的都在於表達藝術和自我修練，而不是贏。傳統的中國運動中，有一些西方人可能會描述成哲學的、甚至是宗教的東西。（氣功後來自然地促成了法輪功的興起。）競賽並不是傳統運動的主要目的，古代中國人也從未建過大型的體育場。

「運動」的現代名稱——「體育」，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和這個時期引進的其他名詞一樣，「體育」一詞源自日文。在古代，日本人曾引進漢字來記錄自己的語言，但日本西化的速度比較快，因此發展出新的詞彙。中國在試圖趕上的過程中，吸納了一些日本人創新的術語，像是「民主」與「民族」。有時，相似的詞彙以不同的涵義重新出現，例如「考古」一詞在中文的原意是「古代的調查」，在二十世紀，它帶著新意從日本回到中國時，成了強調透過發現古文物、遺址來研究人類文化的「考古學」。這些字本身並不新，但它們提供了看待熟悉事物的新方法。人們一直在蒐集古董，但並沒有以科學的方法來挖掘和研究。中國一直有不同的民族，但並沒有用科學的方法來描述和劃分。運動也沒有被加以分類和組織，進而成為一種競賽。

語言的改變是因為世界在變。鴉片戰爭之後，傳教士和其他外國人常常在教會學校介紹西方運動比賽的觀念。二十世紀初，中國開始對奧林匹克運動產生興趣，在一九三二年的奧運會上，有一名中國短跑健將參加了比賽。四年後的柏林奧運會，中國贊助了一個由六十九

名運動員所組成的代表團，其中包括了一個有男有女的「武術」表演團，該團還在希特勒面前表演過。

此後，中國人對奧運會忠心耿耿，他們逐漸把體育視為國家洗去上世紀所遭受的恥辱的途徑，目的就是要在外國人的運動會中擊敗他們。共產黨執政以後，按照蘇聯模式建立了體育學校。中國參加了一九五二年的夏季奧運會，但是因為國際奧委會承認台灣的運動員，中國拒絕參加接下來的奧運會。

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才最終同意返回奧運會。國際奧委會仍然允許台灣運動員參加比賽，但不准台灣的國旗出現。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磯奧運會，是中國代表團在近四十年之後首度重返奧運會。在獎牌總數排名上，中國排名第六。那一年，由於前蘇聯陣營國家聯合抵制奧運，使競爭變弱，中國在游泳和田徑項目上獲得了大豐收。

接下來的十年，中國迅速提高了獎牌數，在競爭還不太激烈的項目上獲得很大成功。中國女運動員非常優秀，這個國家在一些有指定動作的運動項目上尤為突出，例如跳水、體操、花式滑冰。這些運動的經費由政府負責，運動員的培養經過了精心的組織和訓練，而不是全靠力氣、赤裸裸的非理性競爭，以及提高興奮劑劑量。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中國獎牌總數位居第四；在雪梨奧運，中國上升到第三位；在雅典奧運會上位居第二，僅次於美國。

拋開這些不斷進步的成績不談，掩藏在中國體育背後的關鍵情緒依然是「恥辱」。表面上，他們充滿了驕傲，但這驕傲就像舊建築上的粉紅色油漆一般淺薄。一九九三年，當國際奧委會將二〇〇〇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授予雪梨而不是北京時，《中國日報》的反應是，其社論將這個決定跟西方歷史「野蠻的殖民主義侵略和剝削」聯繫在一起。在北京申辦二〇〇八年奧運會的那個月，我參觀了中國體育博物館。那

裡，歷史學家說中國現代體育始於一八四〇年，那時英國大批艦隊到來，為鴉片戰爭畫下了轉捩點。中國奧委會在它預備的說明書中，用英文描述了這個偉大的體育運動在中國的開端：

鴉片戰爭將中國從封建社會轉變成半封建、半殖民社會，體育在這種不可避免的社會動盪和不安中產生，並緊隨著與國家不穩定的命運匍匐前進。

運動比賽是殘酷的，這通常寫在中國選手的臉上：他們大部分看起來都很緊張焦慮。在像足球和籃球這類競爭性很強的項目上，中國球員總是在緊要關頭失誤。很少看到中國選手真正快樂地比賽著，這並不足為奇，因為大多數選手從小就開始在生產線般的體育學校中受訓，再多的觀眾或球迷也幫不上什麼忙。一般的中國體育評論員對於運動項目的了解或個人的努力，並不太關心，他們關心的只有勝利。觀眾或運動迷對失敗者很粗魯，體育精神也一向很差。外國隊員在中國土地上贏賽時，他們甚至會使用暴力。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國家從自己的運動傳統全盤轉到西方的運動傳統，但轉得不倫不類。他們學到了競爭的意識和民族主義，這是西方體育中最愚蠢的、也最明顯的特色，但是他們遺漏了其他所有的奧妙之處，在我看來，那些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從孩提時起，我便跟著父親、而非體育學校參加運動，我常常記起他教給我的最重要一課，那就是：有風度地輸，勝過不惜一切代價地贏。體育的終極目標不在於贏得比賽，而在於自我提升。對許多西方人來說，運動單純只是圓滿教育以及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當然，對讚揚競爭的電視或對外公開的體育比賽而言，我上面所說的運動精神並沒什麼意義。中國人會那麼輕易就接受西方體育的競爭性並不奇怪，因為他們用一種外國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傳統體育。中國傳統體育，比如武術，它的精神、非競爭的特質，應該被看作是過分的西方體育之外的另一種健康選擇，而不應只被看成是中國在朝拜奧運光環的萌芽階段的一項活動。北京奧運會競標的標誌是五個互鎖的環扭成一個人正在練太極拳的形狀。太極拳是一種最沒有競爭性的運動。太極拳比較接近法輪功，而非奧運。

許多中國人也意識到，他們的國家體育選手有些問題，但是他們很難指出問題在哪裡。受到挫敗的激怒時，他們有時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哲學或心理的藉口上。在我研究奧運這個寫作題目的期間，碰到了許多對某種純粹理論感興趣的中國人：這個理論就是中國人在桌球、羽毛球和排球上表現得很好，因為他們不需要和對手有直接的身體接觸。

「中國人不擅長直接的競爭，」中國奧會副主席何慧嫻告訴我，「我們比較擅長中間有網的運動。」她形容中國人很小巧——靈巧、協調但不強壯。不過，她補充說，心理因素也很重要。「儒家學說使人們更加保守，」她說，「看看美國——孩子們被教導得獨立和有創造性。在中國，紀律至上，創造性並不多見。但是，如果你沒有創造力，你就無法適應和改變，你只能跟隨一成不變的舊模式，你就不會得到更好的發展。體育跟其他事情的道理是一樣的。」

此外，中國人也相信奧運會能凸顯富國和窮國的區別。在北京，我碰到了徐濟成，他以前是名籃球運動員，現在是位電視播報員。從一九八八年以來，徐濟成陪同中國代表團參加過每一屆的夏季奧運會。「已開發的國家將奧運會當作是一種商機，」他說，「他們好像

在說：『我有一間大房子，有各種各樣的好家具，我想辦個宴會請人們來參加。』於是他們就售票。但是對發展中的國家而言，情況就不止了，奧運會不只是改變了北京的經濟和面貌——最重要的是，它將改變我們的價值和觀念。」

我問徐濟成，他對中國吸收西方的體育觀有何看法。他跳過了這個問題，解釋說這個問題跟政治有關，而不只是個文化上的問題。

「一九八八年我去首爾，」他說，「韓國人告訴我，要不是因為奧運會，沒有人會知道韓國現在是怎麼樣。在奧運會之前，外國人只知道朝鮮戰爭。」

在徐濟成看來，中國需要仿效西方，將體育當作一種商業模式來操作。他說，中國的體育相對於中國的經濟，整整落後了二十年，原因是體育與民族主義緊密相連，就像一個大型的國企，還沒有市場化。但是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最近，希爾頓香菸成立了國家性的籃球推廣計畫，可口可樂也贊助了中國足球運動。「五十年以後，我們將和西方國家一樣，」徐濟成預言，「奧運對我們來說，將成為商業的一種。我們也會說：『我們有一間大房子，我們想邀請你們來看看。』」

\* \* \*

下午五點半，楊司機終於找到了奧運會場址。我們下車，向一片空地走去。這塊空地有四個街區那麼大，平攤在北京北部的中軸線一帶，而之前在這裡的所有建築都被清掉了。在「拆哪兒」，這種感覺很熟悉。旗杆上的粉紅色旗幟標明了這塊地的範圍。

「這個地方將作為足球場和網球場。」楊司機說。他咧開嘴笑著，對著空氣揮舞著一個虛構的球拍。

「還有羽毛球場，對嗎？」我說。

「對。」

我們站在那裡盯著那塊空地。

「好吧，」我說，「我該回去吃晚飯了。」

在四環路，我們碰到塞車。計程車的計費錶顯示已經跑了三個小時，現在這些數字可能也在計算著掃興的程度。楊司機再次感受到了壓力。最後，他問我晚上要吃什麼。

「我還沒想到。」我說。

「中餐還是西餐？」

「中餐。」

他說去他家不會花太長時間，他家在通州，北京西郊。我們轉向東邊朝四環路走，楊司機又開始談體育了。他告訴我，麥克·泰森是他最喜歡的美國運動員，因為這個拳擊手在他的手臂上刻有毛主席的臉的刺青。

「為什麼中國人會喜歡泰森？」楊司機自問自答，「因為他喜歡中國。如果他喜歡中國，中國也喜歡他。而且他也了解中國。」

「泰森真的了解中國嗎？」我問道。

楊司機說：「如果他不了解中國，為什麼要在手臂上紋那樣的刺青？」

這真是一個好問題，我回答不了。楊司機笑道：「泰森在監獄時讀了四本毛主席的書，」他說，「我在電視上看來的。」

針對為什麼美國運動員總是占優勢，他表達了個人觀點。「美國人很高大，」他說，「人們從出生就吃得很好，美國也比較注重科

學。如果你拿一個國家來比較，例如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就比不上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了，健康很重要。你看泰森，如果他沒那麼強壯，他又怎麼能贏？」

楊司機也很佩服網球員張德培。「他在美國長大，但他身上流著中國人的血，」他說，「很顯然地，那對他沒有不好的影響。這說明了是中國的體制有問題。」

當我們到達通州時，已經七點了，楊司機說他想吃涮羊肉。沿著公路的霓虹燈招牌上寫著：北京二〇〇八年，歡迎來到新世紀的通州。在通州市中心有麥當勞和一家叫物美的超市。

\* \* \*

國際奧委會評估的最後一天，我加入了委員會的陪同記者團。一共有五個人，代表著國外媒體：三名電視台記者、一名攝影師和我。我寫的報告將被分發給在北京的其他外國記者，供他們參考報導奧委會的北京評估。

為了加入記者團，我必須同意奧委會制定的一些簡單規則。第一條是，我不能提問。我可以跟隨委員會成員四處視察，我可以引用他們在檢查期間說過的任何話。如果奧委會的代表正好跟我說話，我可以回應。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能主動、直接與代表談話。如被發現違反這個規定，我將立刻從記者團除名。此外，奧委會通知我們，某些會議我們只能參加開場的部分。

這些規則是有效的，至少就製作一齣戲的角度而言。無論檢查員去哪兒，記者都尾隨其後，筆記本和攝影機都準備好了。我們默默地

跟著，就像被這重大的場合打啞了似的。早上的會議後，我發出我的第一份新聞稿：

這是為今早中國和國際奧委會舉行的會議所做的記者團報導，在北京飯店.....新聞工作者被帶到會議室後面，一條紅色的絨布條將我們隔開。穿著旗袍的女性工作人員站在門邊迎接代表團。代表團的成員一個接一個進來，看起來很從容，熱烈地彼此問候。國際奧委會的成員互相飛吻，中國代表則沒有。旗袍是紅色絲質的。

一位媒體公關解釋說，今天早上不會有太多新聞。「我們在這裡時，他們什麼都不會說，」她說，「我們走了，他們才會講。」

我把她的話寫了下來，她讓我不要寫出她的名字。

唯一的花絮是，奧委會的一位成員麥可洛夫走到桌子的另一邊，要求中國體操選手劉璇在他那份《國際先鋒論壇報》插頁中的宣傳照上簽名.....劉璇在最後一頁，她完美下馬的照片上簽了名。記者團中一位《中國體育報》的攝影記者興奮地指出，那張照片是他拍的，但沒人請他簽名。跟每個人一樣，他仍然待在絨布條後面。

今天的會議主題是北京的旅館和醫療設施，首先發言的是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朱宗涵博士，他畢業於哈佛大學。他一開始發言，記者團就被請離現場。

飯店外面，「萬名單車騎士支持北京申奧活動」的自行車隊正騎過長安街。他們穿著紅、白和黑色的運動服，騎成固定隊形，車上插有旗幟，用英文寫著「申奧是我的希望」。

那是個好天氣，清澈的藍天，強風從北方颳來。

\* \* \*

國際奧委會是一個奇怪的組織。它的成員是由自己選舉產生的，在它大部分的歷史中，這個組織對成員的多樣化並不是很在乎。北京視察期間，國際奧委會是由一百二十三名有表決權的成員所組成，其中近半數是歐洲人。中國只有三名成員，跟列支敦斯登、盧森堡以及摩洛哥皇家的代表總數相同，這三個國家各只有一名代表。一百二十三名成員中，只有十三名女性，其中有兩位公主、一位西班牙王妃。

國際奧委會是少數美國和中國都沒有真正政治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它近百分之七十的營運資金來自美國的贊助者，但只有四名成員來自美國。在北京申奧期間，我跟專門研究體育的美國人類學家麥克·艾倫談過，麥克·艾倫最近才擔任奧委會改革委員之一。我問他，在決定主辦國時，美國人的意見能有多大的影響。「無足輕重，」他坦率地回答，「有太多次我跟奧委會的人在一個房間，某個美國委員進來了，大家都微笑著對他說：哦，能得到你們的支持實在是太好了。但當這個人離開後，每個人都在背後笑他。這是一種殖民主義的關係，歐洲人靠美國人的錢去拓殖。美國人大體上是無能為力的。」

此外，奧委會跟發展中國家的互動向來也有問題。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亞、非、拉丁美洲國家曾經試圖創辦他們自己版本的奧運會，稱為「GANEFO」（新興力量運動會）。籌辦者將這個運動會定義為「與資本主義鬥爭，建立國際新秩序」。一九六二年，第一屆GANEFO運動會在印尼舉行，中國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國際奧委會的

回應是，取消所有參加這個運動會的國家日後參加奧運會的資格。之後，這個運動會就再也沒有第二屆了。

一九六八年夏天，第三世界國家首次主辦奧運會。在那次的墨西哥奧運會開幕之前，數千名學生集體抗議，其中一條理由是，他們的國家不應該把錢花在奧運會上，這對墨西哥成千上萬的窮人沒有什麼好處。政府出動了軍隊，並向這些抗議者開火，造成數百人死亡。奧運會如期舉行，但是這場屠殺的真正死傷人數不明，而且，這起事件在人們後來所知的奧運歷史中也不存在，西方新聞界很少提起，但此後的三十年裡，奧運會再也沒有在第三世界國家舉行過。

儘管如此，在二〇〇一年前，國際奧委會一直極力想要提高與窮國之間的關係。過去，這個組織曾擴大資助第三世界修建體育中心，並擴展其成員，包括了更多非洲、亞洲和南美洲國家的代表。這個趨勢卻因為一九九八年鹽湖城爆發的醜聞而慢了下來。鹽湖城在申辦冬季奧運會時，發給奧委會的現金和禮物超過一百萬美元。窮國的代表很容易成為賄賂的目標：十名因為收取賄賂而被開除或辭職的成員中，九名來自第三世界，大多數來自幾乎沒有冬季的國家——馬利、蘇丹、剛果、史瓦濟蘭、利比亞和喀麥隆。不難想像它是怎樣發生的：如果你來自剛果，你真會在乎誰贏得滑雪障礙賽的主辦權嗎？這個醜聞重重地提醒了我們，儘管國際奧委會主張國際性，但奧運會僅僅吸收了世界文化極其微小的一部分。

從那以後，奧委會禁止申奧時送禮。在找尋二〇〇八年奧運主辦地的過程中，這些規則第一次得到貫徹，這也可能是奧運史上最後一次，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企圖向國際奧委會獻殷勤。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彼此很般配。當我跟曾在蘇聯待過的歷史學教授塞恩談到這點時，他指出，國際奧委會和共產黨之間有一些政治上的相似處。「國

際奧委會跟列寧組成共產黨的原則是一樣的，」塞恩教授說，「列寧在一連串同心圓的基礎上建立共產黨，現代奧運的創始人顧拜旦男爵也聲稱，國際奧委會是培養人們最後能進入階層核心的一個搖籃。它們在結構上也是相似的，你用不著進行民主的選舉，或創立某個派別，你要做的是進入領導階層的內部——執行委員會。不會有任何黑馬人物進入來主導奧運的。」

\* \* \*

調查行程的最後一個下午非常完美。陽光燦爛、萬里無雲：新北京、新奧運的旗幟在風中拍打著。我們乘坐由五輛車組成的車隊，在摩托車員警的護送下，緩緩駛過城市。街道清掃者在道路兩邊排成行，手上拿著掃帚，騎單車和步行的民眾都聚集在十字路口觀看。前一天，委員會參觀了北京的交通控制中心，那裡的人表演了如何遙控交通訊號。今天，我們只要一靠近紅綠燈，它就變成綠色，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樣。

這座城市似乎屏住了呼吸，被這個場面的莊嚴所懾服。在完全沉默中，皇帝開始了他的出遊和祭典。為避免遠處火車的汽笛聲打破這一令人難忘的寂靜，褻瀆了典禮，從皇帝離開紫禁城到他回城的那段時間，北平城內外不允許火車開動。

《北京紀勝》一書出版於一九二〇年，作者是英國人裴麗珠，書中描寫了皇帝每年到天壇的祭祀。八十一年之後，我們的隊伍幾乎同樣的莊嚴，而這儀式可能帶來的利益比皇帝出巡更實際。北京奧運申辦委員會許諾，如果北京申辦成功，他們將在城市建設和運動設施上花二十億美元。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四點九的北京



居民支持申奧；破天荒地，這次中國的統計資料可能是準確的。即使是持不同政見的人都放心地表示支援申奧。在香港，法輪功信徒告訴媒體，檢查委員會在北京期間，當地信徒不會進行抗議活動。

我們花了三個小時才穿過城市，看完這些未來的會場：足球場、壘球場、舉重場、水球場、現代五項全能運動場。我們在每個地方平均花了五分鐘，每到一處，委員會成員會問一兩個有關未來的專業細節問題。現代五項全能運動場的泳池有沒有至少二點二公尺深？是的，會有三公尺深。你能從水球場步行到壘球場嗎？當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正在蓋一座巨大的體育館。這座體育館原先要被用來當作排球場，但如果北京申奧成功，這裡將改作舉重運動場。我們戴上安全帽，一個叫劉列勵的經濟學家帶領我們參觀。我和其他記者跟著快走，做著筆記。

「它看起來像一隻美麗的蝴蝶，或是一部可愛的飛碟。」我們站在體育館外面時，劉教授說。他的英語說得不好，但他把這個句子講得很完美，就像一個舉重運動員把槓鈴舉過頭頂時一樣，在最後一個字上停頓了一下。另一個官員分發著有關這座新體育館的小冊子。上面有一句話寫著：「北航體育館就像一隻美麗的蝴蝶，或是一部可愛的飛碟從天空飛過。」

在體育館裡，我們站在未來的觀眾席裡往下看，在未來的比賽台上，兩個工人正用一張油布覆蓋住一大堆從袋子裡倒出的泥土。一個叫埃爾菲斯通的澳洲籍國際奧委會檢查員開口了。

「那是熱身區嗎？」他指著一堆土問。我和其他的記者跑到前面，想看個究竟。

「那才是熱身區。」劉教授指著另一堆土回答。

埃爾菲斯通往那陰涼處看去，問道：「運動員能直接從那裡走上比賽台嗎？」

劉教授笑了，他說，如果北京能拿到二〇〇八年奧運的主辦權，舉重運動員從熱身區直接走到比賽台，就當然不會有問題。埃爾菲斯通滿意地點點頭。劉教授向檢查團說，這個新的體育館將裝有「智慧化的管理系統」。他停了一會兒，清清嗓子，然後像一名舉重運動員在做最後的挺舉，說道：「它看起來就像一隻美麗的蝴蝶，或是一部可愛的飛碟一樣。」

最後一站是中華世紀壇，它位於北京西部，完成於一九九九年底，是為了紀念璀璨的中國歷史和新世紀的到來而建。在入口處，一團永不熄滅的火焰旁寫著：

廣場中心永遠燃燒的火焰是中國的聖火，起源於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遺址。聖火採用天然氣。火焰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徵。

火焰背後是一條由數百個鑄有文字的青銅盤做成的通道。上面鐫刻著從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到西元二〇〇〇年的時間紀年；第一塊上刻著「三百萬年前」，並記錄著：「中國古人開始使用火」；過了二百五十萬年，一切開始進展：「人類開始出現黃種人的特徵」。西元前一六〇〇年，商代定都河南鄭州；朝代變遷：周、秦、西漢；一八四一年，英軍占領香港；一九一二年，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日本人殺了三十萬中國人；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最後，來到二〇〇〇年，歷史鎔鑄成隨機的統計：

我們國家的科學家成功地解開了人類第三組染色體的遺傳密碼.....「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國家核准。國家統計局宣布，我國國民生產總額首次超過了一兆美元。中國國家代表隊在第二十七屆亞運會上勇奪二十八面金牌。

國際奧委會檢查員們走過時間紀年，進入外形像一個巨大日晷的世紀壇裡。在世紀壇藝術館中，他們觀看了一個八分鐘的宣傳片，由中國最著名的電影導演張藝謀製作。現代的場景一一閃過：飛機、公路、汽車。電腦合成的圖像顯示出即將建造的露天大型運動場和新公路，三葉草形狀的交流道環繞在綠色的草坪上。實際上，沒有一樣能夠辨認得出屬於我現在居住的這座城市。

\* \* \*

楊司機的家是個簡單的單層院落。沒有暖氣，只有煤爐，在大門附近的屋外，有一間廁所。我們在主屋喝茶時，他的妻子準備著涮羊肉火鍋。楊司機給我看他孩子們的照片，他很驕傲地提到他女兒英語講得很好。

我問他有關計程車司機的英語課程，他給我看申奧教材。我迅速翻閱著，他播放起卡帶。傳來一個特別英語的聲音：

- 1.你好。
- 2.早安。
- 3.午安。

我們坐下來吃晚飯，楊司機讓我坐上座——在鄉下，上座就是能清楚看到電視的位置。今晚，電視上有北京奧神隊和上海鯊魚隊的中國職業籃球賽。鯊魚隊中有個叫姚明的二十歲中鋒。

在桌子中央，燃燒的酒精正加熱著一個盛滿湯料的環狀青銅鍋。只要湯沸騰了，我們就把粉紅色的羊肉片放進去涮。楊司機說，涮羊肉讓他想起在部隊的日子。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三年間，他曾在內蒙古邊境當兵，離蘇聯控制的外蒙古不遠，局勢有時很緊張。

「你無法想像那裡有多冷，」他說，「到處都是草原，放眼不見邊際。最難捱的是在野外紮營。當地人常常烤全羊來招待我們，那沒有這種火鍋涮羊肉好吃，但是至少比雜糧好吃多了。」

湯沸騰著，羊肉片變成褐色浮了上來。房間暖和了起來。楊司機和他的妻子吃得很開心，在外國客人面前毫不拘謹。在中國，有幹部參加的宴會總是很尷尬，而外交官員的款待則毫無疑問更是痛苦。但是普通老百姓卻非常好客，禮貌而不拘禮節。這種單純的往來既簡單又真實——也許是太簡單了，以致沒有人想到把它列入計程車司機的英語教材中。教材中有個單元叫「更有用的表達措辭」，裡面的句子還包括：

- 33. 本市的交通愈來愈好。
- 34. 我被北京的風景吸引了。
- 35. 汙染是個全球性的問題。
- 36. 我以做中國人為傲。

## 第十四章 風沙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最早出現的跡象總是風，接著，天空就暗了下來。然後，如果你此時正好在戶外，眼睛會開始覺得灼熱。當你走進屋內，有時你還是會聽得到沙粒輕輕打在窗格上的聲音。黃土從中國西北以及內、外蒙古的乾燥高原吹來，那些地方似乎是抽象或遙遠的，只有砂礫摩擦著你的臉時，你才真實感受到其存在。北京人叫它「沙塵暴」——到了晚上，當沙暴降臨之時，沙粒反射出城市的燈光，天空變成了橘粉色，好像要起火似的。

\* \* \*

三月去露營有些冒險，但是我已沒耐心等到四月。在地圖上，我發現長城上有個地方還沒去過。三個多小時的車程後，計程車司機把我放下車。我跟他說，不用擔心回來接我。過去兩個月，我一心想要逃離城市。

山脈還是冬天的褐色和空寂，耕種季節要到四月才開始。再度背起行囊的感覺很好，我沿著一條土路走到一個叫西駝古的村莊，看到了一片最完整無缺的長城。順著一條陡峭的路走到長城前，風吹得更急，天空變暗了。當我爬上第一個高高的堡壘時，我知道晚上得在那裡過夜。

那座堡壘有四百年以上的歷史，用磚和石頭壘砌而成，它的設計很簡單：一片四四方方圍起來的空間，地面鋪著灰色的明朝的磚。透過圍牆的拱形窗戶俯瞰村落，紅色屋頂的村舍依偎在路旁。往北看，在石牆圍起來的果園再過去，山嶺陡峭地爬升，小徑蜿蜒向上延伸到隘口——沙塵暴已經到達那裡。

站在堡壘上，我眼見它的來襲。褐色的雲層低垂到地面，就好像一個生物的長長卷鬚蔓延到山谷裡。沙與風暴一路狂吹，席捲經過的一切：先是山嶺上的小徑，接著是果園，最後到達了村莊。我的眼睛開始灼熱，我退身離開窗前。接下來的整晚，我盡量躺在地上。

要入眠很難。我不時因乾渴而醒來，之後，那狂嚎的風聲更讓人難以入睡。我記起了在安陽時考古學家構圖地下城市的一些情景。一位考古學家告訴過我，掩埋那座城市的主要是河流帶來的積土，除此之外，還有積累了幾世紀、被風搬運而來的層層黃土。躺在睡袋裡，我用文學的想像安慰自己：中國到處都是黃土，散落在深色中原的每個角落，輕柔地落在安陽的土地上，也輕柔地落在北京城裡。大約清晨兩點時，我用一件襯衫包住臉，拉上睡袋拉鍊，終於睡了一兩個小時，胡亂地做了些夢。沙暴襲落在堡壘上時擲地有聲，整夜落個不停，落在有生有死的大地上。

\* \* \*

清晨很美。在清晨的陽光下，如果灰磚上沒有那層閃耀著紅光的薄土，風沙也許是個噩夢。我用一面濕巾擦臉後，發現它變黑了。我的牙齒裡嘎吱嘎吱作響。我搖搖頭，聽到睡袋發出輕輕的沙沙聲。是沙屑。

我本打算在長城待兩夜，但現在，我想在天黑前返回北京。我抖一抖睡袋，把所有的東西打包好，離開了堡壘。我沿著山谷往北走，我還有足夠的時間遠足一程。

我沿著一條小路來到一座廢棄的村莊。它坐落在一面陡峭的斜坡上，四周的樹木又細又矮，小溪裡堆滿了鵝卵石，但水已枯竭。村裡的一切都是石頭做的：石牆、石徑、石房子。大多數屋頂都不見了，想必原本是木頭。北京郊外常常見到空置的屋子，許多年以來，人們不斷地往山下遷移，很多時候丟棄原屋不管，形成了新經濟下被遺棄的鬼鎮。

一些棄屋中堆積著垃圾，有菸蒂，還有品牌難識的食品包裝紙。有間屋子裡到處都是動物糞便，但因為太久了，聞起來跟泥土沒兩樣。另一間比其他的房子都大，屋頂完好，屋裡的牆上貼滿著舊報紙；在鄉下，舊報紙被拿來當壁紙是很常見的。我在空屋中逛了一下，讀著報上的標題：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

蘇聯提出第二次反美抗議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美國準備跟日本簽訂反蘇軍事協定

所有的報紙都是一九七六年的《參考消息》。《參考消息》是一份黨報，新聞以翻譯過濾過的國外報導為主。以往，這份報紙只限於訂閱——在書報攤買不到，也不賣給外國人。或許，這間遺棄的房子以前住的是位黨委書記，或是什麼地方幹部。在一面牆上，有一張報紙

還轉載了一幅美國的卡通畫。畫面已經模糊，但妙的是那句英文還在：

Excuse me, which way is the unemployment line?（對不起，領失業救濟的隊伍在哪裡？）

You're in it.（你所站的地方就是。）

我繼續往前，走到村子裡的最後一棟房屋。一個很大的石磨立在屋前，多年研磨的痕跡歷歷在目。屋裡的牆上貼的是《人民日報》。它們的標題比第一間房子新了八年：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

我們應該為人們多創造一些具現代感的形象

中國將舉辦機械工具產品一九八三年全國會議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

八種農產品超出四點五億公斤

閒著無事，我在腦海裡重建了這座小村莊：一九七六年，黨書記整修房子，他用只有他才能訂閱的報紙當作壁紙，含蓄地昭顯了自己的權威。同一年，房子修好了，毛主席也死了，開始了改革。七年之後，其他的村民也開始裝修房屋，這回用的壁紙上寫的是跟改變中的經濟有關的標題。一些村民在農休季節去了城裡當建築工人，賺更多的錢，耕種變得沒什麼吸引力。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他們則離開鄉村，尋找更好的出路。剛開始是年輕人，接著是中年人。最後剩下的



是老人，只有他們還擁有本地色彩的記憶：哪個當官的有權力、村裡誰的田最多、哪家在村裡住的時間最久。所有這些記憶慢慢地往山坡下滑，逐漸被大一點的村莊、城鎮、城市、國家吞沒。最後，老人死了，小村莊一片死寂。

這就是現代中國。只需十年的時間，一個地方就熟透得可以拿來考古。我拾起背包，掉頭向山坡下有人住的村子走去。

\* \* \*

在西駝古，一群民眾喧鬧地聚在地方政府的院落前。一開始看起來像是有節慶，但是接著我就看到兩名地方官員，穿著整齊的藍色運動夾克，坐在院落正中央的木製辦公桌後面。桌上有個鐵盒，每過一會兒，一個村民走近，在一本冊子上簽字，接著把一張紙條丟進鐵盒裡。

中國的選舉並非罕見。在城市裡，選民可以選出地方上的人大代表，這是政府三個層級代表中的最低一層。選民對上面兩個層級的代表沒有投票權，任何合法的政黨都不能對共產黨持反對立場。申奧期間，北京市奧委會提供給國際奧委會一份中國政治簡介，如此寫道：

中國也是一個多黨制的國家。目前中國有九個政黨。國家在制定重大的經濟和民生政策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會和其他政黨協商，以做出最好的結論。

那是個「人民的民主獨裁」——歡迎其他黨派和候選人，但是要共產黨准許才行。

然而在鄉下，有些地區正試著舉辦自由選舉。和以往嚴格控制候選人名單的做法不同，有時，官方會允許村民選擇自己的領導人。共產黨意識到這個策略是有效的：當地人知道誰貪腐，通常能選出勝任的人選。這個發展態勢在外國媒體的報導中被稱為「鄉村民主」，有時被視為未來政治改革的前兆。不過，沒有人知道有多少村莊實施了真正的自由選舉，共產黨也還沒有把這策略用在城市。這個主題很敏感，實際上，外國記者一直沒有自由報導這些選舉的管道。

在西駝古，一群村民很快地圍到我旁邊。我跟他們說到我昨晚的露營時，他們都笑了：「在那種沙塵暴裡！」一個興奮的中年村民給我看貼在木板上的候選人登記簿。上面有五個候選人：兩個姓彭，兩個姓周，另外一個姓唐。

「本村的人大多是姓周或姓彭。」那人解釋道。他的名字叫周峰民，因裝了金牙，他的牙齒看起來很重。當我問他投票給誰時，他變得很嚴肅。

「那是機密。」

「你會投給姓周的嗎？」

「和姓什麼無關，」他堅定地說，「我只管誰比較好。」

我看了看選舉牌。上面列出三個職位：兩名村委會委員和一名村長。每個候選人的旁邊都寫著他所屬的政黨和教育程度。名單上有兩個國中畢業，三個高中畢業的。只有兩個是共產黨員，其他三人只簡單寫著「群眾」。我喜歡那個字眼——它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政黨尺度的可能性：群眾、大眾、眾人。

我正讀著那布告牌時，一名地方官員走過來。他看到我並不像村民那麼興奮。他說：「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告訴他我在沙塵暴中露營的事。

那人說：「你在北京是做什麼的？」

就在那個時候，我犯下那趟旅行中的第三個大錯。那三個錯誤可以排成：第一、三月去露營；第二、忘了帶護照；第三、誠實地回答了官員的提問。我應該說我是一個學生或是老師，但那些沙子一定把我的腦袋變遲鈍了。

「我是一個北京的記者，」我說，「我在休假。正要往下一個村莊走，然後就回家。」

「你怎麼不進辦公室裡喝杯茶？」他客氣地笑著說，但那可不是個建議。

\* \* \*

辦公室門上的牌子寫著：消費者協會。兩個官員把我帶到裡面，讓我坐在一張破舊的沙發上。有人用塑膠杯倒了茶。牆上掛了兩幅紀念海報：「消費者權益日」和「澳門重回祖國懷抱」。一份落滿了灰塵的日曆上寫著口號：「明天會更好」。好像預測似的，那是個三年前的日曆。

一名官員打開辦公桌抽屜，裡面有部電話。像聖器收藏室裡的神父般，他小心翼翼地吧電話拿出來，開始撥號。另一個官員問我：

「你的身分證在哪裡？」

就是這個時候，我發現我的護照在家裡。我無助地給他一張我的名片。

「你在這裡有車嗎？」

「沒有。」

「那你打算怎麼離開呢？」

「我會沿著公路走，然後再搭公車。」

「你從前有沒有來過這裡？」

「沒有。」

這時另一個人講完電話，把抽屜關上。有一下子，我以為他們會讓我走。他們看起來放鬆了不少。他們問我在哪裡學的中文，我們聊了一會兒。然後電話響了。

每個人都注視著那張桌子。那人打開抽屜，拿起話筒。

「他在這裡。」他說。

停頓了一下子。

「只有一個。」

又停了一下。

「你覺得你十二點半前能趕到嗎？」

他把聲音壓低說了些什麼，然後把電話放回抽屜，上鎖，鑰匙放進口袋裡。他向後斜了斜身子，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

「他們什麼時候會到？」我問。

「誰？」

「警察呀。」

那官員什麼也沒說。

「沒關係，」我說，「我沒有做錯什麼，我也不擔心。我只是要跟你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要走了。這樣大家都不麻煩。」

「等等，我們送你。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這個地方很安全，今天天氣又好，」我說，「我還是按照我來的方式離開。」

那人把眼光轉開說：「車子馬上就來了。」

\* \* \*

碰到拘留這種事時，我向來沒什麼好運氣。在中國，外國記者要到任何地方採訪之前，照規定得向地方政府部門提出正式申請，但現在幾乎沒有人那樣做。通常是不會有什麼問題，但偶爾會有人遭到拘留。我知道有個英國記者，被拘留時身上正好帶著政府機密文件，那是他不久前從一個聯絡人手裡拿到的。有人跟警察告密。他被抓到時，一組電視台的人馬已經等在那兒。警察得勝似地拿出那些文件——又一名外國敵人暴露了行蹤。那次拘捕滿值得的，警方很滿意逮到了觸犯法律的人，而那名記者至少知道自己的報導足以激怒政府。

在中國，我有兩次剛從公廁出來時，被警察抓住了。一次是在福建，我正在做一則無關政府敏感議題的採訪；另一次是在甘肅，很不巧，我在一個禁止外國人進入的縣裡閒逛。沒有人對那些拘留感到滿意，比較理想的應該有一種互相敵對的氣氛——記者在追求真相，警方在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但是，像我那樣因為在一個外人勿進的小鎮裡小便而被抓，實在很難從中得到什麼有價值的啟示。

最教人難熬的是層層的認證過程。一開始，警察通常總是很興奮，調查進行得很快。但過了一會兒後，他們開始了解這個外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有時候到了最後，我會在他們眼裡看到一絲同情。

可以確定的是，在被拘留之後，我通常對當地有了更多的認識。在西駝古，村民自由地出入消費者協會，跟我閒聊，看守我的官員也不在意。村民告訴我，西駝古的人口有八百人，栗子是當地最獲利的農作物，四月是最漂亮的季節，再過兩個星期，杏樹就會開花。他們

唯一不願回答的問題是，他們選誰。每次問到一個村民，他的臉色就變嚴肅：「那是機密。」

有位老人要我寫篇有關西駝古的報導。「你要是把這裡寫得很漂亮，遊客就會來，」他說，「咱們這裡就可以變成觀光區了。」

我說，我會想一想。過了一會兒，那名官員打開另一個抽屜，拿出一個麥克風。他的聲音透過擴音器響遍全村：「現在差十分就十二點！還沒有投票的人請趕快，十二點一到，投票就結束了。」

日頭正暖，把一個外國人鎖在消費者協會似乎是件殘忍的事。我往外走，官員跟著我。

「麻煩你回到裡頭來。」他說。

「我不要，」我說，「外面這裡比較暖和。」

他看著那名在投票處忙碌的官員，那人聳聳肩沒有阻擋我。我跟一個老婦一起站在太陽下。

「消費者協會是做什么的？」我問。

「假如你買東西被騙了，那你就可以到那裡去投訴。」老婦說。

十二點整，最後一個選民奔向那鐵盒子。簡短的爭執後，那名官員還是讓他投了票。突然間塵土飛揚，來了一輛警車。村民變得很安靜。我聽到人群裡傳出喃喃耳語。

「他們來幹麼？」

「發生了什麼事？」

「是因為那個外國人！」

人群往前擠。四個警察走出車子。我轉身去拿背包，其中一名大吼：「哪兒都別想走！」

「我只是拿我的背包。」我說。我突然覺得很累，我一動，沙子就讓我覺得很癢。我們的車子離開的時候，村民們看起來很嚴肅。

\* \* \*

車子沿著一條乾涸的小溪而行，鄉村土路兩邊種著細長的白楊樹。其他村落似乎都毫無人煙。路上，我們碰到的第一輛車子也是部警車，兩部車同時停了一下，然後第二輛車掉頭，跟在我們車後，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警察被派來處理我這個一身沙子的記者。

路很陡，我們三個人在後座撞來撞去。他們把我放在中間。前座的一名警察轉過頭。

「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昨天。」

「你為什麼來這裡？」

「我想離開北京休息一下，再說，我喜歡露營。」

「你自己一個人露營？」

「是啊。」

「風不是很大嗎？」

「是很大，那我也沒辦法。」

「你在北京做什麼？」

「我是記者。」

「你的護照呢？」

「留在北京了。」

「你知道他們在選舉嗎？」

「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去過那裡。」

「你是怎麼來的？」

「搭計程車。」

「你有沒有帶相機？」

「沒有。」

那人停了一會兒又問：「你有帶吃的嗎？」

「有。」

他試著想其他問題。很長的沉默後，我右邊那名警察第一次開口。

「你每月掙多少錢？」

\* \* \*

我們到了不老屯鎮的警察局。我跟他們說我要上廁所，他們派了一個警察跟著我。之後，他帶我到一間偵查室，裡面有三名穿制服的官員。他們給我倒了杯茶。一名警察提問，另一人在筆記本上記錄。

「你為什麼沒有去司馬台或是八達嶺？」

「那裡太多人去了，我喜歡還沒有整修過的那種長城。」

「你怎麼會去投票的地方？」

「我走下山就到了那村莊，那裡有很多人，我問他們在幹什麼。我沒想到那有什麼敏感的，選舉是常有的事。」

他開始對時間序很感興趣，我跟他解釋每件事發生的確切時間。那話題一談完，我們就又回到了在戶外發生的事。

「你一個人在外面過夜不害怕嗎？」

「不會，那個地方很安全。」

「要是狼怎麼辦？」

「那裡沒有狼。」

「有的，那裡有狼。」



我一點也不相信，但是我沒有立場跟他爭論。警察們都很年輕，最老的看起來也不過四十幾歲。我的朋友麥可對中國警察有個理論，那就是他們不會變老。他很可能沒錯。過去五年內，我從沒看過一個超過五十歲的警察。

過了一會兒，那名偵查員眯起眼睛。

「你說你忘了帶護照，」他說，「我覺得那只是個藉口。」

「那怎麼會是藉口？」我說，「它不只給你、也給我帶來麻煩。我告訴過你，如果你真的不信，我們可以一起去北京，我拿給你看看。」

「你的相機在哪裡？」

「我沒有帶相機。」

「我不相信。」

「那你搜我的背包，」我說，「我真的沒有相機。」

「你怎麼會出外旅行不帶相機？」

「因為太麻煩了。」

「那真的很奇怪。難道你不想有什麼可以回憶的東西嗎？」

我心想：回憶將不會是問題。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們繞著那台想像中的相機打轉。中國警察很愛相機，它們讓拘留比較有效率——拉出底片，丟掉。當什麼都沒發生、也沒有證據證明那些沒發生的事情時，情況就變得複雜多了。

\* \* \*

他們讓我休息吃午飯。警局有一個餐廳，他們要我坐的那張桌子，可以坐八個人。餐廳裡有股奇怪的釀酒味道。他們給我豆腐、芹

菜和米飯。

他們派了一名警察跟我坐。他沒有穿制服，看起來很和善，我們聊了起來。我問他，這裡為什麼叫「不老屯」。

「那是因為本地的一個傳說。」他講起了那故事。從前，在古時候，有位神仙來到了本區最高的雲峰山。有個叫王志的村民爬到山上見到了神仙，神仙給他一顆桃子。王志以為那只是顆普通的桃子，誰料他吃下之後，也成仙了。

終於，我找到了一個可以解釋中國警察不老的原因。我問那名年輕人，他在政府裡擔任什麼工作。他說：「我在宣傳部工作。」

\* \* \*

兩個多小時之後，一名北京警察終於到了。我認得他，他負責辦理記者的護照申請。我也認出他臉上某種覺得我可悲的表情，但至少他的幾個問題讓我覺得有些尊嚴。其他地方官員在一旁看著。

「你知道，你如果要做採訪，要先跟政府申請？」

「我知道。但是我不是去那裡做採訪，我是去露營。」

「那似乎很奇怪，他們正在選舉，你正好在那裡。」

「你看看我，」我說，「昨天晚上有沙塵暴。如果我要去看選舉，我怎麼會帶這麼多東西？」

一開始的虛張聲勢不見了，那名警察好奇地問：「那個選舉是什麼樣子？」

「總共有五個候選人，」我說，「兩個姓彭，兩個姓周，一個姓唐。他們要選出三個人。我知道的大概就是這樣。」

「你以前有沒有見過鄉村選舉？」

「有啊，我住四川的時候。」

「有什麼不同嗎？」

「沒有不同。」

「那跟美國的選舉有什麼不同？」

一個念頭一閃而過：在美國選舉時，他們不會一看有記者就派兩名警車過去。但我把那想法吞到了肚子裡：「很難說。」

那警察說：「去年美國大選時，他們的選票出現錯誤，不是嗎？」

「是的，有幾個地方。」

「還出了其他的問題，」他說，「怎麼會拖那麼久？高爾怎麼會沒有當選？他贏的選票最多。」

在中國，我常試著用一個簡單明瞭的方式來跟中國人解釋選舉團的運作。我早該知道那沒用——教書的那幾年，不管用什麼方式，我都無法用英語跟學生解釋清楚。我一向相信，要刺激美國選舉改革的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強迫每個美國公民在中國課堂上介紹那個系統。

在那個警察局，我的選舉團如何運作的演說更是不成功，警察看起來都覺得無聊。最後，除了看起來最年輕的那個，他們全走了。一看到只剩我們兩個，他問：「美國的警察薪資有多少？」

\* \* \*

我們兩人獨處愈久，那名年輕警察愈不和善。為了爭取他的好感，我試著跟他提到我的姐夫也在密蘇里當警察，但沒什麼用。剛開始，年輕警察慢慢問問題，好像偵訊對他是一件新的工作，但不久他

開始砲轟了。他對村莊裡發生的事好像沒什麼興趣，大部分的問題都跟美國有關。

「哪個地方比較安全？中國還是美國？」

「中國。」我說。我在羅德島大道的所見所聞記憶猶新。

「美國怎麼有那麼多人無家可歸？」他說，「政府為什麼不給他們錢？」

「政府有給窮人一些錢，」我說，「不多，但有一些。那些流浪漢通常是精神有問題。」

「不是，他們只是窮。」

我聳聳肩。他又開口：「美國人為什麼有槍？」

「那是他們的權利，憲法中有寫。」

「那沒道理，你知道睡在長城上是違法的嗎？」

「我不知道，那裡又沒告示，而且當地人說不久前有人那樣做過。」

「他們不懂法規，」他說，「你要讀讀法規。你為什麼會有麻煩，因為你違反了好幾條中國法規。你不可以未經申請就做採訪，而且你沒帶護照。沒帶護照，我們就可以罰你五十元。」

「我現在就可以付罰款。」我說。那約等於六美元。警察搖搖頭，在他提什麼新問題之前，我要求去上廁所。

他站在便池旁等著。我們回來後，他的臉色更難看了。

「在美國，他們為什麼給中學生保險套？」他說。

那天，第一次我完全不知如何作答。他把問題重複一遍：「在美國，他們為什麼給中學生保險套？」

「我想你指的是高中吧？」我終於回答，「他們不會給國中生的。」我不知道為什麼那樣答。在那個時刻，特定的年齡層好像對我

非常重要。

「是國中，」他說，「我讀過這回事。他們為什麼那麼做？」

這次我什麼也沒說。

「這就是中國和美國不一樣的地方，」他彷彿得勝似地說，「美國開放多了。美國女人比較開放。」

\* \* \*

到了最後，大部分時間是沉默。如果他問我問題，我盡可能簡短答覆：是、不是、我不知道。最後他看看手錶。

「你犯了法，」他說，「你得帶著你的護照，還有你要得到允許才可以做採訪，不可以睡在文化遺址上。這些都是不合法的，照理說你要被罰款的，但我們今天不罰你。你以後絕對不准再犯，明白嗎？」

他帶我到警局的前門。自從警察把我從西駝古帶來這裡，四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我沒有看到其他警察，他們一定要那名年輕警察把我再留久一點，給我點教訓。我在街上攔了部計程車。離開不老屯時，我終於意識到我的感受：又髒又累、又氣憤又挫敗，讓我想起小時候在學校過得很爛的一天。

## 【古文物H】

# 字

所謂的「字」，在中國看起來總像是活的。書法家會使用生理學的名詞來描繪它：「骨」、「氣」、「肉」。第一本中國字典《說文解字》大約是在西元一〇〇年東漢時編纂的，作者將文字的發明者倉頡描寫成四眼的半神半人。他在書中後記這樣描述了文字發明的傳奇：

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知分理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鳥獸留下足跡，足跡被抄錄成圖案模式，這些模式加在一起變成了新的模式。字互相匹配——這個字的某些部分跟另一個字的某些部分連在一起，變成了新的字。文字起源於生命萬物，並表現出生命萬物的原貌。

根據傳說，倉頡造字之後，天降甘露，終夜鬼哭神嚎。

\* \* \*

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當我訪問一位中文教授時，他提到高嶋謙一剛抵達該校，並開設一門暑期課程。這名字聽起來很熟，然後我

想起吉德煒說過的故事：高嶋謙一教授曾經試著用焊合的鐵桿鑽鑿一片甲骨。

我在一間臨時的辦公室裡找到這位學者，他正在打開行李。他是位矮小的日本人，留著纖細的山羊鬍，戴著金邊眼鏡。他英文流利，帶著口音。他的學術生涯總是跨越不同的文化。從猶太人辦的日本蘇菲亞大學畢業之後，高嶋到華盛頓大學念碩士。他原本研究的是語言學，但跟一位中文名字叫作司禮義、專精甲骨文的比利時神父做了研究後，對商朝文字產生了興趣。

跟吉德煒一樣，高嶋謙一並非一開始就選擇走上甲骨文研究這條路的，他也經常把語言學的學術背景應用在商朝文字的研究上。最近，他和另一位學者發現，在商朝，不同的占卜者留下的甲骨刻文，有著不同的文法模式。這可能反映出當時有不同的方言或語言，也可能代表著商王朝比之前所想像的更具多樣性。

高嶋教授跟我握手，當我提到我在追溯陳夢家的生平時，他的表情為之一亮。

「陳夢家是位傑出的學者，」高嶋謙一說，「他一九五六年的《殷墟卜辭綜述》至今仍是一本chrestomathy。」

我把他口中說出的這個字記到我的筆記本上，「chrestmoathy」。

我注視著筆下這個字，不得不承認：「我以前從未聽過這個字，它是什麼意思？」

「大師之作，」他說，「陳夢家的書是大師之作。」他打開一本字典，但臉色卻沉了下來。

「我對這個字的了解是……」他打住了，「這跟我所了解的意思不一樣……」

他給我看字典上的定義：「用來當作文學或語言學習之用的佳作選集」。

他從書架上取下另一本字典。「這裡說的也一樣，」他說：「《文學作品選集》。我真希望可以找到一本更好的字典。我可能用錯了這個字。我通常用的是《牛津英語大詞典》。」

他用電腦查起來。今天是他上課的第一天，他剛剛來到新的辦公室，一個記者也毫無預警地出現在此。但這一刻，那個字卻比什麼都重要。他試著上網查詢，試著在辦公室找到更好的字典來求證。我安靜地等著。雖然還沒有花很多時間跟研究古文字的學者相處，但我已經學到，這些人跟文字有份特殊的關係。高嶋謙一可以說流利的日語、英語和中文，他以讀古代漢文典籍為生。字真的很重要。慢慢地，我試著把訪問抓回來：「你說陳夢家的書是大師之作？」

「是的，是大師之作。」他抬起頭，「很多人到現在還拿它當參考。裡面包括了幾乎所有的東西，非常廣泛。不管是研究什麼，我一定會參考陳夢家的書。」

那個字終於離開了話題。這時，他提到另一個線索。

「當我在東京大學時，我聽到一些有關他的謠言。有些教授說，陳夢家相當年輕就死了，他的死因很不尋常，有些東西涉及到政治。我不知道該怎麼查證這些，不過日本人通常很在行，如果不是真的，他們是不會轉述謠言的。」

他繼續說：「你知道嗎，他還寫了本有關中國青銅器的書。書名翻譯成英文，意思大概是被美國帝國主義者偷竊的中國青銅器。那是本很難找得到的書。東京大學有位教授用原來的書名重印了那本書。陳夢家把美國叫成某種帝國主義者，我不懂他為什麼會把書名取成那樣。」



我把我對那本書所知道的，還有陳夢家在一九六六年自殺的事，向高嶋教授解釋。我跟他說，雖然我只是開始追查他的故事，但是有些人告訴我，陳夢家會惹上麻煩，跟他反對文字的改革有關。

「了不起。」教授說。但他馬上發現，脫口而出的這句話有語病。「我的意思不是那樣，」他很快地說，「我了解，結果他被推到一個不得不自殺的情況，那真是太慘了。我的意思只是，我也不喜歡簡體中文。」

\* \* \*

當我跟他提到他鑿裂甲骨的事時，高嶋教授笑了。「吉德煒真的把那段寫在他的書裡？」他說，「我真不敢相信。」他搖搖頭。然後他講起那個故事。

一九六九年六月，高嶋謙一還是研究生時，他決定鑿鑿一塊甲骨來看看。他到西雅圖的一家肉鋪買了一些牛肉，讓肉販給了他幾塊去肉的牛骨。（店裡的人問我：「你要這些骨頭做什麼？」我說：「我要把它敲裂來看看。」他們就送了我幾塊。）高嶋跟他的同學一起辦了一場鑿裂甲骨的儀式，司禮義神父扮演商代的「總祭司」——甲骨占卜者，高嶋來負責執行。

「首先，我試著用焊接烙鐵燒，」他回憶說，「它不是電動的，也不夠熱，只燒灼出一點痕跡。所以，我改用電動焊接烙鐵加上炭火燒。這樣一來，骨頭變得很燙，還發出惡臭。」

他繼續說：「很明顯地，商人有不同的準備方法，也許你要先把它浸在醋裡，或是用類似的做法。我只有先把骨片放在烤箱裡烘乾，它還是沒有裂開。司禮義神父跟其他同學都滿失望的，所以我們想乾

脆去吃喝一頓。我也放棄了，就把骨片丟進烤肉炭火裡，沒再去注意它，但它開始大聲地裂了起來。卜卜卜！發出爆裂聲。歷史語言學家總是試圖重建文字的古音。喔，那真是一次音韻學系統的重建。那聲音聽起來就像中文的『卜』。」

他停下來在一張紙上寫了一個「卜」字。它的意思是「占卜，預測未來」，圖形看起來像甲骨上的一個裂痕。

「在現代中文裡，這個字的發音是『bu』，」他解釋，「但在古代中國，它念作『buk』。那火中的骨片聽起來就像那樣。比較像是P聲，在我聽起來，它像是『pok pok pok pok』！聲音很尖銳。我寫了一封信給吉德煒，他在《商代史料》一書的注釋裡提到這件事。我真不敢相信，他會在書裡提到，他說高嶋謙一以新石器時代的方式把鑿裂甲骨的過程重現了。」

\* \* \*

儘管古中國的文字起源在理論上是清楚有序的——由鳥獸足跡變成字，但無人知道它到底如何產生。沒有任何記載告訴我們，人類最初是如何學會記錄事物的。

「那是如此之大的一步，」高嶋說，「幾千年的口頭傳播之後，這一步帶領人類向文字書寫邁進。你知道，文字的歷史並不是很長，但它一旦開始，文明的發展從此一躍千里。這是很驚人的，文字真的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利器。不管人類的歷史是五萬年或七萬年，文明基本上是過去三千年的事。之前我們對人類的事情所知不多，因為沒有文字。到底是什麼讓人類覺得有必要開始記錄呢？」

我們談到中文書寫，教授提到他曾經發表過一篇有關中文字是正方形的文章。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它們的形態改變了：商代的文字比較瘦長一點，到了漢朝時它們被壓縮變得比較方形，也是現在所稱的方塊字。

「我對宇宙結構學很感興趣，」他說，「我很想知道中國人眼中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我不知道這種世界觀來自於哪裡，但是中國人似乎把東西都看成四方形。不止是文字，還有地理學上也是這樣。」

在甲骨文中，商代的世界總是根據東西南北四個主要方向來描述。不管是商的陵墓、城市，或者圍繞的城牆，都是嚴謹地依照羅盤來擺置。高嶋教授寫下現代的「城」字。這個字通常一體兩義：「城市」和「城牆」。

他說，這個字的古代字形包括了一個像盒子形狀的偏旁：口。「口」字代表了一個「四方形的地區」或「有標定界線的區域」——基本上是一處聚落。口和城的古音是很接近的。

「就跟希臘人對野蠻人的想法是一樣的，」他說，「那些住在城內的人是文明的，而住在城外的則是野蠻的。城的功能就是那樣，城牆基本上是正方形的。在商代時是長方形，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從來沒有圓形或其他形狀。中國人對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一定有一些根深柢固的想法。」

他繼續說：「大約二、三十年前，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的一個指揮這麼形容過中國音樂；他說，中國音樂聽起來跟中國字很像。他的意思是指那音樂的聲音是一塊一塊的。他說西方音樂不是那樣的。」

「當時我心想，他在說些什麼啊？但是，當我在研究這個正方形特性時，我突然發現它們或許相去不遠。他所形容的中國音樂是塊

狀，而非流動的線狀。那是一個很有意象的解釋，我想，他很可能真的觸及到了中國人潛意識中的原始層面。」

\* \* \*

一年多之後，我讀到吉德煒的《商代史料》。在第六十六頁，第二段，第一個句子又長又爬滿了逗點——似乎整頁堆滿了詞。它吸引了我的注意：

雖然缺乏系統而且有些老舊，但甲骨文文法標準入門依然是陳夢家的傑作。它帶領學生進入詞序、助詞、時間詞、代名詞、動詞、修飾詞、數詞、指示詞、連接詞、介系詞、助動詞、否定詞、省略、縮寫和句型。

後來，當我再次見到高嶋謙一時，他提到一位叫大衛·謝納的捷克學者也成功鑽鑿了一片甲骨。關鍵在於把它放在燒炭上，然後對著骨片吹風加熱。在捷克人民共和國，骨片龜裂的聲音跟西雅圖的一模一樣：「pok pok pok pok」！

## 第十五章 翻譯

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

在中美關係的世界裡，一則爭議可能會從一架失事的飛機開始，過了十一天後，便蒸餾得只剩下一個副詞和一個名詞。我們可以拿那事件來練習口才，或者把它當成一則寓言——就像古代道家經典《莊子》的「莊周夢蝶」。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 \* \*

之前，在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早上，兩部軍機在南中國海上的國際領空相撞。一部是美國的，另一部是中國的。中國的軍機是一部F—8戰鬥機，被嚴重撞毀。美國軍機比較大，是設計用來專門蒐集外國軍事電訊的海軍EP—3型第二代偵察機。美國偵察機被撞得直直下落了二千五百公尺，恢復控制後，要求在中國的海南島緊急降落。機場塔台不予回應，但美機還是降落了。飛機上的二十四名男女機組人員立刻被人民解放軍扣留。

駕駛中國戰鬥機的是三十三歲的機長王偉，他的飛機墜入到海裡。

整個事件中，既無一般百姓，也沒有非軍方目擊者。

幾個小時之後，兩國政府官員對事件做出非常不同的描述。

第一天，兩個國家的最高領導者都沒有發表任何聲明。

\* \* \*

四月二日，美國總統小布希打破沉默。那是他任期以來，外交政策面臨的第一個重大考驗，美國媒體預測，從這起事件裡將可以看到小布希政府日後處理外交事務的態度和基調。

站在白宮草坪上，小布希沒有對撞機事件表示道歉，也沒有向王偉的家人致意。他的話很直截了當：「我們的第一要務是，迅速讓機上人員安全返回，飛機也要未經改動地送回國內。」

美國的外交人員要求跟機組人員見面但被拒絕，小布希對此表示關切。「中國政府不能及時答覆我們的請求，這不符合一般外交慣例，也和兩國所表達的想要有更好關係的渴望不一致。」

稍早時，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總司令布萊爾在檀香山告訴記者，南中國海上空的中國飛行員近來的「行為模式愈來愈不安全」。

\* \* \*

一開始，中國高層沒有發出任何聲明。那是很典型的：美國的觀念是，領袖必須有立即的反應；中國則通常是等待官僚體系的輪軸開

始運轉。尤其撞機事件發生的時間特別敏感：北京還在等著主辦奧運的競逐結果，整個國家還在申請進入世貿組織的最後階段。不像一九九九年的北約轟炸案，這一次，政府並不鼓勵或允許學生示威抗議。

四月四日，江澤民主席透過新華社發表第一份聲明：「美國應該做些有利於中美關係發展的事，而不是發表顛倒是非、不利於兩國關係的言論。」

北京外交部發表一篇正式要求美方道歉的聲明。那天後來，美國一名高層人員第一次用了「regret」（遺憾）這個字眼。美國國務卿鮑爾說：「我們對中國飛機沒有安全降落，以及中國飛行員罹難表示遺憾，但是我們應該向前看，致力於解決問題。」

四月四日《北京青年報》頭版標題：

### 霸道的證據

四月五日《紐約時報》頭版標題：

### 北京就撞機事件和美國展開舌戰

四月六日，一位美國官員宣稱，中美正就撞機事件草擬聯合聲明。

莊子云：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

\* \* \*

四月九日，小布希總統說：「外交需要時間。」

中國外交部長表示：「美方必須向中國道歉，並採取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兩邊的媒體繼續以完全不同的說法描述撞機事件。中國堅稱美國飛機突然轉向，撞向他們的F—8；美方軍事官員則聲稱是中國的小飛機先尋釁。美國說，過去好幾個月以來，中國飛行員不斷靠近他們的偵察機，挑釁的意圖非常明顯。

中國軍機和民航機繼續在南中國海中搜尋王偉。

據報導，那份聯合聲明還在擬定中。

四月十日，傑克遜牧師說，他願意飛到中國去幫忙協商。

\* \* \*

整個事件期間，由於雙方政府說的內容不多，兩邊媒體只好用數字來填充他們的故事。雙方各有所長：美國做民意調查，中國做數據蒐集。美國廣播公司和《華盛頓郵報》聯合贊助了一項「美國需要道歉嗎？」的調查：

	男人	女人	十八到三十歲	六十一歲以上
需要道歉（%）	33	46	44	31
不需要道歉（%）	46	47	54	62



據新華社報導，共有一百一十五部飛機參與搜尋王偉的工作，動用了一千多部巡邏艇，搜查的範圍超過三十萬平方海里，比為了準備國際奧委會的檢查而重新粉刷的北京市區面積，還要大十一倍。

\* \* \*

我只認識三個叫王偉的人。一個是藝術家，另一個是考古學家，第三個開了一家書店。我應該認識更多王偉才是。我的藝術家朋友認識五個王偉，每個王偉可能又認識另五個王偉。王偉可以是男生或女生、可以住市區或郊區、可以有錢或沒錢。「偉」這個音，可以寫成偉、為、衛、未、唯、威、委、緯、蔚、韋、微、煒、葦、瑋。<sup>6</sup>中國人不用電話簿，部分原因是因為有像王偉這樣的名字。

莊子云：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乎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 \* \*

四月十一日，雙方終於擬好共同聲明。那二百三十六個英文字花了快一個星期才寫成。據報導，那份聲明至少經過四份草稿，協商最後能達成，是因為多加了「非常」這個字。私底下，有些美國官員稱它為「兩個very sorry的聲明」。

聲明由美國駐中國大使簽名。其中一部分讀起來是這樣的：

布希總統和鮑爾國務卿已向你們失蹤的飛行員和飛機表達了真誠的遺憾。請向中國人民和飛行員王偉的家屬轉達，我們對他們的損失非常惋惜（very sorry）。

雖然事件的全貌尚不清楚，但據我們所知，我們嚴重受損的飛機，是遵循國際處理緊急情況的程序進行緊急降落的。

我們對未經口頭許可進入中國領空並降落非常抱歉（very sorry），對機組人員安全降落感到欣慰。我們對中方在妥善安置機組人員上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謝。

美國大使館的翻譯把「very sorry」翻譯成兩個不同的中文詞彙。對王偉的家人，美國「非常惋惜」。對進入中國領空，美國「非常抱歉」。但是，中國外交部則發布了自己的版本。「very sorry」變成了「深表歉意」（deep expression of apology）。

中國的聲明刊出後，鮑爾告訴記者：「沒有什麼可道歉（apologize）的。道歉表示我們做錯了什麼，我們接受做錯了事情的責任。但是我們沒有做錯什麼，因此我們不可能道歉。」

第二天，《北京早報》頭版頭條寫著：「美國終於道歉」。

\* \* \*

美國機員在一架包機的載運下抵達關島之後，大多數的美國媒體報導說，新總統以彈性的手法，出色地處理了整個事件。分析家也注意到，主掌這事件的政府官員似乎是國務卿鮑爾，而非國防部長倫斯

斐。他們的解釋是，小布希的外交政策將會受中間派而非強硬派所左右。

\* \* \*

《波士頓環球報》刊登了兩篇中國百姓對此事反應的報導。第一篇是拉卡夏瑪飛到北京採訪後寫的，她是該報駐香港的亞洲辦事處主任。那篇聯合聲明發表後的當晚，拉卡夏瑪拿著翻譯成中文的美國大使館版本，到街頭給人們看，一位中國助理幫忙翻譯他們的反應。她的報導部分如下：

年輕一點的居民好像鸚鵡學舌般地，表達愛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是過去二十年來，政府用來取代共產主義而灌輸給人民的。老一輩的人懷念著中國的創始人毛澤東時代.....吳國進，一個被裁員的四十五歲無業工人喊著：「看看這些懦弱的領導！首先是貝爾格勒的大使館被炸，接著我們的飛機被打下來。他們能怎麼辦？如果換作是我，我就把那二十四名機員和那架間諜機藏起來，美國人要是來問，我就說：什麼飛機？我什麼也不知道。」

《波士頓環球報》的第二篇報導是我在同一天晚上寫的。我一個人去了雅寶路的舊餃子館，點了晚餐，跟人們聊天。我沒有給他們看那篇美國版本的聲明。我的文章有一部分是這麼寫的：

「我們應該攻擊美國。」聽到那份聲明後，二十四歲的餃子館老闆高明說。

但被問到他為什麼會那樣說時，高明變得不明確。不到一分鐘，他變得更模稜兩可：「這是政府之間的問題，」他聳聳肩，「美國百姓沒問題，就跟中國百姓一樣。但美國政府很傲慢，他們為什麼這樣久才道歉？」

和高明一樣，很多中國百姓經常從政府經營的充滿了矛盾的媒體、網站和口耳相傳的訊息裡，去找尋蛛絲馬跡，他們對整個事件所持有的疑問和答案一樣多。

他們最初的意見可能又氣憤、又明確——尤其是面對外國媒體的記者時，但經過比較長的討論之後，他們所顯露的是挫折與無力。

在飛機爭執事件結束後，我重讀了這兩篇報導，決定再也不寫新聞性的文章了。

\* \* \*

在日常新聞報導上，我一向不是很在行。我做事緩慢、會拖稿、我沒有培養人脈。我只認識三個王偉。我引用說話的人是一個好的記者不會引用的：計程車司機、女服務生、朋友。我花了太多的時間在餐廳。我迴避記者會。我痛恨講電話，這是一件可以讓新聞記者患上精神官能症的事。我尤其痛恨深夜打電話給美國學者，即便這樣我就可以引用他們有關中國新聞的談話。我早已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正常的人都睡了。

我什麼基本配備都沒有：沒有辦公室、沒有傳真機、沒有助理、沒有司機、沒有剪報員。名義上說來，我是《波士頓環球報》駐北京

的負責人，但那個機構是紙蓋的——假的。我有一張拼錯了報紙名字的記者證：上面寫著Boston Global（本應是Boston Globe），一個政府發的印鑑（用來證明你是正式的特派員），一張辦公室地址登記證，但那裡已經住了《華爾街日報》。有需要時，《華爾街日報》的朋友借我用他們的一間辦公室，然後我一個星期去拿一兩次信件。我通常在家裡工作——位於菊兒胡同的一間擁擠的三樓公寓。

我寫一篇報導可以拿到三、四百美元的稿費。只有在新聞多的時候，我的收入才算不錯。如果我策略用得對，我可以在一則新聞的每一步發展時都發稿：每則官方聲明、每個細微差別的字，從「遺憾」到「誠摯的遺憾」，從「惋惜」到「抱歉」到「歉意」。但讓自己不發瘋是有代價的，而我的代價不只是少賺三百塊。如果我要的只是當個專業的解構主義者，我當初繼續待在研究所就好了。

就算我真的嫻熟於日常的新聞報導——我有間真的辦事處、真的有聯絡網絡、學著愛上講電話，但老實說，我對這套報導方式也還是沒什麼信心。我不喜歡以第三人稱的語氣寫作：有可能兩個記者同處在一個事件現場，寫出來的報導卻完全不一樣，一樣的是他們不涉感情、事不關己，但帶著權威感的語氣。在這類報導中，作者很少出現在他們寫的故事裡，也不會對他們的寫作技巧多做解釋。在中國，很多外國記者需要聘翻譯或者幫他們找到訪問對象的助理，但在報導中很少提及這些人。就算你是單槍匹馬，你是外國記者的身分還是會影響受訪的中國人的反應，但是在一篇以第三人稱寫的報導中，這一點很難交代得很清楚。

我比較喜歡寫有戲劇性、長篇幅的故事。我幫《波士頓環球雜誌》寫過趙老的那座四合院的故事，雜誌有足夠的空間刊載。不過即使如此，由於受限於一些特定的美國新聞價值觀，在海外經過翻譯後

還是可能失去原意。我在涪陵教書的時候，就看過此類跟原意完全相反的文章訊息。我的學生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叫作《英美概況》，其中一篇關於「社會問題」的文章提到：

一九八一年，加州大學搶劫和強暴案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在華盛頓特區的一間天主教學校，一位女學生單獨在教室念書時，被一名手持獵刀的歹徒強暴並搶劫。在加州的一間大學，一名橄欖球教練在校園裡被一名持槍的歹徒搶劫。據說，在南卡羅來納大學，暴徒鎖定女學生、女教師、教師的太太為其強暴的對象，引起嚴重的恐懼。

這樣的文章讓人很難教。細節本身可能全是真的——沒錯，南卡羅來納是有暴徒，但這些訊息不能幫助偏遠的中國學生認識美國。他們需要內容而非瑣事，一堆凌亂的事實只會讓他們覺得困惑。

這些細節有可能是別有用心地從美國報紙揀出來的。在美國，記者有一定的報導領域，通常他們的報導會引起改變。這是新聞事業最高的、也最常被稱譽的理想之一。每個美國新聞記者都知道「水門案」——專業的記者如何幫忙把一個腐敗的政府給拖下台。那是好的新聞記者的典範，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醜聞，即使那是美國總統的醜聞，也一樣讓它曝光。

在大報社，成功的記者成為特派員後，會把那套工作模式帶到國外。他們通常去找戲劇性、尚未解決的問題。如果他們不懂該國語言，就請翻譯或助理。有時，他們的報導的確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在非洲國家，報導饑荒或種族滅絕問題的新聞記者，可以把報導當成鼓

勵國際組織介入的工具。而記者能夠在國際社會中發揮作用，是因為當地社會萎靡不振。

然而中國完全不一樣。這個國家接受了一些國際支援，大多是貸款，但它的經濟主要靠的是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和決心。過去，美國政府曾經聽過不定時的恐嚇，以經濟制裁來支持中國的人權運動，但那個時代過去了，現在貿易變得更重要。基本上，中國已經超越了傳統開發中國家的侷限。儘管它還有問題，但這個國家穩定、獨立地成長著，並且愈來愈強大。當美國的目光越過太平洋，最重要的問題不再是要怎樣改變中國，而是去了解這個國家和住在那裡的人。

但是，大部分外國記者還是卡在老舊的想法、老舊的檔案夾裡面。

Democracy (民主)

Democracy Party (民主黨)

Demonstrations (示威遊行)

Disabled (行動不良的)

Disasters (災難)

Dissidents (異議者)

在一間典型的駐外辦事處裡，中國助理會從當地報紙裡尋找潛在的報導故事，也接受不滿民眾的爆料。一旦有什麼戲劇性的事件吸引了外國人的注意，他就加以追蹤：甘肅賣童案、廣西女性的不孕、山東監獄內的工人激進分子。這些文章刊登在美國報紙上，讀者不但遠水救不了近火，而且也缺乏了解真相的必要知識背景。就像那本涪陵

的教科書，有時候訊息愈多，你知道的就愈少。在某種意義上，即便是最好的善意也變成了偷窺。

我不想寫那種報導——那種意味著媒體的唯一迷人之處只有新聞、別無他物的報導。新聞在中國沒有什麼意義：這國家雖然每年都在改變，但步調平穩且動作微妙；沒有任何偉大的領導人物，即使是撞機這樣的重大事件也草草落幕，像大海巨浪表面濺起的泡沫。我們已經跳過了歷史，新聞不再重要。大哉新世界。

不管怎樣，在二〇〇一年九月之前，世界就是這樣的。

\* \* \*

在電腦中，我找出一篇舊的文件，稍作更改：

親愛的新聞專員：

本文茲證明何偉是一位完全合格的新聞記者，他的經驗和擔任特派員的要求相稱……《紐約客》全心全意支持何偉先生擔任敝社的北京特派員，並感謝您撥冗考慮這份申請書。

雜誌社更適合我。它的故事比較長，你可以用第一人稱來寫，編輯對新聞時效不是那麼在乎。他們按字計酬，這比報紙給自由投稿人的固定報酬要好一些。雜誌社還負擔採訪過程中的開銷。因為作業速度比較慢，在調查故事的過程中，還可能完全用不到電話。

過去二十年，經濟改革帶給中國極大的改變……



修改這份申請書就好像甲骨刻文上的儀式：同樣的陳舊措辭、同樣的信和文件。《紐約客》在中國從來沒有派駐過全職的特派員，因此，我創了一個正式的《紐約客》辦事處，它「正好」跟《波士頓環球報》同個地址，而《波士頓環球報》又「正好」跟《華爾街日報》同一地址。公文愈堆愈高，但外交部好像沒人在意。

一切進行得很順利，直到雜誌名稱翻譯的階段，外交部決定雜誌的中文名字直譯為《紐約人》。我的名片上會印著：

紐約人

彼得·海斯勒

每次我把名片拿給中國朋友看，他們都爆發出笑聲。不管是香港、台灣或美國的華人地區，這本雜誌的中文名字都是《紐約客》，雖然不是最道地的翻譯，但比起「紐約人」要好太多了。

當我跟《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助理孫蘇菲提到這個問題時，她說她可以幫忙。她想，本地人跟外交部可能比較好溝通，但是，在跟他們打過一通電話後，她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她跟我說毫無希望，那些人跟典型的幹部一樣，頑固得不行。

最後，我自己打電話給外交部。承辦人的名字叫史江濤，聲音聽起來很年輕，但一聽到是我，他的口氣馬上變得平穩。我們用中文交談。

「我跟外交部的其他人討論過這件事，」他說，「我們覺得『紐約人』是比較好的翻譯，比較準確。」

「我們可以見面談這件事嗎？」我說，「我很樂意去你方便的任何地方，我想如果我們可以當面談，會比較好。」

外交部在二環路上。那棟巨大的建築裝著灰色的窗戶，向外凸出，好像那地方塞滿了太多假的文件，隨時就要爆開似的。史江濤的語氣沒有變。

「我今天沒空，這週都不行，」史江濤說，「下週也許，不過我不確定。反正，這件事沒什麼好談的。」

「可是，雜誌的名字對我很重要。我要一個大家更熟悉的名字，這樣我的工作會方便些。」

他跟我說，那應該沒什麼關係，因為這本雜誌以前在中國並沒有派駐特派員。

「那不是真的，」我說，「在一九四〇年代，這裡就有他們的記者。」

「嗯，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沒有人會記得。」

「我在很多網站和刊物上看到他們用《紐約客》這個名字，」我說，「而且國外的華人也都是用這個名字。」

「我不管大陸以外的人叫它什麼名字，」他說，「不管美國華人或其他地方的人是怎麼叫的，它是由我們來決定的。」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說，「我的意思不是說，《紐約客》這個名字是從台灣或那些地方來的……」

那人很快駁回：「誰在跟你講台灣？我什麼都沒說。」

「我只是說，在其他的華人地區，《紐約客》是個比較通用的名字，我不是說它跟台灣問題有任何關係。」

「當然跟台灣問題無關，」他生氣地說，「怎麼會有？」

\* \* \*

最後的結果自然採用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決定。我試著用達觀的心態看待此事：得魚而忘荃——魚網是用來捕魚的，一旦你捕到了魚，就可以忘了它。我拿到了新的護照、新的記者證、新的辦事處執照、新的印鑑。印下去，一個鮮紅的印記：

## 美國紐約人

每次在文件上蓋章時，我都告訴自己說，那不具任何意義。我依舊是個驕傲的密蘇里人，那個紅色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

6 編按：英文無法辨別四聲的差異。

## 第十六章 國旗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

車子是波拉特最貴重的財產。當他覺得坐立不安時，他會開著本田汽車老遠跑到馬里蘭或維吉尼亞去。他的英語還是很破，但是找路沒什麼問題。他在儀表板上貼了兩面國旗：一面美國的，一面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這面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國旗，藍底上有伊斯蘭教的白色星星和半月形，在中國是被禁止的。

車子也是波拉特脫離富蘭克林街和羅德島大道轉角住處最大的希望所在。

他很想離開那個地區，也想開始工作，只要他的申請一進入程序，本田汽車可以幫他達成這兩個心願。二〇〇一年五月，他在律師麥茲格爾陪同下，到移民局面試，過程很順利。六月時，美國給予波拉特政治庇護。

他馬上開始幫妻子申請前往美國。過程需要花一點時間——或許一年，或許更久，而對於離開新疆，她好像變得愈來愈緊張。晚上時，波拉特常常打電話給妻子，試圖說服她到了美國後，一切都會很好。但她擔心中國會撤除她的護照，或是到了美國之後，無法適應當地的生活。波拉特沒有向她提到他居住的環境。

波拉特處在一個過渡時期——不再是中國公民，但也還不是美國公民，因此，美國政府給他一份難民旅行文件，讓他可以跨越國際邊界。他在雅寶路時存的錢都花得差不多了，於是他計畫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走一趟，他有朋友在那裡，也許可以找到做貿易的機會。夏天

的時候，他終於搬到華盛頓特區唐人街的一間公寓。對一個逃離中國不到一年的人而言，把房租付給一個同樣從中國出來的廣東房東，好像有點不太對，但中文仍然是波拉特最有用的語言。

八月時，美國政府給予波拉特工作許可。在特區，不太會說英語的維吾爾人一般是當送貨員或在餐館打工。然而，波拉特想找其他的工作機會，因此，我向他介紹以前的大學室友鮑伯。鮑伯在巴爾的摩開了一家罐頭工廠，有時會雇不會英語的工人。薪資不高——只是搬箱子的工作，但它提供了包括健康保險在內的基本福利。

我也介紹亞當給波拉特認識。我們在和平工作隊一起教過書，他目前在國務卿鮑爾的發言人辦公室工作。八月底的一天晚上，亞當安排波拉特跟鮑伯一起見面，波拉特還帶了一位在美國住了十二年的維吾爾朋友。那是個由不同族群混合而成的四個人：兩個政治異議分子，兩個受過長春藤大學教育的白種美國人。很自然地，他們去了一家墨西哥餐廳。第二天，亞當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

那是一個「商業」晚餐，一位四十五歲受過大學教育、講多國語言的退休教師帶了兩位隨員，來討論在一間沒有冷氣的大倉庫搬運重箱子、一個小時賺七、八塊美金的工作。整個說來有點奇怪。服務生很熱心，不停問我們「對他們的食物熟不熟悉」。事實上，波拉特不熟——他點了一種墨西哥捲餅，說他第一次吃那樣的東西。他整盤吃光光。離開餐廳的時候，我問他覺得怎麼樣。他再次說，那是他第一次吃那種東西，不是很好吃。

看過那工廠後，回華盛頓特區的路上，我問波拉特對那份工作有什麼看法。他說可能會很辛苦、很累，但他願意做。他重複了幾次，雖然以前沒做過，但是他不怕那種工作。

他身上只剩一千元，他需要那份工作。他打算在巴爾的摩找個地方住，或者鮑伯會問工廠裡是否有人把房間租給他.....

他不喜歡華盛頓特區——他剛搬離他的公寓。他恨那個地方，因為那裡有人吸毒、犯罪，還有搶劫。以他目前的經濟狀況，他就算到了巴爾的摩，狀況可能也不會好到哪裡。

過了一個星期，亞當又寫道：

不幸地，他的車窗被打破、車內物品失竊。他去一位朋友家聽中國廣播，有人敲破窗戶偷了他的收音機，我猜，那收音機大概值十五塊錢。他花了二百三十元修窗戶，現在他連收音機也沒了。

\* \* \*

九一一發生的那天早上，波拉特再度開車去巴爾的摩，看那個罐頭工廠。他已經重新裝了一台二手收音機，花了他四十美元。但那個星期二的早上，他並沒有聽新聞。他不確定那時是幾點，但他後來相信，九點三十七分之前，他人在工廠。天空又高又藍，晴朗無雲。

工廠的地點讓波拉特擔心。他願意做體力活，至少在他的英語說得更好之前，但他不想跟維吾爾團體離太遠。他大部分的維吾爾朋友都住在華盛頓特區。從他現在住的地方到巴爾的摩工廠，開車大約一個小時。那天早上的路程之後，他判定那家工廠太遠了，他想找個離首都近一點的工作。

那天早上，他一直往紐澤西的紐華克開，有些土耳其移民住在那裡。一九九〇年代，波拉特在土耳其待過幾個月，他們的語言跟維吾爾語很相似，波拉特一向和土耳其移民相處得愉快。一如平常，他到了紐華克後，就打電話給他們。但不知為什麼，電話沒人接聽。

大約十一點時，他決定放棄，掉頭回家。到了州際九十五號公路，他碰到了來美國之後最嚴重的塞車。車子匍匐而行好幾個小時，他注意到其他駕駛人看起來很生氣。他轉到新聞台，從新聞報導中聽懂了兩個詞：「煙」和「國會大廈」。「國會大廈」是他在開車到處逛時學到的，萬寶路菸教會了他「煙」這個字。

他在馬里蘭的陶森停下車，那裡他認識一位曾在中國住過的韓國人。那韓國人的家庭背景很複雜：他小時候不知怎地被送到了中亞，在新疆西部的喀什噶爾長大，但母語是中文。快十年前，他拿到了美國的政治庇護。幾年下來，他存夠了錢，終於自己開始做生意。跟許多在美國的亞洲移民一樣，很自然地，他開了家比較容易招徠顧客的壽司店。

韓國人跟波拉特說了那些攻擊。他們一起坐在壽司店裡看電視：倒塌的大樓，起火的國會大廈。新聞說，攻擊有可能是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所為，猜測更多的暴力將隨之而來。全國飛機停飛。波拉特決定在那位朋友那裡待個幾天。他擔心，路上的美國人會把他誤認為恐怖分子。

九月十三日早上，波拉特終於開車回到唐人街。九十五號公路沿途有很多警車，然而車輛卻很少。國會大廈還在燃燒，幾公里外都可以看得到冒煙。那個月後來，波拉特把車上的兩面國旗都撕了下來。

## 第十七章 直接入鏡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二日

九一一事件發生的次日清晨，我搭上南下安陽的火車。旅程很熟悉，風景如壁紙圖案一樣重複：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座村莊；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座村莊。這重複的感覺和昨晚的電視畫面互相衝突。但實在沒有取消行程的理由，這行程幾個月前就定好了，因為考古學家總是在早秋工作。他們白天都在遺址上，一步步地出那座地下城市；晚上時，我們一起看電視新聞。不過，中國政府對事件初期的報導有限，很難得到太多訊息，而我的旅館網路連線也不好。

試了幾天後，我終於打通了波拉特的行動電話。他聽起來沒事，不過暫時放棄了找工作。我告訴波拉特，因為有個寫作計畫，我可能會去新疆一趟。因此他表示，他在中國還有點存款，可能會請一位烏魯木齊的朋友給我一些現金，讓我幫他換成支票。那個秋天我經常旅行，安陽之後，我打算到溫州去。

我問波拉特，華盛頓特區的氣氛如何。

「我不知道外面的人怎麼樣，」他說，「我不太出門，尤其是晚上。要是有人問我在幹麼，我很難用英語解釋。我擔心的是像這樣的事。」

「你有和其他的維吾爾人見面嗎？」

「有，當然有，」他說，「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有問題。但大家都說，還是小心一點比較好。」



\* \* \*

我離開安陽飛到溫州。感覺就像另一趟遠行——從一個緩慢的考古世界，來到一個經濟蓬勃發展的城市。溫州的經濟發展力之強，就像熱帶國家的濕熱，你一落地馬上就感受得到。在機場的行李提取區有八種不同的鞋子廣告。站在機場外，我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張巨大的廣告牌：嘉來頓活塞。我搭的計程車穿過一面溫州市政府豎立的英文招牌：

GOING ALL OUT TO SET UP THE LIGHT INDUSTRIAL CITY  
(全力打造輕工業城市)

我搭車前往樂清，威利和南西住在這座衛星城。車子經過很多工業城鎮，例如專做便宜西裝的白象鎮，以及專做低壓電器用品的柳市鎮。高速公路的兩旁豎立著各種廣告牌：兄弟包裝機械、挺宇集團、通達電纜。這些廣告牌的設計顯示出這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城鎮，但混合了田園風格，和我印象中的深圳一樣，陽光下，綠地上，一眼望過去，各種無名產品的招牌疊加在一起：輪胎、變壓器、緩衝器、電子插座蓋。每件產品都是為了出口而生產，而且都是散裝的。商品名稱中英文混雜在一起：Jubang（巨邦）、Gelhorn、Shar Moon（夏蒙）、Odkon（奧德康），以及「中國真皮皮鞋之王」Dorkan（多爾康）。

樂清的錄影帶店出售恐怖分子攻擊美國的盜版片。在城市待了幾天後，我變得欲罷不能，只要一經過錄影帶店，就會進去找DVD和VCD。店裡的人跟我說，第一支盜版在攻擊後的第三天就出現了。

他們把這些片子跟好萊塢電影擺在同一個架子上。通常九一一的片子被放在比較便宜的一區，跟一些我從來沒聽說過的美國片擺在一起。這些奇怪的電影一定未曾在電影院上映過，就被直接轉成錄影帶和DVD，我也從來沒有聽過這些演員和製作團隊，通常封面廣告不是色情的，就是恐怖的。一家店裡，有部片子叫作《真情難捨》，中文介紹很好笑：「他對漂亮女人很有辦法。」旁邊擺的是《爬蟲世紀》：「小昆蟲給人類帶來大暴亂。」再來便是九一一的片子：

多架飛機攻擊美國！  
 世貿中心全被炸毀  
 五角大廈和國會山莊遭飛機攻擊  
 白宮國會山莊還在燃燒  
 凶嫌是誰？依然未知

背面寫著：

巴勒斯坦人：「給美國人好看！」  
 美國霸權和強勢政權製造了太多敵人  
 美國慌了

所有的九一一影片都包裝成類似好萊塢電影的樣子。一支片名叫《世紀大災難》的DVD，封面是賓拉登和小布希，背景是燃燒中的雙子星，封底有個代表暴力畫面和用語的小小R級標誌。英文演員名單和製作團隊一片混亂：

TOUCHSTONE PICTURES presents a JERRY  
BRUCKHEIMER  
Production david TOM HANKS silen TWITNESS DAVID  
MORSE PAME  
BUSCEMI ving rhames

中國的盜版片常有很扭曲的演員和製作團隊名單，文字和圖示也沒什麼道理。他們只在乎片名和影片——只要那些基本的東西正確，其他的英文只是用來填滿空白。我找到兩支不同的九一一VCD，其演員和製作團隊名單都抄自《巴頓將軍》：「二十世紀福斯電影推出喬治·史卡特.....」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最愛這個樣板，並把它套用在各種不同的盜版片子上。有一次，在一部關於高中啦啦隊的图片上我竟然也看到了這份《巴頓將軍》名單。

九一一影片上全是抄來的英文解說。有一支的畫面是第二部飛機撞上世貿中心的鏡頭，文字是：

《踢到鐵板》這部充滿活力的電影，描寫了在新南威爾斯新堡鋼鐵工廠工作的兩個強硬兄弟的事情。他們最後分道揚鑣。其中一人，西恩，離家去追求當踢踏舞者的生涯.....

另一支片子有兩張照片，一張是一個驚嚇的女人指著天空，一張是曼哈頓的天空瀰漫著黑色煙柱，然後文字解說是：

除此之外，雖然經濟現代化在某個方面「現代化了」人們對舊標準和習俗的想法，但它並沒有真正讓男女對兩性關係的看法

更自由，也不能讓人們不在乎忠誠與背叛這些傳統的感覺和約束。

\* \* \*

攻擊事件之後，中國政府的反應比平常要快。幾個小時之內，江澤民主席即致電小布希表示慰問，九月十二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附近的中國軍警增多了。同一天，外交部一位發言人表示：「中國政府一貫地譴責與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動。」很清楚表達支持美國，也微妙暗示了中國自己對新疆的態度。這一回，中國和美國政府似乎找到共通處，事件剛開始的那幾天，國營的媒體從未提美國是自作自受。

但是，一般百姓卻這樣說，甚至是當著你的面。在安陽，一位計程車司機跟我說，現在美國應該可以了解中國的貝爾格勒使館被炸是什麼感覺了。在北京的某天早晨，一位我認識但不熟的男人在住家附近大聲叫住我：「哦，你在這！」接著開玩笑說：「我以為你被炸死了。」那種毫無忌諱的說法嚇到了我。我可以想像，當外國人不在場的時候，他們會講些什麼。

在樂清這個溫州城外的衛星城，我跟威利一起找關於九一一的片子。他告訴我，他大部分的同事都很高興美國被炸。

「有個老師特別高興，」威利說，「第二天早上，他告訴我，他昨晚睡不著，因為他太興奮了。」

「他高興些什麼呢？」

「他不喜歡美國。不過，我想他主要是喜歡看。」

「喜歡看什麼？」

「看那些大樓倒塌，他覺得那很有意思。很多人跟他一樣，每個人都說，那就跟電影一樣。另外一個老師跟我說：『美國人拍了那麼多電影，現在他們終於拍了一部好看的！』」

我問威利，他對這些評論有什麼反應。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我很不喜歡待在學校，因為每個人都在談那件事，都在笑。事實上，大概有一個星期，我盡量不跟他們在一起。聽到那個老師說他高興得睡不著時，我覺得很不舒服、很噁心。我只想獨處，或是跟南西在一起。對我們來講是不一樣的，我第一件事想到的是邁爾先生（亞當），因為他住在華盛頓，他在政府部門工作。我很擔心他，一直到你跟我說他沒事。」

在一家錄影帶店，我們又找到了一部關於九一一的片子。老闆跟我說，這些片子的檢查比一般電影要嚴，他說像《珍珠港》這樣的大片子，一般的盜版在美國上映兩天後就會出現，到處都有在賣，但是關於九一一的片子愈來愈不好找。他的感覺是政府管制著發行管道。

離開錄影店時，我跟威利確定我的印象有沒有錯——國營媒體尚未用攻擊事件來指責美國。

「沒錯，」他說，「很多人相信其實政府是高興的，但是他們不能表現出來。大家都說江澤民是個膽小鬼。他們說，現在有太多國家站在美國那邊，中國要自己站一邊是不可能的。」

「你想，不然的話，中國會怎麼做呢？」我說，「支持恐怖分子？」

「我想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威利說，「那只是人們這麼說。」

從某個部分來說，那好像已經成為習慣，多年來的反美宣傳在人們心裡根深柢固。不過，這跟有選擇性的新聞報導也有關。過去，媒體很少報導新疆的緊張情勢，另外像西藏，也總是被報導成一個平靜

的地方，當地人對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心悅誠服。中國一般百姓不太知道，他們的政府其實擔心著伊斯蘭教在西部的擴散。我問威利，人們對賓拉登有什麼看法。

「有些人說他是個英雄，」威利說，「他出身貧窮的國家，但他可以給美國帶來大麻煩。我聽到有人說，現在賓拉登比毛澤東還要有名。」

「那他們喜歡他囉？」

「不盡然，」他說，「他們只是說他厲害，很有名。」

我想起中國人是怎麼用「厲害」這個字。太多事可以用厲害來形容：一場洪水、戰爭；一個英雄、罪犯；一個戰勝的將軍、上海女人。而對有影響力的人，你也可以用「偉大」來形容他：毛澤東、甘地、希特勒、華盛頓都很偉大。這完全跟道德無關，好像世界是全靠大事和偉人來運作，它們是那麼遙遠，一般人是不能加以評價的。幸運的話，你可以站在一旁觀看。

我們走進另一家錄影帶店。「你知道嗎？」我說，「事實上，賓拉登不是出自貧窮的國家，他是沙烏地阿拉伯人，他的家人很有錢。」

威利停頓了一下，「我以為他是阿富汗人。」

「他現在住在那裡，但他是沙烏地阿拉伯人。」

「我不知道，」威利說，「反正很多人的印象是這樣的。他們相信他來自一個貧窮的國家，現在他讓美國人注意到他。」

那家店沒有賣關於九一一的片子，但他們有八片裝的波斯灣戰爭紀錄片，盒子上面有一面美國國旗、一張海珊的照片，和一句吹噓的中文：

世界第一場高科技戰爭！  
波斯灣會再起衝突嗎？

「這不是新的，」威利說，「賣好一陣子了。其實我本來要買的，因為我對這相當感興趣，但南西不准我買。」

「為什麼不准？」

「因為太貴了。」

我拿起一套，價錢八美元。那晚在威利和南西家，我們一起看那些九一一的片子。

\* \* \*

他們住在學校附近一棟公寓的四樓。那棟大樓呈現了一個經濟蓬勃發展的城市特有的風格：新，但尚未完工。樓梯沒有扶手，乾的油漆汙斑交叉塗在水泥地板上。威利和南西的公寓只有一個房間、一面白色的牆、一張床、一台彩色電視，以及一張書桌。木製的書櫃上擺著幾十本書：《朗文英語文法》、《英美歷史選讀》、《英語委婉語詞典》。索爾·貝婁的短篇小說選旁邊，是亞當送給南西的《神探南西和頑強的男孩》。威利那三本破掉的字典擺在正中央，像一隊驕傲的老兵。

好像才是昨天的事，這對年輕伴侶還是我涪陵班上的學生：威利在最後一排，鼻子快碰到字典；南西認真地聽課，希望我不會叫她起來問問題。在涪陵時，她非常害羞，但離家這幾年後她有了改變。我們講話時，她眼睛會看著我。她對威利非常嚴格，這是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在涪陵時，她似乎總是被他的聰明才智折服，但是現在，他們

就像一對差異已經被熟悉的笑話給削弱的伴侶，互相戲謔。威利說南西批評他傲慢，我問她那是真的嗎？

「當然，」她說，眨著黑眼睛，「他總認為自己是對的，總是那樣。」

她試著容忍他的癖好。那年早些時候，溫州電視開始播放中央電視台的第九頻道英文台時，每天晚上，威利都很晚才睡，盯著電視，抄下新的詞彙。她的睡眠惡化成一團跳動的燈光和簡明英語。然後，正當她考慮著他們也許需要多一個房間時，那個頻道停播了。

剛開始幾天，威利以為只是技術上出了問題。一個星期之後，他打電話給樂清廣播電視局，那裡的人告訴他，第九頻道因為地方觀眾太少而被停掉了。又過了一個星期，威利開始打電話給該台，他假裝北京口音，說他在一家國際貿易公司做事，他們公司常有外國代表來樂清，對停播第九頻道很失望。外國代表對投資樂清的興趣很濃厚，要是第九頻道能恢復播出，他們會很高興。好幾個星期，威利心存希望地等著，結果卻什麼都沒有。南西表面上不動聲色，但心裡鬆了一口氣。

跟很多中國女人一樣，南西管錢管得很緊。威利習慣像野馬般自由花錢，但南西會把韁繩拉緊。談到要不要有小孩，南西有一項硬性規定：除非他們存到十萬人民幣，她不考慮懷孕（到目前為止，他們有八萬元）。實際上，他們才剛結婚，那年五月才登記成夫妻，但是因為離四川太遠了，他們從未舉行婚禮。經過幾年的爭論，他們終於決定只拍婚紗照。夏天裡的一天，他們去了溫州市中心的一家婚紗攝影公司。

他們帶回一張巨幅的婚紗照，那成為他們公寓裡唯一的裝飾品：柔色相框裝裱的婚紗照中，威利穿著西裝，南西穿著金絲雀黃色禮



服，頸上戴著一串珍珠。他們花了不少錢，照了一打不同服裝和背景的婚紗照，看起來好像舉行了十二場婚禮，而非一場也沒有。這對新人出現在溫州公園和忙碌的市區裡，他們的服裝周旋在不同的朝代和國際風格裡。一張照片裡，南西甚至穿著日本和服。

「每個人都會穿這套衣服拍照，」她解釋，「大家都覺得日本女人很溫柔，很善良，很會照顧另一半。」

那張照片邊緣用些英文字做裝飾：tenderness、chic、charming、smart（溫柔、俏麗、迷人、聰明），還有一段聽起來像流行歌詞時的詩句：

我不愛你選中的鑽石

我要你抱我，我要你是真心的.....

另一張照片是威利穿著明朝士人服裝，手持扇子。「我要告訴你，寶貝，我為你做的改變。」另一張是南西穿著美麗的絲質旗袍。

「想念你，傾聽你。」有一張是他們兩人穿著正式的現代禮服，伸開四肢，躺在陽光下的綠草上。「直到你回到我身邊，我不知該如何是好。」

\* \* \*

九一一的片子很難懂。它們製作粗糙，無從看出是誰發行的，所有的中文演員名單和製作團隊都是假的。那部《世紀大災難》DVD大部分內容是從美國廣播公司的新聞中剪下的。偶爾，他們會加入美國電影配樂，其中有一段放的是《法櫃奇兵》的主題曲。當第二部飛機

衝進世貿中心時，伴隨著電影的槍聲和爆炸聲。在《大白鯊》的音樂中，北塔像慢動作一樣塌了下來。

另一部片叫《突擊美國》的片子裡，開場採取的是紀錄片的旁白，介紹著曼哈頓和世貿中心，接下來是紐約的日常生活畫面。穿西裝打領帶的商人走過街頭，一排排證券交易員注視著電腦螢幕。突然，有個畫面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個銀行職員手拿著一堆紙，急忙地從一個辦公桌走到另一個辦公桌。不知為什麼，那人看起來很眼熟，很像一個我大學認識的人。

我轉向威利：「你可以倒帶重播剛剛那一段嗎？」他按一按遙控器，然後那個銀行職員又出現了。他只出現五秒，但是我想起來了，那段剪接自電影《華爾街》。

好萊塢電影不斷在《突擊美國》中出現。插入的片段有時很短，看不出是從哪裡剪來的，畫面也很不穩定，真實與虛擬含糊地閃爍著。有些剪接處很明顯，像是雙子星大樓倒塌之後，快速閃過的是《酷斯拉》中怪物躺在曼哈頓的一景，中文旁白解說：「我們只有在恐怖片中才看得到這種破壞……」突然地，畫面接到表情嚴峻的小布希總統在做新聞簡報，他的話被消音了，只聽得到中文旁白：「問題仍然在於：美國的民主安全嗎？」接著的影片是《珍珠港》。

片子的下半段開始敘述恐怖主義的歷史。旁白列舉出各種歷史事件：塞爾維亞人暗殺斐迪南大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片段、納粹軍隊閱兵、炸毀的奧克拉荷馬聯邦大樓、台灣的一場示威。旁白聲稱，恐怖主義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混合在一起所引發的。「恐怖分子對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強國不高興，」敘述者說，「不高興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這些強國把它們的原則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影片以一九九八年美國駐非洲大使館遭受攻擊，來描述美國遭到的後

果。對阿富汗的攻擊失敗後，美國受到的報復則是：飛彈掃過舊金山灣，那是《絕地任務》中的一個鏡頭。

\* \* \*

攻擊事件後，鳳凰衛視新聞台不插廣告直播了三十六小時。鳳凰衛視是中國唯一私營的中文電視台，也是唯一對事件做詳細報導的電視台。梅鐸的新聞集團擁有該台百分之四十的股份，總辦事處設在香港，觀眾群鎖定中國的有線電視用戶。鳳凰衛視希望有一天能變成中國的CNN，它能進入中國市場，主要是因為跟共產黨有良好的關係，有時候，它的報導比中國國營的媒體還要愛國。該台製作能力強，對突發新聞事件能夠快速反應，因此脫穎而出，在中國擁有約四千二百萬收視戶。

我在樂清找到的VCD中，有一片大多是從鳳凰衛視的新聞畫面剪接而成的。政府媒體也許避免批評美國，可是鳳凰衛視的語氣則完全不同。事件後的幾個小時，該台播出一位叫曹景行的人的評論，介紹說他的身分僅僅是一位政治評論家。他說：「為什麼別的國家不像美國那樣被怨恨？讓我們想想看。」他對劫機的評論是：「為什麼人質那麼容易被劫？在幾秒鐘之內，偉大的美國就不見了。」

VCD的剪接很差，中國評論員和美國的新聞片段不時切來換去。在一場記者會上，小布希講了一句：「今早，自由本身受到了不要臉的膽小鬼的攻擊」，然後就不見了。有一段是鮑爾說：「我們再次目睹恐怖主義、恐怖分子、不相信民主的人，相信藉由謀殺他人他們可以……」然後小布希再度出現：「今早，自由本身受到了不要臉的膽

小鬼的攻擊。」他們播了那個段落三次，然後鳳凰衛視的評論員又出現了。

這家中文電視台用的是福斯電視在紐約和華盛頓特區拍的鏡頭，它們就跟那些盜版的好萊塢電影一樣讓人一頭霧水。福斯的商標出現在一角，畫面就跟在美國看到的一樣，可是，卻配上了反美的中文旁白。我記得威利說過，中國政府無法表達它真正的感覺，那是政治，而這是生意：媒體給人們想要的東西。新聞集團用同樣的畫面在美國和中國兜售愛國主義，兩個地方的人民都買下了它。

\* \* \*

威利的教室裡掛著一面中國國旗，和一幅裱框的周恩來語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校園不大但整齊，新的六層大樓，鋪膠的運動場在浙江的雨水中閃閃發光。走廊掛著學生的畫作，這在中國並不常見，中國的公立學校通常得掛表情嚴肅的政治人物畫像：毛澤東、孫中山、馬克思、列寧。我向威利問到這些小孩的作品，他說那是一種廣告。「他們要家長知道這是間好學校。」他說。

一天早上，七點半，我坐在他的課堂裡。學生是八年級生：三十個穿著白上衣、藍褲子制服的男孩女孩。威利站在前面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他們用英語回答。他說：「隔壁班的學生，他們的教室就像一間.....」

「豬舍！」男孩女孩齊聲喊出，笑著。

「很好，」威利說，「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教科書是《國中英文》，那天的課程是針對新經濟而設計的，用簡明英語寫的短句：

王叔叔有一間工廠。他在一九八九年開設那家工廠。工廠是做梯子的。有一天我參觀了王叔叔的工廠.....

威利大聲地把句子唸一遍，然後把一些字彙寫在黑板上。他看了我一眼。

「一九八九年是有意思的一年，」他說，「那年，有些有意思的事情在北京發生。現在，跟我一起唸.....」

沒有學生注意到那個暗示，它很快消失在整齊的朗讀聲中。威利轉向一個男學生：「他們在工廠做什麼？」

學生站起來：「他們在工廠參觀機器。」

「很好，你可以坐下。」

他又叫了另一位學生，威利又看了我一眼。

「他們的工廠是做牙刷的嗎？」

「不是，他們不是。」男孩說。

「他們是做什麼的？」

「做梯子。」

「很好，你可以坐下。」

在那半個小時裡，課堂上的教學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教科書裡的——王先生、梯子、工廠、外銷經濟的樂趣，但威利會不時地特別為我加入一些東西。他插入一些四川俗諺的英文翻譯，間接提到我們對涪陵的共同記憶。當課文的另一部分再次提到一九八九年，威利再次停了下來。「不知道王叔叔的工廠是不是一九八九年六月開的。」他說，然後繼續上課。學生一點也想不到，一條隱密的英語線正穿過他們的頭，射向坐在教室後面的那個外國人。

傳統上，中國的老師只站在講台上，可是威利卻在學生之間自由走動。他一句中文也沒說，可是課堂進行得很流暢，他們的英文很好。當他叫幾個學生出來練習對話時，他加了一個簡單的道具：一塊遮眼的布。男孩們很快就懂了，他們扮演起盲眼的偵查員，調查著王叔叔的梯子工廠。教室一片笑聲。下課前五分鐘，威利把書本闔上，走到學生之間。

「你的父母是做什麼的？」他問一個女孩。

「他們開了一間工廠。」

「工廠是做什麼的？」

「工廠做電視零件。」

一個接一個，學生們回答他們的父母是做什麼的：他們養魚、他們在北京做貿易、他們在公司上班、他們開工廠。下課鈴聲響了，語言換回溫州話，走廊傳來下課的吵雜聲。看我以前的學生上的那堂課，是那整個九月發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一件事。

\* \* \*

在溫州的最後一天，中國政府進行空襲警報測試。台灣就在海峽對面，通常這些測試表示海上有軍事演習，或那個島上正進行著某項政治活動。然而，最近海峽兩岸的關係並沒有什麼突然的衝突，台灣距下次選舉也還有兩個月。空襲警報可以代表著，政府在為九一一後可能發生的任何事做準備。

我去見了市裡另一位以前的學生雪莉，她在一九九七年搬到浙江，經常寄長信給我和亞當。她詳細描述自己的東部之旅：火車上一個營養不良的嬰兒，在跟一個浙江當地人的對話中，她謊稱自己不是

四川人。她的英文文筆很好，我總是記得她在一封信的結尾寫的那句話：

亞當，這些是最感動我，教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它們都是真的。

來溫州前不久，雪莉寄了封信跟我說，她結婚了。起先雪莉在一間私校教書，但最近，她在大虎打火機公司找到一份做外貿業務的工作。大虎是溫州數不清的打火機公司中最有名的一家。雪莉的薪資是一個月二千元人民幣，相當於二百五十美元，是我教過的學生中最成功的一個。

從她上班的主管辦公室開始，她帶我參觀他們的工廠。辦公室裡一個個的展示盒裡擺著高級的產品：鑲假鑽石的黃金打火機，可以伸縮的特製烤肉點火器。一個雕有虎口、你一按鈕它就會噴火的金屬菸灰缸。牆上掛著一幅江澤民的毛筆字，江澤民曾在二〇〇〇年五月參訪過大虎。

另一面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畫著公司的外銷網絡。以溫州為世界的中心，網狀的圖中，箭頭朝各個方向射出：美國、英國、巴西、印度，和十幾個其他國家。辦公室外，生產樓層的入口，一張英文標語寫著：

讓「虎」牌創世界名牌，讓世界更了解「虎」牌

那天我跟雪莉還有她的先生黃序一起吃晚餐。黃序也是四川人，幫這裡的一家公司開發軟體。我們談到剛發生在美國的事件，他們都

贊同威利的觀察，大多的溫州人並不同情美國。

「當我剛開始看到那個事件時，我沒有真的覺得難過，」雪莉說，「我承認，我一直對美國有偏見，因為它是那麼強大，而且，總是把它的強勢加在其他國家身上。但我愈想發生的事，我對那些無辜的百姓就愈同情。我只是要花點時間才會那麼想。」

她的先生加入網站上強烈反美的聊天室。「很多人把它跟我們的南斯拉夫使館事件聯想在一起，」他說，「過去許多年來，我們跟美國有太多問題了。」

攻擊事件後，我無法停止想那些影片。九一一畫面是刺人耳目的：看到暴力發生在自己的國家，真的很令人震撼。我已經習慣了看那些從發展中國家傳來的戲劇化畫面：淹水的城市，血流成河的戰場。現在我在中國，美國的距離跟那些國家一樣遙遠，但這次，畫面卻來自一個不熟悉的方向，我們在安全中看到的是：美國人在死去。

在溫州這樣一個跟外界貿易往來如此之多的地方，看到這些畫面被製成電影出售，尤其讓人覺得彆扭。美國的全球主義向來持有一項基本假設，那就是美國的文化和產品一旦傳布出去後，國際社會就會很自然地更接受和了解美國。美國民眾不太需要去別的國家走動，產品的流動比人容易多了。理論上，這沒錯，但很明顯的，其中缺乏了「人」這個層次。在中國，大部分人對美國的品牌與產品並不陌生，但是，中國人跟外國人的直接互動還是很少。像威利這樣的人算是特例，他有外國朋友，此外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他對另一種語言的執迷。

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外面的世界還是很抽象的，那世界遠在想像的終點，而想像之箭飛馳的起點是做外銷品的地方工廠。攻擊會變成另外一種美式產品，並不讓人驚訝。接下來的那個月，我蒐集與九



——有關的東西：一款「小布希對賓拉登」的電玩遊戲、賓拉登鑰匙圈、幾部巨大的飛機像樹枝般向外伸出的塑膠建築雕塑。溫州有家打火機公司生產了一款賓拉登頭上會射出火燄的新品。中國南方有家工廠生產專門賣給小孩的「魔鬼糖」，包裝紙上使用了賓拉登的照片。

我一遍又一遍看著那些影片，試著找出它們的意義。在鳳凰衛視的一段影片中，女主播陳魯豫說：「我們很驚訝，但我們並不覺得意外。」跟另一位評論家一樣，她一再拿恐怖分子的攻擊畫面，跟《珍珠港》及其他電影的場面做比較。在某方面，對習慣於好萊塢語言的美國人來說，它沒有什麼不同。有時候，小布希總統講話的樣子好像在演西部片——「要死還是要活」，而之前媒體上關於美國軍方回應襲擊事件的標題，拿來擺在溫州盜版DVD的架子上，則再適合也不過了：無限公平、持久自由。

跟雪莉夫婦吃晚餐時，我問他們，那些攻擊事件會不會影響他們。「我們現在外銷美國的東西不多，」她說，「事實上，有些人說，如果美元跌了，對我們和世界其他國家做外銷有幫助。」

她的先生補充說，就算經濟下滑了，他的朋友們也不擔心。「這都是互相的，」他說，「中國人常說，只有站在一個比你更有錢的人身邊，你才會覺得自己窮。如果全世界都下滑，我們也跟著下滑，所以事情並沒什麼真的改變。」

基本上，我不太相信他的說詞，我懷疑在溫州沒有任何人願意減少收入，即便那表示美國人受的苦比他們更多。但我隨之了解到，在中國人看來，這不是他們能選擇的。中國人對遙遠的不能控制的事情的態度，常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是一種被動、置身事外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源自於中國人艱辛的歷史。雖然貨物與文化在流動，但很明顯的，人與人的隔閡更增強了這種世界觀。如果你賣出去

的是打火機，而收到的是好萊塢的文化，這個世界似乎不大可能變得比較親近、比較容易彼此理解。

晚餐快結束時，我問雪莉，她想一般美國人會怎麼看她。二十六歲的雪莉有著又大又黑的眼睛、溫和的笑容。在涪陵時，她是班上功課最好的學生，但現在她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

「我很確定他們會說我很可憐、落後、教育程度低，」她說，「我想，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就是這個樣子。他們不會知道溫州在哪裡。在他們眼中，溫州只是中國的某個城市。」

\* \* \*

攻擊事件之後，威利更加努力地學英文。幾乎每個晚上，他都做筆記，跟著事件整理字彙表：

Milestone（里程碑）

Maul（大鎚）

Lounge（酒店、休息室）

Lodger（住宿）

Lobe（耳垂）

Kidney（腎臟）

Keepsake（紀念物）

Jockey（賽馬騎師）

除了美國之音，他也把溫州報紙上的文章翻成英文：

中東國家是本市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溫州製造的衣服、打火機、皮鞋、小金屬零件外銷到這些國家.....九一一恐怖分子攻擊美國之後，阿富汗的情勢緊張化。根據國際章程，溫州的外銷品將被要求付額外的戰時金額。

翻譯完國內媒體的報導後，他會驕傲地在底下簽名：

新華社

美國總統布希十月十一日傍晚在白宮記者會上發表演說，他說海珊是一個邪惡的人。因為自波斯灣戰爭以來，他一直想從事大規模破壞性的武器製造。

布希表示，最近的攻擊是以阿富汗為目標，但不久這些反恐怖主義的攻擊會擴展到世界其他國家.....

布希說，美國早知道海珊在製造大規模破壞性的武器，並稱海珊是個邪惡的人。布希同時呼籲伊拉克允許聯合國武器調查員進入伊拉克。

威廉·傑佛遜·佛斯特翻譯

## 【古文物I】

# 馬

在穿越中國西北的長途旅行中，這匹馬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決定在甘肅省的一個小城武威停下來。武威不是我的目的地，我事先也沒有計畫要在此地停留。但這是我的慣例，有時當我行經一個因為重要的考古發現而聞名的地方，我會停下來，問一問有關這個發現的事。我對古文物的理解，總會在幾小時內有戲劇性的改變。

武威因為是「銅奔馬」的故鄉而知名。這匹馬現在保存在蘭州的甘肅省博物館，但它最初是在武威發現的，那裡有一個墓葬，裡面葬著一隊青銅兵馬俑：三十匹馬、二十八個步兵隨從、十七個戰士、十四輛戰車和手推車，還有一頭公牛。這個墓葬可以追溯到西元三世紀，年代接近東漢末年。

在這些古文物中，有匹馬很突出。不到六十公分高，但造型卻非常雄偉：正在疾馳飛奔，昂首嘶鳴，尾巴迎風飄揚，三足騰空，右後蹄輕輕地踏在一隻飛燕的背上。這就是聞名遐邇的銅奔馬。中國旅遊業將這件文物拿來當作民族的象徵，每個人都認為，它是中國文化和歷史的代表。這是我到達武威時，腦中對它的印象。

\* \* \*

我在武威的博物館見到了管理員田志成。這個博物館位於一座宏偉的十五世紀孔廟建築群中。它的規模證明了這個城市早年在絲路上

的重要性。但是，隨著甘肅走廊的貿易歲月遠去，武威也開始衰落：塵土漫天，窮鄉僻壤，被人遺忘。廟宇已開始風化，木頭出現了裂縫，油漆也剝落了。田志成難過地解釋說，武威市沒有足夠的經費來維持這群建築。他給我倒了一杯茶，然後告訴我有關銅奔馬的故事。銅奔馬是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發現的。

「他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三日發現了這匹馬，」他說，「林彪元帥告訴中國人應該挖些防空洞，以免中國遭到蘇聯或美國的襲擊。」

田志成解釋說，當地的農民正在一所道觀的下面挖掘鏟土，無意中發現了這個墓葬。由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政治動亂，考古學基本上發揮不了功用，這些出土文物都由農民保管。他們將這些青銅器放在家裡，直到武威文物局有人來把它們收走。最後，這些文物被運到了蘭州的省博物館，拋置遺忘在一間儲藏室裡。

「他們不知道這些文物的價值，」田志成說，「直到七〇年代初期，才有人真正注意到它們。當時，郭沫若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出遊，路過甘肅，參觀了這個博物館之後，郭沫若說，想看看儲藏室。當他看到銅奔馬的那一瞬間，就知道這是件非常特殊的文物。他說，這是到目前為止博物館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從那以後，銅奔馬開始出名。」

郭沫若是浪漫主義詩人、甲骨文研究者，跟共產黨靠攏並妥協的歷史學家。西哈努克親王則是流亡的國王、中國的朋友，以性格反覆無常而臭名昭著的人物。不知怎的，他們成為文革期間閒逛絲路上的博物館的好拍檔。

跟田志成談過以後，我參觀了那個空的墓葬。為了發展旅遊，墳墓已重建過了。我問售票亭，當年挖掘的農民是否有人還住在附近。

售票亭中有個女人給我一個姓：王。王先生的家就在附近，一個在甘肅的乾土裡挖出的簡易防空洞，基本上，只是一個有窗戶和門的窯洞。他的妻子堅定地站在門口。

「他不能跟你講話。」她說。

在農村，婦女到了中年後，她們常常會帶些好像吸取自土裡的固執。在這些地方，外國人的到來也往往會吸引一群人圍觀。愈多的人來湊熱鬧，王先生的妻子就愈固執。她站在門口，胳膊在胸前交叉。她說，那次挖掘不是正式的，她不想惹麻煩。我向她保證，不會有任何風險，我想寫的是一個有關歷史的故事，只會花一點點時間。

「他喝醉了，所以不能和你說話。」她最後說。

人群中傳來了笑聲。那是下午三點，在海拔一千二百公尺的地方，炎熱的沙漠陽光像鐵錘一樣重重地照過來。顯然，這個女人在做最後的掙扎，我繼續試著說服她：我大老遠從北京來，不會待太久，我只想問他幾個問題。人群小聲地支持著，最後，那個女人聳聳肩說：「進去吧！」

窯洞裡和墓葬一樣潮濕，和垃圾坑一樣骯髒。一個半裸的男子四肢攤開，坐在一張木椅上——皮包骨的胳膊下垂擺動著，一頭白髮，懶洋洋地倚靠著椅子。王先生，業餘考古學家、許多珍寶的發現者、武威兵馬俑的發現者，正在打鼾。窯洞散發著白酒蒸餾室的味道。這是我離開武威時，腦海中留下的畫面。

\* \* \*

一九八七年，賓州大學的漢語教授梅維恆，帶領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館系統史密森中心所組成的旅行團穿過新疆。在烏魯木齊省博物

館，他碰巧逛進一間後面的展覽室，看見三具放在玻璃棺中的屍體：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他們有著高鼻梁、深陷的眼睛和金髮。他們被保存得非常地好，是梅維恆從未見過、最完整的古屍。一位館員告訴他，最近在新疆已經發現了幾十具像這樣的屍體。

他們會變成木乃伊是個偶然，是被環境而不是被技術保存下來的。新疆塔里木盆地距離海洋遙遠，降雨量非常稀少，冬天極為寒冷。埋在鹽土中的屍體可以保存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一些新疆古屍已經超過三千多年了。他們的衣服還完整無缺，穿著毛皮裝飾的外套、氈靴和長襪。他們的羊毛衣服帶著格子圖案，他們有褐色或紅色的頭髮，臉上滿是鬍子，外貌看起來像歐洲人。他們看起來跟中國西部沙漠完全格格不入。

像許多古文物一樣，基本上，這些古屍是因為改革開放而被挖掘出來的。在一九八〇年代，隨著國家經濟成長，政府開始在新疆投資。他們有一個政治動機：希望藉由提高維吾爾人的生活水準來安撫他們；同時，政府鼓勵漢族移民到這個地區定居。新疆是這個國家唯一一個有大量移民前來務農的地區。不時地，當他們開墾出一塊新土地或開始一個新的建設方案時，一具古屍出現了。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前來定居，卻有愈來愈多外國長相的屍體被挖出來。這個象徵性可能會令人不舒服——當現代新疆變得愈來愈中國化時，它的古老過去卻愈來愈西化。但是，最初沒有人重視這些文物。當梅維恆參觀烏魯木齊省博物館時，基本上這些木乃伊還不為外界所知。

在一九九〇年代初和中期，梅維恆帶著一些外國專家再三回來參觀。他們跟中國和維吾爾的考古學家一起蒐集標本，發現古屍的衣服隱藏著特別有用的資訊。這種斜紋織物——藍、白、褐三色的格子式

樣，與在德國、奧地利和斯堪地那維亞古墓中發現的紡織品極為相似。這些衣服似乎證明了梅維恆的第一印象：這些人是印歐民族。

塔里木盆地位於世上最大的歐亞大陸的正中央附近。跟中亞的許多地方一樣，它的正史非常單薄和分散，它的過去似乎和這塊土地一樣空曠。但你只需要一點火花——一些令人驚奇的古文物，人們的想像力便可以開始填滿這整個地方。

一九九四年，《探索》雜誌刊登了這些木乃伊的故事，《讀者文摘》隨後轉載。其他刊物跟著報導這個故事，推測這些古屍是東方和西方早期聯繫的證據。電視拍攝小組來到新疆，《探索》拍了一個名叫「沙漠木乃伊之謎」的節目，是美國公共電視台拍的紀錄片，由主演過電視劇《外科醫生》的艾倫·艾達主持。維吾爾人開始將這些古屍叫作「維吾爾木乃伊」，在他們看來，這些屍體是中國人無權住在新疆的最好證據。事實上，根據梅維恆和其他學者的推測，這些古屍可能是吐火羅族的祖先。吐火羅族是一支大約在西元九世紀消失的古代部族，當時，維吾爾的突厥族祖先人數第一次達到相當大的數量。這些定居的突厥族人可能在消滅吐火羅族時，融合了他們的某些基因特徵——這也許能解釋為什麼有些維吾爾人有著金色的頭髮。

共產黨對這些理論一點興趣也沒有。但隨著木乃伊愈加出名，當局開始限制外界接近它們，很快地，政府不再允許梅維恆和他的同事把樣本帶出國。外國媒體不準入內，攝影也被限制。艾倫·艾達報導說，他的攝影隊被趕出了博物館。但是，中國方面的限制來得太遲了，木乃伊已經熱門到研究限制愈多，猜測就愈多的程度。現在，有成千上萬個跟木乃伊有關的討論，提出成千上萬種木乃伊理論。白種人優越論者和維吾爾人一樣熱愛這些古屍。如果你上網，會發現人們都喜歡康帕萊特牧師的理論，他在一篇名為〈該隱怎麼了？〉的文章



中，解釋了木乃伊的起源。這個牧師是土生土長的加州人，史丹佛大學畢業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個可靠、真正的基督徒，一個忠誠、愛國的美國人，一個由立憲政府所領導下的主權美國的信徒。」他認為夏娃偷吃禁果之後，亞當和夏娃從伊甸園向東逃到了新疆。在這裡，在燦爛的沙漠藍天下，夏娃生下了兩個男孩。

\* \* \*

梅維恆說：「馬友友在讀了一些有關這些木乃伊的東西後跟我聯絡。這是他對絲路感興趣的部分原因。你知道，還有誰也被新疆木乃伊吸引嗎？比爾·蓋茲。他在蜜月旅行時參觀了這些木乃伊。他來到北京，租下毛澤東的私人火車，駛向烏魯木齊。他是和他的妻子、他的父親等一群人一起去的。他們在烏魯木齊停留了六個小時。猜猜看這幾個小時他們是怎麼度過的？他們花了三個小時跟熱比婭·卡德爾在一起，另外三個小時跟這些木乃伊在一起。比爾·蓋茲從我的研究文章中得知這些木乃伊。這次旅遊留下了一張重要的照片，我真希望我能將它刊出。這張照片中有一具木乃伊。這是比爾·蓋茲，他正看著它；這是比爾·蓋茲的父親；這位是梅琳達·蓋茲，蓋茲的妻子。她用手捂住嘴巴，看上去好像是害怕染上某種可怕疾病似的。我真希望我能把這張照片刊出來。」

\* \* \*

梅維恆是個非常健談的考古學家。上面那段話就很典型：新疆木乃伊、馬友友、比爾·蓋茲，還有維吾爾女商人，即後來成了政治犯的熱比婭·卡德爾。熱比婭的丈夫斯迪克·肉孜是那位住在奧克拉荷馬市，啟發了波拉特和其他維吾爾移民穿越大平原的美國之音特派員。在一次跟梅維恆的談話中，所有這些東西都完美地連在一起。

梅維恆教授的專業是古漢語。除了把《道德經》翻譯成英文，他的《莊子》英譯也具有優美的特質。（我在寫偵查機擊落一文時，引用的「莊周夢蝶」就是梅教授所譯。）《莊子》是一部與眾不同、沒有固定體裁的著作，將一些明顯無關的東西連在一起，有時那就像梅教授的思維模式。在交談中，他從議題跳到軼事，再從軼事跳回議題。他的研究領域同樣不可捉摸，他翻譯古書，研究新疆木乃伊，編纂漢語詞典。他是推動按照字母順序編製《漢語大詞典》索引的主力之一，這本十二卷的大詞典幾乎可以和《牛津英語大詞典》相媲美。其他學者有時會抱怨梅維恆把網撒得太廣，而且梅維恆有引起大眾注意的本領，這在學術界中並不常見。比較寬廣的視野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聯繫，這倒是真的。要不是梅維恆去參觀博物館，新疆木乃伊可能至今仍不為外界所知。

梅維恆頻繁地出入北京，我們經常相約吃晚餐。此外，他同樣是個曾經加入和平工作隊的美國中西部人。他是俄亥俄州坎頓市人，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曾在尼泊爾當過義工。在此之前，他曾是達特茅斯大學籃球隊隊長，到現在還有著前鋒的高瘦體格。在一次關於古代的談話中，梅維恆提到，有一次在普林斯頓狄倫體育館舉行的籃球賽中場時，他搶了比爾·布雷德里一球。<sup>7</sup>在講到另一位比爾時，他的話題還不僅止於梅琳達·蓋茲和木乃伊：

「你知道嗎？一九九六年，當我們的第一本詞典問世時，比爾的微軟公司跟我聯絡問我可不可以買下它。當時那詞典有七萬四千個詞語，全都按字母順序排列。他們出價四萬美元。我說，少於二十萬我是不會考慮的。」

「去年，我們完成了有三萬七千個詞語的《漢語大詞典》索引。它花了我們十年工夫，我自己可能花了五萬美元。永恆不朽的任務。現在，微軟公司透過各種方法想得到我們的索引。這個索引的價值驚人，但他們想從我這裡免費得到。他們至少得付我一百萬美元。他們一旦拿到這份索引，將會給軟體帶來一場革命。它有二萬三千個不同的漢字。現存的中文軟體只有二萬字，我們特別另外設計了三千個字，那是個讓人難以想像的難題。我回美國時，有學者開始問我，能不能借用那片磁碟，我當時就知道，我們中間有些人跟微軟公司聯絡。」

\* \* \*

回到那匹馬。梅維恆教授發表過一篇名為：〈中國史前晚期的馬：從蠻夷身上掠奪文化與控制〉的論文。根據考古學記載，中原一帶的人（最終成為「中國人」的人）會騎馬的時間相對比較遲，帶頭的是他們的游牧鄰居，在西元前四世紀，北方部落就開始在戰爭中使用騎兵了。根據歷史記載，接下來的二千多年，游牧戰士一直都是中原農耕民族的最大威脅。到了十八世紀，歐洲人大規模前來，中華帝國才遇到更強大的對手。

在安陽，考古學家挖掘出的動物骨骼，還有被埋藏的戰車，是中原有馬的最早證據。商代似乎從北方的草原引進了馬匹和戰車的革新

技術。但是和挖掘出土的其他古文物相較，考古學家找到的馬和戰車並不多，也沒什麼證據顯示，商代在戰爭中真的使用過這些車。它們很可能只是用來展示。倒是有跡象顯示，商代做過用羊拉車的實驗。即使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中國人對騎馬也不是很熱中。統治者擔心一旦採納中亞的創新，諸如騎兵作戰、褲子的樣式，中國人可能會被「蠻人」汙染了。在梅維恆的論文中，他形容中國人「對馬有種牽強的情感」。

他相信這些動物有一種重要的文化功能，牠們刺激了中國人跟其他部落的交流。在梅維恆看來，傳統歷史過分強調北方「蠻人」的威脅：中國人以長城為榮，他們經常談到各朝定都於北方，是為了抵禦北方外人的入侵。在這一點上，梅維恆漂亮地用上了他的反傳統理論，他認為或許貿易比抵禦外敵來得重要，而或許中國文化會植根於北方，是因為與外界的貿易往來而非防禦。他也提起，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地理中心突然轉移，領導人也開始在南方出現，諸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是巧合，還是反映南方逐漸成為與外界的新接觸點呢？

北京的一個晚上，在我們特別廣泛的談話中，梅維恆告訴我另一個有關這匹馬的理論：在中國的文字起源上它可能曾經扮演著某種角色。

\* \* \*

「在中國藝術中，幾乎總是可以看到一個外國馬夫站在馬旁。你仔細觀察，這個馬夫通常要不是粟特人，就是個維吾爾或者其他種族的人。粟特人來自現在的伊朗。中國人為了獲得馬匹，不得不跟所有

部族進行貿易。有些時期，他們跟維吾爾人通商以獲得馬匹，有些時期則是買賣茶葉。維吾爾人愛極了茶葉。在宋代，他們之間的貿易額相當巨大，宋人從維吾爾人那裡買到馬匹而傾家蕩產，他們賣絲綢和茶葉以換取馬匹。有時，我想寫一點有關這些東西的書。我要把它叫作《茶葉的真正歷史》。」

聽著聽著，我腦海中閃過剪報時見過的這些詞彙：

Students (學生)

Style (風格)

Superpower – “New .reat” (超級強權—「新的威脅」)

Superstitions (迷信)

Tea (茶)

梅維恆教授繼續講：「人們對茶有很多的誤解。」他說：「一直到唐朝，中國人都把茶看作是一種蠻人的飲料，一種南方蠻人的飲料。佛教徒是第一個讓茶成為正統飲料的人。到了唐代中晚期，由於跟維吾爾人的貿易，茶葉在經濟上才合法化。在此之前，茶是屬於蠻人的。有些中國書還把它跟尿相提並論。」

「這是我寫完《漢字系統起源》之後可能會寫的一本書。我認為漢字文字系統的出現，是交易的一部分。馬、戰車、青銅技術、書法都是同時出現的。它們都出現在商代，在大約四百年內產生。如果你嚴格考察這些事物真正在使用的時間，則大約是在二百年內。其中有兩樣，幾乎可以確定是從外面傳進來的：馬和戰車。現在，甚至有中國考古學家撰文認為，青銅技術也有可能是從西方傳來的。」

在我與學者們的所有談話中，我從未聽過任何人提出漢字不是土生土長的理論。梅維恆的理論是，漢字是透過與近東的文化直接或間接地接觸發展而來。我問梅維恆，這個領域的其他學者對這個理論有何反應。

「我不太喜歡談這個，」他回答，「文字系統是一種文化，就是文明，是非常敏感的。一九八七年，我分析了部分甲骨拓文，寫了三百頁的書的初稿，但我覺得還沒有完成。我想把它放在考古的背景上來寫。我認為，那將會是我所寫過最重要的東西。但是我總是被木乃伊、詞典的工作打斷。」

「我相信，北方大草原上遍布著各種貿易活動。我認為伊朗人在東西方交流中，是還未被人們歌頌的英雄。還有粟特人，我相信我們在新疆所發現的晚期木乃伊中，有一個是粟特人。這傢伙是個大個子，約有一百九十三公分高。但是在歷史上，我們完全看不見他們。中國文化中很多基本的東西，在歷史中都鮮為人知。」

\* \* \*

當我寫了一篇有關武威青銅馬的短文給《紐約客》後，他們對這個故事進行查證，深夜打電話到絲綢之路。蘭州和武威官方各自證實了那個偶然發現的傳說——郭沫若和西哈努克親王在一間博物館儲藏室的發現。所有一切看起來都很好，但雜誌剛出版，泰國就寄來了一封信：

親愛的《紐約客》雜誌：

謝謝你們的訊息。

在我的研究中，我沒有發現西哈努克親王和詩人郭沫若會見的任何證明。我已把你們的訊息呈報給西哈努克親王本人，他的回答是他從未碰到這件事。

希望這個回答有所幫助。

誠摯的胡立歐

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官方傳記作者

---

7 編按：比爾·布雷德里（Bill Bradley），前美國籃球明星，後來成為知名的參議員和總統候選人。

## 第十八章 餛飩西方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七日

去外景片場之前，我先跟波拉特的朋友見面。我們極其小心，尤其在電話聯絡上。飛機著陸烏魯木齊後，我叫了部計程車進城，找到一個付費的公共電話，撥通後馬上掛斷。他回電時，只說了一句話：一個大眾公園的名字。我的行動電話沒有開機，以免當局追蹤到我的位置。據報導，中國加強了在新疆的安全管制。西部邊界外，阿富汗發生的戰爭還不到一個月。

快到大眾公園入口處，我從他的金髮認出了他。我們之前在雅寶路見過一次面，他是那個偶爾在中國電影中客串外國人的維吾爾人。握手寒暄後，我們在公園的背處找到一張長椅坐下。他拿出一個信封：二萬美元。我把那些鈔票放入我藏錢的腰包裡。

「我這個星期會把支票寄出去。」我說。

「你什麼時候會回去？」

「要到一月，」我說，「到時我會跟他見面。但是我會先把支票寄到一個華盛頓的朋友那裡。」

他不停地四下張望。在有許多少數民族的新疆，我們兩個外國人看起來並不是那麼特別。但是如果有人聽到我們用中文交談，馬上就會知道我們至少有一個是外地來的。他問我，上次見到波拉特時，他看起來怎麼樣。

「還好，」我說，「他住的區域不怎麼樣，但是他已經搬家了。恐怖分子攻擊事件之後，我還沒有見過他。」



「他的證件會有問題嗎？」

「應該不會。他已經得到政治庇護了，很幸運他在九一一之前就拿到了，我相信現在一定更難。」

「他妻子很緊張，」他說，「我想她很怕去美國。」

我決定不去見她，在新疆的這段時間，我想，最好把跟本地人的接觸減到最低程度。一個外國記者出現在新疆已經教人懷疑了，何況還如此危險地拿著一筆現金。我跟他問起這裡的政治氣氛怎麼樣。

「我們在公園走走，」他說，「還是不要在這裡坐太久。」

\* \* \*

他告訴我，當初波拉特沒有回中國時，他的家人曾被找去質問，但是尚未遇到什麼麻煩。波拉特的家人在烏魯木齊警察局有朋友，幫助不少。而且，現在官方關心的似乎是那些大一點的問題。波拉特的朋友聽說有個維吾爾人在喀什噶爾被逮捕入獄，政府宣稱那人的兒子接受賓拉登蓋達組織的訓練。我問他，有很多維吾爾人加入塔利班嗎？

「不是很多，」他說，「但是有一些。不論如何，那給了政府一個好藉口。」

我們回到公園入口。我問他最近有沒有演什麼電影。

「沒有，」他笑著說，「反正賺那種錢也不好。我希望明年能去杜拜做點生意。你要寫的是哪一部電影？」

我到新疆來採訪姜文，他是中國最有名的演員之一，正在這裡拍一部中式西部片。

「他們在哪兒拍攝？」

「在鄯善郊外，」我說，「在沙漠。聽說那兒的風景很好。」

我問他對姜文有什麼看法。

「他比大部分的中國演員好些，」他說，「不過，我不會去看他們在這裡拍的任何電影，我敢說，一定是部亂七八糟的片子。」

我們握手告別，他為不能在家裡招待我而表示歉意。離開公園後，我打開了行動電話。次日清晨，我租了部計程車，開了五個小時。我們沿著塔里木盆地的北邊行駛，看著景色愈來愈荒涼，直到抵達火燄山的邊緣。

\* \* \*

我到片場的第二天，最後一場戲在重拍第五遍。正當傍晚，夕陽把沙漠染成一片橘紅。一個演員騎馬撞上了一根木梁。那是一個柵欄的入口，場景設計師犯了個很嚴重的錯誤：它的高度正好到騎馬人的脖子處。騎到最後一剎那，當那個演員把手舉高時，就撞上了。他是六個奔馳的騎士之一，飾演變了節的唐朝士兵，為了保護一個佛教古物，正企圖逃出一處叫大馬營的綠洲。唐朝（西元六一八到九〇七年）是佛教在中國最鼎盛的時期，同時也盛行優美的詩歌。那個演員重重地跌落在地，動彈不得。四周塵土飛揚，空氣愈來愈冷，日幕低垂照著戈壁沙漠。再也找不到比這時更理想的光線了。

景色也絕佳。火燄山寸草不生，山脊與峽谷此起彼落，隨著夕陽的沉沒，貧瘠山脈左右兩側的顏色不斷的變換——從褐色到紅色，再到灰色。山峰頂端白雪皚皚。山下，柵欄裡到處可見來自戈壁的沙礫。沙漠一直向地平線延伸出去，只有碰到不定時出現的一堆堆鹼土時，才會中斷一下。這樣空曠的一片地方，用來拍片很理想。一九五〇至

六○年代，當中國對外還沒有這麼開放時，電影工作者有時會跑到新疆或其他西部省分去求新求奇，那些帶有異國風味的國片成為外國片的替代品。

現在，電影人再度返回中國西部。這次，他們希望將這裡的景致出口到國外。一年前，《臥虎藏龍》在美國大賣，票房破了一億二千萬美元，片中有些最懾人心魂的場面，就是在這片沙漠取景的，現在大家似乎都一窩蜂跑到西部來拍片。米拉麥克斯投資的動作片《天脈傳奇》，目前正在甘肅出外景。張藝謀導演、外商投資的武俠片《英雄》，外景地一部分設在甘肅、一部分在內蒙古。

在火燄山邊上，哥倫比亞公司製作的《天地英雄》，打算被當成一部中國西部片來宣傳。以中國人的標準來說，這部片子的預算很多——六百萬美元，而且卡司堅強。女主角趙薇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女演員之一，日本明星中井貴一飾演一名反派，最大的新聞是，姜文再度活躍影壇。一年半前，姜文執導的戰爭片《鬼子來了》贏得坎城評審團大獎，但是中國政府禁了該片，指控姜文對國家歷史不敬，從那之後，他不准演出或執導任何大片子。姜文希望藉《天地英雄》重新復出。這部以古代為背景的動作片，照理說不會對共產黨造成什麼威脅。

電影的主題也許很安全，但用來拍片的馬則是另一回事。在拍攝逃脫那一幕之前，中井貴一就騎馬受了傷。一兩個星期之前，一個叫李不空的演員被馬摔下地後手臂脫臼，另一位演員王學圻也摔斷了幾根肋骨。王學圻接長頭髮，戴藍色隱形眼鏡，飾演一個突厥土匪頭子。有位替身至今仍住在哈薩克邊境的醫院，一個負責伙食的工作人員腳踝受傷，連製片統籌都被摔下馬過。三十八歲的姜文在拍用劍打

鬥的場面時，傷了膝蓋和背部，而到目前為止，他算是碩果僅存、還沒被摔下馬過的少數演員之一。

姜文的妻子桑德琳帶著他們的小女兒日前也到了外景片場。桑德琳是位高挑、非常美麗的法國女子，擁有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的宗教人類學博士學位。在拍攝逃脫那一幕時，我正好站在桑德琳旁邊。我們用中文交談：我不會說法語，她講起英文也不是很自在。在重拍場景時，我問她，法國人對姜文拿到評審團大獎有什麼反應，她笑著回憶：「坎城影展之後，我們到法國南部度假。每到一個地方，人們都會認出我們。他們說，喔，我們在電視上看過你們。恭喜！如果我們走進巴黎的一家咖啡館，人們會放下手中的咖啡，來索取簽名。」

那一幕是這樣子的：明亮的燈光，無盡的戈壁，講著帶法國腔中文的金髮女人，導演喊著第五遍重來，所有的人都安靜下來。微風輕吹。最近的城鎮要開一個小時的車跨越沙漠才會到達。片場沒有醫生。那名演員騎馬向柵欄直直地衝去。

\* \* \*

工作人員朝躺在沙地上的演員衝過去。有人喊道，是哈里遜·劉，他扮演著姜文率領的變節士兵中的一員。他試著站起來，卻又跌坐在沙地上，手扶著脖子。

姜文用力拉馬掉頭，勒韁停蹄，迅速地下馬落地。他的臉色很難看——所有的意外和延宕下來，他已經積了一整天的氣。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之子姜文，是個高大、桶狀胸、留著散亂鬍鬚的男子。中國人常說他看起來像個「流氓」：剪得很短的頭髮、凸出的眼睛、堅毅的下巴。他的肩膀很寬，菸不離手。他的聲音深沉而宏亮，每個音都像

是從丹田發出，穿過煙薰多年的喉嚨而出。但撇開「流氓」的外表不談，他是個畢業於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受過專業訓練的電影人。演戲之外，他還執導過兩部評價極高的電影。

姜文幫哈里遜站了起來——還好，他的傷勢看起來不嚴重。他們加入了其他圍著導演何平的工作人員，看著倒帶螢幕，試圖找出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天氣愈來愈冷，天色愈來愈暗。一名穿長大衣的解放軍開始鋸短那根危險的木梁。哈里遜還在揉著他的頸子。

「那一幕得重拍。」何平說。

「我的脖子很痛。」哈里遜說。

「你騎得太快了。」一名演員說。

「你才騎太快。」哈里遜回嘴。

姜文從螢幕前走開。他穿戴著鋼盔、金屬護手、及膝的馬靴，皮護肩和長條紋的盔甲釘在一起。他手持長鞭，臉上的表情看起來像就要爆炸。他轉向助理，怒喊：「給我一根菸！」

那人遞上一包菸，牌子叫雪蓮，包裝上是一朵漂亮的白花。「我操，」姜文罵道，「這是什麼菸？」

「這是本地的菸。」

姜文瞪著那菸，最後還是抽了一根出來。然後他掉頭走人，口中唸唸有詞。他把雪蓮點燃，放進嘴裡，狠狠地抽著。

\* \* \*

跟許多傑出的演員一樣，姜文深諳如何透過角色抓住全國觀眾的心。在改革開放令人振興的初期，電影人以作品歌頌黃土高原：這塊土地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也是安陽和其他黃河流域城市的所在

地。一九八八年，姜文主演了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該片的女主角鞏利後來成為國際最有名的中國女演員。在電影中，女主角拒絕姜文所飾的農民的示好。那男人固執地返回到女人的酒莊，看到姜文到來，她跟雇工們站在那裡，尷尬無言。姜文用挑戰的眼光瞪著他們，姿態中帶著一絲暴力。然後，他轉身往發酵的酒壇中撒尿，一壇接一壇的。最後，他把鞏利抱起，攬在腰上，向臥室跑去。那一整幕，他幾乎沒有說半句話。到頭來，那些酒成為酒莊釀過的最好的一批。鞏利扮演的女主角懷了一子。《紅高粱》不僅得到中國觀眾的青睞，更在國際影展上大放光彩。

五年不到，黃土的熱潮已退。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支持民主的示威雖被鎮壓，但人民的意識卻被喚醒，一股排外的國家主義情緒在中國知識分子之間興起。一九九三年，一部叫作《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呈現一群有文化、有道德、正直的中國移民，如何在老套的美帝國主義者挑戰下求生存。姜文扮演一個努力適應美國生活的移民藝術家。有一幕，他雇了個白人妓女，把紙鈔丟在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一遍又一遍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北京人在紐約》一推出，馬上大受中國觀眾歡迎。

那只是姜文最為人熟悉的角色中的兩個，那兩個角色並沒將姜文綁住定型。那是改革開放時常發生的情況——中國變化得那麼快，很多藝術家紅過一陣子之後，就沒了下文。但姜文還是很紅，他演的角色跨越了不同的朝代。那些年裡，從首位稱帝的秦始皇，到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從太監、農民到警察；從可悲的騙子到小生意人，他全都飾演過。他掌握住某種中國現代男性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與恐懼，他的夢想與不安。

一九九四年，姜文執導了他的第一部片子《陽光燦爛的日子》。故事改編自知名作家王朔的短篇小說，以文化大革命時的北京為背景。歷史電影通常敘述性很強，主角的生活與重要事件的糾纏，然而，帶動《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卻是想像力。該片的初稿是姜文在筆記本上畫的一張圖：一個少年偷看著一群舞者跳舞。電影中，那男孩大多數時候在窺視，或透過一個望遠鏡、或躲在一個女孩的床下偷窺、或窺探他父母的東西。橫掃那個年代的政治運動不見了，標準的文化大革命氣氛——受苦和悲傷，全被青春期的欲望與性覺醒所取代。那男孩，還有他的朋友，基本上是無人管束的，他們的父母都忙於政治運動。那部片子非常賣座，尤其受一九八〇年代出生、年輕觀眾群的歡迎。

跟很多電影一樣，這部片子中也包含了一些借自其他電影的典故，但主要來自共產黨的世界。那群青少年重現了蘇聯宣傳片，像是《列寧在一九一八》中的場景。因為在生長過程中少有接觸，好萊塢對姜文而言似乎很遙遠。一九七〇年代，姜文住在偏僻的甘肅，他父親隨人民解放軍駐守當地。他們住的是個鐵路城鎮，北京來的火車行經該鎮朝西北開去。電影是讓人們瞥見外頭世界的唯一方式。

「我們住在一個像舊穀倉的大房子裡，」有一回姜文跟我說，「門口外就是鎮廣場，每個星期放映兩晚電影。他們在外面放映，我在床上，從窗口就可以看得見。電影讓我很著迷，因為它們是來自像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那些遙遠的地方。我還記得《白毛女》，那真是一部美麗片子。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看過芭蕾舞。我第一次看到拉丁字，是在一部電影裡，在美國士兵的鋼盔上看到U、S兩個字。」

「最主要的是，我記得那些電影裡的每個漂亮女孩。她們通常穿得不多，短褲被剪得很短，衣袖被撕破，腰上繫著一條革命軍服腰

帶，她們站在那兒，像這樣，手上拿著槍。天啊，她們真是漂亮。有一部關於納粹和阿爾巴尼亞的電影，其中有一幕我記得特別清楚：一個阿爾巴尼亞女人，襯衫只扣了幾個鈕扣，正彈著吉他，那之前我從來沒有看過吉他。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她唱的那首歌。」

\* \* \*

在新疆，那場逃逸的戲拍完後，演員們坐進一部小客車，橫越戈壁，在石頭沙子路上顛簸了一個小時。我們全住在中國石油土哈公司的大宿舍裡，該公司正在這區探勘石油。晚餐後，哈里遜的脖子痛得更嚴重，他要去油田公司裡的醫院看醫生。姜文的背部和膝蓋都在痛，決定跟他一起去。王學圻的肋骨也得看醫生，另一名演員也覺得不舒服。結果，我們總共有六個人前往醫院，到達時已經晚上十點多。

有人呼叫了普通內科的副主任曹傑。演員對這麼晚打擾他表示歉意，醫生說沒問題，說他一向喜歡姜文的電影。

姜文脫掉了上衣。曹醫生在他背後用手指壓，問他痛不痛。經歷了一天的挫折之後，姜文看起來終於比較放鬆，跟其他演員開起了玩笑。他的膝蓋又瘀又腫，他用力壓住一個瘀青的部位，然後放了一個響屁。

「這很奇怪，醫生，」姜文認真地說，「我一壓這裡，就放屁。」他再壓了一下，但沒事。「不要緊。」曹醫生說。

曹醫生不停抱怨最近受傷的人很多。過去幾天，一群群演員和工作人員進進出出醫院。那天下午，有個男的腳踝骨折。



「他的傷勢會變得那麼嚴重，是因為他拖了很久才來醫院，」曹醫生說，「你們究竟在那兒幹些什麼？」

「在拍動作片。」姜文說。

曹醫生翻開一本醫學書，指給我們看那人腳踝骨折的地方在哪裡。「他的腳腫得跟饅頭一樣，」醫生說，「我真是不懂，他為什麼不早一點來醫院？」

「我一直說，我們要有醫生在片場。」姜文說。

「跟馬拍片很危險。」哈里遜說。

「你知道真正的問題在哪兒嗎？」姜文說，「特技演員沒有先排練騎馬的戲，就算有先排練，他們也不是專業的騎師，他們的專業是武術特技。」

有個演員拿出一包中南海香菸，問可不可在診療室裡抽菸。曹醫生抽了一根，他們六個人就抽了起來。那個小小的空間很快地煙霧瀰漫。

「我跟你說，我從沒見過這種情況。」醫生說。

「我覺得這是人權問題。」姜文說。

曹醫生幫哈里遜裝了一副頸箍。跟姜文一樣，哈里遜是個大個子，他的女友也是位金髮的外國人，是位比利時人。在中國藝文圈，交外國女友是你很成功的表現。這些女人通常是新進的學院新生，來中國做人類學或社會學論文研究。穿著牛仔靴的哈里遜，一九八九年鎮壓之後得到加拿大的政治庇護，現在是加國公民。他的英文名字取自披頭四。偶爾，他會在加拿大或美國片中客串。一九九一年，他在描述第一批到魁北克的傳教士電影《黑袍》中飾演一個休倫人。如果你仔細看，你會發現那些休倫土著中，有一個看起來很像中國人。哈

里遜還記得他用休倫語講的一句台詞，他跟我說那句話的意思是：「我們不用跟這個白人走。」

幫哈里遜裝好頸箍後，醫生說，他跟姜文都需要做電腦斷層掃描。姜文看了一眼腕上的錶。

「你看，今天已經是十一月十七日，」他說，「蘇聯革命紀念日。」他邊走向X光室，邊哼著《國際歌》。他給我看手機上剛收到的，一個北京談話性節目主持人發給他的簡訊：「我剛找到了盜版的《鬼子來了》。」

「我每天都收到像這樣的消息。」姜文驕傲地說。《鬼子來了》從未在中國上映過，但兩個星期之前突然在市面上出現。姜文露出笑容，「看看剛剛發生的每件事，」他說，「我們受了傷，來了醫院，要去照X光，正好是蘇聯革命紀念日，現在又收到關於《鬼子來了》的消息。這些都夠我們拍成一部電影了。」

掃描過哈里遜的脖子後，一位技師說，看起來像扭傷。曹醫生診斷了姜文的膝蓋和背部的X光片後說，第五和第六根脊椎可能有問題，明天一位這方面的專家可以幫姜文做檢查。差不多已經午夜了，離開醫院前，曹醫生請姜文在他女兒和姪女的三張照片上簽名。那是典型的中國人的照片：兩個嬌小的女孩以讓人吃驚的敵意瞪著鏡頭看。在每張照片背後，姜文寫下：「姜文——第五和第六根脊椎。」

\* \* \*

姜文執導的第二部片子《鬼子來了》，時間場景設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占據中國最後一年的河北鄉下。跟文革時期的電影一樣，對這個敏感時期的描寫通常都是以預設的方式進行的，諸如日本人的殘

暴、普通百姓的勇敢抗拒。英雄的模式，就跟那個把日軍帶進埋伏的牧童王小二一樣，都是固定不變的。

在姜文的片子中，那場戰爭全縮到一個與外隔絕的中國小村莊和一隊日本駐軍裡。電影以床戲開場：一個叫馬大三的農民跟一名年輕寡婦正在風流。突然，有人敲門，一個不具名的中國士兵把一名日本兵和翻譯官送來。兩人是俘虜。馬大三被命令去審問那兩個犯人，還得把他們藏起來，不讓日本駐軍找到。姜文飾演的馬大三覺得責任重大，嚇得請村民們來幫忙。

村民不但沒有幫忙，反而為了芝麻小事爭吵起來：馬大三不該跟寡婦有一腿、村裡最有錢的女人偷藏了多少麵粉。事實上，每個人都是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不是貪心、頑固，就是膽小怕事。那原本打算光榮赴死的日本犯人，很快地失去了自尊，村民對他只剩下同情。後來，他們把他送到日本軍營換取六車麵粉。為了表示慶祝，占領者和被占領者一起坐下來吃一頓，但餐宴被日本投降的新聞給打斷了。在不斷增強的恐懼與羞愧之下，日軍屠殺了手無寸鐵的所有村民。

拍攝《鬼子來了》期間，姜文拒絕使用廢片，如果某一個場景的小部分他不能接受，就堅持這一整段重拍。這在電影業是前所未聞的。據報導，姜文因此用光了中國所有的柯達黑白底片——五十萬英尺。那數量可以拍五部一般的電影。外景地所在的鄉下，坐船才能到，演員得在酷寒裡工作。當地的干擾也是問題，一個村莊起訴那個把土地租給電影公司搭外景的村莊。整部片花了約五百萬美元，是原本預算的兩倍，而且片子長達兩個小時又四十四分鐘。雖然是坎城的贏家，大多影評認為片子需要再次剪輯。《鬼子來了》只在全世界九個國家放映過，在中國，從來沒有人在電影院裡公開看過這部片子。

當我採訪參與過拍攝的人時，因為政治的因素，他們總要求名字不被披露。

來新疆之前，我造訪了拍《鬼子來了》的河北農村。從北京到這裡要開五個小時的車，加上三十分鐘的船，外景地在潘家口水庫的堤岸上。崎嶇的山嶺和已坍塌的長城圍繞著村子裡的十幾棟房子。

整個村莊是為了那部電影而搭建的。中國的勞工和建材便宜，加上沒有專業的場景設計工業，導演乾脆直接用真實的東西來拍片，火燄山附近演員騎馬受傷的事件就是案例之一，那個演員被一根木梁打到腿。在好萊塢，這樣的道具會用保麗龍做成，但在中國，用的則是真的木塊。潘家口水庫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崗石和磚塊蓋成的，壁爐和爐灶都是真的。在一個充滿假的東西——假的名牌、劣質的重建的古代建築、老房子上的新漆的國家裡，這個外景片場卻再也真實不過。有時，它們存在的時間甚至比電影本身還長。

《鬼子來了》已經拍完兩年，沒有人住在這個片場裡，水庫這邊的土壤多石也不適合耕種，但是水庫對岸村落裡的農民，想把這裡變成一個觀光區，他們在入口處設了一個售票口，門票一張約七十五分美元，賣票的人對姜文毫無好評。

「他是個騙子，」老人說，「他原本答應付十萬的土地租金，但他沒付。他們借了些工具也沒還。」

我到了附近那個村莊，那裡有些農民曾出現在電影中。除了專業演員，姜文喜歡用普通百姓，因為那可以改變電影的層次。一位香港電影顧問跟我解釋過，這種策略可以讓電影「少點虛構，多點真實性」。這一點也不假，尤其是對參與拍攝的農民而言。一個叫張福紅的女人驕傲地告訴我，姜文和他的顧問選中了她。「因為我留長髮，他們讓我在一個大場面中出現。」二十五歲的她自豪地說。我訪問她

時，她正在廚房裡包餃子。她說她喜歡姜文，因為他很友善。在電影的一幕重頭戲中，她被日軍殺了。「我是片子最後試圖逃跑的那個。」她說。

回到水庫的路上，我遇到另一個在電影中被殺死的農婦。「我當時有點怕。」她老實地說。她說，她很佩服姜文的高標準要求：「有一場戲他們拍了好幾天，但姜文還是不滿意。」

村民們無人看過那部完整的片子，他們只在拍攝時看到螢幕上的一些片段。村民們對劇情的了解殘缺不全，他們不知道姜文的角色後來也被殺了，因為那些鏡頭是在別處拍的。很多村民甚至不曉得《鬼子來了》被禁演，有個女人說，她不懂電視上怎麼還沒有演，幾個觀光客看起來也很疑惑，他們知道姜文在這裡拍了一部電影，片子出了些問題，但他們並不清楚究竟出了什麼事。

唯一好像知道一切的，是個叫周寶宏的十二歲男孩。到鄉下旅行時，我有時會遇到像他這樣的小孩：很會說話，消息靈通，對村莊以外的一切特別感興趣。一旦看到外國人出現，這樣的孩子馬上會黏上去。必然地，他們會滔滔不絕跟你說最近一次的考試成績，進一所好高中的機會有多難。如果我把電話號碼留給他們，他們會好幾個星期，有時甚至好幾年，定期打電話給我。那些小孩總是讓我想到威利。

周寶宏身穿一套髒髒的藍色西裝，利用週末到舊片場當導遊賺點外快。我雇用了他，他帶我看了所有廢棄的房子和道具。他知道每件道具要花多少錢——他指著一株用水泥做的假樹，製作費花了六百塊人民幣，加上二百塊運費。在長城上多加的那個堡壘花了十萬（姜文對真的長城不滿意）。男孩帶我到片中姜文的家，我們在一片小空地上

逗留了一會兒。「這就是那個大屠殺的地方，」男孩嚴肅地說，「所有的村民都死在這裡。」

我問他，電影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姜文沒有通過國家文化部的允許，」男孩說，「就自己跑到法國去，贏了個獎，所以我們的政府就把它給禁了。」男孩還沒有看過完成後的片子，但他說，他知道被禁演的原因。「村民沒有抵抗，」他說，「紅軍、工農紅軍、游擊隊全沒出現，電影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 \* \*

姜文在坎城贏得大獎後，中國政府保持沉默——在中國，這是不祥的預兆。政府從未正式宣布禁演該片，但有兩則神祕文件還是流傳到網站上。假設它們真是從電影部傳出來的，其中一則標題為「第二十八期簡報」，提到政府「暫停姜文在中國從事任何與電影或電視有關的活動。」

在中國，所有電影都必須送檢兩次：第一次是劇本送檢，第二次是在片子拍完後。第二則流傳的文件：「電影審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二十處姜文未經允許而更改劇本拍攝的地方。床戲不妥：「強烈的畫面和曖昧的聲音，以粗俗的方式刺激感官。」委員會對片尾國民黨接管戰後的中國，而村民並無抗拒的描寫，也不滿意：「嚴重扭曲歷史，沒有達到批判嘲諷國民黨的目的。」

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出在電影中村民的被動。文件中指控，片中有場戲，村民給日本犯人和中國漢奸好東西吃：

它客觀地呈現即使是在生活那麼艱困的戰時，中國百姓不但  
不恨日本侵略者，相反地，還盡其所能滿足他們的需求.....這嚴重  
違反了歷史。

審查制度是個奇怪的東西。在北京，有時我會發現盜版的DVD上  
面用英文寫著「中國禁演」作為廣告。沒有人可以真正管得住盜版  
者，即使是像《鬼子來了》這樣的片子，最後也還是在市面上出現。  
電影人對審查這個議題反應冷淡。一位年輕導演跟我說，電影部門的  
官員讓他想起自己的祖父母——衰老了的權威，需要他的保護。

建國半個世紀之後，共產主義的許多特點變成這樣的東西：黨有  
權無威，人民忍受而非懼怕它。電影部門的壓制常是消極的抵抗，沉  
默是一種有力的武器。他們不發表官方聲明，從未告知姜文被禁演的  
時間會有多久。事實上，那些官員根本拒絕跟他見面。目的很簡單，  
讓他擔心地等待。

電影被禁後，姜文多次跟外國記者提到，那是個戲如人生的例  
子：坎城得的獎就像電影裡的犯人，是個只會帶來麻煩的東西。他  
說，審查讓他想起文化大革命。聽在很多中國電影界的人耳裡，這樣  
的論點很不適切。姜文一直有敵人——魅力和名聲讓他具有一定的影響  
力，加上他暴躁的脾氣和頑固的性情。現在他激怒了政府，其他電影  
工作者擔心管制會因此而變得更嚴格。一位北京的製作人告訴我：  
「如果他公開堅持自己什麼也沒做錯，那會傷害到整個中國電影  
業。」

有一陣子，姜文以身為一名被壓抑的藝術家為榮，但他的態度不  
久就改變了。他的一個朋友跟我說，姜文私下承認他給自己惹了些麻  
煩。最後，他不再發表激進的言論。沉寂了一陣子後，他開始嘗試掙

脫限制，參加了一兩個電視頒獎典禮。之後，他跟一位新手導演合作，演了一部低預算的片子，最後他簽下《天地英雄》的片約。之前，他從沒演過動作片，看得出來他也不是很喜歡，但用動作片在政治上恢復名聲有其必要性。新疆是他從被放逐回到影壇的第一步。

\* \* \*

在新疆的某個晚上，經過一整天漫長的拍片後，我在姜文的旅館房間訪問了他。我問他，觀眾應該怎麼詮釋《鬼子來了》這部片子裡的歷史觀點。姜文小心地往椅子後躺去——他的背還在痛，點了一根菸。

「我從沒說過這部電影是用來表現歷史的，」他說，「我相信一個導演要表達出他內心裡的东西。這可能跟傳承有關，我出生的地方離河北那個村莊很近，所以，我心裡有很多關於當地歷史的东西。從某個層面來講，這部電影是自傳式的。」

我提到有些影評認為電影不夠真實，因為它並沒有把中國人描繪成戰爭的受害者。

「我同意中國百姓是受害者，」他說，「但我們自己也有錯，我們應該拿面鏡子看清自己，想一想為什麼我們會變成受害者，你不能單是指著別人說他很邪惡。你不能光指著林彪，或是江青，或是日本人，事情不是那麼簡單的。」

他抓了抓散亂的黑鬍鬚。他穿著舊運動褲和Nike運動鞋，眼睛看起來很疲倦。

「把中國想成一片田，」他繼續說，一隻手做出手勢，像是在旅館的地毯上插秧，「國民黨、共產黨、林彪、江青——全都是田裡的種



子。他們長成不同的樣子：有些長得好，有些長不好，有些變得很壞。日本人來的時候，你可以說他們已經很壞了——他們是法西斯主義者。為什麼他們在日本人來了之後變得更糟？我們中國人得談一談這點，因為這麼多不好的東西，後來變得更糟。」

「大多數人說得很簡單，因為『他們是壞人，我們是受害者。』但歷史跟一個人的人生是一樣的。我有朋友說，我應該去電影部工作，這樣一來，那個機構會變得比較寬容。我告訴他們，那只會讓我變成一個爛人。如果你的門口有個看門的，那看門的變得很壓抑，這跟那個人無關，而是那個體系、那個環境所致。」

他告訴我，許多中國人需要心理諮商。「人們應該多花點時間看自己的內心，一個人跟歷史其實沒什麼不同——我的意思是，一個人自身的歷史是巨大的。一個個體可能比一個社會更複雜。但中國人沒有時間去做那樣的自省，每個人都太忙了，沒有足夠的安靜時間去自省。在遙遠的過去，這國家很和平穩定，但現在一切變得這麼快。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這樣，或某個程度上來說，過去二百年都是這樣。我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們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路。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就試過，有些人試著從自我的傳統裡去找，有些人往國外找，分歧至今仍然存在。」

他繼續說：「毛主席是個最好的例子。他常說，他不喜歡中國歷史。共產主義一開始會那麼成功，就是因為不走傳統路線。但後來毛用傳統的表達方式去反對舊的東西，因此他變成了一個傳統的帝王。並不是說是他一定要這麼做，他只是不知道其他的方法。他是個悲劇人物——中國歷史上最悲慘的人。他就像一粒種子長得很高，但長歪了，因為種子無法克服土壤的問題。」

我問他，這個問題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你必須改變土壤。」姜文說。

房間變得安靜。他停下來點了另一根菸。「我要拍一部有關毛的電影，」他接著說，「毛比哈姆雷特更具悲劇性。毛是一個有藝術性的人，而不是一個政治性人物。他應該是個詩人或哲學家，他應該從事創作而不是搞政治。」

姜文笑著承認，這樣的一部電影目前是不可能拍成的。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執導——他還在探試著政治的氣氛，一步一步地。但他對毛澤東這個角色依然很著迷。「我想，毛跟每個中國人都是有關的，」姜文說，「他代表了很多中國人的夢想，也代表了很多中國人的悲劇。」

\* \* \*

外景場地總是吸收了周圍世界的人，有些場景拍的是纏著頭巾的突厥戰士。下了戲，演員們叫這些臨時演員為「塔利班」。除了這類笑話，你很難想到有一場戰爭正在新疆的另一邊進行著。就像我跟波拉特的朋友曾經見面的事，感覺也非常遙遠，唯一提醒我的是那一疊疊百元大鈔。

拍片期間，我們很少見到維吾爾人。漢人經營油田公司，電影中騎馬的臨時演員（那些「塔利班」）其實是哈薩克人。大馬營的戲是在一個維吾爾人居住的小綠洲裡拍的，但他們全都迴避開了，去照料他們的二百隻羊群。一天下午，我造訪他們的家，訪問了一個二十幾歲的維吾爾年輕人。帶著睡意的他告訴我，他喜歡姜文，不過還是偏好美國電影——《龍捲風》、《魔鬼終結者》以及任何阿諾·史瓦辛格演的電影。他說，他很喜歡《鐵達尼號》船斷成兩半的那一幕。

當我問導演何平，美國西部片跟中國西部片有何不同，他的答案很圓滑。「西方人講的是把文化帶到西部，」他說，「把一種文化帶到另一個地方，把法律與秩序帶到西部。中國人的西部片則完全不同，它是關於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他還告訴我，為了讓電影看起來更「後現代」，他找了個光頭的演員來演和尚。

他們用了一個替身來代替哈里遜。醫生說他暫時不要騎馬，得趕緊復原，才能演下一場被「塔利班」（飾演突厥戰士的哈薩克人）殺死的戲。他將在一箭穿心、膝蓋又中了一箭下喪生。好幾個月之後，當我在電影螢幕上看到那場戲，我馬上想到《黑袍》裡的那個休倫人。

\* \* \*

在外景地的最後一天，我搭著姜文的私人小客車離開了當地。那天下午，帶領駱駝隊越過戈壁的戲花了他一些時間。哈里遜的替身走在隊伍後面，好讓人不會注意到他。

車子在變暗的沙漠上顛簸而行。沒有樹、沒有草，除了平寂的地平線，周遭空無一物。我問姜文，他最喜歡的電影是哪些，他告訴我，當他年輕時，曾有十年之久，一再重複地看一部叫《蠻牛》的片子。

「我看那部電影，」他說，「不止是把它當美國片、或是一部拳擊電影來看，我覺得它好像在說我的家鄉。」

我問他看的那個拷貝有沒有中文字幕，他搖搖頭說：「我只了解十分之一，但重點在於看那個片子，了解那種心情。我喜歡那些陰

影、那些黑白，我喜歡那個氣氛。我也喜歡勞勃·狄尼洛，因為在那部片子裡，他讓我想到我的母親。他的氣度與姿態讓我想到她。」

我有點小心地問：「你的母親是什麼樣子？」

「要解釋起來太複雜了，」他說，「那是我將來要拍的另一部電影。」

小客車向前跳動。太陽低垂，接著不見了。遠處的油井燒著暗橘的火燄，姜文的菸發出同樣的顏色。他談到鼓勵過他的外國導演——他見過馬丁·史柯西斯兩次，《錫鼓》的導演沃克·雪朗多夫幫他找過第一部電影的資金。姜文努力地想解釋出他對拍片的熱愛，最後他指著手上的菸。

「就像抽菸，」他說，「我需要拍片，就跟我需要抽菸一樣。」

剛開始，我不太確定他的意思，拍電影跟抽菸一樣會上癮？是一種他不能否認的必然？或者是一種不管是透過名氣、審查制度或馬匹，他都注定要走的專業？然後，我注意到他臉上的那抹笑容——那是我在他堅毅的表情上所見過的最甜蜜的笑容。我有了答案：上面說的那些，他全喜歡。

## 第十九章 選舉

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一日

當年參與安陽殷墟挖掘的考古學家中，目前僅存一位。一九三六年夏天，石璋如帶領的工作團隊挖出了史上最大的甲骨文穴窖。第二年，日本占據南京，國民黨西逃。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被共產黨逼退到台灣。那是石璋如的一生——一位流浪的考古學家，隨著戰爭不斷遷徙。對一九三六年六月、那一季最後一場挖掘發現的那批甲骨，石璋如後來有深刻的描述：

確實，事實比我們想像的更奇妙，發現的樂趣遠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大。

安陽的考古學家跟我提過石璋如之後，我打電話到台灣的中央研究院。一位助理接的電話。「他今天可能要下午三點才會進來。」她說，「他這個星期有很多會要開。」

我向她解釋，我打算去台灣一趟，這樣的行程要花時間；中國和台灣沒有直航，旅客必須在香港轉機。我問石教授下個月會不會有空接受訪問。

「噢，我相信他會有空的，」她說，「他每天都在這裡。」

「妳說的是一九三〇年代參與安陽遺址挖掘的那位石教授嗎？」

「是啊，沒錯。」

「他還參加會議？」

「只有當訪客來的時候，這個星期我們有一些大陸來的客人。」

「他今年幾歲？」

「他今年剛過一百歲生日。」

「他的健康狀況怎麼樣？」

「很好！」她說，「他有隻眼睛有點問題，聽力也比較差，除此之外都很好。他每天都來上班，就跟我們其他人一樣。你可以說，他是我們院裡最老的一位同事。」

\* \* \*

用西方的算法，石璋如是九十九歲，但以中國人的算法，人一出生就是一歲。石璋如是河南人，在那裡初試啼聲，但從一九四九年至今，這位考古學家就再也沒有回過中國。遷居台灣之後，石教授專注於整理、分析和發表他所有舊的研究筆記。那是一個虛擬的考古：如果你再也不能在安陽從事挖掘，你至少可以鑽研從安陽帶來的筆記。二〇〇一年，九十九歲高齡的石教授出版了他的第十八本書：《侯家莊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當我到他的辦公室拜訪時，他自豪地送一本給我，並用他顫抖的手，在書上寫下他的名字和日期。書中的內容是六十多年以前的研究。

他的書桌就像那些為了紀念一位已逝的名作家而陳設的靜物：一本老舊、皮裝的筆記本攤開著，泛黃的紙頁上是一座墓葬的水墨素描圖：兩個前傾的骨骼，以及一個圓形器皿。這本筆記是一九三六年記錄的，旁邊放著一篇石教授在一九七〇年代發表過的文章：〈殷代戰車研究〉。（在安陽，石教授挖出、並且分析了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一些戰車。）已經用舊了的工具陳列在桌上——放大鏡、尺、丁字尺。

除了幾張電腦印出、列著各種牌子的數位相機照片，桌上每件東西看起來都很老舊。他的助理說，教授想知道哪款相機最有助於他的研究。

老人的體重不到四十公斤，雙頰癟陷，細微白髮，抓著柺杖的手指瘦如蜘蛛。由於白內障的原因，他的右眼通常是閉著的，只有在興奮的時候，那隻眼才會半開閃爍。他講話仍然帶著濃重的河南腔，有時候，他的助理得在他耳邊重複我的問題，但老人總是馬上回答。因為他的記憶力又快又準，他的年輕同事稱他為「活字典」。只要我一提到某個古文物，他馬上記得它是哪一年、哪個地方出土的。跟每個在台灣的人一樣，老人記事件的時間是從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建立的那天算起。傳統上，中國的每個朝代都是從建朝時開始紀年，雖然共產黨廢除了這個系統，但台灣依然採用。那是他們版本的「主曆年」，一個神聖的參考起點。石教授跟我說，那個甲骨穴窖是在「民國二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發現的。六月的那個星期，他們挖出了一塊藏有一萬七千七百五十六塊甲骨片的泥團。

當我提到陳夢家的名字時，老人閉著的眼蓋跳動了一下。

「我記得他，」石教授說，「我們是在昆明的聯大認識的。他很聰明。不過，我跟他不是很熟。他不在中研院教書，那可能也是他後來沒有跟我們來台灣的原因之一。我聽說他後來被共產黨給殺了。」

\* \* \*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盡一切努力保護甲骨和其他古文物，不讓它們落入敵人之手。他們捆裝一噸噸的歷史遺產，搬上火車、卡車或船，永遠早敵人一步把它們運到安全的地方。戰爭結束後，國共內戰

繼之而起，這時，在象徵性的意義上古文物代表著更高的價值。國民黨以身為正統的繼承者為傲——該黨係由孫中山所創立。因此，當政黨的力量愈弱時，保護中國的過去就變得愈形重要。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之間，當國民黨最終退守台灣時，把歷史文物一起運走成為最重要的事。那時的考古學家有兩條路走：或是跟著最好的古文物跨越台灣海峽，或是待在有著完整古文物遺址的中國。

國民黨宣稱播遷台灣只是暫時的，他們相信總有一天榮歸中國，而美國和其他國家也繼續承認台灣為中國的合法政府。接下來幾十年，台灣繼續在聯合國派駐代表，跟其他國家一樣，聯合國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奧運會允許台灣運動員持中華民國國旗參賽，共產黨曾經杯葛奧運會二十幾年。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中國的影像變得愈來愈奇怪：它是一個據稱由少數流亡者統治的大國，但事實上卻是擱淺在南中國海邊緣的一座島嶼。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訪問北京，踏出美國承認中共的第一步。季辛吉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台灣不該遭受即將發生在它身上的事。」那年年底，台灣被迫離開聯合國。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跟中共簽下《上海公報》。在那份文件中，美國認識到「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堅持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某個程度上，這個態度是沒有爭論性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都非常堅持台灣和中國互相屬於彼此。但對由誰來統治這個想像中的統一國家，雙方的看法卻有很大差異；而美國則試圖著在這個概念的周圍定位自己。一九七九年，美國正式與中國建交，國會也通過《台灣關係法》，該法確立台灣的未來必須透過「和平的途徑」來解決。台灣一旦受到侵犯，美國持有保護台灣的權力，他們也持續銷售軍備武器給台灣。



過去一段時間裡，兩岸局勢維持穩定，但台灣的尊嚴不斷地受到侮辱和打擊。被聯合國和大多數的國際組織擋在門外後，這座島嶼眼看它的盟國一個個溜走。到了二〇〇一年，承認台灣的國家不到三十個，而且是一種悲哀的、不得已的聯盟：邦交國是像布吉納法索、聖多美和史瓦濟蘭等小國。台灣可以派選手參加奧運，但不准帶他們的國旗進場。在亞特蘭大奧運的一場桌球賽中，美國官員用手銬帶走一位台灣球迷，只因他搖舉他的島國旗幟。

但台灣還是擁有歷史古文物的那方。不管在國際上受到多少屈辱，台灣人應該為他們在中國遺產的保護工作上做得比共產黨好太多而驕傲。國民黨蓋了美麗的建築，像是故宮博物院，作為一些最精緻的中國古文物的展示地。而且他們提供優渥的考古與歷史研究經費，讓像石教授這樣的學者，可以花上幾十年的時間鑽研他的筆記。

石教授的辦公室位於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位年輕的考古學者帶我參觀了那裡的收藏室。室內有空調裝置，而且保持得很整齊：古物被小心地整理過，收在抽屜和箱子裡。青銅器從商代以降一堆十個排開。地上立著一尊從安陽某王陵中挖出的、九十公斤的青銅鼎。室內還有兩大箱一九三六年發現的甲骨片。年輕的考古學者拿起一片被三千年前的占卜者燒黑的龜殼，幫我以口語直譯出上面的兩行刻文：

在這段時間，國家會很順遂。

在這段時間，國家會很不順遂。

架子上還陳列著一部古董一樣的皇家打字機、一把量尺、一個軟尺捲，還有一個勘測工具，上面的老式標籤寫著：KEUFFEL & ESSER CO., NEW YORK。年輕人告訴我說，它們是石教授在安陽用

過的東西。他的挖掘工具也變成了古物，跟青銅器和甲骨片一起被分類、保存在同一間儲藏室裡。

\* \* \*

石教授跟我說，遷移到台灣的決定不難。「我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從南京過來的，」他說，「在之前我原本就像難民一樣，遷來遷去有八、九次，到台灣只不過就是再遷一次而已。這樣想吧，如果有人把你正在研究的資料、你一輩子工作的東西全搬走了，你怎麼辦呢？」

一九九〇年代，中國的考古研究所曾經邀請石教授回去參加會議，他考慮自己的年紀太大不適合旅行而回絕了。但他還是很跟得上最新的考古資訊，當我問他有沒有聽過最近在安陽挖掘的地下城市，他很快地回答：「那是唐際根主持的。」老人說：「他們告訴我還在研究階段，但是他們發現了一片很大的城牆，他們想那可能是座城市。我們從來沒有挖過像那樣的東西，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去挖掘、研究那樣的城牆。」

他停了一會兒，然後用那隻好的眼睛看著我：「北京沒有城牆了，對不對？」

我告訴他，共產黨拆了它快四十年了。

「但是西安還有城牆，對嗎？」

「是的。他們把它保存了下來。」

他再度停下來，好似正把腦海裡的印象轉到安陽和那座地下城市。他的右眼依然闔著。「喔，我們以前沒有機會去研究像那座牆那樣的東西，」老人說，「我們在那裡做了一些調查工作，但是從沒發

現那道牆。小屯的發現就夠我們忙了。他們現在有足夠的時間在那裡做調查。當然，我們在那裡的時候，它只是一片鄉村，還沒有機場。」

他對那個遺址的熟悉讓我很驚訝——那個機場是日本人蓋的，當時石教授已經離開去了西南。很久以後，當我回到中國，跟年輕的現任安陽考古工作站站長唐際根提到與石教授的訪談。三十多歲，畢業於倫敦大學研究所的唐際根，是中國考古界的明日之星，他跟石教授從未謀面。有一回，唐際根原本計畫去參加一場在台北的研討會，但是因為台灣拒絕發給他簽證而作罷。石教授對目前調查狀況的熟悉，他並不驚訝。唐際根告訴我，他曾把地下城市的地圖傳真到台灣，好讓石教授能跟得上新發現的步伐。那種不同年代之間的聯繫，是虛擬考古學的另一種典型：年輕人在安陽，瀏覽著泥土；年老的流亡者在台北，讀著傳真來的繪圖，想著那片被他拋棄多年的田野。

\* \* \*

石教授的太太跟我們會合去吃午飯。八十五歲的石阮馨是位優雅的女士，有著一頭完美的梳理過的白髮。她耳聰目明，吃飯時不斷注視著一支鮮黃色的手機，還用筷子幫丈夫挑選適合他的東西吃。

老人身邊的每個人都對他很殷勤——在中研院，他有兩名全職的助理，年輕的考古學家談到他，都帶著一種溺愛的柔情。你很容易把他看成像福神一樣的人物，在二十世紀中葉從中國遷來台灣的那些人眼中，他代表著與那個變得感傷的年代的一種聯繫。他的身體如此羸弱，相較之下，他那清明的記憶變得像商朝甲骨一樣，有如神喻。每

次我們談話，我得提醒自己這些不是普通的故事，他在追憶的是一段被政治和歷史永遠打斷的生命。

那個星期正值選舉，午飯時，年輕人談起前一天在一場競選大會上發生的衝突。他們都很興奮——年輕的台灣人喜歡談政治。石阮馨皺眉說，她不喜歡談這些東西，她的丈夫表示同意。

「我研究的是古代，這反而使得現代的事件看起來很遙遠，」他說，「我對它們的了解愈來愈少。我會收聽新聞，但不是很經常。」

他說，他喜歡看像《大陸尋奇》這樣的電視節目，因為它介紹了他年輕時就知道的地方。我問他，如果他去投票會投給誰，他聳聳肩。「我也不知道，」他說，「星期六是我太太的時間，她決定我們星期六做什麼。」

我問：「假如你去投的話，你會投給誰呢？」

「我還沒想過，」他說，然後他笑了一笑，「再說，那是祕密。」

石阮馨抱怨老人沒有多吃一點。午餐快結束時，我問他，他們是哪一年結婚的。

他抬起頭來，沉默。那是第一次，教授記不得某個日子。他喃喃自語，算著年歲，他的太太插嘴。「民國四十四年。」她說。

「所以，那是在你們來到台灣以後？」

「是啊。」她答。

\* \* \*

這座島的歷史是由外來的人層層堆積而成的。土著居民從石器時代就存在。十七世紀時，來自海峽對岸的移民大規模地遷入島上定

居。該世紀下半葉，清朝正式把台灣劃入版圖，但是並沒有管轄得很緊。它變成一個貿易和前線防禦的基地，移民大多來自對岸的福建。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連連戰敗後，滿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簽訂這項條約的清朝大臣解釋說，這個割讓不算太糟，因為台灣的「男女毫無用處，對朝廷也沒有感情。」）日本統治台灣直到二次大戰結束，那段時間，台灣叫作「福爾摩沙」。日本人不像在占據南京或其他中國城市時那麼短暫而殘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時間長達五十年。日本人在島上鋪路、築鐵路、建設其他基本民生設施，他們辦的學校則訓練台灣本地精英得以成為帝國的一分子。即使在今天，很多台灣人對日本人仍持著正面的評價——那是一種跟中國人完全不同的看法。

日本投降，國共戰爭之後，國民黨把另一層殖民主義帶到台灣。蔣介石的政府剛遷到台灣時，跟著他前來的人跟原有的台灣人比較起來並不算多，但是他們統治嚴厲。除了施行戒嚴，國民黨並實施「報禁」和「黨禁」，把政治異議者逮捕下獄。受惠於自由市場以及跟美國的緊密關係，台灣的經濟蓬勃發展。但隨著時間過去，美國對自己的角色愈來愈感到不舒服：美國軍隊保護著台灣，也給予台灣貿易優惠，但國民黨所表現的，跟美國自認看重的政治理念完全不一致。

一九八〇年代，美國官員對國民黨施以改革的壓力。在壓力之下，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成為一種在獨裁小國裡很罕見的人物，他沒有為自己的系統鋪路——這自然是一條失敗之路。一九八七年，國民黨解除戒嚴，兩年後，允許反對黨合法化。接下來的十年，民進黨成為國民黨最強的敵對政黨。民進黨的支持者大多是對「一個中國」沒興趣的台灣本地人，一九九九年，他們的黨綱開始將台灣形容為一個獨立國家。二〇〇〇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贏得台灣總統選舉。

隨著政治轉向本土，台灣人對文化和歷史的看法也轉變了。台灣人開始強調島嶼的本土歷史，而非傳統、中國的朝代傳承，歷史課本也以台灣的觀點重寫。學校開始教從前被教育機構禁止的台語。這個島嶼開始紀念起自己的敏感日子：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國民黨為了鎮壓反政府的抗議，屠殺了上千名台灣百姓。

在某方面，台灣人看歷史的眼睛，基本上還是很中國的：傾向於把自己看成是受外來侵略者誤解和傷害的無辜受害者。這種看法基本不變，唯一不同的是，現在，侵略者不再是日本人、英國人或美國人，而是共產黨以及從中國過來的國民黨。台灣人變得把歷史去中國化了。

他們那種操作民主的方式，也讓美國領導人很緊張。隨著民進黨的掌權（二〇〇一年時，他們贏得總統職位，但是在立法院還沒有拿下多數席位），他們對獨立的主張也愈來愈固執。民進黨權勢人士威脅要用人民公投來解決這個議題。共產黨清楚回應，將採取軍事行動來對應這樣的投票。雖受制於當年的承諾，但美國還是把話說得很清楚：即便採用美國式的公投來決定獨立與否，美國也不會支持台灣人的任何挑釁行為。

民進黨變成很會用台獨主張去挑釁共產黨，共產黨的反應通常也出手很重，比如像是選舉前在海峽對岸進行飛彈測試。這樣的動作通常導致了反面的效果，只是幫主張台獨的候選人贏得了更多選票。很難看出民進黨的策略中，哪些只是選舉的花招。在台北，當我拜訪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田欣的時候，他給我一份題為《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中的位置》的英文官方文件：

民進黨打算如何面對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呢？台海的衝突是否無法避免？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解釋民進黨是如何看待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首先，我們了解台灣的地理位置不能被移動。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提到這個事實很好笑，沒有任何地表板塊能夠被移來移去。一點也沒錯，認識這個事實，對我們在規劃中國政策上是非常有意義的。

如果中國和台灣之間有相當的距離，台灣可以有比較多的自由和空間。但是，這個在地理上靠近中國的現實，使得台灣相較之下選擇比較少。

「如果中國的領導人能多一點自信，真的會很有幫助。」田欣告訴我，「基本問題是，他們以前被欺侮過，所以當他們看自己時，並不自認是一個很好的國家。如果你有自信，你就不會擔心台灣離開，你就不會擔心日本人從前對你做了什麼。問題在於，中國始終不覺得被尊重。」

他所說的，很容易讓人聯想是在描述他自己的政黨和島嶼。受辱多年之後，台灣好不容易才脫穎而出：它是華文世界中唯一真正民主的社會。不過，它的每次選舉，對岸都密切注意。而更深層的問題是：做或不做中國人，其意義在哪裡——這是個無法用投票來決定的複雜議題。你可以選自己的領導人物，你可以寫自己的歷史，但人類的心理跟地表板塊一樣不可移動。

\* \* \*

選前第三天，我開車去新竹參加民進黨的一場選舉大會。從台北南下，高速公路有好幾段跟箭一樣筆直：當初設計的用意是，萬一共產黨轟炸機場，它可以作為一條臨時跑道。新竹看起來還是很繁榮——從事高科技生產的工業園區規模很大，但台灣整體經濟正陷入空前嚴重的不景氣。二〇〇一年時，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下滑，失業率每月提高。工廠和工作機會成群流失，出走到勞工較為便宜的中國。

台灣在中國的投資不斷成長，為兩岸關係增加了一個新的層面。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聯繫一直是共產黨用來拉進台灣策略之一：成立經濟特區的一個很明確的目標，是要讓「台灣回歸祖國」。二十年後，這看起來可能是中國對台策略中唯一成功的一項。中共的恐嚇和威脅從來沒奏效過，但它的經濟力量卻讓台灣愈來愈難以忽視。

選舉結束後，我跟新竹市副市長林正杰見了面。他要我叫他傑克。跟我在台灣遇到的每個政治人物一樣，他馬上答應接受訪問。台灣人很快地適應了新聞自由，不像中國人那樣害怕外國記者。

林正杰的父親曾經是國民黨特務。一九五六年，台灣政府派林父從香港偷渡入境中國，到江西設立一個祕密廣播電台。任務既危險又困難，林父不到一個星期就被逮捕了。共產黨把他關在南方一個監獄一段時間，後來又把他送到青海的勞改營。在台灣，國民黨跟林家說他被殺了，但他太太不願改嫁，她總是告訴林正杰和其他三個孩子，他們的父親有一天一定會回來。那時林正杰只有四歲。

收到父親寄來的第一封信時，林正杰二十七歲。他父親還活著，而且已經出獄，暫時待在福建鄉下，試著說服中共讓他回家。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中共同意了，但現在問題卻出在國民黨這邊，他們擔心



林父變成了雙面間諜。最後，兩邊終於同意交人，一九八三年，林正杰的父親回到了台灣。

他正好趕上見到他的兒子介入政治麻煩。林正杰成為民進黨早期的領導人物之一，以善於組織街頭運動著稱。他在獄中待了一段時間。他的父親雖然是個堅定的國民黨支持者，但還是對他抱有同情。

（「他告訴我，去做我相信的任何事。」）知道父親曾經歷過更糟的事，這位獄中的年輕人學著往好處看。（「那並不是太糟。我可以讀書，而且不用接電話。」）

雖然很早就獻身民進黨，但林正杰在一九九一年退出該黨。他不喜歡台灣政壇充斥的亂象——一如很多經驗不足的民主國家，這島嶼經歷過政治分裂，目前它有五個主要的政黨和一些更小的政團。人們常常依照他們的祖先什麼時候來到台灣而決定選誰；民進黨迎合本土，而國民黨吸引的則是那些家人在一九四八和四九年之間來台的民眾。

林正杰也不同意民進黨推動台灣獨立。他跟昔日盟友保持良好關係，但並沒有正式加入任何政黨。他是位次要城市的官員：小個子、開始禿頭、留著短鬍、有著小腹的男人。他父親在一年前過世了。

「如果我的家族在台灣已經八代了，那我會比較傾向支持獨立，」林正杰告訴我，「你必須先看看人們的自身經驗，才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反應。這些外省人被放在台灣是因為一個歷史事件。它的結果是我們有機會建立了民主、成為一個妥善運作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可以說，這也是對岸中國人的使命。如果我去看中國的偉大領導人物——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他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都要把中國現代化。但是，所有這些領袖最後都失敗了。鄧小平有一些成就，但沒有完成。所以那變成我們的使命。台灣是一個試驗性的地

區——是給中國的一個試驗。因此，即使我們只是個小島，我們的民主對中國的未來也很重要。」

他話語輕柔，沒有中國知識分子在跟外國記者講起歷史時，有時流露出的那種高傲。中國人常愛吹噓他們的歷史有多長，但對現狀又非常謙卑。他們也坦然承認：經過了上千年，他們還是無法找出讓中國可行的好辦法。他們還在嘗試——試驗的城市，試驗的島嶼。只要再給我們一點時間——中國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覺得蔣經國跟鄧小平很像，」林正杰繼續說，「兩個人都真的有遠見。他們不是很有政治魅力，但都很實際。你也知道，他們個子都小小的——講求實際的矮個子。我們需要多一點像那樣的矮個子。」

\* \* \*

那場選舉，沒有任何政黨獲勝。第一次，國民黨失去在立法院的獨占控制權，而民進黨雖然拿到席位，但不夠成為多數黨。四個最大的黨必須在彼此之間找聯盟。

選舉結果揭曉的那天晚上，我參加了剛當選的無黨籍立委陳文茜的記者會。陳文茜是本土台灣人，曾經是民進黨的創始黨員，但在兩年前退出該黨。她的形象鮮明豔麗——是一位著名的評論節目主持人，也是島上最受爭議的政治人物之一。她的競選海報系列，是把她的頭像放在四位知名外國人身體上的四張照片。其中三位是西方代表人物：蒙娜麗莎、伊莉莎白女王、柴契爾夫人。第四張是留著鬍子的陳文茜，包裹著頭巾，右手食指朝上指：賓拉登。

她年輕時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子，如今以毫無保留的反抗態度面對中年。記者會上，她穿了一件低胸黑禮服，頸上載了一串繞了兩圈的珍珠項鍊。她的頭髮染成紅色，假睫毛幾乎有五公分長。在攝影記者的燈光下，她臉上的厚妝發出淡橘色的光。

很難想像有任何勝選者跟陳文茜一樣，對剛剛獲勝的那場選戰表現出如此少的敬意。記者會之後，她告訴我，台灣的憲政鼓勵當選的公務員建立狹隘的支持基礎，因為在一個被分割的政治領域中，這樣做是自然而然的。在她看來，台灣模仿到了民主的樣子：有選舉大會、有政見發表，但缺乏真正民主的價值與透明度。

「這是全世界上最荒謬的系統，」她說，「憲政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傳統，但是在第三世界，它並沒有同等的價值。在台灣，民主變成了第三世界經驗的又一個悲劇。對第三世界的每個國家都一樣，民主指的不是統一，而是一個被用來分裂國家的政治工具。政府要不就買票，要不就用低級的招數取悅選民。他們只在乎自己的那三分之一選民，不管其他的人。」

她繼續說：「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們實行的不是傳統的歐洲民主。第三世界領導人的基本想法，是要設計一個他們可以確保權力的憲政。在美國，憲法的重要性勝過選舉產生的領袖。但在台灣不是那樣，在印尼不是那樣，在菲律賓也不是那樣。」她的英語說得非常好，她擁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紐約新學院大學的學位。當我問到她的競選海報時，她笑了。

「那是一種模仿藝術，」她說，「我喜歡伊莉莎白女王，因為她把英國變成一個重要的國家。把我的人像做成蒙娜麗莎的樣子，是因為她是一個年代更久遠的女人，但看起來還是如此驕傲。那是三年前

設計的，當時我四十歲，逐漸發胖，我得面對自己不再有好身材的事實。」

「我喜歡柴契爾因為她是個很強的領袖，一個像男人的領袖。我想看看如果我扮成男人的樣子，人們會有什麼反應。至於賓拉登——我只是好奇，如果把我的臉放在他的頭上，會是什麼樣子。他是一個恐怖分子，但是，他也表現出一種對西方政府的憤怒。」

「我不贊同他所做的事，但是當事件發生時，我的心裡很矛盾。我痛恨那樣的行為，我希望這些恐怖行動能夠被制止。但另一方面，我非常同情伊斯蘭教的歷史，而且，我不喜歡伊斯蘭教徒就等於壞人的這種簡單想法。我想，這一點是東方式的。巴勒斯坦學者薩伊德描述過，人們如何透過西方人的眼睛看這世界，採用西方人的歷史立場。用這種方式，我們只是在延伸西方人的偏見，由他們來決定我們看起來如何，對這點我很有意見。」

「我不是一個輕率做結論的人，說這是邪惡！或這是好的！我是一個需要深思的人。這裡的人很同情紐約，但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賓拉登在伊斯蘭教國家是個英雄。我試著解釋，雖然他是錯的，但他為什麼是個英雄是有原因的，是有一些歷史的原因。歷史這個字相當於戰爭這個字，我們所有的記憶都是用戰爭來記錄的。你說你是誰——我是一次大戰時出生的，我是二次大戰時長大的，或者我是冷戰年代出生的。那就是我們。」

\* \* \*

選舉過後的那天，我向石教授告別。他的兒子，退休的中研院人類學家石磊，帶我去老夫婦的公寓。在路上，他跟我說，他們後來還

是去投票了。

「他們投給國民黨，跟他們一向的做法一樣，」石磊說，「他們很傳統，你也知道的——那個年代大部分的人都是。他們很愛國。」

我問他是不是也一樣。

「我是中國主義。」他笑著說。那不是一個真的慣用語，聽起來像是拿「Chinese-ism」一詞在玩語言遊戲。我問他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我支持中國，」他說，「但是我不會只因為愛國，而盲目地支持某個政黨。我支持中國，但我也支持民主。我認為台灣最後應該回歸中國，那些是我的政治信念。我不支持國民黨或民進黨。」

我們走進公寓，老夫婦正坐在客廳裡。我帶了一份《國家地理雜誌》送給石教授，裡面有我寫的一篇關於西安考古的文章。他仔細地看著那些墓葬圖。

「坐落的方向很有意思，」老人說，「在安陽，所有陵墓朝的都是同一個方向，角度稍微偏西。我想，那是因為太陽的關係——每天有個固定的時間，太陽的陰影向那個方向移動。」

我們談著考古，然後石阮馨提到選舉。

「我們輸了，」她說，「這個結果不太好。台獨獲得更多支持。」

她問我有沒有訪問什麼候選人，我提到陳文茜。「她滿有意思的。」婦人說。

石教授看起來好像快睡覺了——他閉起眼睛，雜誌攤在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上。他兒子說，他贊同陳文茜的政見，這時，老人的左眼突然快速地張開。

「陽陵是不是在長陵的西邊？」他問。他說的是西安的陵墓。

我說，我不是很確定。

「我民國三十二年的時候去過那兒，」他說，「我還參觀了武則天的墓，那個地方很漂亮，你有沒有去過？」

我說有。

「我也去看了秦始皇的墓，」他說，「當然，那裡什麼都沒有，他們還沒有發現兵馬俑。」

老人再度陷入沉默。我說，我該告辭了，我跟他握手——他的皮膚冷且薄如紙。他的兒子送我到街上。我問他，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民國二十三年。」

我算了一下——一九三四年。困惑地，我再算了一次，然後說：「但是石阮馨說，他們是來台灣之後才結婚的。」

「沒錯，」石磊說，「她不是我的親生母親。我父親的原配十幾年前在大陸去世了，她沒有來成台灣。一九四九年時，她不在南京，因為她要照顧她公公。她留了下來，希望我們後來會回去。」

街上下起了小雨。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石教授在回想他是哪一年結婚的時候，不像他回想古文物出土的日期那麼快速。那就是中國的歷史：你記得的事加上你試著要遺忘的事。在等計程車時，他的兒子轉向我。

「我比我父親晚一點來台灣，」他說，「離開大陸之前，我母親讓我轉告父親一個口信。她說：萬一發生什麼事，他們不得不分開，他應該要再婚。我想她已感覺到，國家會走向分裂。」

## 第四部

## 第二十章 唐人街

二〇〇二年一月

波拉特的第二個房東是個美籍華人，他在廣東長大。房東的父親在文革期間偷渡到香港，最後到美國取得政治庇護，就把自己的兒子們也接了過來。其中一個兒子有段時期在華盛頓開餐館，後來賣掉了餐館，在西北第六街買了兩幢並排的紅磚房子。他們一家住其中一幢，剩下的全租給其他的移民。

每個月付二百六十美元的房租，波拉特住進了這個中國家庭二樓的一個房間。他的房間是正方形的，長與寬都是二點七公尺，牆上一片空白。有一台彩色電視、一個電爐、一個水壺和一台電暖器。他有五本書，全是英文課本。桌上，一本可撕開的中式日曆停留在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從唯一的一扇窗望出去，一條條並行的細電線切割著視野。

房間很狹窄，而波拉特真希望可以不和中國家庭共用浴室。實際上，他們很少交談——波拉特和房東從沒有交換過移民的故事。波拉特盡量避免跟中國人談他的政治背景，房東也無意分享自己的過去。這一點，波拉特是從其他房客那兒知道的。

雖然房東和房客的這種關係滿尷尬的，但比起之前位於富蘭克林街和羅德島大道交會的住處，這裡的地理位置算是很大的改善。他離市中心更近了一些，這排房子就在第六街和Q街的交叉口附近。過去這個地區叫作簫郡或維農山莊，現在人們逐漸把它視為唐人街的一部分。這一區正在轉型中：附近正在蓋華盛頓會議中心，而且，當地政



府打算將部分政府補助的住房轉變成一般的房子租出去。這一區過去住的絕大多數是黑人和窮人，不過，現在開始融合了。不少移民遷入——大部分是中國人，以及一些年輕的中產階級白人。離波拉特家幾條街外，是一間由同性戀團體創建的大都市社區教會。

這些跡象透露出，這個日漸破敗的地區將被改建成適合中產階級的好區，或許第六街最終會出現一種在美國市區中少見的、具有多元文化的繁榮景象。但現在，當你從波拉特的公寓往南走，你仍會看到黑人和中國人過去分開居住的情況。第六街沒有什麼商業機構，許多並排的房子都急待維修。保存最好的幾個地方屬於傳統的黑人教堂：春田浸禮會教、第一錫安山浸信會和加百列錫安教堂。在L街角是厄利垂亞文化和市民中心，在I街一幢磚樓的牆上，塗著一個舊標語：福建同鄉會。

那之後就是特區的小唐人街的中心。這裡餐館和店鋪林立——「中國男孩」熟食店、唐人街市場，而幾乎每家都插著美國國旗，這在黑人區是很少見的。沿著H街，旗幟掛得密密麻麻，招牌都是中英雙語：麗華園、食為先、珍味樓。在H街和第七街街角，豎立著一座中式牌樓，上面的題字記載著，該牌樓在一九八六年由北京市長陳希同和華盛頓市長巴里共同揭幕，被視為是北京和華盛頓的「友誼牌樓」。不過幾年之後，兩位市長都進了監獄，這座牌樓令人意外地成為他們的共鳴之處。一九九〇年，巴里被判非法持有古柯鹼罪行；八年後，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陳希同犯下貪汙罪。不過，這種特別的美中聯繫並沒有記載在牌樓上，這是另一個潛伏在華盛頓整齊的地圖下的不規律性。

唐人街招牌的意涵也在兩個世界中不均衡地轉換。英文店名裡滑稽的種族主義在翻譯出中文後消失了。「China Doll Restaurant」（中

國娃娃餐廳）綻放成中文的「麗華園」，「Chinese Child's Fresh Noodles」（中國孩子的新鮮麵條）因為翻譯成「中國男孩熟食店」，而獲得了一種被尊重的感覺（提供的食品也不再只有麵條）。「Wok N Roll Restaurant」（鍋子和滾筒餐廳）中譯為「珍味樓」。在H街和第八街，有個英文招牌寫著：「CHINATOWN GIFTS」（唐人街禮品店），但中文卻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二者的意義截然不同。

\* \* \*

「我想，這些店的合作對象，就像我在北京去過的那種辦假簽證的公司，」有一天傍晚，當我們開車經過唐人街那個招牌時，波拉特跟我說，「那些公司在美國需要有人做聯繫，我想，那可能就是這家店在做的事，他們處理的那些信就像從洛杉磯寄給我的那封一樣。那個招牌所寫的『出國』，指的『國家』是中國，難不成有人要離開美國，還需要他人協助？」

那是一個寒冷的一月下午，我陪著波拉特一起上工。十月時，他找到了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在市區一家叫「亞洲咖啡」的餐館做外送。他有一些維吾爾朋友已經在這裡工作了，這份工作比較適合一個還不太會講英文的移民。他們晚上工作，這樣白天的時間就可以上語言課。波拉特剛結束一個為期兩個月的課程，他已經學會相當多的英文了——他經常在開車時收聽電台新聞。但他講起英文還不太自在，可以的話，他寧願用中文。

他的開車技術倒是已經達到一般打工移民特有的熟練。他懂得華盛頓奇奇怪怪的路標——單行道、交通尖峰時間不准通行的區域，他也知道如何偷偷地開上人行道繞行，如何假裝好像不是故意地，滑過停

車標誌；他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掉頭。他時時注意著警察的一舉一動，在送外賣找停車位上，他已是個行家。如果都找不到空位，他就隨機應變：孤注一擲地停車、匆匆送餐，同時希望別被開罰單。有個詞他總用英文講——開車時，他一遍一遍咕嚕著，就像在唸咒：Parking, Parking, Parking（停車位，停車位，停車位）。從開始做這份工作以來，他已經繳了超過六百美元的罰款，到目前為止，他的最高紀錄是在一天內被開了三張罰單：兩張二十美元的違規停車罰款，和一張五十元的闖紅燈罰款。在亞洲咖啡，他每小時的工資是七塊美元，小費另計。

他出過一次意外。在十二月，有一次外送時，他剛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紅燈前停下，車子後面就被撞上了。後面那個司機開得太快，他們從車裡出來時，波拉特從那個司機的氣息中嗅到了一股酒味。他撞掉了波拉特本田車後面的保險桿。

「他剛開始跟我講話時很友善，但一旦發現我是個英文講得很爛的外國人時，就開始嚇唬我。他告訴我，不要叫警察，因為會帶來太多麻煩。他說，我可以把車修好，他會付一半的修理費。我同意了，雖然現在我知道應該叫警察，但當時，我認為就算警察來了，我也需要找一位會講英文的朋友，那太麻煩別人了。後來，我所有的朋友都告訴我，當時應該叫警察。我有保險和駕照，而且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他們告訴我，不要相信任何非洲人。」

買一個新的保險桿要花一千美元，肇事司機當初答應付五百美元，但是，波拉特從未收到他承諾的支票。波拉特到他的辦公室去找他，他只願給三百元。雖然不滿意，但波拉特還是接受了。他繼續等著，但還是沒有收到錢。之後，對方壓價到一百美元，波拉特威脅說

要請律師，最後對方給了他一百五十美元現金。波拉特找了一個中國的技工，按照打折價修理後，還是花了他三百美元。

波拉特還留有那個司機的名片，上面有他的地址：西北十三街。

「我想，他做的是騙人的工作，」波拉特告訴我，「那個地址只是間擺著一張桌子和一部電話的普通房間，他甚至沒有任何電腦或印表機這類的辦公用品。那人原本說他是做跟營建有關的生意。」

不論如何，波拉特自己也不想去爭更多的賠償。他開車開得好極了，但是當他跨出車外時，那種得心應手便不見了。他知道他的紀錄不太好，除了那些罰單以外，總可能有人會看到他的維吉尼亞州駕照，發現它是用假的宣誓拿到的。這種特殊的漏洞在恐怖襲擊的十天後就再也行不通了，因為那十九個劫機犯中，有七個所持有的證件就是在維吉尼亞州非法拿得的。

\* \* \*

亞洲咖啡的招牌上打著「異國風味」的廣告，菜單上大部分是日本菜，但也包括了亞洲各地的菜色：新加坡炒麵、泰式、馬來西亞料理、左宗棠雞。廚師來自泰國、印尼以及南美，洗盤子的是墨西哥人。我們送外賣的第一個晚上，壽司主廚是馬來西亞和廣東人。他們穿著白色的日式寬鬆外套，在一個非常明亮的對街窗戶前工作，從我們站的外面看起來，那一幕很溫暖。

那晚，所有亞洲咖啡的外賣員都是維吾爾人。溫度大約是攝氏零下三、四度，我們四個縮成一團站著，聽候差遣。跟波拉特一樣，另外兩個維吾爾人也是最近才到美國的。有一個從新疆取道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另一個在土耳其長大，他家是為了避難才搬到那裡。

「我來這裡是因為我不想服兵役，」他解釋道，「在土耳其，每個男人都要服兵役。你知道，生活並不容易。」

那維吾爾人不帶痕跡地說，在寒風中咧嘴笑著。他是個高大英俊的小夥子，留著短短的黑髮，我問他多大了。

「二十三大歲。」（Twenty-three old years.）

他的文法錯誤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喜歡他說的old years——一個年輕移民的「舊歲月」。我問他，一個土耳其公民需要服役多久。

「二大歲。」（two old years）他回答。

「危險嗎？」

「因為北方有恐怖分子，以前比較危險，不過現在沒那麼糟了，我不想當兵的主要原因是覺得當兵很無聊。」

波拉特開始分發他的萬寶路涼菸，這些維吾爾人轉過身，避風點燃香菸。餐館裡非常忙——大多數客人都是剛剛下班的年輕專業人士。一對對來用餐的人匆匆忙忙地穿過冷天，穿過我們這群抽菸的維吾爾人。隔壁也是一家亞洲餐館——「暹羅之星」，以及「阿曼德的芝加哥披薩店」。每棟樓都插著美國國旗：自從恐怖攻擊以來，似乎每個做生意的人都必須至少有一面這樣的旗幟。

波拉特打電話給一個在附近的「自由亞洲電台」工作的維吾爾朋友，他來加入了我們。那人叫阿林。他告訴我，他是唯一擁有美國新聞學學位的維吾爾人。他曾在查特努加市的田納西大學讀過廣播新聞（之前，他讀過田納西州的一家基督書院）。他三十二歲，穿著黑色的皮夾克，身材瘦小，神情嚴肅。他以苦澀的口吻講起國際上對新疆形勢的無知。

「比起其他少數民族來，我們在中國有更多的問題，」他說，「比西藏人的問題多得多，但是他們得到了較多的關注，因為他們有

達賴喇嘛。我的父親被當政治犯關了十年。我第一次看到他時，都十一歲了。我父親認識被處死的人。」

有個白人女人提著外賣的盒子從亞洲咖啡走出來，一聽到阿林說的最後一個字「處死」，她突然扭過頭來，盯著這群維吾爾人看了一下，然後她繼續走，走得更快了。阿林好像並沒有注意到她。「幾乎每個維吾爾家庭中都有人坐過牢，」他繼續講，「他們一直能夠這樣悶不吭聲地，實在讓我很驚訝。」

另一個維吾爾人外送回來了。他二十初頭，長長的鼻子，戴著Pure Playaz嘻哈品牌的棒球帽，當波拉特去給本田車投幣時，他狡黠地笑著說：Parking（停車位）。這是我聽他說過的唯一一個英文字。波拉特告訴我，他五個月前才從加拿大偷渡到美國。他從新疆一個偏遠的地方來的，所以連中文也不會講。

過了一會兒，這群男人決定該吃晚飯了。亞洲咖啡供應他們伙食，不過他們寧願不吃。（「日本菜一年吃上一次，就夠我受的了。」波拉特說。）我們到隔壁「阿曼德的芝加哥披薩店」吃飯，這裡的員工都是摩洛哥人。他們熱情地跟這些維吾爾人打招呼——伊斯蘭教移民之間的良好聯繫，體現在我們買披薩片時打折。披薩不含豬肉，就像在芝加哥吃的一樣。我問阿林對阿富汗戰爭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非常好，」他回答，「我比美國人更恨塔利班人。如果不把塔利班除掉，人們可能會把他們跟維吾爾人聯想在一起，這正是中國人所希望的。他們現在才跳上反恐怖主義戰爭的列車，他們的反應很慢。我覺得，一開始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他們開始想，我們該怎麼利用這個機會獲利呢？」

\* \* \*

有一種策略叫作舊瓶新裝。恐怖攻擊事件之後，中國當局及其國營媒體開始提及在阿富汗以及其他中亞國家受過訓練的「東突厥斯坦恐怖分子」。在過去，他們通常將維吾爾異議分子稱作「新疆分離主義者」，現在的這個新名稱聽起來則比較洋化，似乎這樣設計能讓美國人更同情中國人：中國因為安撫一個不安分的國內少數民族，而受到外來的伊斯蘭教勢力威脅。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中國外交部部長在向聯合國提出有關恐怖主義的報告中，強調了中國與東突厥斯坦恐怖分子的問題。

中方要求將這個維吾爾團體列入恐怖分子之列，不過美國有些人並不同意。維吾爾人最堅定可靠的同盟中，有一些是美國的保守派人士。二〇〇一年十月，《華盛頓時報》刊登了一則由參議員漢姆斯操作編輯的言論：

如果美國最後真的獲得北京在反恐怖主義上的支援，其代價無疑將會是默認中國對維吾爾人的鎮壓（中國也試圖鎮壓西藏和台灣的獨立）。

以那些顯然對我們有害的、殘忍的狂熱行為來懲罰維吾爾人，是怎麼也說不過去的，那是一種道德上的不幸。在北京的專制統治下，維吾爾人只不過以大多和平的方式，爭取著他們的自由.....

參議員漢姆斯也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維吾爾廣播節目的主要支持者。這個電台類似於「美國之音」，不過成立的時間比它晚得多。自由亞洲電台從一九九六年開始，以各種亞洲語言（包括普通話）播音。一九九八年，它增加了維吾爾語節目，每天播出兩個小時的新聞

和節目，新疆和中國其他地區的聽眾可以用無線電短波收聽到這些節目。美國人捐給自由亞洲電台的錢，對他們勉強接受中國為一個世界強國這個事實，有時能起一種平衡的作用。二〇〇〇年五月，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目的在建立與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其中一個附帶條件是，增加資助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的資金。這個附款緩和了大會中的反中國情緒：美國人接受中國是經濟強國的事實，但他們藉由支持這些獨立的電台，以表達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輕蔑。

問題是，在美國，實際上沒有人能理解廣播中的內容。一位從事中亞研究的學者告訴我，自由亞洲電台的維吾爾廣播節目遠比普通話和藏語節目還要激進，他擔心這些內容除了用來對抗中國當局，別無功能。他也顧慮維吾爾人高估了像參議員漢姆斯之類領袖的支持。中亞流傳著一個老故事：美國常用的一個策略是，藉由鼓勵少數民族或宗教團體來抑制更強大的勢力，比如像是俄羅斯或中國。一旦地緣政治發生改變，支持便隨之結束，這些抗爭團體也會被遺忘。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正是這種美式策略的證明。

這就是模糊政策的代價——一個像維吾爾這樣小而偏遠的族群，幾乎從未被獨立看待過，中國人把他們看作是人民共和國中的少數民族；土耳其部族把它當作土耳其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則把他們看作是伊斯蘭教徒；參議員漢姆斯把他們當作反中親美的團體。他們就像那些新疆的木乃伊——有關他們的資訊太少了，每個人都可以照自己的想像來塑造這個少數民族。

在華盛頓特區，我和自由亞洲電台的特派記者卡納特見了面。卡納特報導過最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戰爭，採訪過幾位與塔利班並肩作戰後被俘虜的維吾爾犯人。據他估計，好幾百名維吾爾人曾經在阿富汗受過訓練。他採訪的這些維吾爾犯人都很年輕，二十多歲或三



十歲初頭，來自維吾爾各傳統的社會階層：農民、商人、知識分子。有個犯人曾在中國一所大學獲得經濟學的學位。他們最後都會被送到關塔那摩灣的美國審訊中心。

「他們不願被視為恐怖分子，」卡納特告訴我，「他們說，他們跟那些阿拉伯人無關，跟蓋達組織也毫無關係。他們說，他們會與塔利班並肩作戰，只是因為戰爭開始時，他們正在接受訓練。他們說，這是個內戰，我們不要被牽扯進去，我們只想跟中國打仗。我們到這裡來，只是想利用這個受訓的機會。」

我問卡納特，他們對美國的態度如何。

「他們對美國並不生氣，他們很高興，」他回答，「他們告訴我，也許美國會在阿富汗建軍事基地，那麼美國就是中國的鄰居了。他們充滿希望，希望美國能幫助他們對抗中國。」

\* \* \*

晚上七點半後，亞洲咖啡的外賣忙了起來。波拉特的第一份外送地址是到K街一九〇〇號的一棟辦公大樓，它的招牌上列著裡面是一些律師事務所和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一個分所。他將車違規停在K街上，讓車燈一閃一閃的。叫外送的是一個白膚金髮、右手部分殘疾的女人，她給了波拉特兩塊多美元的小費。

「收她的小費總是讓我覺得很不舒服，」我們一起走回本田車時，波拉特說，「她人非常好，而且她是身障人士。」

「不用擔心，」我說，「我想她是個律師，她可能賺很多錢。」

「我知道，」他說，「但我還是覺得不好受。」

第二份外送是去L街。波拉特掉頭開上第十三街，並看看他的後視鏡。

「這樣是會違反美國法律的，」他說，「這裡有雙黃線，如果警察看見，會罰我三十美元。」

他迴轉，又違規地把車停在荷馬大廈前。沒有警察，只有更多的律師事務所：一棟十二層的中庭大樓上裝飾著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一塊青銅板上刻著標題為「美國青年的精神」的文字。文字寫著這大樓最初是為紀念諾曼第登陸而設計的。當我們進去時，大樓警衛對我們微笑。

「這個警衛很好，」等客人時，波拉特和我說，「我常來這裡，他對每個人都非常和善。」

那個中年警衛正跟一個年輕人閒聊。兩個黑人旁若無人地講話，很多美國人只要聽到我們講外語，反應都是那樣。此刻，荷馬大廈裡，那男人正談著一個女人，警衛給他提供建議。

「你要酷。」年長的警衛說。

「我要酷。」年輕人同意。

「你要酷。」老警衛又說了一遍，內行地一笑。

這一晚忙碌了起來，我們只要一回店裡，總有新的外送單子等著我們。送加州卷、牛肉撈麵和炸蝦卷給尼古拉；送酸辣湯、左宗棠雞和海藻沙拉給蘇菲（波拉特說：「這個名字就像個土耳其人」）。大部分的大樓他都用樓外的對講機，只用兩個英文：「哈囉，外送」。許多顧客都是加班中的律師；他們走下樓來，雙眼模糊，摸出錢包，沒有人會多看我們一眼。從所有的袋子中，辨認出哪一個是他們要的左宗棠雞，已經花去他們很多時間。這道菜的英文菜名拼錯了——General Tao Chicken，所以左將軍雞變成了陶將軍雞；左宗棠是一

位拓展中國疆域的清朝將軍，才華橫溢而又殘忍冷漠。一八八四年，在他的領軍下，新疆成為中國的一省，而現在，維吾爾人在美國首府送著以他命名的雞肉。左將軍和肯德基炸雞的創辦人桑德斯上校——偉大的雞肉帝國主義者。不吃肯德基，不吃新疆。

最後一趟外送，我們去了麻塞諸塞大道一七〇一號。波拉特把車停在一個寫著「任何時候都不准停車」的標誌前，然後我們走進大廳，經過一個寫著「禁止外送者通過大廳」的牌子。訂餐的女人給了波拉特兩塊十二分的小費。在第二十五街，他把本田車停在消防線上。回到第十九大街時，一部計程車超車而過。

「我從未見過白人開計程車，」波拉特說，「計程車司機都是外國人，他們非常糟糕地影響了這個城市的交通，那些計程車司機開車開得甚至比我還糟。」

十點鐘，他打卡下班。今天發薪水，亞洲咖啡裡，墨西哥洗碗工排隊領取他們的支票。維吾爾人把小費收在一起，分成五份，每份二十六美元。波拉特每兩個星期可以賺到美金五百四十四塊三毛八分。我們直奔對街的公共電話，他要打電話給他太太。最近他的行動電話費太高了，不得不改用電話卡。風很冷，一個穿派克皮夾克、怒氣沖沖的黑人跌跌撞撞地向我們走來。

「你們要一些泰諾嗎？」他問，「一盒三塊錢。」那是一種止痛藥物。

波拉特和我盯著他。

他吼道：「泰諾！一盒三塊錢！」

「不了，謝謝。」我盡可能禮貌地回答。這個人又跌跌撞撞沿街而去，生氣地對自己咕噥。

「你確定在這裡打電話安全嗎？」我問。

「安全。」波拉特說。他開始撥號——烏魯木齊某個地方，電話通了，但沒有人接。我們開車回到他租的房子，在巷子裡找停車位。停車位，停車位，停車位，最後波拉特找到了一個車位，不過，車子正前方就是個不准停車的標誌。

「只要車子的大部分是停在這牌子的後面，就沒事。」他說。

在波拉特居住的那棟並排房屋前，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懸掛在凸窗上。他把房間讓給我，自己則打算睡在隔壁的維吾爾朋友的沙發上。我們走進客廳，中國房東在客廳坐著。當他看到我時，多看了兩眼。「這位是我跟你提過的朋友，」波拉特介紹道，「他是美國人。」

房東上下打量我，「我們在北京就是朋友了。」我笑著說，「雖然我是美國人，但是我住在北京，來這裡拜訪朋友。」

「噢，你會講中文。」房東說。他微笑了，不過他的嘴唇閉得緊緊的，這個表情是什麼意思，我在中國時就知道了。他問波拉特，他們是否可以單獨談一下。

我在波拉特的小房間等著，過了一會兒，他回來了。

「他不讓你住在這裡，他說你是『外人』。」

他吐出那詞。在中國，我已經習慣被當作「外國人」，不過，在唐人街，問題跟「國」無關，「外人」簡單指的就是「陌生人」。

「沒有關係。」我說，「我可以住旅館，我不想給你惹麻煩。」

「房東說，你可以住在隔壁我朋友那裡，他只是不要你住在他們家。」

「我了解，他們不認識我。」

波拉特生氣地詛咒著。他說：「中國人到哪兒都是這副德行。」

\* \* \*

波拉特晚上送外賣，白天很自由。我們開著本田車在市裡閒逛——他把我介紹給他的維吾爾朋友，帶我去了一些他常去的地方，例如，華盛頓東北部的農民市場，很多移民在這裡購物。現在戶外觀光太冷了，但他喜歡參觀博物館，有一天下午，我們去了史密森學院。那裡有一個叫「從田野到工廠」的展覽，導言這樣寫著：

美國曾經是數百萬逃離戰爭、貧窮和歧視，或者追尋自由的移民天堂。但是在有些地方和有些時候，美國社會壓抑了自己的人民。

有一個展區描述了一九一五到一九四〇年期間，黑人移民到美國北部的過程。展區裡有一個狹窄的寄宿者房間：床、床頭櫃、櫥櫃。我們靜靜地站在前面觀看，我們倆想著同樣的事情。最後，波拉特笑了，自嘲道：「這可能都比我的房間好。」

不遠處，另一個展區名為：「這值得嗎？」引用了收錄在社會學家約翰遜所著的《芝加哥的黑人》一書中的一封匿名信。

我本以為（芝加哥）是個好地方，但我發現它不是。叔叔告訴我，他住在波蘭大街，一條很不錯的大街；但他的家只是個泥洞。我真希望能回家。

波拉特從未談過他想回去。申請政治庇護後就不可能了。他常常談到他的時機不好，但願攻擊發生時，他就已經安頓好了。不過，到

目前為止，他還沒有碰到太多被公開歧視的事件。九一一攻擊事件過後幾個星期，有一次，他在馬里蘭州艾塞克斯的一家加油站加油，一些白人要求他離開。其他維吾爾朋友也遇到了些小麻煩，那些名字聽起來很「伊斯蘭」的朋友，發現找工作變得更困難了。但是，人們大多時候並沒有把這種不信任講出來。「美國人不會當著你的面告訴你，他們不喜歡你，」波拉特說，「這點跟中國人不同，如果他們不喜歡你，他們總是表現得很明顯。美國人很聰明，他們不把厭惡的感覺表現出來。」

他最大的苦惱是不能把太太接過來。律師已經把簽證必要的文件都送去申請了，但是沒有人知道批准要多久。恐怖攻擊事件後，所有這些程序也跟著產生了變化。律師認為至少需要一年時間，或者兩年，甚至更久。在此同時，要讓她相信一切都正常，變得更加困難。恐怖攻擊後，整個十月，波拉特的電話帳單竟高達四百八十八美元七毛五分。

在特區，我住在另一棟並排樓房、波拉特維吾爾朋友的家。這個地方很擠，三個墨西哥人住在地下室，一個維吾爾人住一樓，九個中國人住在樓上臥室。住在這裡的人中，除了一個之外，其他人從事的工作都與食物有關，他們之間也沒有什麼交流。似乎沒有人在意，有個「外人」睡在樓下臥室的沙發上。

波拉特的維吾爾朋友四十八歲，也拿到了政治庇護，正等著他的妻子和雙胞胎兒子的簽證申請被受理。妻兒都在土耳其，他有兩年多沒有見到他們了，他要求我如果寫到他，不要提到他的名字。

他房間的牆壁上，掛有各種不同語言的標語：英語的是「停止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迫害」，阿拉伯語的是「偉大的阿拉！」中文的是「祝你美夢成真」。門上掛著一個日本歌舞伎日曆，是從他送外賣的

餐館「日式鐵板燒兄弟餐館」拿來的。他在西安一所大學取得電機工程的學位。最近他的車被偷了——這一區也許有變成適合中產階級居住的好區的跡象，但仍需時日發展。

一天早上，我們三個在聊天，他說，他對美國人的審美觀很感興趣，跟他在新疆或中國其他地方看到的全不同。「工作的時候，我到很多人家裡送外賣，」他說，「他們通常不會請我進去，但有時會，因此，我可以看到他們的房間是什麼樣的。你知道嗎？很多人家中掛著中國畫。我看得出來，很多美國人喜歡中國。」

我問他，這是否讓他感到困惑。

「不會，」他回答，「能欣賞另一種文化是很好的事。這可能只表示美國人的品味很廣，我還看到有些人在家裡擺非洲面具。」

我問波拉特的看法，他皺皺眉。這些年來，他總是把文化看成某種神聖的、比經濟或政治更基本的東西。有一次，他告訴我，美國黑人的問題就在於文化——不管他們是否生活在一個經濟良好、政治制度自由的國家，奴隸制度摧毀了他們的語言和文化，這點跟那些自由移民到這裡的人是不同的。照他看來，黑人總是得努力恢復那份損失。

此刻，他認真地想過後，徐徐道來：「那些美國人有自己的文化——歐洲的文化，而那些文化也同樣是很輝煌的。但是，我在他們的家裡看不到歐洲的東西，為什麼他們如此喜歡中國？我知道中國人說他們有五千年文化，不過這是真的嗎？還是他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說說而已？」

他繼續講下去：「看到這些中國畫，讓我想起我工作的餐館。它賣的不是真正的日本菜——是假的。做這些菜的人也不是真的日本人，他們是馬來人和中國人扮的日本人。我沒有看過日本人在這裡吃東西，全是美國人。」

「唉呀，真正的日本餐館可能也不會做外賣，」另一個維吾爾人說，「真正的日本餐館很注意食材的新鮮，所以，我的餐館也不是真正的日本餐館。實際上，老闆是越南人。」

「我認為這跟美國的自由有關，」波拉特說，「如果你找到了賺錢的門路，你就去做，這才是重要的，而且這也沒錯。但是，日本人從來不在這裡吃飯。還有，他們把店員打扮成日本人的做法，讓我很困惑。它讓我想起了北京那些把中國人打扮成維吾爾人的維吾爾餐館。」

\* \* \*

波拉特生日那天，他特別休了假。早上，我們在城裡兜了幾圈，完成了幾件瑣事，去了農民市場。波拉特指他繳停車費的市政大樓給我看。電台的一個播音員提到《華盛頓郵報》上刊登的一則關於驅逐非法移民的報導。那是一個寒冷而晴朗的日子，外出的人很少。波拉特滿四十六歲。

辦完那些事後，我問能不能去看看五角大廈。那個月初，我在紐約參觀了九一一廢墟。生活在中國使得那起恐怖攻擊離我似乎很遙遠——那裡只有盜版光碟、冷漠的反應。現在我覺得我應該見證這些遺址。我們繞著五角大廈轉了幾圈，然後在哥倫比亞公路對面，找了一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五角大廈的Citgo加油站停車。當我們停下時，電台正播放著國歌。波拉特告訴我，自從恐怖攻擊後，中午播國歌已經成了電台慣例。

五角大廈遭損害的一面被支架隔開，支架上也插著美國國旗。頭頂上，傳來巡邏中的直升機的嗡嗡聲。三名挪威遊客也找到了加油



站，我們站在他們旁邊。波拉特不停回頭看著他的本田。

「它沒事，」我說，「停在加油站不會被開罰單的。」

「這裡的加油站可能不一樣。」他說。

我到加油站裡面去買了一份《華盛頓郵報》，頭版頭條是：

### 美國尋找數千名逃逸的被驅離出境者 中東男子是搜查的重點

我把這篇文章的大概說給波拉特聽：司法部在追捕那些不接受驅逐命令的人。

「我支持這種做法，」他說，「很多人的簽證經常都過了期，但政府都不管，這樣其實給了他們幹壞事的機會。」他換成英文表達：

「太過自由了。」他說得很慢，然後又換回中文：「哪個種族的人都沒有關係，如果他們來到這裡能遵守法律，那麼就應該允許他們留下來。」

我問他過生日，中午想吃什麼。他告訴我，這裡的一家伊朗餐館，有很好吃的烤羊肉串，跟新疆的一樣。我們開車經過波利瓦將軍雕像和世界銀行，接著經過賓夕法尼亞大道。停車位，停車位，停車位。在我們找車位時，波拉特說，在華盛頓的生活一定會愈來愈容易的，「只要有勇氣，」他說，「在北京我有勇氣，所以我賺了很多錢。我也是有勇氣才能離開家。」

他暫停在一輛黑色的凌志後面，等著看它是否會離開。那車沒動，我們就開走了。「你知道嗎？我看看這裡的人，很多都沒有我聰明，」波拉特說，「有些人受的教育不多，有些人比我老。並不是每

個在美國的人都很聰明，不過，你知道，很多並不聰明的人也過著很好的生活。我就想，如果他們都能過好生活，我有什麼理由不能？」

幾分鐘後，波拉特終於找到了一個車位。我們走進了一家叫「白鯨記」的烤羊肉店。進門時，波拉特笑著跟店裡的人揮手，另一個維吾爾人站在櫃檯後，正忙著燒烤。

【古文物J】

## 批判主義

陳夢家故事的真相，似乎隨著講述人的不同而改變。有關他身故之前的紀錄那麼少，我不得不靠訪問、記憶、傳言來拼湊他的那段生平。大部分我訪談過的人都已年過七十。老楊跟我說，陳夢家被指控有段婚外情；趙老說，他是因為支持繁體中文而惹上麻煩；石教授聽說的是，共產黨把他給殺了。其他人還有不同的版本，有時候是些二手的傳聞。在我的筆記本上累積的一些字句，看起來也互相矛盾：

陳夢家給我的印象是非常英俊。我記得當時心裡還閃過一個不大合適的念頭：這人都可以當電影明星了。

我從某個認識他的人那兒聽說，他外遇的對象是北京某位京劇女演員。

那時候傳聞很多。他們可能會批評某個人的私事——那只是一種手段。當然，這原本就跟誰都沒干係；只要他太太不出聲，關那些人什麼事？

我不知道這跟你聽到的吻不吻合，但據說，陳夢家是因為跟一個女演員有婚外情而自殺。千萬別說是從我這兒傳出去的。我是從A那兒聽到的，A是在B幫C辯護時聽到的。

這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它不是我們可以談的。

他是詩人的個性，對什麼事情有意見就會說出來。心直口快。

\* \* \*

在上海博物館的四樓，我找到在那裡永久展覽、原本屬於陳夢家的明朝家具。博物館的家具展總讓人有種感傷，而陳夢家的收藏似乎特別寂寞：空的椅子、空的桌子、空的香台。一張罕見的黃檀木做的椅子上，刻著一個「壽」字。展覽的說明中，半個字也沒提到陳夢家的生平，只說：

本室家具原由陳夢家先生和夫人所收藏。

馬承源是博物館裡最老的館員。他七十五歲，已經退休，但還在館裡幫忙。當我要求訪問時，他欣然同意：他是那位甲骨文學者的朋友。老人告訴我，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五五年。那時，博物館的規模還小，現在這個美觀的新館是在一九九六年開放的。一九五〇年代時，馬承源和其他館員會從地方古董市場收購青銅器，常請專家來鑑定買進的東西。

「陳夢家來過博物館幾次，」馬承源說，「他有一股文人氣，但講話很坦白。他總是直接說出他的真實意見，結果，那給他帶來了麻煩。他覺得漢字很美，反對一九五〇年代推動的改革。我聽說，他在北京的一些會議中公開表示反對。那很危險，因為是政府在背後推動文字改革。換句話說，他的言論不只反對文字改革，他是在反政府。老實說，我也不喜歡那個構想，但我什麼也沒說。那些都是發生在北京的事，跟我無關。」

馬承源繼續說：「只要陳夢家到上海，我總喜歡請他來看我們的收藏。有時候，他太太會同行。我想，那時她的個性已經變得跟以前

不太一樣——我是從別人那兒聽來的。她話不多，我想她的精神上遭受著某種壓力。我知道他們想要有小孩，只可惜始終無法如願。他們曾想要領養，但那太複雜了——我們中國沒有那種習俗。我想，他們家因為沒有小孩很寂寞。有一次，陳夢家告訴我，他們不能生，但是他沒有多說什麼。當然，我也不好意思多問。」

老館員告訴我，他最後一次見到陳夢家是在一九六三年。「那個時候，他已經惹上了政治麻煩，」他說，「我去北京，上他家裡看家具。那麼多美麗的東西，我特別注意到一件，那張刻著『壽』字的黃色檀木椅。我們在他家吃晚飯，他送我一本他的新書——《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你要了解，那個書名不是陳夢家選的！」

「也就是那個時候，他第一次跟我說，要把家具捐給上海博物館。他很擔心它們的安危。他沒有特別說，他怕的是政治上的麻煩，但是我知道，任何收藏家都會想擁有那些東西的，他為什麼要把它們送給博物館？我們只能用猜的。後來，他寫了封關於捐贈的信給我。那信我還保存著——我找給你。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馬承源提到，陳夢家的政治麻煩始於一九五〇年代晚期。「有一些年輕學者寫文章批判他，」老人說，「有一些批評得很嚴厲。」

我問他記不記得那些批評者的名字。

「李學勤，」他說，「他寫文章說什麼陳夢家研究甲骨文是錯的。」

「那樣的批評準確嗎？」

「不，」那館員說，「而且他不應該在那個時候寫那樣的文章。陳夢家的麻煩已經夠多了。」

「李學勤是個什麼樣的人？」

「李學勤……」馬承源搖搖頭，想了一下，「不好說。」

馬承源接著說：「現在，李學勤居於考古學領域的頂端。有一段時間，他是陳夢家的助理。」

\* \* \*

老館員不願對那些批評多說些什麼，儘管知道我的好奇心已經被挑起，但他只給了那個名字就沒下文了。他以政治應對老練著稱——文化大革命期間，據說，他用寫著毛澤東標語的布條把博物館的古文物蓋起來，才使它們免於受難。馬承源知道紅衛兵不會摧毀毛澤東的語錄，上海博物館的收藏因而毫髮無傷。今天，它被視為全中國最好的博物館，馬承源是保護館藏的功臣。

有謠傳指出，文化大革命讓很多知識分子和有錢人傾家蕩產，而博物館事實上是從中獲利。我向老館員求證，他很鎮定地回答：「我也被批判，我們關心的只有怎樣才能生存下去。」他說了一個在一場「批鬥大會」上，他和其他館員怎麼被提得高高的、然後摔到大理石地上的故事。馬承源說他摔得遍體瘀青，但沒有受傷；另一個館員摔下時碰到頭，死了。那故事短而有力，讓我閉嘴，不再追問文化大革命有沒有給上海博物館帶來好處。

在離開之前，老館員影印了陳夢家的最後一封信給我。那封手書的日期寫著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陳夢家自殺的那年。筆跡很美，沒有提到任何擔心或政治麻煩。字體跟在上海博物館展覽的家具一樣簡潔，感覺上也一樣空虛：

我們上次相談甚歡，你可能忘了，可惜我們沒把它記下來。  
你來我家，但時間很趕.....

那張黃色檀木椅，時間可能比明朝還要早，當然應該捐給上海博物館。如果你喜歡其他的東西，它們也可以捐給博物館。我希望博物館可以派人來裝運.....

\* \* \*

在北京，我找到了那篇批判文章。它發表於一九五七年，當時陳夢家剛被打成右派和黨的敵人不久。文章對陳夢家撰寫的甲骨文書籍做了很長的評論，對陳夢家的學術研究批評得尤其嚴苛。在文章最後，攻擊變成了針對個人：

陳夢家沒有發表任何足以能讓他那麼傲慢的扎實研究。陳夢家非常愛自誇。例如，在本書二十篇中，他用了很多其他學者的學說和理論，而不是只有他自己的創見.....這種自誇的態度是不能為我們所接受的。

要找更多關於李學勤的資料並不難。在考古和歷史的領域，他的名字隨處可見——他寫過有關甲骨、青銅器、竹簡文獻的文章，聰明而且多產。有幾位學者告訴我，他有一種既能做優秀研究、又能熟練地滿足共產黨需求的罕見才能。一位古文字學者坦白地跟我說，李學勤是一個「諂媚者」，有幾位提及他對陳夢家的批判。

李學勤現任「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的組長。中央政府從一九九五年開始贊助這個工程，旨在明確建立中國早期文明的年代表。在

此之前，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所能證明的中國歷史的最早時間是西元前八四二年，但是斷代工程提出了一個新的時間。這個工程在國際上受到嚴重抨擊——很多外國學者相信，中國人是企圖用多一點民族主義、少一點學院研究的方式，來構築他們的歷史。有些學者說，這個工程的動機主要是跟西方抗衡，因為西方像是埃及文明，有史可載的時間比中國還早。在工程進行的過程中，當參與學者們對古代的時間持不同意見時，有時最後是用投票來決定——中國學者們各自提出他們的看法，最多人選的那一年贏。中國媒體對工程的相關報導，讀起來常讓人覺得很奇怪：

《中國日報》（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經過兩年的研究，一項填補中國古代歷史紀年空白的工程有著耀眼進展。中國以作為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國家聞名於世。不幸的是，在歷史發展中，有一段二千年的空白，從而掩藏了中國的真實年齡……這二千年的歷史包括夏、商、周，並且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元前二一〇〇年。北京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員李學勤做了上述表示……

李學勤說，這個標示中國古代史起點的確切時間，將會在明年年底公布。

\* \* \*

研讀過李學勤的經歷後，我跟一個當記者的中國友人相約見面。他在黨營的新華社工作，閒暇時研究歷史和考古學。他利用工作職務拿到被管制的文件，揭發被人遺忘的事件。有時候，他希望自己能把



那些東西全發表出來。他喜歡說他的左手是為新華社做事，而右手是為自己做事。我們同年：三十初頭，都屬雞。

我請我朋友對如何接近李學勤給我意見，他要我先不要提到陳夢家，應該找另外一個藉口訪問他，然後再問到那個批判。

「要是他拒絕回答呢？」

「嗯，有可能。不過如果你出其不意，他就有可能會回答。」

「你覺得他會怎麼答？」

「中國人有一句成語叫『如日中天』，那就是李學勤現在的地位。他正處於事業的最高峰，當他再次看到他寫的那篇評論，我不認為他會想：『我不該那樣攻擊我的老師。』相反地，他可能會想：『你看，我年輕的時候就懂這麼多。』」

我的記者友人繼續說：「這個國家的學者是這樣的。他們是一群黑暗的團體——很多人做了不該做的事。我聽說，陳夢家自殺後，有學者搜尋了他的辦公室、讀他的筆記，有些後來還拿他的想法當成自己的發表。過去有很多學者做過那樣的事，但是他們不會承認。中國人不喜歡自我審查，很少人會承認自己是錯的。」

談話的最後，我的朋友鼓勵我去追查這個故事。他說，中國有太多這樣的故事溜掉了。「這不是中國記者可以做的事，」他說，「我在新華社，當然也不能做。但作為一個外國人，你卻可以。」

\* \* \*

我約李學勤在他清華大學的辦公室見了面。他快七十歲了，高額頭，眼袋很大——一張非常勤奮工作的學者面孔。他穿著灰絨西裝、紅領帶和拖鞋。他跟我說，他在美國待過一段時間，包括在達特茅斯大

學度過他的年休。他的英文說得不錯。我跟他說，我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有興趣。

「這是從一個叫宋健的人開始的，」他說，「宋健是一位神經機械學家，但一直對考古學有興趣。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他到了歐洲和地中海等地，參觀了很多博物館，尤其是在埃及、希臘和以色列。之後，他想：『外國人的歷史紀年可比中國的清楚多了。』回國後，他問我和其他學者，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基本上，我們決定讓科學家在歷史和考古學上多參與一些。」

李學勤教授解釋說，天文學家幫忙追蹤古文獻中記載的月蝕，其他的科學家則用碳十四來確定時間範圍。他指出，工程基本工作是在安陽——最初發現地下城市證據的地方。

「我們的歷史年表和以前的觀點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他說，「拿商代最終被周打敗的時間來說，那是歷史上的關鍵時刻。過去，有四十四種不同的說法，前後差距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遠。運用最可靠的資源，我們把那個時間差距縮小到三十年——西元前一〇五〇到西元前一〇二〇年。我們的結論是，武王克商的時間最有可能是西元一〇四六年。我們不是說那是『絕對』正確的，但從現有資料來看，那是最有可能的。」

「這真的只是一個起步，」他說，「我們準備做另一個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工程。當然，有人說我們想延伸中國的歷史，但那不是真的，我們只想找出中國是怎樣發展而成的，這跟研究古希臘、埃及或以色列並沒有不同。那些古文化被研究得比中國要多。但是中國文明有它的特質：它還存在，不像其他都已經消失。」

\* \* \*

我等了半個小時才轉換話題。我從背包中拿出那份評論，放在我跟他中間的桌上。如果李教授有什麼立即的反應，那他一定掩飾得很好。

「我在讀你的文章的時候，」我說，「注意到這篇寫甲骨文的的文章，我也看到張光直稱讚你對商朝的祭品名稱所提出的理論。」

「是的，那對我很有意義。」李教授笑著說，「不過，我一直到後來才看到他寫的東西。他第一次讀我的文章時，人在台灣，當然，那時兩岸沒有任何聯絡。我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才讀到他對我的評價。」

我指出文章中出現的陳夢家的名字。「我對這位甲骨文學者也很感興趣，」我說，「我從安陽和北京的人那裡聽說過他。你是他的學生嗎？」

「他是清華的一位教授，不過我不是他的正式學生。」李教授說，然後他解釋了他的背景。李學勤最初學的是數學邏輯，但在共產黨得勢之後，北京大學面臨重組的命運。正是在課業中斷的那段時間，這位年輕的邏輯學家轉而研究他的業餘興趣——甲骨文。

「我十八、十九歲的時候就對甲骨文感興趣，」他說，「年輕的時候，我對任何不了解的東西都有興趣。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任何我覺得好像有象徵性或複雜的東西，我都想把它搞懂。那是邏輯吸引我的原因。當我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我毫無概念，但卻使我更想了解它。」

他繼續說：「國民黨撤出大陸時，把甲骨一起帶走了，但拓文刊在書裡，其中有很多並沒有被仔細研究或拼湊在一起。閒暇時，我做的就是這些：把破片整理在一起，找出它們可以互相組合的可能性。

我有了點小成就，後來陳夢家跟其他人注意到了。他們要我到考古研究所一起研究甲骨。基本上，我是陳夢家的研究助理。」

他的聲音有點改變。他的表情不變——下巴一樣翹起，眼光穩定沉著，但他講話的速度加快了，音調也提高了一點。他說了下面的故事：

「一九五七年之後，他被打成右派——他們給他扣上那樣的帽子。那些年他很辛苦。而文革時被打成右派的人麻煩更多，那是他會自殺的原因。」

「那時候，我在另一家研究機構，我們不在同一個地方。我相信他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自殺的，但是我一直到那年冬天才聽說。知道的時候我很難過，他是一位很好的學者。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我們把他的東西、筆記還有書都照顧得很好。」

他講完了，但我攤開那篇評論。最後一頁的中央，對陳夢家人身攻擊的醜陋字句跳了出來：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李教授的眼光落在文章和地板之間的某個點上。「我們不應該談這個，」他說，「陳夢家是個很好的人，我不想談這些事。」

「我只是想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說，「我看過很多對他的批評，有很多更糟。很多人跟我說，那個時候就是那樣的。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很難了解這種事，所以才想問你。」

現在教授明白我的訪問目的了。但我以為會看到的情緒——被打攪、自我防衛，甚至於生氣——並沒有出現。如果有的話，這男人看起

來只有疲憊，眼袋重重地垂在眼下。

「不只是外國人難以了解，」他說，「年輕的中國人一樣難以了解。那時有種壓力迫使我們寫那樣的東西。考古研究所要我寫的，我很年輕，無法拒絕。你會注意到我避免說任何政治的事。我從未用『右派』或任何類似的字眼，我也把所有的批判只寫成一段，最後那一段。」

他說得沒錯：人身攻擊全縮成一段只有五行的句子。

「我不想寫那個東西，」教授繼續說，「文章其他部分，跟學術有關的論點是沒有問題的，但我不願寫那些個人批判。那篇文章刊出來後，我很少見到陳夢家。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我偶爾會在考古研究所碰到他，我跟他講話變得不是很自在。我沒辦法跟他談話，因為我心裡的感覺很差。我一直很後悔寫了那篇文章。」

「我想人們是了解的。很久之後，他死之後，我跟他的朋友還是有聯絡，有時我會見到他太太，從來沒有人責怪我。我想他們了解發生了什麼事，但我還是覺得難受。沒辦法。」

整個訪問過程中，我一直記著筆記，李教授看著我的筆記本。

「我希望你不要把這些寫在《紐約客》裡，」他慢慢地說，「那是個人的問題。我希望你只寫斷代工程和我們早先談的東西。」

我說，除非我可以完整地解釋每件事，否則我不會寫。

「那是個恐怖的年代，如果不了解這個事實，那你就很難了解發生的那些事，」他說，「文革發生的時候，如果人們批判你，你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有錯。我那時也被批判，我也相信人家所說的。每個人都是那樣，那是社會心理學的一種。那麼多敵人——似乎所有人都是敵人。」

\* \* \*

訪問之後，我在清華園內閒逛。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地上的雪融化了，留下不均勻的灰色泥堆。校園很美，除了它的學術聲望之外，這所大學還像一座矗立的紀念碑，代表了一段歷史恢復了正常。一九〇一年，外國聯軍擊敗義和團後，強迫清朝賠款三億多美元。美國把它拿到的那部分錢捐給中國辦教育，其中有些錢用於創辦了清華大學。

李教授的辦公室附近，我參觀了王國維的紀念碑。一圈松樹圍著那三公尺高的石碑。碑文是用老國民黨的紀年方式：民國十八年。那是一九二九年——王國維對末代王朝的瓦解感到絕望而投湖自盡的兩年後。當時他的一位友人寫了這篇紀念文：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我的新華社友人沒錯——有些事情對外國人來說是比較容易的。但是，這些事情比較容易的原因，有可能是錯的。來清華的路上，我告訴自己，對李學勤教授無預警的出擊是必要之舉，否則，那些過去的細節可能會消失。如果他為自己辯護或生氣，我會覺得好過一些，但最讓人難受的是，我看到的是他的後悔。寫那些批判言論時，他才不過二十四歲。

## 第二十一章 國是訪問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小布希總統在中國待了三十個小時。此行他先在南韓停留，在那裡，他用望遠鏡窺視了下南北韓之間的休戰區。不到一個月前，小布希宣布北韓和伊朗、伊拉克是「邪惡軸心」。在休戰區，有人提到對面北韓的博物館裡展示了一把短柄小斧，它在一九七六年時曾經殺害了兩個美國軍人。「難怪我會覺得他們邪惡。」小布希總統說。

北京之旅正逢尼克森首次訪華三十週年紀念。小布希訪問期間，有兩項活動對媒體開放，並允許全國電視轉播：一個是小布希總統跟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聯合記者會，另一個是小布希在清華大學的演說。記者會上，兩國元首談笑風生，一如這些國家領袖常有的表現。小布希總統也提到了台灣：

我們相信，台灣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我們不鼓勵兩岸彼此挑釁。美國會繼續支持《台灣關係法》。中國的未來應由中國人民決定，但每個國家都必須顧及人類對尊嚴的要求；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在內，都應享有選擇生活方式、信仰與工作的自由。

江澤民在被問到對伊拉克海珊政權有什麼看法時，表示：

我想，正如我剛剛跟布希總統的討論中，說得很明白的，很重要的，和平必須被視為最主要的價值.....讓我用句中國古諺來做結論：「欲速則不達」。意思是，儘管實際上，有時候有些問題需要立刻被解決，但是耐性也是必要的。

當晚的國宴上，江澤民主席高歌一曲義大利歌謠〈我的太陽〉娛樂來賓，並且輪流跟美國總統夫人蘿拉以及國家安全顧問萊斯跳舞。第二天早上，小布希總統前往清華大學。

\* \* \*

外國記者在香格里拉大飯店聚集，政府派了特別巴士載我們去清華。我在兩個國務院記者團的記者後面，找了個位置坐下。跟大多數跑華盛頓新聞的記者一樣，他們是留著短髮、穿深色西裝的白人。他們不斷地談著政治和新聞，要偷聽到他們說什麼很容易，因為他們完全無視於任何非國務院記者團的人的存在。

「鮑爾是個聰明的傢伙。」

「我總覺得他像是個管美國政府的大人。」

「不過，我不覺得他有季辛吉式熟悉全局的特質。」

早上八點二十五分，巴士在香格里拉外面等著不動。原本的通知是八點發車。

「布希的觀點來自漫威漫畫。邪惡一號、邪惡頭目。但鮑爾是從各個角度看事情。」

「布希要確定的是每個人都是——基本上，就跟我們一樣。」



「如果你真的要說殺人的是誰，我擔心的倒不是賓拉登。我擔心的是桑德斯上校、百威人，還有萬寶路牛仔男。」

「他們怎麼會找不到他？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公分，走路還一拐一拐的。」

「也許他躲到一個有很多高個子的地方。」

「這裡的腳踏車都跑去哪兒了？」

「這是個『波將金村莊』（Potemkin village），很大很大的村莊。這是中國。」

「我們為什麼坐在這裡這麼久還不動？」

「歡迎到中國。在這裡，你首先要學的就是等。當白宮那批安全狂熱分子和這裡的控制怪物碰在一起，情況就是這樣——一座安全警衛城。」

巴士後面傳來有人敲打著筆記型電腦鍵盤的聲音。

「近來，艾希克羅和倫斯斐、倫斯斐和鮑爾之間有一些爭論。」

「人們常說，歐尼爾會下台。」

「去年，我去採訪在蘇州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那是哪裡？」

「離上海約一百四十五公里。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八點三十八分，巴士駛離了香格里拉。

「我認為記者低估了布希先生，因為他們以自己作為評價的標準。」

「我曾經報導過高爾一年——你可以用圖表把他的英文列出來，用那些句子來做英文教學，但是我從來搞不懂他在說什麼。有一次，有人問一個有關一座半圓形舞台的問題。高爾答了這麼一句：『天文觀測窗是第一座圓頂建築，王國是最大的緊閉空間——盡是些這樣的答

案。』換作是小布希，他會說：『我喜歡在戶外看棒球賽。』你說誰比較聰明呢？」

「阿靈頓墓園有圓頂嗎？」

「沒有。」

「我從來沒有坐過像這樣的車隊。」

一排黑色的轎車隊伍帶著我們向北開過二環路，黑衣警衛站在街上管制交通，行人停下來觀看。天空一片蔚藍。

「我去過猶卡山，還進過猶卡山裡面。」

「拉斯維加斯發展快得嚇人。」

路旁的標誌寫著：

北京西方汽車零件市場

北京農村信用公司

中國石化

「法國人把廢棄物再利用做成飾元素。」

「有位叫賈斯柏·貝克的記者，發現中國餓死過三千萬人，在中國大躍進時期。三千萬耶！讓你懷疑其他記者都在幹麼？」

巴士經過四環路。一面巨大的英文招牌寫著：

實施新商標法以面對進入世貿組織的挑戰

「你看那些腳踏車！我在等著要看的就是這個！」

「《郵報》那個叫里克斯的傢伙很棒。」

## 北京化工研究所

「他是第一個了解衛星攝影科技可以成為一種很有用的新聞工具的人。」

巴士駛進清華大學的後門。

「再說，對一個大媒體來說，用一千塊美金傳一張照片，不算什麼。」

松樹、草地、舊石磚校舍。銅像和紀念碑。

「他們用庚子賠款的錢蓋的。」

「他很好配合嗎？」

「他那條線，我只跑了幾個月。」

「有一次，我在飛機上正在讀奚尼，就是那個愛爾蘭詩人的書。柯林頓剛好要回座位，問我在讀什麼。他竟然可以跟你談這個作家。他真的很才有才華，只不過……」

## 歡迎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到清華大學

\* \* \*

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往上升，中國自身亦然。過去，中國人總是從外面的世界去找尋所需的東西：認同、貿易夥伴、世貿組織會員身分，以及奧運主辦權。通常美國是有影響力的那方，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美國對中國也有所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世界唯一跟北韓有良好關係的國家；九一一之後，中國在中亞的存在不能被忽視。如果美國要把伊拉克的問題搬進聯合國，中國支不支持很重要。

而且中國的經濟愈趨強大，不容輕視。有時，實在很難相信只不過兩年前，波拉特還在雅寶路兌換著比官方銀行高過百分之九的外幣。那時人們推測中國貨幣會貶值，現在大家認為它會升值。房地產市場蓬勃發展，貿易順差每年增加。因為雙邊貿易那麼不平衡，很快地，美國將會要求中國貨幣升值。

小布希訪問期間，所有過去的糾紛——大使館爆炸案、間諜機墜海事件，似乎都變成一個世紀以前的事。聯合記者會上，小布希的談話在中國電視上完整播出。這是另一個正面的徵兆：過去，總有些話會消失不見。一九八四年，雷根總統引用了林肯的話：「沒有人可以好到在未得到他人同意之前，就逕自管理他人。」錄影播出時，這整句話被切掉了。二〇〇一年十月，小布希總統到上海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時，有幾個關鍵字也從他的電視記者會上消失了。那些不見了的字是：對恐怖主義之戰不應被用來迫害少數民族。

記者追逐著大大小小的新聞。有時，當你從一貫的新聞工作中抬起頭來，突然發現世局已經改變。在那些時刻——穿上西裝打起領帶，跟其他穿西裝打領帶的白種人坐上媒體專車，你不免會想：一切就是這樣嗎？在這些會議和演說之下，在三十個小時的停留後，世界真的就會向前進步嗎？

但那就是你的工作，所以你蒐集所有的細節——問題、背景、顏色，然後組織它們寫進報導裡。美國要中國停售核子技術給巴基斯坦，中國要美國停止在太平洋部署核子防衛系統，美國要對中國出口黃豆。恰逢尼克森訪華三十週年，看來是個好時機。外國記者以前幾乎從來沒有機會跟江澤民說話，而現在，他看起來比任何中國現今領導人物都更和藹；如果你跟他提起他在國宴中高歌的事，對採訪還會幫助不少。好訊息到處都是：北京有十八家普爾斯馬特，中國有六百

家肯德雞炸雞店。據報導，小布希總統訪問期間，四十幾個中國基督教活躍分子只被軟禁。根據《紐約時報》最近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中國近一半的十二歲以下孩童相信，麥當勞是國產品牌。

幾個月前，小布希總統訪問上海時，威利的美國之音筆記中，出現了有史以來最長的一句簡明英語：

在記者會上，中美兩國在世界共同責任上是兩個有主要影響力的國家，而且對於順利向前發展雙邊關係都有興趣。只要雙方能堅持共同利益，適當地處理雙邊關係，尤其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一直是最敏感的議題，希望美國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遵守三項聯合公報。

在反恐怖主義上，中國一向反對任何型態的恐怖主義，並且支持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

\* \* \*

副主席胡錦濤介紹小布希總統出場。胡錦濤畢業於清華大學，但由他擔任引介人還有其他原因。到那年年底，江澤民按規定辭退主席一職，很多人預測副主席胡錦濤會接手成為國家領導人。一九九九年五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爆炸案後，他成為第一個在電視上露面的中共高層，從那之後，外國媒體就對他密切注意。大家都知道胡錦濤喜歡跳社交舞。

在簡短的介紹中，胡副主席提到三十週年的事。他說：「三十年只是人類歷史的一瞬間，但是，這段時間內，兩國關係的重大改變將會被寫進歷史。」

小布希總統向胡錦濤致意，然後說：「很有意思地，這所大學是在我國的支持下創辦的，這把我們兩國的關係綁得更緊。」

小型演講廳的暖氣設備不怎麼好，在場聽眾大約有三百名，他們都是共青團從清華各系中精心挑選出來的。我跟其他記者站在後面，抄錄著小布希的演說重點，好跟待會兒國務院發布的官方演講確認：

隨著美國對中國有更多的認識，我關切的是，中國民眾對我的國家不一定總有清楚的認識。這原因很多，有一些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我們的電影和電視經常未展現我所知道的真正的美國價值。

如果有一天你到美國去旅行（如果你還沒去過，我希望你有一天會去），你會發現很多不同種族背景、不同信仰的人。我們是個多樣化的國家，我們有二千三百萬華裔，不管是在我們的公司行號、在美國總統座艙，或者美國奧運溜冰隊中，都可以看到他們。每位移民只要對我們的國家宣誓，就可以變成跟總統一樣的美國人。

改變來臨了。中國已經有地方層級的不具名選舉和競選。近二十年前，一位偉大的中國領袖鄧小平這麼說過——我要你們聽聽。他說，中國最終會全面擴展民主選舉一直到國家層面。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 \* \*

演說之後是開放提問的時間。據報導，所有的問題都被黨事先過濾過。第一個學生舉手站起來，用英語發問：「每次您談到台灣問

題，您總是用『和平解決』這個字眼。您從來沒有用『和平統一』。它們的不同在哪裡，為什麼？」

小布希總統的回答重複了幾個P字——和平、和平的、和平地——一共十次。但他一次也沒有用「和平統一」。另一個學生跳起來。

問：很可惜，你還是沒有給予我們（haven't given us）——對不起，沒有給我們（haven't give us）清楚的答案，你為什麼總是用「和平解決」？你從不用「和平統一」，這真是可惜。

小布希總統：我們又回到台灣了（一陣笑聲），問吧。

問：這是我們中國百姓非常關心的問題。

小布希總統：是的，我知道。

問：三天前當你跟日本首相見面，你說美國記得對台灣的承諾。

小布希總統：是的，沒錯。

問：但我的問題是，美國還記得對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承諾嗎？

（掌聲）請遵守三項公報和三個聲明。謝謝。

小布希總統還是使用了三次P字：「和平的解決」、「和平的對談」、「和平的對談」。還是沒用「和平統一」。他說：「再者，當我的國家簽了一項協議，我們就會遵守。」問答繼續進行。過了一會兒，有人問小布希總統有沒有注意到，跟他上次在一九七五年，當他父親擔任駐中國大使、他來訪問北京時，中國有沒有什麼不同。

「一九七五年時，每個人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小布希總統說，「現在，民眾自己選喜歡的衣服穿。看看這裡第一排坐著的，每

個人的衣服都不一樣。因為這是你要的。你做出決定要穿這件漂亮的紅毛衣，當你做了那個決定，那就是你的決定。」

「換句話說，那個人、那個個體、那個需求影響了產品的生產。認識到個體對自由市場的需求就是自由社會的一部分，就是自由的定義之一。」

\* \* \*

他的最後一句話是：「願上帝保佑你們大家。」我沒有跟其他記者坐專車回去，我自己到清華校門外一家小咖啡廳去吃午餐。餐廳擠滿了學生，但是沒有人談論著這場國是訪問。



【古文物K】

## 遺失的字母

某段特別的細節，在許多人的記憶裡一再重現。每位老人對那起自殺事件都各持己見，常常強調一些別人忽略的東西，如關於外遇的謠傳、批判主義，以及在美國的那幾年。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一致提到陳夢家與文字改革的關係。依循這條線索，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穿越過老人們、詩人學者和安陽的挖掘者，穿越過歷朝歷代，甚至穿越過那些甲骨，最後停下來的地方就是：太初。

\* \* \*

人類塗鴉。在遠古，他們用簡化的和標準化的方式塗鴉，這些塗鴉演變成了象形文字，直到他們遇到了無法畫出的抽象的概念，這時，人類轉向了聲音。

想像以下三個代表英文單字「葉子」（leaf）、「蜜蜂」（bee）和「眼睛」（eye）的簡圖：



現在，識別下面三個象形文字：



很快地唸出：「Eye-bee-leaf; I believe」，這三個字就已經包括了兩個抽象的概念：第一人稱的名詞，和「相信」這個動詞。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加入像下面這樣簡單的標示，讓讀者能夠區分「eye」和「I」，將「believe」和「bee-leaf」區分開來：



在這樣一個系統中，寫字的人聽出單字之間的聯繫——諧音字、近音字、押韻，繼而把原有象形文字的詞彙量擴大。其中的關鍵在於聲音：符號代表的是講話時發出的聲音，而非圖畫，這時你才有了文字。嚴格的定義，文字是：言語的圖形表現。

關於文字的這個階段，沒有人發現過直接證據——這不是會被記錄下來的那種東西，但專家們認為，文字的發生大概就是如此。當現知東亞最早的文字出現在甲骨上時，它已經是個功能完整的系統了。雖然其中很多字跟象形文字脫不了關係，但是商代文字已非象形文字。商代文字中的「眼睛」寫為：



這種文字系統叫作表意文字。每個文字代表一個音節，而諧音（同音異義字），則由不同的文字來表示。例如，現代漢字「偉」的

寫法和「菱」、「偽」不同，儘管這三個字都發一樣的音：wei。其他已知的古老手寫文字，像是蘇美人的楔形文字，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它們首次出現在考古紀錄上，也是在它們的表意時期。（蘇美人的楔形文字是已知最古老的手寫文字，比甲骨文約早一千七百年出現。）儘管梅維恆和少數人的理論是，商代文字和近東文字有聯繫，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漢字是獨立發展而成的。

這些早期的手寫文字來之不易。在表意文字系統裡，讀者必須記住數以千計的符號，當碰到生字時，常得藉助字典才能讀出它的發音。西元前二〇〇〇年期間，近東的閃族最先將埃及的象形文字轉化成字母。字母讓音節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單位，比起表意文字，它有更大的彈性。讀者可以用字母來細分同音異義字（例如「see」和「sea」），而不需採用完全不同的字，因此就算碰到生字，也可以讀出聲來。字母在不同的語言，甚至不同方言之間的轉換也比較容易。例如，聽過美國南部的人說「I believe」之後，你可以用拉丁字母描述出每個音節的發音：「Ah bleeve」。

表意文字系統無法像字母那樣，抓住那麼細微的差別。況且，記一個字母表只需要記住數十個符號，而非數以千計的文字，這就是近東和地中海地區那些古老文字系統沒能存活下來的原因。蘇美人的楔形文字沒有直接的繼承者；埃及象形文字因為啟發了最初的字母而被保留下來，但也只是間接地。

但是中國人依舊使用著漢字。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漢字書寫是獨一無二的：它是一種三千多年基本結構原理不曾改變的表意文字。漢字本身的永恆性也非常驚人。即使到了現在，當一個中國人寫下「目」、「雨」或「牛」時，每個站在商代文字旁邊的現代寫法，似乎都跟它有如親戚般相近：



\* \* \*

沒有人知道漢字系統為什麼仍然如此穩定。古代中國的口語主要是單音節的，而且不可改變（沒有複數字尾和動詞時態的變化）。有些語言學家指出，這些特質使得中文很自然地適合於表意系統。口語音調極富變化的日文，原本只採用漢字，但後來他們把漢字變成一種音節文字，變成一套比較單純的文字系統，使其更容易處理詞尾的變化。

其他學者認為是文化的原因。古代中國的思想十分保守——祖先崇拜、循規蹈矩的本質、抗拒改變，以及儒家學說的崇古，這些價值觀自然導致人們不太可能去修改他們的文字系統。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理論，最基本的問題並不在於文字系統是如何保持穩定，關鍵在於，這種文字的穩定性如何幫助塑造了中國世界。

在中國大部分的歷史中，官方的文字是文言文。這種文字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漢朝時被標準化，此後它一直只以書面的形式存在。人們用文言文寫作，但是他們的日常用語則不同。長期以來，隨著口語的發展、帝國領土的擴張、新地區和新語言的加入，用文言文書寫的傳統保持不變。明朝人說的話跟漢朝人不同——他們之間隔著十幾個世紀，但他們都是以文言文書寫。福建人的方言跟北京人的方言不一

樣，但如果他們都識字的話，他們就都可以看懂對方寫的字。文言文超越了空間和時間，將人們聯繫起來。

換作字母系統，要維持這樣的書面穩定性則比較困難。在歐洲，幾世紀以來，拉丁文雖然是受過教育的人士所使用的書寫語言，但他們一直都有合適的工具把拉丁文轉變成各地的方言：字母系統使得這種語言轉換比較容易（當然，文化和社會因素會延遲這種轉換）。中國有一些方言文字，但十分有限。方言文字比較不可能在表意文字系統中得到發展，它不能像字母一樣，在不同的語言和方言中轉換自如。

但是漢字有其他的好處，它們為帝國的統一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要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統一是一種族群和語言的混合。文字創造了卓越的歷史連貫性：無止境的敘述撫平了歷代的混亂。漢字本身十分美麗，書法成為一種基本的中國藝術。比起西方的文字，漢字的重要性要大得多。文字到處都是：花瓶上、繪畫裡、門口。早期到中國的外國遊客，常常為中國字能那樣被裝飾在日常物品如筷子或碗上，而讚嘆不已。在中國的寺院裡，祈禱者的心願通常是用寫的，而不是用說的，算命先生則常用漢字筆畫來預言未來。十九世紀時，社會機構致力於蒐集寫有文字的紙張碎片，他們無法容忍看著那些紙像垃圾一樣被丟棄。地方上設置了特殊的火爐，讓這些文字能得到適當的火葬。

當然，中文書寫是困難的。為了達到文雅，中國學生必須記住數以千計的漢字。沒有字母次序，要歸類很複雜（甚至到了今天，歸檔仍是挑戰，有索引的中國書也很少）。最早的漢語字典是按形狀來排列文字。長期以來，許多漢字擁有了第二個成分——即現在的「部

首」，它有助於區分和歸類文字。但即使是部首也是複雜的：最早的漢語字典列出五百四十個部首，以及九千個以上的漢字。

這個對自己的文字有強烈認同的文化，識字寫字的動機很強。到了十七世紀，中國已經有了穩固的商業媒體，識字能力在社會各個階層的涵蓋範圍，比起歐洲的許多地區要廣得多。外國遊客就曾注意到，即使在農村地區也很容易找到書籍，往往是些教農民如何擬定簡單合約的參考書。匹茲堡大學的歷史學家羅友枝（Evelyn S. Rawski）針對十八和十九世紀中國男性的基本讀寫能力做研究，結果發現中國男性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跟工業化前的日本和英國男性相較起來，羅友枝的結論是，雖然中國的工業化不如那些國家迅速，但差距的原因不該被歸咎於讀寫的能力。

\* \* \*

對外人來說，漢字的書寫系統卻似乎亟需改革。一位十六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將學寫漢字描述為「半受難」，因此，耶穌會教士會成為最早促使以拉丁字母代替漢字的人，也就不足為奇。幾個世紀過去了，隨著更多外國人的到來，他們一般認為，字母化對大眾有益，當然，對外國人和他們的教堂也有幫助。十九世紀時，鴉片戰爭後簽署的條約允許更多外國人在中國傳教，基督教徒們以地方方言印製《聖經》。按字母順序編排中文成為傳教工作的主要事務。到了十九世紀末，外國人和中國信徒已經為所有主要的地方方言，製造出了對應的字母系統。

於此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正經歷著自己的文化信仰危機。被外國人反覆擊敗後，他們開始對一切傳統的東西，包括珍貴的文字典

籍，產生了質疑。當學者們重新發現甲骨文時，許多中國人正考慮著廢除所有的漢字。一九一〇年代，錢玄同，一位傑出的語言家，建議中國將口語和書寫全轉換成世界語。

大部分的解決之道並不是那麼激進。有些知識分子建議採用同樣的漢字，但是把文言文變為白話文。這個提議在一九一〇年代晚期獲得支持，具體的表現為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該運動呼籲中國採行政治和教育各層面的革新和現代化。

最後，改革者成功廢除了傳統文言文的書寫。學校、政府機構、書籍和報紙開始使用北京地區的方言——即普通話的書寫系統。這與在歐洲發生的不同，在歐洲，拉丁文被多國的語言所取代，諸如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以及其他語言。在中國，主要因為沒有字母，轉變成用普通話並沒有犧牲書寫上的一致。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仍然學著以同樣的方式書寫。

改革者認為有必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他們指出，大多數南方人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二種語言來寫字，例如說一個溫州人要學識字，他首先必須學習普通話。這跟一個說英文的人被迫用荷蘭文來讀寫的情況是一樣的。中國南部中，香港是一個主要特例：香港作家創造出一套用漢字來書寫他們的粵語方言的系統。儘管如此，傳統的漢字與粵語的發音嚴重不符，以至於香港的系統需要一千多個額外的符號，其中有許多是特別為這個系統而製造出來的。其他中國方言並沒有開發出類似系統，所以依然無法被書寫下來，要讓漢字能被使用於各地方言將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若採用字母，則會容易得多，外國傳教士已經用他們的方言版《聖經》證明了這一點。全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呼籲按照字母順序來排序，他們認為漢字是識字和民主共同的障礙。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

現代作家魯迅，提倡轉向拉丁字母。他寫道（用漢字寫下的，他一生都這樣做）：「如果我們要繼續生活，就不能再用漢字……我明白漢字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但我們可以選擇犧牲遺產或者犧牲自己：選哪一個呢？」

一九三〇年，住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創造出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中文系統。文字改革成為共產黨的主要工作之一。一九三六年，共產黨權勢日盛，毛澤東告訴美國新聞記者斯諾，中文字母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遲早的事，」毛澤東說，「我們相信，如果要創造一個人民大眾可以充分參與的社會文化，我們就不得不放棄漢字。」共產黨把漢字描述為橫亘在群眾和新文化之間的「長城」。他們甚至將鴉片戰爭之後國家衰落的原因歸罪於文字，聲稱漢字「助長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侵略」。

在共產黨控制下的北方地區，字母化的文字於一九四一年被賦予合法的地位，合約和政府文件可以用拉丁字母，也可以用漢字來寫。共產黨控制全國之後，文字改革似乎迫在眉睫。一九五〇年，一位叫德范克（John DeFrancis）的美國語言學者在他出版的一本書中，預言漢字的末日即將來臨。

\* \* \*

德范克談到自己那個預言時，還是覺得有點苦澀。我在這位學者的家中採訪他時，每當觸及這個話題，他都顯得很不安。他錯了，但他認為自己沒錯——在他心裡，他認為中國本「應該」擺脫掉漢字，而共產黨掌權之後「應該」馬上執行。無法預料的事情總是令人沮喪，而有時這種讓你想起來難免心痛的記憶，會持續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教授已經九十一歲了，身體健康。儘管他已經從瑪諾亞的夏威夷大學退休了，但仍然把時間花在他的漢語字典專案上。他在瑪諾亞山谷一棟漂亮的日式房屋裡居住和工作。房子後面有一個花園假山，假山中央是個小寶塔，甜美的九重葛葉香飄入敞開的房屋裡。往南，可以看見鑽石山的棕綠色山峰。對於一個想在兩塊大陸之間安度餘生的學者而言，這是個理想的地點。

德范克從耶魯大學畢業後，於一九三三年首次到中國。他原本是打算尋找商業機會的，但是當他到達北京後，一切都變了。「從第一天開始，我就失去了對美國商界的所有興趣，」他告訴我，「我們當時在一家餐館吃飯，用餐結束時，有個美國商人拿出一張鈔票要給中國服務生當小費，他把它撕成兩半，扔到服務生的腳下。我不想成為那樣的人。」

中國的貧窮困擾著這位年輕人，他相信這個國家亟需改革。如同那個時期的很多外國人，他認為國民黨的腐敗無可救藥。他學習中文，並在北京與另一個年輕的理想主義學者喬治·甘迺迪成為朋友。洛克斐勒基金會頒給甘迺迪一筆獎金，讓他在耶魯設立一個中文課程，他用獎金在上海買了一套中文的印刷機字模。甘迺迪計畫把這些字模運到紐哈芬，組裝起來，幫美國學生印中文課本。他請德范克幫忙。

「實際上，我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德范克回憶道，「我們在耶魯的『哈克尼斯廳』地下室裡開始做這件事。想像一個這樣大小的屋子，比這大一點，放滿了V形的木質支架。如果我站起來的話，它們就到我下巴這裡了。支架被分隔成可以放二十五乘三十公分的盤子，然後再把盤子分隔成五乘五公分的小正方形。每個正方形包含一個獨立的漢字，按部首排列。我的工作就是印刷：我拿著排字盤，從

『亻』這個部首中找出一個漢字，然後再到『田』這個部首中找出一個字。我來來回回地走，把幾個句子放到一起，再把它們放到印刷機的金屬鑄件上面。我們有的漢字字模太少了，因此我得不停地組合和拆散它們。我們當時從中國古典文學中選出故事，把他們印成現代白話文。」

每個學過中文的外國人都有相同的經驗——「半受難」，而德范克的經歷特別深刻。經過了長年在木支架上搜尋如亻和田的細小金屬碎片後，他成了一個漢字改革的熱情倡導者。（他的同事喬治·甘迺迪成了耶魯的中文羅馬系統的主要設計者。）一九五〇年，預言過漢字的死亡後，德范克待在美國，急切想聽到文字改革的消息。那個夏天，毛澤東終於下達一個命令：

文字系統必須改革，應該以世界語言通用的語音為走向，應該施行全國式的改革，應該以現存的漢字為基礎，精心製作出一套字母系統。

這個指示使讓所有人大吃一驚。德范克和其他的學者原以為共產黨會直接採用拉丁字母，但一九五〇年的命令將這項運動導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毛澤東要的是一套自己的中文字母系統。

\* \* \*

主席的指令代表著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之後，中國的語言學家花了多年時間，試圖創造出一套截然不同的中文字母系統，同時他們也失去了從事其他改變的動力。德范克認為，這是一次錯失的機會，而

這也正是他感到憤怒的原因。好幾次，他告訴我，因為文字改革的失敗所帶來的苦澀，他有四十九年沒有回過中國。

毛澤東這命令的動機，正如他的許多決定一樣，至今仍然是個謎。有一次，我在電話中跟德范克談及這個時期，他認為，可能是韓戰或美中關係的某些因素影響了毛澤東，使他反對採用拉丁文字。德范克鼓勵我去拜訪那些參加過這個案子的現存中國語言學家，尤其要去拜訪年近百歲的周有光。一九八二年，當德范克最終不情願地回到中國時，他問過周有光有關一九五〇年的那個關鍵決定。

「他說，他知道毛澤東為什麼會做出那個決定，但是他不能說。」德范克在電話中告訴我。但是他認為，隨著中國愈來愈開放，加上周有光的高齡，可能會讓他願意比較放開地談論過去。

\* \* \*

我從第一層樓開始。周有光與另外兩位語言學家，住在北京市區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宿舍裡。三個男人共用一個入口通道。這是共產黨傳統的工作單位安排，一種倒退到計畫經濟時代的做法。但對採訪而言，卻再方便不過了，我要做的只是在樓梯間爬上爬下，然後，我將見到還在世的中國最重要的文字改革者。入口通道變成一座時間和語言的城堡：日子一天天過去，改革者漸漸老去，他們的記憶在失敗的運動年代裡忙碌地遊走。

七十二歲的尹斌庸是他們當中最年輕的，住在一樓。幾個月以來，他都在與肝癌搏鬥，他的身體已耗損：瘦小的胸，脆弱的四肢。他的臉很皺，有著道家仙人式的眉毛，大塊的白膜遮蔽著黃濁的眼睛。但就算這男人深為病痛所苦，他也沒有表現出來。他熱情地歡迎

我，拿出我之前寄來的信。有位學者建議我，用拉丁字母的拼音而非漢字寫封信，聯繫這些語言學者。尹斌庸對我以不用任何漢字的方式跟他聯絡，感到驚喜。

半個世紀之前，尹斌庸畢業於四川大學，主修數學。他當過一陣子的中學數學老師，同時研究語言學並發表文章，最後被聘到北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他的背景並不特別——許多語言學家都精通數學或邏輯學。

「它們肯定是有關的，」他說，「通常，你可以把數學方法直接運用到語言研究上。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就動物而言，哪一種動物與人類的關係最密切？你也許可以把牠們縮小到：牛、馬、狗和豬。但是，哪一種在人們生活中最重要呢？」

「狗。」我說。

尹斌庸笑了，眉飛色舞。「那是你的猜想，」他說，「但你又怎麼能確定呢？方法之一是透過統計來分析牠在文字裡的出現頻率。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五〇年代做的事。我們考察文獻，包括現代的和古典的，看哪種動物的名字出現得最頻繁。在所有的時期中，這個字都是：馬。所以我們斷定在中國，和人類社會關係最密切的動物就是馬。」

種種景象閃過我眼前：一件青銅器，一駕被掩埋的戰車，一個男人騎在馬背上直衝撞上木柵欄，都跟馬有關。尹斌庸繼續說：「我在一九五〇年代寫了篇有關這個題目的文章。我也在英文和日文的文獻裡做過研究，它們都是一樣的。只是關係第二密切的動物不一樣。在英文中是狗，而在我們中國，是牛。」

討論完馬的變形後，他談到了漢字演化的挑戰。有些人認為，漢字有太多的同音字，無法用一套字母來書寫，這些同音字需要有漢字

來做區別。尹斌庸承認，就文言文來說，上述說法是事實，但在白話漢語中則不然。跟收聽廣播一樣——中國人在聽廣播時看不見字，卻也能理解，這表示他們同樣能夠理解一篇以字母表達的文章。

「當然，那只是理論，實踐起來又不同了，」他說，「人們用漢字很久了，要他們改變是很困難的。而且，如果換成用字母來書寫，在面對古典文學時就會遇到麻煩。例如在《紅樓夢》裡，同一輩人的名字都有個相同的部首。如果你改變了書寫系統，你就得忽略這些細節。主要的，老實說，是舊習難改。看看你們自己的語言——書寫英文同樣需要改革。蕭伯納就曾經認為英文需要改變。」

口語英文大概有四十個音素，如果要讓拉丁字母系統有效地發揮，這些音就太多了——所以，英文中時常出現違反邏輯的拼寫。用速記法書寫一切的蕭伯納，特別在遺囑中注明，把未來的版稅收入用來贊助創造一套新的字母系統。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期間，一項公開競賽吸引了四百六十七份英文字母系統的建議方案，獲選的有四份。其中一份由一位建築師所設計的提案，成為最終以四十八個字母組成的「蕭伯納字母」的基礎。使用這套新字母系統的人還出版了一本書，那就是蕭伯納作品《安德克羅斯與獅子》一書的特別版。原書名的四個英文字呈現如下：

יאלכרדעק א פערל

巧合的是，中國人也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建立起自己的字母系統。但是，他們的工程要嚴肅得多。它是由國家主席指揮，動用了全國上下的語言學家，創造出二千多份不同的中文字母系統提案。其中有些使用拉丁字母，有些使用古代斯拉夫文字母，有些合併了日文的字音

表，有些則用阿拉伯文為字母。尹斌庸還記得，有一個字母系統用的是數字。另外一個提案結合了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在這套符號體系中，中文的「法」字（發音為 $fa$ ），被寫成：

ifa

語言學家在拉丁字母上修修補補。有個系統建議，添加四個代表中文特有發音的字母：zh、ch、sh和ng。提案中，ng寫起來就像國際音標符號中的：

ŋ

「東德人聽說了這件事，」尹斌庸說，「他們很快就設計出一個含有那些字母的打字機，而且，還把這台打字機送到我們單位裡。他們說，只要我們真採用這套字母系統，他們的工廠就會生產這種打字機。那是一九五二年左右的事情，我記不太清楚了。但我倒是記得，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那台打字機還在局裡。那是個漂亮的機器，我不知道那台機器後來怎樣了。」

一九五五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將建議案刪除到只剩最後六件。其中一套採用古斯拉夫文字母，另一套採用拉丁字母，剩下的四種則採全新的「中文」字母系統，全以漢字的形狀為基礎。但一年之後，毛澤東和其他國家領導人決定，中文字母系統還不具實用性。他們認可了拉丁字母系統（也就是現知的拼音），用在幼兒教育和其他特殊目的上，但拼音並沒有得到法律地位。同時，他們決定把某些漢字簡化，把原有的筆畫減少。例如guo，在繁體字中寫成「國」，簡化

後寫成「国」，「龍」改寫成「龙」，「偉」改寫成「伟」，「夢」改寫成「梦」。總計有五百一十五個漢字被簡化，同時被簡化的還包括一些部首。字的個別寫法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基本的文字系統依然被保持完好。中文仍然是表意文字，大部分的方言仍然無法被寫出。

文字改革委員會將這次的文字簡化形容為「改革初期」，他們仍然希望提出一套字母系統，但毛澤東好像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考慮這些提議。與此同時，人民共和國與後期相比算是樂觀的建國初期即將結束。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運動，知識分子應邀大鳴大放、暢述己見，不論其觀點批判性有多強。這個運動獲得熱烈的反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公開地對各種議題進行評論。文字改革變成了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們論戰的目標之一，知名報刊上出現了數十篇評論：

漢字是團結人民的工具.....人民繼續團結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漢字把我們維繫在一起。

拉丁字母不是我們民族的產物.....如果我們把漢字拉丁化，我們會跟世界搶拉丁文字。

我們是一個堅持和平政策的民主國家，採用素來侵略性強的拉丁文並不合理.....一旦中國有樣東西比外國的差，中國人民就會覺得中國所有的東西都比不上外國。

\* \* \*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之前，陳夢家在文字改革的論戰中並不算活躍。他所在的國家考古研究所跟其他研究所分開，甲骨文學者從來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隨著新的開放風氣，他的言論突然頻頻出現在各種知名刊物上。在《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中，他寫到：「我們之所以在三千多年後仍使用著這些漢字，一定有其客觀原因。」在《人民日報》上他則寫到：「現今似乎有一種新的教條主義。一些人視領袖的話語為金科玉律，卻忽視了現實。」陳夢家指責人們暗地裡密報抨擊他人的政治錯誤，他評論說，許多官員所學不精、濫竽充數。他建議中國共產黨能夠多一些幽默感。他評論說：「我非常不喜歡教條，而且我的文章很少引用馬列主義的言詞。」在一份公開發表的演稿中，他聲稱：

時值今日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我想，這是坦誠探討漢字未來的最好時機。我將毫無保留地提出一個不同的觀點.....

我們已經使用漢字三千多年了，而這些漢字並沒有任何問題.....過去，洋鬼子說我們的漢語不好，而現在，資本主義國家開明的學者再也不會這麼說了.....

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引起了一些爭議。我願意惹這樣的麻煩，是因為我想有所貢獻.....我預料這些漢字我們還會用很多年，我們對待它們應該就好像它們有生命一樣。它們是我們的文化遺產。

他是對的——中國人在後來的許多年中繼續使用漢字，但他錯以為自己身處在一個能夠自由說話的年代。只不過五個星期，毛澤東就終



止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很快地，「反右」運動取代了它。一九五七年底，至少有三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其中許多人被判入獄，或被下放勞改。曾刊登陳夢家主張的那份報紙，此時正刊登著怒氣沖沖的頭條：

批判陳夢家

打倒右派分子陳夢家的荒謬理論

繼續追打右派：批判陳夢家和關西

有篇文章宣稱：「右派分子陳夢家是一根有毒的草……永遠不能讓他扎根。」另一篇文章則將他形容成心懷「險惡陰謀」的「牛鬼蛇神」：「為什麼每個年代的反革命者都憎恨簡體字？難道他們真的想返古嗎？」一些人寫道：「陳夢家認識了一小撮西方資本主義漢學家，就拾人牙慧，把它們當成寶貝。」那是一九五七年，也就是在那場運動中，學者李學勤發表了那篇批判陳夢家的文章。

陳夢家的反應只有沉默。人民政府將這位甲骨文學者下放到河南，在這個商文化的搖籃裡接受勞動改造。接下來的五年裡，他被禁止在國內發表任何文章。

\* \* \*

和尹斌庸先生談過之後，我往樓上走，訪問了年長八歲的王君。王君已是八十高齡，當我提起陳夢家時，他笑了。「戰時在昆明，他是我的老師，」王君說，「他教我青銅銘文。那是一個小班，只有三個學生，他就像我們的兄長。」

從舊報紙裡，我蒐集了一些對陳夢家的批判，我把它們拿給王君看，問他是否記得這些文章的作者。他翻了翻後指出，一些名字顯然是筆名。然後，他認出兩個人：一位南京的音韻學家，一位福建的語言學家，兩名學者都已經死去多年了。

「你不用擔心這些批評，」王君說，「人們在那些日子裡所說的話和寫的文字，都不能算數。他們沒有自由，如果共產黨想要批判誰，所有人都會跟著批。那些年我也被批判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的時候我發表了一個意見，我的研究所因此特別開了個會來批判我。即使是不認識我的人也不得不批兩句。那些批我批得最凶的人，我都不記得了。我並不恨他們，所以你也不必計較是誰寫了這些文章。」

我點點頭，而後我們聊了一會兒文字改革的事。當討論到傑出的反對派時，我提到了袁曉園女士的名字。

王君愣住了。他平靜地問：「你對她的認識有多少？」

「不多。德范克說，他不喜歡袁曉園，他說她反對文字改革。」

德范克曾經把袁曉園形容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她一生中有很長一段時間，以國民黨外交官的身分住在海外——她是中國第一位女外交官，出使過印度加爾各答，但後來轉投中華人民共和國陣營。出於感謝，共產黨頒給她一個可以賺錢的商業執照，因此發了財後，她拿出一點錢支持一份反對文字改革運動的刊物。一九八九年民主示威被鎮壓後，袁曉園立刻在中國的電視上譴責抗議者。

「那個女人是個騙子，」王君說，「她每件事都撒謊，包括她的年齡。她九十五歲，但卻說自己是一百歲。」

言語間，這個男人的神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依然保持著微笑，但他的下顎緊收，眼睛背後好像有光射出來一般。

「她曾經比周有光年輕，」他說，「現在她比周有光更老。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我說我不知道。

「很簡單，」他說，「她撒謊。她什麼謊都撒。」

這男人還在微笑，而我也報以微笑。不到十分鐘前，他還在談論著寬恕。

「我有證據。」他說。他走到櫃子旁打開一個檔案夾，夾子裡有一疊複印文件和一些發黃的剪報。老人目光炯炯。

「首先，你看這個。」他打開政府年鑑的一頁遞給我，上面有一張照片。一位老祖母：慈祥的微笑、燙過的頭髮、過時的眼鏡。她的生日寫的是一九〇七年。

「現在，」王君像勝利者似地說，「再看看這個！」

那張剪報是二〇〇〇年的，標題寫著：

### 詩人兼書法家袁曉園在北京歡慶百歲壽辰

接下來的剪報出自二〇〇一年：

### 百歲老人袁曉園笑談養生之道

文章裡有幾個段落被小心地用紅墨水畫著線，其中一個畫線的句子寫著，袁曉園的出生年分是一九〇一年，另一句說她已是一百零一歲高齡。頁邊空白處，有人用紅筆寫著「九十四」，就像是給學生作業加的批語。

「每年的報紙都有這些東西，」王君說，「她每年都在撒謊。這就是為什麼她能比周有光還老的原因。」

他指著另一段被畫線的段落。

「她說她曾經當過紐澤西『東西大學』的教授，」他說，「誰聽說過這個『東西大學』？多蠢的名字啊！她還說自己曾在『三藩市大學』任教，根本沒有『三藩市大學』這個學校！」

那篇文章裡每個偽造的學術機構也都用紅筆畫上了線。我離開以前，王君給我那些剪報，他建議將袁曉園的謊言曝光，給我的《紐約客》文章添上一個漂亮的花邊。最後他告訴我：「她的文章寫得不錯。說真的，她是個出色的詩人，而且書法也很好。但她是個騙子。」

\* \* \*

當我上到三樓的時候，天色已黑。比王君年長十六歲的周有光，就要步入九十七歲了，這個羸弱佝僂的男人穿著運動褲和拖鞋。他那禿頭上的皮膚光滑發亮，好像被歲月打上蠟似的。我們交談時，他把手做成杯形靠在助聽器邊，我俯身湊近他，用喊的。但他的思路仍很清晰，也還記得英文。一九四〇年代時，他曾是紐約的一個銀行家。

「我曾經在『銀行家俱樂部』裡讀過你的雜誌！」他說。

我朝他喊著：「那裡後來變了不少！」

老人看了我的名片後笑個不停，我跟他解釋那是外交部的翻譯。

「紐約人士！」他用中文說，他瘦小的身軀像風裡的柳條一樣搖晃著。「紐約人士！太好笑了！」

一如許多旅居海外的、愛國的中國年輕人，周有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回到他的祖國。原本，他想幫助新政府建立它的銀行業，但很快意識到共產黨的銀行業沒什麼前途。他轉向業餘愛好的語言學，最終成為拼音的主要設計人。

我問周有光，一九五五年進入決賽那四套特別的中文字母系統，後來怎麼了。老人對它們的記憶有些模糊——他回憶說，有一套字母，是一位叫丁西林的物理學家設計的。但很顯然地，有關那些字母系統的所有紀錄都被銷毀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像那樣的東西很容易不見的。」他說。

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指責毛澤東，有些人指責江青和四人幫。但從更長遠的視野看來，這是中國長期以來對其自身傳統破滅的高潮。那半個多世紀裡，中國人把他們的文化一塊塊敲下，試圖把造成「倒退」的因素拿掉。文革期間，這個過程變得那麼激烈，甚至到了完全自我毀滅的地步：人們憎惡中國的一切，但同時也憎恨外國的一切。

諷刺的是，文化大革命至少保護了中國的一種傳統：漢字。從大躍進以來，社會動亂阻滯了文字改革運動前進的腳步。當毛澤東去世時，中國人對激烈的文化變革已經失去了胃口。他們從國家危機走到意識形態，再走到虛無主義——然後，他們走向另一個極端，從實用主義和鄧小平的政治口號中找到了歸宿。要務實和現實。實事求是。

現今，除了活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宿舍裡的老人之外，在中國幾乎沒有人談文字的字母系統化。即使這些學者們談起來都帶著感傷。周有光告訴我，中國不會放棄自己的文字，就算會，至少也要再過一個世紀。如同其他語言學家，他視漢字簡體化為一種失敗的經驗。毫無證據顯示，漢字簡體化提高了文化教育的普及率，因為文

字系統的根本結構並沒有改變。如果要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漢字簡體化把中國的文化圈分割了。台灣、香港以及其他海外華人社會依然使用著繁體字。長年以來，進口簡體字的書在台灣是非法的，這種限制出於政治性的動機。但如今，簡體字令人反感的原因主要是審美上的，對於受過傳統教育的中國人來說，寫簡體字就好像美國人把「walking through the Kwik-mart to buy something」寫成「walking thru the Kwik-mart 2 by sumthing」一樣。（「去Kwik-mart超市買些東西」）

\* \* \*

我問周有光關於一九五〇年，毛澤東號召建立字母系統的那個關鍵時刻。令人意外地，老人似乎覺得這問題理所當然。

「當然，共產黨從一九四〇年代就已經開始使用拉丁化的字母了，」他說，「他們想改變是很自然的。一旦掌了權，他們就更小心，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照顧，那是改革被耽誤的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第一次訪問蘇聯。那時，毛澤東視史達林為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領袖，他解釋中國正經歷著文字改革，並詢求史達林的意見。史達林告訴他：

『你們是一個大國，你們應該要有自己的中文書寫形式，不應該只用拉丁字母系統。』那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想要一個全國統一的字母系統的原因。」

我問起韓戰是不是也扮演了某種角色，他搖了搖他的光頭。當我喊出陳夢家的名字時，老人笑了。

「我很喜歡他，」周有光說，「不過呢，老實說，他的反對意見對這些沒有任何影響。」

\* \* \*

下樓：三樓、二樓、一樓。通道的門被打開，通向一座城市，這城市感覺大如整個世界。所有的細節在我腦中縈繞——人和馬之間的關係，袁曉園更改自己的生日，消失不見的字母系統；最讓我震撼的事，是陳夢家為漢字的申辯，如此勇敢，如此代價慘重，而那代價卻完全毫無必要。史達林早已拯救了漢字。

## 第二十二章 濃縮精華

二〇〇二年六月

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幾個月裡，威利持續注意著相關的新聞。有時候，他會打電話到北京給我，通常是問跟阿富汗，或反恐怖戰爭的發展有關的問題。到了晚上，他就收聽美國之音，寫他的筆記：

美戰鬥機繼續在阿富汗執行任務

美國出現更多的炭疽病案例

巴基斯坦警方與反新教徒群眾發生衝突

紐約和柏林舉行和平反戰示威遊行

上帝保佑布希

他也把地方新聞評論翻譯成英文：

有趣的是，兩個兄弟城——寧波和溫州，同時以成為中國的米蘭為目標。兩個城市之間的競爭肯定很激烈。溫州想要成為服飾和皮鞋的首都。在溫州市中心，「穿在溫州」是個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口號。

有時他也以自己的經驗為題材，在筆記上寫自己的英文「新聞」：



去年我們學校很有成就，有二十五名學生被城裡唯一的重點高中錄取。今年學校面對外面社會更激烈的挑戰——一家新的公立學校打算把我們學校鬥到破產.....

到處都是競爭。威利和南西的學校跟公立學校競爭，他們的城市跟寧波競爭，中國跟外面的世界競爭。威利記憶最深刻的童年往事之一，是看著他父親的營造事業受害於他的不識字，一開始成功而最後失敗。至於競爭在威利和南西那一代的故事則是：他們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長大，是市場經濟的小孩。

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二年那個學期一開始，威利的校長就把所有老師叫來，給他們打氣一番。他激勵他們在三個前線上跟公立學校競爭，就跟當年共產黨打敗國民黨一樣。後來威利告訴我這件事時，他不確定那三個前線是什麼。多年以來，中國人帶有數字的標語是如此之多——三這個，五那個的，因此記憶模糊是難以避免的。重點是學校之間的競爭已經白熱化，成為一場戰爭。在一封信中，威利如此寫著：

嗨，牙刷：

我確定春節會留在浙江。學校要求我們給這些「亞戶」學生補課.....二〇〇二年，學校將面臨他媽的那家公立住宿學校的激烈競爭和挑戰，真希望它被賓拉登給炸掉不見。對了，你的家人還好吧？那裡有什麼新的發展？

我得跟你說再見了。現在我得去輔導我的頂尖學生，他們是我二〇〇二這新的一年的財神和希望。

一兩個月之後，威利和南西的銀行帳戶終於存到了十萬人民幣，賭注變得更高了：

嗨，彼得：

你在北京一切如何？首先我要告訴你，可能再過一年，我就會是一個「亞戶」的爹。也就是說，南西懷孕了。

近來我忙著即將到來的高中入學考試。今年對我很重要，學校告訴我，如果讓更多學生進入那所重點高中，我就可以領到一筆可觀的獎金。

威利和南西已經決定，最後還是會回四川。他們還不確定什麼時候，很可能南西跟小孩先回去，威利留在經濟比較好的浙江繼續工作一段時間。家庭分隔兩地在中國是常見的事，尤其是在外來人口之中。大多數人相信在家鄉附近養小孩比較好，因為他們熟悉那裡的文化，有需要時，自己的父母和親戚還可以幫忙。威利和南西的理想計畫是能夠在小城南充安定下來，那裡離威利老家不遠。老師的工作到哪都找得到，況且他們已有不少積蓄，尤其是威利真能領到那筆考試獎金的話。

入學考試定在六月，分兩天舉行。考前最後一個星期，威利不停地補課，榨乾學生，並留意跟考題有關的任何風聲。他的學校再一次賄賂了溫州的教育官員，也再一次地，那人除了一些省略簡要的回答，什麼也沒給。威利痛恨這些重複的事——總是把考題洩漏給公立學校，尤其是那些在溫州市和其他大城市裡的學校。但除了對那個體系和國家嗤之以鼻，他又能怎麼樣？六月初，看完世界盃足球賽後，他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

我很高興中國足球隊被哥斯大黎加隊打敗了。兩個半場我都為哥斯大黎加加油，因為我曾經學過西班牙語。中國隊將為他們在球場上的爛表現感到羞恥。

考試第一天結束時，有個學生的父親來到威利跟前。他看起來似乎很緊張，要求跟威利私下談談。他們獨處後，他跟威利說了一則情報：根據他所得到的可靠消息，貝多芬和比爾·蓋茲會出現在明天的英文試題上。

威利離開學校，走了一段安全的距離後，找到一間影印店，從學生的教科書中，他影印了兩段課文，一段描述貝多芬，一段有關比爾·蓋茲。那天下午，他嚴令學生：只讀這兩段，其他的都不要管。

第二天，閱讀測驗中，有一題是從用簡明英語寫的第九十課直接抄下來的：

比爾·蓋茲出生於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長大。比爾·蓋茲取了他父親和祖父的名字威廉·亨利。他就是個很聰明的小孩.....

比爾從十三歲就開始玩電腦。那時，電腦是個很大的機器。有一次，他對一台很舊的機器發生了興趣。他和朋友花了很長的時間，拿它做各種不尋常的實驗。最後他們發展出一套軟體程式。比爾以四千二百美元把它賣掉，當時他只有十七歲.....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比爾跟梅琳達結婚。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比爾嗜好閱讀，也喜歡打高爾夫球和玩橋牌。

你會想成為跟比爾一樣的人嗎？為什麼？

不久，考試結果公布，威利班上的成績是全校最高的。校長頒給威利六千人民幣的獎金，這相當於他兩個月的薪水。若非貝多芬只是一則謊報，他可能還可以領到更多的錢。

\* \* \*

二〇〇二年夏天，艾蜜莉決定到深圳以外的地方過一個學期。她來了北京，在大學區的一家英文補習班就讀。週末她有時會到城裡找我，一起吃午餐和逛街。一天下午，她來拿一本《紐約客》雜誌，上面有我寫的一篇關於她的文章。她之前已讀過初稿並幫我查證，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篇文章被刊登出來。當然，就跟每件有關中國的報導一樣，一些細節已經成為歷史。現在，民眾不需要特別通行證就可以進入深圳，政府也在討論有可能拆掉那面圍牆。一夜之城又走過了一個時代。

艾蜜莉坐在我的沙發上，翻到文章首頁，上面有張美術家畫的她的人像插圖。她掩口笑了起來：「臉好大！」

那是依照她的一張照片畫的：高聳的臉頰，圓潤的嘴巴。一排隱約的工廠宿舍輪廓當背景。她翻到下一頁，看到一張典型的《紐約客》插圖：一對夫婦抵達一場晚宴，標題寫著：「請見諒，我們來遲了——我們遇到停車問題。」

她翻閱著雜誌，每隔一會兒就停下來讀一下，某篇文章、某則插圖、某首詩。她看完後，我們出門去公園，我問她，文章裡面有沒有她不認同的地方。

「我覺得你對那老闆太挑剔了。」她說。

我回答，她對那個人從沒有好話，尤其是當他企圖跟工廠裡的年輕女孩上床後。

「我知道，」她說，「我不喜歡他，但是我知道他不能對我怎樣。愈想我就愈同情他，他其實滿悲哀的。」

\* \* \*

艾蜜莉是我在涪陵時教過最積極學習的學生之一，是那種對美國文化滿懷好奇的年輕人。那時，她似乎總是在尋找著什麼。有一次，她寄了一封信給田納西納許維爾的鄉村音樂協會，因為她對鄉村音樂很好奇（他們從未回信）。她的筆記是班上最有見地的。身為她的老師，我總希望她有天能繼續深造。

但是，在北京時，她看起來像有心事，而且我可以感覺到，她對學習英文並不是那麼熱中。我想起一九九六年，她在課堂上寫過的一篇關於她姐姐決定搬到深圳的故事：

現在我姐姐已經到那個繁榮的城市五個月了。不知道她還記  
不記得我們的對話，不知道她還是不是一樣的充滿活力。

好幾次她跟我提到，對未來的空虛和無意義感讓她鬱悶。在那一夜之城，她已經有一些成就——在私人學校任教，男友在器具工廠做得也很好。在二十五歲這樣的年紀，她大部分的朋友都進入結婚、買公寓、養育他們的獨生子的階段。但不知道為什麼，她無法跟他們一樣。她難以解釋原因，每次我們談到這個話題，她只說，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似乎既乏味又可悲，只是不斷地累積財富。她痛恨深圳人滿腦

子想著房地產、買賣公寓轉手圖利，然後再全部重來一次。不管處在兩個世界的哪一邊，最壞的狀況莫過於：陷在你所擁有的這個小空間的同時，卻有著一種不安全感，隨時想搬到下一個地方。

因為精神上的問題，她弟弟從沒辦法維持正常的工作，這讓艾蜜莉很擔心。幾年前，她跟我要深圳電台主持人胡曉梅的電話。她承諾，只會在緊急的時候打電話。在北京時，她跟我說，去年當她弟弟的狀況特別不好時，她打了電話給胡曉梅。

「她對妳有幫助嗎？」我問。

「有，」艾蜜莉答，「我們談到那件事，她讓我覺得好一些。」

「她有沒有給妳什麼建議？」

「她跟我說要對自己有信心。」艾蜜莉說。

在艾蜜莉看來，如果人們能夠接受他人的不同，她弟弟的情況可能會好一些。高中時，人們視他為怪胎，其他學生取笑他時，老師也不禁止。她問我，在美國，人們如何對待精神障礙人士，我給了她一些相關文章。但我最大的感覺是無力感——比起在涪陵，她的世界已經變得複雜多了。

我想，跟其他外國人聊聊也許會對她有幫助。我介紹她認識了北京一位叫米米的華裔美國人。那年六月，我回美國時，收到米米的電子郵件：「我前幾天見到艾蜜莉，她看起來還不錯。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她過來吃午飯，然後我們聊天，聽了一會兒音樂（她想知道鄉村音樂是什麼樣子）。」

幾天之後，艾蜜莉寫信來：

海斯勒老師：

一切都好嗎？

我星期天去找米米，跟她聊得很愉快。我想，她有一種讓人放鬆的天性。我們聊了很多，包括「鄉村音樂」，我發現它跟我想像的很不一樣。從前按字面意義，我理所當然地把它視為只跟花、草、小溪、陽光、鄉村的人和單純的愛有關，每件事都既美麗又快樂的一種音樂。

那年夏天，她回到深圳，但是她既沒有結婚也沒有買房子。她又工作了一年，同時利用時間念書，後來考進了重慶的研究所。那是一個培養精障小孩師資的新科系。當艾蜜莉打電話跟我說她考上時，她的聲音聽起來是過去幾年從未有過的快樂。

\* \* \*

當她還在深圳工作時，在一封信中，她提到我為了寫《紐約客》上那篇文章所做的採訪工作：

你的出現點亮了我的大學生活，你讓我知道一個教師可以那樣地跟學生相處。你不知道，我從你給我的作業評語中，得到多大的樂趣，那讓我不再那麼擔憂，也讓我思考。

我一向喜歡跟你談話，你知道我的一切.....但是每次你回北京（在深圳做完採訪後），我都感到那種空洞的緊張。好像我掏空了一切，同時卻什麼也沒有得到。

我剛到北京的時候，從教師轉變成作家身分，感覺並不是太困難。角色基本上很像：我是個在不同的世界裡過濾訊息的外人。但是

過去幾年，當想到艾蜜莉所寫的信時，我了解到，外國特派員永遠是個不自然的角色。當教師時，我從遙遠的地方拿取訊息——美國文化、英美文學，把它們介紹給現今的中國學生。

但作家的工作是從相反的方向介入。我從跟人的接觸開始，然後寫出文章，刊登在遙遠的國家。通常，我在文章中寫到的人，對那種描述他們的語言並不是太了解。刊登文章的那個世界是如此遙遠，有時好像是假的。每年一次，我拜訪在紐約的編輯，我幾乎沒有收過什麼讀者來信。我通常一年只寫兩三篇文章，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那筆稿費足夠維持簡單的生活。《紐約客》一個字的稿費——兩塊多美金，夠在北京吃一頓午餐。一個長一點的句子就夠我吃一個星期。那些就是外國特派員所做的交換：把人們和地方蒸餾成字，賣字為生。

每當收到《紐約客》上登出的文章時，我發現自己會一邊翻閱著雜誌，一邊想我住的這個世界和刊登出我文章的那個世界之間的差距。我拿差距做交易，從中獲取利潤，而雜誌的廣告反射出那個差距有多麼大。一篇關於涪陵學生的軼事，跟下面這些廣告混在一起：Orb Silversmiths珠寶店、紐約Tribeca Grand Hotel旅館和Wildflower Log Homes度假木屋（屋子空地從四萬九千美元起價）。那篇關於波拉特的文章，題目被定為「中間人」，開頭第一句是：「在雅寶路，什麼都買得到。」那頁有則廣告寫道：

每一年，世界的領袖和四千名最聰明的耶魯大學管理學院學生，一起討論面對今日商業和社會上的挑戰與機會。加入其中，成為他們的一分子。



北京拿到二〇〇八年奧運主辦權一年多後，我收到楊司機的女兒寫來的一封電子郵件。我也在一篇《紐約客》的文章中寫到他。他女兒的英文名字是辛蒂，正在國立新加坡大學念電機研究所。她寫說：「你知不知道新加坡的英文很難懂，我們叫它Singlish。跟新加坡人說話時，我總聽不太懂他們在說什麼。我希望可能藉由跟你交流，增進我的英文。」

很難相信一個身穿二手軍服、純樸的男人，會有一個在國外念書的女兒。當我問到她關於電腦語言的研究時，她回應道：

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用Linux做的，因為Linux的圖形比較穩定。我目前正在做的案子跟混成實境（mixed reality）有關，意思是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和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混在一起。我工作的所在是一間特別的房間。天花板上有一個追蹤系統，可以送出超音波，如果你拿著一根棒子，那追蹤系統就會發現你的位置。因為棒子會接收超音波.....

因此在我的研究專案中，我跟我的朋友可以從擴增世界進入虛擬世界，去救援我們的朋友。我們會在虛擬世界跟敵人打一架。如果我們贏了，就可以把朋友救回到擴增世界。我對我的研究非常感興趣。

\* \* \*

每年夏天，我會寄出一百封信給我以前的學生，每年我至少回涪陵一次。有時候，我會去學生目前任教的學校看他們——這些學校都在

偏遠地方。張大眼睛、露出笑容的孩童圍過來看我這個天外訪客。他們通常已經學了四、五年英文，但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

我之所以寫信和探訪學生，除了我喜歡回去外，也是我提醒自己作為一個外國特派員的侷限的方式。距離是不可避免地，那是寫作的特性，但你得找辦法平衡。而我一直謹記在心的是，至少有一種信仰聯繫著教師和作家兩個身分。當一個人學了另一種語言，到另一個地方去——甚至只是用想像的，他就有可能得到一種新的看事情的角度。他可能會誤解訊息，異國的資訊讓他感到困惑——我自己就不斷目睹那樣的情況發生。但如果願意用耐心、決心和誠意，儘管只是往外瞥了一眼，都可能讓一個人在這世上活得更加自在。

二〇〇一年，中國教育部公布了一項拓展英語學習的計畫。學生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必須上英語課。到頭來，除了每個中國大學生之外，還會有二億以上的中國小孩在學英語。（相比之下，不到百分之九的美國大學生選修外語。）在新頒布的中國課程中，教育部強調，學英語的原因，主要為年輕人將來跟外面世界互動做準備。課程中也提到，學外語可以「發展學生的個體性」。

在北京，我訪問了教育部一位叫張連仲的官員，談這個新計畫。張先生在英國讀過研究所，談起留學生涯興趣盎然。當我問到他「個體性」（individuality）這個字時，他承認，在中國教育裡這是個新觀念。「就好像法國人對人性主義的想法，」他說，「在公文中，我們從來沒有用『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這個字眼，因為它在中國有負面的涵義。所以我們繞過它，我們說，學習外語可以幫助發展個人的獨立，我們要去強調每個人是與眾不同的。」

過去幾年，我接過數百封來自四川和重慶的信，有我教過的學生寫來的，更常見的是他們的學生寫來的。郵戳來自各地，某個名不見

經傳的小山村或無人記得的小城鎮，每個孩子都用自己的英文寫道：

我的英文有些進步。不過，我發現有些成語和常用語很難學。比如說，「得了感冒」（have a cold）和「染上感冒」（catch a cold）。得了感冒是你有了某個東西，染上感冒是你做了某件事。首先你必須先染上感冒，才會得到感冒。您可以給我一點指導嗎？拜託？

我阿姨也告訴我一定要努力學英文。如果我把英文學好，我可以去挪威的首都奧斯陸。我要把英文學好一點，這樣我才可以去奧斯陸。但是我擔心我不能學好。我希望你幫我。給我一些建議。

我是一個在重慶秀山第一中學念書的中國女孩。你的學生曾斌是我的英文老師。我十六歲，但身高只有一百四十五公分。有些同學取笑我，但是我不生他們的氣。我跟他們說，我是濃縮精華。我想這是自信。我需要自信，因為自信是成功的首要祕訣！

\* \* \*

二〇〇二年十月，威利買了一本新的筆記，來記他的美國之音筆記。他所記下的東西愈來愈長，愈來愈詳細，到了十一月時，多了一些新的題材：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日

「以自由之名，美利堅共和國將帶領一個聯盟去解除它的武裝。」

比起一個中國工人一年製造一部半汽車，一個美國工人一年可以製造二十五部。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日

下午兩點二十五分，我女兒在樂清出生，我太興奮了！

菲律賓。一架小飛機今天在起飛前撞毀，機上至少有十四名乘客喪生.....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女兒今天很乖。她媽媽跟我說，她昨晚哭了一會兒。她很喜歡喝奶，喝很多。她好可愛。

消息是在第十六屆共產黨大會閉幕時發布的。新華社的中國官員證實，中國主席江澤民將退任.....

聯合國祕書長安南說，伊朗跟核武檢查員合作是很重要的。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我今天沒什麼課。女兒很乖。南西跟我終於決定了她的中文名字——戴悅燦，代表她是星期天生的，會有好前途，快樂一輩子。幾位同事來看我女兒。他們很稱讚她，我很高興。

布希總統前往布拉格參加北約高峰會議，典禮邀請了多個東歐國家加入同盟.....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今天我們帶女兒搭計程車到本地醫院去打肝炎預防針。但因為是週末，他媽的醫生放假。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明天是我女兒出生滿四十天。我們要去照相館給我女兒拍照。這些照片很重要，因為它們會是悅燦出生以來的第一組照片。

布希預計在今天對伊拉克武器宣言發表第一次公開評論。

有次我到溫州時，威利給我看這本筆記，我問他，為什麼把當父親的經驗和美國之音的筆記放在一起。他說，當他的女兒長大了，她可能會覺得這很有意思。「這會幫她記起很多過去發生的事，」他說，「也許到時候，世界會變得很不一樣。這是給她的一本真實的歷史課本，關於她自己，也關於這個世界。」

\* \* \*

那年期末，就在大考之前，威利的同事們拿到一份有利的內部情報——從溫州教育局洩漏出來的一份政府文件，裡面清楚地寫著考題中的一個單元。

再一次，威利拿著那份文件離開學校。但這次，他把它傳真到溫州的一家有線電視台，一個叫「零距離」的揭發真相節目。這類節目在中國愈來愈多。記者不能直接攻擊黨或政府高層，但他們常常揭發地方腐敗。

傳真之後，威利還打了通電話給該台。為了小心起見，他使用公共電話，並拒絕透露真實姓名，只自稱是個「鄉下來的教師」。他建

議那家電視台派一位記者，在學生離開考場時訪問他們。手上擁有那份文件，他們要證明有洩題並不難。

那樁作弊事件被「零距離」揭發後，該省有幾家報紙也做了報導。《南京週報》的一篇報導這樣寫著：

### 「溫州高中入學考作弊案大調查」

六月十二日下午兩點三十四分，溫州有線電視台「零距離」節目接到一通某中學英文教師的電話，該教師不願透露真實姓名，但提供了一些不尋常的內幕.....

記者調查過程中發現，那個神祕人非常小心，傳真和電話都使用公共電話，記者無法找到本人。

過了好幾個月之後，威利才跟我說起他做的事。他說那個事件被揭發之後，安全官員到溫州學校詢問調查。不難看出，他們要找的是洩題的源頭，而非舉發的人，所以他並不是太擔心。我問他為什麼要冒那個風險，他說：「我是為鄉下學生做的。每當這種事發生，只有城市的學生得到消息，這對鄉下來的學生而言，是不公平的。」

【古文物L】

## 抄錯的字

陳夢家的兄弟姐妹中，還在世的只剩一位。不知道為什麼，趙老從未提起過他有這位親人，但上海博物館的老館員告訴我，陳夢家還有個弟弟住在北京。他的名字是陳夢熊——陳家五兄弟的名字中間都有一個「夢」字。

夢熊是一位退休的水文地質學家，也是中國科學院的會員。一九四六年，他在長江流域的三峽從事調查工作；當時，在美國工程師的協助下，國民黨打算在三峽蓋一座水壩。那計畫的英文是「Yangtze Valley Authority」（長江流域水利局），取名自美國的「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夢熊的工作是評估地震對水利工程所在地的潛在風險。

八十五歲的夢熊依然是個大個子：高大的身材，白髮，講話時，厚重的雙手晃動不停。我們在他位於三環路的小公寓客廳見了面。他太太端來兩杯茶，客氣地問候了一聲，就消失到另一個房間。夢熊說他自己患了感冒，他看起來疲憊而且帶了點警惕。我感覺到，這將是一場簡短的訪問。

他給我看陳家唯一的一張合照。各種留住時間的方式中，給人感受最強烈的，莫過於一張大家庭的合照了，尤其是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合照中，穿著黑綢袍的父母坐在正中央，陳父的黑西瓜帽讓人回憶起在清朝的日子。他腳邊站著身穿寬鬆童裝的夢熊和他的小妹。夢家和弟弟夢學穿著傳統中國學生的長黑袍。他們的長兄夢英則完全

不同：戴墨鏡，穿西服，打領帶。他們的大姐：擦著口紅，時髦的髮型，窄翻領，剪裁恰如其分的外套，就算是處在美國大都市也不失流行的打扮。這是一個轉型中的家庭，一個轉變中的國家。未來的夢。夢。

\* \* \*

夢熊說，一九五七年，他哥哥公開保衛繁體中文後，就被打成右派分子。黨送他到河南去接受勞改。

「他在那裡待了兩三年，」夢熊說，「我不太清楚他在那裡做什麼，不過我知道他還是找到辦法同時做考古研究。那些年我自己也很忙，負責的事很多，那也是為什麼黨沒有給我戴帽子。你知道『戴帽子』是什麼意思嗎？一旦你戴上右派的帽子，你就沒法做事。還好我的工作有其必要，他們才沒給我戴上帽子。」

他繼續說著：「我不記得夢家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但他們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才把那帽子拿掉。那些年我們不是很常見面。在那之前，他一直很外向活躍，但回來之後，他變得話不多。」

老人咳嗽起來，他啜了口茶。我們已經聊了半個小時，大多跟陳家還有他的研究有關，這是他第一次觸及政治話題。但那個故事隨即又游離跑遠了，老人回憶起他哥哥從甲骨到京戲的廣博興趣。我們聊了一會兒明朝家具，然後他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

「我哥哥常說，他要把那些收藏捐給國家，」他說，「但最後趙老把它們賣給上海博物館。我跟他本來是朋友，那之後就再也不是了。夢家要把那些家具捐出去，不是用賣的。那之後，我再也沒跟趙老說過話。」



在上海，那館員曾跟我說，趙蘿蕤原本答應把家具送給博物館，博物館只需給她一點點錢，但是她突然作罷，館員相信是趙老說服她那麼做的。她過世後，趙老捐了那筆收藏，拿到了比原本高很多的價錢。我問夢熊，他為什麼那麼做。

「因為他貪心。」夢熊不帶情緒地說。他解釋說，陳夢家的一些書信和照片，也在北京的潘家園古董市場出售過。趙老辯稱是四合院的一名女傭人偷賣的，但那事件激怒了夢熊。北京報紙報導過這起糾紛。

上海博物館員影印過陳夢家的信給我，信中他表達了把家具捐給博物館的意願。那份文件在我的背包裡，我拿出來給夢熊看。老人把眼鏡戴上。突然之間，房裡一片寂靜。

「你這是哪兒拿的？」他問。

「馬承源給我的。」我說。

夢熊注視著哥哥的筆跡，時間緩慢地流逝著。慢慢地，他唸出那個日期：一九六六年。陳夢家自殺那年。老人說：「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封信。我能影印一份嗎？」

\* \* \*

在中國，當談到不愉快的往事時，人們的談話變得迂迴，描述變得鬆散，像一團繩線散落在地，聽的人得用想像把所有事串連在一起。有時候，最重要的細節全被省略了。但是，一旦中國人決定跟你開門見山，他們的坦白也會讓人招架不住。他們常是不帶情感，不拖泥帶水地直話直說。在某種原因下，看到他哥哥的信，讓夢熊想起了那段故事並拉著不放。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他毫無倦意地聊起來。

「夢家從右派平反後，每天都在寫東西，」老人說，「他不停地寫有關甲骨文和考古的東西，他對其他的都不在乎。他死後留下許多資料，很多都還沒有發表過。」

他說，那些年趙蘿蕤也是寫作不輟。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他們再也無從躲避。夢家的個人背景使得他自然成為目標：他在美國待過多年，他蒐集古董，而且他還支持保護繁體中文。

「那年八月，紅衛兵開始了反四舊的運動，」夢熊追憶著，「我也被批鬥。我的大兒子那時大約九歲，我要他到夢家那兒去，跟他說要小心，夢家有那麼多古畫、古書和古董。我跟他說，要把它們丟掉或者藏起來。我兒子回來說，一切都沒事。」

老人望出窗外，他粗厚的手搓揉不安。

「我相信事情是在那天晚上發生的，」他和緩地說，「我記不太清楚……」

他想了一下。「我確定，」他最後開口，「那天晚上是夢家第一次自殺。他吞了安眠藥，但是沒死。他們送他去醫院。第二天聽到消息後，我趕去他家，門上被貼了批判的大字報，進門後我才知道，那四合院已被紅衛兵占據了，他們把那裡當成一家搞運動的總部。他們馬上抓住我，說：『很好，自投羅網。』」

「夢家的太太也在場，他們要她和我坐在庭院裡的椅子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的頭髮剃光一半。那時候，那叫『陰陽頭』，是常見的一種處罰。然後，他們抽出皮帶，開始鞭打我們。剛開始他們用這裡……」老人摸著皮帶的前端，然後他的手滑到帶扣，「過了一會兒，他們改用這裡，有鐵的這個部分。我開始流血。他們抽打著我的頭，我穿了件白襯衫，那個時候是夏天，整件襯衫都是血。他們沒有像打我的頭那樣打蘿蕤。過了一會兒，我傷得愈來愈重，我請他們讓

我去附近的診所包紮一下。我跟他們解釋，否則我將失血過多，我跟他們發誓會馬上回來。他們最後答應了。在診所的時候，我打電話給工作的單位，他們馬上派人過來。他們跟那些紅衛兵解釋說我是個好人，後來紅衛兵就放我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遇見我太太——不是你剛剛見到的那個，是我當時的太太。我要她趕緊回家。那是個可怕又危險的日子。整個晚上，你可以聽到他們敲門和打人的聲音。」

「夢家在醫院待了一陣子，但因為他的背景，他們把他趕出醫院。後來，我再也沒有去過他家，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一個星期後，他自殺了。他們家裡有個女傭，我想，就是她發現的。當我知道後，我也無法到他家去，我自己都被批鬥著，更不用說舉行什麼葬禮了。」

\* \* \*

陳夢熊是共產黨員。他哥哥自殺時，他還不是；後來在一九七〇年，當政府派他重回三峽的葛洲壩水電站工作時，他也還不是。但他的工作和以前一樣，負責評估地震的風險性。不過這次，他是在共產黨而非國民黨的政府下做事。「長江流域水利管理局」的名稱已成歷史，在新中國，沒有人會允許使用一個受美國人啟發的名字。

地質學家用一套標準化的數據系統來顯示地震的危險性，陳夢熊評估葛洲壩的風險指數是六。那是個處於危險邊緣的數字：指數如果是七，水壩就必須加入抗震的設施，重新設計。陳夢熊的評估出來後，那個案子的副主任要他把數據改成五。夢熊不願意，有段時間他擔心會給自己帶來不良的後果，但那個時候，其他分心擾人的事太多了，他因此逃過了被政治鬥爭的一劫。

葛洲壩的幹部採用的是一套叫「三同時」的策略——同時調查，同時設計，同時施工。通常，這三個元素是有先後順序的——先調查，接著設計，然後再施工。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舊辦法全行不通，幹部們相信，調查、設計和施工應該同時進行。因此，當陳夢熊在做調查時，工人同時在挖著洞，工程師做設計時，洞還在挖。一九七三年，周恩來終於下令放棄那個案子。花了三年，他們的結果是一事無成。改革開放後，水壩的工程才又重新開始，整個工程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才宣告完成。

也就在那個十年中，年逾七旬的陳夢熊終於加入共產黨。他不是因為信仰而入黨，而是單純地因為在地質礦產部，他已經到了需要黨員身分的位階，否則不能參加某些特定的會議。跟現今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他真正相信的是實用主義政治。

當你看著那張一九二〇年代拍的大合照，看到那清式的禮服和西裝，充滿希望的年輕臉龐和以他們為傲的父母，你不免疑惑，那段時間和那些才華都跑到哪兒去了。夢。

\* \* \*

夢熊的故事並未隨著他哥哥的死而中止。他喝了一口茶，繼續說。

「我太太那年也出了事，」他說，「她的階級背景不好。她父親是位有名的書法家，曾在國民黨政府裡做事，所以她的麻煩很多。一九五七年政治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正好離家工作，她自己跟孩子留在北京。反右運動把她給嚇出了精神病。她在醫院住了一年後，才好了

些。在那之前她是個物理老師，但從那之後，她沒法教書了。她到了另一家工作單位。」

「一九六六年，夢家死後不久，她的單位要她在複寫紙上抄寫革命歌曲。歌詞是：『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同樣的歌詞一再地重複。但是她寫錯了一個字。她把『萬』寫成了『無』。」

夢熊把那兩個字寫在我的筆記本上：

万岁

然後他又寫兩個字：

无岁

繁體字的「萬」和「無」一點都不像，但是簡體字很容易混淆，一九六六年，中共實施簡體字還不到十年。「無」的意思是什麼都沒有。在夢熊太太的錯誤下，那句歌詞變成：毛主席無歲。

「她馬上被拘捕，」夢熊說，「被下放到河北大約有五年的時間。其中有段時間，她被關在豬舍裡。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她回來後，已經再也不是同一個人了。最後，她的健康更惡化，臨終前，她幾乎完全癱瘓。她死於一九八二年。」

老人苦笑一聲，他說：「那是段悲慘的時光，死了很多人，很多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失去心智。現在中國年輕的一輩對陳夢家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他的詩或是他的學術研究。他死了快四十年了。」

## 第二十三章 巴頓將軍之墓

二〇〇二年六月

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的慣例之一是到處觀光。每次我來，至少都會花一天時間在城裡閒逛，到波拉特想去的景點參觀。「阿靈頓國家公墓」是他名單上的最後一個地方。他開了那部本田車來接我，我們先到一家有露天座位的咖啡館吃午餐。那是一個完美的六月天。

波拉特最近剛搬家，還換了工作。他還是住在第六街的唐人街，但是搬到了隔壁那棟公寓，就住在他維吾爾朋友的樓上，比起先前跟中國房東分租的情況好多了。他還是做外送，但現在打工的這家叫「調味料」的亞洲餐廳，客人給的小費比較高。老闆是位新加坡華裔，剛到美國的時候，在越南餐館洗碗盤，現在是個自己做生意的百萬富翁。波拉特剛開始在他那兒打工時，他就刻意跟波拉特提他的奮鬥史。「調味料」的外送，一個小時五塊美金，小費另計。

過去的兩個月裡，本田車送修了好幾次（花了一千美元），加上停車罰單不斷累積（又是另外三百美元）。不過波拉特的英文持續進步著，他在處理問題上也愈來愈有自信。最近有天晚上，叫外送的那個人故意不給錢，接過食物道聲謝後，就把門關上。波拉特在門外等了一會兒後，開始敲門，那男人終於來開門，說他沒錢之後又把門關上。波拉特再敲門，然後大喊要去叫警察。那男人終於出來把錢給付了，說他只是「開玩笑的」。

在波拉特眼中，看起來像是中東或中亞的移民，是華盛頓特區的少數族群中情況最糟的一群，至少在九一一攻擊之後。「維吾爾人找

工作愈來愈難，」他說，「我有個叫穆罕默德的朋友最近去應徵一份工作，接下他的申請表的是一個白人。那人看了看表格上的名字，抬起頭：『噢——穆罕默德。』他說他會打電話通知，但從來沒打，這種情況很常發生。」

我說，這種情況應該會隨著時間而好轉，但是波拉特搖搖頭。

「像這種事是不會改變的，」他說，「我不相信那些感覺會自動消失不見。事實上，隨著時間，它們只會變得愈來愈深。每次人們看到電視上那些照片，聽到新聞上出現『賓拉登』或者『伊斯蘭教』這些字眼，就會加深那種感覺。」

他太太申請簽證來美國看他的事情依然沒有進展。移民局的進度放慢了下來，好幾個月以來，唐人街與新疆之間緊繃的深夜國際電話，一直維持不變。

午餐吃到一半時，他起身去看停車投幣有沒有逾時。吃完後，我們坐在陽光下聊天，我問他後不後悔來美國。

他回答：「維吾爾人有句話說，『後悔不是真男人』，沒什麼好擔心的。我相信每個移民剛來美國時，都有段時間會比較辛苦，剛開始的幾年，對誰來說都是困難的。」

中國政府不斷施壓，迫使美國把維吾爾的獨立組織列入它的反恐戰爭之中。一月底，中國駐美辦事處發布一項報告，宣稱一個叫「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組織獲得賓拉登的金錢和武器資助。根據中國政府的說法，「東突」是過去幾年在新疆發生的一連串恐怖主義行動的幕後主使者。

那份報告出來的第二天，「東突」的領袖得到自由亞洲電台電話訪問的機會。那人的名字叫麥合蘇木。他拒絕透露所在的位置，中亞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訪問中，他強調該組織不曾接受過賓拉登或蓋達

任何金錢資助。「我們跟塔利班沒有任何關係，」麥合蘇木說，「我們自己的麻煩就已經夠多了。」

我們對麥合蘇木、「東突」，或者其他被中國指名的維吾爾組織都一無所知。過去十年來，新疆的暴動都是零散且匿名的，正式組織從未承認他們策動過任何暴動，這使得外界很難分析。外界所得知的只是些很零散的訊息，而且很多根本是說不通的。一個照理說是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的恐怖分子，會願意在美國資助的電台出聲——就好像是賓拉登把自己的錄音帶寄到美國之音，而非伊斯蘭教的半島電台，實在是件很奇怪的事。中國指稱「東突」跟賓拉登有聯繫，「東突」卻選由美國參議員漢姆斯和其他愛國的美國保守分子所支持的自由亞洲電台發聲，這也完全說不過去。

\* \* \*

每趟回美國都讓我想到，以我看來，這個國家的歷史永遠會有個洞。在機場，我看到更多的國旗和安全警衛；在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等城市，我看到處處架設起柵欄。新的用語出現了：反恐戰爭、邪惡軸心、橘碼、<sup>8</sup>愛國行動。我在祖國（Motherland，指中國）登機，在家園（Homeland，指美國）降落。我總以為，當一個國家得使用這些詞彙時，並不是什麼好徵兆。而住在中國的經驗讓我相信：恐怖事件發生當日的人們表現得如此關切，這也是不健康的。不過，這種站在距離外的觀察是容易的，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當歷史在美國發生時，我人並不在家鄉。

在中國時，身為外國人的我一直在距離外觀察，現在我回到一個正從傷害中復原的國家，人們從回聲和記憶裡重整自己。事件的真相



還不明朗，但陰影卻歷歷在目。證據很重要，但故事也很重要。從外面回來，各種武斷的說詞讓我震懾：巧合與疑惑，被強調的事件以及容許消失的事件。意義和渾沌事實之間的分野，經常模糊在了一起。

在中美之間穿梭旅行的感覺逐漸變得一樣——舊有的界線和分野開始模糊起來。我剛住在中國時，感受最強烈的是那裡的不同，但隨著時間過去，那些不同變得愈來愈熟悉。美國人和中國人有一些相同的特質：他們都重實效而不拘形式，他們都有一種輕鬆的幽默感，兩國的人民都趨於樂觀，有時甚至太過頭。他們都勤奮工作——商業上會成功，會走向物質主義是很自然的。他們都非常愛國，但愛國主義是基於信念而非經驗：比較之下，兩國在國外住過的人不多，但這些人還是非常愛國。當他們真的出國，他們通常也不是很好的旅客，很快就開始抱怨，而且適應得很慢。他們問外國人的第一個問題通常是：你覺得我們這兒怎樣？中國和美國在地理上都是與外在隔絕，而兩國的文化又是如此的強大，所以，兩國的人都很難想像別人的觀點是如何。

但這兩個國家又各自扎實地團結在一起。它們有廣大的領土、眾多的少數族群和語言，不管是多嚴密的軍事或政治力量都無法把它維持得這麼久。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特定的思想把人們凝聚在一起。當漢人談到文化和歷史，讓我聯想到美國人談到民主和自由。這些是兩國人民基本的價值觀，並且含有信仰的成分。如果你真的去調查——去看看甘肅的一個考古遺址，或者佛羅里達的某場選舉，你會看到躺在表面下的不安定元素。兩國都有些能言善道的強勢人物，他們把不安定安撫下來，創造出關於自己的動聽故事。

這也是為什麼兩個國家如此無法面對失敗的原因之一。只要事情一有差錯，人們就被這些混亂嚇得手忙腳亂——幾艘載運著鴉片的船

隻、幾個帶著小刀的人，都會變成很奇怪的衝擊。對於一個習慣於控制和組織周遭世界的文化，那種事件的傷害是很深的。因此很自然地，當遇到最嚴重的危機時，美國人採取犧牲民主和自由，而中國人則轉身跟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對抗。

然而，就算是那些最糟的時刻，在像維吾爾這樣的少數族群看來，也只是歷史的驚鴻一瞥。對波拉特而言，世界一向反覆無常、不可預料，今後也不會有什麼不同。後來，那年夏天，八月時，他將會打電話到北京給我，說他太太要求離婚，她不想再等了，況且，跟兩年前比起來，從中亞移民到美國好像也不再那麼具吸引力。

後來，也是同一個月，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將訪問北京，他會宣布美國已經把維吾爾「東突」團體列入反恐之戰的敵人之一。很多分析家將抨擊這項決定，相信這項決定將讓中國有更多壓制新疆少數民族的藉口。但美國必須為即將在聯合國所面臨的，跟伊拉克有關的辯論做準備，而中國在安理會有永久席位。在北京，阿米塔吉告訴記者：「總之，我認為中美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前景良好。」

但那些都是未來的事。在華盛頓特區這個六月的下午，天氣如此之好，空中晴朗無雲。波拉特開著他的本田車，穿過波多馬克河，來到了阿靈頓國家公墓。

\* \* \*

我們在約翰·甘迺迪的墓前停留了很長時間。墓園遊客很多，但是一看到那「永恆的火燄」，<sup>9</sup>人們就安靜了下來，只剩輕聲細語和花崗石上的腳步聲。

離開之後，波拉特的眼神露出光采。「二十年前，我說我要去參觀甘迺迪的墓，今天見到了，」他驕傲地說，「我在新疆看過關於他的電影，讀過有關他的書，我記得讀過些關於他死因的推理，有些人說，他是被克格勃或中情局暗殺的。但是我關心的不是這些，我總覺得甘迺迪是個信奉自由的人，他不應該死的。」

我問他，要不要去看阿靈頓的其他名勝，他說，他一直想在巴頓將軍的墓旁照張相。

「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巴頓的電影曾經用維吾爾文的字幕上映過，」他解釋道，「對我們的影響很大。片中有一段，巴頓說他有多恨共產黨，說什麼他要摧毀每個有共產黨的地方，那對維吾爾知識分子有很大的意義，因為那是我們面對了五十年的問題。我跟我的朋友以前常會談到電影裡的那一段。」

我找了一個墓園的員工，問他巴頓的墓在那裡。那人瞪著我們看。

「不在這裡。」他說。

「那在哪裡呢？」

「巴頓葬在盧森堡。」

波拉特在一旁聽著，看起來一臉困惑。我試著解釋，但我不知道Luxembourg的中文怎麼說。

「那是歐洲的一個小國，」我說，「離比利時很近。巴頓可能死在那裡——老實說，我也不清楚。」

波拉特聳聳眉。接下來，我們花了半個小時在墓園裡走來走去。午後陽光下，那一排排的墳墓跟骨骼一樣白得發亮。我們在停車場找到本田車。當夕陽的影子開始拉長時，我們開車回唐人街。

---

8 編按：美國政府針對恐攻警戒所發布的安全警報代號。

9 編按：甘迺迪墓上的一個噴火點，火焰不斷噴出，用以象徵他對國家的熱愛。

【古文物Z】

## 賣掉的字

孩童時期，高奕睿在莫斯科住過五年，那時他喜歡看一系列的蘇聯西部片。「那些片子叫《復仇神仔》，」他還記得，「裡面有三、四個主角，好看的西部片裡的所有元素它都有：同樣一批牛仔，都騎馬。那些電影都以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的蘇聯內戰為背景。裡面有槍戰，而好人總是有辦法脫逃。主角是小孩子——破壞白軍行動的青少年，還有一個吉普賽人、一個女孩，和一個知識分子，都是政治正確的典型俄羅斯人。」

至於高奕睿自己，則並不屬於任何典型的種族：他有二分之一匈牙利人、四分之一哈薩克人、四分之一塔塔爾人的血統。他的童年大部分在當時仍實行共產主義的匈牙利度過。大學時代他到中國讀書，然後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念研究所，博士論文是關於古代漢字的發展。他目前任職於大英圖書館，管理著敦煌原稿：那些於十九世紀初期在中國西部發現的佛教典籍，已有上千年的歷史。

中國人對這些典籍被大英圖書館收藏一事非常敏感，常說它們是「被掠奪的」，但是高奕睿認為，那樣的說法過於輕率。當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政府委靡不振，輕率地把古文物賣給外國人。不管人們在道德上對那些行為的感覺如何不舒服，但過程是合法的：文稿與錢的交易都有完整紀錄。目前，高奕睿正和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敦煌手稿「虛擬圖書館」網頁的設立。真實的古文物還是在英國，但透過電腦，全世界每個人都可以看到手稿的影像。

高奕睿的興趣不僅止於古董。他研究各種形式的文本：過去和現代的、正式與非正式的。他對電腦很在行，正在學習西夏文——一種在中國西部出土的刻文上發現的死語言。他也在學維吾爾文。來北京的時候，他蒐集各種餐廳菜單，用來分析一般百姓寫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樣子。他對旁門左道的用字尤感興趣——錯誤的和故意寫錯的。有時候，他會買些盜版的西洋DVD，去看裡面那些跟原意完全不同的中文字幕。有一次，高奕睿拿盜版的《虛擬偶像》的英文對白和中文字幕做了比較：

（對白）「我就是那個主要的發言者，你一定要記住我說過的話：『誰需要人類？』」

（字幕）「我是速度之王，你一定，我的速度代表人類。」

（對白）「席夢有跟珍方達年輕時一樣的聲音，蘇菲亞·羅蘭的身材，她的優雅，嗯，有如葛麗絲·凱莉般優雅，還有奧黛莉·赫本加上天使的臉孔。」

（字幕）「席夢有年輕複製討厭鬼的聲音，莎發拉玲的身材，好優雅的凱莉的優雅，還有阿弟法盆角度的臉孔。」

菜單和盜版片，歷史和電影，語言和考古……都是相關的。不管過程看起來有多反覆無常，文字創造出意義的本質是不變的。「真實是什麼？」在我們一次北京的談話中，高奕睿這麼問：「就是大量的數據。有位對我影響很深的哲學家卡西勒寫過一本叫《語言與神話》的書。他的觀點是：語言本身創造了真實。比如說，為了要有代表名詞的字，你首先必須有概念。形成概念的同時，你創造出一些東西——那就是一種創造的過程。你從環境中去找某些東西，給它們標上稱

呼，就這樣，你在周圍創造了一個真實的世界。當你小的時候，你不只是在牙牙學語，你還在學怎麼察覺真實。這很像電腦語言，有個內在程式讓你能夠思考。」

「這在語言學上是個很古老的概念，很多現代人不相信，但我想它在某種程度上有其真實性。也許，當你找不到字來形容某種特定的感覺，或特定的顏色，你就不會特別注意那感覺或顏色，它不會特別顯著。這就是字的功能：它們讓事物凸顯出來。否則，那些事物可能只是一堆模糊的數據。用電腦語言來說，可以稱它們為不可解的數據。因此，語言就是你的瀏覽器。」

\* \* \*

高奕睿精通五種語言：匈牙利文、英文、中文、日文和俄文。他學外語的動機很少跟學術有關。他學中文是為了脫離匈牙利軍隊；學日文是因為那時他交了個日本女友。搬到美國去跟中國太太在一起後，他的英文變得很流利。今天，那些女人已不在他的生活裡，但語言還在。

二、三十歲的時候，高奕睿在世界各地來來去去，學習新語言與技能，與此同時，他童年的那個國家發生了改變：俄羅斯的孩子不看蘇聯西部片了；匈牙利也不再是個共產國家，不再有強迫式的兵役。近年來，高奕睿在布達佩斯有一個固定的家，只要工作上允許離開英國，他就回到那裡。在布達佩斯，他的同居女友是他二十年前的高中同學。我問他為什麼會回去，他的答案很簡單：「整個成人時期我都没在家，所以，現在我決定留在這裡。」

多年的異國經驗讓他極善於比較不同文化的差異。他的學生有中國人也有美國人，他跟我說，美國人跟文字的關係不像中國人。對中國人而言，文字似乎是他們文化認同的根本，但很多美國人並不熟悉自己國家的文學經典。我問他，美國文化中有沒有什麼東西，大致上可以跟漢字相提並論。

「也許是電影，」他說，「我覺得在美國，電影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人們獲得世界訊息的方式。如果你問一個美國人某個主題——像是佛教好了，答案總是來自電影。他們會跟你提《小活佛》，或者他們看過的什麼電影。」

「我想，電影所創造的這張網，就跟傳統上中國所創造出的文字書籍一樣。中國書籍裡對真實的看法來自其他書籍。活在那個世界裡的學者，把他們的文化看成一個網。他們不是住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他們不談真實的世界，談的都是歷史與文字。而美國人對電影的看法是類似的，電影中的人們老是談到其他電影。在美國，那好像是個像電影宇宙似的巨大真實。但是這次，它真的愈蓋愈大，變成一個獨自存在的世界。很多人透過它得到真實的經驗，我就是那樣。在美國的時候，我看了很多電影，我覺得真實就是美國電影。你可能會說個什麼，我會答，哦，那讓我想到某部電影。就好像夢與真實全混在一起。對每件事你都有那種感覺，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電影就是文字。他們提供相同的目的，只是語言不同罷了。在中國，書寫最興盛的時期，就是他們最需要重新定義自己的時期，那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創造。它不只是紀錄，而是重新思考過去和創造現在，它是為了證明現在，為了建立思想體系。所以在美國，他們有這些電影，讓美國人感覺自己很美國，像是《珍珠港》。那跟文字、書籍的功能很像。但是電影讓人記得比較久，可能因為它是個比



較視覺性的語言。它也變成人們決定價值觀的方式之一，你已經擁有這些模型和樣式，供你隨時取用。電影給了你一個語言，就跟書一樣。你可以用它來解析自己的個性，你可以用它來理解、來展示、來表達。」

\* \* \*

我一開始是在網站上認識高奕睿的。一天下午，我在Google上搜尋陳夢家，出現了一個網站。我跟該網站的編輯高奕睿聯絡，結果發現，我們有共同認識的熟人——在柏克萊，他上過甲骨文學者吉德煒的課。

高奕睿設立那網站的目的是銷售語言學習的軟體，他也放了一些中國文字系統的資料在上面（陳夢家的引述就在那裡）。不久，他開始接到來自美國年輕人的電子郵件，他們的要求頗為一致：

嗨！我在寫一篇報告，我需要中文字母從A到Z。如果你能幫我，我就太好了。謝謝！

我在找一個中文字母或字型，它好像躲在網站某處，躲得很難找，如果你可以指出哪裡可能找得到，我感激不盡。

謝謝。

我要去刻一個刺青，以紀念最近被殺的一個朋友。我想知道DeAndra、Love、和Angel的字或象徵符號。我要這些字的中文或者中文符號，好把它們刺在身上。你可以幫我嗎？

高奕睿回了他們的電子郵件，他也在網站上放了更多資料。他解釋中文是沒有字母的，是一套由幾千個字組成的表意符號系統。結果他犯了個錯誤：把「中文」和「字母」放在一起——即使是用來否認有這樣的東西，也保證會被任何蒐尋的人找到。現在人們發出的要求多如過江之鯽：

可不可以寄中文字母給我，或者至少這三個字母.....我需要一個C、一個D和一個G，謝謝。我女兒要這些字母，她要把它們刺青在背上。

我真的很需要R的中文字母，如果你讓我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就太棒了。非常感謝你！

你可不可以今天的十二點之前，把中文的「生日快樂」寄給我？謝了。

我的貓「冒煙」最近死了。我想把冒煙或是多煙的中文字放在牠的骨灰盒裡，你可以幫我嗎？

請寄給我有關中國軍隊的資料。

哈囉，我一直在找「哈」和「囉」的中文字，要放在一個刺青上，請幫我。還有「無懼」和「勇者生存」，請回信。

我覺得你應該放一些有關中國人的東西。比如說，第一個皇帝是誰，還有其他重要的人物等等。我到你的網站找第一個皇帝是誰，但找不到。所以我不認為你這些東西很「古老」。

「House Music」的中文符號是什麼？

高奕睿試著有耐性地回答——中文沒有字母，是一套由幾千個字組成的表意符號系統，但人們不接受這個答案，他們生氣了：

你的網站爛透了！我要中文字母！現在就要！

放一些中國名字，你的網站臭死了。

你的網站爛斃了！

嗨，我想給你的網站一個建議。你他媽笨死了，把你的網站叫作什麼中文字母，它哪裡是？人們要找的是中文字母，不是要聽你解釋它為什麼不存在，給人家中文字母嘛。

高奕睿的一個朋友也認為那是個好主意。「他說：『你為什麼不乾脆就給他們？』」高奕睿這麼記得：「所以我們就坐下來，試著想出：什麼可以稱得上『中文字母』。有人建議把中文內碼頁寄給他們——那跟統一代碼的價值一樣，每個字都有數字代表。或者，寄給他們整套一萬三千個中文字，把他們的信箱爆掉。」

最後，高奕睿控制住了他的攻擊性想法，他對自己那樣的反應也有點不好意思。不管怎樣，他畢竟是個嚴謹的學者和古代典籍保管者。但美國人不斷地跟他要中文字母：顯然那樣的需求是存在的，他可以決定要提供些什麼。

他在網站上放了一些美國名字的中文——西西莉亞、傑洛米等等，一個名字訂價十塊美金。剛開始生意很淡：一個月有二百元進帳。他重新設計網站，加進一些人名之外的中國字。他還有策略地設計出，只要有人在Google打進Chinese symbols（中文符號）這兩個字，他的網站就會出現。

「每個月的進帳多到六百美元，」他說，「我心想，酷哦。然後，我再重新設計一次，每個月的收入又多到大約一千五百塊。到了八月，光是中文符號的收入，就大約二千美元。它們只是英文字，有一百多個。你選你要的買，就會收到一個兩週內有效的網頁，可以下載或做別的用。最好賣的是『愛』、『信任』、『命運』、『朋友』、『兄弟』、『哥哥』、『弟弟』、『姐妹』這些字。有時候是『上帝』和『耶穌』。我放了『聖神』，但沒人買，就把它拿下來了。我放『西洋星座』的那天，每個人都在買那個，我想：噢，酷哦。所以，我就把那網頁翻成西班牙文，我們也接到來自西班牙的訂單。所以我想到把日文也放上去，現在我們有百分之二十的收入來自那個部分。一個字賣兩塊半，一次最少得買四個符號。像『命運』，兩塊半。」

「我在匈牙利的妹妹生活狀況不太好，所以我把網站交給她管，賺的錢我們平分。接下來我要放埃及符號，還有馬雅符號。幹麼不？大部分的人買了去做刺青，也有做設計的人跟我買。」

他繼續說：「這網站成立了快一年，後來，我曾看到有些中國人在網路上做類似的生意。但中國人無法只賣中國字，他們得把字放在杯子、筆、T恤，或是其他什麼東西上頭。他們好像不能了解——人們要的不是杯子或T恤，他們只要他媽的那些字。就像你要賣字母B給蒙古人，對中國人而言，那是說不通的。」

## 第二十四章 茶

二〇〇二年六月

老人的朋友把茶送到我北京這兒，包裹裡是兩袋安徽黃山的茶葉。晚春是茶葉最佳的採收季節，飛越太平洋時，我的背包裡都是新鮮的撲鼻而來的茶香。

到華盛頓特區看波拉特時，我繞道到維吉尼亞州雷斯頓一家退休老人之家。藍色的地毯，白色的牆，輪椅路軌——那地方給人的感覺僵硬而無生氣，跟年紀大的人常給人的感覺一樣。我穿過安靜的走廊，來到八二三號公寓。門上有一張貼紙，上頭是一面美國國旗和「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等字。

巫寧坤前來應門，接過我遞上的茶葉時，他高興地笑了。「這就是他們以前在院子裡泡的那種茶，」他說，「你看這綠，是不是很漂亮？以後它會變紅色，但還新鮮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他說，茶是他懷念的中國東西。除此之外，他對美國生活沒有太多抱怨。我坐下，他倒了兩杯法國白蘭地。

\* \* \*

巫寧坤喜歡自稱為「戰爭獲利者」。一九三七年，日軍侵略他的江蘇老鄉，在首都南京犯下大屠殺的惡行，當年十七歲的巫寧坤往西逃。他的童年並不快樂——七歲時母親自殺，逃難的生活給了這年輕人一個新的開始。在四川讀完高中後，他進入昆明的大學主修英文。他

幫當時營地設在四川、對日作戰的美國飛虎隊飛行員做翻譯。戰後，巫寧坤拿到一份印第安那州曼徹斯特學院的留學獎學金，他是學校裡唯一的外國學生。一九四八年，他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些就是巫寧坤從戰爭中獲利的東西——全部是教育上的。

一九四九年之後，跟其他在美國的中國年輕人一樣，巫寧坤面臨一個困難的抉擇。有些芝大畢業生，包括趙蘿蕤，決定回到新中國。她從北京鼓勵巫寧坤回國教書，他最後答應了。當時他的論文《艾略特的批判傳統》尚未完成。他的研究所朋友，一位叫李政道的年輕物理學家到舊金山去送他。巫寧坤問他為什麼決定待在美國，他說：「因為我不想被洗腦。」

故事繼續著。一九五五年，巫寧坤被列名為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七年，他變成了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他被下放勞改；接下來的二十年，他不是牢裡，就是被下放到偏遠的地方。有好幾次他瀕臨餓死。但是，他和太太李怡楷都活下來了。不管怎麼被鬥爭和處罰，李怡楷從未宣布放棄她的天主教信仰。

一九九〇年，曼徹斯特學院頒予巫寧坤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他獲邀留在學校寫他的英文自傳《一滴淚》，該書後來由大西洋新聞出版社出版。書出版後，北京的工作單位取消了他的退休金和房屋居住權。巫寧坤和太太決定在美國住下來，他們的三個成年子女也都在美國讀完書，並定居下來。一九九六年，巫寧坤和李怡楷成為美國公民。

巫寧坤偶爾會幫美國之音寫稿子（「稿費給我買酒！」他說。）。在一次廣播中，他針對我的第一本書寫了篇評論，後來把那篇書評影印寄給我。那次聯絡把我帶向過去：當巫寧坤跟我提到他跟

趙蘿蕤和陳夢家在研究所的情誼後，我決定追蹤報導這位甲骨文學者的故事。

八十二歲的巫寧坤有著濃厚的白髮，談起往事時，他大笑起來，感染力讓人無法抗拒。多年的悲慘遭遇，對他似乎沒有造成什麼影響。他還喜歡講那個不願被洗腦而留在美國的物理學家李政道的故事。一九五七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的時候，李政道成為史上第二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

\* \* \*

「敬陳夢家和我大姐趙蘿蕤一杯。」巫寧坤說，他以大姐稱呼趙蘿蕤，以表示對她的仰慕之情。我們舉杯致意。然後他起身走到書桌前，拿出兩封信。「這些都是很私人的信件。」他說。

兩封都是趙蘿蕤在一九九〇年初期所寫的中文親筆信。有一封跟巫寧坤的書，還有我親眼看它被拆的四合院有關。她寫著：

我還在為你的書感到振奮.....你和怡楷來京可住我處，我們現在西屋是客房，有全套衛生設備。你們可以和我一起吃飯。

「我一直很同情她，」巫寧坤說，「我認為趙老先生待她不是很好。據趙蘿蕤說，她父親原本要把四合院留給她，但是，那個時候她跟陳夢家在一起，所以就把祖屋讓給她弟弟。陳夢家自殺後，她失去了他們的房子，只得搬去跟她弟弟還有弟媳住。他們占了最好的部分，只給她一間小的。他們待她不是很好，三個人甚至不同桌吃飯。」

一位守寡的姐姐，而文革才剛過——他們應該對她多用點心！她只有那兩個小房間。」

他繼續說：「他們的個性完全不同。趙老先生和太太喜歡打麻將，還喜歡跟萬里等其他大人物打網球，對教英文也不是那麼在乎，當趙蘿蕤在翻譯惠特曼時，他們就忙著打麻將！」

他再喝一口白蘭地。他的小公寓塞滿了代表兩種文化的裝飾品。書架上的書中英文都有：布羅茨基、張紫葛、納博科夫、徐志摩、濟慈。牆上掛著一張怡楷和教宗的合照，不遠處是他們的三個小孩和家人的照片。他們有兩個孩子跟白種美國人結婚（「那幾個是混血兒。」巫寧坤指著他孫子們的照片說），另一面牆上掛著一幅詩人汪曾祺的書法：

往事回思如細雨

舊書重讀似春潮

我問巫寧坤，他是什麼時候聽到陳夢家自殺的事。

「在文革結束之前，」他說，「我在安徽時，從一個祕密消息來源那兒聽到的。他不是唯一一個自殺的，我不會那麼做。我可能早就被殺，因為共產黨有的是子彈，他們要殺我什麼時候都可以，但我不會自殺。我母親走那條路，我不會跟她一樣。」

他說，直到政治鬥爭終告結束，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他才跟趙蘿蕤再次見面。

「我連夢家的名字都沒提，」巫寧坤溫和地說，「那恐怕是我遇到的、最難開口的事之一——就算我說對發生的事深感遺憾，那也是些無用、無意義的話，還好她也不提。她沒有哭，她很堅強。」



\* \* \*

文革之後，趙蘿蕤得了精神分裂症，後來她復原到可以教書也可以寫作的程度，並在一九八〇年代，完成了第一本惠特曼《草葉集》的完整中譯本。一九九〇年，她回到母校芝加哥大學，以她的譯作做演講。第二年，該校授予她傑出貢獻獎。她於一九九八年，我搬到北京的前一年逝世。

我對這位女士的一知半解，全靠二手的資料。有些是冷酷的——夢熊記憶中的她坐在院子裡，被紅衛兵剃頭，巫寧坤描述她是如何的不願觸及過去。但有些時候，表面的面紗還是被稍微掀開。曾經擔任趙蘿蕤導覽的芝加哥藝術協會館員潘思婷曾告訴我，她既迷人又活潑，直到他們來到一些她丈夫在一九四〇年代研究過的商代青銅器前面時，她的神情變了。一看到那些古文物，她激動得話都說不出來。她說，她擁有的那本夢家的著作——《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在文革時被拿走了。

打從開始追查，我就知道要去揭開陳夢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之謎，已經太遲了。他的傳奇已隨那些過去的政治鬥爭而消失，他屬於已逝的一代：奮鬥度過上個世紀的知識精英。今日的中國是一個未來的故事，由新興的中產階級所推動，實用主義代替了從前的理想主義，新興城市和外來人口——像艾蜜莉和威利那樣，在一個改變中的國家找尋自己方向的年輕人，才是重要的。身為一個記者，年輕同樣有助於我從事這份工作。這份工作需要體力和自由，必須跟著移動的人的步伐前進。我輕裝便囊地旅行：不帶家人，沒有永久的家，沒有辦公室。我的辦事處裝得進口袋裡——一張通行證和幾張概略的執照。

但隨著我在陳夢家的故事上花的時間愈多，我對存活下來的人愈感敬佩。那是個離途的年代——他們逃離戰亂、避開災難、躲掉政治動亂，他們得整合西方的思想和東方的傳統。大部分的人雖然失敗了，但並沒有失去他們的尊嚴。且更重要的是，不經意之間，他們的理想主義火花延續了下來。我在艾蜜莉和威利這樣的年輕人身上看到那股精神，不管他們身處的是一個如何過度實用主義的年代，他們仍然在乎對與錯。

同時，上一輩的人也以自己的某種方式安定了下來。不論如何，他們都休息了，而且是一種平靜的休息。每次訪問完一位老人，回到紛擾的世界裡——一夜之城、頭條新聞，我都不有一種不同的看待事情的觀點：所有這一切都將隨時間而逝。

老一輩的每個人用自己不同的方式處理回憶。石教授在台灣耐心地工作，挖掘他的舊安陽遺址筆記。王君在一個米黃色的文件檔案中，收錄一位老婦人的謊言；夢熊加入共產黨；李學勤爬到學術塔頂，但卻不諱言對年輕時所寫的那篇批判感到後悔；趙老——當有人批評他對姐姐和姐夫的過往不敬，我不免要懷疑，四合院被拆除是不是某種宇宙循環的報應方式。

每個故事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在北京，我遇到陳夢家的一個以前的學生，叫王世民，王世民曾經擔任趙老和上海博物館之間交涉的仲介，他說，誰也不該責怪趙老從捐贈家具中獲利。「他有權那麼做，」王世民對我說，「老實說，別人不該評論，不管那是好還是壞。」我可以了解他的觀點：與其判定誰錯誰對，何不去了解那場政治鬥爭殘害了多少生命、友誼與家庭。我可以了解，為什麼趙老寧可打網球，也不願只活在不好的回憶裡。所有人都是如此——我從未見過一個存活者對那段過去有不同的反應。那個歷史事件讓我難以想

像，好像來自一個不同的世界，但我完全理解每一個親歷者的反應：努力以個人的方式去復原，是人類的本能。

而我對巫寧坤的沉著，尤其尊敬。他的回憶錄不是暢銷書，但藉由它，他釐清了過去。對於任何作家，尤其是曾受過苦的，那是基本的寫作動機。寫作可以遮掩真相，變成一種陷阱，它可以摧毀，也可以創新。但是尋找意義的本身，自有一份超越所有缺點的尊嚴。

談話中，老人說他對人生沒有後悔。「如果沒有文革或反右運動，我也許會是個比較好的學者，」他說，「我可能會寫出幾本有關英國或美國文學的書。但那又怎麼樣呢？世上已經有這麼多書了，《一滴淚》說不定是比較重要的。」

\* \* \*

我們還在喝著白蘭地時，李怡楷回來了。她去參加了一個當地天主教堂的活動——十六位新執事的授職典禮，她的胸前掛著一個金十字架。聽到先生談起過去，她搖搖頭。

「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我很健忘，」她說，「我忘記東西放哪裡，忘記新的事情，但我記得所有從前的事，有時候甚至是一些小細節，比如幾號、幾點鐘，我都記得。我女兒說，妳怎麼能記得這麼多細節。」

巫寧坤笑了，啣著他的白蘭地。

「像是我先生被逮捕的那天，」她繼續說，「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兩點。那個時間我永遠不會忘記。我也記得到河北監獄去看他的那三次。」

我問巫寧坤在牢裡和勞改營的那些年，他是怎麼維持他的勇氣的。

「我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亞和狄蘭·湯瑪斯，」他說：「你知道狄蘭在他父親死的時候寫的那篇〈死亡不能統治我〉，裡面有一句『在刑架上受折磨』。那跟我們如何行止，應該如何行止有關係。雖然我們在受苦、在被折磨，但死亡不能統治我們。你知道嗎？我在芝加哥聽過狄蘭朗誦自己的詩，那應該是一九五〇年，非常令人感動。」

我問他，有沒有跟那位威爾斯詩人交談。

「沒有，我只是坐在觀眾席裡，」他說，「況且，他那時已經不止半醉了。他不懂得照顧自己。他在受苦——我想對他來說，生命是個沉重的負擔。」

\* \* \*

輪椅路軌、白色的牆、藍色的地毯。退休老人之家的外面，下午的陽光讓我眨眼睛。前面是一排純美式的商店——漢堡王、喜互惠超市、好萊塢錄影帶、麗都披薩、辛辛那提咖啡。我走進一家便利商店，買了罐飲料，回到老人之家門前的長椅上坐下。公車還要幾分鐘才會來，三個老婦人坐在不遠處的另一條長椅上，她們不是在等車，只是在閒聊。

「好喝嗎？」其中一個問。我點點頭，把飲料放一邊。

「小心你的身材。」另一個婦人冷冷地說。她有一口很重的紐約腔。

「你來這裡看誰啊？」第三個老婦問。

「巫寧坤，」我說，「巫先生和李太太。你認識他們嗎？」

「當然！」

「這裡每個人都認識巫先生！」

我問為什麼。三個婦人瞪著我看，好像我是個笨蛋。

「因為他的書，因為他上過芝加哥大學。」一個老婦人說，理所當然似地。她的聲音聽起來很熟悉——中西部人的平板口音。我問她們有沒有讀過那本書，然後馬上明瞭那又是個笨問題。在維吉尼亞州雷斯頓這個特定的角落，巫寧坤是本地作家。

我問她們對巫寧坤的書有什麼看法。

「我喜歡。」一個說。

「他的一生很辛苦。」有中西部口音的那個說。

「尤其是他們把他丟進勞改營那段。」紐約腔的那個說。

公車來了，門嘩啦一聲開了。突然之間，眼前的景象變得很清晰：三位老姐妹，打著線圈，編織著，縫綴著。我呆了一下，不知該如何為我們的這場對話劃下句點。

「你最好趕緊上車。」紐約腔的那個說。然後，我上了車。

\* \* \*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裡，一位朋友幫我找到兩冊中譯的《草葉集》。它們是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封面醒目地寫著「譯者趙蘿蕤」。

一九九四年，美國一位研究惠特曼的學者普萊斯到北京拜訪趙蘿蕤。他們的談話後來刊在《惠特曼季刊》上。訪談中，普萊斯問趙蘿蕤，她是如何翻譯〈搖籃外搖不停〉那首詩的第一段的：全詩的主詞和動詞出現之前，那一段先走了二十二行。

趙蘿蕤說：「要把那些句子只翻成一段是不可能的，我必須說的是，雖然我想忠於原著，但也必須顧及中文的流暢度。」

我重讀惠特曼的原著，然後我拿著那中譯本，藉助字典找出難的字彙，盡我所能地把露西所翻的那首詩的最後三段翻回英文：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歡樂的歌手，今世和來世的統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來，加以利用，但又飛速地躍過了這  
些，  
歌唱一件往事。

有位甲骨文學者曾經說：那些是音符，我們得自己把它們譜成樂曲。

## 後記

我在北京的公寓裡寫完《甲骨文》大部分的內容。這棟公寓坐落於紫禁城北方一公里多，藏身在一條窄小到沒有郵遞地址的巷弄盡頭裡。小巷蜿蜒曲折，共有三個九十度的彎，是那種存在好幾個世紀、屬於北京特色的舊胡同。

一七五〇年，中國正值乾隆皇帝的統治，而最早的北京地圖也在這一年完成。我所居住的這條小巷可輕易在這份地圖上被認出來，因為它的形狀同樣曲折。當地人稱小巷為「小菊兒」，因為它連結到菊兒胡同。

我總是很討厭忙碌熙攘的街道，汽車的喇叭聲此起彼落且未曾停歇，實在太可怕了。然而，小菊兒對汽車來說太狹窄了，所以車不多，巷子裡的聲音也顯得相對清楚。一般來說，我都在黎明時分開始寫作，當我坐在書桌前，我可以聽見從小巷裡傳來的日常聲響。

一天裡的第一道噪音來自公共廁所。我的許多鄰居家裡沒有馬桶，所以當他們一大早拎著夜壺到街上清理時，彼此會順便閒話家常。這些來自街上的聲響越過巷弄，在水泥牆上反彈，最後形成回聲，穿過窗戶，完美地傳入我的耳裡。

每天早上大約六點半的時候，有一個老人會花整整十分鐘在廁所裡。他總是發出低沉、規律且持久的噪音，就像鼓聲一樣。在我早期的寫作生活裡，這類噪音總是令我抓狂，但現在我已逐漸適應，甚至能從中得到領悟。

寫作有節奏，就像是每天的固定行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節奏，老人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但我知道，如果在噪音開始之前我可以產出一些文字內容，那將會是美好的一天。

當攤販出現時，我通常已寫了一頁的內容。他們騎著三輪車，穿過整條巷弄。每個小販都聲稱自己的產品有註冊商標、品質優良。賣啤酒的女攤販聲音最為宏亮，她總是喊了又喊：「買啤酒！」早上八點，這樣的叫賣聲對寫作者來說是很嚴重的干擾。

攤販們共同營造出老胡同的氣氛。米販高音調的叫賣聲、醋商的低沉嗓音，以及刀具師傅敲敲打打的磨刀聲。這些聲音提醒了我，即使我仍未完成我的書，不曾離開那間公寓，生活依然會持續下去。在我家門口，我可以買到食用油、醬油，以及當季的蔬果。在冬天，我可以買到一串大蒜，而且永遠不用擔心煤炭會短缺。每天都有一位賣廁所紙的小販會經過巷弄，偶爾，還會有人帶來蘋果蜜餞。

我甚至可以從資源回收業者那邊賺一點零錢。平均來說，一個資源回收業者每半個小時就會騎著三輪車經過巷弄。他們回收紙板、紙張、瓶罐、發泡膠，以及廢棄家電，例如舊電視。廢棄家電可以維修再利用，或是拆下某些還可使用的零件；紙張和塑膠被賣給鄰近的資源回收中心，以換取微薄的工資。

有時候，當寫作的進度趨緩，或是毫無靈感，我會有放棄的念頭，甚至覺得乾脆把家裡的東西賣一賣好了。我會先從家具開始賣起，然後再賣掉鍋碗瓢盆，我必須認真思考先賣掉電視還是冰箱才好。接著，我會賣掉我的書櫃，一本書接著一本賣，筆記本會是下一個被賣掉的東西，最後賣掉的才是電腦。

某天早晨，我把一堆毫無用處的東西拿去門口賣，看看可以賺回多少錢。一疊舊雜誌賣了六十二分（以下皆為美元），一條被燒毀的



電腦線換了五分，兩個壞掉的燈具賣了七分，一雙前室友的鞋子賣了十二分，兩個壞掉的掌上型數位助理器賣了三十七分，我還把做過標記的《甲骨文》手稿給賣了，對方秤了一下頁數，然後給我十五分。

在結束一天漫長的寫作後，我偶爾會往南走走，在抵達寬街路口前穿過半個胡同。街角處有一間中國建設銀行的分行，每當我看到那個地方，我總是想起這棟建築的前身：趙景心的宅院。我記得在二〇〇〇年深秋，一個晴朗的日子裡，我拜訪了趙老，聽他更新關於官司的最新進度。我也記得十月的某個早晨，這棟宅院終於被拆除。雖然是拆除工程，但工人依然小心地將一磚一瓦取下，因為這些建築材料要再次販售給其他公司。這些建築物件依然存在於某個地方，就像那些記憶依然在我的腦裡鮮明一般。

在中國的時間感就是如此。在來到中國之前，我認為過去已然結束，歷史僅是因果的線性發展。歷史學家選擇重要的事件，並將它們放上合適的順序，然後再調整移動。但隨著我在中國待得愈久，就發現愈少有事情是線性的發展。因為改革開放，人們得以更自由地移動，所以你有機會遇到那些之前活在生存線邊緣的人。大部分被我書寫的人「沒有歷史」：波拉特屬於一個遙遠陌生的民族；艾蜜莉住在一個新興的城市裡；威利住在一個沒沒無聞的小村落裡，被不識字的父母扶養長大。

頭一遭，多數的中國人得以掌控他們的個人生活。移民們做了重要的決定：是否離開鄉村、要去到哪裡、接受什麼樣的工作，即使這些選擇總是沉重，但它們也提醒了人們自身的獨特性。當我訪問威利的父母時，他們告訴我：「我們為毛主席舉辦了追悼會。」村落這麼做、家庭也這麼做，每件事都和群體有關，但威利卻認為個人才是最重要的。

陳夢家也選擇了他自己的名字：流浪者。他屬於較年長的世代，那一代人選擇離開家鄉，但他們的人生最後往往以悲劇收場。當倖存者談論到過去的政治或經濟災難時，他們經常選擇沉默，略過細節。在中國，事情的重點不在於如何發生的，而在於如何被記得。

以現在的觀點看待過去，用過去的觀點形塑現在，是一種常見的協商方式。假使我住在舊城區，我可以預期看到一些老舊的地標消失，這些地標建築的材料有時會被賣掉，以建造新的建築。這就好像我先是書寫，然後印出，接著再把稿件給賣掉。

當我完成本書的一半時，一位總是稱呼我為「叔叔」、有禮貌的男孩周寶宏打電話給我，說他因為生病必須來到北京一趟。很明顯地，他很沮喪。幾週前他的頭部受到撞擊，至今仍為頭痛所折磨。醫生建議他到北京接受X光和其他檢測，但是他無家可住。

我本來也不認識他。我是在研究影片《鬼子來了》（一部贏得坎城評審團大獎卻遭到中國共產黨禁播的影片）時遇見這位十二歲的男孩。同樣地，這部影片也「沒有歷史」，因為共產黨認為這部影片關於過去的敘述是錯誤的，因此決定這部片不能在任何電影院播放。但是劇中的拍攝場景依然存在，就在河北省潘家口水庫的堤岸上。當我造訪那裡，發現當地農民對影片的細節其實不太了解，而且除了周寶宏，其他人似乎都不知道該片已遭到禁播。

周寶宏是我偶爾會在鄉村遇到的聰明、友善的孩童之一，所以我給他我的電話號碼。當他告訴我，他和媽媽正前來北京時，我說他們可以待在我的公寓裡。我把書房讓給他們，自己待在臥室裡工作。

這是他們第一次造訪大城市。女人有很重的口音，而且她的聲音宏亮。作為見面禮，他們給了我一大袋的核桃。出於禮貌，他們堅持不睡在床上，只要睡沙發。第一個晚上，我在半夜兩點被一陣「叔

叔！叔叔！」的呼喊聲驚醒，接著我才發現他們把自己反鎖在客廳裡。隔天，他們弄壞了廁所裡的東西。一天早上，《紐約客》的編輯打來找我，而他媽媽回了這通電話，她用粗糙的口音一遍又一遍地大聲回覆：「你是誰？你是誰？你是誰？」

當我快要寫到周寶宏即將出現的章節時，我卻猶豫了。我不知道是否該把這個住在樓下、等待治療的男孩寫進書裡。周寶宏看起來氣色不錯，他似乎抱著希望。但是一個星期過去了，病情卻毫無起色。最後，他媽媽先回老家了，因為田裡還有工作等她去做。第二個星期過去了，我的寫作依然毫無進展。清晨，攤販響亮的叫賣聲又開始穿過巷弄：「買啤酒！」

最後，周寶宏離開了。我回到家後發現書房是空的。一小時後，電話響了，是周寶宏，他說檢查結果一切正常，所以他決定趕上最早的一班巴士回鄉。他告訴我，如果哪天我去了潘家口，記得要去拜訪他們家。

這個男孩悄悄地離開，在我家留下了一些東西。我發現一袋米、一件髒衣服、一雙壞掉的拖鞋。在客廳裡，我發現一疊錄影帶，那是周寶宏在北京的盜版商店買的（你可以在那裡買到任何東西，甚至是那些被禁播的影片）。最上方的正是《鬼子來了》。

我把所有的東西都丟棄在街上，確信資源回收業者會發現它們。也許他們會把這些塑膠廢料都賣掉，但我由衷希望，他們其中一人會把錄影帶給保留下來，並且觀賞。幾個月後，關於周寶宏的章節很快就寫完了，而就在此刻，周寶宏又打了給我，告訴我他的頭痛已經痊癒了。

二〇〇六年十月於北京

# 謝詞

身為一名研究者，我仍有許多限制與不足之處：不會說維吾爾語、看不懂甲骨文，也並非成長於第十大隊。我曾作為局外人接觸這些領域，並認識具備更多直接知識的學者呈現各自的學術研究、記憶與觀點，正是經由這種專家到作者，作者到讀者的層層交流中，因而創造意義。關於犯錯及失誤一事，我盡所能地確保本書正確無誤，也透過審稿、審閱者得到很多建議，不過在此強調，書中如有任何遺誤之處，皆是我個人造成。

梅維恆幫我閱讀草稿，並給出許多指正與建議。感謝吉德煒耐心回覆無數的電話與電子郵件，他對書中甲骨文內容的回饋讓我獲益匪淺。德范克為我的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提供出色的指引（我從沒看過一位九十四歲的年長者如此迅速地回覆有關語素的郵件）。另外也感謝John Rohsenow追蹤北京的改革者並寄給我有用的研究資料，以及Imre Galambos親切地幫我審閱草稿。

安陽考古工作站的人員惠我良多，尤其是大方給予各種協助的唐際根。荊志淳是洹北遺址的最佳指南，感謝他對「地下城市」章節相關製圖的評論。同時我也在安陽與北京和Rip Rapp、Jim Stotlman、Yang Xizhang、He Yuling、Jonathan Mark Kenoyer，以及高嶋謙一的對話與訪談中獲益良多。

也感謝多年來仍舊與我保持聯繫的學生們。和溫州的雪莉一樣，我的深圳行有艾蜜莉這位很棒的東道主。很高興有機會去樂清拜訪南

西和威利，在造訪第十大隊的旅程中，威利的家人Dai Xinghui和Liu Guiqing都大方地招待我。

我很幸運在《華爾街日報》非官方援助下前往北京，該報運作良好且具備豐厚知識的分部成為我在當地的理想據點。多年來，許多《華爾街日報》和《遠東經濟評論》的記者無私地分享他們的專業知識與建議：David Murphy、Karby Leggett、Charles Hutzler與Peter Wonacott。Sophie Sun和Lily Song以多種不同方式予以協助，Kersten Zhang反覆確認訪談與報導行程的細節，Jason Dean對台灣和好萊塢都相當熟悉並好心地幫我審稿。

我曾在一九九九年於《華爾街日報》辦事處擔任剪報員並與張彥、Matt Forney、Dou Changlu和Xu Jiang共事（了不起的工作團隊），以上全部都歸檔在「J」。<sup>10</sup> Matt的經驗與善意讓我度過在北京多事的第一個春天，自此我便十分珍惜我們的友誼。作為一名年輕記者，張彥的專業知識、判斷力與幽默感是無價之寶，非常感謝他對本書的細膩審閱。

Mark Leong能將所有事物拍得栩栩如生，甚至包括澱粉和甲骨文，何其有幸能與他共事數個專案；Lou Mazzatenta出色地完成記錄安陽文物與考古的工作，米米則記錄趙老先生四合院的最後時日，非常感激她多年來的友誼（尤其是在三岔村）；Shawn McDonald帶我參觀南京；Jen Lin-Liu不但在上海接待我，對威利在北京期間也十分慷慨。我很高興能在菊兒胡同與Mary、Adam Weiss及Travis Klingberg共度時光；其他回中國的和平工作隊前同事們Adam Meier、Craig Simons、Rob Schmitz和Tamy Chapman幫助我以不同方式和四川維持聯繫；從內蒙古到康區所有美好之地，Mike Goettig都是我的最佳旅伴。

非常感激梅英東與法蘭西絲（Frances Feng）的友誼、鼓勵以及對文字在中國和美國之間轉換，極其敏感的觀察力，在此特別感謝梅英東的編輯評論和法蘭西絲的研究協助，以及提供翻譯的陳夢家詩作譯本。

身為自由撰稿者，我受益於編輯和出版社的慷慨支持，十分感謝HarperCollins出版社的編輯Tim Duggan和John Murray出版社的編輯Gordon Wise；也要感謝我的經紀人William Clark在計畫初期便抱持的堅定信念。我很高興有機會為《波士頓環球報》撰寫趙老先生的四合院，《Worldview》的David Arnold則整理了威利的早期簡介。非常幸運能在《國家地理雜誌》與Oliver Payne共事；Bernard Ohanian的先見之明令我們得以擴大對商朝的研究（一直到台灣）。另外特別感謝David Remnick讓我有機會為《紐約客》寫作，他的眼界與廣度使我得以實行書中的諸多主題。

論及對寫作的掙扎與收穫之理解，紐澤西的John McPhee可說是無人能及，感謝他多年來提供的種種建議。來自密蘇里州哥倫比亞的Doug Hunt一直是最棒且最忠實的編輯，自我前往中國寫作以來，他就豪不吝嗇地付出時間並給予評論，本書也藉由他細心的閱讀得到極大的改進。

我的父母始終對我長期缺席抱持耐心，他們各自的專長——社會學和歷史學——對我影響深遠。艾咪確保我的文字條理分明、安潔拉畫了張精緻的地圖、布莉姬塔保留了早期草稿的複本。我十分享受在北京拜訪Gary、Matt和Andrea的旅程，而回到密蘇里州與Connor和Heidi見面總是令人開心。我的祖母朵莉亞多次接待我在出生地與家鄉間往返的時差旅程。

至於萊絲莉，任何言語都不足以形容這麼一位，理解在虛幻浮生之地中追尋過去與現在之人。

\* \* \*

哥倫比亞影業的Alex Graf在我研究中國電影的過程中提供許多幫助，對於他在青海不幸逝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難過，真希望能有機會當面向他致謝。書中其他受訪者也是如此：上海博物館的馬承源、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尹斌庸，以及中央研究院的石璋如。在理想世界中，石璋如本該可以認識地下城市的挖掘者唐際根，然而即使是一百零一年的歲數仍無法克服政治與歷史的複雜性，唐際根第一次訪問台灣的申請被拒，等到申請獲准時，已經來不及見到這位前輩了，於是年輕人只好前往台北的墓地，燒了香火並在墳前磕頭以表心意。

---

10 編按：作者在書中第一章提及，在剪報歸檔時會將檔案依主題以英文字母歸類。

## 參考資料

在《江城》中，因擔心涪陵人可能對該書產生的反應，我用假名「安」代替艾蜜莉的名字。但幾年後發現此舉過於謹慎，決定在本書《甲骨文》移除假名（並讓她恢復成原本的勃朗特）。<sup>1</sup>如有任何混淆之處在此深表歉意，我唯一的藉口就是中國政治氛圍為寫作者帶來的種種不確定因素。

甲骨文學者陳夢家的名字有時在英語著作中寫作Ch'en Mengchia，本書則採用標準拼音：Chen Mengjia。

國民黨奉南京為首都的統治時期，北京以「北平」之名為人所知，為了令內容得以清晰明瞭，我統一以「北京」稱呼該城市。

個人訪談及觀察在我的研究中占比極大，為了避免讀者閱讀這類非虛構寫作時分神，文中並沒有標明注腳，不過本書仍從不少書面資料中獲益良多，以下將分別列出各章節參考的主要資料來源。

### ◎地下城市

Clifford, Nicholas R.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194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非常感謝吉德煒讓我閱讀和援引他未曾發表的中國信件。

### ◎中間人



有關北約轟炸與隨之而來的抗議事件，我參考了《華爾街日報》、《遠東經濟評論》、《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以及倫敦《觀察家報》的報導。成都抗議事件在Craig Simons的老師所著論文中亦有描述，可見“He Who Climbs On a Tiger Might Have Trouble Getting Off: Chinese Nationalism, Protest and Control.” Harvard University, 2001.

維吾爾的歷史主要參考此書：Benson, Linda.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0.

### ◎文字的世界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Translated by Raymond Daw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alambos, Imr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Writing: Evidence from Newly Excavated Texts (490–221 BC).”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2.

### ◎美國之音

Heil, Alan L., Jr. *Voice of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感謝威利協助我訪問他的家人與第十大隊口述歷史的相關人士。

### ◎一夜之城

有關深圳史與中國的經濟特區策略：Reardon, Lawrence C. *The Reluctant Dragon: Crisis Cycles in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a’s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5 (November 1996): 281–303.

### ◎好萊塢

現代維吾爾文化與階級制度的相關背景：Rudelson, Justin J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法輪功與政府鎮壓行動的相關背景：Johnson, Ian. *Wild Grass: 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4.

### ◎龜之聲

關於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安陽發掘與早期甲骨文學者：Bonner, Joey.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Lawton, Thomas. “A Time of Transition: Tuan-fang, 1861-1911.” *The Franklin D. Murphy Lectures XII*. Lawrence, Kansas: Spenc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1.

Li Chi. *Anyang: A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Liu E. *The Travels of Lao Can*.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1.  
Trigger, Bruce G.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商文化與甲骨文銘文的相關背景：Chang Kwang-chih.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Keightley, David N. *The Ancestral Landscape: 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ca. 1200-1045 B.C.)*.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Loewe, Michael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夜空不寂寞

Miao Yong. *Wode Shenghuo Yu Ni Wu Guan*. Guangzhou: Huacheng Chubanshe, 1998.

### ◎四合院

北京的歷史與覆滅主要依靠張彥的著作《野草》（*Wild Grass*）以及 Wang Jun. *Chengji*.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2003.

關於梁思成與林徽音的相關背景：Fairbank, Wilma.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 ◎青銅頭像

Bagley, Robert, ed.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Seattle: Seattle Art Museum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hang Archaeolog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Von Falkenhausen, Lothar.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67 (1993): 839–49.

### ◎書

Chen Mengjia. *Yin Xu Buci Zong Shu*.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1956.

Kaogusuo, bianji. *Mei Diguo Zhuyi Jieluede Wo Guo Yin Zhou Tongqi Tulu*.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1962.

Paper, Jordan. “The Meaning of the ‘T’ao-T’ieh’.” *History of Religions* 18 (1978): 18–41.

Wu Ningkun. *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3.

### ◎鑿不裂的骨片

陳夢家的詩作並未以英文出版。感謝法蘭西絲翻譯許多陳夢家的詩，使得這些作品能被印於本書，書中所有相關摘引均來自她的譯作。

在以下資料來源可以找到陳夢家的詩和其他著作的中文版：

Chen’s poems and other writings in the original Chinese may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sources: Chen Mengjia. *Chen Mengjia Juan*. Wuhan:

Changjiang Wenyi Chubanshe, 1988.

Chen Mengjia. *Tie Ma Ji*. 1934.

*Xin Yue Shi Xuan*. Shanghai: Xin Yue Shudian, 1933.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Elinor Pearlstein研究陳夢家在美國度過的歲月，並參觀了洛克斐勒基金會和許多博物館的檔案室。非常感謝她大方地讓我拜讀她的草稿“Chen Mengjia in the West: Scholarship Realized, Lost, Preserved.”，使我了解陳夢家在美國和歐洲之旅的諸多細節，本書有關陳夢家寫給洛克斐勒基金會以及蘭登·華爾納寫給陳夢家的信件都引自她的論文。

同時也感謝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Jason Steuber，提供收藏於堪薩斯博物館檔案室裡陳夢家一九四五年的信件影本。

另外我還參考了以下中文出版物：

Wang Shimin. “Chen Mengjia.” *Zhongguo Shixuejia Pingzhuan (Xia Ce)*. Beijing: Zhongguo Guji Chubanshe, 1985.

Zhao Luorui. *Wode Du Shu Shengya*.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6.

有關吉德煒在甲骨文及其他領域的研究，本書仰仗前述提到的資料（*Sources of Shang History*與*The Ancestral Landscape*）以及以下參考來源：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Keightley, David N. “Art, Ancestors, and the Origins of Writing in China.” *Representations* 56 (1996): 68–95.

——. “Clean Hands and Shining Helmets: Heroic Action in Early Chinese and Greek Culture.” *Religion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Past*. Edited by

- Tobin Sieb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 . The Making of the Ancestors: Late Shang Religion and Its Legacy.”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Edited by John Lagerwe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The Origins of Writing in China: Scripts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e Origins of Writing*. Edited by Wayne M. Senner.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 . “Shamanism, Death, and the Ancestors: Religious Mediation in Neolithic and Shang China (ca. 5000-1000 B.C.).” *Asiatische Studien Etudes Asiatiques* LII.3 (1998): 763–831.
- . “What Did Make the Chinese ‘Chinese’?: Musings of a Would-Be Geographical Determinist.” Warring States Working Group, Amherst, Massachusetts. 8 October 2000.

### ◎奧運會

Bredon, Juliet. *Peking*.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0.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eds. *5,000 Years of Physical Culture & Sports in China*. Beijing: Beijing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1996.

Jennings, Andrew. *The New Lords of the Rings: Olympic Corruption and How to Buy Gold Medal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Senn, Alfred E. *Power, Politics, and the Olympic Games: A History of the Power Brokers, Events, and Controversies That Shaped the Games*.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1999.

### ◎字

Lewis, Mark Edward.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Takashima, Ken-ichi. "A Cosmography of Shang Oracle-Bone Graphs."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e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e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Edited by S. C. Yau. Paris: Centre Recherche Linguistiques sur l'Asia Orientale, 2001.

### ◎翻譯

Chuang Tzu. *Wandering on the Way: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Translated by Victor H. Mair.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4.

### ◎馬

Hadingham, Evan. "The Mummies of Xinjiang." *Discover* April 1994: 68–77. (A condensed version of Hadingham's article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in *Reader's Digest*, August 1994)

Mair, Victor H.,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ume 1*.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 "The Horse in Late Prehistoric China: Wresting Culture and Control from the 'Barbarians.'"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Edited by Marsha Levine, Colin Renfrew and Katie Boyle. Cambridge, UK: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3.

- . “Mummies of the Tarim Basin.” *Archaeology* March/April 1995: 28–35.
  - . “The North(west)ern Peoples and the Recurrent Origins of the ‘Chinese’ State.” *The Teleology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 Japan and China*. Edited by Joshua A. Fogel.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 . “Prehistoric Caucasoid Corpses of the Tarim Basin.”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 (1995): 281–307.
- Wang Binghua. *The Ancient Corpses of Xinjiang: The Peoples of Ancient Xinjiang and Their Culture*. Translated by Victor H. Mair. Urumqi: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99.

### ◎餛飩西方

姜文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中國思想氛圍中的作用：Bar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選舉

Shih Chang-ju, with the assistance of Liu Hsiu-wen, Feng Jong-meei, and Lai Shu-li. *Hou Chia Chuang (The Yin-Shang Cemetery Site at Anyang, Honan): Volume X: Descriptions of Small Tombs: One*.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1.

下列書籍的標題譯為「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的回憶」，講述林正杰父親的故事：Lin Kunrong. *Gui Hong: Yige Dihou Qingbaoyuan de Huiyi*. Taipei: Renjian Chubanshe, 1989.



## ◎批判主義

- Li Xueqin. "Ping Chen Mengjia Yin Xu Buci Zong Shu." *Kaogu Xuebao Di San Qi* (1957): 119–29. Wang Shixiang. *Classic Chinese Furnitur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ranslated by Sarah Handler and Wang Shixiang.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2000.
- . "In Memory of Mengjia."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 Summer* (1991): 70–72.

## ◎遺失的字母

- 漢字的口語、書寫系統與文字改革運動的相關背景：Boltz, William G. "Language and Writ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Haven, Connecticu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 DeFrancis, John. "China's Literary Renaissance: A Reassessment."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7.4 (Oct.-Dec. 1985): 52–63.
- .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 . "Language and Script Reform."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in East Asia and South East Asia*. Edited by Thomas A. Sebeok. The Hague: Mouton, 1967.

- . “Mao Tse-tung and Writing Reform.” *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China*. Edited by Joshua A. Fogel and William T. Row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9.
- .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 Mair, Victor H. “Review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antone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by Cheung Kwan-hin and Robert S. Bauer.”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2.1 (2002): 157–67.
- Rawski, Evelyn Sakakid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 Rohsenow, John S. “The Second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59 (1986): 73–85.
- . “Diagraphia in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0 (September 2001).
- Su Peicheng. “Diagraphia: A Strategy for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21st.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S. Rohsenow.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50 (September 2001).
- Zhou Yougua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Scripts*. Translated by Zhang Liqing. Columbus, Ohio: National East Asian Languages Resource Cente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3.
- 周有光生平的背景資料：Zhang Lijia and Calum MacLeod. *China Rememb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陳夢家參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文字改革運動中的爭論：Chen Mengjia. “Chai Qiang He Liu Xian: Kaogu Xuejia Chen

- Mengjia.Xiansheng Fangwen Ji.” *Renmin Ribao*. 17 May 1957.
- . “Guanyu Hanzi de Qiantu.” *Wenzi Gaige* Di 82 Qi (19 May 1957).
- . “Liang Dian Xiwang.” *Wen Hui Bao*. 6 May 1957.
- . “Lue Lun Wenzixue.” *Guangming Ribao*. 4 February 1957.
- . “Women Dang Bianji de.” *Wen Hui Bao*. 19 April 1957.
- Hong Duren. “Jianhua Hanzi Bu Shi ‘Zheng Zi’ ma?” *Meishu Luntan* 1. (1958).
- Huang Cuibo. “Bochi Youpai Fenzi Chen Mengjia ‘Hanyu Jueding Hanzi’de Miulun’.” *Jiang Hai Xue Kan* 5 (July 1958).
- Qin Hua. “Jixu Zhuiji Youpai: Bochi Chen Mengjia, Guan Xi.” *Zhongguo Yuwen*. 10 Hao 1957.
- Seybolt, Peter J. and Gregory Kuei-ke Chiang, eds.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1979.
- Shi Zhenye. “Ye Tan Guanyu Jie Ci Jiegou Zuo Wei Yu.” *Zhongguo Yuwen*.60 (June 1957).

### ◎濃縮精華

- Chen Lei. “Wenzhou Zhongkao ‘Xiemi Shijian’ Diaocha.” *Nanjing Zhoumo*. 25 June 2003.

### ◎抄錯的字

- 長江三峽大壩歷史的相關資料：Chetham, Deirdre. *Before the Deluge: The Vanishing World of the Yangtze’s Three Gorg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巴頓將軍之墓

“Uyghur Separatist Denies Links to Taliban, Al-Qaeda.” *Radio Free Asia Uyghur Service*. 28 January 2002.

## ◎茶

Price, Kenneth M. “An Interview with Zhao Luorui.” *Walt Whitman Quarterly Review* 13 (Summer/Fall 1995): 59–63.

Walt Whitman. *Cao Ye Ji (Leaves of Grass)*. Translated by Zhao Luorui. Shanghai: Yiwon Chubanshe, 1991.

Wu Ningkun. *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3.

---

1 編按：安妮、艾蜜莉和夏綠蒂為勃朗特三姐妹，是三位著名的英國作家，分別創作了《荒野莊園的房客》、《咆哮山莊》、《簡愛》等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推測作者以安為假名代替艾蜜莉的想法可能出自於此，所以在文中說明要讓她「恢復成原本的勃朗特」。

何偉作品集 02

# 甲骨文（三版）

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

作 者 何偉（Peter Hessler）

責任編輯 邱建智

譯 者 盧秋瑩

校 對 魏秋綢

排 版 張彩梅

封面設計 莊謹銘

副總編輯 邱建智

行銷總監 蔡慧華

出 版 八旗文化／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

地 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3號8樓

電 話 02-22181417

傳 真 02-22188057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信 箱 gusa0601@gmail.com

Facebook facebook.com/gusapublishing

Blog gusapublishing.blogspot.com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印 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1年7月

三版一刷 2025年10月

I S B N 978-626-7509-79-1（紙本）

978-626-7509-75-3（PDF）

978-626-7509-74-6（EPUB）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社立場。

Copyright © Peter Hessler, 200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Clark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